

帝

王

明代 帝王陵墓制度研究

刘毅著

人民出版社

陵

墓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

ISBN 7-01-005359-6



9 787010 053592 >

ISBN 7-01-005359-6 定价：42.00元

帝

王

明代 帝王陵墓制度研究

刘毅著

人民出版社

陵

墓

责任编辑:乔还田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卢永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刘毅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

ISBN 7-01-005359-6

I. 明… II. 刘… III. 陵墓-研究-中国-明代 IV. 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1279 号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

MINGDAI DIWANG LINGMU ZHIDU YANJIU

刘 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8.875

字数:45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5359-6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刘庆柱

六年前,我应邀作为刘毅博士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高兴地看到了这篇博士论文。我长期从事古代都城与帝陵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研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我曾经参加并主持过汉唐帝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此后我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这就是我看到《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倍感兴奋的原因。

刘毅博士以《明代帝王陵墓研究》为题,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想主要是他看到了这项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有着“视死如生”理念,当时人们的生死观认为:世界有“生”与“死”两个世界,前者是人类生前的活动空间——“阳间”,后者是人类死后的归宿——“阴间”。正因为如此,古人非常重视墓葬的修建,尤其是历代王朝的帝王更是倾全力营建其陵墓,使其恢弘不异人间。帝王生前的主要活动空间是其都城,古代都城是王国或帝国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和文化礼制活动中心。帝王去世后的“阴宅”应该按照其“阳宅”——都城修建,因此《吕氏春秋》记载国王修建的“陵墓若都邑”。如秦始皇陵陵区范围56平方公里,仿照当时通行的都城布局形制,陵园设内城与外城,内城中央为帝陵高大封土。在陵园之中有秦始皇的妃嫔与儿女的墓葬,陵园附近的东南部还有皇室显贵的陪葬墓。秦始皇陵陵区现已发现各类陪葬坑180座,包括陵园之内的铜车马坑、文官俑坑、百戏俑坑、石铠甲坑、

马厩坑等,陵园之外、陵区之内的兵马俑坑、动物俑坑等,这些陪葬坑反映了秦始皇生前所在都城布局的情况。又如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显然是以唐朝首都长安城为蓝图修建的。乾陵坐北朝南,陵园平面方形,四面各辟一门,陵墓位于陵园中部。陵区自南向北置鹊台、乳台和陵园南司马门门阙,它们分别象征都城的外郭城正门的明德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从这一角度来看,“阴间”的墓葬成了“阳间”都城的缩影与模型。因此,历代王朝的帝王把陵墓的修建视为国之大事。历史文献记载,帝王一般是“预作寿陵”,帝王墓葬最早所称之“陵”即名“寿陵”。有的帝王登基伊始即为自己建造陵墓,如汉武帝在位54年,他为自己修建陵墓长达53年。帝王陵墓不只是修建时间长,而且耗资巨大,有的帝王陵墓建设经费几乎占用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历代帝王对陵墓的修建越来越重视,从陵墓到陵园,从陪葬坑到陪葬墓,从陵寝建筑到陵邑设置,帝王陵墓越来越成为体现王权或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形式。有鉴于此,古代帝王陵墓的研究,就成为揭示古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与途径。帝王陵墓成为复原、认识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考古资料。当然,在谈到对古代帝王陵墓资料进行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应该明确古代帝王陵墓及一般古代墓葬,虽然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但是它们毕竟还不是现实生活的再版,古代墓葬是人们为死者构建的“理想”世界,其中既有现实生活的“折射”,也有对现实生活的“期盼”。这种生者对死者的“期盼”,实际是生者理想的寄托。古代墓葬的“期盼”习俗、“夸大”的文化现象,在当今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调查中还可以看到。尽管古代墓葬资料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遗产,其科学研究价值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考古学、历史学而言,所有的各种各样资料既有其优越性,也有其局限性,古代墓葬资料当然也不例外。

刘毅博士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中颇具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明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晚期的王朝，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制度之大成，这在帝王陵墓制度方面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刘毅博士在《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一书中，通过回顾、梳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和以往关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展开对明代皇陵制度、王陵制度及其所涉及的关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渊源问题、陵墓选址问题、埋葬与随葬品情况、祭祀制度等，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重要学术观点，颇多创新之意，如关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方面创新多于继承的认识，并且进一步指出有明一代，帝王陵墓制度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通过对帝陵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凤阳明皇陵、明孝陵与明长陵及以后诸帝陵的三个时期分期的科学论断，并进而提出创新的学术推断：即凤阳明皇陵属于基本继承唐宋帝陵制度，孝陵开明代帝陵一新之格局，长陵因之小有改作，以后其他诸明帝陵则进入守成时期。此外，该书对于明代藩王陵的分期，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意义。

近年有关古代帝王陵墓方面的著作出版数量不少，其中大多为普及读物，像刘毅博士《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这样的学术专著还不多见。《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的突出学术特点是考古资料的大量使用，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有机结合。我们知道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殷墟甲骨的释读、汉晋简牍的出土、敦煌文书的发现，曾经震惊世界，成为中国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契机，引发了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新史学的诞生。国学大师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等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密切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近百年来，从世界范围的历史科学发展趋势来看，考古资料在历史科学研究中使用越来越多、

学术价值越来越重要。无庸讳言,目前中国学术界能够很好地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有机结合的历史著作,为数不多。我认为刘毅博士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就是这些“为数不多”中的一部,因而对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能够出版,我觉得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刘毅博士长期主持南开大学文物博物馆专业的教学工作,他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全面、系统的掌握相关考古学资料,尤其是在中古时代以后的考古学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宽广的学术积累。这应该是他搞好博物馆学专业教学、推进博物馆学研究和取得一系列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基础。我期盼着今后刘毅博士再接再厉,为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为社会各界撰写出更多、更好的像《明代帝王陵墓研究》这样的精品学术著作。

2005年8月18日

执著与严谨的追求之作(代序)

冯尔康

刘毅弟将《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书稿拿来,要我写序,我理解、尊重他的情谊,但是当时没有答应。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懂考古学,从未研治过帝王陵墓史,哪里有资格为这部运用考古学、历史学结合研究的成果——《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作序!鉴于友情,我将书稿留下,表示思考一下再说。

现在我写序了,不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序”,名曰“代序”,仅是想说两句心里话:一句推荐该书出版的话,一句表示我对刘毅佩服的心情,而且主要是为说后一句话而不得不说前一句话,因为既然就该书说其作者的追求,怎么能不提这部书呢!

第一句话很简单,我将推荐信原文照录于次:“刘毅教授的书稿《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是第一部关于明代帝王陵墓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论述了明代皇陵、王陵的陵园制度、玄宫制度及其特征与演变,并通过纵通(帝王陵墓的明代与古代、清代的比较)、横通(明代皇帝陵与亲王陵的比较)的比较研究,首创地提出明代皇陵制度与前代相比是创新多而继承少的见解,具体指出明代山陵建于山阳慢坡处,注意穴点和周围环境的选择;皇陵陵宫确立全新的平面布局,其结构模拟“前朝后寝”;陵祭比前代发生根本性变革,取消寝祭,突出殿祭,甚至陵墓之祭重于太庙之祭;天子玄宫用石材建造,亲王用砖石混合材料,体现社会等级差异。鉴于该书稿是一部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结合的颇具学术建树的陵墓史专著,特予推荐,建议出版,以享学术界和读者。”

第二句话,句子长一点,然而也有限。

1999年6月,这部书稿的初稿,作为刘毅的博士学位论文被答辩委员会通过了,至今算来,已经整整六年又一个季度,一般的情形,书稿早就会变为著作问世了,可是刘毅才将它交给出版社,最快明年始可见书。见他不着急的样子,我倒有时间问问加工修饰的情形。他当然不是不想早出书,但是有个原则,就是对书稿修改提高,精益求精。他在补充资料,丰富已有的见解。而这种充实,不只是图书文献,更多的是田野考察,文物调查,这自然要大费时日和精力了,且不说经费的筹措。举例来说,2002年9月我们一起去桂林出席学术研讨会,会间去明代靖江王陵园考察,我的“考察”不过比一般性参观多用点心,他则不然,对所要获得的信息,先作详细的调研提纲,进行目的性极强的实地调查和访问,我们只在那里停留了几小时,他不满足,又专程去继续察看。今日我们看到书中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目之第8子目《靖江诸王陵园》,他奔波的辛劳情景立即显现于我的脑际。同章的《明代亲王陵墓资料表》、《明代亲王妃墓葬资料表》等四个表,莫不是这种艰苦劳作的产物。时下社会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谁都知道,博士论文的出版,就意味着职称、津贴,甚而至于房子,当然越早推出越好,刘毅不慌不忙,他不是嫌钱烫手,而是要保证著作的学术质量,他在追求学术的高品位、高质量。

刘毅在本科,学的是政治学,他同时在历史学系学习文物博物馆学,获取双学位,与只学一个学科的同学一样,所用的时间亦是四年,可知他的勤奋于学了。两个学科,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他毕业后进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博物馆学专业工作,文物博物馆学知识结构庞杂,涉及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的考古学,他又投入进去,进行相关知识的补充和从事新领域的课题研究。不时听他讲,到浙江什么地方去了,到河南、陕西、山东那个地方去了,到考古发掘工地

去,带领学生去哪个博物馆实习去,到什么遗址研究课题去,总之在校外的时间很不少。他的专业,要求他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结合起来,他克服种种困难实践着这种要求。跑田野,辛苦、费神,出活难,他从来不计较这些。这样,他的知识结构不断完善,从而能够胜任他的工作,提高学术研究的品质。他现在是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学政治学、历史学出身的年轻人,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在令人替他高兴,当然更佩服他了。他在书上讲研究方法是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即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材料的结合,不过他更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为基本依据,结合明代以来的文献记载,进行实物与文字材料互勘、互证,写出他的书。他的这种多学科结合研究,令我们可以信赖他的研究结论。

刘毅被文物界接受,特别是被陶瓷考古学界认可,是完全凭着他的学术实力打出来的,是挣出来的。我常想,我所在的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群体的声誉,是我的老师郑天挺、杨志玖等教授开创的,当郑天挺师在1980年举办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令学术前辈、同龄人知道我们,给了我们展示的机会,我们就容易冲出去。老师早走了,但留给我们恩泽,让我们享受余荫。可是刘毅和我们决然不同,他缺少群体的资源,在他身边没有人能够拉扯他,他必须自己闯,用他的学术见解、学术成果感动同行,去接纳他。他三十岁出头时成为陶瓷学会理事,是奋斗出来的,是学术实力的体现,当然也体现出陶瓷学会的真正学术团体的品格。

最后,我愿意说:刘毅能写出这样的好书,在于他的勤奋,他的知识结构较为完善,他的对学问的执著追求和严谨的学风,这样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可以预期,他还会有新成果贡献给学术界。

2005年10月8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目 录

序	刘庆柱(1)
执著与严谨的追求之作(代序)	冯尔康(5)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的范畴和学术意义	(1)
一、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范畴	(1)
二、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的学术意义	(7)
第二节 中国明代以前陵寝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	(8)
第三节 明代帝王陵墓的研究状况与本书的预期目的	(25)
一、明清时期有关明代帝王陵墓的文献资料	(25)
二、民国以来对于明代帝王陵墓的调查和发掘	(28)
三、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现状	(34)
四、关于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方法	(35)
五、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预期目的	(38)
第二章 明代皇陵制度研究	(41)
第一节 明代皇陵的建置沿革	(41)
第二节 明代皇陵陵园制度研究	(54)

一、凤阳皇陵和盱眙祖陵	(54)
二、南京孝陵	(70)
三、北京长陵	(80)
四、北京昌平陵区诸陵	(89)
五、景帝陵和显陵	(99)
第三节 明代皇陵玄宫制度研究	(107)
一、明神宗定陵玄宫的结构	(107)
二、明代皇陵玄宫的使用和后妃葬制	(117)
三、关于明代皇陵玄宫结构演变的讨论	(138)
第三章 明代王陵制度研究	(153)
第一节 明代皇子制度和王陵概况	(153)
一、明代的皇子制度	(153)
二、明代王陵的数量估算	(157)
三、明代王陵调查和发掘的基本资料	(172)
第二节 明代王陵陵园形态研究	(198)
一、明代王陵陵园形态	(199)
二、关于明代王陵陵园制度的讨论	(242)
第三节 明代王陵玄宫形态研究	(281)
一、明代王陵的玄宫形态	(284)
二、关于明代王陵玄宫制度的讨论	(317)
第四章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若干问题的专题研究	(326)
第一节 关于明代皇陵对于前代皇陵制度的继承问题	(326)

一、关于南宋皇陵(攒宫)对明代皇陵的影响	(326)
二、明代皇陵对于前代陵寝制度的继承	(341)
第二节 制约明代皇陵、王陵选址的因素	(362)
一、地理因素对陵址选择的影响	(362)
二、政治因素对陵址选择的影响	(363)
三、风水理论对陵址选择的影响	(373)
四、礼制因素对陵址选择的影响	(387)
第三节 明代帝王埋葬制度和随葬品研究	(394)
一、明代帝王的葬式和装殓	(395)
二、明代帝王随葬品研究	(413)
第四节 明代皇陵祭祀制度研究	(470)
一、明代皇陵祭祀制度概况	(470)
二、关于明代陵祭几个问题的讨论	(477)
第五节 明代“陵山之祭”研究	(497)
一、明朝“陵山之祭”的发展过程	(498)
二、“陵山之祭”出现的原因	(504)
第六节 影响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变化的原因	(507)
一、帝王个人旨趣的影响	(508)
二、国家财力的制约	(511)
三、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	(517)
第五章 余论	(521)
第一节 明代帝王陵墓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 上的地位	(521)

第二节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对于清代和民国陵墓建 置的影响·····	(523)
一、清朝皇陵概况·····	(523)
二、明清陵寝制度的异同·····	(531)
三、明代陵寝制度对民国陵墓的影响·····	(543)
第三节 明陵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研究·····	(544)
一、明代帝王陵墓的保护·····	(544)
二、明代帝王陵墓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548)
三、明代帝王陵墓的研究·····	(550)
参考书目·····	(551)
后记·····	(583)

第一章 引 论

本书研究明代帝王陵墓制度,本章首先讨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范畴、历代陵墓制度的发展演变概况、明代帝王陵墓的发掘和研究状况、本项研究的预期目的等问题。

第一节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的范畴和学术意义

陵寝是中国古代墓葬的形式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墓葬’”^①。“陵寝”则是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墓葬的一种特殊称谓。

一、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范畴

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的基本内涵可以分别从“陵”、“寝”、“庙”三个概念来理解。

1. “陵”

^① 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制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6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陵”字的本意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成语有“陵谷之变”即用此义。东汉应劭考证说:“《诗》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春秋左氏传》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崤在弘农澠池县,其语曰:‘东崤西崤,澠池所高’。《国语》:‘周单子会晋厉公于加陵’。《尔雅》曰:‘陵莫大于加陵,言其独高厉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坟垆各称陵也”^①。这段话把“陵”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辨析得很明白,并特别指出汉代王公坟墓各称“陵”。北魏酈道元考证云:“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②。此后,沿袭应劭和酈道元之说者不乏其人,都认为汉代高坟大冢始称“陵”。

事实上,“陵”字派生出“墓葬高大封土”之义已见于先秦,而不是始于汉朝。对此,清初顾炎武曾经做过考证,他在《日知录》中认为:“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及春秋以降,乃有称‘邱’者,楚昭王墓谓之‘昭邱’,赵武灵王墓谓之‘灵邱’,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邱’,盖必因其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③。顾亭林以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335年)为以“陵”指称高坟大冢之首见,亦即认为“陵”这一名称始于战国时期。清末俞樾又根据《汉书·地理志》中“河东郡·襄陵”条下唐颜师古注:“晋襄公之陵,因以名县”;“陈留郡·襄邑”条下颜师古注:“圈称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

① 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一〇,《山泽·陵》,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元大德本,第70—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一九,“渭水”,第286页,岳麓书社,1995年。

③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陵”,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湿,故徙县于襄陵,谓之‘襄邑’”等两条资料^①,认定:“春秋之世已有陵名”^②。按,晋襄公驩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八月,宋襄公兹父卒于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7年)五月,如颜注无误,则至迟公元前7世纪晚期已有以“陵”名诸侯墓之例。

从前哲的考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陵字由本义高大山丘,不晚于春秋战国之际引申出高大的坟墓之义,此义系因高坟大冢堆土象山的实际面貌引申而来。从汉代起,“陵”开始成为帝王墓葬的特定称谓,如高祖墓称“长陵”,文帝墓称“霸陵”等,是陵字又从单纯的封土象山之义扩充为指代帝王墓葬之全部及其附属设施。

2. “寝”

“寝”字的本义是指古人正规的、或最主要的起卧处所,成语“寿终正寝”即用其义。“寝”在“堂”之后,正规的堂、寝之间还应该以门相隔,“寝门”之名数见于《仪礼》、《礼记》等典籍,如《仪礼·士婚礼》谓:“妇至,主人揖妇以人,及寝门,揖人,升自西阶”^③。帝王则专门辟有寝宫,以与受朝办事之“殿”、“朝”相并列,帝王所居若多的寝宫具体又可以分为“露寝(正寝)”与“小寝”等。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礼也”^④,因而也在宗庙中、陵园内为先人设置了“寝”和“便殿”,而且在寝中要如对待生者一般服侍先人。汉代皇帝陵园的寝要“日

^① 汉·班固:《汉书》卷八二上,《地理志第八上》(唐·颜师古注文),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6册,第1551、15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② 清·俞樾:《〈日知录〉小笺》,“陵”,影印《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本,附载影印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32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 《仪礼·士昏礼第二》,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仪礼注疏》卷五,第966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④ 《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五年》,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九,第2174页,中华书局,1980年。

上四食”，唐儒颜师古认为：“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①。汉诸陵之寝中不仅要供奉饮食，而且还要“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②，寝中有宫人等人役应差，完全如墓主生时一般。此制唐宋相沿无改，至明初，明太祖下令取消了皇陵中寝的建置，这便是顾炎武之所谓“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③，是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 “庙”

“庙”字的本义是指宗庙。上古自天子至士皆可建庙，用于崇祀祖先；后代庶人亦可建造祠堂以祭享先人，这种祠堂，有时也称之为“家庙”，唐代颜真卿即有书法名作《颜氏家庙之碑》。天子的宗庙仿生前宫殿为之，规制崇宏，有象征朝堂的“庙”，还有象征露寝的“寝”。东汉末蔡邕认为：“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④。在上古时代，“庙”与陵墓应该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事物，并且，墓的地位要逊于庙。《礼记》记录了孔子和曾子的一段问答，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东汉郑玄在“望墓而为坛以时祭”句下注释曰：“不祭于庙，无

^① 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10册，第3116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② 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见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200页，中华书局，1965年。按，“严”即“妆”，避汉明帝讳庄改。

^③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墓祭”，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④ 汉·蔡邕：《独断》卷下，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爵者贱,远避正主”^①。从这段对话及其注释中,可以明显看出上古之“庙”在正规的礼仪活动中的地位为墓所难望其项背。

秦火以后,古礼不尽传于世,西汉列帝皆各自在陵旁立庙,但这种“庙”仍然是上古意义的宗庙,而不是陵园本身的设施^②。东汉明帝把“西都旧有上陵”之礼制度化,届时,“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武行之舞。乐阋,(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③。这种仪式与以往陵园中寝殿内的“上食”之礼不同,而是“如会殿前礼”^④,亦即模拟朝会仪式。从此,陵园中的主体祭祀建筑——“寝殿”或“石殿”开始具有了一部分宗庙的功能。

在古文献中,不晚于两汉之交已经有了“陵”、“庙”并称的用法。如《汉纪》记载: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五月,丞相韦贤病故,其子韦弘“为太常丞,贤以弘当为嗣,太常职当陵庙,烦剧多过,敕令自免”^⑤。

① 《礼记·曾子问第七》,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礼记正义》卷十九,第1399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② 西汉之宗庙初建于长安城南,至惠帝时以每月“游衣冠”不便等原因,采纳叔孙通之议,迁高祖之“高庙”重建于渭水北岸,因称“原庙”。“原”者,再也。景帝以后诸帝皆于陵旁立庙,相因无改。参见刘庆柱:《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③ 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见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103页,中华书局,1965年。

④ 汉·刘珍等:《东观汉记》卷二,“显宗孝明皇帝”,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本,第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⑤ 汉·荀悦:《汉纪》卷十七,“孝宣一”,地节三年五月甲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3册,第36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

又如《后汉纪》记载,明帝于永平二年(公元59年)十月“甲子,幸长安,祠陵庙”^①。“陵”、“庙”并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皇陵地位的提高。此后,唐宋陵园中的“献殿”、明清陵园中的“祫恩殿”、“隆恩殿”等作为陵园中的主体祭祀建筑,都沿着东汉以来强化陵上政治性祭祀的方向继续发展。“陵上之庙”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与宗庙的祭祀方式也越来越相近似;在这种制度、观念变化的背后,是皇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一定程度上看,明清皇陵中的享殿或曰献殿,具有和国都中太庙(宗庙)相同的功能和象征意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即:“陵寝”是一个特称名词,它专指中国古代帝王的墓葬,其内涵不仅包括墓葬的本身,还包括了陵园中的其他一切附属设施。陵寝制度则是历代帝王墓葬及其附属设施和各种规范的总和。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应该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中地面陵园建筑、地下玄宫^②建筑以及附属的石像生、碑刻等,属于凸显于表层的物质层面,而葬式、陵园布局和玄宫结构及

^① 晋·袁宏:《后汉纪》卷九,“显宗孝明皇帝纪”,永平二年十月甲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3册,第59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 “玄宫”即墓室,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地下建筑的核心部分。中国早期大型墓葬的墓室结构为木椁或凿山为穴,大约从东汉开始改为砖石建筑。“玄宫”之名至迟六朝时已有之,1960年在南京富贵山麓曾经出土过一块石碣,其上有“晋恭皇帝之玄宫”等字(李蔚然:《南京富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载《考古》1961年第4期),该石碣现藏南京市博物馆。据《唐会要》等文献记载,唐朝帝陵墓室名曰玄宫。宋朝皇室以所奉始祖名中有“玄”字,为避讳,将玄宫改称为“皇堂”。《宋会要辑稿》卷七三四七记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七月七日“礼仪院言:玄宫上字理合回避,请只以‘皇堂’为名,从之”。明代对于皇陵墓室的称谓,见于《明实录》者有“玄宫”、“皇堂”、“玄堂”、“寿宫”、“地中宫殿”等,有时也直接称为“陵寝”。清朝避圣祖玄烨之名讳,一般将玄宫称之为“地宫”。本书一般用“玄宫”表述。

其所映射出的思想观念等,则属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以历代帝王陵墓为基本研究对象,探究历代帝王陵寝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之轨迹。这一领域应该有两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一是陵园制度,包括陵园布局、祭祀建筑使用制度以及相关的陵园总体规划、祔葬墓和陪葬墓布列制度等;其二是地下埋葬制度,如棺槨制度、玄宫制度以及葬式和殉葬、祔葬之制等。除这两项主要内容外,还应该兼及一些其他与陵寝规制有较密切关系的问题,如身份等级制度、宗法制度、灵魂观念以及宗庙、宫室制度等。笔者以为,陵寝制度本身的研究重点应该在于物化层面,而精神层面的东西则用于辅助解释系统。杨宽先生曾经认为:“所谓陵寝制度,就是把远古流行的在墓地上建屋献食的礼俗,加以固定化和扩大化而已”^①,似乎将陵寝制度的研究范畴限制得过窄。

二、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的学术意义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陵寝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一个缩影,不同时期的陵寝制度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想和社会风貌。因此,古代陵寝制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历代陵寝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对于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研究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其次,陵寝制度是古代专制皇权的产物,陵寝除了埋葬亡故帝王的实际功用外,更是为了宣扬帝王的“威德”而建,借以展示墓主的

^①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文治武功”，从而达到神化皇权并巩固统治秩序的目的。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陵寝以及相关制度的建设，作为时代文化的载体，历代陵墓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礼制思想、灵魂观念、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建筑艺术甚至帝王个人好恶等多方面的信息；也就是说，历代帝王陵墓真实地记录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上层的历史。

第三，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对于古代帝王陵墓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也是帝陵考古的基础工作之一；同时，帝陵考古发现的一些现象或遗迹，也需要通过陵寝制度的研究给予合理的解释。

第二节 中国明代以前陵寝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

按照古史传说，中原地区在距今四五千年时已经产生了帝王制度，即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所谓“三皇”、“五帝”。后来禹之子启继父而立，建立夏朝，是为帝王“家天下”之始。夏代及其以前的个别王陵，在先秦史籍中有零星的记载。公元前628年，秦人伐晋，秦大夫蹇叔告诉从征的儿子：“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①。此外如《墨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也都有关于“禹葬会稽”的记载。现在虽然能见到一些传说时期和夏商两代的古帝王陵墓，如河南淮阳的伏羲陵、湖南酃县的炎帝陵、陕西黄陵的黄帝陵、山东曲阜的少昊陵、河南濮阳的颛顼陵和帝喾陵、山西临汾的尧陵、湖南

^① 《春秋左氏传·僖公三十二年》，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之《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七，第1839页，中华书局，1980年。

宁远的舜陵以及浙江绍兴的夏禹陵、安徽亳县的商汤陵等,但它们基本都是后世为追怀圣王功德而兴建的纪念性建筑,不一定是这些古帝王的真正藏骨处;而且“五帝”之有无都还是一个尚未完全廓清的历史疑案。因此,这些所谓的“圣王”陵墓,并不能用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信史资料。

迄今为止,能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古帝王陵墓是位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西北岗一带的商代晚期的商王陵和商王族墓。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轫起源时期。

殷墟商王陵为土坑竖穴,分为“亞字型”(四条墓道)、“中字型”(两条墓道)两种形式,其他王族成员则有“中字型墓”和“甲字型墓”(一条墓道)等墓葬形式。商王陵中陪葬品丰厚,而且还有殉人、殉牲^①。商王墓穴之上没有封土,但在侯家庄等地一些大墓和小屯村妇好墓的墓口之上却发现同期有同期的建筑遗迹^②。关于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的功用和性质,有人认为应该是“寝”^③,也有人认为它们应该名曰“宗”,是享堂^④。

西周王陵至今未能发现,从司马迁《史记》和裴骈“集解”、张守

① 商代贵族之葬流行以人或牲畜殉葬,殉人、殉牲一般埋葬在椁室周围和墓道中,另外,在椁室下的腰坑中也有殉人或殉狗之例。西周以后,以生人为殉的现象日渐减少,象征人的各种不同质料的俑在东周以后日渐流行。明朝初年,在皇族内部又恢复了残酷的妻妾殉夫之制,直到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正月,始以英宗遗诏废止。

②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台北,1962年;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期,195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③ 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

④ 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

节“正义”以及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孙星衍《皇清经解》等文献中的考辨来看,今陕西咸阳塬上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周成王等“周陵”实系讹传;现代考古调查表明,它们应该分别是战国秦惠文王、悼武王陵以及若干汉代皇陵的后陵或陪葬墓^①;西周王陵应该在今陕西西安的西南部,即周都沔、镐遗址附近。但也有人根据陕西周原的有关考古发现,认为西周王族墓地可能在周原黄堆一带,“寻找西周王陵,应当把黄堆作为主攻方向”^②;2004年春,陕西岐山县凤鸣镇周公庙一带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墓葬群,其中有“亞”字型大墓,因而有人认为与西周王陵有关^③;但这些都还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西周王陵和商王陵一样,地表也应该是“不封不树”的。

东周王陵在今洛阳附近,考古调查、钻探资料表明,东周王陵分为周山、王城东北、金村三个陵区^④,估计东周诸王陵的地下结构应该与商王陵相同,为土坑竖穴式木椁墓。1957年在洛阳王城东北钻探出4座规格很高的甲字型东周大墓即为此种结构,其中一座墓曾遭两次盗掘,清理出的残存随葬品中有带“天子”字样的石圭^⑤。2001年在洛阳西工区27中内发掘过一座“亞”字型大墓,出土鼎上有“王作宝尊彝”铭,初步断定为周王墓;2002年在洛阳中州中路与金谷园路交汇处发现有六马驾车的车马坑,在其西南曾探出大墓一

① 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② 罗西章:《西周王陵何处觅》,《文博》1997年第2期。

③ 周原考古队:《周原李家楼铸铜作坊遗址发掘和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1日第1版;孙玉松:《西周王陵掀开面纱》,《今晚报》2004年5月24日第21版。

④ 洛阳市文化局:《洛阳市文物志》第80—82页,洛阳市文化局内部印行,1985年。

⑤ 洛阳市文化局:《洛阳市文物志》第81页,洛阳市文化局内部印行,1985年。

座,也为东周王陵的调查发掘提供了重要线索^①。

春秋时期至秦代,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从此以后,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开始有了明显的发展序列,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封土墓的出现^②。中原地区王侯贵族墓上开始出现封土是在春秋晚期,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大墓,封土高7米,直径55米,该墓所在地为吴楚交界处,墓主应系吴或楚国的贵族^③。1992—1995年,江苏苏州浒墅关相继发现了2座春秋中晚期和3座战国晚期的封土墓,其中D9M1的墓主推测为春秋中晚期的吴王寿梦^④。战国时期,封土墓日渐普及,在今河北易县和邯郸、山东临淄、陕西咸阳、湖北江陵、浙江绍兴等地都发现过一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巨大封土堆,它们分别是燕、赵、齐、秦、楚、越等国的王陵所在^⑤。这些

① 刘先琴:《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开馆》,《光明日报》2004年10月4日第A2版。

② 封土即墓室之上的坟邱土冢,以土夯筑而成,是帝王陵墓的重要标识物。战国秦汉至宋代,帝王陵墓封土平面大多是方形或长方形,上小下大,如覆斗状,多分成上下三层或二层。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皇陵封土名曰“陵台”。从明太祖孝陵开始,明清两代皇陵的封土改为圆形或椭圆形,并且以砖石环砌,称为“宝城”。封土的中心凸起部分称为“宝顶”,在明清文献中有时也把宝顶及其围墙统称为“宝城”。

③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大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④ 苏州博物馆:《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⑤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张学海:《田齐六陵考》,《文物》1984年第9期;李兆华:《荆门发现楚大型陵园建筑》,《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4日第1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封土堆由夯土筑成,最高的可达10余米,封土的形状,有的呈方锥形,有的原型已经难于判定,有些陵墓的封土堆上还明显地残留着同期建筑的遗迹。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𦉑墓中出土的“兆域图”展现了中山王陵地面建筑的情况^①。这件“兆域图”的出土表明战国时期不仅在王侯埋葬处的地表上出现了封土标识,而且还有规模宏伟的陵园建筑。

春秋战国时期王侯陵墓的墓室结构仍因袭前代,土坑竖穴,开辟墓道,或一或二,还有些不设墓道;墓坑内为棺槨结构。除土坑竖穴外,还出现了开凿山岩为墓穴的特殊做法,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墓穴系开凿于丘陵的岩石中,墓室形状亦不规整^②。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经过历年的勘察,陵园及附属建筑的布局正在逐渐廓清,陵园及周围发现有大型兵马俑坑和大量珍贵文物^③。秦始皇陵是秦代以前陵寝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墓。它是先秦陵寝制度的最高级示例,确定了秦以后陵寝制度的基本框架。

汉代皇陵因袭秦制,在制度上有所简省亦有所变化发展,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初步发展时期。西汉十一帝,葬于渭水北岸咸阳塬上者有九帝,自西而东依次为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成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𦉑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②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有关资料可参见王学理著:《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园考古队:《秦始皇陵》,《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第348—349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帝的延陵、平帝的康陵、元帝的渭陵、哀帝的义陵、惠帝的安陵、高祖的长陵、景帝的阳陵。另有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两陵在长安城东南。自19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对于长安城周围的西汉诸陵及其附属建筑遗址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调查和勘探,弄清了渭北九陵的排列次序,纠正了一些讹传^①;其中有些陵园如宣帝的杜陵^②、景帝的阳陵^③等还先后进行过钻探和局部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汉陵陵园结构已经基本清晰。

西汉皇陵未经发掘,地下墓室结构尚不清楚,但根据陕西栎阳汉太上皇陵的钻探^④、北京大葆台汉燕王墓的发掘^⑤等资料分析,汉皇陵应为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墓穴之上建有高大的封土堆,为方或长方型覆斗状,一般高十二丈,武帝茂陵规模最大,高十四丈。诸帝陵域中还有宫城、阙、寝、便殿等地面建筑,在帝陵之东建有皇后陵,

①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③ 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⑤ 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陵园外有助戚陪葬墓。陵旁附设陵邑^①。文帝霸陵因山为藏,在山体中凿洞修建墓室,不另起坟。各地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有不少这种葬制的实例,如河北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②,山东曲阜九龙山鲁王墓^③,河南永城芒砀山汉梁王墓^④,徐州狮子山^⑤、北洞山^⑥和小龟山^⑦以及周围其他汉楚王墓^⑧,广东广州南越王墓^⑨等。

① “陵邑”是西汉时期在列帝陵园之旁设立的县级行政建置。汉初的陵邑之内,迁徙关东战国旧贵族后裔以及“高贤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居守。徙富民实关中,一方面是为了奉守祖先陵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地方政治、经济势力,强化中央集权,亦即所谓“强干弱枝”。汉初诸陵包括太上皇陵、勾弋夫人云陵等陵皆有陵邑,至元帝渭陵始废而不建。陵邑即以所奉之陵为名,如汉高祖长陵之陵邑名长陵县、武帝茂陵之陵邑名茂陵县等。汉渭北之长、安、阳、茂、平五陵之陵邑号称“五陵”,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唐代。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③ 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⑤ 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⑥ 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⑦ 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汉墓》,《文物》1973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等:《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⑧ 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⑨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东汉时期的皇陵制度与西汉相比大同小异,但陵园结构趋于简化。自明帝开始在光武帝原陵上推行“上陵礼”之后,陵上祭祀活动和祭祀建筑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进而影响到唐宋以后的陵园建筑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东汉诸陵分别在东都洛阳城的东南和西北,按照文献记载:光武帝葬原陵、明帝葬显节陵、章帝葬敬陵、和帝葬慎陵、殇帝葬康陵、安帝葬恭陵、顺帝葬宪陵、冲帝葬怀陵、质帝葬静陵、桓帝葬宣陵、灵帝葬文陵^①,共11座,由于行政地理变迁和后人张冠李戴之误指,诸陵的位次尚有待进一步勘查考证^②。另有少帝被董卓杀死,藁葬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圻中;献帝禅位于曹魏,死葬禅陵,在山阳郡(今河南省修武县北)。

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代,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由衰微到复兴的时代。魏文帝曹丕鉴于东汉诸皇陵被盗掘、遗骸遭毁弃的惨状,为确保身后之安宁,乃实行薄葬,不建寝庙等陵园建筑,地面不留任何痕迹。曹操原已按汉制以王礼营葬,至此亦撤除车马衣服等。蜀、吴二国除汉昭烈帝惠陵在成都^③、传说吴大帝陵在南京明孝陵前梅花山以外^④,其余诸帝陵虽有陵名记载,但具体位置已难确指。

① 关于东汉诸帝陵名称,各书记载不尽相同,《后汉书》中也有缺载。此处据清代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十三、十四综合考证著录,影印清道光刊本,第94—108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② 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韩国河:《东汉陵墓踏察记》,《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③ 一般认为汉昭烈帝惠陵在成都西南郊外,今武侯祠旁之土冢即是。曾有昭烈帝实葬奉节之说,否定成都惠陵之真实性,因而有人专门撰文论证成都惠陵之真,如梅铮铮等:《对惠陵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清明子:《读惠陵史料札记》,《四川文物》2001年第5期。

④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四,《国事类·南都二墓》条有云:“孝陵城西门内有吴孙权墓”,排印本,第148页,中华书局,1959年。

西晋五陵(包括追封的宣帝、景帝、文帝三陵)亦仿曹魏之制,不封不树,晋五陵地望在洛阳城东,其中文帝之崇阳陵经过发掘,武帝之峻阳陵经过铲探,二者均为为规模稍大的土洞墓^①。东晋南迁,诸帝葬建康钟山西翼阳坡,即今南京鸡鸣山、富贵山一带,其墓室结构为凿山成穴、砖砌单室券顶,多建有完善的排水设施^②。另有晋穆帝永平陵在南京北郊北固山,其结构与富贵山者相似^③。

南北朝时期陵园制度有所恢复,南朝宋、陈皇陵在今南京附近,齐、梁两朝皇陵在今江苏丹阳陵口。从已经发掘的丹阳胡桥齐景帝修安陵^④、齐废帝东昏侯墓以及齐和帝恭安陵^⑤、南京西善桥陈宣帝显宁陵^⑥等实例来看,南朝陵墓的地下建筑与东晋相仿,为砖砌单室结构;但地面陵园建筑明显增多,墓上多筑有封土,并且陵前还辟有很长的神道,自陵墓所在的岗阜顺山势直抵平地,神道两侧置望柱、天禄、辟邪等石仪。南朝陵墓凭山而建,各抱地势,陵园朝向随山向背,而不像汉陵那样都有固定的方向。

北朝统治下的北方陵园制度也有所恢复,北魏早期皇陵在代地,即今山西大同附近,其中文明太皇太后(孝文帝祖母冯氏)的永固陵经过发掘^⑦。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诸帝葬于洛阳瀍水以西,仿汉制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② 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③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

④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

⑤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⑥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⑦ 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筑封土、建陵园,令功臣勋戚陪葬于灋水以东。其中孝文帝的长陵经过勘察^①、最近的调查钻探又取得了重要收获^②,宣武帝的景陵经过发掘^③,有研究者对北魏诸帝陵的位次及相关问题做过比较系统的探讨^④。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诸皇陵各自在首都附近,东魏北齐诸陵在邺城,即今河北磁县漳河北岸,西魏和北周皇陵在陕西咸阳市渭北塬上。其中北齐文宣帝武宁陵^⑤、北周武帝孝陵^⑥经过发掘。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自立,继而以北朝为基础统一了全国,隋文帝卜陵于陕西扶风三畴塬,名“泰陵”。泰陵经过调查^⑦,它以汉代皇陵制度为模本,又兼采南北朝诸帝陵的长处,陵寝制度开始向复杂、完备发展;只是隋三代而亡,且炀帝死于非命,藁葬于扬州,未能完成这一使命。

唐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鼎盛时期,陵寝制度亦在此时得到了空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第3期。

② 朱亮等:《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调查钻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7日第1版。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④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等:《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⑦ 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前的高度发展。唐朝共有二十一位皇帝(包括武则天),末二帝昭宗李晔被朱温杀害于洛阳,葬和陵,哀帝李祝死于山东菏泽,葬温陵。其余 19 位皇帝均葬于汉陵以北的北山山脉附近,自乾县至蒲城,东西绵亘 150 余公里,号称“关中十八陵”。唐代诸陵做过较为系统的调查,其中有些陵墓还做过多次调查或局部清理发掘^①。诸陵的位次,自西而东依次为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僖宗的靖陵、肃宗的建陵、太宗的昭陵、宣宗的贞陵、德宗的崇陵、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高祖的献陵;庄陵、献陵一线以北自西而东为懿宗的简陵、代宗的元陵、文宗的章陵、中宗的定陵、顺宗的丰陵、睿宗的桥陵、宪宗的景陵、穆宗的光陵、玄宗的泰陵。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王世和等:《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王仲谋等:《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泾阳县文教局:《唐贞陵调查记》,《文博》1986年第6期;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1987年;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马文良:《唐玄宗泰陵的石雕》,《文博》1991年第4期;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第3期;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第4期;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蔡建明等:《唐代帝陵中第一次发现双重城垣——航拍显示乾陵外城跨山越谷气势恢宏》,《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5日第1版;姜捷:《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王小蒙:《昭陵六骏的新出土》,《文物天地》2003年第8期;昭陵考古队:《昭陵北门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第355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唐陵的建筑方式有两种,一是仿汉制封土为陵,如唐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另一种是因山为陵,即在山腰间开凿洞穴,在洞穴内构筑墓室。这种做法始于太宗营建昭陵,至高宗乾陵已基本确定规制。唐陵规模宏大,帝后同穴合葬,在陵山或封土的周围建有气势恢弘的陵园,陵山位于陵宫城内部正中,其南为献殿。陵城四面正中各辟一门,按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神方位命名。以朱雀门外为主神道,夹列石像生和蕃部客使等像。在陵宫(上宫)的西南方向约2.5公里处另建寝殿(下宫),供奉帝后灵魂起居生活。

199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唐僖宗的靖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虽是帝陵,但仅为单室土洞墓^①,时当丧乱之际,规制简陋,据僖宗遗诏所云:“应缘山陵事物,宜令中外商量,比从来每事十分各减六七”^②,因而该陵不足以代表唐代帝陵的玄宫制度。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展再度趋向低落,诸王朝的陵墓建造多承汉唐之制,但规模却远逊之。由于敌国之间相互仇杀,这些短命朝代的皇陵还有不少被取而代之者破坏、发掘,保存到今日的很少。保存比较好的五代帝王陵墓只有河南新郑的后周太祖、世宗二陵,周陵规制简朴,有封土而无神道石像生。此外,经过调查和发掘的十国陵墓有南京江宁的“南唐二陵”^③、浙江临安和杭州

^① 陈安利:《唐十八陵》第1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第323—327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②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十二,《帝王·遗诏下·僖宗遗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6册,第111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③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

的若干座吴越王陵和王妃墓^①、福建福州闽太祖宣陵^②、四川成都前蜀高祖永陵及后妃墓^③、后蜀高祖和陵^④、南汉高祖陵^⑤等。

宋、辽、金、西夏、元时期,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处于徘徊阶段,这几个王朝的皇陵兼采汉唐诸陵制度为之,鲜见创新,其中北宋皇陵最具代表性。

北宋皇陵在河南巩义市,埋葬着七个皇帝,另有太祖之父赵弘殷(追尊为宣祖)的迁葬墓,号称“七帝八陵”。巩义八陵分为四个陵区,西村陵区(东南部)有宣祖的安陵、太祖的永昌陵、太宗的永熙陵,蔡庄陵区(中部)为真宗的永定陵,孝义陵区(北部)为仁宗的永昭陵、英宗的永厚陵,八陵陵区(西南部)有哲宗的永泰陵、神宗的永裕陵。北宋末二帝徽宗和钦宗在靖康之变中被掳至金国,均死葬于北地,后来钦宗被金世宗以一品礼归葬巩洛之原,即北宋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杭州郊区施家山古墓发掘报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7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3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第8期;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② 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闽王王审之夫妇墓清理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

③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市1990年田野考古工作纪要》,《成都文物》1991年第1期;张亚平:《“前蜀后妃墓”应为前蜀周皇后墓》,《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④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第3期。

⑤ 冯永驱等:《广州发掘南汉高祖刘龚康陵》,《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1日第1版;冯永驱等:《南汉开国皇帝之康陵》,《文物天地》2005年第4期。

皇陵兆域^①。北宋皇陵制度比汉唐简易,皇帝生前不再预营寿陵,陵寝规模也比较小。巩义宋陵陵园的基本建制是:中央为封土陵台,其下即为玄堂地宫,陵台南为献殿,陵台、献殿四周环以陵宫城墙,四面辟门,南神门外为主神道,夹列石像生,设阙两道^②;陵宫北面偏西处为下宫寝殿。北宋诸陵实行帝后分葬,皇后陵亦仿帝陵制度,但规模较小,一般在帝陵西北部。各陵近处有功臣陪葬墓,还有宗室墓区。北宋诸陵有比较详细的考古调查勘探资料^③,但巩义陵区中只有一

① 关于宋徽宗的葬地,宋金以来诸书记载有异。《宋会要辑稿》云“崩于金”并记绍兴南宋皇陵兆域有永祐陵,《全辽志》及《宋史》则云葬在五国城,《宋史》又云归葬绍兴。一般认为五国城就是越里吉城,即今黑龙江依兰。清礼亲王昭槿《嘯亭杂录》卷八“五国城”条则认为:“五国城在今白都纳地方,乾隆中副都统绰克讷筑城,掘得宋徽宗所画鹰轴,用紫檀匣盛瘞,千余年墨迹如新。又获古瓷器数千件,因得碑碣,录徽宗晚年日记,尚可得其崖略。云于天会十三年寄迹于此,业经数载。始知金时所谓五国城即此地也”。按,清代白都纳即今吉林扶余,金天会十三年即宋绍兴五年,为公元1135年。又据宋人《南渡录》卷三记载,宋徽宗死在均州(按,金均州即辽福州,其地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正东约70余公里处),被当地土人按习俗焚尸投水中作灯油。《南村辍耕录》等书云绍兴永祐陵实为空陵,《辍耕录》且引孙阳语,谓宋徽钦二帝陵墓在高丽。根据上述等有关文献记载,笔者认为:宋徽宗实未得归葬南宋,其骸骨沦落金国,确切埋葬地点已经失考。又,傅永魁等:《北宋徽、钦二帝陵墓考》(载《中原文物》1992年第4期),认为巩义回郭镇清易镇村原有徽宗衣冠冢和金人归葬的钦宗墓,合称“二圣冢”。

② 阙作为陵墓建筑群入口的标志,不晚于秦代已经出现,唐、宋皇陵神道前之阙均为左右对称的双阙,以夯土筑成胎芯,其外包砌砖石,顶上建三出楼阁。北宋皇陵南神门外设阙两道,《宋会要辑稿》等文献称其南者为“鹤台”、北者为“乳台”。

③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杨伯达:《古代艺术的瑰宝——巩县宋陵雕刻》,《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傅永魁:《巩县宋陵》,《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学集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傅永魁等:《河南巩县宋永昭陵的考察》,《考古学集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座皇后陵的墓室部分经过发掘,为砖构单室,规模比较小^①。

南宋皇陵在浙江绍兴宝山,南宋六帝葬于此,为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南宋末三帝,恭帝降元北徙,葬所失考;端宗葬广东新会崖山;帝昺亡国投海,相传墓在深圳赤湾。南宋皇陵又称“攒宫”,意为暂厝待迁巩义之暂葬所,所以规制较北宋更为简单,但仍按旧制分设上、下宫,上宫有献殿、攒殿(又名“龟头”,棺椁在其下)等建筑,下宫仍为寝宫。南宋诸皇陵埋葬较浅,在宋亡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明初曾略有规复。关于绍兴诸陵的规制、方位等尚有异议^②,陵区的考古调查工作也刚刚开始^③。

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和金三个王朝也有各自的陵寝制度。三朝皇陵一方面吸收唐陵、宋陵的某些制度,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若干本民族的特征,如契丹式的葬法、西夏陵园中的陵塔等。

现存辽陵分布于三处,一处 在辽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镇),为辽太祖之祖陵^④,已发现比较清晰的陵寝建筑遗迹^⑤;另一处在辽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② 陈仲篪:《宋永思陵平面及石藏子之初步研究》,《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3期,中国营造学社印行,1936年;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③ 葛国庆等:《绍兴发现宋六陵宁宗墓碑》,《文物天地》1997年第6期;陆菊仙:《宋六陵的历史与现状》,《东方博物》第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 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考古》1966年第5期。

⑤ 董新林等:《辽代祖陵陵寝建筑初现端倪》,《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26日第1版。

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幸福之路乡),名怀陵^①,葬有辽太宗和穆宗;再一处是在辽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力嘎王坟沟),称庆陵^②,葬辽圣宗、兴宗和道宗。

西夏王陵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下,除追尊的太祖葬裕陵、太宗葬嘉陵外,见诸史载的还有景宗泰陵、毅宗安陵、惠宗献陵、崇宗显陵、仁宗寿陵、桓宗庄陵、襄宗原陵等。西夏陵经过严重破坏,其中一座属于西夏晚期的皇陵墓室^③、3号陵(推测为泰陵)的碑亭和陵园遗址^④经过发掘,全陵区北面的礼制建筑也经过发掘^⑤,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曾经对西夏王陵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调查,诸陵位次已基本廓清^⑥。

金代皇陵最初在黑龙江,今黑龙江阿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西面有金太祖旧陵的遗址^⑦。《金史》记载,海陵王贞元三年(公元1155年)春,在中都大房山云峰寺营建山陵,次年即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十月,“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⑧。大房山金陵共有17座,但

① 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

② [日]田村实造等:《庆陵》,京都大学座右室刊行会,1953年;[日]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株式会社同朋舍,日本京都,1977年。

③ 宁夏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④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三号陵园东碑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银川市西夏3号陵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8期。

⑤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⑥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

⑦ 许子荣:《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张连峰:《金胡凯山和陵考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3期。

⑧ 元·脱脱等:《金史》卷五,《海陵本纪》,张政烺等点校本第1册,第107页,中华书局,1975年。

由于它们在元初和明末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性破坏,而今早已面目全非,这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正在展开,金陵的面貌日渐清晰^①。

由蒙古族建立的蒙古—元朝相继攻灭了西夏、金和南宋,重新统一了中国,元代的帝王丧葬制度与前代迥异,据《元史》和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叶子奇的《草木子》等明初文献记载,元诸帝崩后均归葬于“起辇谷”,不封不树,地下无墓室玄宫,地表亦不建陵园等一应设施,起辇谷的地望也是众说纷纭^②。以其实行“秘葬”,我们可以认为元代不存在正规的陵寝制度。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经过辽、宋、夏、金四朝之徘徊与元朝之中衰,从明初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明太祖对于前代陵寝制度斟酌损益,从预营寿陵孝陵开始,创立了全新的皇帝陵墓规制,并为后嗣诸帝所尊奉。明代帝王陵墓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发展模式,它们以鲜明的创新特色标志着中国古代陵寝制度走到了一个新的、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后的一个

① 宋大川等:《金陵遗址第一阶段调查报告》,《北京文博》2001年第3期;宋大川等:《金陵遗址主陵区第二阶段调查报告》,《北京文博》2002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2期。

② 历代关于起辇谷的地望莫衷一是,南宋徐霆疏证彭大雅之《黑鞑事略》认为起辇谷应该在克鲁伦河河畔;明人龚之钥《后出塞录》认为起辇谷在北京房山县;清人张鹏翮认为元朝诸帝后驾崩皆潜厝于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老城)北九里之“祁连山”;张穆《蒙古源流记》认为起辇谷在河套伊克昭盟腾格泊西北,即塞因诺颜左翼右旗与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交界处。民国初屠寄《蒙兀儿史记》、张相文《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曾论及成陵及有关问题;现代研究者有外蒙古三河源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等说。笔者推测,起辇谷应该在斡难河等三河源头处的布尔罕山一带,即今蒙古肯特山地区。这里是博尔济锦家族的发祥圣地,元朝后嗣诸帝或许皆随先祖而葬。

发展阶段。

第三节 明代帝王陵墓的研究状况与本书的预期目的

从广义上说,对于明朝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在明代本朝就已经开始,只是明清两代对于明陵的研究,大体上都是局限在礼制的讨论和輿地著录两个基本范畴之内。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北京昌平明神宗定陵的考古发掘为起点,若干座明代帝王陵墓调查和发掘资料的相继整理刊布,为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但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本来为数不多的关于明代陵墓的文章中,资料性、知识性的偏多,而研究与探索性的却寥若晨星。下面分别介绍明清以来关于明陵的资料性和研究性成果以及本书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明清时期有关明代帝王陵墓的文献资料

明清两代关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记载的文献种类不少,但大多比较零散,依据这些文献自身的性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官、私所修史书类:如明代历朝《实录》和《大明会典》,以及《皇明大政纪》、《名山藏》、《国朝典汇》、《皇明史概》、《宪章类编》、《嘉靖大政类编》、《王国典礼》、《太常续考》、《罪惟录》、《国榷》、《明史》、《钦定续文献通考》、《明会要》等。其中明代十五朝《实录》对于有明朝诸皇陵的卜选经过、兴建时间、施工进度、竣工时间、经费开销以及某些皇陵的陵园制度等内容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对于各地藩王陵墓的营建及相关事项也有一些记载,资料最为翔实,但该书总计将近3000卷,有关内容分散于不同的年月日之下,查找的工作量极大;

《大明会典》对于明代皇帝、亲王等人的陵墓規制、祭祀制度等内容有粗线条但却条理清晰的记载；其余诸书或辟专条，或散见于相关的传、纪、志等诸条目中。

2. 文集与笔记类：如《皇明经世文编》、《国朝典故》、《治世余闻》、《松窗梦语》、《戒庵老人漫笔》、《七修类稿》、《万历野获编》、《酌中志》、《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昌平山水记》、《春明梦余录》、《北游录》等，这类书目关于帝王陵墓制度的记载大多是以条目的形式出现，比较散乱，并且多为只言片语；但有些是当事人的记载，史料价值比较高，其中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是研究明代昌平列帝陵的重要资料，所记为作者在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至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十余年间六次实地拜谒诸陵亲历所见，其史料价值远在《大明会典》之上。

3. 地方史志类：如《大明一统志》、《中都志》、《帝乡纪略》、《钦定日下旧闻考》、《顺天府志》，以及各地省、府、县之地方志如《四川通志》、《宁夏新志》、《西安府志》、《兖州府志》、《太原县志》、《南阳县志》等。其中清代乾隆朝于敏中等奉敕编纂的《钦定日下旧闻考》著录了明昌平十三陵及金山陵区若干陵墓的重要资料，摘引自诸家诗文集和笔记，内容比较详赅。官私所修地方志关于明代帝王陵墓的记载一般在“陵墓”、“古迹”、“山川”和“金石”门中，“陵墓”或“古迹”、“山川”门所记多为明代藩王陵墓的方位、世次等，大多语焉不详，关于陵墓制度的具体记录资料比较少；但这些记载却为各地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调查和指认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金石”门著录碑文、圻志文，可供皇族史研究参考，一般对于陵墓制度研究的价值并不特别大。

4. 专门著述类：如《查勘皇陵纪》、《帝陵图说》、《读礼通考》、《历代陵寝备考》等。《查勘皇陵纪》撰成于崇祯年间，作者蒋德璟时

任礼部侍郎,奉旨查勘泗州祖陵和凤阳皇陵,因作是篇,记述二陵状况。《帝陵图说》三卷,清初南丰人梁份撰。该书专记明代两京皇陵规制,亦为实地调查之记录,详于《昌平山水记》,约成书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或稍后^①。卷一记南京钟山孝陵,卷二记长陵等昌平诸陵,卷三记金山诸陵,卷四为“十三陵记”上下两篇。此书有汪鱼亭藏抄本,缺第一卷,且有说无图,十三陵管理委员会曾据以内部影印传世;又有北京图书馆藏图、说俱全本。清初徐乾学著《读礼通考》研究历代礼制,该书第九十三卷专录明代诸皇陵。《历代陵寝备考》五十卷附《历代宗庙备考》八卷,清中期上海人朱孔阳撰,书前有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赵曾显序及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刘汲序。该书采摘历代官私史书、礼书、政书以及诗文集等而成,记述太古盘古氏至明末历代帝王陵墓。明代部分在该书第四十五卷至第五十卷,文字多转引自《钦定日下旧闻考》等书。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据南京图书馆藏书影印本。

在上述四类著述以外,还有若干种明清以来的类书和堪輿术类著作涉及到明代皇陵制度,如康熙朝陈梦雷等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堪輿部》等。另外,在现存为数不多的明朝档案中,也有一些涉及明代帝王陵墓的文字,但主要是讨论帝王后妃丧葬典礼以及明末内忧外患中皇陵的防护问题,直接关乎陵墓制度者则基本没有。这些档案现已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以《中国

^① 《帝陵图说》卷三云:“金山之陵,自鼎革后且有守陵内臣一,守冢陵卒二,……五十年来,寝殿门墙依然如昔,松柏之夹道者垂荫参天;迩来,陵卒虽守,守之以剪伐倾颓也,守之以平地无坟也”,可知此书当作于明亡后五十年左右。又,该书所附《十三陵记·下》有云:“岁癸来,源友梁份暨新安黄曰瑚徒步往谒(昌平诸陵),份为《图说》,曰瑚步跬”,故推此“癸来”当为康熙四十二年,即公元1703年。

明朝档案总汇》名义编辑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资料可能已经亡佚,如在《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沈德符《万万野获编》卷三、以及清朝官修《明史》卷一一三中,都提到明孝宗曾向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出示《裕陵图》,联系各前后记述文字判断,此图所绘应当是明英宗裕陵之玄宫结构。又,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大学士韩爌自天寿山光宗庆陵工地回京,以新卜吉地形势、规模,祭告启土时风日熙明等事奏闻熹宗;又言:“建造奉旨一准昭陵,该内监賚有工部原绘《陵图》,遍示诸臣,中加石桥一道,尤为合法,更于宝城后因山增筑,庶称尽美”^①。这段记载中也提到了昭陵或庆陵之《陵图》,并透露出此图为工部所绘、内容可能是地面建筑、用于施工等讯息。这类《陵图》所蕴涵的资料信息无疑非常丰富而且重要,希望能够发现原件、复制件或引述资料等其他相关线索。

二、民国以来对于明代帝王陵墓的调查和发掘

民国以来,对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逐渐进入了科学化的新阶段。民国初年开始出现了科学调查的报告以及比较有价值的维修工程之勘察和工作记录,这方面价值比较大的论著或工作记录主要有刘仁甫著《前明十三陵始末记》(铅印本,1915年)、刘敦桢著《明长陵》(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1933年)、王焕镛著《明孝陵志》(南京中山书局,1934年)、黄鹏霄等著《明陵、长城调查报告》(载《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第131—141页,1935年刊印)、朱楔著《谒昌平明十三陵记》(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期,

^① 《明熹宗实录》卷五,天启元年正月癸巳,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252页。

1935年)、汤用彬等纂《旧都文物略》(北平市政府编印,193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工务局编纂《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怀英制版局铅印本,1936年)等。这些调查资料本应该是现场状况之实录,但有些著述,如《旧都文物略》之“六·陵墓略”等书的茂陵等陵部分,几乎全文照抄顾亭林《昌平山水记》中的相关文字,使其资料价值大打折扣、可信度不得不被质疑。

1950年以来有关明陵的图书最多的是介绍性的著作,数千字至数万字不等,并且大多是1980年以后为适应旅游业需要而出版发行的,如商传著《明十三陵》(北京出版社,1978年)、定陵博物馆编《定陵——地下宫殿》(北京出版社,1978年)、南京博物院编《明孝陵》(文物出版社,1981年)、金世绪著《漫话十三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魏玉清著《明十三陵》(中国旅游出版社,1983年)、魏玉清著《明长陵》(中国旅游出版社,1986年)、李登勤著《特殊的明帝陵——显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路秀闽著《明鲁荒王陵——地下宫殿》(山东友谊书社,1988年)、李世源著《明祖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蒋中健著《明代第一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杜彤华著《潞王与潞王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袁家新主编《楚天名胜龙泉山》(武汉出版社,1995年)、中山陵园管理处文物管理办公室编《朱元璋与明孝陵》(南京出版社,1996年)等,这类图书文字大多比较浅显,但大都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此外,一些介绍历代帝王陵墓的专书也涉及到明代诸陵,如孙中家等著《中国帝王陵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黄濂著《中国历代帝陵》(大连出版社,1997年)、张生三主编《中华帝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曹砚农著《古代帝王陵寝实录》(岳麓书社,1997年)等。与上述书目性质相似的还有一些对于明代帝王陵墓介绍性的文章,分别刊载于文物考古类期刊上,这些在本书第二、第三章中凡有涉及

处将尽量全面注出,以资查核,又多见于本书末所附《参考书目》中,为省篇幅,在此不一一俱列。

关于明陵研究资料性的著作,主要有胡汉生著《明十三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对于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做了全面的介绍,其中有不少实地调查测绘资料,颇有价值;胡汉生著《明朝帝王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一书则对明朝的6处皇陵做了集中的介绍。

明代帝王陵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

1951年8—1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西郊金山南麓董四墓村先后发掘了明熹宗三妃合葬墓和明神宗七嫔合葬墓,最早揭示出明朝皇室贵族陵墓的实例^①。1956年,为发掘明成祖长陵积累经验、并作必要的准备工作,长陵发掘委员会工作队在北京昌平十三陵中选择试掘对象,由于发现了墓道的重要的线索,最终选定对大峪山下明神宗的定陵进行试掘。1958年定陵玄宫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随即发表了发掘简报^②,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定陵》一书199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63年,北京镶红旗营还发现过明宪宗妃墓7座^③。

关于定陵发掘,还有一些当年直接参加定陵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撰写的回忆文章或著作,如赵其昌之《定陵发掘始末》(载《文物天地》1985年第2期);庞中威所撰《定陵发掘逸事》曾在《中国文物报》

^①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均载《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刘精义等:《明代妃嫔陵园及圻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② 长陵发掘委员会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定陵试掘简报(续)》,《考古》1959年第7期。

^③ 陈光:《北京市考古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2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上分8期连载^①,他的《定陵发掘亲历记》(学苑出版社,2002年),对于这些内容有更详尽的记述,“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②。杨仕、岳南所著《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中国文化史探秘丛书》,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系报告文学体裁,记录了明定陵发掘前后的一些事件,而以万历朝史事穿插其间,可读性较强。

定陵的发掘,不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而且还使明代皇陵玄宫首次重见天日,为明代陵寝制度、特别是玄宫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证资料。此后,由于保护条件限制等原因,对于包括明代在内的历代皇帝陵的玄宫部分再也没有进行过主动发掘。最近10余年来,北京十三陵的主神道^③,南京孝陵陵宫门和配殿、东陵的陵园^④等明代皇陵的地面建筑遗址进行过清理发掘,揭示出不少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资料。

明代王陵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除山东曲阜的鲁荒王陵是主动发掘以外,其余诸亲王、郡王陵大都是因建设工程需要而开展工作或是清理盗后遗存。已经发掘的明代亲王陵中有发掘简报、报告或见诸正式报道文字的有晋裕王陵^⑤、益庄

① 庞中威:《定陵发掘逸事》,分别刊载于《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24日第4版、1999年11月28日第4版、2000年1月9日第4版、2000年1月12日第4版、2000年1月16日第4版、2000年2月6日第4版、2000年2月13日第4版、2000年2月16日第4版。

② 张显清:《〈定陵发掘亲历记〉序》,见庞中威著:《定陵发掘亲历记》卷首,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③ 赵福生:《明十三陵主神道发掘简记》,《北京考古信息》1990年第2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内部编印发行,1990年6月。

④ 南京明孝陵和东陵的发掘信息分别经《中国文物报》和《南京日报》、《扬子晚报》报刊等披露,其主要成果均收入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⑤ 郭勇等:《明晋裕王墓的清理工作》,《文物考古资料》1956年第6期。

王陵^①、宁献王陵^②、鲁荒王陵^③、益端王陵^④、蜀悼庄世子陵^⑤、潞简王陵^⑥、益宣王陵^⑦、益定王陵^⑧、庆康王陵^⑨、楚昭王陵^⑩、辽简王陵^⑪、德庄王及德藩诸王陵^⑫、蜀僖王陵^⑬、蜀昭王陵^⑭、梁庄王

①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②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③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④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檣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⑤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⑥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第5期。

⑦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⑧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⑨ 许成等：《同心县任庄村明代王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第175—17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⑩ 梁柱等：《武昌县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第24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傅守平：《明代楚昭王朱桢墓发掘简讯》，《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蔡华初：《明楚昭王朱桢墓》，《文物天地》1993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⑪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⑫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⑬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⑭ 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陵^①,还有1997年发掘的蜀某王陵^②等;此外,襄宪王及襄藩诸王陵则公布较为系统的调查资料^③,秦藩诸王陵公布过地面遗存调查资料^④。至于郡王陵则主要有:秦藩兴平安僖王墓^⑤、肃藩某郡王墓^⑥、晋藩广昌悼平王墓^⑦、益藩罗川瑞懿王墓^⑧、周藩原武温穆王墓^⑨、靖江安肃王等王墓^⑩、宁藩乐安昭定王墓^⑪等。明代王陵的发掘简报以及若干调查资料为明代王陵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① 梁柱:《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大批精美文物》,《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21日第1版;梁柱:《定陵之后又一明代重要考古发现——钟祥梁庄王墓出土大量精美文物异彩纷呈》,《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2日第1版;梁柱:《梁庄王墓5000余件珍宝大出土——明定陵以后的最大发现》,《文物天地》2002年第1期;梁柱:《钟祥明代梁庄王墓的发掘》,《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② 谢涛:《成都发掘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村明蜀王及王妃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22日第1版;谢涛:《成都市潘家沟村明蜀王、王妃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年》第224—22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③ 叶植等:《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襄樊市考古队等:《明襄阳王墓调查》,《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④ 王翰章:《明秦藩王墓群调查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

⑤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四府井明安僖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⑥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⑦ 戴尊德:《山西太原七府坟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⑧ 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

⑨ 郑州市博物馆:《荥阳二十里铺明代原武温穆王壁画墓》,《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⑩ 罗标元等:《靖江王墓群简介》,《广西文物》1987年第1期。

⑪ 徐兴万等:《明乐安昭定王墓清理纪实》,《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三、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现状

关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迄今为止,尚未见关于明代陵墓研究性质的专著。徐苹芳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四章中、杨宽先生在所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都曾经讨论过明代皇陵的有关制度,虽然各篇只有约二三千字,但却有筚路椎轮之功。

专论明代陵寝制度的论文,基本都发表于1980年以后,涉及陵址卜选、陵园制度、玄宫制度、祭祀制度、石刻艺术、殉葬制度、建筑艺术等内容,依发表先后主要有刘精义等《明代妃嫔陵园及圻志》(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王岩等《明十三陵的陪葬墓——兼论东西二井陪葬墓的墓主人》(载《考古》1986年第6期)、阮荣春《论明代祖陵、孝陵石刻之时代》(载《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黄展岳《明清皇室的宫妃殉葬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1期)、李世源《明祖陵建造时间考》(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胡汉生《明定陵玄宫制度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霍巍:《论江西明代后期藩王墓葬形制演变》(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孙祥宽《凤阳明皇陵及其石刻研究》(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刘毅《明朝“陵山之祭”述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刘毅《明清皇陵制度比异》(载《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刘毅《明朝皇陵祭祀制度研究》(载《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6月)、祝建华等《奇特的明代帝陵——显陵的建筑艺术》(载《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载《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刘毅《明代帝王陵墓选址规则研究》(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6月)、

刘毅《明代皇陵陵园结构研究》(载《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王纪潮《明代亲王葬制的几个问题》(载《文物》2003年第2期)、董新林《明代诸侯王陵墓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许智范《江西明代藩王墓考古收获》(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等。还有一些讨论内容与明代陵墓制度相关的文章,如孔繁峙的《试谈明墓随葬梅瓶的使用制度》(载《文物》1985年第12期)、任新建的《明蜀僖王陵藏式石刻考释》(载《四川文物》1995年第3期)等。另外,还有一些介绍、考释明代藩王圻志以及利用圻志进行皇族史、宫廷生活史研究的论文等,与陵墓制度研究关系不大,不一一具列,其重要者亦附列于本书末之《参考书目》。

从总体上看,相对于资料性的著述来说,关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层面的研究性文章甚少。

四、关于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方法

出于礼制建设的需要,中国古代对于陵寝制度的研究起源很早,在儒家经书和先秦诸子中都有不少关于前代帝王陵墓的记载与讨论,如《易·系辞》、《礼记·檀弓》、《周礼·春官》,以及《墨子》、《吕氏春秋》等。自先秦以至明清,礼制方面的研究应该是历代陵寝制度研究的重点所在。前面介绍的明清两代有关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官、私记载,有不少都属于这一范畴。

中国古代第二种比较常见的陵寝制度的研究方法,是对于古代陵墓的文献著录和方位考订,东汉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中就记载了西汉末年刘向对于“不封不树”时代一些古帝王陵墓方位的考订。此后西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北魏酈道元作《水经注》,其中都有关于古帝王陵墓处所的记载。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如明人王在晋的《历代山陵考》、祁光中的《关中陵墓

志》，清代则有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梁份的《帝陵图说》和朱孔阳的《历代陵寝备考》等。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还有一种常见的方法，即“堪輿术”。“堪輿术”也称“风水术”，一般认为，“风水”二字源出伪托东晋郭璞所纂之《葬书》：“《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①。风水之论可能肇始于先秦时期，传说秦始皇曾下令在孔子墓前挖洙水，欲以泄儒家灵气。晋人张华《博物志》记载：“汉滕公（夏侯婴）薨，出葬东都门外，公卿送丧，驷马不行，踟地悲鸣，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②。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说，东晋明帝司马绍会“解占冢宅”，曾微服私访郭璞为人所择葬地并进行评论^③。南朝时期，风水术对陵墓制度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南朝陵墓朝无定向，皆随山水之宜，应该是这方面的反映。北宋以后，皇陵受堪輿术影响日益明显。“风水”之说虽常为正统学人所不乐道，但它对于皇陵、王陵卜选和建置的影响却始终不衰。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和田野考古发掘的正式开始，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的发掘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发掘的开端，最近四五十年来，历代帝王陵墓的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陕西西安周围的秦始皇陵和西汉、唐代若干皇陵以及

^① 晋·郭璞（题）：《葬书》，“内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8册，第1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晋·张华：《博物志》卷七，“异闻”，影印《四库全书》本，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下卷上，《术解第二十·郭璞选葬龙角》点校本，第173页，岳麓书社，1989年。

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的持续多年的考古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帝王陵墓的调查和发掘,是秦汉至元明时期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半个世纪来的秦汉至宋明时代帝王陵寝考古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人们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①。与之相适应,对于古代帝王陵墓研究的着眼点,也从以出土文物为重点,转移到了以陵园结构和陵墓制度本身为重点;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的研究逐渐从一般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中剥离出来,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正式提出了用“二重证据法”治史之说。他在《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的“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②。这是王国维对于“二重证据法”最简单明了的阐释。从《古史新证》的阐释以及王观堂自己的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看出,“二重证据法”的最初提出,主要是指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等古代文字资料研治中国上古史。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二重证据法”的应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我们可以把“二重证据”的内涵扩充理解为所有古代文献和一切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包括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古器物资料及各类标本等;而它的适用范围也

①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第2—3页,影印北京来薰阁1935年之影印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应该从上古史扩大到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领域^①。

具体到古代帝王陵墓的研究,由于它涉及典章制度层面的内容比较多,因而必须把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比较勘合。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能有可观的深度和广度,才更能发现问题并进一步去解决问题。相对于秦汉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而言,有关明代帝王陵墓的文献记载比较多,所以在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中,对于文献资料尤其应该重视。

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实物资料为基本依据,运用考古学的资料分析方法,结合明代以来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实物材料与文字材料互勘、互证,在此基础上对于明代皇陵、王陵的陵园结构和墓室形制进行分析研究。在可以归纳出结论的地方,适当提出个人的看法;不足以下结论的,本诸实事求是的原则,信以传信,疑以存疑。在研究资料的选取、运用方面,由于明代皇陵的考古发掘资料只有明神宗定陵一例,因此本书大量采用了“下天子一等”的亲王陵墓资料。亲王陵既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类项,又可以作为皇陵制度研究的重要参照。对于藩王(诸侯王)陵墓制度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并不是笔者的首创,曾经有学者对汉代诸侯王陵做过专门研究^②。但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以王陵的资料来作为皇陵制度研究的借鉴和参照,却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五、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预期目的

一般说来,历史研究的目的包括记录史实、阐明制度、总结规律

^① 刘毅:《“二重证据法”与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载中国史学会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第36—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等方面,本书以明代史为背景,研究帝王陵墓制度这一特殊事项。其基本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集中地记录来自文献梳理、考古调查发掘所采集的历史事实,二是以已知史实为基础,结合他人相关研究成果,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全面研究。关于皇陵制度的研究,将讨论明代不同时期诸皇陵之间制度的异同,并与唐、宋皇陵及清代皇陵制度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出明代皇陵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讨论明陵在古代陵寝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占的历史地位。关于明代亲王陵墓制度的研究,则希望以已经公布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为基本依据,讨论其纵向(某藩王陵前后演化历程)和横向(同时代各地藩王陵之间的异同比较)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而对明代亲王陵墓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期。本书的研究对象基本局限于皇帝陵和亲王陵,与亲王陵墓制度相同或相似的王妃墓也在研究范围之内。至于各地的郡王陵,因其发掘资料公布得比较少,也收入相关章节,作为皇族墓葬等级规范和制度变化的研究参照,但郡王陵本身并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在对明代皇陵、亲王陵实例进行整体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的第四章拟对一些不便在第二、第三章中展开讨论的问题,如明代皇陵与南宋等前代皇陵的关系、明代帝王陵址的卜选规则、明代帝王的埋葬制度和随葬品、明代皇陵的祭祀、明朝“陵山”的祭祀、影响明陵制度变化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第五章归纳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它对于清代和民国时期陵墓的影响,并讨论明代帝王陵墓的保护、开发和研究等问题。

对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要高质量地完成本书还有着相当的难度。这是一个介乎于历史学和考古学之间的课题,它要求研究者既要精通明代史中相关的历史与文献,又要对于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作者不

敏,虽勉力为之,仍难免漏洞百出。除受个人学识的限制外,研究资料的限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历史文献、考古调查发掘资料都比较少而且零散,其间还有不少有缺环,因此本书总结出的只能是相对的规律,有些还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有待文献、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现来证其实或伪。总之,笔者希望这项研究是渐进式的,倘若本书能为今后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做一阶梯,那便是奢望了。

第二章 明代皇陵制度研究

明太祖追尊四代先人,增修父祖陵墓,所建陵园保留着明显的唐宋特征,这是明代皇陵制度的肇建时期;以南京钟山孝陵的营造为标志,明朝全新的陵园制度开始创建,到明成祖在北京营造长陵时基本定型。明代皇陵的地面建筑大多基址清晰或基本完好,本章通过这些资料,分析研究明代皇陵陵园结构的异同,进而归纳出它们的基本特征。至于皇陵的玄宫结构,则以已经发掘的惟一实例——明神宗定陵为基础,参照明清以来的有关文献记载,初步总结出明代皇陵玄宫结构的基本特征;另结合明代后妃陪葬制度,进一步分析了明陵玄宫各部分的用途和玄宫制度的变化。

第一节 明代皇陵的建置沿革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至思宗朱由检殉国,先后传十二世,共有十六位皇帝。其中十五位皇帝和五位追封皇帝分别葬于六处,按世代先后依次为:江苏盱眙的祖陵、安徽凤阳的皇陵、南京钟山的孝陵、北京昌平的十三陵、北京海淀的景帝陵、湖北钟祥的显陵,这18座规模不等的陵墓是研究明代帝陵制度最直观、最可靠的资料。

明太祖即位后仿前代之制追遵四代祖先考妣皆为帝后,高祖朱

百六为“玄皇帝”，庙号“德祖”；曾祖朱四九为“恒皇帝”庙号“懿祖”；祖父朱初一为“裕皇帝”，庙号“熙祖”；父亲朱世珍（朱五四）为“淳皇帝”，庙号“仁祖”。神主供奉太庙，并按照帝王规制，为他们重建或补建了陵墓。

明太祖先世贫寒，且为谋生而多次迁徙，因而祖先遗骸的埋葬处所亦大有疑义。关于明太祖的祖籍，在他自己撰写的《朱氏世德碑》中云：家族出自江苏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向上只能追溯到五世祖朱仲八，“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①；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最后定稿的《明太祖实录》则记为：“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一带）。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人号其里为‘朱家巷’”^②。元朝初年，明太祖的祖父朱初一被官府籍为淘金户，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朱初一为逃避赋役举家渡淮徙居于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死后遂葬于此。明太祖即位后，崇祖先陵墓祀典，荐上陵号，只知“历世墓在朱家巷，惟高（引者按，应为“先”）祖葬泗州”^③，但句容、泗州的具体墓址并没有找到。当时“有言（皇帝祖先陵）在朱家巷者，命筑土为万岁山，有司修砌路，太祖躬临拜

① 明·朱元璋：《御制朱氏世德碑》，见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朱氏世德碑》排印本，第119—120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缩微卷《明实录·太祖实录》第1册，第1页，1962年。本书所引明历朝《实录》皆为此种版本，以下仅简注为“校印本《明实录》第某册、第某页”。

③ 明·朱元璋：《御制朱氏世德碑》，见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朱氏世德碑》排印本，第120页，中华书局，1959年。按，此句在《帝乡记略》及《剪胜旧闻》等明人著述中皆作“惟先祖葬泗州”，《七修类稿》所录“惟高祖葬泗州”，考诸实际，当系郎瑛误校改。

祭,土遂崩,至分为深涧。太祖怒,重罚言者”^①。在祖先陵墓无从查访的情况下,“每遣官,止于泗州城西潮河坝望祭”^②。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乃“建祖陵庙”^③,奉德祖、懿祖、熙祖三世神主,一并岁时望祭。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十月,明太祖的同宗、龙骧卫总旗朱贵因年老退役还乡,其先人与太祖祖父相携由句容到泗州,所以朱贵回乡后,“即画图贴说,认识宗派,指出居处葬处,备陈灵异始末”^④,由此确认了泗州城北杨家墩为朱初一夫妻墓址所在。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命皇太子往泗州修缮祖陵,葬三祖帝后冠服”^⑤,明祖陵正式兴建。泗州祖陵实际是一座三代祖先合圻的招魂衣冠冢,有内外三重城垣和棊星门、享殿、玄宫等建筑。

祖陵紧靠洪泽湖,所在地势低洼,从英宗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开始就受到洪水的威胁,明代晚期洪灾日甚,“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淮又大溢,……祖陵下马桥水深八尺,旧陵嘴(相传是熙

① 明·曾惟诚:《帝乡记略》卷一,《帝迹志·祖陵兴建》,《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700)据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影印,第1册,第5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②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国事类·葬祭衣冠》排印本,第183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八,《礼志十二·山陵》,郑天挺等标点本,第5册,第1446页,中华书局,1974年。本书所引《明史》皆为此种版本,以下仅简注为“标点本第某册、第某页”。

④ 明·蒋德璟:《凤泗皇陵论》、《查勘皇陵纪》,见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十,“陵园”,点校本,第13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⑤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八,《礼志十二·山陵》,标点本第5册,第1446页。

祖的真正葬地)水深丈余,淹枯松柏六百余株”;“内水久浸”^①;虽然采取了筑堤、开河引水等措施,但却无法根治。清朝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黄、淮二河并涨,明祖陵终于全部没入水中。1963年春,洪泽湖畔有部分石像生露出水面,经调查确认为明祖陵遗存^②;1977年开始对神道石刻进行全面复位整修^③;现存遗迹主要有神道石刻、享殿之部分柱础以及仍然浸泡在水中的砖砌玄宫等(图2—1)。



图2—1 明祖陵神道石刻

元朝时,明太祖之父朱五四为生计所迫举家迁至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乡,后又迁至太平孤村庄。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春,淮北

① 明·曾惟诚:《帝乡记略》卷一,《帝迹志·陵墓》,《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700)据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影印,第1册,第76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② 张正祥:《明祖陵》,《考古》1963年第8期。

③ 刘秉才等:《祖陵石刻修复》,《文博通讯》1982年第5期。

大旱,继之以瘟疫,朱五四和妻子陈氏相继于四月初六日及二十二日先后罹疫亡故。朱家贫为雇农,得田主刘继德之宗兄刘继祖惠地一块,方将尸骸安葬。明太祖在《御制皇陵碑》中追述当时“殡无棺槨,被体恶裳,浮掩三尺,莫何肴浆”^①,只是草草入土而已。丙午年(元至正二十六年,宋小明王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年),明太祖发迹后曾回乡祭扫先茔,并厚增封土。即位后的洪武二年(公元1367年)又大规模修缮陵园,是年二月,荐上陵号曰“英陵”,命左丞相李善长恭诣陵前立碑,五月初一日,“更英陵曰皇陵,立皇陵卫以守之”^②。对于父母之微葬,明太祖也曾经考虑过“启坟改葬”,但终以“虑泄山川灵气,使体魄不安,益增悲悼”,乃“姑积土厚封,势若冈阜,树以名木,列以石人石兽,以备山陵之制而已”^③。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筑皇陵城,十一年(公元1378年)又令江阴侯吴良督工添建、改建皇陵,废学士危素所撰碑文不用,御制《大明皇陵之碑》,历述家世及创业艰辛,欲以此昭示子孙。凤阳皇陵是明朝最早建成的一座帝王规格的陵墓,还保留了很多唐宋旧制。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张献忠部农民军攻陷凤阳,“焚皇陵,烧享殿,燔松三十万株”^④,皇陵受到大规模破坏。现存遗迹主要有神道石刻、皇陵碑、无字碑、陵冢等(图2—2)。

明太祖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陵墓在京师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城东钟山独龙阜下,名孝陵。孝陵为预建之寿陵,洪武十五年(公

① 明·朱元璋:《御制大明皇陵之碑》,见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皇陵碑》排印本,第11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827页。

③ 明·危素:《大明皇陵之碑》,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皇陵碑》排印本,第115—116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④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一,“贼陷凤阳”,魏得良等点校本,第173页,中华书局,1984年。



图 2—2 明皇陵全景

元 1382 年)九月葬入太祖嫡妻孝慈马皇后,次年建成享殿,陵工基本告成。明孝陵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其主体建筑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为神道,自下马坊至棂星门。主体建筑有大金门、大碑楼、神道石刻、棂星门等。后面部分为陵宫,在棂星门东北方。主体建筑为陵宫门、享殿门、享殿、明楼、圆形封土(名“圆丘”,亦名“宝顶”)。孝陵规模宏大,主体建筑亦雄伟壮观,自明亡以后逐渐頹圮,其中献殿陆阶三重,原为九五开间,毁于太平天国之役,晚清同治年间(公元 1862—1874 年)于故址上重建三间小殿以备祭祀(图 2—3)。

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懿文皇太子朱标之子)朱允炆即位,改元建文,是为建文帝^①。靖难之役,燕王攻克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

^① 朱允炆在明朝无尊谥庙号,明成祖在《御制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中称之为“建文君允炆”,也有人因其纪元年号称之为“建文帝”。明朝中期以后曾经数次有人为之请谥及相应祀典,均以不了了之。南明弘光朝始为其追上尊谥曰“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肃文扬武克纯笃孝让皇帝”,追上庙号曰“惠宗”。乾隆元年(公元 1736 年),清朝追谥之为“恭因惠皇帝”,并以此号入官修《明史》,所以此后也称之为“明惠帝”。



图 2—3 明孝陵享殿及基座

《明太宗实录》等官书记载说他于城破时自焚而死,按天子礼制葬于懿文皇太子园寝^①,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并且建文帝既无陵址,有明一代也始终没有陵园祭享。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礼科给事中万象春曾上疏云:“国家大事,莫大于祀典;祀典之起,实由于人心。洪惟太祖开基,建文君嗣统,既缘靖难兵至,避位自焚,迄今无祭享无闻,陵园不治。行道之人,歔歔叹息”,因建议追补建文帝祀典,明神宗不允^②。另外一说,则谓建文帝金川门失守时祝发为僧,从间道出逃,往来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最后被明英宗迎居北京,

^① 懿文皇太子朱标卒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当年八月葬于大程寿陵(已葬入孝慈马皇后,即孝陵)之东,称“东陵”。1999年,南京市考古工作者在孝陵东面发现了一座陵园遗址,有围墙,享殿等,认为即是懿文皇太子之东陵,详见本书第三章。

^②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一七,《礼·山陵》,标点本,第275页,中华书局,1956年。

以耆寿终天年,葬于西山。蒋一葵《长安客话》记其事云:“正统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人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树不封。闻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九月,圣驾尝幸此”^①。至今在云南武定、四川邻水、重庆磁器口、广西南宁和宜山还有一些相传为建文帝的遗迹^②。明代有一种传说,认为北京西郊金山“天下大师之墓”即建文帝葬所。金山口景帝陵“又北二里,一丘一碑,碑曰:‘天下大师之墓’。仁和郎瑛曰:‘建文君墓也’。《通纪》称建文自滇还京,迎入南内,号曰‘老佛’,卒葬西山”^③。但这些记载或遗迹也都缺乏足够的佐证,明末清初,曾数度有人在西山询访“天下大师之墓”,均无结果。崇祯进士孙承泽曾“于丁酉(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十月十五日,自退谷早饭后,策一驴同僧秋月遍于西山后寻访(天下大师之墓),无有也。至功德寺午饭,问之寺僧,俱云未有。并言王先生亦曾屡访不获。王先生者,宗伯王公崇简也。余有《退谷小志》,宗伯载其事于首云:‘崇祯戊寅(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间,策杖寻大师墓于金山口,远近十数里未得其处’。”^④清代康熙间徐乾学即指出:所谓葬建文帝以天子礼,“特史臣欺世之辞尔。至于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相传有天下大师之墓,好事者实之以为建文

①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郊垌杂记·建文帝坟》,标点本,第8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夏敏:《明惠帝在宜山留有遗迹》,《文物报》1986年7月11日第3版。

③ 明·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五,“黑龙潭”,标点本,第22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按,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国事类·建文君》条下有“葬西山,树碑曰‘天下大法师之墓’(出《革除编年》)”。见横排点校本,第1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④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四十,“陵园”,标点本,第60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帝坟,然访之土人皆莫辨其处也”^①。所以建文帝的下落和葬所,几百年来一直是不解之谜。

燕王朱棣夺取了皇位,改元永乐,是为明太宗(世宗嘉靖十七年改上庙号曰成祖)。明成祖即位之初升旧封地北平府为北京,并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底迁都北京,把南京降为陪都。早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成祖仁孝徐皇后病故,成祖即下令由礼部尚书赵珣等人在北京附近选择吉壤建陵,最后选定了北京西北昌平境内的黄土山,改名“天寿山”。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开始在天寿山下大兴土木修建皇陵,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玄宫等主体工程完工,葬人徐皇后梓宫。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明成祖死于北征途中,梓宫还京后与徐皇后合葬,是为明长陵。长陵神道工程断断续续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大碑楼、石像生等都是宣德(公元1426—1435年)末年始建的,陵区最南端的青白石五阙石碑楼则建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长陵陵园结构基本仿太祖孝陵为之,但又有明显的差异(图2—4)。成祖以后,十二位嗣皇帝先后祔葬于长陵左右,即仁宗葬献陵,宣宗葬景陵,英宗葬裕陵,宪宗葬茂陵,孝宗葬泰陵,武宗葬康陵,世宗葬永陵,穆宗葬昭陵,神宗葬定陵,光宗葬庆陵,熹宗葬德陵,思宗葬思陵;皇后及嗣皇帝本生母皇太后皆合葬。其中景陵、永陵、德陵三陵在长陵以东,其余九陵皆在长陵以西。这片陵区自清朝以来被统称为“明十三陵”,除皇陵外,天寿山兆域内还有埋葬妃嫔的东井和西井,另有若干妃嫔和少量皇子墓,陵区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

明思陵以外的十二陵在明末曾经李自成军焚烧,清兵入关亦曾拆

^①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建文帝”引《两京求旧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4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图 2—4 明长陵二柱门、明楼

烧神宗定陵和熹宗德陵以泄愤。清朝建立以后,曾屡次下诏保护明十三陵,乾隆朝还利用诸陵旧料拆大改小,进行过一次比较全面的修缮,但诸陵境况已远逊于往昔。民国以后,各陵陵宫部分,除长陵基本保存完好以外,其余诸陵大多只剩明楼和残垣断壁;主神道部分的大石牌楼、大红门,长陵神功圣德碑及碑楼、石像生、龙凤门建筑等尚大体完好(图 2—5)。195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了定陵,从而揭示出明朝帝陵玄宫的实例。1987—1990 年,为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十三陵管理部门对明穆宗昭陵的陵园建筑进行了全面修复。

正统十四年(公元 1449 年)八月“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九月,皇弟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明景帝^①。明景帝在位时曾在天寿山

^① 明景帝死后,初谥曰郕哀王;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明宪宗下诏恢复其皇帝之号,礼部议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但并无宗庙祭享。因此,明朝的一般记载只称之为“景皇帝”或因纪元年号称“景泰皇帝”。南明弘光朝为景帝按明朝列帝规制补上尊谥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颂孝景皇帝”,并加上庙号“代宗”,说后的有些记载也称其为“明代宗”。清官修《明史》仍用成化所上尊谥入《纪》。



图 2—5 明十三主神道龙凤门

陵区中祖父献陵的西旁预建有寿陵(即后来明光宗庆陵址),并已经葬人皇后杭氏。天顺元年(公元 1457 年)英宗复辟,景帝被废,死后以王礼葬于西山妃嫔皇子墓区,天寿山所营寿陵被平毁。成化十一年(公元 1475 年)十二月,明宪宗以“朕叔郕王践祚,勘难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①,下诏恢复其皇帝身份,加上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补饰修缮西山陵寝。据《长安客话》记载:“景皇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树多白杨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②。明景帝陵在北京海淀区金山口,现存碑亭、享殿门等(图 2—6)。

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三月,明武宗无子而崩。张太后(孝宗之妻)和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定议,以“兄终弟及”,迎立宪宗之孙、

^① 明·孔贞运:《皇明诏制》卷五,影印南京市图书馆藏明崇祯七年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第 458 册,第 18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②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郑州杂记·景皇陵》,点校本,第 86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年。



图 2—6 明景帝陵碑亭

孝宗之侄,时为兴王世子的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经过十几年的“议礼”之争,明世宗渐次为本生父母争得了全部帝后之礼遇和祭享。其父兴献王朱祐杭被追尊为“献皇帝”,加上庙号曰“睿宗”。兴献王原在封国钟祥松林山的陵墓被尊奉为“显陵”。明世宗曾经在昌平陵区大峪山下为生母蒋太后卜建寿陵(后来成为明穆宗的昭陵),并准备奉迁兴献王灵柩,但最终因风水等因放弃昌平之选而决定在钟祥改建旧陵。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钟祥显陵主体建筑基本完成改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最后完成了掖恩殿的改建工程。陵园仿昌平帝陵规制,由新旧红门、神道石刻、掖恩门、掖恩殿、宝城等主体建筑组成,环以外罗城。显陵的宝顶十分奇特,有前后两座,前宝顶下原为兴献王的旧墓穴,后宝顶下为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按皇帝规制新建的玄宫,当年迁兴献王棺柩及北京运到的蒋太后棺柩葬入。

显陵在明末农民战争中遭到破坏,开始衰败,农民军顺义王、射塌天、混十万、老回回、满天星等十六股,二十余万“盘踞于陵之左右前后者二十余日”,“去陵仅十里”^①。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兵部札总兵左良玉,要求“该镇速厉兵马,刻期歼剿,蚤奏肤功,如即恢复名城、奠安陵寝,净扫狂氛,以尽根株,朝廷断不断通侯之赏也”^②。显陵在今湖北省钟祥市东北之松林山(嘉靖十年曾被封为纯德山,从祀地坛),现存大牌楼、神道石刻、祔恩门和祔恩殿等主体建筑基座以及前后宝顶等(图2—7),新旧红门、明楼等亦重新修复。



图2—7 明显陵神道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兵部为贼突德安四关擒掠滇楚兵遣截获胜事题稿》(崇祯朝),影印本第46册,第198、19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兵部为饬“平贼总兵”左良玉等速厉兵马刻期早剿恢复名城奠安陵寝的札文》(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影印本第101册,第3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二节 明代皇陵陵园制度研究

从整体上看,明代皇陵陵园结构与唐、宋等前代陵园结构迥然有别,为一种全新的制度,但明朝的6处18座皇陵,因其建成时代先后不一,陵园结构亦有所变化。大体说来,凤阳皇陵基本套用了宋代等前代制度,南京孝陵创立了新的陵园平面布局,北京长陵因之而小有改作,献陵以后各陵则进入定型守成期。下面按营建时代先后依次讨论诸陵发展变化、陵园结构的异同和基本特征。

一、凤阳皇陵和盱眙祖陵

凤阳皇陵和盱眙祖陵都是追谥先人的陵墓,二陵结构相似,其中皇陵建成年代早,规模也更大一些。

1. 凤阳皇陵

凤阳皇陵是明太祖父母之墓,在明中都城西南5公里的太平乡,今其地为安徽凤阳皇陵农场,陵冢东北距凤阳市约8公里。

根据明代所修《大明会典》、《中都志》、《帝乡纪略》、《凤阳新书》以及清修《明史·礼志》等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知凤阳皇陵坐南朝北,自外而内由土城、砖城和内皇城共三重城垣构成(图2—8)。

土城,平而呈正方形,筑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城周二十八里。城墙四面正中各辟城门,东、西、南三面各一门,北面正中为正红门三间,面向东北,是为陵园正门。正红门左右另辟东角门、西角门。正红门外北向有道路直达于中都城下。砖城又名“皇陵城”,筑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十月。砖城结构为夯土胎芯,里外包砖,城周六里一百二十八步(明代一步准五尺),高二丈。四面正中辟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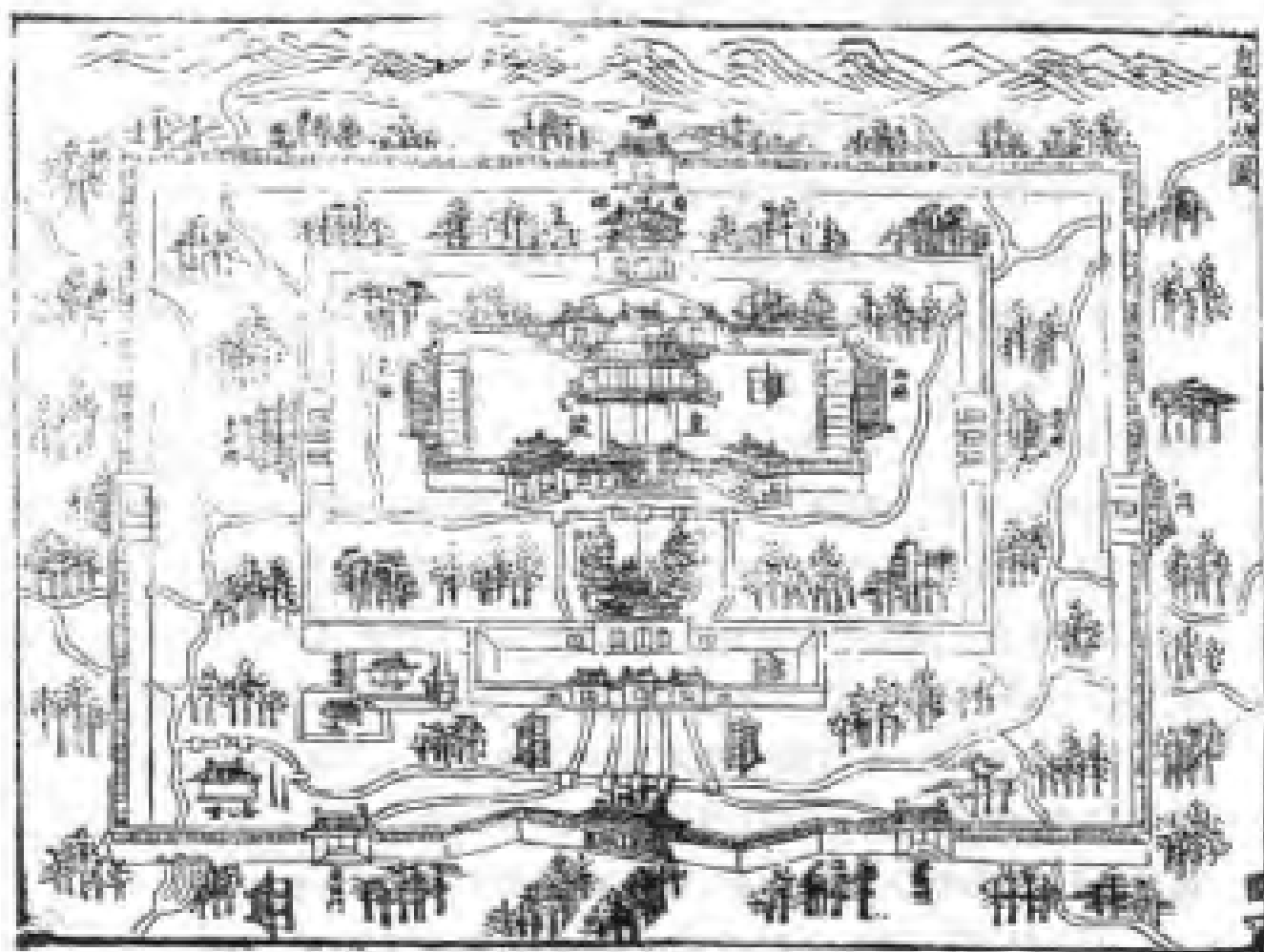


图 2—8 明皇陵平面图(原载《帝乡纪略》卷首)

上建城楼,名曰“明楼”^①;各门分别冠以方位,如北门名“北明楼”等。

^① 从《中郡志》、《帝乡纪略》所附之《皇陵总图》来看,凤阳皇陵之“明楼”就是城门和城楼,但不知“明楼”二字义所自出。考“明楼”之名不见经传,疑为土语。清人纪昀说:“北方以覆瓦者为暗楼,上层作雉堞形,以备御寇者为明楼”(《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溧阳续录二”第 32 则,标点本,第 273 页,华龄出版社,2002 年)。如此,明楼有防御功能,皇陵明楼或因此得名。孝陵明楼之制犹有城门及城楼遗意;此后,明朝诸陵宝城前之城楼皆名曰明楼。清代梁份:《帝陵图说》卷二中云:“明楼踞宝城城阙上,如迎敌丽谯之楼也”(清代汪鱼亭传抄本,第十八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北明楼外复有外罩门一道,为红宫门及东、西角门二座,三门并列,亦名“棂星门”。

今实测凤阳遗址皇陵土城平面为正方形,周长 14.4 公里;砖城南北长 1100 米、东西宽 750 米^①。

砖城内部中央为内皇城,此城可能在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已经筑成,城墙砖砌,外涂朱红。内皇城是皇陵建筑的核心部分,《中都志》记其制度云:“内皇城一座,周七十五丈,正殿九间,金门五间,东西庑各十一间,左、右角门二座,后红门三座,左、右角门二座。燎炉一座,碑亭二座。御桥正三座、左、右石桥二座,金水河一道”^②。正殿是举行祭祀典礼之处,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名曰“皇堂”^③。

从《帝乡纪略》卷首所附万历四十一年(公元 1613 年)十一月凤阳知县万嗣达增补的《皇陵总图》来看,凤阳皇陵的陵冢应该在内皇城的后红门之南、砖城南明楼之北。也就是说,凤阳皇陵的封土在内皇城之外、砖城之内。现存封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约 50 米,南北宽约 30 米,四角已呈浑圆状,残高约 5 米,上植柏(图 2—9)。

从内皇城金门向北至砖城北明楼的神道两侧夹列碑亭、石像生和望柱。神道石刻自北而南依次为:麒麟两对、狮八对、望柱两对、马和左右控马官及侍者两对、虎四对、羊四对,文官两对、武将两对、内

① 徐莘芳:《明皇陵和祖陵》,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 334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周致元:《明代凤阳的皇陵》,《东南文化》1997 年第 1 期。

② 明·柳瑛:《中都志》卷四,“陵寝”,《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618)据明隆庆三年重刻本影印,第 2 册,第 417—418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年。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五,洪武十二年闰五月丁巳,校印本《明实录》第 3 册,第 1997 页。



图 2—9 明皇陵封土

侍两对,总计 28 对^①。凤阳皇陵石像生之多,为历代皇帝陵所仅见。金门外东西两侧各建碑亭一座,内树巨碑,西为明太祖御制《大明皇陵之碑》,立于洪武十二年(公元 1379 年);东为无字碑,立于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原拟“树皇陵右亭,以配太祖哀翰”^②,但以世宗

① 关于凤阳皇陵的石像生数,历来有不同的记载:明人袁文新修《凤阳新书》记为“华表并石人、石兽共三十六对”;哲冈的《明中都皇陵石像生之地》(载《文物天地》1985 年第 2 期),认为皇陵有石人兽等共计 32 对;徐莘芳在《明皇陵和祖陵》碑目(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 334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中认为明皇陵有华表和石像生共 28 对。1995 年 11 月笔者至凤阳皇陵作实地调查,考定明皇陵神道有石人兽共 26 对(石虎缺二,按其空位补记在内;现已断刻配补置于原地),石望柱 2 对,总计石刻 28 对。按,唐宋诸皇陵神道石像生中的马和控马官一组(有一人一马、两人一马两种)例以一件计数,这从诸件石仪排列间距的差别上可以明显看出,几十年来有关唐宋诸皇陵的考古调查报告亦皆用此种统计规则,明皇陵石像生 32 对或 36 对之说,是误将控马官与马分别计算所致。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一,嘉靖十七年四月乙巳,校印本《明实录》第 43 册,第 4347 页。

未遑撰文，遂成无字碑^①。二座碑亭均早毁，新近修复；石碑尚存，承以赧厝，碑阳均朝向神道。

凤阳皇陵虽系追封帝后之陵，但规模却依然可观。即以土城城周二十八里而论，虽不及因山为藏的诸唐帝陵那样气势宏伟，但其封域却远远超过了同样是封土为陵的巩义北宋诸陵、甚至比唐高祖的献陵规模要大^②。从平面布局来看，凤阳皇陵规制直接脱胎自唐、宋皇陵，特别是受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但与之相比又有所变异。

凤阳皇陵与唐陵、宋陵的异同，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进行对比：

第一，从陵园的总体平面布局来看，凤阳皇陵与唐陵、宋陵在方形城垣、方形封土、献殿朝向一侧陵宫墙垣外列神道石刻、神道取直等方面完全一致，是直接继承自唐宋制度；但在建筑物的具体排列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唐宋皇陵的封土或玄宫所在之山峰一般都位于陵城内部正中，即陵城横、纵两条轴线的交接点上，陵冢以南为献殿；凤阳皇陵陵冢则位于内皇城之外、整个陵园的后部（南侧），虽然还在纵轴线上，但却偏离了横轴线，最内一重城——内皇城的中心建筑是“皇堂”即享殿或献殿。其次，从三重城垣的功用来看，

^① 关于凤阳皇陵神道东侧石碑，据《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一记载：“先是，凤阳守臣修建皇陵、祖陵，请御制碑文各一通，一树皇陵右亭，以配太祖宸翰，一镌勒祖陵”，见校印本《明实录》第43册，第4347页。据此知该碑当竖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原拟刊刻明世宗御制碑文。也有人认为此碑为明初旧物，即明初翰林院学士危素奉命撰《皇陵碑》被废弃之后磨去文字而成，见俞凤斌：《凤阳明皇陵“无字碑”考》（载《文物研究》总第13辑，黄山书社，2001年）；但此说没有提出相应证据。

^② 据宋人宋敏求之《长安志》记载：唐关中十八陵之封域以昭陵和贞陵为最大，周一百二十里，次为乾陵，周八十里，次为泰陵，周七十六里，次为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诸陵，周四十里，献陵最小，周二十里。

凤阳皇陵最外围的土城实际相当于唐宋皇陵的封域,也就是陵园的最外界限。中间的砖城亦即“皇陵城”包纳了封土和献殿,平面呈正方形,四面正中辟门,应该相当于唐宋诸陵的陵宫城或名“神城”。但皇陵的砖城中又包含了神道石刻,显然也是一种变异。砖城的大小比唐高宗乾陵之陵城小,而大于北宋诸陵^①。最里面的内皇城,城周只有七十五丈五尺,约合今240米,谓之为“城”,实在有夸张之嫌,而其中的建筑也只有享殿和东西两庑,其实际功用仅相当于一个庭院。享殿取代封土居于陵园的中心,并且自成封闭院落,凤阳皇陵的这种格局显然不同于巩义宋陵,它显示出享殿或献殿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因而在建筑等级和处理方式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布局方式实际上开启了后来的南京孝陵新制度的先声,亦为鲁荒王陵、楚昭王陵等明代早期亲王陵陵园所循用。

第二,凤阳皇陵与汉、唐、宋诸王朝的封土式皇陵相同,封土皆呈覆斗状,上植松柏,但其封土之下却没有墓室,也就是说没有“玄宫”一类设施,这在历代皇帝陵包括追封皇帝陵中是罕见的。考诸史籍,朱五四夫妻相继亡故前后相差10余日,朱五四先葬,明太祖《御制皇陵碑》追述当时“殡无棺椁,被体恶裳”,只是“浮掩三尺”而已^②。由于初葬无葬具并且天气已渐热、不便启封的缘故,朱母陈氏很可能并未与朱五四合葬在一起,而是另葬于近旁。明太祖后来的有关回忆可以为这一推断作证,他说:“昔遭兵乱,母后之坟为兵所发,朕收遗

^① 唐乾陵在今陕西乾县西北,因梁山为之,陵城南北墙基长1450米,东墙基长1582米,西墙基长1438米(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载《文物》1960年第4期);巩义北宋诸陵神城呈正方形,边长一般在240米左右(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 明·朱元璋:《御制大明皇陵之碑》,见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皇陵碑》,排印本,第117页,中华书局,1959年。

骸,失一指骨,于坟近地遍求不得,忽得一指骨,然未敢必其是,闻世有以指血验之者,遂啮指滴血其上,果透其中,及以他骨验之,则血不入,乃知亲之气血相感如是,与他人自不同也”^①。这里只谈“母后之坟”而言不及父,显而易见二人并不同穴。为不泄“山川灵气”,明太祖并未因富贵而迁葬或改葬先人,只是就地增饰了地面建筑。又,据《大明会典》记载:“南昌王(太祖长兄)、妃王氏,盱眙王(太祖次兄)、妃唐氏,临淮王(太祖三兄)、妃刘氏,山阳王(南昌王之子),招信王(盱眙王之子),以上坟附葬凤阳皇陵”^②,但这些人的坟墓究竟在皇陵中的什么位置,却没有明确记载。笔者怀疑上述诸人凡死于此次瘟疫前后的,当皆葬在朱五四夫妻近处,后来“积土厚封”时,皇陵的封土很可能将他们的坟墓全部覆盖。中都城西北有“十王四妃坟”,为太祖伯叔等人的迁葬墓,“以各散葬者,俱攒于此一处,建茔域以便祀焉”^③,是一个有明文记载的多人合葬墓,皇陵亦当同之。所以,凤阳皇陵不但没有地下玄宫设施,而且所葬也不仅限于追封的仁祖帝后,可能还包括了太祖的兄侄等人,这在历代皇陵中是一个特例。不

① 明·朱元璋:《明太祖宝训》卷一,“孝思”,洪武二年四月乙亥,见张德信等编:《洪武御制全书》,第425页,黄山书社,1995年。

② 明·李东阳等奉敕修、申时行等奉敕重修:《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国初追封诸王坟》,影印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刊本,第3册,第1431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本书所引用《大明会典》皆为此版本,以下仅注“影印本第某册,第某页”。

③ 清·于万培等修、谢永泰续修:《(乾隆)凤阳县志》卷四,《舆地志·邱墓》,《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699)据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影印,第1册,第30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按,同书下文又有“十王墓今惟周围土墙尚存,中间一冢即十王四妃并攒于一处者也,西南一冢即驸马黄琛也。冢旁皆已垦为熟地,石人石兽无一存者”,更可确证“十王四妃坟”实为多人合攒之墓。

仅如此,当年圈定皇陵墙垣范围时,还有一些民人坟墓散落其间,“所司奏民家坟墓在旁者当外徙,高皇云:‘此坟墓皆吾家旧邻里,不必外徙’。至今坟在陵域者,春秋祭扫,听民出入无禁”^①。这种情形在历代皇陵中也不多见。

第三,凤阳皇陵神道取正南北直向,在石像生的内容方面尚依稀可见唐宋旧制。唐初二陵石像生制度变化较大,高祖献陵前原有石虎、石犀等(有些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太宗昭陵玄武门东西两庑还有著名的“六骏”浮雕(其中四石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两石被盗卖,现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高宗乾陵以后石像生制度基本定型。乾陵神道石刻自南而北依次为望柱一对、翼马一对、鸵鸟浮雕一对、马及控马官五对、石人十对,总计 18 对(含望柱)^②;除追封宣祖的安陵以外,巩义北宋诸皇陵石像生制度基本一致,以宋太宗永熙陵为例,自南而北依次为望柱一对、象及驯象奴一对、朱雀浮雕一对、角端(独角兽)一对、马及控马官二对、石虎二对、石羊二对、蕃部客使三对、武将二对、文臣二对,总计 17 对(含望柱)^③。从石刻内容上看,凤阳皇陵的石像生中保留了唐、宋诸陵的虎和羊,马仍配以控马官,但控马官中却新添了长须文官的形象(图 2—10);取消了翼马、象及驯象奴、朱雀(或鸵鸟)浮雕、角端、蕃部客使等,并且取消了宋陵南神门前的镇陵将军和神城内的内侍石像;新增加了麒麟、狮子(唐宋诸陵只有门狮),内侍亦改置于神道。在石仪排列次序上,凤阳皇陵一改唐、宋诸陵以望柱为导引的常规,将望柱夹列于石人和石兽之间,并且增为二对,这种排列方式后来为祖陵和

①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三,点校本,第 26 页,中华书局,1985 年。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 年第 4 期。

③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 年第 11 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第 58—75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



图 2—10 明皇陵神道石刻马及控马官

孝陵所沿用。

第四,中国秦汉以后帝王陵墓的朝向大多都有一定的规律,封土为陵和因山为藏者有坐西朝东(如秦、西汉等)和坐北朝南(如唐、宋等)两种形式,皆按当时的理念习俗取尊位;依山坡建陵者方向不能取正,每随山势而有所偏斜,如南京和丹阳的南朝诸陵即有偏东、偏西,或朝东、朝西者,但坐南朝北的只有南京西善桥陈宣帝的显宁陵一例^①。凤阳皇陵建于平地,但却与传统建筑迥异,取坐南朝北之倒向,其何以如此颇耐人寻味。王剑英先生认为:凤阳皇陵在其始建时

^①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也是朝南的,“这可从后划入陵垣的燕山侯孙祖兴墓、陵垣外东南二里汪氏老母家坟均为南向得到印证”。后来因为兴建中都城而改变了皇陵的方向,“皇陵的改建和转向始于罢建中都后的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十月,完成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8年)”^①。综合各方面资料来考察,这个结论应该是有道理的。至于皇陵转向的原因,王文认为是“皇陵离(中都)城较近,又在城南,将其由朝南改为朝北,不仅从形势上将其有机地纳入了整个中都城的大格局,使中心不移,而且出城谒陵可径直抵达,避免了沿皇陵外垣向南绕到陵南,再折北才能进入陵园的麻烦”。这一推测无疑也有其合理性,但有两点疑问无法解释清楚。首先,既然皇陵与中都城总体规划关系如此密切,何以不在兴建中都城之初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改变皇陵朝向(此时皇陵也正在大兴土木),反倒是在“罢建中都”之后才改变朝向呢?其次,与都城城门相同朝向的礼制建筑并不会因为“绕路”而轻易改变方向,这是礼制所在,为历朝所尊奉无改,明朝也不例外。明朝南北两京南郊圜丘坛朝南、而北郊方泽坛朝北就是极好的例证,祖先陵寝亦属重要礼制建筑,显然不会因为避免“绕路”而变成倒向。笔者认为,凤阳皇陵朝向之所以改变,可能主要是为了凭依“龙脉”所自来之山。皇陵之北约10公里处有凤凰山,在中都城修建以前可以指为皇陵的龙脉所自来;当中都城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拔地而起后,无疑是阻断了皇陵的龙脉,当发现了这一失误后,作为补救,皇陵只好转向,凭依南侧同样是肉眼难于望见的大约10公里以外的善山、青山、离山诸小山,后来善山最终被确认是皇陵所凭依之山,并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改名为“翔圣山”,从祀方泽坛。光绪《凤阳府志》记载:“青山在凤阳县东南四十里,山木常青,涧水出焉,流而注

^① 王剑英:《明中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2期。

为东濠。按：山东西长六七里，其南岗峦甚多，土人各立异名，其实皆青山支络也”；“善山在府治南四十里，一名‘翔圣山’，入南山之要径”^①。明初虽然山陵制度尚未完备，但对风水却十分重视，明太祖因“虑泄山川灵气”，宁肯不改父母之微葬。因此，追求龙脉风水凭依应该是凤阳皇陵改变朝向的最根本原因。

第五，从祭祀场所和祭祀礼仪来看，凤阳皇陵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唐、宋皇陵的奉祀场所分为上宫和下宫两部分，上宫之祭殿建于陵冢前，即献殿，供奉神主，是上陵时举行礼仪性祭典的处所，用牲醴、祝版致祭；下宫距陵宫稍远，供奉墓主画像、衣冠，饮食起居如常日，二处的祭祀性质存在明显的差异。《宋史·礼志》将上下两宫祭祀之区别讲得十分清楚：“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备膳馐，内臣执事，百官陪位”^②。也就是说，上宫之祭由礼官行事，为国家之公祭；下宫之祭则由宦官行事，百官陪从，类同私家之祭。凤阳皇陵的祭殿由江阴侯吴良督工，重建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四月，次年闰五月“皇陵祭殿成，命称曰‘皇堂’”^③。可见，“皇堂”是凤阳皇陵祭殿的正式名称，它相当于唐、宋陵园中的献殿，也就是后来

① 清·魏家骝等：《凤阳府志》卷九，《山考》，《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698）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刊本影印，第3册，第1437、143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按，“善山”是否为山之原名已不可考，善或许是“翔圣”的谐音，因疑为清代的讹传之名。又，凤阳皇陵凭依陵山之名在明代文献中有“翔圣”、“翔圣”之异，笔者认为当以“翔圣”为是。详说可参阅拙文《明朝“陵山之祭”述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以及本书第四章中的有关考释。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三，《礼志·上陵之礼》，点校本第9册，第2883页，中华书局，1977年。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五，洪武十二年闰五月丁巳，校印本《明实录》第3册，第1997页。

有明诸陵中的享殿或祔恩殿,是举行陵园大祭的处所。从整体布局来看,皇堂在陵园中占据着核心的崇高位置。此外,凤阳皇陵中仍然有“寝殿”之设置,据《中都志》记载,在皇陵砖城内,有“寝殿五间,膳厨五间,左、右庑各十间;红门三间,中门五间,西厢房一间”^①。这明显是一处自成系统小宫院,但其具体功能如何,是否等同于唐宋时期事死如生的下宫,却未见明文记载。

2. 盱眙祖陵

盱眙祖陵是明太祖追尊高、曾、祖三代帝后的衣冠冢,位于盱眙县管镇乡明陵村,紧傍洪泽湖。

从明末曾惟诚《帝乡纪略》和明历朝《实录》等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来看,泗州祖陵系仿凤阳皇陵规制而建,陵园坐北朝南,自外而内由外罗城、砖城和皇城共三重城垣构成,但《帝乡纪略》等明晚期文献中所附载的《祖陵图》均未画出外罗城(图2—11)。1998年3月至6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明祖陵进行了钻探,确定了陵园的总体布局,大致掌握了各类建筑遗存的基础现状,并发表了考古调查简报^②,提供了泗州祖陵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外罗城,土筑,周九里三十步,城外有下马牌坊一座;东、西面各有防水堤一道。钻探中没有找到外罗城的遗迹,据推测是已为洪水彻底冲刷毁坏。

砖城,周四里十步,四面各辟城门一座,为红门三洞;另有东西角门各一座,应该在南墙正门两侧。1998年钻探发现,砖城平面为长方

^① 明·柳瑛:《中都志》卷四,“陵寝”,《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618)据明隆庆三年重刻本影印,第2册,第41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②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明祖陵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0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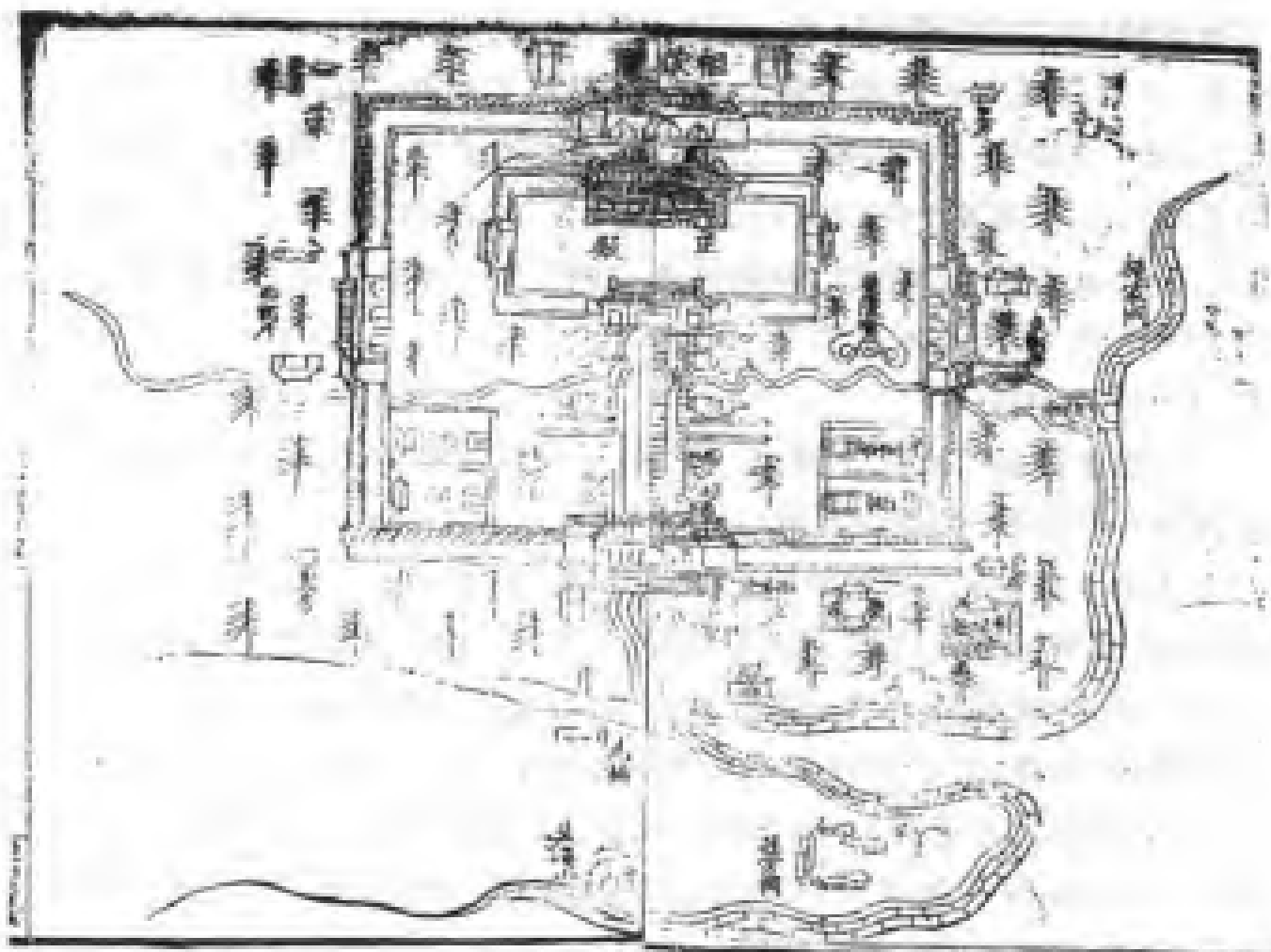


图2—11a 明祖陵平面图(原载《帝乡纪略》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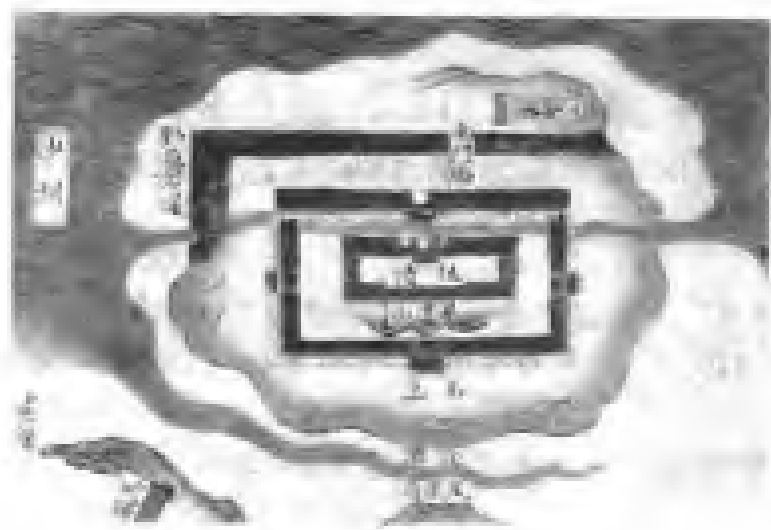


图2—11b 明万历《河防一览图》中的祖陵部分

形,东西长 580 米、南北宽 340 米,尚存局部墙基等遗迹。曾在西墙处探得宽 8.5 米的墙基,据此,估计此城的结构应该是和一般城墙一样,为夯土胎芯内外包砖,而不会是全部砖砌。砖城纵轴线上有南门、神道石刻、皇城、北门等核心建筑。按照《帝乡纪略》所附《祖陵图》来看,祖陵玄宫上的封土(亦称“万岁山”)也在砖城之内,具体位置在皇城和砖城北门之间。但 1998 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却“在玄宫的南部,南距享殿台基西北角 71 米处,探出东西长 13 米、南北宽 8.5 米的一段白灰渣、碎砖遗迹”,推测“应是中砖城北墙遗迹”。按,这一推论与明代《祖陵图》不符,也与凤阳皇陵布局有异;揆诸情理,将祖陵玄宫(尽管只葬衣冠)置于砖城之外,其地位还不如神道石刻,显然贬抑太过。因此,笔者怀疑玄宫前发现的这段建筑基址,很可能不是砖城的北墙。据《帝乡纪略》记载:祖陵“皇城,正殿五间,东、西两庑六间,金门三间,左、右角门二座,后红门一座,燎炉一座。砖城一座,内四门四座,各三间,红门,东、西角门二座”^①。该段建筑基址应该就是皇城的“后红门”,其功用与凤阳皇陵内皇城的“后红门”以及后来太祖孝陵、成祖长陵二陵享殿后面的“内红门”相同,即将享殿与墓区分隔开来,这道门从仁宗献陵开始变成三座琉璃花门的形式。如果这一判断不误,则泗州祖陵砖城的南北长度也将会超过 340 米,其城为正方形亦不无可能。

皇城,砖砌,为一封闭院落,中为正殿五间,两庑分别为东西配殿各三间,正南为金门三间,两侧为左、右角门。1998 年钻探发现,皇城墙基尚存,宽 2 米—2.5 米,距今地表 0.8 米—1 米。皇城南北长 60 米、

^① 明·曾惟诚:《帝乡记略》卷一,《帝迹志·祖陵兴建》,《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700)据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影印,第 1 册,第 62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年。

东西宽 64 米,周长 272 米。实测金门夯土台基东西长 25.6 米、南北宽 17 米,台基向北延伸出一长 14 米、宽 4 米的月台,因此整个金门台基呈“凸”字型。正殿东西长 32.6 米、南北宽 17 米,尚存柱础 26 个,从《简报》所附图来看,柱础略东北方向位移,可以推算出原建筑形式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与文献记载相吻合。金门与正殿之间联以长 30 米、宽 6.5 米的丹陛。东配殿台基南北长 27 米、东西宽 14 米;西配殿台基南北长 25 米、东西宽 14.5 米。钻探结果表明,泗州祖陵皇城为四合院式,正殿及两配殿之后墙与城墙重叠,惟金门向南凸出。

在皇城金门外排列神道石刻,已拉起扶正。经钻探发现,这段神道原本就是自然隆起的高岗,并且“石像生复原扶正的位置大体是正确的”。泗州祖陵神道石刻自南而北依次为麒麟两对、狮子六对、望柱两对、马及马伕两对(前一对为一人执鞭、一人牵马,其中牵马者与马联体;后一对二人分别拱手侍立于两侧,马腹下有祥云),过小沟一道(钻探确定为金水河旧址),复有文臣两对、武将两对(图 2—12)、宦官两对,包含望柱总计 18 对^①。

^① 泗州祖陵神道石刻数目的统计方法与前述凤阳皇陵同。关于明祖陵神道石刻数目,还有 19 对、20 对、21 对不同说法;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不同的计算方法以外,还有对于石刻出土时位次理解等。诸家说法可以参见张正祥:《明祖陵》(载《考古》1963 年第 8 期),刘聿才等:《祖陵石刻修复》(载《文博通讯》1982 年第 5 期),刘聿才等:《明祖陵述略》(载《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2 期),蔡述传:《明代第一陵——明祖陵》(载《文物天地》1985 年第 2 期),徐萃芳:《明皇陵和祖陵》(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 334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李世源:《明祖陵建造时间考》(载《东南文化》1988 年第 1 期),蒋中健:《明祖陵浅探》(载《东南文化》1988 年第 1 期);秦士芝:《明祖陵的营建及其神道石刻》(载《东南文化》1999 年第 2 期,又见《档案与建设》1999 年第 7 期);周致元:《明祖陵的地位和影响》(载《东南文化》1999 年第 4 期);以及李世源《明祖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年)、蒋中健:《明代第一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年)等。

泗州祖陵系仿凤阳皇陵制度而建,二陵在平面布局上几乎完全相同,只是祖陵的规模和等制都略低一些。祖陵工程前后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最初建成的玄宫部分是在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八月,由皇太子朱标主持,葬三祖帝后衣冠;稍后,建成核心建筑正殿。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工部以泗州祖陵黑瓦为言,帝命易以黄,如皇陵制”^①。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成神库、神厨、棂星门等,至此,泗州祖陵始规模大备。嘉靖十二年



图2—12 明祖陵神道石刻武将

(公元1533年),祖陵奉祀朱光道奏请祖陵改易黄瓦,增设石像生,至十五年(公元1536年)完工。嘉靖年间的这次祖陵工程应该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改建和添建,永乐元年祖陵易黑瓦为黄琉璃瓦,可能仅限于正殿、宫门等主要建筑,嘉靖年间应该是彻底的更换。至于“增设石像生”,从明祖陵现存神道石刻来看,它们的时代风格并不一致,可能分别是洪武(或永乐)和嘉靖两个年代的作品。泗州祖陵神道石刻年代的准确判定,对于明代诸陵神道石刻的分期研究大有裨益。

^①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一七,《礼·山陵》,标点本,第270页,中华书局,1956年。

二、南京孝陵

孝陵在江苏省南京市东郊钟山(即紫金山)独龙阜下玩珠峰,是明太祖朱元璋和孝慈马皇后的合葬墓。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和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曾分别将陵址所在地原有的宝公塔和蒋山寺迁移,洪武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改建蒋山太平兴国禅寺为灵谷寺。初,太平兴国禅寺在宝珠峰之阳,梁僧宝公塔在焉。至是,住持僧伸羲奏请迁之,遂诏改建于京城东独龙冈之左。既成,赐额曰‘灵谷’,榜其外门曰‘第一禅林’,又赐田一百五十余顷”^①。一般即以洪武十四年作为孝陵的始建时间,“其经始,在洪武十四或十五年(迁蒋山寺在洪武十四年,马皇后崩在十五年)。其成在洪武十六年”^②。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太祖嫡妻马皇后病故,九月葬入已建成的玄宫中,“庚午,孝慈皇后梓宫发引,……是日安厝皇堂。……是晚,仍遣醴僕告谢于钟山之神,以复上故也,命所葬山陵曰孝陵”^③。次年,孝陵享殿建成,孝陵陵宫区主体建筑基本完成。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孝陵全部工程完工。

孝陵依山而建,主要建筑均坐北朝南,陵园分为神道和陵宫前后两部分(图2—13)。

孝陵神道部分,起自下马坊止于棊星门。下马坊是一座两柱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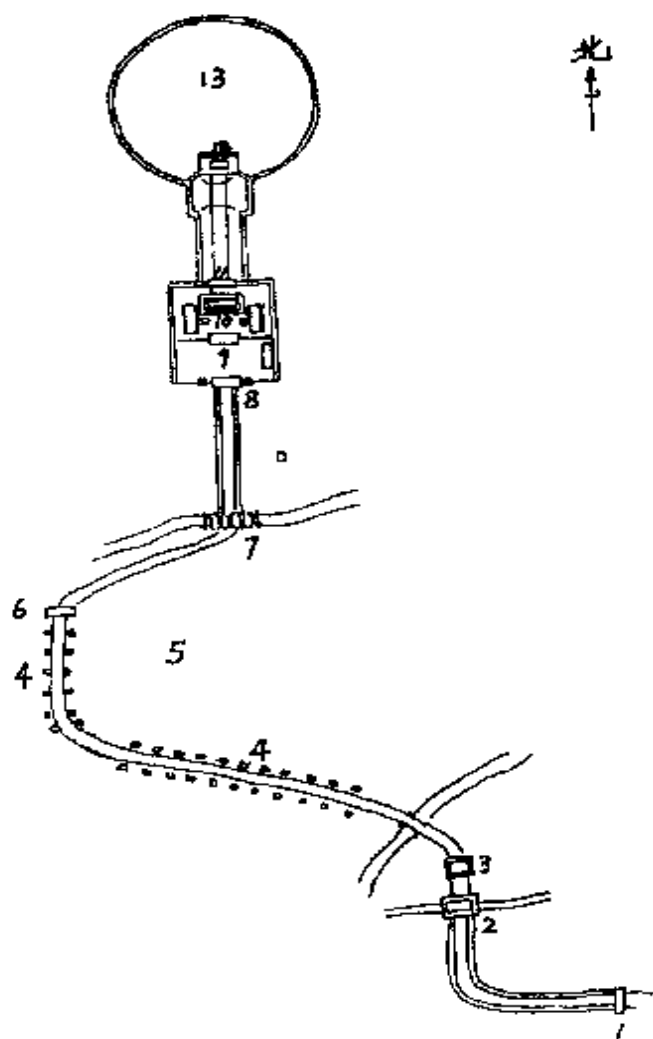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九月己亥,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189页。

^② 王焕镛:《明孝陵志》,“规制第二”,见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1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庚午,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342页。

图 2—13 明孝陵平面示意图
 (据《南京日报》
 1999年3月3日第
 5版,南京市文物研
 究所供稿摹绘)

- | | |
|-------------|--------|
| 1. 下马坊 | 2. 大金门 |
| 3. 孝陵神功圣德碑亭 | |
| 4. 石像生群 | 5. 梅花山 |
| 6. 根星门 | 7. 御河桥 |
| 8. 陵官门及文武方门 | |
| 9. 享殿前门 | 10. 享殿 |
| 11. 内红门 | 12. 明楼 |
| 13. 宝城 | |



天式的石牌坊,坊额上横刻“诸司官员下马”字样,下马坊东面分别为立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的“神烈山碑”和立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的“禁约碑”。下马坊西北1.5公里处有一座砖石结构的券门,名“大金门”,面阔26.66米、残高4.91米^①;是为陵园区大门,券门三洞,顶部已不存,1964年清理时曾发现黄琉璃瓦等建筑构件,推断原为重檐歇山顶。

^① 本书中有关明孝陵建筑的测量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引自南京博物院编:《明孝陵》,第1—5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图 2—14 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及碑楼

大金门北为大碑楼，平面正方形，边长 26.68 米，碑亭顶部已毁，仅存四面围墙，券洞四开，俗称“四方城”。内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高 6.7 米，螭夙高 2.08 米；碑文由明成祖御撰，称述太祖一生功业（图 2—14）。碑亭折向西北过御河桥为神道石刻，列石兽 12 对，自前而后依次为蹲坐狮、立狮、蹲坐狮豸、立狮豸、卧骆驼、立骆驼、卧象、立象、蹲坐麒麟、立麒麟、卧马、立马各 1 对。石兽之后神道

折而向北，复有望柱 1 对、武将 2 对、文臣 2 对。再向北为棂星门，为三间两垣式牌楼门，现仅存柱础。棂星门后，神道转向东北。自大碑楼至五孔御河桥，孝陵神道顺山势弯曲，傍梅花山而过，传说东吴大帝孙权葬于此山。“孝陵城西门内有吴孙权墓，筑城者奏欲去之，诏曰：‘孙权亦好汉子，留为门主’。遂止”^①。今梅花山上有民国时期汪精卫墓址，山下孝陵神道石望柱旁有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孙权墓”标志碑，还有新建的孙权像和碑廊等，但孙权墓的具体墓址不详。

^①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一四，《国事类·南都二墓》，标点本，第 148 页，中华书局，1959 年。

陵宫部分是孝陵陵园的核心,在棂星门东北方。过五孔御河桥,正北为陵宫门,有人称为“文武方门”^①,原为拱券式大门,黄瓦单檐,久毁,曾改为一洞,仍作陵宫门,上题“明孝陵”三个字。1998年7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孝陵博物馆对孝陵陵宫门基址进行了清理发掘,清理结果表明:陵宫门正门三道,圆券顶,其中西侧券门宽3.07、深3.80米;东西二掖门,为平顶过梁式,其中东掖门宽3.33、深2.22米;纠正了以往认为五门皆为券洞式的误解^②。现已按原状修复。陵宫门内为享殿门(相当于昌平诸陵的祔恩门),一层须弥座式台基,东西宽40.10米、南北进深14.60米,久毁。清代即其址改建为面积较小的三开间碑殿,内立清朝圣祖、高宗二人南巡途中谒陵时所题碑记。享殿门北为享殿基址,有白石殿陛三重,通高3.03米,其上建享殿,仿宫中奉天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现仅存大柱础56个。

^① 此名称最早见于王焕镛之《明孝陵志》“规制第二”,“有文武方门五(即陵寝之第一门),三大而二小”(见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13页);此后,南京博物院编《明孝陵》等书亦相沿此说。有人推测“文武方门”系“文武坊门”之误,但未能提出论据。查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引《江宁府志》云:孝陵主体“宝城、明楼、御桥、孝陵殿、廊台辇道、戟门、文武方门、大殿门、左右方门、御河桥、棂星门、华表,多同大内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40—241页)。以孝陵实际建筑物堪合,这段引文中的戟门应为享殿前门(制同太庙戟门),大殿门即陵宫门,而文武方门、左右方门应该分别是指戟门、大殿门这两座主门旁侧的掖门。孝陵陵宫门正门为拱券式三洞,其形制与享殿后内红门同,昌平长陵、永陵、定陵之陵宫门皆为此制。正门三洞,中为神道,墓主所用;余二门,左御道,右王道。而所谓“方门”者,所指为两旁掖门,以其为平顶过梁式,形状方正,不同于中门半圆券顶,故有此名。又以其在旁侧,亦名“角门”。祭陵时文武官员分别进出掖门,故曰“文武方门”。

^② 南京文研所:《明孝陵陵宫门基址清理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2日第1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明孝陵陵宫门址的发掘收获》,载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176—18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清初屈大均谒孝陵时见到：“牧马蕃儿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①；又魏世效于康熙庚申年（公元1680年）谒孝陵时听游人说：“郑氏兵至，不识楠木，而以为异香也”^②。据此可知当年孝陵享殿为楠木大柱，并且有金龙为饰。孝陵原享殿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毁于兵火，同治四年、十二年（公元1865、1873年）曾即原址改小重建，现存小殿三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督修的。享殿前两庑原有东西配殿，1999年3月至2000年2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东配殿进行了考古发掘，殿基通长66.84米、进深7.3米，建筑坐东朝西，面阔十五间、进深三间；还发掘出了焚帛炉、神厨、宰牲亭、东井亭等遗迹^③。到2002年3月，又相继发掘出西配殿、具服殿、西井亭等建筑遗迹，其中西配殿的殿基用纯净的粘黄土和鹅卵石分层夯实，高度超过2米。具服殿位于配殿之南，门朝东，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10余米，五开间^④。

享殿基座北面为“内红门”，砖石拱券结构，今仅余一门。内红门往北约200米处为宝城之大明楼，明楼前有山涧一道，跨涧建有大石

① 清·屈大均：《道援堂集·孝陵恭谒记》，王焕镛《明孝陵志》“艺文第七”引，见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1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清·魏世效：《魏昭士文集·孝陵恭谒记》，王焕镛：《明孝陵志》“艺文第七”引，见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11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 陈文林：《朱元璋墓大探秘》，《南京日报》1999年3月3日第5版；贺云翔等：《南京明孝陵及东陵考古获多项发现》，《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7日第1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明孝陵陵宫内东侧建筑基址发掘记》，载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183—19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④ 孝博源根：《明孝陵考古又添新成果，寝宫全貌重见天日》，《扬子晚报》2002年3月8日。

桥一座(亦名“升仙桥”)以通行。明楼后是即原独龙阜山体修补而成的圆形大封土堆,名“圆丘”,略呈圆形,直径为325米—400米,周围环砌以城垣,城墙以石条为基,上砌城砖,是为“宝城”。明楼在宝城南端正中,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堡式建筑,以整齐的石块砌成,下承以石须弥座,通高16.25米。方城正中辟券门一洞,高3.86米,内为斜坡隧道,铺54级石阶自下而上,券门内为一小院落(这个小院实际上相当于后来明清皇陵中的“月牙城”或“哑巴院”),迎面有十三层石条砌成的挡土墙一道,墙后为坟丘封土;院内的左右两侧分别有东西转向礅礅可以上达明楼。明楼砖砌,外抹红灰、内抹黄灰,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18.4米,顶部已不存,南面辟券门三洞,东、西、北三面各辟券门一洞(图2—15)。



图2—15 明孝陵明楼

1998年12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配合,采用无破坏性精密磁测技术(GPM)对孝陵封土堆进行探测,在明楼

东侧发现了墓道的迹象,西北转至宝城中心,长度超过120米;明楼北100米处至宝顶南沿一片区域内疑为玄宫的所在,其范围为南北90米、东西50米^①。孝陵玄宫开凿于钟山玩珠峰下的独龙阜山体之中,其墓冢封土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利用了原山本体,再加筑卵石,填补成半球形。至于墓室工程做法,山东曲阜鲁荒王(薨于洪武二十二年)陵、湖北钟祥梁庄王(薨于正统六年)陵、江西南城益端王(薨于嘉靖十八年)陵等一些亲王陵也是凿山开穴,鲁荒王陵“凿石开圻,然后以砖砌室,封土夯层坚固”^②;梁庄王陵墓“墓室乃是从墓道北端向内凿岩,形成隧洞,再在洞内用砖砌成”^③;益端王陵“建于石山之中,造墓时先将石山凿开,用红条石作墙基”,以青砖砌成墓室,“墓顶上再填封土”^④。孝陵玄宫做法或许与它们有相似之处。

孝陵陵宫部分自成三进封闭式院落,即自陵宫门至享殿前门(碑殿)为第一进;自享殿前门至内红门为第二进;自内红门至宝城为第三进,从陵宫门至明楼纵深375米。自下马坊至明楼纵深2.62公里。

孝陵的陵宫部分和神道部分共环以外郭城,以大金门为正南门,门两侧原有向东西延伸的红墙,东到灵谷寺,西接南京城墙,复折向北,包围整个陵区。从前引《七修类稿》等文献记载来看,孝陵外城还应该还有西门等其他城门。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孝陵“沿山周围缭垣四十五里,王门、西红门、后红门、东西黑门、神宫监、孝陵

① 陈文林:《朱元璋墓大探秘》,《南京日报》1999年3月3日第5版;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等:《明孝陵地下宫殿勘测记》,载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198—20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④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棨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卫环之”^①。但这些城门、城墙今皆已不存。

孝陵主体建筑建成于洪武中叶,其时正是明朝各项典章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时期,陵园规制多由明太祖亲自拟定,它奠定了明朝陵寝制度的基础,也开辟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与汉、唐、宋诸朝皇陵以及凤阳皇陵相比,明孝陵有以下几项重大变革:

第一,在陵园布局方面,汉、唐、宋等朝皇陵陵园布局皆模仿都城,方形城垣,四面辟门,封土在陵城中央,象征帝王中宅天下;孝陵则将陵园平面改为前方后圆,南北以一纵轴线贯穿之,陵园建筑由南而北逐级递进,坟丘建于陵园最北端。在孝陵陵宫中,献殿和坟丘各为一个院落中的主体,其中献殿部分完全模拟皇宫正殿格局,地位比坟丘更加突出。孝陵的这种平面结构应该是模拟宗庙、宫室而来。东汉蔡邕说:“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②。明朝的宗庙和宫室亦为前朝(庙或大殿)、后寝(寝殿或寝宫)之制,在孝陵陵宫中,享殿即相当于前朝大殿或宗庙大殿,而明楼宝顶及地下玄宫部分亦即皇帝的安眠处则相当于大内正寝或宗庙中的寝殿。按照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象征观念,孝陵陵宫的平面布局可理解为追求后世嗣君在地(享殿)祭天(圜丘宝顶)的意境。

第二,由秦汉至唐宋,与陵园平面布局为方形相配,皇陵封土的形状亦大多为方形或长方形覆斗状(因山为藏者除外),明孝陵则改

①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太祖孝陵”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4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② 汉·蔡邕:《独断》卷下,《诸子百家丛书》本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为圆形。关于明太祖将皇陵封土由方形改为圆形的原因,刘敦桢先生认为是受了长江流域“无方坟之习”的影响^①;杨宽先生基本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圆形宝顶“可能和六朝以后南方帝王坟墓采用圆形有关。六朝坟墓除了那些深藏在山腰里不起坟丘的以外,起坟丘的陵墓都作圆形,不见有方形的”^②。长江流域流行圆形封土的确是一种传统,除了杨宽先生所举诸例以外,夹在唐、宋之间的前蜀高祖王建之永陵(在四川成都)也是圆形封土,封土的下部尚有残存的界土石条^③。但明太祖在礼仪制度上颇好革古创新,所以,促使孝陵将封土改作圆形的主要因素很可能不是传统习俗,特别是那些偏安王朝的习俗。以实地考察所见,孝陵是一种特殊的“因山为藏”,玄宫开凿于山体之中,独龙阜本身就相当于封土的一部分,为了外形美观,“独龙阜体表至少60%的地方是经过人工修补、堆填的”^④,圆形更接近于山体的原形,便于人工修饰,这是孝陵封土由方形改为圆形的最直接原因。另外,孝陵玄宫建于山前小丘上,而不是像汉、唐皇陵那样选址于广袤的平川,坟墓在钟山映衬下并不起眼,而且也容易为山水所冲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在原独龙阜周围加砌了城垣,从建筑力学来考虑,圆形当然也比方形更为坚固。这项工程不仅有利于保持封土不流失,也有利于防盗;更主要的,高耸的明楼和日常封闭的券洞门更使皇陵封土笼罩上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比前代皇陵平地裸露的大封土堆凭空多出几分威严,较一般的“因山为藏”也更具感染

① 刘敦桢:《明长陵》,《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1933年。

②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④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等:《明孝陵地下宫殿勘测记》,载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20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力。从整体结构来看,孝陵这种新型皇陵布局与原山自然环境更加和谐。

第三,孝陵陵宫及周围建筑中没有下宫(寝殿)之设置,祭祀建筑惟有献殿一处,陵宫中虽有神厨、神库、省牲亭等附属建筑,但其功能却是备献殿大祭之用,不再用于供奉墓主日常饮食、盥洗等。《大明会典》记载:孝陵之祭“每岁圣旦、正旦、孟冬、忌辰,果酒行香;清明、中元、冬至,太牢致祭。特遣勋旧大臣一员行礼,南京各衙门文武官俱陪祭”^①。清初顾炎武更明确地说:“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②。从此,皇帝陵墓中取消了事死如生的祭祀活动。唐、宋皇陵下宫即寝宫的一部分职任改由明初皇宫内新出现的奉先殿所承担(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本书第四章中论述,在此暂不展开)。陵园祭祀更加庄严神圣,祭祀礼仪日趋类同于宗庙,陵上之庙(享殿)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也直追宗庙。

第四,孝陵神道和石像生制度也与唐宋诸陵以及凤阳皇陵有了明显的不同。在神道布局方面,唐宋诸陵和凤阳皇陵、泗州祖陵神道取直,自起点到陵宫门一览无余;孝陵神道则随山势弯转,曲径通幽。在石像生的内容方面,孝陵和凤阳皇陵一样不再设置翼马、朱雀(或鸵鸟)浮雕、角端、蕃部客使;孝陵神道恢复了象、保留了马,但取消了驯象奴和控马官,并且取消了皇陵仍保留的羊、虎(这两种石兽明清时期多见于人臣墓前);新增加了骆驼、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影印本第3册,第1421页。

^②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墓祭”,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獬豸^①；保留了凤阳皇陵望柱夹列于石人和石兽之间的排列方式。从孝陵开始，诸种石兽、石人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基本固定；确立了石兽每种两对，均为一对蹲坐或跪卧、另一对伫立的形式，这些为以后明清诸陵所继承。

三、北京长陵

长陵在北京市昌平区北天寿山主峰之下，是明成祖朱棣和仁孝徐皇后的合葬墓。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故，成祖命于北京择地建陵，先后参加陵址卜选者主要有礼部尚书赵玘、知县王侃、给事中马文素、江西术士廖均卿和曾从政、僧人吴永以及钦天监的阴阳生等，最后选定了昌平的黄土山为吉地，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动工。《明太宗实录》记此事云：“营山陵于昌平县。时仁孝皇后来葬，上命礼部尚书赵玘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②。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徐皇后梓宫自南京发引，二月，“葬仁孝皇后于长陵”^③。这时，长陵玄宫等工程已经完工，“定管(营)建长陵功”，封赏山陵卜吉、营建有功诸人^④；三

① 獬豸和麒麟都是想像出的狮形神兽，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麒麟为双角而身生鳞甲，獬豸为独角不带鳞甲，传说獬豸之独角可触好恶。南朝陵墓前的狮形带翼神兽——天禄、辟邪即有双角和独角之分，但明陵石像生中的獬豸和麒麟的直接母本可能是源自宋陵神道之角端。

② 《明太宗实录》卷九二，永乐七年五月己卯，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1202页。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七，永乐十一年二月丙寅，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668页。

④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〇，永乐十一年五月壬寅，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684页。

年后又建成了享殿^①,长陵陵宫部分的土木工程基本告竣。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明成祖病故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附近),同年十二月葬长陵。但这时长陵的神道石作工程还尚未开始。直到英宗即位之初的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四月,才“修葺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于御道东西”^②;同年十月,又“建长陵神功圣德碑”^③。一百年后,即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重修长陵等七陵,始用石砌神道,其石像生等项各护以石台”^④;至于整个陵区南端大红门外的青白石五阙石牌楼,则更晚建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这时上距长陵之始建已经130余年。

① 关于明长陵享殿亦即献殿建成的时间,《明实录》中并存二说,其一是《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四,永乐十四年三月“癸巳朔,长陵殿成,奉安仁孝皇后神位”,见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915页;其二是《明宣宗实录》卷二六,宣德二年三月“己亥朔,长陵殿成。以明日清明,奉安皇祖考太宗文皇帝、皇祖妣仁孝文皇后神御”,见校印本《明实录》第10册,第671页。又,《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壬子,礼部奏上太宗皇帝大葬仪中亦涉及到长陵献殿,“至陵,执事官先陈龙輜于献殿门外,俟大升舆以至,礼官诣大升舆前跪,奏请灵驾降舆,升龙輜,诣献殿,执事官捧祥宫升龙輜由正中门入,皇太子、亲王俱由左门入,诣献殿奉安讫,谥册宝等舆仍陈于前,行安神礼”。见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170页。此条记载可证长陵享殿应该在宣德二年以前已经建成。因此笔者认为,长陵献殿应当建成于永乐十四年,至于宣德二年之“长陵殿成”,可能是指修缮或重建成功。

② 《明英宗实录》卷四,宣德十年四月辛酉,校印本《明实录》第13册,第87—88页。

③ 《明英宗实录》卷一〇,宣德十年十月己酉,校印本《明实录》第13册,第192页。

④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山陵》,影印本第5册,第2730页。

长陵陵园建置与南京孝陵相仿,也分为神道和陵宫两部分。

神道部分原起于大红门(或名大宫门),后向南又延伸至1.2公里以外的石碑楼。大石碑楼仿木结构,青白石质,以榫卯相连,五阙十一楼,气度雄伟,面阔33.6米,正脊高10.5米^①,枋、柱等处均有精美雕饰。大红门为陵区大门,南向,砖石拱券结构,面阔37.6米、进深11.34米,单檐庑殿顶覆黄琉璃瓦,辟券门三洞,原有双扇大门。大红门两门侧原另有东、西角门,旁原有砖墙延伸,环包整个陵区;现俱已不存。门前东西各有下马碑一座,门内偏东原有时陟殿,为嗣皇帝谒陵时小憩更衣之所。

大红门内0.5公里神道正中为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平面为正方形,重檐歇山顶,四面各辟券门,建于边长为26.51米的台基上,俗称“大碑楼”。大碑楼内立明仁宗御制“大明长陵神功圣德之碑”,述成祖一生功德,以巨形螭趺承托,通高8.1米;碑阴、碑侧刊刻清高宗、清仁宗所作祭谒明陵诗文。碑亭外四隅各有华表一根,其制与皇城天安门内外四根华表相同^②。大碑楼迤北,在长约1公里的神道两旁夹列神道石刻(图2—16),计有望柱1对和石像生18对。石像生分石兽石人两种:石兽共12对,自南而北依次为蹲狮、立狮、蹲獬豸、立獬豸、卧骆驼、立骆驼、卧象、立象、蹲麒麟、立麒麟、卧马、立马各1对;石人6对,依次为武臣、文臣、勋臣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册,第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此外,本书采用长陵地面建筑的有关数据,分别引自魏玉清:《明长陵》(中国旅游出版社,1986年)、胡汉生:《明十三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等,以下不一一另注。

^② 长陵大碑楼四隅华表在《大明会典》中名为“擎天柱”。见《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山陵》,影印本第5册,第2729页。



图 2—16 明长陵神道(十三主神道)

各 2 对^①。石像生尽处为棂星门一座,俗名“龙凤门”,为三座并连的石牌楼门,中间联以砖砌墼墙,门通宽 34.65 米,高 8.15 米。由此往北,经七孔桥一座、五孔桥两座抵达长陵宫门。

自大红门至长陵陵宫门,神道总长约 6 公里,基本朝向为由南向北而略偏东,不同地段有局部弯曲,大碑楼和神道石刻集中于靠近大

^① 本书关于长陵神道石像生的定名,多依清初顾炎武:《昌平山水记》,梁份:《帝陵图说》以及《光绪昌平州志》等,取其简便易懂。如《昌平山水记》卷上记长陵石像生云:“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石兽二十四,四马,四麒麟,四象,四鸾驼,四獬豸、四狮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远者蹲”。见点校本《昌平山水记》第 5 页,北京出版社,1962 年。又,《光绪昌平州志》卷十,“渠堰记第十二”中所记文字略同,见《中国方志丛书》本(华北地方第 137 号)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重印《光绪昌平州志》第 487 页,成文出版社,1968 年。但这些石人兽在《大明会典》中却有所不同记载,该书獬豸称为“兽”,武臣称为“臂刀执瓜盔甲将军”,文臣称为“朝衣冠文像”,勋臣称为“朝衣冠武像”,见《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山陵》,影印本第 5 册,第 272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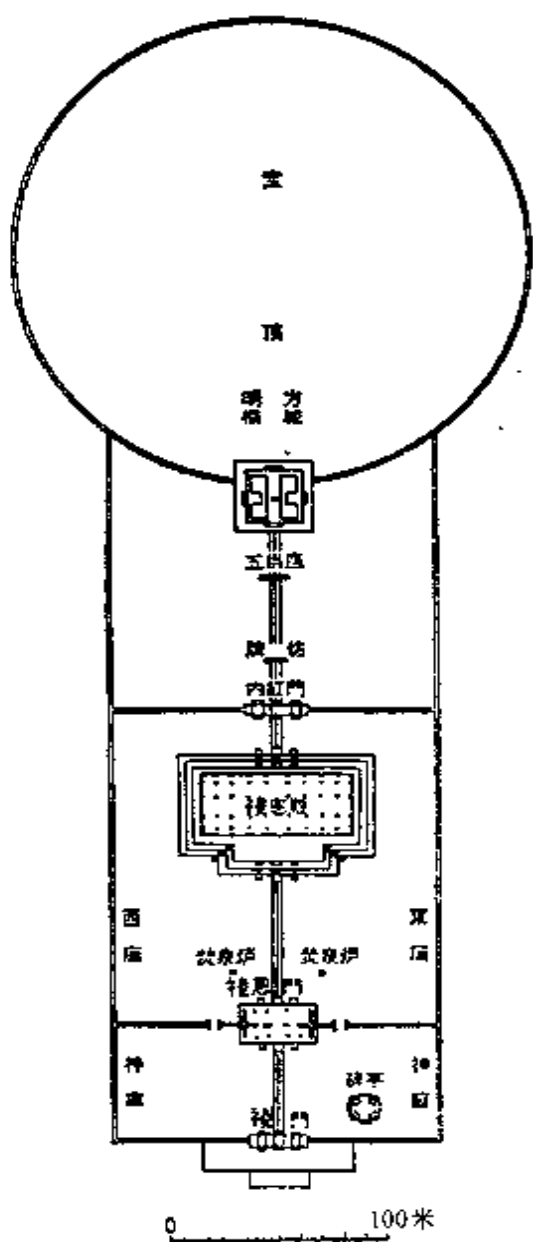


图2—17 明长陵陵宫平面图
(引自《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1933年)

宫门的前段。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四月,明世宗面谕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等:“长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像生等项各护以石台”^①。按照这一记载,长陵神道本无石甃,嘉靖十五年以后改为条石铺砌。但1989年12月,有关部门对长陵石像生段神道进行考古试掘,发现在现地表以下为卵石铺路,路面宽3.84米,两侧为明代大砖竖砌的砖牙子,但未发现御道条石^②。从现存遗迹观察,仅在靠近长陵陵宫的神道北段,尚有部分条石所铺神路的原物遗存,和南京孝陵情况相似。

长陵陵宫在天寿山主峰之下,由三进院落组成,南墙长145.4米、东墙长343米、西墙长327米,北接宝城(图2—17)。院墙砖砌,墙体内外上部抹红灰,下部磨砖对缝,方向坐北朝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六,嘉靖十五年四月癸巳,校印本《明实录》第42册,第3929页。

② 赵福生:《十三陵主神道发掘简记》,《北京考古信息》1990年第2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印(内部发行),1990年6月。

南而微偏西。陵宫南垣正中为陵宫门,由此进入第一进院落。门为砖石拱券结构,制同神道大红门,辟正门三洞,单檐歇山顶,面阔25.5米。门前有月台,前出礅礅;两侧原有东西角门,已封堵。陵宫门外东侧有宰牲亭、西侧有具服殿,门内御道东西原有神厨、神库各五间,现俱已不存。宫门内东南隅有小碑楼一座,平面正方形,边长10.48米,重檐歇山顶。内立石碑,碑额龙首,碑座为龙首龟身鼉形异兽。此碑本无字,清代于碑阳刊刻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世祖保护明陵的谕旨,碑阴、碑侧刊刻清高宗、清仁宗祭谒明陵的诗文。

陵宫门内正北为祔恩门,单檐歇山顶,进深两间,面阔五间,通宽31.5米,中三间为门道,建于一重汉白玉石台基之上,前后陞阶各三出,门及基座通高14.57米。祔恩门两侧红墙各辟随墙小琉璃门一座,与正门相配,通向陵宫第二进院落。祔恩门内为祔恩殿,是为陵宫建筑的核心,建于通高3.13米的三层汉白玉石台基之上,殿前有月台,台基平面呈“凸”字型,前后正面各三出陞阶,月台东西两侧各设副阶。大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通长65.7米,进深28.5米,重檐庑殿顶,规制与皇宫正衙奉天殿相仿。殿内大柱均系整根上等楠木修治而成,其中32根金柱高达12.58米,直径均在1米以上,中间的明柱直径超过1.1米。明代原制是:“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①。民国二十四年前后所见,殿“中有楠木龕一,上刻双龙环绕之形,内供神位”^②;“殿内楠木明柱四十余根,高三丈,大二人合抱。中

^①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5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② 朱侠:《谒昌平明十三陵记》,《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1935年10月。

间楠木大龕一，供皇帝牌”^①。祔恩殿前两庑原有东西配殿各十五间，倒毁于清初以后；祔恩门内两侧各有一座琉璃砖砌焚帛炉。

祔恩殿后为内红门，形制与陵宫门相同，由此进入陵宫的第三进院落。内红门内迎面为二柱牌楼门，亦名“塞门”^②，再往北就是明楼和宝顶封土。明楼前列石几筵^③，为须弥座式长条台案一，长 7.05 米、面宽 2.2 米、高 1.03 米，上陈列鼎式香炉一、烛台二、花瓶二。长陵封土呈不规则的圆柱形，据《大明会典·工部·山陵》等明代文献以及《明史·礼志》记载，其直径为“一百一丈八尺”。封土周围环砌砖垣，称为“宝山城”，简称“宝城”^④。宝城上设雉堞，墙内设马道一周，实测长陵宝城高 7.3 米、周长约 1000 米。宝城南端正中为平面

① 汤用彬等：《旧都文物略》，“陵墓略”，第 119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

②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 18 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③ 明代文献中对于“石几筵”的称谓不一，在《大明会典》以及清代修成的《明史》中称为“石几筵”，《明实录》中亦多用此名，但《明宪宗实录》卷六，天顺八年六月壬寅条下，记英宗裕陵之制称为“祭台石”，见校印本《明实录》第 22 册，第 157 页；其他记载中亦有名“石祭台”者。清初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称为“石台”，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名曰“石供案”，后人俗称为“石五供”。本书从《大明会典》说，用“石几筵”之名。

④ 有关“宝山城”或“宝城”名称的记载见诸《明实录》，其典型者主要有：《明英宗实录》卷三四四，天顺六年九月丙午，“以大行皇太后将合葬景陵，命抚宁伯朱永、都督佥事赵辅、兵部右侍郎白圭帅官军除道及建明楼、筑宝山城”，见校印本《明实录》第 21 册，第 6961 页；《明宪宗实录》卷六，天顺八年六月壬寅条，英宗裕陵之制有“金井宝山城池一座……”，见校印本《明实录》第 22 册，第 157 页。《明神宗实录》卷二〇三，万历十六年九月壬戌，“上率后妃恭谒长陵、永陵、昭陵毕，亲阅寿宫。从官于殿前朝见，命辅臣及在工大臣随行，历阅宝城、玄堂毕，御幄次进茶”，见校印本《明实录》第 55 册，第 3797 页。可见“宝山城”是明代皇陵封土外包砌砖城之正式名称，简称为“宝城”。

呈正方形的方城明楼,陵宫的东、西墙北端在明楼两侧与宝城城垣相接。方城城台高 10.95 米,顶边面阔进深均为 34.86 米,底为石须弥座,座上砌以城砖,正中辟券门一洞,券洞内为南北向长 28 米斜坡面上的礅礅隧道,隧道尽头折向东西分别有一券洞式扒道,各长 15 米,出口至方城外,再转折面南即可上达明楼。顾亭林记载,宝城“城下有甬道,内为黄琉璃屏一座,旁有级分东西上”^①,据此可知原甬道尽头原有琉璃屏壁,今已不存。明楼是整个陵园的制高点:明代“陵寝之制,宝城最高,明楼当城台上,又高,远望无不见”^②。长陵明楼平面呈正方形,建于边长 21 米、高 0.94 米的台基之上,楼高 20 米,重檐歇山顶,四面辟券洞,其中东西两面券洞在清代被封堵。明楼内部正中竖陵碑^③,碑方首,上刻双龙,承以须弥座式碑座,通高 5.8 米。碑额刻篆书“大明”二字,碑身刻隶书“成祖文皇帝之陵”七字;碑身涂朱砂,字描金。长陵原碑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 1604 年)五月二十三日毁于雷击,现碑为万历三十三年(公元 1605 年)三月重建。明楼南侧重檐之间悬挂榜额曰:“长陵”,蓝底金字。

①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 5 页,北京出版社,1962 年。

②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 19 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③ 昌平诸陵明楼内所立石碑在明代文献中似无固定名称,《明宪宗实录》卷六,天顺八年六月壬寅条下,记英宗裕陵之制称为“云龙五彩贴金朱红油石碑一”,见校印本《明实录》第 22 册,第 157 页;《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七,嘉靖十七年十月乙巳条下有“初,上阅长陵碑,欲更成祖谥号,命钹木加碑上”,见校印本《明实录》第 43 册,第 4439 页;《明神宗实录》卷四〇七,万历三十三年三月辛丑,“竖安长陵明楼石碑”,见校印本《明实录》第 60 册,第 7601 页。清初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中称为“大碑”,梁份《帝陵图说》中记为“穹碑”。按,此碑竖立于坟墓之前,文字内容及功用等同一般墓碑,笔者以为应当名之曰“陵碑”。

长陵陵园建筑基本上模仿南京太祖孝陵规制,但对比二陵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长陵大宫门制同孝陵大金门,但于门两侧各增立下马碑,其南1公里处复有五阙青白石牌坊,比之孝陵大金门仅有二柱下马坊更显规制崇宏。

第二,长陵神功圣德碑小于孝陵神功圣德碑,大碑楼制度亦模仿自孝陵大碑楼,但长陵碑楼四角外各增立高10.81米的“擎天柱”一根,周围环境愈显庄严神圣,为孝陵所不及。

第三,在神道石刻方面,长陵恢复了唐、宋诸陵以望柱列于石像生之前为导引的做法,而与明初祖、皇、孝三陵望柱夹于石人石兽之间有异。长陵石像生中石兽的内容和排列方式源自孝陵,在石人中还增列了两对勋爵形象。长陵石像生刀法细腻,写实逼真,与孝陵略显粗犷的风格明显不同。

第四,长陵陵宫内红门以内的第三进院落不如孝陵的相同部分深邃,而略嫌逼仄,但却在明楼前增设二柱牌楼门和石几筵台各一座,前者起了屏风遮挡视线的作用,后者则除了本身的功用以外,还能衬托出明楼的高大。长陵陵宫的第三进院落布局紧凑,起伏跌宕,装饰艺术技高一筹。

第五,长陵方城明楼规模小于孝陵方城明楼,而且为砖石混筑,不如孝陵全部石砌城台之气势宏伟,明楼平面亦由孝陵之长方形变为正方形。长陵明楼内增设了陵碑,标识出陵墓所属。从现存遗迹现察,长陵不同于孝陵之凿山开穴,其宝城周围增设马道,由挡护封土的墙垣变成了真正的“城墙”,有利于守望巡察,比孝陵宝城的防卫功能更强。

第六,孝陵、长陵外围均设有环绕整个陵域的红墙,它界定了陵园的核心保护区域,孝陵名“外郭城”,长陵名“边墙”,后来清代遵化

东陵则名曰“风水墙”。昌平陵区，“现存边墙总长约12公里，十口相连环山约34公里”^①。孝陵陵区内只有皇陵1座，（孝陵东旁原有懿文太子之陵，成祖即位后不再做皇陵祭祀），长陵陵区先后共建有皇陵13座，仁宗献陵以下为从葬，各陵设神道直接或间接通往长陵主神道，除永陵、定陵以外，其余诸陵的规模也都比较小。

四、北京昌平陵区诸陵

长陵以后昌平陵区中的其余十二陵规模均小于长陵，各陵皆无单独通向陵区总门户大红门的神道，并且均不设置大碑楼、石像生、龙凤门等，与长陵的主从关系十分明显，属于从葬或同兆域异陵园的祔葬（图2—18）。《明实录》中对于诸皇陵制度的记载，以英宗裕陵之制最为详细，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六月壬寅，“裕陵成。其制：金井宝山城池一座，照壁一座。明楼、花门楼各一座，俱三间。香殿一座，五间。云龙五彩贴金朱红油石碑一，祭台石一，烧纸炉二。神厨正房五，左、右厢房六。宰牲亭一，墙门一。奉祀房三，门房三。神路五百三十八丈七尺。神公（宫）监，前堂五间，穿堂三间，后堂五间，左、右厢房四座二十间，周围歇房并厨房八十六，门楼一，门房一，大小墙门二十五，小房小八，井一。神马房、马房二十，歇房九，马桩三十二，大小墙门六。白石桥三，砖石桥二，周围包砌河岸沟渠三百八十八丈二尺。栽培松树二千六百八十四株”^②。可见，长陵以后诸陵真正属于各陵自身的建置，实际上只有陵宫及其附属建筑和小段神道。

^① 王岩：《明十三陵边墙山口的建制》，《考古》1983年第9期。

^② 《明宪宗实录》卷六，天顺八年六月壬寅，校印本《明实录》第22册，第157—1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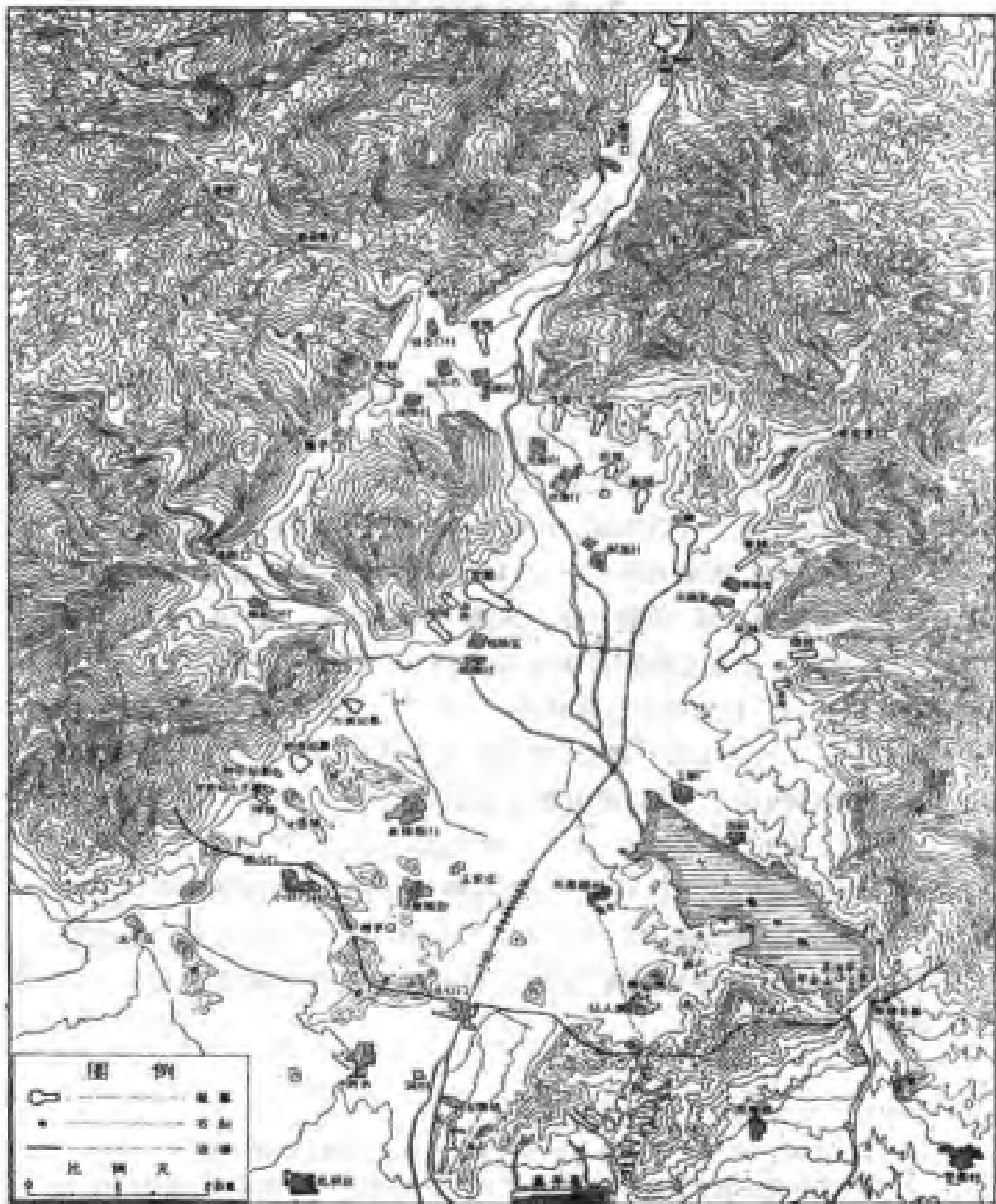


图2—18 明十三陵及妃墓分布图(引自《定陵》)

昌平各陵陵宫均自成体系,主要由碑亭、祔恩门、祔恩殿、东西庑配殿、琉璃花门、二柱牌楼门、石几筵台、明楼、宝城等组成,另有作为附属建筑的神厨、神庠、宰牲亭、神宫监、神马房以及陵宫前神道等。各陵宫前神道长短不等,据《昌平山水记》等有关文献记载,献陵、景陵、永陵、昭陵四陵的神道分别从长陵总神道分支,其余诸陵则分别从各陵就近的宗陵神道分支,如裕陵神道自献陵神道分支、茂陵神道自裕陵神道分支、定陵神道自昭陵神道分支、德陵神道自永陵神道分支等。关于诸陵之间的异同,在《大明会典》中有如下的记载:“宝城:宝城惟长陵最大,径一百一丈八尺;次则永陵,径八十一丈;各陵深广丈尺不等”。“明楼:有陵寝门,惟永陵,中为(以实际遗存考之,“为”疑系“无”字之误)券门,左右墙门各一”。“祔恩殿:殿惟长陵重檐九间,左右配殿各十五间;永陵重檐七间,配殿各九间;各陵俱殿五间,配殿各五间”。“神庠:或二座,或一座,惟献陵无神庠”^①。《大明会典》所记仅为长陵至昭陵九陵情况,而且过于简略,下面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以及笔者实地调查的资料,将思陵以外十一陵陵宫部分之建置与长陵有关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②。

1. 陵宫平面布局的差异

长陵陵宫平面布局为三进院落,其余十一陵陵宫平面与长陵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山陵》,影印本第5册,第2729页。

^② 思陵为明思宗之陵,在天寿山陵区西南隅锦屏山下,原为思宗田贵妃墓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思宗帝后葬入。思陵陵宫建于明亡以后,規制简陋,又经多次改建。其地面建筑亦仅存宝顶、香鼎烛台等石供器和石碑,不尽合明制,故本书不多涉及。

a)景、裕、茂、泰、康、昭、德七陵式,是天寿山陵区最为多见的陵宫形式,直接从长陵形式简化而来。陵宫为二进院落,比长陵减陵宫门,直接以祔恩门为陵宫入口,在祔恩殿后设三座琉璃花门以替代内红门。此式陵宫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碑亭、祔恩门、祔恩殿、三座琉璃花门、二柱牌楼门、石几筵台、明楼、宝城。

b)仁宗献陵和光宗庆陵式,是前种形式的变体。献、庆二陵分别在天寿山西峰下之黄山寺一岭和黄山寺二岭,因有小山余脉自天寿山主山蜿蜒而来(献陵者名“玉案山”,庆陵者在《昌平山水记》中仅名曰“土冈”),宝城前地势逼仄,为不伤及龙脉,乃将祔恩殿建于小山之前,陵宫因小山间隔而分为前后两组院落。前宫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碑亭、祔恩门、祔恩殿,祔恩殿后增设宫墙一道、琉璃花门一座;后宫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三座琉璃花门、二柱牌楼门、石几筵台、明楼、宝城,余制同诸陵。

c)世宗永陵和神宗定陵式,规格明显高于前两种形式,结构比较新颖。陵宫亦为三进院落,但比诸长陵有二项主要变革:一是不设砖券式之内红门,改为在祔恩殿左右两侧各设卡子墙一道,在墙上辟左、右随墙门各一座;二是不像长陵及诸陵将宝城的大部分直接暴露于外,而是在陵宫三进院落之外再增设一道外罗城,将陵宫和宝城的全部封闭起来。此式陵宫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碑亭、陵宫外罗城门、陵宫门、祔恩门、祔恩殿、二柱牌楼门、石几筵台、明楼、宝城。从定陵发掘实例来看,永、定二陵增设外罗城应该与玄宫隧道入口不在明楼下中轴线上,而是直接通向宝城之外有关,可以看做是一种加强陵园保护的措施。

献陵以下十一陵陵宫门或祔恩门前均有碑亭,多已倾圮,但可见平面呈正方形,四面辟门,陛阶各一出。碑亭内有石碑,承以鼈趺,碑上无字。其中定陵碑亭基座边长 11.35 米,碑高 6.12 米、鼈

厝高 1.45 米^①,其余诸陵大体与之相仿。按,献、景、裕、茂、泰、康六陵之陵宫前原无石碑,嘉靖十六年(公元 1537 年)七月,明世宗谕令为先朝六陵各立神功圣德碑,嘉靖二十一年(公元 1542 年)五月十六日礼部尚书严嵩等上奏:“诸陵工(宫)所建造列圣碑亭俱完,长陵碑二通,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碑各一道,皇贵妃石碣一道,东、西二井石碣二座。查得成祖文皇帝圣德仁(神)功碑文乃仁宗昭皇帝御撰,今长陵等陵碑文伏请皇上亲御宸翰制文镌石,以记述列圣功德,垂示于万万世,其皇贵妃及东西二井碣文,合行翰林院撰拟”^②。世宗览奏,只是“报闻”,却始终未亲撰碑文,此后诸帝因循,六陵碑遂成“无字碑”。后来永、昭、定、庆、德五陵修建时皆依制立碑,但也都是白版。

各陵附属的神厨、神库、宰牲亭位置不一,长陵神厨和神库在陵宫门内、祔恩门外;永、定二陵神厨和神库在陵宫门外、外罗城内,宰牲亭在外罗城外;其余诸陵这三种建筑皆在祔恩门外,献陵无神库。长陵宫门外另有具服殿,顾炎武记载:“十二陵各有宰牲亭,在祔恩门之左,西向,厅五间,厢各三间,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黄瓦。惟长陵止一亭,无厅厢。而长陵门右别有具服殿五间,东向,有周垣,垣南有白石槽五,方而长,名曰‘雀池’,贮水以饮雀”^③。各陵宫前或左或右还有祠祭署和朝房,近处各有神宫监。

十二陵陵宫的朝向不一,长、献、裕、茂、泰、庆六陵大多随山势取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册,第 9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一,嘉靖二十一年五月丙申,校印本《明实录》第 44 册,第 5199 页。

^③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 10 页,北京出版社,1962 年。

南向而略偏西或偏东,景陵、永陵朝西南,康陵、定陵朝东略偏南,昭陵朝东南,德陵朝西略偏南,清初建成的思陵朝正南。

2. 祔恩殿、祔恩门制度的差异

长陵至昭陵九陵祔恩殿殿制之差异已见于前面《大明会典》引文,该书所记九陵实例中,惟长陵祔恩殿独存,确如该书所记载为九间重檐大殿无疑。裕陵、茂陵、泰陵、康陵四陵的祔恩殿尚有部分残砖垣及比较齐全的柱础存在,仍可见是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之制,殿前有月台,平面呈倒“凸”字型。月台正面三出陛阶,两侧各有副阶,殿后墙不辟门,亦无陛阶,殿前两庑各有配殿五间。其余七陵柱础多有移位,结合《昌平山水记》、《帝陵图说》等明清之际文献记载来分析,永陵、定陵二陵之祔恩殿当为面阔七间,殿前有月台,平面呈倒“凸”字型。月台正而三出陛阶,两侧各有副阶,殿后墙辟门,一出陛阶;永陵两庑配殿各九间,定陵两庑配殿各七间。献、景、昭、庆、德五陵之祔恩殿当为面阔五间,殿前两庑各有配殿五间,建筑规制应与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等四陵相同。其中献陵门殿之制见于《明宣宗实录》:洪熙元年八月乙亥,“命行在工部建仁宗昭皇帝陵寝殿五间,左右庑各五间,门楼三间,神厨五间并祭器”^①。各陵殿内部装修,在清初尤可见,“承尘皆五色花板,多残缺,而茂陵、泰陵完焉”;庆陵、德陵“殿柱饰以金莲”^②。

关于诸陵祔恩殿的殿顶结构,据《昌平山水记》记载,献陵为“殿五间,单檐”;景陵为“殿五间,重檐”;裕陵未记殿制,但云“并如景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洪熙元年八月乙亥,校印本《明实录》第10册,第196页。

^②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7—8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陵”，茂陵以下诸陵多同前制^①，《帝陵图说》所载景陵以下皆为“黄瓦重檐”，而献陵祔恩殿“制亦如长陵，惟不重檐不同也。殿五楹，卑隘。栋宇楣梁，质素无采篆，俭朴之至，天寿诸陵无一同焉”^②。民国二十四年，朱僎调查十三陵所记亦是：献陵，“殿五间，单檐”；景陵，“殿五间，重檐”^③。由此推测，除献陵为单檐以外，景陵以下十陵祔恩殿之殿顶原制皆为重檐结构。

各陵祔恩殿之基座，从现存遗迹来看，除长陵外，皆为一层，但《昌平山水记》云永陵“殿七间，两庑各九间，其平刻左龙右凤，石栏二层”^④，《帝陵图说》则仅云：“祔恩殿，黄屋重檐，朱扉西南面向坤；额曰祔恩殿，七楹。殿中栋梁柱础地屏，丹漆金碧，雕镂一如长陵”^⑤，而说不及殿座。以实际遗存考之，永陵白石殿座仅一层，《昌平山水记》所载此条或为误载。

各陵祔恩门制度，《大明会典》缺载，《昌平山水记》比较简略，所记不及祔恩门檐制。《帝陵图说》则谓长陵“门三道，黄瓦重檐”，献陵“黄瓦单檐，朱扉南向，门三道”，景陵“黄瓦重檐朱扉，门三道”，裕陵“黄瓦重檐，朱扉向南，门三道”，茂陵“黄瓦重檐，朱扉向南，门三

①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6—8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②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24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③ 朱僎：《谒昌平明十三陵记》，《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1935年10月。按，献景两陵殿制是否为朱僎所亲见，尚不能肯定，因作者文中先有云“诸陵除长陵外，类皆残破，瓦砾纵横，荒凉满目”。

④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7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⑤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50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道”，泰陵“黄瓦重檐，朱扉向南，门三道”，康陵“黄瓦重檐，朱扉向东，门三道”，永陵“黄瓦朱扉重檐，向西南，门三道”，昭陵“黄瓦朱扉重檐，向东南，门三道”，定陵“门基三道，旁二掖门”，庆陵“黄瓦朱扉重檐，向南，门三道”，德陵“黄瓦重檐，朱扉向西，门三道”^①；按此记载，则除献陵以外，天寿山诸陵之祔恩门原制皆为重檐，五开间，中三间为门道。

长陵现存祔恩门实物为单檐歇山顶，进深两间，面阔五间，中三间为门道；献陵以下诸陵之祔恩门均已倾圮，仅可见为一层基座，有不少柱础保存尚好，还可以明显看出五间面阔、中三间为门道之制；凡以祔恩门为陵宫门者，门前多有大月台；屋顶之制不详。但如果长陵祔恩门系保留明代原制，从礼制等级角度来考虑，献、景以下诸陵之祔恩门皆不当有重檐之制。至于1935年朱僊所记之长陵陵宫门“黄屋重檐”、祔恩门“黄屋重檐”^②，与今日所见二门均为单檐歇山顶制度不同，究竟是作者亲见，还是沿袭《昌平山水记》等旧说，不得而知。

3. 封土、宝城明楼之差异

昌平十二陵封土皆可归为两种形状，长、永、昭、定、庆、德六陵为圆形或接近圆形；献、景、裕、茂、泰、康六陵为椭圆形，另据《昌平山水记》说，景陵“甬道平宝城，长而狭”^③。各陵明楼城台券洞、礅礅之制不一，除长陵外，其余十一陵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①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17、24、28、32、36、41、45、49、54、61、66、69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② 朱僊：《谒昌平明十三陵记》，《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1935年10月。

^③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6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a) 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式:明楼下城台正中辟券洞门道,通入宝城内,直达陵冢封土,其制如《昌平山水记》述献陵:“甬道平宝城,小冢半填”^①。在券门里面、明楼城台左右两侧各有转折礧礧可以上达明楼。在茂陵方城券洞迎门处的宝顶前坡上,现存基本完好的黄琉璃照壁一座和挡土墙一道。琉璃照壁避免了在宝城券门处即对城内一览无遗,挡土墙则起到了保护封土前坡、不使水土流失功效。从文献记载来看,琉璃照壁应该诸陵皆有,长陵宝城“下有甬道,内为黄琉璃屏一座,旁有级分东西上”^②;裕陵之制:“金井宝山城池一座,照壁一座,明楼、花门楼各一座,俱三间”^③。又,献、景、裕、茂、泰、康六陵甬道直通宝城内,照理也都应该有挡土墙护封土。但现在只有茂陵之琉璃照壁和挡土墙尚存,其余五陵大多只剩遗址或残迹。景陵以后,诸陵券门门道依旧如献陵无坡度;但从景陵开始,五陵明楼城台之前皆增设高4米左右的月台,券门门道的高度因而相应升高,宝城内的封土也应该比献陵有所增高,不会再“小冢半填”。

b) 永、定二陵式:明楼城台不辟券门,而在城台外左右两侧建转折蹬道,可以上至宝顶,其制如《昌平山水记》述永陵:“明楼无甬道,东西为白石门,曲折而上,楼之三面皆为城堞”^④。宝城全封闭,城墙以内全部填土。此式宝城应该是从长陵宝城形式发展而来,它的最大变化就是把用于上达明楼的礧礧由城台内部移至城外;而“城无瓮

①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6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②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5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③ 《明宪宗实录》卷六,天顺八年六月壬寅,校印本《明实录》第22册,第157页。

④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第7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门,使人不知中羨门所在”、“使人不能知地道”^①,更有利于防护玄宫安全。

e)昭、庆、德三陵式,依然如长陵、献陵之制在明楼城台正中辟券洞,城台内左右两侧建转折礅礅以通上明楼,但将琉璃照壁两侧的挡土墙加高延长,使之与宝城马道内壁相连,琉璃照壁成了嵌入墙体中的装饰,这样就在宝顶和明楼城台之间形成了一个小院落,因其平面形似月牙,故名“月牙城”(又名“哑巴院”)。这种宝城形式实际上是南京孝陵以及裕陵、茂陵等 a 式宝城的发展,与 a 式相比,更有利于厚填宝顶封土(图 2—19)。



图 2—19 修复中的明昭陵明楼

上述 a、c 两式诸陵明楼的右侧多有窄而陡的礅礅一道,明楼城

^①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 50、61 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台下面的券洞用砖封堵,从做法来看,可能不是明朝原制。

五、景帝陵和显陵

景帝陵和显陵是明代两座特殊的皇帝陵,最初都是以亲王之礼建墓,后因故升格为帝陵。二位墓主生前身后之别不啻霄壤,一位是生前曾做皇帝、但却以王礼下葬,陵墓等制最终介于帝与王之间;另一位则是终身食王禄、死后却仿皇帝等制扩建陵园,其制较昌平诸陵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景帝陵

明景帝陵在北京海淀金山口,玉泉山正北,是明景帝和汪皇后等后妃的合葬墓。金山本是明朝妃嫔和夭折皇子、公主的墓区,宣宗废后恭让章皇后亦葬其中。景帝死后谥曰郕戾王,以王礼葬于西山。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十二月十三日,宪宗诏令“其郕王可仍旧皇帝之号,所有尊谥礼部会议以闻,务合人心,毋乖典礼。仍令所司修饰陵寝”^①。但景帝并没能全部享有皇帝应得的祭葬赠谥之典,既未迁葬天寿山陵区,西山陵园也仅仅是略加增饰。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世宗谒陵毕,过此,特谒景帝,易黄甃焉,庙初碧瓦也”^②。这只是易瓦色,景帝陵始终没有完全按照明朝帝陵规制完善陵园建置,甚至连陵号都未曾荐上。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礼科给事中万象春上疏认为:景帝“庙号未加,陵制有俭,于国终属缺典。似宜遵照典制,备加尊谥,仍恭上庙号,昭示无疆。其陵制隘陋,

^① 明·孔贞运:《皇明诏制》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据南京市图书馆藏明崇祯七年刊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第458册,第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② 明·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五,“黑龙潭”,标点本,第22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尤须亟为恢改,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重一代经常之则”^①。明神宗不允所请。因而后人乃有“景皇帝陵在帝与王之间也”^②的评论。

景帝陵规模甚小,既无神道石刻,陵宫又颇卑隘。《昌平山水记》称:“恭仁康定景皇帝、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别葬金山,门三道三重,殿五间,周垣门内有碑亭一座,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③。在诸种相关史料中,清初梁份《帝陵图说》关于景帝陵的描述最为详细,从该书记载中可以看出:景帝陵陵宫朝南向,分为三进院落,分别以陵宫门、享殿前门、土墙为界。

陵宫门在清初时已毁坏,“门及屋墙皆毁尽,所存惟石基石阶耳。颓断红墙缭碑亭、享殿、神厨、神库、宰牲亭、祠祭署、内宫房,通为一周遭而属之”^④。陵宫门原制不得而知,由此进入第一进院落。门内为碑亭,平面正方形,进深面阔各三间,重檐歇山顶,门四开,两侧环以矮墙。亭内石碑螭首须弥座,碑额篆书“大明”二字,碑身楷书“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九字;碑阴刊刻清高宗《题明景帝陵》诗及前“序”后“按”。此碑原依王陵之制立于陵宫门外偏东,“代宗陵庙初用碧瓦,世宗谒陵始命用黄瓦。又以陵碑偏置门左非宜,命建亭于陵门之外、大门之内”^⑤。《明世宗实录》记其事在嘉靖十五年(公元

①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一七,《礼·山陵》,标点本,第275页,中华书局,1956年。

②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83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③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10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④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82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⑤ 清·王弘撰:《山志》二集卷一,“大明世系”,何本方点校本,第167页,中华书局,1999年。

1536年)三月;当年十一月,“建恭仁康定景皇帝陵寝碑亭”^①。现此碑及碑亭尚存,但石碑的阴阳面倒置。

碑亭北为享殿前门(相当于昌平诸陵之被恩门),由此进入第二进院落。享殿前门之制,“屋三楹,黄瓦单檐,无门,无棹楔、闾闳、累簷,不彩绘,朴素卑小”;今存者为硬山顶,灰瓦,当为清代以后重修(图2—20)。门内为享殿,“殿基瓦砾堆中露石础,较门之础倍大,而殿无可考矣”;殿后有土墙一道,中为门,“门北八十跬景皇帝陵冢”^②。



图2—20 明景帝陵享殿前门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三,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43册,第4080页。

^②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83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土墙后为第三进院落,为墓冢区,规制较昌平诸陵更为简陋,“陵冢无宝城、无明楼、无穹碑,不封不树。土冢隆隆(引者按,原文似衍一“隆”字)起可二三尺,周三十跬,径十跬”^①。

从平面布局来看,景帝陵只能说是略如帝陵规制而已,而碑亭之制尤属不伦不类。昌平诸陵石碑分别立于陵宫前(无字碑)、明楼上(陵碑),景帝陵之碑却置于陵宫门和享殿门之间。以实际刊刻内容考之,景帝陵前之碑相当于天寿山诸陵的陵碑,应该树立于墓冢前明楼内。大约是考虑到景帝陵既无明楼,封土又卑微,才有此乖制之举。

2. 显陵

显陵在湖北省钟祥市东北 15 公里的松林山(嘉靖十年封为纯德山),是明世宗本生父母兴献王朱祐杭(追尊为“睿宗献皇帝”)和蒋太后的合葬墓。

朱祐杭卒于兴王之位,最初是按亲王之礼下葬并修建陵寝,明世宗即位,他的陵墓被荐上陵号曰“显陵”。嘉靖三年(公元 1524 年)八月,显陵司香太监杨保奏:“(显)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工部尚书赵璜因建议:“陵至当与山水相称,恐难概同。今殿墙已易黄瓦,但宜添设明楼、石碑,及改司香衙门为神宫监,设置护卫曰显陵卫。其余未备房屋,应创新者,另为添造;应仍旧者,止加修饰,不必大为改作”^②。次年三月,“工部奏请盖造恭穆献皇帝陵寝明楼,树碑镌题如制,及名司香衙门为神宫监,林卫为显陵卫”^③。嘉

^①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 83 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② 《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嘉靖三年八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 39 册,第 1095—1096 页。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九,嘉靖四年三月甲戌,校印本《明实录》第 39 册,第 1239 页。

靖六年(公元1527年),明世宗“特敕修理(显陵),各项规制俱照天寿山,添设石像生、碑亭,八年工完”^①。此后,显陵工程断断续续,到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主体建筑基本完工。其间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十二月世宗生母章圣太后崩,世宗曾因北迁睿宗合葬于大峪山新显陵、南祔太后于承天旧陵亦或父母分葬三种方案而颇费踌躇,甚至于嘉靖十八年亲回钟祥相度,“辛巳,谒显陵,立表于陵寝之北,周览久之,命改营焉。壬午,诏增显陵围垣,遂定新玄宫之式”^②。前后“三数月之间,陵寝大事,或南或北,或行或止,更改数番,一惟圣意自裁”,最终以“大峪山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完美”为由^③,而将蒋太后南祔显陵。

钟祥显陵仿昌平长陵及诸帝陵规制,也由神道和陵宫两部分组成,陵域周围环以平面呈葫芦或宝瓶状的外罗城。外罗城砖砌,外抹红灰、顶覆黄瓦,墙高6.5米、厚1.9米、周长4730米^④。

显陵神道部分起于新红门,止于内明塘。新红门砖石拱券结构,门三洞,单檐歇山顶,两侧有角门,形制和功用都相当于昌平陵区的大红门。门外东西两侧各有下马碑一座,上镌严嵩手书“官员人等至此下马”。门前西南方为一大水塘,名曰“外明塘”。新红门内西北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山陵》,影印本第5册,第2730页。

^② 明·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章圣南祔”,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第6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③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列朝·大峪山用舍》,谢兴尧点校本,第79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④ 显陵的测量数据,主要引自李登勤:《钟祥明显陵调查记》(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李登勤:《特殊的明帝陵——显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登勤:《特殊的明显陵》(载《紫禁城》1988年第6期)、祝建华等:《奇特的明代帝陵——显陵的建筑艺术》(载《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等。

方为第一道并列三座单空石桥,桥北为旧红门,制同新红门,通宽 18.8 米,两侧原有东西角门,已毁。旧红门内为第二道并列三座单空石桥,桥北为碑亭一座,面阔 18.5 米、进深 18.57 米,亭内原立明世宗御制“显陵睿功圣德碑”,明末被李自成军砸毁,碎为数段。碑亭北过第三道并列三座单空石桥开始神道石刻,自南而北依次为望柱一对、蹲狮一对、蹲獬豸一对、卧骆驼一对、卧象一对、蹲麒麟一对、立麒麟一对、卧马一对、立马一对,叉手盔甲将军一对、执金瓜盔甲将军一对、梁冠执笏文臣一对、朝衣冠执笏文臣一对;计石兽 8 对、石人 4 对^①。石刻北为龙凤牌楼门,为六柱三门式,中间联以墼墙,仿昌平陵区龙凤门。门北过第四、第五两道并列三座单空石桥,至内明塘。该塘为人工开挖,砖石砌岸,周长 46.3 米。内明塘东西两侧各有石碑一道,左为“瑞文碑”,右为“纯德山祭告文碑”,两碑均高 3.5 米。

内明塘北面为显陵陵宫,分前后两进院落,布局与昌平景陵、裕陵等陵相同。

祔恩门建于一层台基之上,两侧有八字琉璃花墙,门三间两进式,陛阶三出,内侧有栏板,面阔 15.9 米、进深 11.2 米,由此进入第一进院落。祔恩门正北为祔恩殿,建于一层台基之上,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出廊,东西通宽 31.1 米、南北长 17 米,前出月台,陛阶三出。大殿前两庑为东西配殿,各为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前出廊,基址南北 22.2 米、东西 9 米。显陵祔恩门和祔恩殿等建筑俱已不存,但基座石构和柱础等尚大体完好。祔恩门外有神厨、神庖和宰牲亭遗址。

祔恩殿后为三座琉璃花门,一字排开,由此进入第二进院落。门内

^① 因未发现原始资料,显陵神道石像生名称系据笔者实地调查并参照《大明会典》记长陵制度而定。

正中为二柱牌楼门,门后为香鼎、花瓶、烛台五件石供器,各承以圆形石几。再后为石几筵台,长2.8米、面宽1.3米、高1.1米。石几筵台东西两方分别为世宗御制文碑和武宗御赐谥册志文碑。石几筵台北为明楼宝城,明楼基座为正方形,边长9.2米、高6.8米,明楼按昌平诸陵之制重建。明楼内竖碑,额篆“大明”,碑身镌楷书“恭睿献皇帝之陵”。显陵宝城分为前后两座,平面呈“8”字形,前宝城高5米,呈不规则圆形,南北125米、东西112.1米,宝顶下原为兴献王的旧墓穴。后宝城高5.5米,圆形,直径103米,宝顶下为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世宗亲拟规制的新建玄宫,亦即世宗父母的合葬处。前后宝城前原各有琉璃照壁一道,现仅余残迹。前后宝城之间连以甬道,名曰“瑶台”,宽11.5米、长40.5米,南北两端各有礅礅下至新旧宝城内。

显陵虽然仿昌平陵制,并且从整体布局来看,还比献陵以下诸陵增加了神道石刻、自新红门起全部神道均甃以条石,其规格远在昌平诸陵之上;适应湖北多水泊特点,显陵引水盘桓于陵园内,设内外明塘各一、神道三孔石桥五道,特色鲜明,独具匠心。然而显陵毕竟是在原来亲王陵的基础上进行添建改建而成,因初选地势逼仄,各主要建筑的布局均比较紧凑,有些建置的规模也相对小一些。特别是石像生最为明显,不仅体量较小,在数量上也由长陵的18对减为12对,石兽减站立式狮、獬豸、骆驼、象各一对,石人减文臣、勋臣各一对,即各减三分之一。显陵的主要建筑物,除新红门偏东以外,全部落于一条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外明塘、旧红门、睿功圣德碑楼、神道石刻、龙凤牌楼门、内明塘、祿恩门、祿恩殿、三座琉璃花门、二柱牌楼门、石几筵台、前后宝城;内明塘以南神道有几处略弯曲(图2—21)。

明朝的6处18座皇陵,完整地展示了明代帝陵制度的全部发展历程。风阳皇陵建于明初典章制度草创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



图 2—21 自明楼南望明显陵建筑遗迹

唐宋之制为之,但从享殿与陵冢的布列位置等方面已经兆示出明代新陵制的端倪;泗州祖陵一仿风阳皇陵,因为是衣冠冢并且亲缘稍疏,所以规制比较简单。明太祖孝陵创建了一种全新的陵园布局方式,成祖长陵则将这种制度发扬光大并使之基本定型。明朝皇陵制度的发展演进历程可以扼要概括为:发端并初步形成于洪武时期(公元1368—1398年),其标志分别是风阳皇陵和南京孝陵陵宫部分;确立于永乐时期(公元1403—1424年),其标志是南京孝陵神道工程的完成和北京长陵陵宫部分的完工;永乐以后,昌平十一陵的陵宫部分都是长陵的简化或变体,陵园发展进入守成期,鲜见创新。景帝陵和显陵是因两位特殊人物而出现的特殊皇陵形式,景帝陵基本上是有名无实;显陵的神道部分是长陵神道的具体而微,陵宫部分则是宣宗景陵等帝陵陵宫的翻版但规模略大,其前后并连的双宝城则完全是缘事设例。

第三节 明代皇陵玄宫制度研究

玄宫制度是历代陵寝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埋葬制度的核心。历代对于皇陵制度的文献记载虽然并不稀缺,但大都是关于地面建筑和相应的建置,对于玄宫制度却几乎一律讳莫如深。就明陵玄宫而言,明清两代官私文献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大都是缘事而发,涉及玄宫结构的多是只言片语,难以缀合成篇。迄今为止,明代皇陵玄宫研究最可靠、最完备的个案资料就是1956—1958年发掘的明神宗定陵地下宫殿,本书的研究也以此为基础展开。

一、明神宗定陵玄宫的结构

定陵在北京昌平陵区西部大峪山下,是明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王皇后、孝靖王皇后(光宗生母)的合葬墓。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正月,神宗谕内阁:“朕于闰二月躬诣天寿山行春祭礼,并择寿宫”^①,由此揭开了定陵陵址卜选的序幕。经过反复查勘、筛选、斟酌,最终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九月卜定大峪山为寿宫吉地;十月,神宗“钦定寿宫式样、丈尺”^②,同月开始开山伐木,并备砖石料于陵区,次年八月初一日正式“营寿宫于大峪山”^③。万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二,万历十一年正月丁丑,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2462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四,万历十二年十月己酉,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2847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四,万历十三年八月己亥,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2983页。

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七月,“寿宫就绪”^①;次年六月全部完工,升赏有关人员。

定陵是预营之寿藏,并且由明神宗亲定规制,所以在天寿山诸陵中规模比较大,且环以外罗城。陵宫朝向为坐西朝东而微偏南,祔恩门原为面阔五间,清代乾隆重建时改为三间,基址面阔29.68米、进深14.7米、单层石基座,高2.04米^②。祔恩殿原为面阔七间,乾隆重建时改为五间,基址面阔58.6米、进深35.9米、单层石基座,高2.23米。明楼城台下为青白石须弥座,上砌城砖,平面为正方形,底边边长30.45米,向上略有收分,城台含雉堞通高9.84米。明楼平而正方形,重檐歇山顶,底边边长17.75米、高20.5米;重檐间悬石质榜额,上题“定陵”二字。明楼内竖陵碑,方首刻双龙,额篆“大明”二字,碑身涂朱,刊刻楷书“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下为五层坛台式碑座,通高6.2米。明楼城台无券洞,两侧设转角蹬道,可以上达城墙。宝城为城砖砌就,磨砖对缝,平面呈圆形,城墙内径216米、城高7.32米,城内满填黄土。

定陵玄宫位于宝城正中偏后(西)侧,朝向与陵宫朝向一致,玄宫地表距宝顶封土最高处落差约32米。玄宫正前方有主隧道、两侧后方即配殿之后另各有一条副隧道通向宝城外。

定陵玄宫主隧道起自宝城东南侧、在陵宫内垣墙与宝城交接点略偏西处。此段宝城城墙下有暗券门一座,门内填砖,暗券门的内外两侧如别处一样砌城砖。暗券门处墙内即是砖隧道,隧道的底部以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三,万历十七年七月辛亥,校印本《明实录》第56册,第3991页。

^② 本节所述定陵地面建筑及玄宫建筑的测绘数据,除特别说明以外,皆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三章“陵墓建筑”,文物出版社,1990年。以下不另注明。

黄土夯实,不铺砖石,两侧砌城砖,墙高4.5米,上距封土1.5米,墙间距为8—8.6米,是为隧道宽度。砖墙的两外侧有鹅卵石砌筑的护墙。砖隧道为南北向,方向与陵园中轴线垂直,前后两端略有弯曲,前端折而向东,连接城墙,后端折而向西,通向石隧道。石隧道东西走向,与陵园中轴线重叠,前端略向东南弯曲,与砖隧道的后端相向,但这两条隧道并不互相连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防盗掘措施之一)。石隧道由南北两道石墙砌成,长40米,宽(石墙内间距)8米,由浅入深呈斜坡状直达玄宫前,底部以黄土夯实,隧道石墙的顶部及西边末端加砌城砖。隧道石墙未经解剖,其背后结构不详。石隧道之后是金刚墙亦即玄宫封门墙,墙高8.8米,厚1.6米,底以四层石条为基,上部砌城砖,顶部出檐,上覆黄瓦。金刚墙正中下部有“圭”字形开口,为地宫入口处(帝后入葬后这部分亦用砖石以灰浆砌死,然后填土,但由于墙内外压力不均使后砌部分略向内倾,露出开口痕迹)。

金刚墙以内是玄宫的前甬道(隧道券),以砖起券,纵拱,长宽各7.9米,青石铺地,地表至券顶高7.3米,甬道东壁与金刚墙相接,辟券门一洞,以砖封堵;甬道西壁即玄宫前殿石门。

玄宫由前殿、中殿、后殿、左配殿(北侧)、右配殿(南侧)五座殿宇组成(图2—22),五殿皆用条石砌成,拱券式无梁柱,每殿各有石门。前、中、后三主殿前面各有矮小的门洞券,进深恰可容门;中殿至配殿连以甬道,无门洞券。三主殿之门洞券外侧以雕刻石材砌成门楼式,脊、枋、檐、瓦、吻兽、额枋等一应俱全。三主殿石门的规格一致,均为高3.3米,宽1.7米,厚0.2—0.4米(门轴一侧厚,另一侧较薄),每扇石门上分别凸雕九横九纵81颗门钉和1只铺首。

前殿纵式,东西进深20米,南北宽6米,地表至券顶高7.2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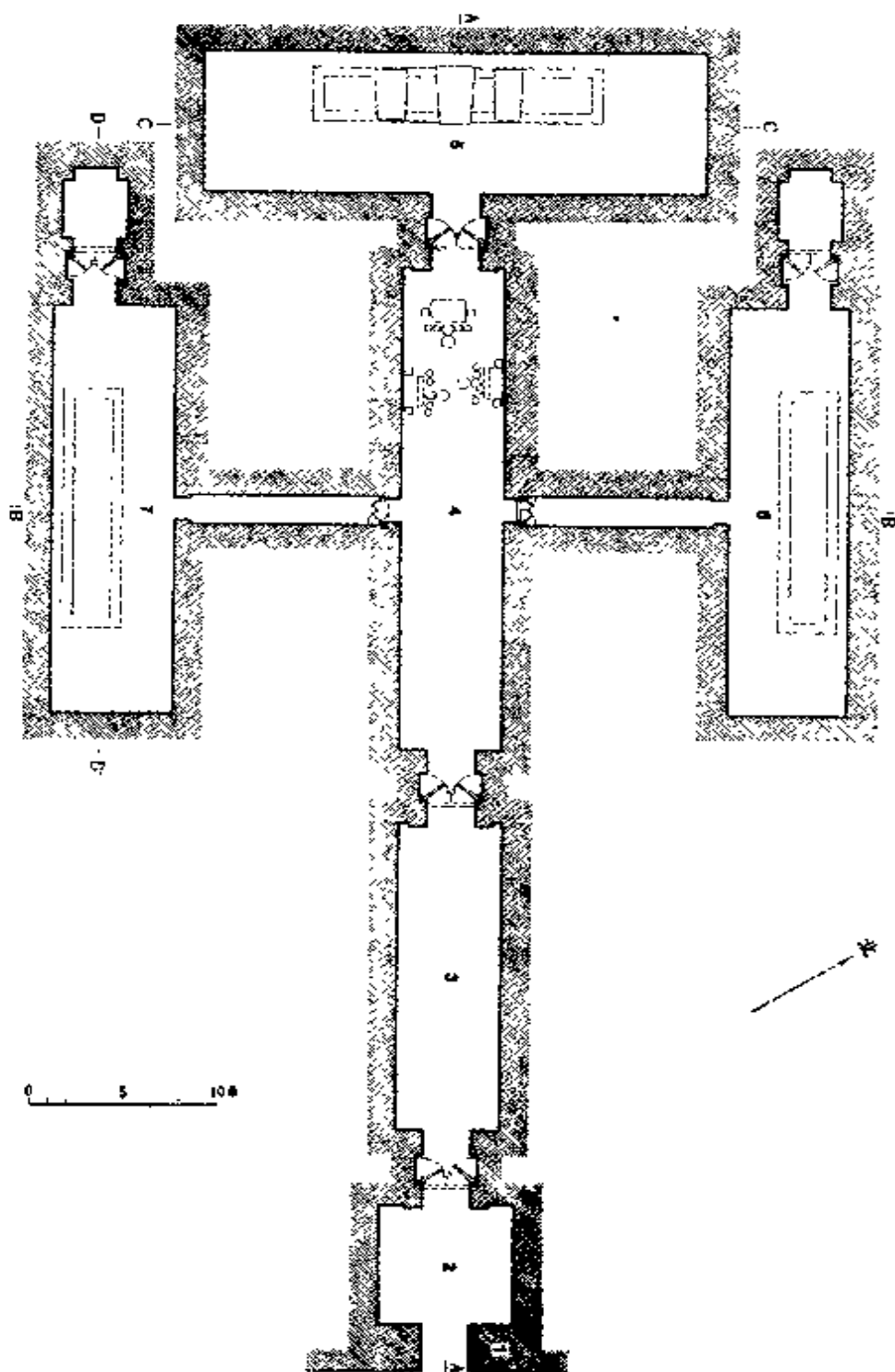


图 2—22 明定陵玄宫平面图(引自《定陵》)

1. 金刚墙 2. 隧道券 3. 前殿 4. 中殿 5. 后殿 6. 左配殿 7. 右配殿

中殿纵式,东西进深 32 米,宽、高均与前殿同。殿后部有汉白玉神座和供器陈设三份。神座石质,皇帝宝座形式,以石板拼成,上有云龙、莲花等雕饰;宝座旁为方形须弥座式小石几二。神座前陈设黄琉璃五供一套,分别为香炉一、烛台二、花瓶二,复前为“大明嘉靖年制”款青花大龙缸一只,缸内贮油、设灯捻,名曰“万年灯”。黄琉璃五供及龙缸下各有圆形须弥座式石几承托。神座安设位次:明神宗居中面东,孝端皇后居左(北侧)面南略靠近神宗位,孝靖皇后(光宗生母)居右(南侧)面北而略远于神宗位。神宗神座背后正对后殿石门。

后殿横式,南北面阔 30.1 米,东西进深 9.1 米,地表至券顶高 9.5 米,地面铺花斑石。这里是玄宫的核心部分,在五殿中规格最高。后殿正中偏后为汉白玉石砌之棺床,须弥座式,南北长 17.5 米,东西宽 3.7 米,高 0.4 米,床面铺花斑石。《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公元 1586 年)七月戊戌条下记载:“以寿宫安砌宝座,赐辅臣花币”^①,可知明朝皇陵棺床亦名曰“宝座”。棺床正中有一 0.4 × 0.2 米的“金井”,内填黄土。棺床上放置帝后棺椁,其位次,正中为神宗皇帝,北为孝端皇后,南为孝靖皇后,均头西脚东(即棺椁头朝里)。三棺旁空隙地放置 26 只木箱以及青花梅瓶、璞玉等随葬品。

左、右配殿位于中殿的左右两侧,在中殿南北壁正中各有一券洞甬道与左、右配殿相连。北壁券洞内为左配殿甬道,方向与中殿垂直,南北长 13.38 米,东西宽 1.88 米,地表至券顶高 3.46 米。靠近中殿的一端安设石门两扇,但不起门楼。门高 2.2 米,宽 0.9 米,厚 0.12—0.18 米,每扇门各有一铺首,无门钉。甬道另一端通左配殿,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七月戊戌,校印本《明实录》第 55 册,第 3236 页。

不设石门。左配殿与中殿平行,东西面阔 26 米,南北进深 7.1 米,地表至券顶高 7.4 米。殿中部靠后为汉白玉石棺床,长 16 米,宽 3.5 米,高 0.35 米,床面铺方砖。棺床中央有一 0.39 × 0.19 米的金井。左配殿西壁的北侧有一券门,双扇石门向内开,门外为一小甬道,西端为以砖封闭的券门一洞,门外为封门墙,这里原设计有一条副隧道通向玄宫之外。

右配殿及其甬道在中殿的南侧,结构、尺寸与左配殿完全相同,殿内布局则与之对称。

定陵玄宫自甬道至后殿通长 87.34 米,左右配殿间两端最宽处 47.28 米,总面积(墙内落空面积)1195 平方米。

定陵玄宫石墙以外部分未经发掘,其上下左右结构不详。在这方面,明代妃嫔墓、藩王墓的发掘以及清代皇陵玄宫填筑制度等有关文献记载可资参照。

1951 年 8—11 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西郊金山南麓董四墓村先后发掘了明熹宗三妃合葬墓和明神宗七嫔合葬墓,由于是大揭顶式发掘,所以玄宫券顶外部的结构一目了然。一号墓的墓主为熹宗三妃^①,玄宫平面呈“工”字形,拱券结构。屋顶上覆盖绿色琉璃瓦,屋脊、螭吻、脊兽等一应俱全。其中后室为主室,屋顶为庑殿顶(四阿式),正脊长 13.8 米、檐长 16 米、由正脊至檐口宽 9.8 米。券顶最高处上距地面不过 0.4 米,已被毁去的正脊上的琉璃瓦应当高出发掘时的地面(图 2—23)。顶坡全部铺方砖,而不用筒瓦或弧形板瓦,垂脊上有琉璃瓦脊饰。墓壁厚达 2 米,券顶薄处也有 1 米厚,接近正脊处更厚。

^①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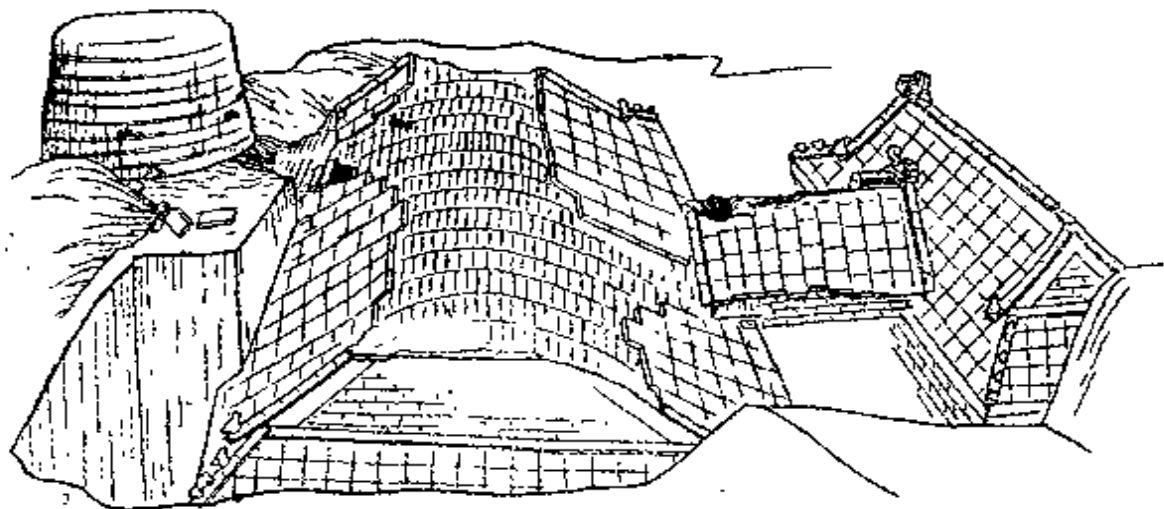


图 2—23 明熹宗妃墓墓室(北京西郊董四墓村一号墓)及封土结构图(引自《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2 期)

二号墓的墓主为神宗七嫔^①,在一号墓东北约 300 米处,墓室内部分隔为前后两室,屋脊是用磨成半圆形的大砖接连而成,距南檐 18.8 米、距北檐 5.4 米,屋顶面上铺方砖一层,砖面以上用三合土作成阶级式的台阶,南北各三级。

1996 年,十三陵东井墓室顶部的局部被挖开,据介绍,暴露部分的结构是:“顶部呈庑殿形制,纵式走向,上部覆以斜面形蓑衣砖。其正脊部位以断面为三角形的砖眉子作脊。包括砖眉子在内三层砖下露有伏砖和券砖各两层。券面砖之前有类似定陵玄宫金刚墙形制的砖墙,其上则为墓室砖顶的前半坡所覆盖”^②。

玄宫拱券之上装饰成屋顶状,在明代宗藩陵墓中亦可找到一些例证。1956 年在湖北蕲春清理的荆端王次妃刘氏(薨于嘉靖三十九年)墓时发现,此墓四壁和底部以三合土筑成,无墓门和墓道,东西长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2 期。

^② 胡汉生:《明十三陵》,第 303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

5.1米、南北宽2.8米、通高2.35米。“墓顶两檐用青砖斜铺,中间用瓦堆成屋脊”^①。此墓规制很低,但墓圻之上仍以瓦饰屋脊。1958年江西南城发掘益庄王(薨于嘉靖三十五年)陵,“该墓为卷棚式砖室墓,分为前后两室”,前后室“仰顶为卷棚式”^②;1972年江西南城发掘益端王(薨于嘉靖十八年)陵,“墓为卷棚式,分为前后两室”,前后室“仰顶为卷棚式”^③。通读这两篇《简报》分析,这两座益王墓玄宫的“卷棚式”似应指拱券以外的填筑结构而言。1997年12月,位于湖北江陵城西太晖观内的湘献王朱柏(建文元年自焚)之墓被不法分子盗掘开,荆州博物馆随即进行了保护清理,出土了包括“湘献王宝”木玺在内的各类文物600余件。该王陵为衣冠冢,墓室上亦有灰瓦屋顶式建筑,前檐屋脊高于现代地面,上有封土^④。

从上述诸例来推断,明代皇陵玄宫拱券顶上应该有和地面宫殿一样的屋顶建筑。另外,据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所编纂的《工部厂库须知》记载,“各陵地宫:上伏檐、下伏檐共九座,每一座吻五对、兽头八个,共吻四十五对、兽头七十二个,每座六工,计五十四工;单檐三座,吻三对、兽头二十四,每座三工,计

① 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按,该墓发掘报告称,相传墓主刘氏路过葬地,溺死井中,故有“刘娘井”地名。笔者认为,此“井”非“水井”之“井”,应该是指刘次妃之墓为无墓道之竖井式,或取“金井玉葬”之义,用法同天寿山“东井”、“西井”之“井”,后以讹传讹而衍生出“溺井”之说。

②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③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④ 丁家元:《荆州堪明湘王府城遗址》,《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第1版;作者调查资料。

九工”^①。这应该是明朝皇陵玄宫拱券结构之上加覆瓦件的最直接的文献记载。

清代官方文献中偶尔可见关于皇陵地宫石拱券以外装修和填筑结构的记载,也为明代皇陵玄宫拱券结构之外加铺琉璃瓦屋顶的推测提供了佐证。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七月,清宣宗谕令东陵宝华峪陵工大臣绵课等:寿陵“一切工程务从朴实。并谕以宝城内月台、碑亭等工程酌量裁减,地宫内之起脊琉璃黄砖头停,金券内之经文、佛像,及二柱门,俱行裁撤。其石像生一项量为收小”^②。这段文字证实了在宣宗慕陵以前清代诸陵玄宫拱券顶之上皆覆有黄琉璃瓦。1935年,刘敦桢先生曾经以清代宫廷建筑设计师“样式雷”所作清朝皇陵地宫设计施工图为依据,并结合实地调查的结果,对于清陵地宫的切面结构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清代皇陵“地宫墙壁之下,皆下柏木桩。桩长一丈至一丈五尺,径五寸至七寸。桩头露出五寸,空间填碎石,谓之‘掐当石’。石缝之间满灌桃花浆,待阴干后,再筑灰土”。“灰土之上,砌垫底石及埋头,皆用豆渣石灌浆。次砌压面石一层。次平水墙,用顺石与丁石合砌,其上砌券洞,……凡砌石俱灌石灰浆,内加糯米白矾,并嵌生铁银锭及熟铁铜榫,以资联络。对缝处,则凿浅沟,嵌填桐油石灰”。这是讲地面以下部分和地宫券洞做法,至于“平水墙外侧,另砌背后砖墙保护之。然亦有二者之间,再加豆渣石一层者。其在各券洞之上,昌(清仁宗)、崇(清德宗)二陵皆加砌砖券,厚五券五伏,慕东陵(宣宗孝静皇后)规模较

^① 明·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五,“琉璃黑窑厂”,第17—18页;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4函,第109册,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本,1947年。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三八,道光二年七月丙戌;据皇史宬旧藏等清抄本影印《清实录》,第33册,第679—680页,中华书局,1986年。

小,则减为三券三伏,据雷氏昌陵地宫图,地宫砖券之上,再覆琉璃瓦脊,如普通宫殿状。……自道光以后,则皆改为庑殿顶之蓑衣砖,而慕东陵金券及隧道券上,覆以平顶蹬券,较蓑衣砖尤为简陋”。再向外围,“背后砖墙外侧与蓑衣砖之上,苫盘踞五次,内加糯米汁掺和二次,掺灰泥背一层。其自背后墙至宝城城壁之间,满筑小夯填厢灰土,但亦有下层用小夯,上层用大夯者。宝城城壁厚约一丈,以铁拉扯与内部灰土联络”。“自蓑衣砖以上至宝顶,夯过河灰土,亦系小夯。上苫盘踞五次,内加糯米汁掺和二次,掺灰泥背三层,表面刷土黄二遍,俗云‘包金泥’”^①。

从已知诸实例来看,明陵玄宫拱券顶之上的覆盖结构应该有等级差别,即嫔用青砖,而妃用绿琉璃瓦;以此类推,皇陵所覆应该是黄琉璃瓦。其具体的建筑形式,有现存的南京紫金山灵谷寺无量殿(俗称“无梁殿”,建于永乐至嘉靖之间)和北京南池子皇史宬大殿(建于嘉靖十三年)等明代实例可资参照。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在可以清晰揭露拱券以上填筑结构的明代亲王陵玄宫中也有不覆屋顶式瓦件的例证,如湖北武昌楚昭王(薨于永乐二十二年)陵^②、湖北钟祥梁庄王(薨于正统六年)陵等^③。另外,1992年四川成都蜀昭王(薨于正德三年)陵揭顶发掘,未见有券顶覆瓦

^① 刘敦桢:《易县清西陵》,《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中国营造学社,1935年3月。另见《刘敦桢文集》第二卷,第143—14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的做法;2002年蜀僖王(薨于宣德九年)陵玄宫揭顶加防水涂料、安设排水管,也未见有券顶覆瓦的做法。至于明代皇陵玄宫外顶装饰的作法是否也会因时代先后不同而有所差异,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讨论资料。

二、明代皇陵玄宫的使用和后妃葬制

定陵玄宫的发掘,不仅揭示出明代皇陵玄宫结构的实例,同时也揭示出了明陵玄宫使用的实例。在定陵玄宫的后殿中,神宗帝后和嗣皇帝本生母的棺椁并非陈放在宝床之上,但是在棺床、金井齐备的两配殿中却空无一物。那么,两配殿究竟是用来安葬后妃的,还是仅仅出于礼制需要,备而不用的呢?再更进一步说,定陵的埋葬制度是明陵的常规,还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变异呢?

据清初查慎行《人海记》记载:万历时海宁籍给事中陈与郊奉职巡视大峪山寿陵工地,他描述所见定陵玄宫之制云:“寿宫五室,中三间待御,四隅维以铁索,各大铜缸注油。左右室通门,待中宫及嗣帝所生母升祔。神庙阅寿宫,自坐石室饮酒”^①。大约是根据类似的记载,有人认为定陵玄宫后殿三棺并列而葬是事出非常,因为神宗帝后三人同时入葬、又逢光宗新丧,诸事杂乱无章;三棺仓促皆由一条墓道进入玄宫,但配殿的甬道狭窄难于通过皇后棺椁,所以才有了发掘时所见的三棺并列形式^②。这种推论应该说有其合理成分,但从历史事实来看,神宗帝后之葬虽然受到了突发性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基本还是按部就班进行的。只要理清明神宗和两位皇后的丧葬时序和相关工程次第,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澄清。下面根据《明神宗实录》等明代文

^① 清·查慎行:《人海记》卷上,“明朝诸陵”,石继昌点校本,第2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 类似的想法在一些介绍明十三陵及定陵的手册中时常可以见到,如定陵管理处编印的魏玉清著《明定陵》等。

献的有关记载,把定陵三位墓主的丧葬事实依时间先后勾勒如下:

孝靖王皇后,原是皇太后慈宁宫的宫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生神宗长子朱常洛(光宗);初封恭妃,以皇长孙诞生而封皇贵妃。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九月十三日,久幽冷宫的王氏病故。经礼部多次疏奏,一个月后,神宗乃命礼部侍郎翁正春“同各官诣天寿山,看得东井一地”^①,作为王氏墓地;次年七月,即以皇贵妃之礼下葬。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秋,光宗、熹宗先后即位,王恭妃得以加上尊谥曰“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后”,并于当年十月初三日随神宗帝后大葬而迁葬定陵玄宫。孝靖皇后之葬定陵是随同迁葬,因此有关安排皆取决于神宗帝后之葬。

孝端王皇后,为神宗元配皇后,卒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四月初六日。当月十八日,首辅方从哲上奏:“大行皇后崩逝,山陵事极重大,礼部以孝烈皇后近例为请。臣查世庙《实录》:嘉靖七年,孝潔皇后崩,于时山陵未建,故另择陵地于天寿山袄儿峪;嘉靖二十六年,孝烈皇后崩逝,预造陵工已完,遂安葬玄宫,定名‘永陵’,不复另择。此虽皇祖亲出宸断,实与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先葬孝陵、永乐十一年仁孝皇后先葬长陵之例先后吻合”^②。二十日,神宗传谕方从哲:“所有安厝梓宫,著安葬于寿宫玄宫。所有合行礼仪,卿可传示礼部俱仪来看,且先年该部具题香殿金柱稍有朽蠹,便著工部作速换安修理,毋得迟延”^③。次日,工部尚书周嘉谟题请:“万寿宫香殿一

^① 《明神宗实录》卷四八八,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己卯,校印本《明实录》第62册,第9198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乙丑,校印本《明实录》第65册,第11377—11378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丁卯,校印本《明实录》第65册,第11380页。

柱腐朽,拟照南京孝陵享殿制用大木四面环抱,柱即坚稳,其对柱亦照样帮修,费工无多,匝月可完。必欲另换新柱,工程甚烦,且日月难计”^①。神宗不允,坚持要求更换新柱。五月,钦天监奏准:“大行皇后山陵,择五月二十五日换金柱开工,六月初九日开隧道”^②。六月初一日,以将开挖寿陵隧道,遣侯梁世勋等分别祭告长陵等九陵和后土、天寿山之神。至此,王皇后的丧礼基本还是如仪进行的。但神宗荒于政事、于奏章“不报”的积习难改,虽然一反常态对于有关皇后的丧祭之请多有批复,但仍然多有拖沓。眼看皇后崩逝“百日”将近,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奏敦促:“大行皇后梓宫发引,例不出百日,臣等遵例请旨行钦天监择日,未蒙简发,玄宫隧道不可久洩,况时当溽暑,大雨时行,尤为担虑,乞立赐简发施行”,神宗览奏,以钱粮未备而委过于户部^③。数日后,方从哲、周嘉谟等人又有类似奏请。七月十三日,册谥大行皇后为“孝端皇后”,并预拟于当月二十二日题神主。此时却另生出变故——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病故。至此,只得帝、后丧礼并办,八月初七日,新即位的明光宗御拟神宗陵名曰定陵,并传谕内阁议拟帝后发引礼上奏。大学士方从哲回奏:“先帝梓宫在殡,皇后无先发之理,而玄宫隧道开挖将完,又难久待,应命该监择吉同时发引,仍先期奉迁圣母温肃端静纯懿皇贵妃一同祔葬新陵”^④。九月初一日,光宗驾崩,神宗帝后丧仪继而由熹宗主持。九月二十八日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辰,校印本《明实录》第65册,第11381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丁酉,校印本《明实录》第65册,第11397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五,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壬戌,校印本《明实录》第65册,第11419页。

④ 《明光宗实录》卷四,泰昌元年八月壬子,校印本《明实录》第65册,第101页。

梓宫发引,十月初三日,“葬神宗显皇帝、孝端显皇后于定陵,孝靖皇太后祔”^①。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定陵玄宫隧道的开挖始于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当时是为王皇后下葬而兴工,如果皇后依礼当葬配殿,那么这时挖掘的应该是玄宫西北面的左配殿隧道,而不会是东面的主隧道。这项工程大约到八月中旬左右完成,工程过半而神宗死,随即安排葬事,此后的《明神宗实录》中并未见另开定陵隧道之记载,神宗帝后显然是从同一条、也就是预先挖开的那条隧道入葬的,而这条隧道只能是玄宫东面的主隧道。可见,孝端皇后葬于定陵玄宫后室显然不是非常之举。

定陵仿世宗永陵结构,永陵皇后之葬法见于明代文献,可资参照。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457年)十一月,世宗第三位皇后方氏死去,谥为“孝烈皇后”,传旨“皇后比救朕危(指‘壬寅宫变’),奉天济难,其以元后礼葬”^②,丧祭从优,跻元后孝潔陈氏之上。经大臣劝谏,世宗始改变初衷,次年五月诏:“孝烈皇后梓宫入山陵,居中之右,虚其左(以备孝潔皇后迁葬)”^③。这里讲到的“中之右”,无疑是指玄宫正寝之右位,它提供了否定皇后葬配殿说的有力证据。万历年间一次关于皇妃能否合葬于皇陵玄宫的议论,更可以直接证明皇陵玄宫配殿原本不是为安葬皇后而设。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

^① 《明熹宗实录》卷二,泰昌元年十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74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世宗孝烈皇后方氏》,点校本第12册,第3532页。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六,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丙子,校印本《明实录》第45册,第6144页。

三月,敬妃李氏病故,“神庙极为悲悼,丧礼从厚,所生两皇子派与中宫王老娘娘为慈母,共育咸福宫”^①。随即传旨封为皇贵妃,并令“葬于寿宫右穴”,命议葬仪。这里的“寿宫右穴”显然是指预造玄宫之右配殿,但大学士张位、沈一贯对神宗的设想提出了异议:“窃惟寿宫,乃国家万年储祥吉壤,灵气萃钟,似不宜轻有动泄。在祖宗时亦未尝有妃嫔预人之例。是以礼臣守礼,只拟于天寿山悼灵[陵]左右相择言[吉]地。……今奉圣谕,命臣等议拟,臣等再三商量,玄堂之傍制设左、右侧穴,推原初意,或者以待各妃,但从来未经附[祔]葬,臣下不敢轻议”^②。这段回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明朝帝陵玄宫之设左、右穴(配殿)“或者以待各妃”,皇后是不可能葬于配殿的。神宗虽然意有未慊,但终究不敢违背“祖制”,最终将李妃葬于预营寿宫西南的银线山下,另起园寝^③。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嗣皇帝生母既属“祔葬”,是否应该葬于玄宫配殿呢?答案也同样是是否定的。因为从神宗之死到落葬,前后有70余天的时间,如果明光宗生母孝靖皇后应当祔葬于玄宫配殿,这段时间用于开挖另一条隧道也足够了。在正常情况下,皇家丧葬

^①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二,“见闻琐事杂记”,冯宝琳点校本,第19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万历起居注》,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己未,《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据天津市图书馆藏明抄本影印本,第9册,第83—85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2001年。

^③ 敬妃李氏为神宗宠妃之一,生皇六子惠王常润、皇七子桂王常瀛,明末太监刘若愚曾有李敬妃死,“自此郑娘娘无有与分宠者矣”之说(见《酌中志》卷二十二,“见闻琐事杂记”,冯宝琳点校本,第19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由此推断,神宗欲将李贵妃葬于玄宫右配殿,或许是为确保郑贵妃将来必能合葬定陵玄宫而作的一种试探性的安排,如果李敬妃得祔葬玄宫,则将来即使郑氏不能如愿成为皇后或皇太后,也可以在敬妃之上葬入玄宫左配殿。

大典是不会因为头绪多而任意删改重大礼仪的；所以，孝靖皇后与神宗及孝端皇后合葬于玄宫主室，应该是合乎明代礼制的正常行为，而决不会是因图“省事”而出现的权宜之变。在仅比定陵晚落葬 11 个月的庆陵玄宫中，明光宗也是和元配郭皇后、熹宗生母合葬于同一棺床之上，六年后又葬入思宗生母。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先是，天启七〔元〕年修建（庆陵）玄宫时，计妥安梓宫宝座，合容光庙老爷、孝元郭老娘娘、孝和王老娘娘三位梓宫也。彼时内宫监管理王敬、翟应奎创议，于合造尺寸之外，仍暗将宝座增阔若干尺。至（天启）七年十二月内圣母孝纯刘老娘娘迁入，共妥安梓宫四位，尺寸恰好。时护送圣灵内外诸臣刘镇、郭志义、李志铨等亲人恭阅，无不赞叹。不然，时日所限，天寒暑短，既不敢停候增修，又不敢崇卑殊厝，将奈之何”^①。根据这段记载，庆陵玄宫中也是明光宗和孝元郭皇后（光宗元配）、孝和王皇后（熹宗生母）、孝纯刘皇后（思宗生母）并排合葬于梓宫宝座（即棺床）之上。

可见，明朝无论是皇后合葬、还是嗣皇帝生母祔葬，都是与皇帝合葬在玄宫主室，而不会葬入配殿。这个制度是在成化、弘治年间（公元 1465—1505 年）缘事而逐步形成的。

明太祖、成祖两朝皇后先于皇帝而死，都是直接葬入皇陵玄宫。仁宗张皇后、宣宗孙皇后皆以太皇太后或皇太后身份后于皇帝而寿终，亦与皇帝合葬；并且仁宗献陵、宣宗景陵的明楼等墓室之上的主

^①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四，“恭纪今上瑞徵”，冯宝琳点校本，第 25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按，此事在《明□宗□皇帝实录》（不标卷数）中记为：天启七年十二月辛酉，“孝纯刘太后祔庆陵。初，庆陵玄宫稍广其制，故前祔孝元、孝和二太后，今祔孝纯，适相当也”。见校印本《明实录·附录》第 88 册，第 60 页。又，《崇禎长编》卷四记为：天启七年十二月壬寅，“孝纯皇后迁祔庆陵”。见校印本《明实录·附录》第 91 册，第 173 页。

要建筑也都是在皇后合葬时才营建的。仁宗张皇后死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十月,十一月营葬事,十二月下葬,并“造献陵明楼”^①。宣宗孙皇后死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九月初四日,十五日“以大行皇太后将合葬景陵,命抚宁伯朱永、都督佥事赵辅、兵部右侍郎白圭帅官军除道及建明楼、筑宝山城”^②,当年十一月下葬。明初一帝配一后,帝后合葬一起原无疑义,这就是所谓“本朝先帝大行山陵,止一后祔葬”之制^③。但这种制度的前提是嗣皇帝为皇后嫡出(至少名义上如此),一旦皇太子或嗣皇帝生母为妃嫔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嫡庶之份和相应祭葬礼仪待遇问题。

明朝之制,皇帝妻妾分十二等,分别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才人、婕妤、昭仪、美人、昭容、选侍、淑女。其中皇后一人,皇贵妃、贵妃各一人至数人不等,其余九等自数人至数十人不等。不仅后妃等级森严,她们所生子女也有嫡庶等差。嫡庶制度所涉及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礼仪待遇和政治地位的继承。中国古代皇位及公侯等其他爵位的继承的基本原则是:嫡妻所生长子为第一合法继承人,无嫡长子则依长幼序立其他嫡子,无嫡子则立庶出长子以至于诸庶子;无子者选立嗣子或兄终弟及。它的核心思想是注重生母身份和本人齿序,而不论贤否。明朝对于嫡庶之分强调的至为严格,《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

^① 《明英宗实录》卷九九,正统七年十二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15册,第1999页。

^② 《明英宗实录》卷三四四,天顺六年九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21册,第6961页。

^③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帝后祔葬》,谢兴尧点校本,第78页,中华书局,1959年。

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①。至于亲王亦然,“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朝廷授以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如或以庶夺嫡,轻则降为庶人,重则流窜远方。如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②。明太祖的子孙们将这一制度绝对化,因而接连出现庶出皇子生母被埋没、皇后因无子而被废的现象。

明末李清记载:“予阅《南太常寺志》,载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则硕妃生,讶之。时钱宗伯谦益有博物称,亦不能决。后以弘光(公元1645年)元旦谒孝陵,予语谦益曰‘此事与《实录》、《玉牒》左,何征?但本《志》所载,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而西侧止硕妃,然否?曷不启寝殿验之?’及入视,果然。乃知硕、李之言有以也”^③。据《南京太常寺志》记载:“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左二位皇妃生楚王、鲁王、代王、郢王、齐王、蜀王、谷王、唐王、伊王、潭王,左三位皇贵妃生湘献王、肃王、韩王、沈王,左四位皇贵人生辽王、左五位皇美人生宁王、安王;右一位硕妃生成祖文皇帝”^④。1930年代,吴晗先生曾经撰文考证,认为太祖元配马皇后无子,而明成祖和周定王朱橚皆系硕妃所生,“成祖为高后所养,故冒称嫡子”^⑤。明成祖自建文帝手中夺得

① 明·朱元璋:《皇明祖训·法律》,张德信等主编《洪武御制全书》本,第401页,黄山书社,1995年。

② 明·朱元璋:《皇明祖训·职制》,张德信等主编《洪武御制全书》本,第405页,黄山书社,1995年。

③ 明·李清:《三垣笔记》“附志二条”,点校本,第249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④ 明·佚名:《南京太常寺志》,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太祖孝陵”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4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⑤ 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第10卷第3期,1935年7月;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第55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皇位,为了表明自己继太祖而立的合法性,便伪称自己是高皇后嫡出,将生母硕妃隐没不认。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一月,一位不知名的宫女为明宣宗生下了皇长子朱祁镇,随即被宣宗宠妃孙氏抱为己子,生子的宫女则从此销声匿迹。不久,皇长子被立为皇太子,但他毕竟是庶出,对照《皇明祖训》而言名分不正。而宣宗的元配皇后胡善祥虽为人贤惠,却多年未有子息,皇长子出生后,她即上表请早立太子以定国本,自己逊位以避太子母。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三月,在宣宗的胁迫下,胡皇后正式上表辞位,被赐号为“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皇太子名义上的母亲孙贵妃则晋位皇后。后来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孙氏成为皇太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胡废后死去,大臣们慑于孙太后之威,不敢奏明实情,只以嫔御礼草草葬于西山。直到孙太后死后的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闰七月才加上“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尊谥,即原地增饰修缮陵寝。恭让胡皇后是明朝第一位生前被废、死后不能与皇帝合葬皇陵玄宫的皇后。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明景帝效法父皇再行立嗣废后之举。是年五月,景帝废英宗(时为太上皇,居南内)所生原太子见濬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皇太子,而只生过两个女儿、又反对改易储君的景帝元配皇后汪氏,亦“以无子废,册皇太子见济母杭氏为后”^①。景帝死后,英宗“以弟妇少年,不宜存内”^②,遂令汪氏以郕王妃身份出居宫外原郕王府。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汪氏以八十高寿而薨,依

^① 明·郑晓:《今言》卷二,“一百五十三”,李致忠点校本,第88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② 明·杨瑄:《复辟录》,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明刻“广百川学海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第1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大学士王鏊之议“葬以妃、祭以后”^①，谥为“贞惠安和景皇后”，葬景帝陵。汪氏以亲王妃封后、既而被废处别宫、再称王妃出居外邸，最终以嫡妻身份追谥皇后与景帝合葬，这是明朝的一个特例。

英宗复辟后，面临着和前朝同样棘手的难题，即皇后无出，庶子名分难定。太监蒋冕曾于孙太后前游说：“皇后无子，亦当换”，被英宗斥止；及复立皇长子为太子时，蒋冕又以“其母如何”为言，被英宗视为“谗乱小人”^②。英宗和元配皇后钱氏同患难，钱皇后的两个弟弟在“土木之变”时战歿沙场，英宗幽居南内时生活匮乏，“钱后日以针绣出贸，或母家微有所进，以供玉食”^③。所以英宗对之恩礼始终，不但无废立之心，而且为确保钱皇后日后在宗庙、陵寝中应该享有的地位不被动摇，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正月，在临终前特别以遗诏的形式讲明：“皇后钱氏，名位素定，当尽孝养以终天年。……殉葬非古礼，仁者所不忍，众妃不要殉葬。敛时须沐浴洁净，棺内装用袍服系腰绦环。皇后同东宫自选带皮鞋者易以绦鞋，衣服不须多，纵多亦无用。择好地建陵寝，皇后他日寿终宜合葬，惠妃亦须迁来，以后诸妃次第附葬。此言俱要遵行毋违。”^④明英宗生前未尝预建寿陵，所以对身后葬事做出了至为详细的安排。这部分遗诏讲了三层意思：首先，钱皇后名位不能改变、百年后必须合葬玄宫；其次，废除明初以来的宫妃殉葬制度，殓服从简；复次，惠妃刘氏（数月前先死，英宗曾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景帝废后汪氏》，点校本第12册，第3519页。

^② 明·李贤：《天顺日录》，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八，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1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畿辅·南内》，谢兴尧点校本，第60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④ 《明英宗实录》卷三六一，天顺八年正月己巳，校印本《明实录》第21册，第7172页。

手定其丧仪,葬绵山)亦应迁入玄宫,以后诸妃死后以次祔葬玄宫。

尽管英宗口述遗诏时特别强调要“定后妃名分”^①,但在他死后不久,钱皇后的地位就受到了挑战。在议尊奉皇太后时,太监夏时迎合宪宗生母周贵妃之意,欲摒钱皇后而独尊周贵妃为皇太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力争曰:“今日合遵遗命,景泰年事不可法!”周贵妃则搬出宣宗废胡后之成宪:“子为皇帝,母当为太后,岂有无子而称太后耶!宣德中自有例”;争执的最后结果,是按照彭时的提议,钱皇后、周贵妃并尊为皇太后,钱太后如前朝太后例加上“慈懿”二字徽号,但名义上只能是“得二字好称呼,非有尊卑于其间也”^②。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六月,慈懿钱太后死去,周太后为自己身后与英宗合葬玄宫计,千方百计阻挠钱后合葬裕陵,竟欲援宣宗恭让胡皇后例别葬于西山,经大学士彭时、礼部尚书姚夔等人力争,最终变通旧制将钱太后葬于英宗裕陵玄宫之左,“异隧,距英宗玄堂数丈许,中窒之,虚右圻以待周太后,其隧独通;而奉先殿祭,亦不设后主”^③。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三月,周太后病故,孝宗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议陵庙事,“袖出《裕陵图》一纸,指示曰:‘此未合理’”^④。图中所示“则英宗隧道右圻相通,而左为孝庄钱氏玄宫,相去数丈,中隔不通。辅臣谢不知。上曰:‘先生辈如何得知,都是内官做的

①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七二,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5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七二,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5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英宗孝庄皇后》,点校本第12册,第3517页。

④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弘治十七年三月丁丑,校印本《明实录》第32册,第3887页。

勾当’！”^①明孝宗曾表示要乘周太后祔葬裕陵之机开通左隧道，并以“皇堂不通，则天地否塞；通之，则风气流行”为辞^②，以沮钦天监“恐动风水”之说。但终因“钦天监以为岁杀在北，方向不利；内官监亦谓事干英庙陵寝，难以轻动”而作罢^③。

从当时的有关奏疏来看，成化四年所拟定的两太后分别葬于裕陵玄宫主室两侧并且将来分左右同祔太庙之议，实在是出于被周太后胁迫之无奈，至于裕陵玄宫左隧不通，更是非礼之制。所以当时宪宗即有“朕心终不自安”^④之语，后来孝宗“孝庄睿皇后葬未合礼，欲为厘正”^⑤之说亦由此而发。但此事既经做出，亦只得将错就错。钱皇后既葬于裕陵玄宫之左圻，不能正玄宫中皇后之位，惠妃等其他妃嫔因而不可能再葬入皇陵玄宫，英宗遗诏则全未遵奉。此后，在宪宗茂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诸陵中，除元配皇后以外，嗣皇帝本生母、本生祖母皆得合葬玄宫，由孝肃周太后之例而成为不可动摇的“祖宗之法”。并且，后祔者并不以相距年久而再启玄宫为忌，宪宗生母周太后晚于英宗40年、世宗生祖母邵太后晚于宪宗35年、神宗生母李太后晚于穆宗42年，皆开启帝陵玄宫合葬；明思宗即位后，亦依例开启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闈·宣宗废后》，谢兴尧点校本，第76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弘治十七年三月丁丑，校印本《明实录》第32册，第3887页。

③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弘治十七年三月癸未，校印本《明实录》第32册，第3896页。

④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七二，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5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⑤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弘治十七年三月丁丑，校印本《明实录》第32册，第3886页。

光宗庆陵玄宫,由崇信伯费天泽等奉专敕护持,奉迁本生母刘太后梓宫合葬^①。至于定陵中一帝、一后、一嗣皇帝本生母同时落葬,只是巧合而已。

从以上的史实中可以看出:皇帝皇后合葬于陵墓玄宫主室应该是明初以来的常制,太祖孝陵、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例皆如此,玄宫配殿之设最初是用于祔葬妃嫔,自英宗裕陵起妃嫔皆不入于皇陵玄宫,其配殿始形同虚设。

明初妃嫔之所以多合葬于帝陵玄宫,是与当时实行宫妃殉葬之制密切相关。

以活人殉葬之制西周已经少见,春秋以后,在汉族聚居区更为罕见,但在洪武年间却恢复了这一灭绝人伦的做法。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月,太祖次子秦愍王朱棣死,两名王妃殉葬;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太祖三子晋恭王朱栢死,亦用人殉。此后,藩王妃妾之殉葬见诸列帝《实录》者亦历历可考。至于皇帝,据《大明会典》记载:“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十六妃余俱从葬;献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②;景帝死,因李贤之奏,汪妃以抚养幼女免殉,但唐妃等亦被“赐红帛”从死。据朝鲜国《世宗庄宪大王实录》记载,明成祖死后,“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诸死者之初升堂也,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兵部尚书阎鸣泰等为奉迁皇后祔葬事题行稿》(天启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影印本第4册,第117—1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十,《礼部·坟陵等祀》,影印本第3册,第1423页。

仁宗亲入辞诀”^①。在英宗遗诏废止人殉以前,宫妃殉葬在明朝皇宫和各王府中是普遍存在的。此后直到明朝晚期,虽然不再有强制性的人殉,但宫嫔自尽殉夫之事在各藩王府中仍偶有发生,朝廷则例子旌表,如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六月,“赠宁河康僖王宫人王氏、杨氏、张氏、段氏俱为夫人。宁河王薨时,王氏等俱尽节自缢,晋王奏其事,且乞加恤其以励风化。命俱封为宁河康僖王夫人,并赐祭葬”^②。

关于皇帝殉葬妃嫔的具体葬地,明代官方史料中缺乏明确的记载。顾亭林在《昌平山水记》中认为殉葬妃嫔葬于天寿山侧翼的东、西二井,他曾亲到二井查勘:“宫人从葬之令,至英宗始除。故长陵有东、西二井,东井在德陵东南馒头山之南,西向,西井在定陵西北,东向,并重门,门三道、殿三间,两庑各三间,绿瓦周垣(引者按,实地考之,东井在德陵西南,西井亦在定陵西南,当地俗称“娘娘圈”,顾文此处有误)。《会典》言长陵十六妃从葬,位号不俱。其曰井者,盖不隧道而直下,故谓之井”^③。相似的说法亦见于梁份之《帝陵图说》:“东井、西井当天寿山正东正西之地,永乐间所置,取金井之义,下窆穿圻不隧,为成祖十六妃殉葬之所,以次而祔也”^④。现代一些研究者通

① 《朝鲜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二六,世宗甲辰六年十月戊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李朝实录》本,第7册,第387页,东京,1956年。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九,成化二十二年六月己亥,校印本《明实录》第27册,第4710页。

③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9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按,曾有人推衍顾亭林之说,认为东井、西井是明朝若干代殉葬妃嫔的葬地;事实上,二井之专属长陵,多见于明代文献记载,如《明孝宗实录》卷三九,弘治三年六月甲申条下有“修长陵东西井香殿及厢房墙垣”等,见校印本《明实录》第29册,第821页。

④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19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过对天寿山陵区诸陪葬墓的调查排比,认为: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殉葬宫妃是祔葬于帝陵玄宫之左、右配殿;而“东西二井规制与其他各坟园基本相同,推测其墓主,亦当为永乐诸贵妃、妃嫔埋葬之所,不当为殉葬妃嫔宫女之葬地”^①。这个推断应该说是合理的,既用殉葬,显然应该葬在墓主近处。另从《大明会典》中“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一句,也可证从葬之妃嫔显然都是埋葬在陵内。成祖、仁宗、宣宗三朝殉葬者不记葬处,通读上下文应该是因同于孝陵而省略。

殉葬妃嫔的身份一般都不高,有些甚至是死后才封妃的。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八月,明英宗追赠诸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其册文有云:“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②,从册文来看,这些被追赠者无疑都是殉葬者。明初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四朝皇帝妻妾得终天年者,除皇后以外,一般都是生有皇子女者或是勋旧之裔。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仁宗上仙,宣宗谥皇庶母:贵妃郭氏、淑妃王氏、丽妃王氏、顺妃谭氏、元妃黄氏五人,又益以先赠张氏顺妃、李氏丽妃,俱系潜邸,追共七人是矣。然前是登极所封贵妃郭氏、贤妃李氏、惠妃赵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仅郭贵妃、王淑妃在所殉中,何也?况贵妃所出,有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三朱邸,在例不当殉,岂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又,上未崩前之两月,曾封

^① 王岩等:《明十三陵的陪葬墓——兼论东西二井陪葬墓的墓主人》,《考古》1986年第6期。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宣宗后妃》,点校本第12册,第3515页。

张氏为敬妃,为荣国忠显王之孙,今太师英国公辅之女,册文中赞美甚备,亦不从殉,盖以乃祖父勋旧特恩也”^①。敬妃以勋旧之裔不殉,而郭贵妃曾生三个皇子本不当殉,沈德符疑其或死于报仁宗之殊恩。其实,这里面另有隐衷。郭贵妃与仁宗张皇后(宣宗生母)素不睦,至有猜忌倾害之心。关于仁宗之死,明人传说谓:“郭妃以中宫诞辰,邀过其宫上寿,上亦往。妃进卮于后,后不即饮,上曰:‘尔又为疑乎?’遽取饮之,妃失色,无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经死,时适雷”^②。郭妃谋鸩张皇后,仁宗误饮而崩,她最好的结局当然只能是“自裁”了。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太祖朝有未从殉之惠妃崔氏,卒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谥曰庄靖安荣,皇妃“四字谥始见于此”^③,但其葬地失考^④。卒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迁都北京以前的成祖、仁宗(时为皇太子)嫔妃有些葬于南京,“牛首山东有观音山,为贞静顺妃张氏坟,妃,荆宪王之母也;吉山东有南山,为悼熙丽妃李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宫闱·仁庙殉葬诸妃》,谢兴尧点校本,第801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明·祝允明:《野记》卷二,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二,许大龄等点校本,第5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闱·妃谥》,谢兴尧点校本,第802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④ 崔氏事迹不详,不知是否为《大明会典》卷九十中“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的二妃之一,但其人必葬南京无疑。1957年3月,南京江宁县东善桥镇响龙山(原名孙家山)民间传说的“娘娘坟”中出土有釉里红岁寒三友纹带盖梅瓶1件和铜锡明器40余件(沈彭年:《东善桥娘娘坟发现宣德瓷瓶》,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按,该消息未披露墓主身份、性别,但从所附图片来看,出土之梅瓶年代定为宣德明显不妥,从器形和花纹图案判定,该瓶应为洪武官窑产品,则该墓年代有可能会早到洪武、永乐时期。东善桥一带是明初异姓公侯的葬地之一,至于是否有妃嫔墓,姑俟异日考证。

氏坟,俱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①。成祖朝以寿终的妃嫔葬于天寿山两侧之东、西二井,另有权贵妃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死于北征凯旋途中,谥曰恭献,葬于山东峰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南)。今枣庄峰城区有娘娘坟村,村西有权贵妃墓,封土高约7米。永乐以后,仁宗、宣宗相继葬于长陵左右,天寿山陵区遂不再葬妃嫔。从仁宗朝开始,以寿终之妃嫔皆葬于西郊金山。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宪宗宠幸的万贵妃葬于天寿山西南苏山脚下,才又重开妃嫔葬天寿山陵区之例,以后世宗阎贵妃等六妃、神宗郑贵妃、神宗李敬妃等四妃、思宗田贵妃等相继葬于万贵妃墓西南方的袄儿峪、银线山、鹿马山一带。世宗元配孝潔皇后初亦葬于袄儿峪,建成悼灵皇后之陵^②;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三月,迁祔阳翠岭永陵与世宗合葬。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月,皇贵妃王氏薨逝,世宗传谕礼部:“皇贵妃王氏同阎氏墓葬,哀冲、庄敬二太子祔其旁,冲幼儿随母,礼以义起,俱入天寿山,以上近祖宗之义也”^③。当年十月自金山墓区迁二太子棺柩于袄儿峪,近阎贵妃、王贵妃而葬,天寿山陵区因而亦有了太子墓,但仅此一例,属妃墓之祔葬墓。

天寿山陵区妃墓的墓主都是皇帝的宠妃,因此,她们陵墓的规格也比较高。东井、西井、万贵妃墓、郑贵妃墓都有单独的陵宫,有无字

^①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三,“山祭”,谭棣华等点校本,第70—71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② 孝潔皇后陈氏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九月以孝宗之妻张太后之命立为皇后,世宗因恶张太后,遂殃及陈氏。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月,陈皇后因惊悸堕胎而死,初谥曰“悼灵皇后”,至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始因礼部尚书夏言之请而改谥“孝潔皇后”。笔者认为,天寿山之“悼陵”应系“悼灵皇后之陵”的简称或俗称,而不是正式的陵名。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九,嘉靖三十年正月丁巳,校印本《明实录》第46册,第6608页。

碑、享殿、宝顶等主要建筑。其中明神宗郑贵妃墓规制最完备、占地面积也最大,应该也是预建的寿藏^①。郑贵妃墓陵宫朝向东南,有外罗城和内城两道宫墙,外罗城平面前方后圆,南北通长 287 米、东西宽 218 米,周长 812 米^②。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外罗城宫门、陵宫门、享殿门、享殿、石碑、石几筵台、宝顶等,享殿门前东西有神厨、神库,享殿前有两庑配殿。享殿基址尚存,长 32 米、宽 18.50 米,规制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殿前有月台。封土残高约 3 米、直径 11 米(图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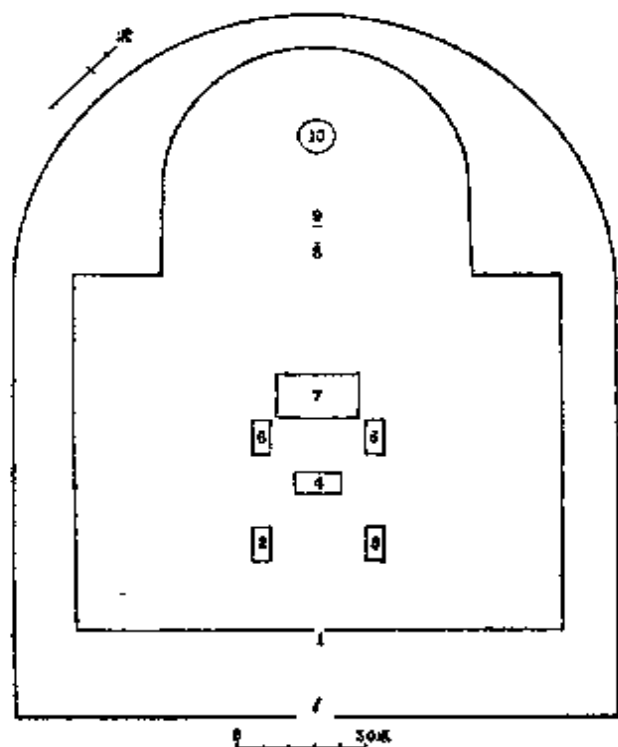
能够葬在天寿山皇陵兆域的妃嫔毕竟是少数,明代绝大多数嫔妃死后是葬于京城西郊金山,到明末,这一带的妃嫔和夭折皇子女墓已经连成片,谈迁在清朝顺治十一年(公元 1654 年)八月所见情形是:“自景帝外,怀猷、悼恭、哀冲、庄敬、宪怀、猷怀、悼怀故太子七,卫、许、忻、申、蔚、岳、景、颖、戚、薊、均、邠、简、怀、悼故王十七,殇主二十六;仁庙妃三、宣庙妃一、英庙妃□□、宪庙妃十二,按史皆葬金山。与景(帝)陵相属,凡五十三园,望之色馁”。这些陵墓“碧殿道

^① 郑贵妃卒于崇祯三年(公元 1630 年)五月,据《崇祯长编》卷三四,崇祯三年庚午五月乙巳条下记载:“神庙皇贵妃郑氏于崇祯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酉时薨逝,丧葬事宜命照神庙恭顺荣庄端静皇贵妃李氏例行,即葬李氏园内,并择吉开隧兴工”;见校印本《明实录·附录》第 93 册,第 2039 页。按,李氏皇贵妃即李敬妃,其墓园在郑贵妃墓之南侧,内葬神宗四妃,与郑墓为并列的两座园寝;此处言“即葬李氏园内”,或记载有误,或思宗挟万历朝争“国本”之嫌,命将郑贵妃与诸妃同葬,而未葬入所预管陵中。又,清初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记载:“孝宁郑太后(即郑贵妃,弘光帝立于南京,乃为本生祖母加上尊谥曰‘孝宁皇太后’)初随福王封地,葬莫考”。见《罪惟录》卷十六,“陵志”,点校本,第 809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按,明朝无本生母妃随子之国之制,查氏“葬莫考”之说亦不知出处。

^② 王岩等:《明十三陵的陪葬墓——兼论东西二井陪葬墓的墓主人》,《考古》1986 年第 6 期。以下有关郑贵妃墓园的测量数据,均引自该文。

图 2—24 明神宗郑贵妃墓平面图(引自《考古》
1986 年第 6 期)

- | | |
|---------|---------|
| 1. 陵宫门 | 2. 神库 |
| 3. 神厨 | 4. 享殿前门 |
| 5、6. 配殿 | 7. 享殿 |
| 8. 石碑 | 9. 石供案 |
| 10. 坟墓 | |



接,化为榛莽瓦砾者过半矣”^①。金山陵区的嫔妃墓规模要小一些,最初是每位妃嫔各为一墓,至宪宗时,始十三妃共为一墓;但这时仍是每个墓穴只葬一人。1963年,北京镶红旗营发现宪宗妃墓7座,南北向并列一排,每墓葬一妃^②。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六月,礼部左侍郎程文德奉诏为睦妃何氏在金山相度墓地,因奏:“金山一带垄地无余,宜与故宜妃包氏、静妃陈氏同窆。昨年二妃逝,奉圣谕:‘二妃相近而逝,可同一地而墓,我宪庙诸妃皆同处者,且省民力一分’。仁言惻怛,闻者感动,今圻域甚广,附造更便”。明世宗准其奏,并因而更定诸妃合葬墓园之制:“遵古世妇、御妻数俱用九,其自今以

^① 清·谈迁:《北游录》,“纪邮上”,汪北平点校本,第76、75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② 陈光:《北京市考古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2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九妃同墓,共享一殿,而中为七室”^①。“于是金山预造五墓,墓各九数,以次葬焉”^②。世宗 30 妃、26 嫔除葬袄儿峪者以外,皆葬金山;他的第二个皇后——废后张氏亦葬于金山。此后,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诸妃亦大多葬于金山。1951 年 8—11 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西郊金山南麓董四墓村先后发掘了明熹宗三妃合葬墓和明神宗七嫔合葬墓,揭示出明代晚期妃嫔多人合葬墓墓室结构的实例。

熹宗三妃园寝享殿遗址已被施工破坏,出土有崇祯六年和七年的铭文砖^③。地表有封土堆,圆形,平顶,上部直径 4.8 米、下部直径 6 米、发掘时高 4 米,夯筑而成。封土位于地下墓室之后,并不叠压于墓室之上。墓室平面呈“工”字形,拱券结构,其上覆绿釉琉璃瓦。前为墓门室,前部入口处以砖砌塞。墓门室后为一纵式券洞(原报告称为前室),长 4 米、宽 3.3 米,由基底至屋脊高 6.6 米,后面有双扇石门通向主室(后室)。后室横券,面阔 10.9 米、进深 5.74 米,基底至穹顶高 7.2 米。室内靠后壁为石条铺砌的棺床,宽 3.5 米,高 0.3 米,上置三口棺槨,在靠后墙的棺尾处,各有墓志一合,可知墓主左为张裕妃、中为段纯妃、右为李成妃。根据墓志记载,张裕妃卒于天启三年(公元 1623 年)八月二十二日,葬于崇祯四年(公元 1631 年)闰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纯妃卒于崇祯二年(公元 1629 年)五月十三日,葬于崇祯四年(公元 1631 年)闰十一月二十二日;李成妃卒于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十一月初六日,葬于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四月十六日。由此可知,熹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四,嘉靖三十年六月辛巳,校印本《明实录》第 46 册,第 6675 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十,《礼部·坟陵等祀》,影印本第 3 册,第 1424 页。

^③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2 期。

宗三妃是先后分两次人葬的。另外,在张裕妃和段纯妃二棺中间,尚有可置一棺的空隙,应系为熹宗某妃(如任贵妃等)预留。

神宗七嫔墓在熹宗三妃墓东北约 300 米处^①,封土亦为截尖圆锥体,夯筑,位于地下墓室之后,而不是叠压在墓室之上。墓室为砖石砌成的平房式建筑,坐北朝南偏西 5°,东西北三面石砌、南面砖砌,平面近乎方形,内部分为两室,皆为拱券结构(图 2—25)。前室南壁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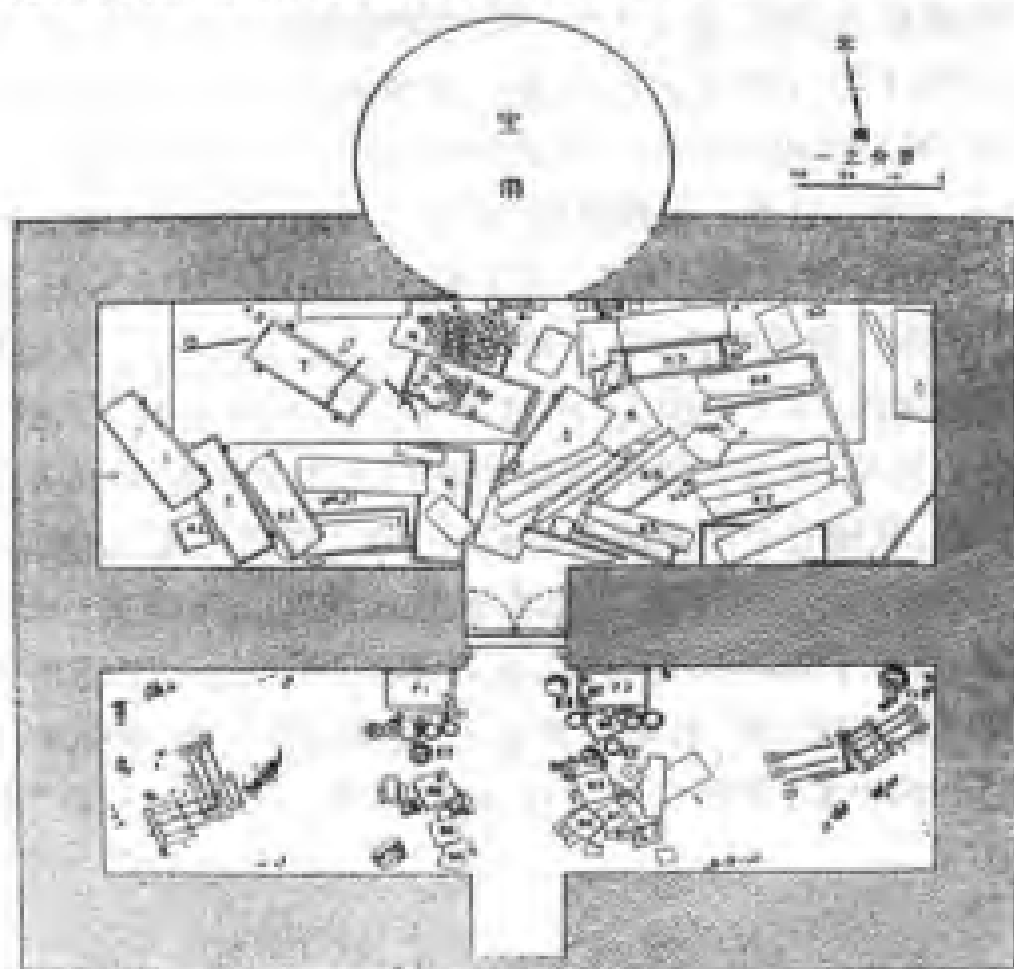


图 2—25 明神宗嫔墓(北京西郊董四基村二号墓)墓室平面图
(引自《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2 期)

1—7 椁底 K1—K7 棺材 E1—E5 水缸 F1—F2 石座 B1—B7 墓志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基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2 期。

砌,正中辟门,门洞以砖堵塞,可随手拆卸。前室面阔 19.1 米、进深 5.1 米、高 5.3 米,北壁正中为石门两扇,以通后室。前室内主要是各种祭器、祭品,石门两旁靠墙各有石宝座一,座前各有小石几 5 个,其上置香炉一、烛台二、花瓶二。东侧有墓志三副、西侧有墓志两副。后室面阔 19.1 米、进深 6.65 米、高 6.19 米,靠后壁为棺床,长 15.75 米、宽 3.35 米、高 0.7 米,其上排列七副棺槨,棺床中部偏东有两副墓志。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七人分别是顺嫔张氏(卒于万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七年七月四日葬)、悼嫔耿氏(卒于万历十七年六月初四日,同年八月初九日葬)、敬嫔邵氏(卒于万历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同年五月十七日葬)、慎嫔魏氏(卒于万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同年五月十七日葬)、荣嫔李氏(卒于天启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同年闰六月十二日葬)、德嫔李氏(卒于崇祯元年八月十八日,二年六月二十日葬)、和嫔梁氏(卒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七日,同年七月十八日葬)。

除金山之外,北京西郊的翠微山在明末也成为妃嫔和夭折皇子女的墓葬区,其地在今苹果园北刘娘村。据《崇祯长编》记载,崇祯三年(公元 1630 年)五月庚寅,“德陵择是日兴工。怀隐王(明思宗次子朱慈烜)坟卜于翠微山麓,亦以是日兴工”^①。这一带还出土过明光宗恭懿庄妃李氏(即“东李”)圹志^②,根据志文记载,李妃卒于天启四年(公元 1624 年)十月二十六日,以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翠微山之原”。

三、关于明代皇陵玄宫结构演变的讨论

在讨论明代皇陵玄宫的使用和后妃葬制时,已经涉及到一个

^① 《崇祯长编》卷三四,崇祯三年庚午五月庚寅,校印本《明实录·附录》第 93 册,第 1989 页。

^② 刘精义等:《明代妃嫔陵园及圹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 年第 2 期。

难于理清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明朝历代皇陵玄宫的结构是否和已经发掘的定陵一样?它们有没有因时代先后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变化?

大约是因为受到研究资料限制的原因,对于明陵玄宫制度的研究历来罕见。1989年,胡汉生先生发表过《明定陵玄宫制度考》一文,认为:“定陵地面建筑中的祫恩殿、明楼、宝顶相当于皇宫中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的位置;祫恩门的位置又相当于奉天门的位置。定陵玄宫建筑的前、中、后三殿室,分别相当于皇宫内廷建筑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殿,左、右配室又相当于东、西六宫的位置”;也就是说,定陵的“地面建筑相当于皇宫的外朝部分、玄宫建筑相当于皇宫的内朝部分”。这篇文章虽然以定陵为研究对象,但也涉及明代皇陵玄宫制度的变化问题,认为《明会要·礼·山陵》记载:神宗表示寿宫“欲仿永陵制”,而“永陵的玄宫和明初诸陵的玄宫规制一样”^①;也就是说,自长陵迄于定陵,明代玄宫制度一脉相承,并无改变。作者后来又重申旧说,认为自长陵至昭陵九陵之玄宫结构,“可能和定陵一样,同属‘五室三隧’之制”^②。

笔者认为,明代皇陵玄宫制度很可能不是单一的模式。关于这个问题,明代文献中的资料虽然很少,而且语焉不详,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

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五年五月,“上谒陵还,召见辅臣李时、尚书夏言于行宫,谕以寿宫规制宜逊避祖陵,节省财力。其享殿以砖石为之,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之,工力甚巨,此皆

^① 胡汉生:《明定陵玄宫制度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第31—32页。

^② 胡汉生:《明十三陵》,第9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至是,言等拟上图制,上命会同知建造侯郭勋,礼、工二部,翰林院讲、读诸臣通将皇妃从葬之式总拟定图进览。于是诸臣议奏:‘皇上亲为之兆,惓惓以避尊节财为谕,执谦虑远,臣等所当将顺;但恐过于贬损,无以称臣子尊崇之礼,其享殿、明楼、宝城拟请量依长陵规制,其地中宫殿等项仍请稍存其制,寔皆臣子无己之诚。至于列圣诸妃从葬之制,具载《会典》。今拟于外垣之内,宝城之外,左右相向依次而祔,庶合礼制。谨画图帖说呈览,仰请圣断施行。’得旨:‘具如拟,其未尽事宜,俟朕仍亲往决之’”^①。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关于世宗永陵营造规制的文件,它直接讲到了永陵和长陵的关系,即:享殿、明楼、宝城等地面建筑“量依长陵规制”,地中宫殿等“稍存其制”。胡汉生先生认为其中的“地中宫殿等项仍请稍存其制”只不过是文饰之辞,其实际规模仍等同于长陵。笔者认为:通观全文,“量依长陵规制”与“稍存其制”的用辞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从今日昌平陵区长、永二陵陵园地面遗存来看,永陵虽然多外罗城一道、明楼的额枋和斗拱等皆以石制成,但其享殿、明楼、宝城的规制都明显逊于长陵,其中享殿台基层数、面阔进深开间以及宝山城的直径等项更为明显。由地面推及地下,永陵的玄宫可能也会比长陵玄宫有所不同。

定陵之建,神宗颇倾心力,以至“钦定寿宫式样、丈尺”^②。《明会要》记载:“中官示帝意,欲仿永陵制”^③,结合前后文及相关文献记载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辛未,校印本《明实录》第42册,第3958—3959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四,万历十二年十月己酉,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2847页。

^③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一七,《礼·山陵》标点本,第274页,中华书局,1956年。

考察,这应该是指陵宫的结构和大小而言。据礼部左侍郎兼经筵日讲官朱赓回忆,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四月,他曾奉神宗之命至大峪山工地巡视,“司礼(监太监)张宏密传圣谕:‘欲仿效永陵之式’。余惊惧曰:‘司空安得如许金钱!’乃密令祠部卢正朗丈其地广狭亦不称,因具疏略曰:‘永陵宝城横亘八十一丈,外加方墙若干丈,必欲仿之,未免限于沟界。请就中通融,连外方墙总合九九之数,庶规模既已洪远而风气益为完萃,且与昭陵相望不致悬殊之深,亦圣衷之所安也’”^①。明神宗览奏,留中不发,派人暗访得实,采纳了朱赓的建议。因此,定陵的宝城、外罗城都要比永陵窄小,但其享殿、明楼等却一如永陵之制,并且,明楼城台“铺地石皆文石,其鲜艳如芙蓉、如桃花片,其合际若天衣无缝、若片石生成;其滑泽若涂脂,履之如踏坚冰,缩武紧鞵鞞,惧踣跌。其城暨墙石皆窾其中,贯(灌)铁液,千百夫不能动摇,虽永陵计不及此也”^②。如此,定陵玄宫之制亦模仿永陵,应当与事实相去不远。

如果永陵和定陵一样,玄宫为三正两配五室,那么,作为“稍存其制”祖本的长陵玄宫会是什么规制呢?前引《明世宗实录》中有“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之”等语,显然“九重法宫”应该就是长陵的玄宫制度。

从字面上分析,对于“九重法宫”至少可以有三种解释,其一是前后九宫纵向一字排列,其二是左右九宫横向一字排列,其三是“九宫格”式排列法。从定陵玄宫实例来看,显然第三种解释更为接近实际。所谓“九宫”,乃是中国古代一种宫室或寝庙的建置结构,是一种

^① 明·朱赓:《茶史》第3页,罗振玉辑:《殷礼在斯堂丛书》本,第7册,东方学会石印,1928年。

^②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汪鱼亭传抄本,第61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被理想化了的布局模式。关于“九宫”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其中西汉戴德《大戴礼记》中提出的“明堂九室”之说与礼制建筑的关系最为密切。在这个解释系统中,明堂九室各有名称,九室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序列呈“井”字型排列,分别为明堂太庙、总章太庙、太庙太室、清阳太庙、玄堂太庙和四个个室,后再配以八卦,遂成“九宫八卦”之图,其图示如下:

明堂左个 清阳右个 巽四	明堂太庙 离九	明堂右个 总章左个 坤二
清阳太庙 震三	太庙太室 中五	总章太庙 兑七
清阳左个 玄堂右个 艮八	玄堂太庙 坎一	总章右个 玄堂左个 乾六

按照八卦的固定方位(即乾在西北、巽在东南等),可知此九宫八卦图当以上为南,下为北。如此,“九宫”的布列形式应该是三横三纵,中路自南而北依次为明堂太庙、太庙太室、玄堂太庙,东路自南而北依次为明堂左个暨清阳右个、清阳太庙、玄堂右个暨清阳左个,西路自南而北依次为明堂右个暨总章左个、总章太庙、玄堂左个暨总章右个;那么,长陵的“九重法宫”式玄宫的布局就会是前、中、后三个主殿井连,以当明堂太庙、太庙太室、玄堂太庙;前殿东西通两配殿,以当明堂左个暨清阳右个、明堂右个暨总章左个;中殿东西通两配殿,以当清阳太庙、总章太庙;后殿东西通两配殿,以当玄堂右个暨清阳左个、玄堂左个暨总章右个。这是最标准的“九重法宫”之制,而“稍存

其制”的永陵应该有所简化,如果它确实和已经发掘的定陵玄宫结构一致,亦即三主两副五官玄宫,则是省略了位于四角的明堂左个暨清阳右个、玄堂右个暨清阳左个、明堂右个暨总章左个、玄堂左个暨总章右个,而保留了五个太庙。

事实上,九室玄宫之制已见于明初,只不过它既不是正式帝陵,更不是“九宫格”式的排列形式。1982年,江苏盱眙县文化管理部门对曾遭局部破坏的明祖陵玄宫作了初步清理。据介绍,“在距地面2米深处发现砖砌拱券甬道9座,以神道中线为轴左右对称。中间一券为中券,两侧分别为东一、东二、东三、东四,西一、西二、西三、西四。中券宽1.68米,券下有对开石门两扇,门缝直对神道中线。石门宽1.12米、厚0.2米,门上有门楣石”^①,东一、西一2券宽度与中券等,东二、东三和西二、西三4券各宽1.36米,东四和西四2券各宽1米。每券前各有对开石门,石门的大小和门间距等亦自中央向两侧递减。这九座南北向的拱券东西一字排开,总宽度约在30米左右。并列九券的南面有一条东西向券洞,东西长17.10米、南北宽2.03米、墙厚1.03米,券顶已被拆除。在这个券洞的南壁中部向南通向另一南北向券洞,此券长2.65米、宽2.2米,顶部亦遭破坏。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盱眙明祖陵的玄宫结构应该是由墓道、南北纵向甬道、东西横向甬道、玄宫几部分组成。所谓带石门的“砖砌拱券甬道”,实际上已是玄宫部分,左右九室横向一字排列;而其前面纵横相连的“丁”字型形甬道,则刚好把墓道和每座玄宫连接起来。1998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祖陵玄宫部分进行了钻探,在今水塘(即“丁”字型形甬道部分,因1966—1967年挖土取砖积水而成)南沿探出墓道一条,长5米、宽3米;探得玄宫东西长20米、南北宽5

^① 蒋中健:《明代第一陵》,第81—8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米，“是在自然岗丘之下直接挖深坑，再用砖砌成”^①。这种以纵拱券洞为前室，向后连接横拱券洞为中室，再连接多个并列的纵拱券墓室为后室的墓葬结构，已知属于明初的实例还有1959年发掘的黔宁昭靖王沐英（薨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墓^②，沐英墓在江苏江宁县东善乡印堂村东观音山龙埂之西，墓室砖砌，坐北朝南，后室并列三室，中室葬黔宁王沐英，左室葬沐英元配马氏、右室葬继配耿氏，中室的東西两壁上各有过洞，分别与左、右室相通（图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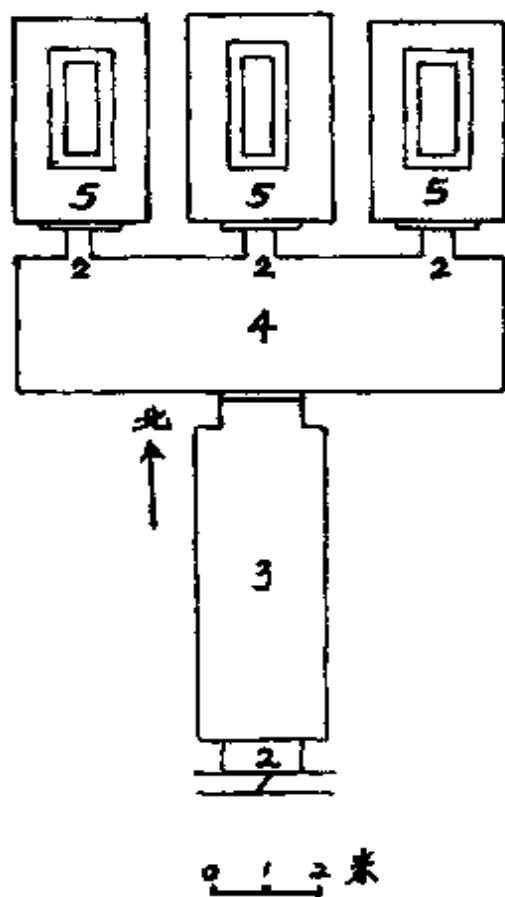


图2—26 明沐英墓墓室平面图（据《考古》1960年第9期摹绘）

1. 封门墙 2. 甬道
3. 前室 4. 中室
5. 后室(棺室)

①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明祖陵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0年第4期。

②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附载沐英墓），《考古》1960年第9期。

盱眙明祖陵玄宫虽然是以砖砌成,规模也比较小,但它毕竟是明代皇陵玄宫制度研究不可多得的参照资料,它提供了时代比较早的九室玄宫实例,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对孝陵等明代早期皇陵玄宫制度的一种映射。

明永乐至景泰时期(公元1403—1456年),亲王陵多用五室玄宫形式,其平面结构与神宗定陵玄宫相同,其典型有河南洛阳伊厉王(薨于永乐十二年)陵^①、甘肃榆中肃庄王(薨于永乐十七年)陵^②、湖北江陵辽简王(薨于永乐二十二年)陵^③、江西新建宁献王(薨于正统十三年)陵^④等,只是王陵玄宫面积较小,材质稍逊色而已。湖北江陵湘献王(永乐初建衣冠冢)则为七室玄宫,即在前后两主殿的两侧各设一配殿。亲王既已多用五室玄宫(后室还多有三壁龕),甚至用七室玄宫,则天子理应再高一等,用九室玄宫。玄宫平面布局等级的变化,一般说来只能是在主室旁边做文章,即增加配殿或耳室。如果按照定陵和湘献王玄宫的模式向上逆推,则皇陵玄宫无疑应该是前述“九宫图”结构。当然,也不排除皇陵使用七室玄宫的可能性,和湘献王玄宫一样,平面呈“工”字形。勘探孝陵玄宫范围为南北90米、东西50米^⑤,而定陵玄宫自甬道至后殿通长87.34米,左右配殿两端最宽处为47.28米^⑥,两者大体吻合,说明孝陵玄宫结构不会比定陵

① 徐金星等主编:《洛阳市文物志》,第133—134页,《明代伊王朱楨墓》,洛阳市文化局刊印(内部资料),1985年。

② 施连山:《明肃王墓考略》,《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③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④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⑤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等:《明孝陵地下宫殿勘测记》,载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198—20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简单。另外,明英宗遗诏讲到“皇后他日寿终宜合葬,惠妃亦须迁来,以后诸妃次第祔葬”^①,亦可从侧面证明当时设计玄宫殿室较多,只有这样,众多后妃合葬于一处才有可能。从明代亲王陵来看,其玄宫结构有一个从早到晚由繁变简的大致规律(详本书第三章),这暗示着明代皇陵的玄宫结构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在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猝死,议定于仁宗献陵迤西黄山二岭前景帝旧陵址卜建陵寝。工部郎中万燝曾经参与督工,工毕因作《陵工记事》,其中有云:“陵寝有后殿、中殿、前殿,重门相隔。有为门之枢纽者曰铜管扇,冶铸甚艰,旧例责内侍监造,时因庆陵择定九月初四日窀穸,内侍以期太迫,再四规避。工部尚书札臣万燝董其事,甫一月而功成”^②。万氏所记只讲到了庆陵有前、中、后三殿,但却没有谈及左、右配殿,以定陵实例考之,配殿也须隔以石门,石门之制虽有所不同,但门轴之制应当一致,此处言不及配殿及石门,或许庆陵没有两侧配殿。如果能够找到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庆陵玄宫只有前、中、后三主殿,而别无左右配殿之设,则该陵提供了明代皇陵玄宫的又一种形式——三室玄宫。

因此,笔者推断,明朝帝陵玄宫可能会有九室、七室、五室、三室等多种形式;其发展变化之轨迹,不一定就是从早期的九室或七室、五室,简化为晚期的三室。关于皇陵玄宫建筑的材质,已知定陵是全用白石;文献记载营造光宗玄宫时,“工部尚书王佐以庆陵发引期迫,玄宫石料未凑,乞参酌诸陵规制,砖石并用,以竣急工。上命仍用石,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三六一,天顺八年正月己巳,校印本《明实录》第21册,第7172页。

^② 清·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四九引,影印清道光刊本,第341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添工繕造,务及吉期”^①,另从各地藩王陵墓来看,除个别几例全用石材外,一般兼用砖石或纯用砖砌,或许明朝诸帝陵中亦有“砖石并用”之例。

在明人关于皇陵地下结构的些许记载中,明英宗裕陵玄宫之制最为扑朔迷离,而它可能也是最终解开明代帝陵玄宫制度变化之谜的关键(图2—27)。



图2—27 明裕陵享殿基址及明楼

据《明宪宗实录》记载,裕陵始建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二月初三日(一云二十九日),建成于同年六月二十日^②。在裕陵玄

^① 《明宪宗实录》卷十,天启元年五月庚申,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529页。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天顺八年二月甲申朔,丙戌,“营建大行皇帝陵寝于天寿山,称名裕陵”。见校印本《明实录》第22册,第35页。又,同书卷六,天顺八年六月癸未朔,壬寅,“裕陵成。……经始于是年二月二十九日,至是成”。见校印本《明实录》第22册,第157—158页。

宫的设计和营造过程中,因宪宗生母周太后欲独尊自己,贬黜无子的钱太后,两太后之间的嫡庶仪制之争再趋激烈。据当时曾参与其事的大学士彭时记载:“营造山陵,时(彭时)与同僚李(贤)、陈(文)计曰:‘前日事(指为钱太后争名分)费周折如此,今玄宫且从权作三位,庶日后两全其美’。李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内臣传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武以来制度只双穴,未可轻易为’。仍令诸大臣同议。及议,夏太监坚言不可,众顾望不言乃已”^①。结合明代玄宫实例和其他文献记载来考察,彭时等人所建议的“双穴”或“三穴”并设,虽不排除是指两套或三套玄宫而言,但更大的可能性应该是指帝后棺位或棺位之下的金井。明初有记载说,太祖马皇后崩,“命葬孝陵之左”^②,这显然不是葬马皇后于孝陵玄宫之外,应当是指孝陵玄宫之左位。明朝宪宗以前诸帝在名义上皆是皇后嫡出,所以先朝一帝一后合葬并无疑义。彭时等人为了预防以后周太后必欲别葬钱太后于裕陵玄宫之外,所以才想出“三穴并设”的办法,但此方案最终被太监夏时所否定,也就是说,裕陵玄宫仍为并设双穴。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六月二十八日,慈懿钱太后病故。虽然英宗有“皇后他日寿终宜合葬”的遗诏^③,但周太后“恐他日不得葬裕陵,乃胁上(宪宗)欲别择地以葬慈懿”^④;据彭时记载,太监夏时甚至

^①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七二,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5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明·谢缙(传):《天潢玉牒》,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一,许大龄等点校本,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明英宗实录》卷三六一,天顺八年正月己巳,校印本《明实录》第21册,第7172页。

^④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宣宗废后》,谢兴尧点校本,第76页,中华书局,1959年。

公然否决钱皇后与英宗合葬的主张,宣称:“慈懿无子且有病,岂可入山陵!只可比(宣宗)胡后例,葬西山”。针对此言,彭时和礼部尚书姚夔等人在宪宗面前力争不已,彭时说:“皇上大孝当以先帝之心为心,先帝待慈懿娘娘始终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虚其右以待后来,则两全其美,庶不失先帝之意”^①。稍后,群臣又上书请尊英宗遗诏,帝后合葬。针对夏时妄援宣宗胡废后之例,姚夔还特别指出:“或者曰:慈懿无子,宜与恭让皇后同。此犹不然,恭让在宣宗时已尝逊处别宫,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当时未尝退处他宫,未尝别立一皇后。岂得谓之同乎?况宣宗晚年,追复恭让徽号,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盖可知矣”^②。经过激烈的争执,周太后终于让步,钱皇后得以合葬裕陵,但太监们却在玄宫制度上作了手脚,钱皇后并没能葬入英宗玄宫,而是同坟异穴。七月二十一日,“命营(慈懿皇太后)葬事于裕陵左,开山破土”^③,同年九月初四日将钱太后葬入。《明史》记其玄宫之制:与英宗玄宫“异隧,距英宗玄堂数丈许,中窒之,虚右圻以待周太后,其隧独通”^④。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三月十六日,孝宗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至西角门议周太后陵庙事,“上袖出裕陵图一纸,指示陵门内有二隧道,其一西北行转而至者为英宗皇堂,虚其右圻而中有道可通往来。其一东北行转而至者为孝

^①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七二,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5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明·姚夔:《姚文敏公集》,《陵庙事第三疏》,见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五六,影印明末刊本,第1册,第444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③ 《明宪宗实录》卷五六,成化四年七月丙子,校印本《明实录》第23册,第1147页。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孝庄钱皇后》,点校本第12册,3517页。

庄玄堂,相去可数丈,中隔不通”^①。李东阳的这段记录,是对裕陵玄宫布局最详细的记载。

从上面所引述的诸条文献来看,明英宗裕陵玄宫应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其中左路独立,而中、右两部分相通。如此,其具体模式不外乎两种,其一是英宗及周太后和钱皇后分别使用大小不等的两套玄宫,二宫并列;其二是“九宫格”式玄宫或定陵式玄宫,而左路与中、右两路不相通。从“洪武以来制度只双穴”^②一类记载来分析,裕陵玄宫预拟之制应该是英宗葬左位,钱皇后葬右位,周太后按妃嫔礼祔葬于配殿,这是继承孝陵之制。但周太后欲援宣宗孙皇后之例,阻挠钱皇后入葬裕陵玄宫,预占了玄宫右穴。于是钱皇后只能别葬于玄宫之外,“异隧焉,去英宗玄堂可数丈许,中室之;虚右圻待周太后,则其中有隧通道”^③。这实际上是在明初定制的帝陵玄宫之外再别建一玄宫,因此应该是大、小两组玄宫并列。按照李东阳《燕对录》的记载,就是自明楼券门内西北折为英宗玄宫,而东北为钱皇后玄宫。裕陵玄宫这种形式既不是孝陵之制,也不会是定陵之制而堵塞左配殿隧道,它只是明朝的一个特例。从关的记载可以分析出,明初帝后合葬于玄宫主室,但很可能是分室而葬,如黔宁王沐英墓室那样隔室而通隧^④,而妃嫔则祔葬于主室两侧的二至六个配殿中。明代帝王中这种隔室葬的实例,在早期有河南禹州市周定王朱楠(薨于洪熙元

① 明·李东阳:《燕对录》,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九,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1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七二,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5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十,《坤则记·钱皇后》,影印明崇祯刊本,第3册,第17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附载沐英墓),《考古》1960年第9期。

年,公元1425年)之墓,该玄宫是在后室(内有棺床)之后再另辟四个墓室^①。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则有蜀昭王朱宾瀚(薨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之墓^②、德庄王朱见潏(薨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之墓等^③。其中蜀昭王玄宫后室以石壁隔为两室,有假石门开缝相通;德庄王玄宫后室分为并列的左右二室,异隧(甬道)而入,两室间有窗隧相通。此外,这种隔室葬法亦见于安徽嘉山县曹国公李贞(卒于洪武十一年,追赠陇西王,曹国公李文忠之父)、孝亲公主朱氏(明太祖次姊,卒于明建国前)夫妻合葬墓等明初皇亲墓葬中^④。裕陵既将皇后别葬于玄宫之外,则妃嫔已无人葬帝陵玄宫之理,加之废止宫妃殉葬,玄宫不宜多次开启,所以天顺以后诸妃只能别葬于金山等处。至于世宗曾经为永陵设想的“诸妃陪葬义则不当由隧,宜于外垣之内、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附”^⑤,实际并未实行。从建筑规制来考虑,这种拟议也只能行之于有外罗城的永陵和定陵(图2—2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明代皇陵玄宫制度依时代前后可能会有所变化,具体而言,有定陵式的五室玄宫,也有更高级的九室玄宫,或许

①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321页,《明周定王墓》,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杨焕成等主编:《河南文物名胜史迹》,第614—616页,《明周定王墓》,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调查资料。

② 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③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④ 吴兴汉:《嘉山县明代李贞夫妇墓及有关问题的推论》,《文物研究》总第4期,黄山书社,1988年。

⑤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世宗永陵”引《嘉靖祀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5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图 2—28 明永陵二柱门及明楼

还有七室玄宫以及最简单的三室玄宫。英宗裕陵玄宫制度扑朔迷离,应该是明代诸陵中的一个特例,但它却开启了明朝帝陵中不再葬妃之制。

第三章 明代王陵制度研究

明代亲王陵墓制度是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皇帝陵墓制度研究的重要参照系。明代分封皇子于全国各地,从考古调查或发掘资料来看,散处各地的明代藩王陵墓,不仅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且还有更鲜明的地域特征。本章重点研究明代亲王陵墓陵园和玄宫的形态及其制度特征,兼采已经公布的王妃和郡王墓葬考古资料,以作为对比参照。

第一节 明代皇子制度和王陵概况

明代的皇陵,特别是南京钟山孝陵和北京昌平十三陵在清朝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从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研究明代皇陵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然而下天子一等的明代亲王陵墓,却由于建筑等级低、散处全国各地并且明亡以后缺乏有效保护等原因,三百多年来日渐湮没于荆榛乃至毁坏殆尽,另兼以文献记载的不足,所以除了少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外,关于明代王陵制度的研究还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而这项工作的开展也不得不从最基础的资料搜集和统计开始。

一、明代的皇子制度

明代之制,皇帝之嫡长子立为皇太子,以备储君之位;若皇后无

出,则以庶出长子为皇太子。其余宗室成员分为八等:皇帝众子封为亲王;亲王嫡长子立为亲王世子,其余众子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立为郡王世子,其余众子封为镇国将军。郡王之孙封为辅国将军,郡王曾孙封为奉国将军,郡王四世孙封为镇国中尉,郡王五世孙封为辅国中尉,郡王六世孙以下皆封为奉国中尉。尽管这些宗室子弟“贤愚杂出”,但却一律“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①。亲王、郡王是皇室高级贵族,他们所享受的政治、经济待遇也更高。凡亲王受封,“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署。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②。明代亲王封号一般都用古国名或地名,如“秦”、“晋”、“汝”等,万历(公元1573—1620年)以后亦偶用吉祥字,如“福”、“瑞”等;死后例谥一字,如“恭”、“定”、“庄”等。亲王嫡长子年至十岁,授金册、金宝,立为亲王世子;嫡长孙年及十岁立为世孙,冠服如一品官员。世子、世孙是亲王爵禄的继承人。郡王亦自十岁受封,身份次亲王一等,授以涂金的银册、银宝。郡王封号一般用古郡县名或州县地名,用二字,如“兴平”、“安塞”、“乐陵”等;死后例谥二字,如“懿简”、“恭惠”、“安禧”等。郡王嫡长子立为郡王世子,嫡长孙立为长孙,冠服如二品官员。

明代皇族(包括不在本书研究范畴之内的女性宗室成员)俸禄全由国家支出,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规定皇子女岁供之数为:“亲王,米五万石、钞两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纁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纁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已受封之公主,“赐庄田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标点本第12册,第3557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标点本第12册,第3557页。

一所,岁收粮千五百石,钞二千贯”;皇侄孙靖江王位下,“米二万石、钞万贯、余物半亲王,马料草二十匹”^①。洪武初年,明太祖感念宗族势力单薄,因此有意识地扶持子侄,以期壮大羽翼,屏藩朝廷。他总共有 26 个儿子,除长子朱标立为皇太子、幼子朱楠夭折无封外,其余 24 子皆封亲王。明初诸王位高权重,特别是沿边诸王,如“广宁(今辽宁北镇)辽王、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宁王、宣府(今河北宣化)谷王、大同代王、宁夏(今宁夏银川)庆王、甘州(今甘肃张掖)肃王,皆得专制率师御虏。而长陵(明成祖)时在北平为燕王,尤英武。稍内则西安秦王、太原晋王,亦时时出兵,与诸藩镇将表里防守”^②。诸王在藩可统兵征伐,在朝亦位公侯大臣之上,有时还可代替皇帝处理朝政,如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 年)冬,“命肃王(皇十四子朱模)于奉天门设座听朝政”^③。明太祖恢复分封制、强化诸侯王权的初衷是希望本强枝茂,巩固新兴的大明王朝,但皇室人口的迅速繁衍,很快即给朝廷财政造成严重的负担,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于是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不得不“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④。新制度规定:亲王岁禄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以下依次递减。

明太祖诸子中,懿文皇太子一支在“靖难”后绝嗣,燕王一支升为帝系,其余 23 位亲王,本身获罪削封或无子国绝者 7 人,又正德十五年(公元 1520 年)废宁王、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废伊王、隆庆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二,《食货志·俸饷》,标点本第 7 册,第 1999 页。

^② 明·郑晓:《今言》卷一,“八十八”条,李致忠点校本,第 46 页,中华书局,1984 年。

^③ 明·谢缙(?):《天潢玉牒》,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一,许大龄等点校本,第 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二,《食货志·俸饷》,标点本第 7 册,第 2000 页。

二年(公元1568年)废辽王,惟13王传至明末。大体上说,明朝中晚期,亲王一般维持在30位上下,一项隆庆、万历之际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国共有洪武以来所封亲王二十五位(秦、晋、周、楚、鲁、蜀、代、肃、庆、岷、韩、沈、唐、赵、郑、襄、荆、淮、德、崇、吉、徽、益、衡、荣),“郡王二百五十一位,将军七千一百位,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共七千七十三位,庶人六百二十,未封未名者与齐府高墙之庶皆不与焉”^①。这些宗室成员死后例由国家负责丧葬,亲王、郡王及王妃、公主等人不但由皇帝“赐祭葬”、由官府造坟,而且一应葬仪用品亦由工部制造送用,如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八月,沈王(太祖第二十一子朱模)妃张氏薨,“讣闻,上辍朝一日,遣官赐祭,命工部给明器仪仗,有司营葬”^②。后来因为需求量大,工部应付不过来,只好奏请皇帝采用变通之制。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六月礼部上奏:“宗室本支蕃衍,每有丧礼,所用溢宝册、铭旌、明器俱下工部委所司制造,累月不成。比成,遣官赉送或已不及葬期,虚糜工料,有孤恩典”;因而,建议采纳右佥都御史李侃的建议:“凡亲王、郡王溢宝册仍下工部所司促办,付掌行丧礼等官赉去;其明器宜令工部具例品式,下所在有司就彼制造给用”^③,以节省道路供亿之费、减少对民间的烦扰。有明一代,自太祖至思宗凡16位皇帝,共生育皇子107位,除皇太子以外,其余长成者皆得封亲王,子孙世袭;而早夭者亦多有“某太子”、“某王”一类的追封谥,祭葬如制。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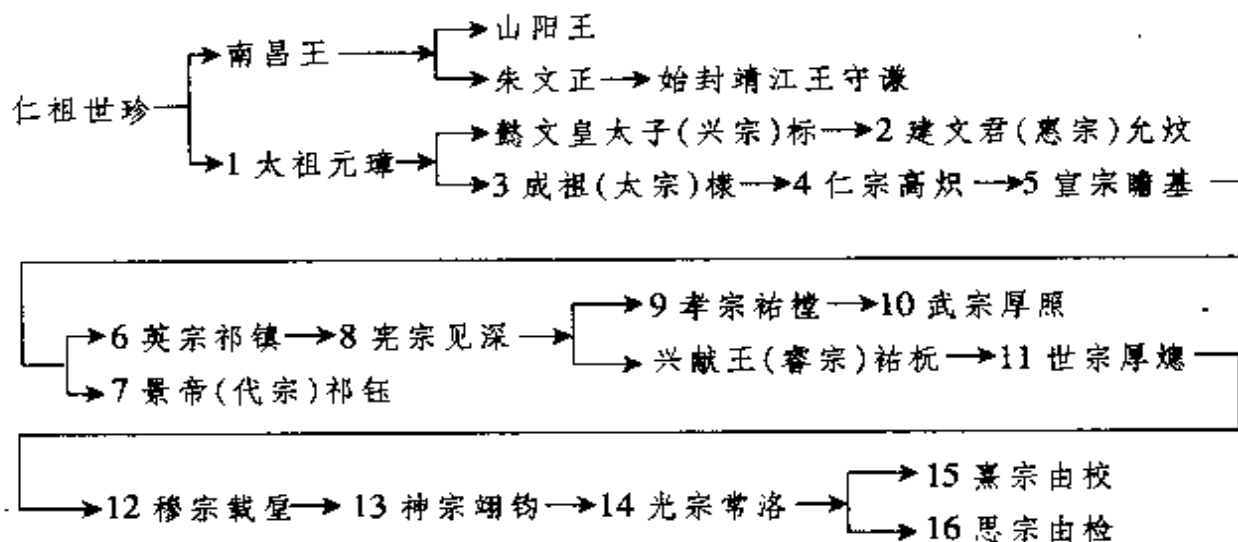
^①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三,《朝端大政十三·宗藩下》,影印明天启刊本,第2册,第12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己酉,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851页。

^③ 《明宪宗实录》卷六八,成化五年六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23册,第1351—1352页。

“宜都王贵燊薨。讣闻，礼部言：‘王四岁而薨，为下殇，无辍朝、赐祭、加溢之礼’。上曰：‘免辍朝、加溢，仍遣官赐祭’。贵燊，辽简王第六子也”^①。此后，宗藩子孙幼殇者皆依例赐祭葬。同年九月，“临汾王冲焨薨。遣祭如宜都王礼。冲焨，韩宪王第三子，时年四岁云”^②。明代的分封制和养贍宗藩之制直接导致了王陵在各地大量出现。

明朝皇帝世系



二、明代王陵的数量估算

明代亲王、加上名义上比亲王更高的夭折皇太子总共到底有多少座陵墓、它们的具体分布情况怎样？现状如何？这是一个并不很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大体上说，明代皇子受封已赴封国者一般都葬在封国（王府所在）附近，子孙承袭亦因之，有些是同藩历代亲王、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五一，永乐四年二月壬午，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767页。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辛酉，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856页。

甚至包括郡王葬于同一兆域。这些王陵散布在全国很多省区,它们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亲王已出藩但无后者,有的葬在封国,有的则归葬京师。至于夭折皇子,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迁都北京以前葬南京,迁都以后一般都葬在北京郊区。

1. 南京皇子墓

有案可稽的葬于南京的皇子有2人,即太祖长子懿文皇太子朱标、第二十子韩宪王朱松。

懿文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卒于皇太子之位,享年三十八岁。同年八月,“庚申,祔葬皇太子于孝陵之东,谥曰懿文”^①。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皇太孙建文帝(明惠宗)即位,追懿文太子谥曰“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并曾荐上陵号,明成祖即位后一切削夺,其墓复称“懿文皇太子园寝”如故。据明朝遗民查继佐记载:“懿文皇太子园,在孝陵之左,懿敬(引者按,核《明太祖实录》等书,应为“敬懿”,查书记载有误)皇太子妃常氏合葬,以时祔孝陵行祭。初称陵,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立碑孝陵,削陵号,而俗犹称‘东陵’云。……缪恭请封建庶人后^②,以主太子祀,不果”^③。懿文皇太子陵逢忌辰、四季之首日、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一年中凡

^① 明·朱国桢:《皇明史概》“大政记”卷五,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申,影印明崇祯原刊本(浔溪朱府藏版),第32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

^② 缪恭是台州籍布衣百姓,弘治(公元1488—1505年)时曾到北京伏阙上书,请恢复建文年号并续封其后裔。明孝宗未采纳他的意见,但也未加罪于他。“建庶人”是明建文帝的次子朱文圭,明成祖“靖难”成功夺得皇位后,年仅两岁的朱文圭被囚禁于凤阳中都城广安宫,号“建庶人”;建文帝之长子(皇太子)朱文奎则不知所终,一说亦被囚于凤阳。朱文圭等人直到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才被英宗下令放出,“尚不识牛马”,不久亦死去。

^③ 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一六,《陵志》点校本,第80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九次大祭,祭文亦填写嗣皇帝御名,一如祭祀诸帝,甚至年祭次数也远远超过了太祖陵的三次,明人推测这是因为“建文追谥兴宗时,加隆祚庙,有此缛礼,其后因循不及改正”^①。但是靖难以后懿文陵主祭官员的品秩较低,例遣南京太常寺属道官奉祀行礼,“至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五月,太常少卿谢杰始抗章议其非礼,上(明神宗)下部详议,始改遣南京五府金书官行礼”^②。东陵的建筑规制很低,据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九月南京太常寺卿杨时乔等奏:“朝廷典礼,自山陵至于藩封坟墓享堂,其高深、广阔、亩间皆有定数,又皆用红丹涂饰。今东陵殿浅隘卑狭,仅能展安祭器品物,又以黑饰,与众庶同”^③;因建议增饰。但东陵始终未能如制修缮,“至弘光(公元1645年)中,始以礼臣议,追崇尊号,易黄瓦、改故殿”^④。

1999年3月至2000年2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孝陵陵宫以东60多米处勘探确认了明东陵寝殿遗址,……基本查清了陵寝布局”^⑤。这组建筑由陵宫门、享殿前门、享殿等几部分组成,主要建筑全在一条轴线上,坐北朝南,南北纵深94米、东西总宽49.8米,陵宫以北约300米处为宝顶,其规模远远小于孝陵。自陵宫门到享殿前门为第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陵寝之祭》点校本,第8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园庙缺典》点校本,第8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③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兴宗东陵”引《南京太常寺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4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④ 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一六,《陵志》点校本,第80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⑤ 贺云翱等:《南京明孝陵及东陵考古获多项发现》,《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7日第1版;贺云翱等:《明东陵考古纪实》,载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230—24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一进院落,东西两侧宫墙呈弧形向陵园前门内收,平面呈龟背状。从残存柱础判断,享殿前门为三间两进式,基址长约20米、宽13.5米。享殿前门以为北第二进院落,平面为长方形,中心为享殿。享殿台基东西长33.34米、南北宽18.7米、残高约1米,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有月台,与享殿前门联以丹陛桥(图3—1)。砖砌陵宫墙垣一般厚1.2米,



图3—1 明东陵享殿及享殿前门基址

北垣厚达3.1米,宫墙侧翼有完善的排水设施。遗址中出土有石雕柱础、阶石等构件,还有绿釉、黄釉琉璃勾头、滴水、螭吻、脊兽,上有龙、凤、西番莲等不同纹样,也有黄、绿、黑等不同色釉的板瓦、筒瓦、通脊等,享殿院落中的某些地方还保留有完好的埧地砖(图3—2)。

明代官私记载均说懿文皇太子葬于孝陵之东,但并未有记录具体距离远近的文字。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刘曰梧奏疏中说:自孝陵“东去数百武为东陵,则懿文太



图 3—2 明东陵陵宫后墙及埽地砖

子寝庙也”^①，这是目前所知关于孝陵与东陵间距最具体的数字。又，崇禎十七年（公元 1644 年）五月朔，南明弘光帝（嗣福王朱由崧）至南京，“展谒孝陵，祭享殿，素服角带，望东陵，问知为懿文太子也”^②；弘光帝“由城外至孝陵，乘马从西门入享殿祭告，以东门乃御路也。拜谒罢，徘徊良久，问懿文太子寝园，遂诣瞻拜”^③。从这两条可以互证的记载也可以看出，懿文太子陵应当附近孝陵。孝陵东遗址中出土黄、绿、黑三色琉璃瓦，与前引明代有关记载也相契合，因此，此处遗址很可能就是湮没了三百余年的明东陵。不过该陵园与

①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兴宗东陵”引《南京太常寺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4 册，第 242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

② 清·谈迁：《国榷》卷一〇一，崇禎十七年五月戊子朔，张宗祥点校本第 6 册，第 6081 页，中华书局，1958 年。

③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五月福王入南京”，任道斌等点校本，第 8 页，中华书局，1984 年。

孝陵仅仅相距 60 余米,又显然距离过近。明人张瀚谒二陵游记有云:“(孝)陵中禁采樵,草深木茂,望之丛蒙,深远不可测,惟遥望殿宇森严。御路旁列石器,长亘数里。前峙御碑,高三丈许,覆以石亭,亭前朱门御戟,以时启闭。左有懿文皇子墓,亦朱门深锁,不能至也”^①。又据《大明会典》记载:“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②。笔者认为,孝陵东侧新发现的这座墓园,还有可能是从属于孝陵的明太祖妃墓,据说“文化大革命”中曾在孝陵西旁挖出过一明代女性墓,其地今为军事管理区。这两座墓夹孝陵而葬,正符合《大明会典》中“二妃葬陵之东西”之说。倘若如此,懿文太子之东陵所在还应该再向东一些。从钟山整体形势来看,孝陵居于中心位置,其东与中山陵之间尚有一道小岭自主峰逶迤而下,懿文陵园也有可能在这一带。

韩宪王朱松卒于永乐五年(公元 1407 年),“以未之国,命葬(南京)安德门外”^③。安德门是明代南京外城南侧城门之一,分为大安德门和小安德门,现在南京城南仍有“安德门”地名,但韩宪王的具体墓址失考。韩宪王子孙后来建藩平凉(今甘肃平凉),因而皆葬于甘肃,韩宪王墓由南京衙门照料,“南京韩宪王、张顺妃、李丽妃坟咸以时祀,牲醴庶馐各有差”^④。

除懿文皇太子和韩宪王以外,明太祖之第九子赵王朱杞、第二十六子朱楠,成祖之第四子朱高熾等早夭皇子亦应葬于南京附近,但均

^①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二,“东游记”,点校本,第 36 页,中华书局,1985 年。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十,《礼部·坟陵等祀》,影印本第 3 册,第 1423 页。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韩宪王松》,标点本第 12 册,第 3604 页。

^④ 明·劳堪:《宪章类编》卷三,“西山陵坟”,影印万历六年自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 46 册,第 482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无祭享,其墓址史传亦缺载。

2. 北京皇子墓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皇太子(仁宗)之第四子静乐王朱瞻垠死去,年十七,“葬昌平宜山”^①;仁宗即位追封为献王,谥曰献。献王朱瞻垠是第一位葬在北京的天折皇子。此后,仁宗第八子滕怀王瞻埜(卒于洪熙元年)、第十子卫恭王瞻埏及妃杨氏(卒于正统三年)、第三子越靖王瞻墉及妃吴氏(卒于正统四年)等人相继葬于昌平绵山、宛平石景山等地。景泰(公元1450—1456年)、天顺(公元1457—1464年)以后,北京海淀金山一带逐渐成为最集中的夭殇皇子女的墓葬区,“凡诸王、公主夭殇者并葬金山口,其地与景(皇帝)皇陵相属,又诸妃亦多葬此”^②。这期间也有一些皇子仍然别葬于石景山等处,如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八月,“命造申王坟于京西兰山”^③。此外,北京西郊的翠微山在明末也成为妃嫔和夭殇皇子女的墓葬区,其地在今苹果园北刘娘村。据《崇祯长编》记载,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五月庚寅,“德陵择是日兴工。怀隐王(明思宗次子朱慈烜)坟卜于翠微山麓,亦以是日兴工”^④。这一带还出土过明光宗恭懿庄妃李氏(即“东李”)圹志,称其“葬于翠微山之原”^⑤,李妃卒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二,永乐十九年十月壬寅,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2292页。

②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郊垌杂记·诸王公主坟》,点校本,第8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③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二,弘治十六年八月己未,校印本《明实录》第32册,第3765页。

④ 《崇祯长编》卷三四,崇祯三年庚午五月庚寅,校印本《明实录·附录》第93册,第1989页。

⑤ 刘精义等:《明代妃嫔陵园及圹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夭折皇子分为有封谥和无封谥两种,无追封谥的皇子丧葬之仪相对简单,歿后很快即湮没无闻;有封谥者不然,他们不仅丧葬如制,而且每年还要数次例受祭享。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重修《大明会典》记载葬在北京有封谥的25位皇子之葬地和祭祀情况云:“怀献世子(景帝长子,原追封怀献太子)、悼恭太子(宪宗次子)俱葬金山;哀冲太子(世宗长子)、庄敬太子(世宗次子)初俱葬金山,后迁袄儿峪(在昌平天寿山西南),附其母妃墓旁;宪怀太子(穆宗长子)葬金山;俱祭以牲醴,遣内官行礼,惟悼恭用素羞,哀冲、庄敬遣皇亲行礼。蕲献王,越靖王、贞惠妃吴氏,滕怀王,卫恭王、贞烈妃杨氏,许悼王(英宗第四子),秀怀王(英宗第五子)、妃黄氏,忻穆王(英宗第八子),歧惠王(宪宗第五子)、妃王氏,雍靖王(宪宗第八子)、妃吴氏,寿定王(宪宗第九子)、妃徐氏、继妃吴氏,汝安王(宪宗第十一子)、妃李氏、次妃晋氏,涇简王(宪宗第十二子)、妃曹氏,申懿王(宪宗第十四子)、妃项氏,蔚悼王(孝宗次子),景恭王(世宗第四子),颖殇王(世宗第五子),威怀王(世宗第六子),蓟哀王(世宗第七子),均思王(世宗第八子),靖悼王(穆宗次子),惟蕲、滕二王葬绵山(在北京昌平),雍、申二王葬兰山(在北京石景山),余俱葬金山,祭以牲醴,遣内官行礼”^①。

以上25位皇子,具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幼殇而追加封谥,有悼恭、哀冲、庄敬、宪怀四位皇太子和蕲、蔚、颖、威、蓟、均、靖七王,共11人;属于这种情况的在万历以后还有神宗之子邠哀王、沅怀王、永思王,光宗之子简怀王、齐思王、怀惠王、湘怀王、惠昭王,熹宗之子怀冲太子、悼怀太子、献怀太子,思宗之子怀隐王、悼灵王、悼怀王和皇七子等15人。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影印本第3册,第1424—1425页。

第二种情况是已受封,甚至已成婚但未尚赴封国而夭亡者,有怀献世子和越、腾、卫、许、忻、申六王,共7人。

第三种情况是已受封、已成婚并且已经之赴封国,但因无子封除而还葬北京者,有秀怀王之藩汝宁(今河南汝南)、歧惠王之藩德安(今湖北安陆)、雍靖王之藩衡州(今湖南衡阳)、寿定王先后之藩保宁(今四川阆中)和德安(今湖北安陆)、汝安王之藩卫辉(今河南汲县)、泾简王之藩沂州(今山东临沂)、景恭王之藩德安(今湖北安陆),共7人。其中泾简王朱祐檉曾有一子厚焯,亦前卒。明初之制,皇子既已出就藩封,虽歿而无后,亦葬于藩府所在,如太祖之子湘献王朱柏、安惠王朱楹、郢靖王朱栋,仁宗之子梁庄王朱瞻埈等即是。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九月,英宗第五子秀王朱见澍死于封国汝宁,“讣闻,上(明宪宗)甚哀悼之,辍朝三日,赐祭葬如礼。上念王乏嗣,不忍遐弃,遣中官奉迎灵柩归葬于京城之西山”^①;由此开亲王无后者归葬京师之例。此后,皇子之藩而无后者例皆归葬京师,宫眷还居京邸。如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十月,“诏修汝王府第于京师,以居宫眷。遣侍郎茅瓚、卢勋督、钦天监副杨绘往西山卜择葬所”^②;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正月,“景王薨。……遣中官王臻往经理其府事,迎柩归葬西山,处其宫眷于京邸”^③。

以上总计皇子40人,以太子或亲王的名义葬于北京。

3. 各地藩王墓

^① 《明宪宗实录》卷一〇八,成化八年九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24册,第2111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五,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47册,第7848页。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二,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丁未,校印本《明实录》第48册,第8762—8763页。

已经分封之国并且传之子孙的皇子,以及个别已赴藩封但绝嗣的皇子,一般都葬在各王府所在地附近。为清楚明了且节省笔墨,将各藩亲王的世系、承袭情况、王府及墓地所在等相关内容列表如下。

表3—1 明代亲王传袭概况表

世系	始封王	齿序	王位传袭情况	封国	墓地
太祖	秦愍王	次	11世15王,追封王5	陕西西安	陕西长安
	晋恭王	三	12世11王,追封王5,废王1	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
	周定王	五	12世11王,追封王2	河南开封	河南禹州
	楚昭王	六	8世9王	湖北武昌	湖北武汉
	鲁荒王	十	10世11王,追封王2	山东兖州	山东邹城
	蜀献王	十一	10世13王,世子1	四川成都	四川成都
	湘献王	十二	1世1王	荆州(今湖北江陵)	湖北江陵
	代简王	十三	12世11王,追封王2	山西大同	
	肃庄王	十四	9世9王,追封王3	甘肃兰州	甘肃榆中
	辽简王	十五	7世8王,废王1	荆州(今湖北江陵)	湖北江陵
	庆靖王	十六	10世12王,追封王1,世子1	宁夏(今宁夏银川)	宁夏同心
	宁献王	十七	5世4王,追封王1	江西南昌	江西新建
	岷庄王	十八	10世9王,世子1,世孙1	湖南武冈	
	韩宪王	二十	12世12王,追封王1,世子1,世孙1	甘肃平凉	江苏南京
	沈简王	二十一	9世8王,追封王5	潞州(今山西长治)	山西长治
	安惠王	二十二	1世1王	甘肃平凉	
	唐定王	二十三	9世12王,追封王2	河南南阳	河南南阳
郢靖王	二十四	1世1王	安陆(今湖北钟祥)	湖北钟祥	
伊厉王	二十五	6世7王,追封王1	河南(今河南洛阳)	河南洛阳	

世系	始封王	齿序	王位传袭情况	封国	墓地
成祖	赵简王	三	11世9王, 追封王2, 世子1	彰德(今河南安阳)	河南安阳
仁宗	郑靖王	次	7世7王, 追封王1, 世子1, 世孙1	怀庆(今河南沁阳)	
	襄宪王	五	8世9王, 追封王2	襄阳(今湖北襄樊)	湖北谷城
	荆宪王	六	10世10王, 追封王1, 废王1	蕲州(今湖北蕲春)	湖北蕲春
	淮靖王	七	8世9王, 追封王1	饶州(今江西波阳)	江西波阳
	梁庄王	九	1世1王	安陆(今湖北钟祥)	湖北钟祥
英宗	德庄王	次	7世7王, 追封王1, 世子1	山东济南	山东长清
	崇简王	六	7世6王, 世子2	汝宁(今河南汝南)	河南汝南
	吉简王	七	8世7王, 追封王1	湖南长沙	
	徽庄王	九	4世4王	钧州(今河南禹县)	河南禹州
宪宗	益端王	六	7世7王, 追封王1	建昌(今江西南城)	江西南城
	衡恭王	七	6世7王	青州(今山东益都)	山东益都
	荣庄王	十三	7世6王, 追封王1	湖南常德	湖南常德
穆宗	潞简王	四	2世2王	卫辉(今河南汲县)	河南新乡
神宗	福忠王	三	2世2王	河南(今河南洛阳)	河南孟津
	瑞王	五	1世1王	陕西汉中	被张献忠杀死于重庆
	惠王	六	1世1王	荆州(今湖北江陵)	客死广西, 一说被杀于广东
	桂端王	七	2世3王, 世子1	衡州(今湖南衡阳)	客死苍梧(今广西梧州)

关于表一,有如下几点需作说明:

第一,表中所列始封王之封、谥号以及王位传袭情况均以《明史》中的《诸王传》和《诸王世表》为准,惟其中晋、德、益、衡、福诸藩条目与该书中的有关记载有异,系笔者根据出土诸王墓志以及其他文献资料订正^①。此外,秦、庆、韩等府亦有类似情况,容当另文专述。

第二,诸皇子受封后因过削封除国、本身未得以王礼葬者表中不列,如太祖第七子齐王朱榑、第十九子谷王朱橞,成祖次子汉王朱高煦等;生而未受封而殇,未得以王礼葬者亦不列,如太祖第二十六子朱楠、英宗第三子朱见湜等;曾受封、但归葬北京者已记述于前,此表中亦不重复列出。

第三,“王位传袭情况”一栏中“废王”是指废旧王而另立新王,本身曾经被废而得复立者、废藩除国之末代王不计入其中;各藩末代王均按正常承袭者统计;“世子”或“世孙”指的是本身终于世子、世孙之位者;“墓地”一栏所记为始封王墓之所在地。

第四,表中涉及南明诸帝的情况比较复杂,兹稍详述如下:

(1)鲁藩第十代王朱以派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死于清兵,其五弟以海南明初袭封,曾以鲁王名义监国,后依郑成功,殁葬金门^②。

(2)唐藩九任王朱聿键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以擅自起兵勤王被废,幽禁于凤阳;弟聿模袭为唐藩十王,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被李自成兵所杀;聿键在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南京

^①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可参阅拙文:《〈明史·诸王传〉补正》(载《南开学报》1997年第2期)以及拙著《明清皇室》第二章(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等。

^② 范胜雄:《明监国鲁王三冢略记》,《台南文化》新卅七号;谢碧连:《金门文物保存——凤狮爷、鲁王墓》,《台南文化》新卅七号;台南,1994年7月。

失守后即帝位，年号隆武，命四弟聿錡袭封唐王；聿键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在福州被清兵杀害；唐王聿錡继立，年号绍武，命弟聿錡袭封唐王；绍武政权很快即亡于清兵，绍武帝自缢于广州（图3—3）^①，聿錡于永历帝败亡时自杀。



图3—3 南明绍武帝墓碑

（3）潯藩二代王朱常滂南明时曾监国于杭州，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降清，次年被杀于北京，葬地不详。

（4）福藩二代王朱由崧即南明弘光帝，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降清，被解送北京，次年遇害，葬地不详。

（5）桂端王朱常瀛死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世子早夭，次子安仁王朱由棖以序嗣立，但不久亦死去；第三子原封永明王朱由榔受隆武帝命嗣立，旋即被拥戴即位，是为南明永历帝。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永历帝被缅甸王献于吴三桂，次年四月十五日和皇太子慈烜及妃嫔同被缢杀于昆明，温睿临《南疆逸史》

^① 绍武帝及同死难者被葬于广州流花桥，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竖碑坟前，上题曰“明绍武君臣冢”。1955年，因征用其地，迁葬于越秀公园内。

谓“丛葬于云南郡城北门外”^①，但具体墓址已经失考。

(6) 韩藩 12 世 12 王，末代王韶口不见于《明史》记载；南明韩王（年号“定武”）事迹不详，表中未列。

根据这份表格，可知明朝自太祖至神宗总共有 37 位皇子开府京外，其中 31 人皆曾传之子孙，加上袭封诸王，明朝在藩亲王前后共有 266 位亲王。在这 266 位亲王中，除去各府的末代王（他们或因过被废黜而葬以庶人之礼，或被李自成、张献忠以及清兵所掳杀，不得以王礼殡葬）和南明颠沛诸王共计 36 位^②，再除去 3 位废王，这样算来实际明代应该有亲王陵 227 座。另外，各府还共有 40 位追封王和 13 位世子、世孙，按道理他们也应该按亲王规制修建或补修陵园。因此，明代两京以外应该有亲王等级的陵墓大约 280 座，它们分布在各藩王府所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宁夏、甘肃、

① 清·温睿临：《南疆逸史》纪略卷五，“永明王下”，影印清道光刊本，第 307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又，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三篇第十七章，吴三桂“得撤藩诏时，谕其属，将行，须谒永历陵。……至日，各具汉官威仪，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酹酒山呼，再拜恸哭，伏地不能起”。影印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五版，第 455 页，中华书局，1986 年。上述两说均可证永历帝葬在昆明附近。另一说则谓吴三桂杀死永历帝后，“焚尸取灰，分赐诸将”，永历帝遗骸之一部分葬于贵州都匀市郊大坪镇。见李居一：《都匀发现南明永历帝遗骸墓》，《中国文物报》1996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② 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以前数年被杀诸王如鲁王朱以派、唐王朱聿键、福王朱常洵等人应当仍然是按王礼下葬，故不计入无王陵诸王中。其中福王墓志于 1924 年在河南孟津被盗出土，内有“讣闻，上辍朝三日，特遣臧监科诸臣诣府察勘，予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厚，赐谥曰忠。更为之立庙，建坊赐额，以表其烈，竖碑以纪其事。东宫及在京文武官皆为致祭，以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于邙山之原”等语，可知福忠王朱常洵虽被杀死，但却祭葬如制。墓志全文见李献奇等：《明福王朱常洵圹志》，载《中原文物》1987 年第 3 期。

山东等 10 个省区中,另有桂端王陵墓应该在广西梧州附近。

总计,明代两京加外藩共有太子陵、亲王陵、世子陵等总计大约 320 座,其中某些幼殇者、追加封谥者和无后者陵墓的规格可能会稍次一等,保守地估计,自明初迄于明末,比较正规的亲王陵墓应当不少于二百二三十座。但这些王陵的保存情况却远远不及皇陵,有不少王陵从明末开始就遭到了破坏,李自成攻克承天府(今湖北省钟祥市)后,曾派兵掘兴献王朱祐杭(明世亲生父)之显陵,因风雷大作,“闯大惧,遂不敢动”^①。又有记载说“贼陷楚、豫诸省,每决陵求宝”^②,所掘之陵大多是明代各藩府的亲、郡王陵,甚至有新葬不久者。潞藩王妃冢亦被盗发,嗣潞王朱常淐因奏请:“贼延蔓渐及江北,凤、泗陵寝可虞,宜早行剿灭”^③。经过易代之际的扫荡,入清以后,各藩王陵祭扫无人,更缺乏有效的保护,除遭盗掘破坏以外,更多的或掩没于荆榛,或为百姓田亩所侵蚀,渐次湮没无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的明代藩王陵再度遭到严重破坏,地面地下的建筑砖瓦多被拆作他用,坟园外观则因平整土地而尽失原貌。如明仁宗第七子淮靖王朱瞻墺及其后嗣总共 8 世 9 王的陵墓原俱在江西波阳,《江西通志》记载:“明淮靖王瞻墺、淮康王祈铨、淮定王佑[祐]桀、淮庄王佑[祐]樸、淮宪王厚焘、淮恭王载垕、淮顺王载坚、未谥王翊钜、常清,清江端裕王等墓俱在鄱阳八都安山”^④。淮诸王陵墓

①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九,“李自成陷承天”,魏得良等标点本,第 354 页,中华书局,1984 年。

②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九,“附记二异”,魏得良等标点本,第 354 页,中华书局,1984 年。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传·潞简王翊穆》,标点本第 12 册,第 3649 页。

④ 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一一〇,“邱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516 册,第 649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年。

1950年代起渐次被拆毁,1970年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诸墓中出土的金器(每墓不少于约半市斤)被当地农民熔化后重铸成戒指等戴用,墓砖则用于生产队修盖猪圈,基本没有留下有价值的调查资料^①。又如位于湖北蕲春的荆藩诸王陵,分布在今蕲州镇东部、北部一带,“荆宪王朱瞻垞墓、荆靖王朱祁镐墓、都昌惠靖王朱祁鑑墓,俱在安平上乡大泉山;荆和王朱祐橧墓,在诸家湖韩家山,妃刘氏合窆;荆恭王朱翊钜墓、荆敬王朱常澐墓、荆康王朱常盗墓、都梁悼惠王朱见溥墓、都昌怀顺王朱见潭墓、樊山庄和王朱祐构墓,俱在安平上乡;樊山温懿王朱见灃墓、都昌悼僖王朱祐棖墓,俱在永福上乡;富顺王朱厚焜墓在白龙潭;富顺王朱戴[载]垞墓在白龙潭左竹林嘴;荆王朱某(应即末代王慈爨)墓,因国除无谥,寇乱时葬李公气,墓未封”^②。这些墓葬也大都在1970年前后因兴修农田水利设施而遭破坏,有些当年掘开的墓壁依然裸露,墓主身份世次已经失考。

三、明代王陵调查和发掘的基本资料

明代亲王陵的调查发掘资料十分有限,相对于总数大约320座王陵而言,只占不到五分之一,而这其中有比较完整测绘数据的又只占其中的大约一半,用做研究显然有所缺憾。为了取得更多的研究资料,本书也征引了和王陵制度相近似的王妃陵资料,作为王陵资料的补充;此外,还引用了测绘数据比较完备的郡王墓葬资料,它们在郡王墓总数中所占比例更小,但本书并不以郡王墓葬为

^① 此信息系1998年笔者在江西进行古瓷窑遗址调查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柏泉先生告知。

^② 清·英启修、邓琛纂:《黄州府志》卷四十,《冢墓》,《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346)影印清光绪十年刊本第5册,第144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研究重点,只是用来作为对比参照。现将这些资料以时代先后为序,分别制成以下三表:

表 3—2 明代亲王陵墓资料表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鲁荒王 朱檀	山东 邹城	洪武二十二年 (1389年)十二月	陵园南北长 206 米,东西宽 80 米,青砖砌成,墙基厚 1.4 米;分为前后两进,后墙辟一门通向墓室。殿基柱础等尚存,旧传还有角楼。	墓室距地表 20 余米,凿石开圹,以砖砌成,券顶。墓道后为封门墙、金刚墙,脊覆绿瓦。前后两室,间以石门,平面呈“丁”字型,通长 20.6 米,连以甬道。棺床在后室。	《文物》1972 年第 5 期,《发掘明朱檀墓纪实》。	王陵西侧 60 余米处有王妃戈氏墓,疑其东侧另有王妃常氏墓。
秦愍王 朱棣	陕西 长安	洪武二十八年 (1395年)三月	墓南向,占地面积约 8000 平方米,封土底径 51 米,高约 15 米。原有围墙、享殿等;神道石刻尚存华表、麒麟、虎、马各 1 对,翁仲、狮各 2 对,羊、碑趺座各 1 件。	未发掘。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第 109 页,《明秦王朱棣王墓》;调查资料。	主墓两侧另有陪葬墓 4 座,为王妃郑氏、王氏及嗣封之隐王、僖王、怀王、昭王等。
湘献王 朱柏	湖北 江陵	建文元年 (1399年)	墓在城西太晖观西,有封土,为衣冠冢。	1997 年 12 月被盗掘,清理出土文物 600 余件,有“湘献王宝”木玺。前、中、后三个主室,前、后两室各有 2 个配殿;总面积 109 平方米。	《中国文物报》1998 年 6 月 17 日第 1 版,《荆州城遗址》;调查资料。	王自焚而死,初谥曰“戾”;王妃同时自焚。永乐初葬衣冠。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蜀悼庄世子朱悦燊	四川成都	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	陵园建筑无存,墓穴建在山凹中。	墓顶距今地表约2米,墓室全长34.7米。前殿、中殿两侧砌出廊庑,中殿后部有左、右两个耳室,中殿中央有一圆殿,建于台基上,内有石桌三,后殿隔为三室。中、后殿各有三座门。	《考古》1978年第5期,《成都凤凰山明墓》。	永乐八年四月葬
秦隐王朱尚炳	陕西长安	永乐十年(1412年)	墓冢高约20、周长约100米,东、西偏前各有小冢一座,应为王妃。神道石刻尚存麒麟、文官、武将各1对,石马3对。	未发掘。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明秦藩王墓群调查记》;调查资料。	传盗墓人曾发现秦隐王墓志铭
伊厉王朱楹	河南洛阳	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	墓冢尚存。	墓室以青砖起券砌成,全长34.1米,分为前殿、中殿、后殿和左、右配殿,最宽处24米。前殿石门,中殿木门,后殿东、西、北壁各有一很浅的耳室(壁龛)。	《洛阳市文物志》,第133页,《明代伊王朱楹墓》。	1976年在王陵东侧曾出土伊厉王妃刘氏圹志。
郢靖王朱栋	湖北钟祥	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	墓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墓冢尚存,椭圆形,南北长45、东西宽30、高12米。陵园无存,地表有青砖、绿釉龙纹琉璃瓦等。	墓室青砖起券。	《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第399页,《郢靖王朱栋[栋]墓》;调查资料。	墓前原有一龟座碑一通,碑文记墓主生平。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肃庄王 朱榑	甘肃 榆中	永乐十七年 (1419年)十二月	陵园建筑无存;尚有坟墓,直径31、高11米。	墓室砖砌,拱券结构,分为前殿、中殿、后殿和左、右配殿。后殿北、东、西三面各有壁龛。前殿、后殿为石门,中殿为木门,门上涂朱漆,两配殿无门。三殿通长24米,最宽处13米。	甘肃省博物馆资料;《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明肃王墓考略》;调查资料。	墓中出土残片上有“妃……薨于永乐”等字。
辽简王 朱植	湖北 江陵	永乐二十二年 (1424年)正月 ^①	陵园东、北、西三面仍保存着50—60厘米的土围墙,现已修复;占地面积约80亩。封土呈圆形,高约4.5、直径约60米。	墓以青砖起券砌成,纵长21.8、最宽处10.6米,墓室地面自北向南倾斜,分为前殿、中殿、后殿和左、右配殿。后殿北、东、西三面有壁龛。	《考古》1995年第8期,《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	外棺无底,内棺落于棺床。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葬。
楚昭王 朱榑	湖北 武昌	永乐二十二年 (1424年)二月	陵园外墙基本完好,石基砖砌,南北长355、东西宽335、高3.3米。主要建筑有三洞拱券式宫门、金水桥、享殿前门、享殿、祭台、玄宫等。现存封土高4—8米、底径24米。	土圻砖室墓,土圻南北长16、东西宽9.6—9.8、深3.8米。长方形斜坡墓道,平长11.1米。墓单室,长13.84、宽5.78、高4.78米。有三座并列的小石门。室内自南而北为石质圻志、供桌和棺床。北、东、西三面各有一壁龛。	《文物》2003年第2期,《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	墓室略偏离陵寝中轴线。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葬。

① 据辽简王墓中出土的《辽简王圻志》记载,辽简王朱植薨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八日,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葬。但在《明太宗实录》中,此事记为同年五月,该书卷二七一,永乐二十二年五月壬午条下有“辽简王薨”;见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245页。此处从墓志说。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周定王 朱榑	河南 禹州	洪熙元年(1425年)闰七月	残存建筑基石和“御祭碑”等,还有一个青砖拱券洞。连同王妃陪葬墓,构成一个庞大的陵区。王陵前400米处有一陪葬墓,砖石砌成,有一个墓门和17个墓室,均为永乐八年(141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入葬。	墓室凿山起券,由甬道及前、后及配殿组成,纵长约40、宽34米,面积1970平方米。前殿长12.33、宽9.58米,左、右各为两配殿,长10.23—10.25、宽3.7—3.71米,有石门。寝殿长9.57、宽25.7、高15米。棺床后有壁龛。后壁并排四个墓室,皆各有石门。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321页,《明周定王墓》;《河南文物名胜史迹》,第614页,《明周定王墓》;调查资料。	曾采集到“故次妃穆氏”、“故次妃杨氏”墓志两方。
赵简王 朱高燧	河南 安阳	宣德六年(1431年)	陵园建筑已拆毁,封土高约3、周长40米。	砖石结构。已毁。由甬道、前、后室以及左右耳室等组成,砖券顶,石墓门。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77页,《赵简王墓》、《赵简王翁妃墓》。	王陵东200米有王妃翁氏墓,封土高2.5、周长20余米,现存墓碑1通。
蜀僖王 朱友壘	四川 成都	宣德九年(1434年)	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75、东西宽约120米,中轴线上仍有建筑遗迹,残留绿琉璃瓦件等。	砖石结构,券顶,三进,后殿为棺室,两旁为耳室。圮志碑在甬道。通长27.8、最宽处6.14、高5.8米。	《文物》2002年第4期,《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调查资料。	《明史》云僖王名曰“友壘”,圮志云王名曰“友壘”。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庆靖王 朱橚	宁夏 同心	正统三 年(公 元 1438 年)	陵园长方形,长 200、宽 100 米, 陵坐西朝东,在 陵区最北端。整 个陵区共有王陵 及陪葬墓 30 余 座。	未经发掘,结构不 详。	《中国考古 学年鉴· 1984 年》, 第 175—176 页,《同心县 任庄村明代 王陵》。	陵区出土 有靖王及 庄王圹 志。
梁庄王 朱瞻埈	湖北 钟祥	正统六 年(1441 年)正 月	内外两重宫墙, 仅存北部基址, 其余建筑已无 存。外茔园东西 宽 250、南北残长 200 米;内茔园东 西宽 55、南北残 长 75 米;封土连 山高 9 米。	崖洞砖室墓,前为 10.6 米长的斜坡墓 道,墓道尽头为凿 岩而成的隧洞,其 内建墓室,内长 15.4、最宽处 7.88、 高 5.3 米,分为前 后两室,各有一条 甬道和双扇石门。 后室三壁各有一小 壁龛。	《文物》2003 年第 5 期, 《湖北钟祥 明代梁庄王 墓发掘简 报》。	继妃魏氏 (卒于景 泰二年) 葬于王棺 床西侧; 陵东北约 500 米另 有一冢, 俗称“娘 娘坟”。
淮靖王 朱瞻埈	江西 鄱阳	正统十 一年 (1446 年)		墓穴长 29、宽 12 米,连同东西耳室 等共有 7 室。	《手铲下的 文明——江 西重大考古 发现》,第 522—523 页。	淮藩其他 王墓室多 为石灰榫 结构。
宁献王 朱权	江西 新建	正统十 三年 (1448 年)九 月	封土长约 50、宽 约 15 米,前有柱 础、华表等遗存。	墓顶距地表约 5 米,玄宫由前殿、次 前殿、中殿、左右配 殿、后殿组成,全长 31.7、最宽处 21.45、后室高 7.17 米。配殿及后殿无 门。后殿的左、右、 后三壁各有 1 个壁 龛。	《考古》1962 年第 4 期, 《江西新建 明朱权墓发 掘》。	正统十四 年二月 葬。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秦康王 朱志燦	陕西 长安	景泰六年(1455年)	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封土底径残长约13、高约9米,尚存墓碑1、祭文碑1、石人4、石马3、石狮2。	未发掘。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明秦藩王墓群调查记》;调查资料。	早年曾出土“大明宗室敕谥秦康王故妃陈氏墓志铭”1合。
伊安王 朱勉 塋 ^①	河南 洛阳	天顺八年(1464年)七月	在北邙山上,原有墓冢,已平。	三复三券砖砌单室,出土墓志一方。	《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第488—489页。	《明史·诸王世表》记王名勉塋,《墓志》曰勉塋。
庆康王 朱秩燧	宁夏 同心	成化五年(1469年)	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坐西朝东,长140、宽84米,东墙正中辟门、封土高20.5、底径52米。	墓室由甬道及前、中、后和左、右配五殿组成,通长18.1、最宽处13.5米,棺床在后室,后室西、南、北壁各有壁龛,券顶。墓内地面铺方砖,出土4对肱骨。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第175—176页,《同心县任庄村明代王陵》;调查资料。	以实地考察之,封土高20.5米似误记。

① 朱勉塋为伊简王庶长子,原封洛阳郡王,卒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七月,谥曰安惠。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其子谔钺继简王而立,是为伊悼王,因追谥勉塋为伊安王。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襄宪王 朱瞻埈	湖北 谷城	成化十四年 (1478年)	封土底径约50、高约15米,周围砌青砖石条。墓冢前为三级台地,落差1—2米,第一级台地上原有石碑2通,一为御祭文,一仅存龟趺座。二层台地有砖石等建筑遗迹。有神道通向山外,地表散见青砖。	条石砌单室墓,墓顶以方块石横行起券,1层,厚0.25米。前有甬道,平面呈“凸”字形。墓室内长6.4、宽4.8、高3.8米,墓室后部有石棺床。墓门石质,高1.8、宽1.3、厚0.185米。甬道内前后部分别以青砖乱石块封砌,尺寸不详。	《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明襄阳王墓调查》;调查资料。	
周懿王 朱子陞	河南 荜阳	成化二十一年 (1485年)六月	现存墓冢高2.5、底径5米。		《二十世纪郑州考古》,第247页。	
秦惠王 朱公锡	陕西 长安	成化二十二年 (1486年)	占地面积约1900平方米,封土底径23、高15米,尚存神道碑和墓碑2通、石人3件、石马2对;石麒麟、虎、羊、狮各1对。	未发掘。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第110页,《明秦惠王墓》。	王妃王氏祔葬于东侧,封土底径19、高7米。
襄定王 朱祁鏞	湖北 南漳	弘治元年 (1488年)	封土底径约30、高约5米,墓冢前残存长约8、高3—7米的石墙。散置石碑2通,分别刻正德元年、隆庆元年御祭文。	墓室情况不详。	《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明襄阳王墓调查》。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周悼王 朱安瀾	河南 郑州	弘治二年(1489年)	墓冢不存,残存神道石刻有文官、武将、马、羊各2件。		《二十世纪郑州考古》,第247页。	曾出土“皇明周荣悼世子之墓”墓志盖。
襄简王 朱见淑	湖北 襄樊	弘治三年(1490年)	封土底径约30、高约7米,墓冢前原有石砌祭台、神道,已毁。	勘探墓室,单室砖砌墓,券顶,平面呈“凸”字形。墓室内长6.2、宽2.4米。	《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明襄阳王墓调查》;调查资料。	墓东侧另有一冢,底径约20、高约5米,传为王妃墓。
宁康王 朱觀鈞	江西 新建	弘治十年(1497年)六月	位于乌溪乡润溪罗村祠堂后土阜正中。	圹室圆拱形,7层竖砖间7层平砖砌成,长5.6、宽3.92、高3.67米。朱漆棺置于圹室中央,外有木椁,椁外复有青石板的盖、墙、底;石板与圹室间以石灰、砂土拌糯米浆填实。距圹室3.3米处有厚8.4厘米的照面墙,墙上并列长方形砖龕二,内置皈依瓶1对。	《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第534页。	王墓西约6.2米处土阜边缘有元妃徐氏墓,结构同王墓,5层砖砌成,灰砂糯米浆填于圹室内,直接包裹棺木。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秦简王 朱诚泳	陕西 长安	弘治十一年 (1498年)六月	墓南向,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封土底径37米,高12米,尚存石麒麟1对,石翁仲、马各2对。	1989年暴露,出土各类彩绘仪仗俑300余件,俑座下有“清道旗”、“戟”、“笛”等70余种标识文字,现陈列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第110页,《明秦简王墓》。	
周惠王 朱同鑑	河南 荥阳	弘治十一年 (1498年)十一月	墓冢已平。	1985年大雨后露出墓室,已被盗。	《二十世纪郑州考古》,第247页。	出土墓志铭6块。
徽庄王 朱见沛	河南 禹州	正德元年(1506年)	现存墓冢高1米余,周长10米。建筑已毁,仅存三个门洞及部分石刻。	未发掘。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321页,《明徽庄墓》。	
蜀昭王 朱宾瀚	四川 成都	正德三年(1508年)五月	有馒头形土冢,土冢前为墓穴,墓穴两侧有柱洞。墓前发掘出红砂石板铺的地面,勘查出陵园墙基。	砖石拱券结构。长16.5、宽4.7—5米,分为前殿、中殿、和后殿,并排双石门,涂朱,雕饰;后殿隔为两室,有二棺。中殿和后殿各有祭案。蜀昭王及王妃刘氏分别从东、西道入葬。	《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调查资料。	旧题曰“蜀惠王陵”。出土残破圮志确认为昭王陵。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德庄王 朱见潋	山东 长清	正德十 二年 (1517 年)八 月	内外两重陵垣， 南北长 487.5、 东西宽 286.5 米，内陵垣中尚 可见官门、享殿、 配殿的遗迹。封 土南北长 13、东 西宽 19、高 5.8 米。	墓室砖石拱券结 构，分为前、后东、 后西三室，通长 17.02、通宽 11.9 米。	《考古学集 刊》第 11 辑，《山东 长清县明德 王墓群发掘 简报》。	王妃刘氏 卒于弘治 六年十二 月，先葬 于弘治九 年九月； 王正德十 三年四月 合葬。
郑懿王 朱祐樾	河南 沁阳	正德十 六年 (1521 年)		墓室砖砌，穹隆顶， 宽 5.8、进深 8.3 米，前室出土多尊 彩绘泥俑，后室有 郑懿王及王妃阎 氏、赵氏三棺及圹 志碑。	《中国文物 地图集·河 南分册》，第 205 页，《郑 懿王墓》。	
徽简王 朱祐柏	河南 禹州	嘉靖四 年(1525 年)	墓冢早年夷平， 仅存部分石刻。		《中国文物 地图集·河 南分册》，第 321 页，《明 徽简墓》。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襄惠王 朱祐 揭 ^①	湖北 谷城	嘉靖十 一年 (1532 年)	封土底径约 50、 高约 6 米。墓冢 前为二级台地， 残存砖石宫墙。 神道地表散见青 砖，原有“皇明襄 惠王神道”石匾 及牌楼。	条石砌单室墓，墓 顶以方块石横行起 券，1 层，厚 0.25 米。前有甬道，平 面呈“凸”字形。	《江汉考 古》1999 年 第 4 期，《明 襄阳王墓调 查》；调查资 料。	“皇明襄 惠王神 道”石匾 现在承恩 寺内。
荣怀王 朱厚 嬲 ^②	湖南 常德	嘉靖十 一年 (1532 年)	封土不存，墓前 原有石人、石马、 石狮等，大部分 已毁，仅存石龟 2 件。	墓室暴露，券顶砖 室。	《中国文物 地图集·湖 南分册》，第 196 页，《怀 穆王墓》。	

① 襄樊市考古队等《明襄阳王墓调查》认为：“文献记载的怀王与实陵墓名不一致，实际墓名为惠王，经庄王墓志文考证，惠王即怀王”（《江汉考古》1999 年第 4 期第 93 页）。按此说不确。据《明史》卷一〇三《诸王世表四》、卷一一九《诸王传四》记载：襄怀王朱祐材（定王之孙、简王长子）卒于弘治十七年（公元 1504 年），无子，其弟祐楨以光化郡王嗣立，是为襄康王。康王卒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无子，乃以定王曾孙、阳山郡王厚颖入嗣，是为襄庄王。庄王即位，追谥祖父阳山恭和王见滂（定王次子）为襄恭王，父阳山荣康王祐楨为襄惠王，是惠王与怀王为同祖之孙，而不是同一人。惠王歿于郡王之位，葬地在今谷城县茨河镇前庄村东北，不在襄藩诸王兆域。

② 荣怀王朱厚嬲，荣庄王嫡长子，正德十年（公元 1515 年）封世子，早卒，后以其子恭王载堉袭亲王封，因追封谥为怀王。《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本条墓主介绍作“怀穆王，原名勳，明荣庄王之子”，名、谥皆有误，据《明史》卷一〇四，《诸王世表五》改；“怀穆”或其以世子身份所得之初谥。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周恭王 朱睦㮮	河南 禹州	嘉靖十七年 (1538年)	封土不存,墓前尚有部分石刻。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321页,《明周恭王墓》。	
荣庄王 朱祐樞	湖南 常德	嘉靖十八年 (1539年)	封土不存,墓前尚存残碑及石龟2件。	墓室已被破坏,曾出土瓷器、金银器及龙纹铜镜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第196页,《荣庄王墓》。	
益端王 朱祐檠	江西 南城	嘉靖十八年 (1539年)八月	陵墓前有琉璃瓦片,在墓南约100米处有红石雕成的文官、武官、马、狮、望柱及汉白玉碑各1对。左碑已仆,右为“御祭文”。墙基范围约占地六十亩。	墓室凿山而建,红石为基,青砖砌拱。前后两室,前室长1.21、宽1.62、高2.12米,后室长5.2、宽3.62、高2.97米。左、右各一壁龛,后墙两龛,各放一圹志。棺床上并陈两副棺槨。	《文物》1973年第3期,《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檠墓发掘报告》。	王葬于嘉靖十九年八月,王妃彭氏(卒于嘉靖十六年)合葬,位右位。
襄康王 朱祐檠	湖北 谷城	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封土底径约35、高约6米。墓冢前20米处有一条长27、高3—4米的石砌墙体护坡。	条石砌前后两室,拱券结构。前甬道长1.6、宽2.15、高2.88米;石门已失,门槛犹存;砖砌封门墙。前室长2.55、宽3.45、高3.8米。后甬道长0.93、宽2.3、高2.88米,残存石门一。后室长5.65、宽4.75、高4.1米。	《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明襄阳王墓调查》。	征集到“皇帝御制襄康王圹志文”志盖1件。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益庄王 朱厚焯	江西南城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五月	土冢高出地面约7.8米,前有小池,在池前左右土台上有建筑遗迹,南为石像生文官、武将各1对、狮子1只,石碑2通。	墓门外有四道封门墙。砖砌墓室,拱券结构,前后两室,全长8.74米,有三道石门,后室左、右壁有两座壁龛,后壁原有三座壁龛,后被封堵。棺台高0.8米,台上四周加砌高1.2米的围墙,墙内填石灰,三棺置于内。	《文物》1959年第1期,《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江西考古资料汇编》,《江西南城明益王朱厚焯墓发掘简报》。	王葬于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元妃王氏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先葬;次妃万氏万历十九年合葬时,王及元妃更棺易殓。
秦□□世子朱敬钤 ^①	陕西长安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	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封土已平,尚存“赐嫡子敬钤墓碑”1通,石麒麟、马各1件。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第110页,《朱敬珍墓》。	
赵康王 朱厚煜	河南安阳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月	陵园坐北朝南,椭圆形围墙,长250、宽100、高约3米,有神道罗鼓桥、寿安山石坊、石像生7对以及享殿遗迹。原占地540亩,现存石象2、石羊1,石碑2通。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77页,《康王墓》;《河南文物名胜史迹》,第267页,《康王墓》。	陵园1943年毁于兵火。王妃郭氏、邓氏葬王墓两侧。曾出土陈妃、邓妃墓志各一方。

① 秦□□世子朱敬钤在《明史》之《诸王世表》和《诸王传》等有关秦藩的条目中均缺载,其墓碑云墓主以痘疹歿于嘉靖三十七年,推其年代可知敬钤当为秦宣王之子;其名按五行相生之义当从“金”部。《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记其名为“敬珍”不确,本书“珍”写作“钤”。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襄庄王 朱厚颀	湖北 南漳	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	封土底径约25、高约4米。冢前台地已毁,砖铺神道已埋入地下。墓西南有青石碑一,圆首方座,高3.2、宽0.8、厚0.35米,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砖石砌前后两室,平面呈土字形,拱券结构,石门。前甬道砖砌,长2、宽1.4、高2.2米。前室砖砌,长2.5、宽4、高3.2米。后甬道砖砌,长4.5、宽1.4、高2.2米。后室石砌,长4.5、宽5.7、高4.5米;后部有石棺床,长5、宽2、高0.18米。	《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明襄阳王墓调查》。	墓室已空。征集到“皇帝制襄庄王圹志文”一合。
秦宣王 朱怀埏	陕西 长安	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八月	墓南向,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封土底径29、高约7米,神道石刻尚存华表、翁仲、马及控马官、虎、羊各1对;龟趺座1件。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第110页,《明秦宣王墓》。	主墓两侧另有稍小陪葬墓2座,方志载附葬嗣王有靖王、敬王、肃王、景王等。
荆敬王 朱常澂	湖北 蕲春	万历四年 (1576年)	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封土底径约10、残高2米左右。墓前原有朱氏祠堂,早年被毁。		《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第451页,《明荆敬王墓》。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郑懿王 朱厚烷	河南 沁阳	万历十九年 (1591年)	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封土高3米。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05页,《郑恭王墓》。	
襄靖王 朱载尧	湖北 南漳	万历二十三年 (1595年)	封土底径约50、高约5米。墓西南有青石碑一,圆首方座,高3.2、宽0.83、厚0.35米,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平面呈凸字形的石室墓,内部结构不详。	《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明襄阳王墓调查》。	两次被盗掘至墓外壁或石门时被发现制止。
益宣王 朱翊钊	江西 南城	万历三十一年 (1603年)二月	墙基犹存,墓前原有石柱础、石像生等,现存有绿琉璃瓦碎片。	青砖砌成一圪三椽室,中以砖墙隔开,每室长2.4、宽1.04、高1.2米。中宣王,左元妃李氏,右继妃孙氏。每室一棺,棺上盖大石板,边缘凿成边槽搭合缝。板上浇0.8米厚的石灰糯米汁,盖顶呈覆斗状。	《文物》1982年第8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	王葬于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元妃李氏卒于嘉靖三十五年,继妃孙氏卒于万历十年。
郑端清 世子朱 载堉	河南 沁阳	万历三十八年 (1610年)	墓区面积约900平方米,封土高2.5、直径7.6米。新修砖砌围墙及墓碑,神道长126、宽10米。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05页,《朱载堉墓》。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荣定王 朱翊钫	湖南 常德	万历四 十年 (1612 年)	1956年抢救发 掘,封土高1.6、 底径20米。	墓为砖室,长17、宽 13米,分为前、后两 室。前室有石质 椅、案、灯等;后室 分为三个棺室,各 有一石雕棺座,王 妃李氏、杨氏合葬。	《中国文物 地图集·湖 南分册》,第 183页,《荣 定王墓》。	共有圹志 8块,荣定 王2块, 其余分属 二妃。
潞简王 朱翊镠	河南 新乡	万历四 十二年 (公元 1614 年)五 月	神道自南而北有 三间四柱石坊1 座和石柱2根, 石兽14对,文武 官1对,三孔石 桥1座。陵宫以 青条石砌成,内 外两重宫墙,内 垣已毁。外垣长 324、宽147、高6、 厚1.5米。分三 进院落,中院有 享殿,后院有坟 冢。	墓室距地表3.8 米,总面积185平 方米,分为甬道、前 殿、后殿和左、右配 殿。墓室以青石砌 成,拱券结构。后 室长15.63、宽6.1、 高6米,内设棺床。	《文物》1979 年第5期, 《新乡市郊 明潞简王墓 及其石刻》; 调查资料。	分为东西 两墓区, 东区为简 王墓,西 区为次妃 赵氏墓, 占地11 万平方 米。王葬 于万历四 十三年八 月。
晋裕王 朱求桂	山西 榆次	崇祯三 年(1630 年)十 一月	旧有残石、柱础 等建筑遗迹,耕 地中仍可见琉璃 瓦等,在一块约5 亩大的田地中有 一个半截孤冢。	墓室砖砌,拱券结 构,分为前、中、后 三殿,后殿最大,三 殿墙上以白粉涂 底,绘云气纹,中、 后两殿用红、黄、淡 墨三色,前殿增加 绿色,甬道石门以 及外墙涂红色。棺 床在后殿,单人葬; 圹志出土于玄宫 前。	《文物》1956 年第6期, 《明晋裕王 墓的清理工 作》。	崇祯五年 八月葬。 原报告误 以墓主为 晋藩郡 王。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益定王 朱由木	江西南城	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	地表有围墙、享殿、石碑座、石像生、琉璃瓦等残存。东距益宣王墓约200米。昭、宣、敬、定四王自东而西列葬。	青砖砌成椁室,中间以两堵0.39米厚的墙隔为三室。每室一棺,棺椁之间以及棺盖之上填石灰,圻口盖大石板。其上浇以石灰糯米汁。各室前有圻志。中定王,左元妃,右次妃,三人合葬。	《文物》1983年第2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	王崇祯七年十二月葬;元妃于黄氏卒于天启年,次妃于王氏卒于崇祯七年十月。
蜀某王	四川成都	年代不详	陵园范围东西长490、南北宽140米,占地近75亩,由神道、献殿、明楼、墓室组成,发现献殿石基、柱础及陵园的渗井、散水、排水沟等遗迹。		《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	1995年7—8月调查试掘,在王陵区较大。
蜀某王	四川成都	年代不详	三墓同在一封土堆下,直径约60、高约5米,经过夯筑。自东而西排序,1号墓为王妃史氏,2号墓为蜀某王,3号墓为王妃某氏。主墓之墓主身份不详,发掘者疑为定王(卒于天顺七年)或康王(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后又定为明晚期;还有人认为蜀末王。	墓室砖石拱券结构,1、2号墓大小、结构相同,墓门外八字墙相连。1号墓全长12.2、宽1.9、高1.2—2.3米,由前、中、后三殿以及棺室组成。每殿之间以石条封门,以石条封门,中、后殿及棺室各以砖墙封门。墓碑在中殿石门外,后殿有石祭案。墓室内四壁及顶部涂青,表面涂朱红色,浮雕出仿木屋脊、瓦当等。3号墓在西侧,全长8.9、宽1.8米,分为前殿、后殿和棺室。	《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22日第11版,《成都锦江区潘家沟村明蜀王及王妃墓》;《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	1997年11—12月发掘。墓上有“皇明显考蜀王墓”、“皇明显王妃史氏墓”等字;1号墓木棺已残,内存部分水银。

表3—3 明代亲王妃墓葬资料表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鲁荒王妃戈氏	山东邹城	正统五年(1440年)十月	与鲁荒王共陵园,墓室在王陵玄宫以西60余米处。	砖砌拱券结构,分为前后两室,通长15.2米,石门。门前有《鲁王妃圹志》。	《文物》1972年第5期,《发掘明朱檀墓纪实》。	鲁靖王生母,正统六年四月葬。
辽废王朱贵烺之妃曹氏	湖北江陵	成化六年(1470年)十一月卒或葬	靠近辽简王陵。出土墓志文有“王妃曹氏墓志”、“王妃正统四年随夫守……”、“成化六年十一月初……”等字,结合《明史·辽简王传》推断,曹氏应为原二代辽王朱贵烺之妃。	单室,砖砌。长5.2、宽3.3、高2.4米。墓门在东壁,南、北、西三壁各有一壁龛,进深0.3米。西龛内有白瓷罐1件,另两龛内各有陶房1件。	《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江陵八岭山明王妃墓清理简报》。	朱贵烺于正统四年(1439年)被废为庶人,守简王陵园。
蜀定王次妃王氏	四川成都	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九月	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50、东西宽约60米,占地约22亩。北高南低,分为三级平台,有供坝、棖星门、房屋等遗迹。	砖石结构,券顶,由封门墙、八字墙、墓门、前室、中室、后室、棺室组成,通长17.52、高5.12米。圹志碑在前室东北角。	《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295—314页,《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	蜀惠王生母,弘治九年十二月葬。
宁靖王夫人吴氏	江西南昌	弘治十五年(1502年)九月	地表有高约8米的土堆,上为黄土,下为三合土。	墓圹南北长4.1、东西宽2.7—3.48米,墓室砖砌拱券结构,仅有东西壁,南北无墙及封门砖;长2.52、宽1.32—1.6、残高1.6米。室内填黑色松香,厚约15厘米,紧裹楠木棺。	《文物》2003年第2期,《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	弘治十七年春葬。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宁康王次妃冯氏	江西南昌	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一月		墓室青砖砌成,拱券结构,分为前后两室,间以石门,前室长6.75、宽3.05、高3.35米;后室长8.52、宽3.09、高4.2米。后室置棺床,床前有圹志。左、右两壁各有壁龕二,后壁有壁龕一。	《考古》1964年第4期,《南昌明宁康王次妃冯氏墓》。	废王宸濠生母。墓西250米处另有一墓,长9.64、高4.6米,前后二室,后室有三个壁龕。
汝安王次妃晋氏	河南卫辉	嘉靖二十年(1541年)以前 ^①		墓室为砖砌单室券顶,长4.15、宽2.7米,后墙有壁龕。	《中国文物报》,1991年5月5日第1版,《卫辉清理一明亲王次妃墓》。	

① 汝安王朱祐棹,明宪宗第十一子,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之藩卫辉,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成婚,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薨,无子国除,还葬北京西山。晋氏卒年不详,但其墓既在卫辉,则落葬必当早于汝安王还葬北京的嘉靖二十年。另据《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条下记载,汝安王及妃李氏、次妃晋氏,“俱葬金山,祭以牲醴,遣内官行礼”(见《大明会典》影印本第3册,第1424—1425页),推测晋氏可能亦随安王迁葬北京金山。如此,则卫辉发掘之墓可能为空墓。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荆端王次妃刘氏	湖北蕲春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八月	地表封土呈不规则椭圆形,厚0.6至1.1米。	墓四壁和底部以三合土筑成,厚约0.45米,坐东朝西,东西长5.1、南北宽2.8、通高2.35米。墓顶两檐用青砖斜铺,中间用瓦堆成屋脊,无墓门和墓道,以石板两层做成棺室。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刘娘井明墓的清理》。	荆恭王本生祖母、追封荆庄王本生母。墓在圻春县圻州镇。
潞简王次妃赵氏	河南新乡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	在王陵西侧,无神道石刻,其余建筑结构与王陵同。陵宫坐北朝南,平面前方后圆,外垣南北长260、东西宽137、高6、厚1.5米。	墓室石砌,分为前殿、后殿和左、右配殿,结构同王陵,总面积230平方米。墓室石门,门钉横纵各8路。陵宫内墙外左右各一陪葬墓,墓室石砌,主室长8、宽4.35、高3.7米,旁有耳室。	《文物》1979年第5期,《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	原报告称“墓室距地面48米”,以实地考之,当系4.8米之误。
郑□王妃吕氏	河南博爱	不详	面积40余平方米,墓冢近平;有墓碑1通,上书“郑王妃吕氏之墓”,通高1.95米。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188—189页,《郑王妃吕氏墓》。	
潞简王妃蔡氏	河南卫辉	不详		青石砌筑,拱券顶,墓门高2、宽1.14米,雕铺首。主室面阔五间,左右耳室各一间,面积317平方米。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56页,《明潞王蔡妃墓》。	不与潞简王同兆域

表3—4 明代郡王墓葬资料表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靖江悼僖王朱赞仪	广西桂林	永乐六年(1408年)	占地约315亩,有内外陵园墙两道,外围墙长577、宽324米,内围墙长200米。神道石刻有羊、虎各1对,石人2对。		《广西文物》1987年第1期,《靖江王墓群简介》;调查资料。	
晋藩广昌悼平王朱济熈	山西太原	宣德二年(1427年)十月	地表有封土,高约15、直径约15米。王墓坐东朝西,南侧为王妃杨氏墓,北侧为刘氏墓,各相距约10米,二妃墓穴上无封土。	墓室砖砌,拱券结构。悼平王:前后两室,通长13.1米,后室置棺,长9.74、宽3.6—6.1米、高3.95—4.95米;杨妃:单室,长6.8、宽4.25、高4.5米;刘氏:前后两室,前室长4、宽3.7、高3.35米,南北各有一壁龛,后室长4.5、宽4.9、高4.25米,东壁有一壁龛。	《考古》1961年第2期,《山西太原七府坟明墓清理简报》。	王葬于宣德三年六月;悼平王妃杨氏薨于天顺二年五月,当年九月葬;“广昌安僖王母”刘氏薨于成化八年。
周藩郾陵王朱	河南荥阳	成化八年(1472年)	现存神道石刻有文官、武将各3件,羊2件、猴1件。	砖厂取土时发现砖砌墓道、土圹墓道。	《二十世纪郑州考古》,第247—248页。	

① 郾陵王身份不详,其墓在荥阳贾峪乡武庄村南,与周靖王、周懿王等墓毗邻,墓主可确定为周藩宗室。查《明史》之《诸王世表》和《诸王传》,周王位下均无郾陵王其人;《二十世纪郑州考古》一书亦未记载其姓名世系,仅云正统元年(公元1441年。对照公元纪年,此“元年”应为“六年”之误印)受封,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或有墓志为据。查《明英宗实录》卷八三,正统六年九月壬寅条下记载:“遣驸马都尉王谊等为正使、给事中寥庄等为副使,持节册封周王庶长子子埜为周世子,庶第二子子壁为通许王,庶第三子子埜为原武王,庶第四子子埜为郾陵王,庶第五子子埜为河阴王,庶第七子子埜为项城王”(见校印本《明实录》第15册,第1660页)。因此,“郾陵王”疑为“鄆陵王”之误。又,《明史·诸王世表一》记载:郾陵安僖王子埜,成化二十一年薨。诸说未知孰是,姑记于此,以俟再考。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秦藩兴 平安僖 王朱公 铄	陕西 长安	成化十 二年 (1476 年)十 一月	墓正对终南山,建于土壕断壁上,封土残高5.42米。	墓室砖砌,拱券结构,石门涂红色,前后两室。前室长3.85、宽4.25、高4米,东西各有一个壁龛;后室长9.15、宽4.1、高4.35米,东西北各有一壁龛。棺床在后室,单人葬。	《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长安四府井明安僖王墓清理简报》。	成化十三年六月葬。
郑藩河 阳怀简 王朱见 洙 ^①	河南 博爱	成化十 五年 (1479 年)	面积50平方米,墓冢近平;有残碑1通,上书“大明怀简王之墓”。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188页,《怀简王墓》。	
郑藩朝 邑荣简 王朱祁 镒	河南 博爱	成化二 十二年 (1486 年)	墓冢高近2米,面积约40平方米。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188页,《朱祁镒墓》。	墓碑毁于1958年。
宁藩乐 安昭定 王朱奠 垒	江西 新建	弘治元 年(1488 年)十 一月	王陵背靠山,封土现高3米余。	砖石砌拱券结构,双室,自金刚墙甬道至后室全长19.83米。前室长5.37、宽3.49、高3.27米;后室长7.95、宽5.35、高4.13米,东、西、北三面各有一壁龛。	《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明乐安昭定王墓清理纪实》。	弘治二年八月葬;王妃宋氏卒于成化九年,迁与王合葬。

① 怀简王墓在博爱县上庄乡乔村北,与朝邑荣简王朱祁镒墓毗邻,墓主应为郑藩某郡王无疑。查《明史·诸王世表四》,郑藩位下河阳郡王有谥“怀简”者,据以考出墓主名氏及封号、卒年。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靖江安肃王朱经扶	广西桂林	嘉靖四年(1525年)		王妃徐氏合葬,二穴并列,王左妃右,二墓室间隔以墙。墓室青砖砌券,下壁用石料,分为前后两室。后室左、右壁各有3个壁龛,后壁有壁龛1个。	《广西文物》1987年第1期,《靖江王墓群简介》;调查资料。	1972年发掘,王妃徐氏合葬,王左妃右。
肃藩某郡王①	甘肃兰州	嘉靖十六年(1537年)四月以后		墓室建在土圪内,砖砌拱券结构,朝正北。由石门、甬道、主室、耳室组成。甬道长2.25、宽1.18、高2.48米。主室东西宽7.45、南北长5.46、高3.46米。东西两壁各有一耳室,南北长1.15、东西宽1.3、高2.1米。主室四壁各砌高0.37、宽0.55、深0.55米的壁龛2个。	《考古》1960年第3期,《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	夫妻合葬,男东女西。墓中出土黑漆碗底面有“嘉靖拾陆年四月十七日监造内使”等字。

① 在《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中并未说明墓主身份,但从二龙戏珠金簪、金凤钗等出土品来看,墓主应系明朝王室贵族墓无疑。徐苹芳先生曾经认为此墓墓主是“肃王家族中的某郡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第63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笔者曾在甘肃通过多种渠道查询此墓详细资料,均未果。以墓址所在考之,墓主或为追封之肃安王朱弼柿(懿王之父),原封镇国将军。

墓主	地点	卒年	地表遗存	玄宫情况	资料出处	备注
周藩南陵庄裕王朱睦模	河南郑州	隆庆元年(1567年)	墓冢无存。原残存神道石刻有石人4件,羊2件,墓碑2通;马1对移至郑州市碧沙岗公园内。		《二十世纪郑州考古》,第247页。	二妃合葬。
伊藩万安康懿王朱典楨	河南洛阳	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	1974年冬土冢被平掉,出土万安康懿王和王妃王氏、张氏三方墓志。	砖砌拱券结构,单室,深约4米,墓室之南为墓道。	《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第490—492页,朝华出版社,2002年。	隆庆六年十一月葬。
益藩罗川瑞懿王朱常潏(?) ^①	江西南南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墓前有二龟跌座,墓左侧3米处发现有益藩“罗川瑞懿王副官夫人张氏”墓志。	椁室以三合土筑成,方形,以青砖隔为左右两室,长2.9、宽3.3,墙厚0.4米,上各覆石板。右室置一棺,左室系空圹。尸身注过水银,已成尸蜡。	《考古》1965年第6期,《江西南南城明墓出土文物》。	
周藩原武温穆王朱朝垠	河南荥阳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墓室距地面7米,坐北朝南,小砖砌,单室,长5、宽4.1、高3米左右。石面。东、西、北三面各有一壁龛,三壁龛有佛像等佛教内容的壁画,墓顶绘日月星辰。	《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荥阳二十里铺明代原武温穆王壁画墓》。	王妃张氏合葬,圹志铭称“原武温穆王元配张太妃”,可知张氏卒于王之后。

① 查《明史·诸王世表五》中有益宣王之子罗川懿王朱常潏,谥号缺字,核张氏墓志,该王应谥“瑞懿”。从该墓旁3米处出土益藩罗川瑞懿王副官夫人张氏圹志,结合《明史·诸王世表》中的有关记载,推断此墓墓主应该是益宣王第九子罗川瑞懿王朱常潏。但随葬品清单上的“万历二十一年六月”与《明史》中万历“二十九年薨”之记载有出入。该墓墓主为益藩某郡王无疑,但具体身份尚存疑。

以上三表所收录内容,均见于公开文字发表,有些以笔者调查资料补充;凡未经发表及单纯笔者个人调查资料皆不录入。

表3—2中所列54座亲王(含追谥)陵、2座亲王世子陵,表3—3中所列9座亲王妃墓、1座亲王夫人墓,涉及到秦、晋、周、楚、鲁、蜀、湘、肃、辽、庆、宁、郢、伊、赵、郑、襄、荆、淮、梁、德、徽、益、汝(安王次妃)、荣、潞诸府,共25藩;时代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十三朝。诸王墓分布于11省中的27个县市,即陕西长安,山西榆次,山东邹城、长清,河南郑州、洛阳、禹州、荥阳、安阳、沁阳、新乡、卫辉,湖北武昌、襄樊、谷城、南漳、钟祥、江陵、蕲春,湖南常德,江西新建、南昌、鄱阳、南城,四川成都,甘肃榆中,宁夏同心。有些记载中没有实质性的关于陵园或玄宫制度的资料,如《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所列“明周藩懿王墓”、“明周藩靖王墓”仅云“今墓冢已平”^①;同书“周端王墓”仅云“墓冢早年被夷平”等^②,以其无具体可供研究的资料,又不具有代表某藩封或埋葬地点的意义,皆不入于本表。至于只有墓志资料而无墓地资料者,如淮康王、淮恭王^③以及周端王^④、福忠王^⑤等,本表亦不列入。关于亲王妃墓,凡与王同穴同坟合葬者仅注明;凡与王同坟异穴合葬者,资料一并于王表中列出;凡与王异坟异穴者,不论与王

①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11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②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321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③ 淮藩靖、康、恭三王墓志现藏江西省博物馆,志文见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03—50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周端王卒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其圹志现存禹州市博物馆。

⑤ 福忠王墓志文见李宪奇等:《明福王朱常洵圹志》,载《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陵远近,均单独列入表3—3。

表3—4中所列13座郡王墓,涉及到靖江王以及秦、晋、周、宁、肃、伊、郑、益8府亲王位下,有确切纪年者为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嘉靖、隆庆、万历七朝,诸陵分布于广西桂林,陕西长安,山西太原,河南郑州、洛阳、荥阳、博爱,江西新建、南城,甘肃兰州等地。资料录入选择标准基本与亲王府相同,以其仅作参考,又稍加严格。有些名实不副者不入,如《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列有“明郑府繁昌王墓”,但云现存石碑题曰“郑府繁昌王柘城县县主之墓”^①,显然墓主并非繁昌郡王,故不列入。

第二节 明代王陵陵园形态研究

前节表3—2、表3—3所罗列的资料,揭示了明朝60余座亲王及王妃陵墓的概况,表3—4搜集了13座郡王陵墓资料,它们涉及的时间自明初迄于明末,地域也比较广泛,但遗憾的是其间仍有不少缺环,描述内容语焉不详者甚多,很难归纳出全国范围内明代藩王陵墓的统一演变规律。就陵园结构而言,因为各地藩王陵宫倒毁殆尽,资料不足征的问题尤为明显。因此,在这一节中,只能先从上述诸项资料中那些相对保存完好或有现存比较完整遗迹的王陵陵园结入手,对其所展示的若干种王陵陵园形态进行分类对比,然后再作分析研究,最后归纳出某些规律。

^①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164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一、明代王陵陵园形态

1. 鲁荒王陵园及鲁藩诸王陵

鲁荒王朱檀为明太祖第十子，“生两月而受封，幼聪慧好文学，善歌诗”，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十五岁时之藩山东兖州，以“服金石药致毒伤目，至是（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疾作而薨”^①，年仅十九岁。谥曰“荒”，葬于曲阜、邹城交界处的九龙山。据鲁荒王妃戈氏《圻志》中关于戈妃“以薨之次年（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四月十九日葬于九龙山之原”^②的记载可知，九龙山之名古已有之。九龙山形似卧龙，自西北蜿蜒而东南，从曲阜进入邹城，龙身处（在曲阜界内）曾发掘过西汉鲁王陵^③，传说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即葬于此山。鲁荒王陵正当山南龙头处，其地今属邹城。陵园建于山坡至山脚处，坐北朝南，东望卧虎山，西近玉皇山，南面为开阔的平原，陵宫门前有白马泉，为白马河之源头，正南方有一小山与陵宫遥遥相对，名朱山（一名朱雀山），墓址的选择基本符合明代皇室的风水标准。

鲁荒王陵园建筑自南而北顺山前缓坡而上（图3—4），1970年发掘时仍有部分以青砖砌成的宫墙存在，陵宫南北长206米，东西宽80米，墙基厚1.4米。南墙正中辟门三座，尚存铺砌石面的台基，其中中门道宽约3.6米，左右两侧门道各宽约3.2米，现已即其址复原为三座并列拱券式门楼，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陵宫门前有单拱石桥一座，桥下即白马泉。陵宫部分分为前、后两进院落，第一进院落北墙中间为屋宇式享殿门，三间两进式，发掘时测量中间门道宽约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校印本《明实录》第5册，第2974页。

^②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③ 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图 3—4 明鲁荒王陵享殿基址

1.5 米,现已复原为单檐歇山顶绿琉璃瓦享殿前门一座。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为享殿,台基保存基本完好,又经砌补,东西宽 33 米,南北长 24 米,前出月台。殿基上尚有角石、柱础等遗存,可以看出享殿面阔七间,进深已不太清晰,似为三间^①。发掘时调查陵园中有大石柱础,还出土有龙纹琉璃瓦,据当地故老传说早年还存有角楼^②。享殿正北即陵宫北墙有一随墙门通向墓穴,门外为现代东西走向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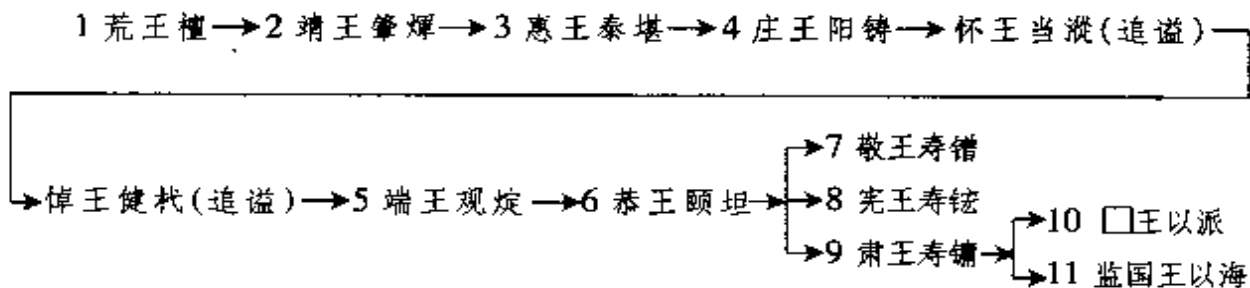
① 关于明代亲王陵园建筑物之名称,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坎坐》条下记永乐八年定制中有“享堂”、“中门”、“外门”等名(见影印本《大明会典》第 5 册,第 2730 页)。按,享堂即享殿,相当于皇陵之被恩殿,本书一般用“享殿”之名;中门即享殿前门,相当于皇陵之被恩门,本书多用“享殿前门”之名;外门即陵宫门。以后各章节同。

②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鲁王陵墓纪实》,《文物》1972 年第 5 期;路秀阁:《明鲁荒王陵——地下官殿》,第 5 页,山东友谊书社,1988 年。

路一条,与通向墓穴的道路垂直,未见两侧有宫墙遗迹。由此往北为山前缓坡,道路两旁夹列新修红墙,北部正中有帝陵式明楼一座,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明楼后有隧道通墓穴。经实地调查访谈核实,此明楼为近年仿明神宗定陵而建,不是原初陵园制度。

发掘时探明,鲁荒王玄宫深距地表 20 余米,凿石开圻,墓室之上夯筑封土,“封土铺展的面积约 1 万 3 千多平方米”^①。以现代地貌考之,所谓封土,可能只是墓室之上的回填土,与山坡原体齐平,而没有地上封土。据介绍,鲁荒王“陵区分内城和外城,修有内、外护城河,进入神道的第一座门坊是午朝门,后为单拱石桥”^②,现存陵宫宫墙应该是内城,外城已无明显遗存。从现存遗迹观察,墓穴在陵宫(内城)墙外,享殿是陵宫的核心建筑,这与明初凤阳皇陵、盱眙祖陵的制度是一致的,估计外城应将陵冢区包容在内。至于神道部分,未见有关于鲁荒王陵石像生的明文记载,现代调查亦未发现此陵有神道石刻的遗迹。

鲁藩传十世,十一王,其世系如下:



鲁后世诸嗣王并没有与始祖荒王葬在同一兆域。在九龙山东十余里的云山前官庭村曾出土《鲁靖王圻志》,可知鲁藩二代靖王

①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② 路秀闾:《明鲁荒王陵——地下宫殿》,第5页,山东友谊书社,1988年。

“葬于邹县五云山之原”^①。另据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刊刻的于慎行编纂的《兖州府志》记载,鲁藩三代惠王、八代恭王葬泗水县南三十五里的二奇山,四代庄王葬滕州东南二十里处的狐台山,五代怀王(追封)、六代悼王(追封)葬费县西南八十里的毓秀山(又名曾子山),七代端王葬费县西南洙湾山^②。九代敬王、宪王、肃王三人葬地缺载。十代王朱以派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清兵破兖州时自缢死,葬地缺载。王弟(鲁肃王第五子)朱以海南走,南明弘光时嗣王位,后曾被奉为监国,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十一月十三日病死于金门,以王礼葬于鼓冈湖畔。清代曾误将一北宋妇人之墓指为鲁王墓,并勒碑为志。1959年8月20日,当地驻军在旧金城东炸石时发现真墓,有棺椁遗骸等,并出土圹志一方,确证了墓主身世,“此墓坐西向卯,前有古岗大湖,右靠梁山;山顶多石,其顶一巨石似系人工所置,用为记号。左青龙、右白虎,天然形胜。右前大帽山麓倒塌巨石,刻有鲁王手书‘汉影云根’四字”^③。因原墓址已遭破坏,遂迁葬于金门太武山麓,重建墓园^④。

2. 楚昭王陵园及楚藩诸王陵

楚昭王朱桨为明太祖第六子,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三月生,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就藩湖北武昌府。朱桨“恭慎畏事,

①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附录),《文物》1972年第5期。

② 明·于慎行:《兖州府志》卷二三,《陵墓志》,第三至十五页,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第3册,齐鲁书社,1985年。

③ 刘占炎:《明监国鲁王墓发现经过》,《中华日报》(南部版)1959年11月14日第2版。

④ 范胜雄:《明监国鲁王三冢略记》,《台南文化》新卅七号;谢碧连:《金门文物保存——风狮爷、鲁王墓》,《台南文化》新卅七号;台南,1994年7月。

执守礼法,始终一心;在国四十余年,不非理取于民”^①。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二月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葬于武昌县龙泉山,其地今属武汉市江夏区龙泉山风景管理处。楚昭王寝园建于龙泉山主峰天马峰之下,其山为东北—西南走向,自昭王陵西折向西北为石蓬峰、观音堂山等山,往东北则依次降为龙泉二、三、四诸峰。龙泉山对面有一道自东北而西南复折向西的小山脉,分别名玉屏峰、笔架峰、龙帐峰等,与昭王陵园遥遥相对,号“五龙捧圣”。南北两列山峰之间为谷地,有古河道一条,向东北直通梁子湖,西南有陆路通武汉三镇。因两列山峰夹峙,故此山在唐初名夹山,后因有泉可占晴雨,又名灵泉山。传说宋人张芸避乱于此,构建含山楼,“楚藩废为昭寝”^②。

楚昭王寝园坐西北朝东南,有条石为基青砖砌成的内外两重宫墙,平面略呈正方形,外墙基本完好,南北长355米,东西宽335米(一说陵垣周长1528米,占地169.2亩),墙高3.3米^③(图3—5)。外墙南部正中辟宫门,石基座,砖砌拱券结构,辟门三洞,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现门为1984年修复。宫门左前方为碑亭一座,平面呈正方形,前、左、右三面各开一门,单檐歇山顶,内有赑屃驮巨碑,立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由昭王之孙楚康王朱季垵撰文,记述楚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九,永乐二十二年三月癸巳,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2439页。

^② 清·王庭楨修、彭崧毓纂:《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古迹附》,《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341)影印清同治八年刊本、光绪七年重刊本,第1册,第18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③ 梁柱、魏航空:《武昌县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第24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傅守平:《明代楚昭王朱楨墓发掘简讯》,《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蔡华初:《明楚昭王朱楨墓》,《文物天地》1993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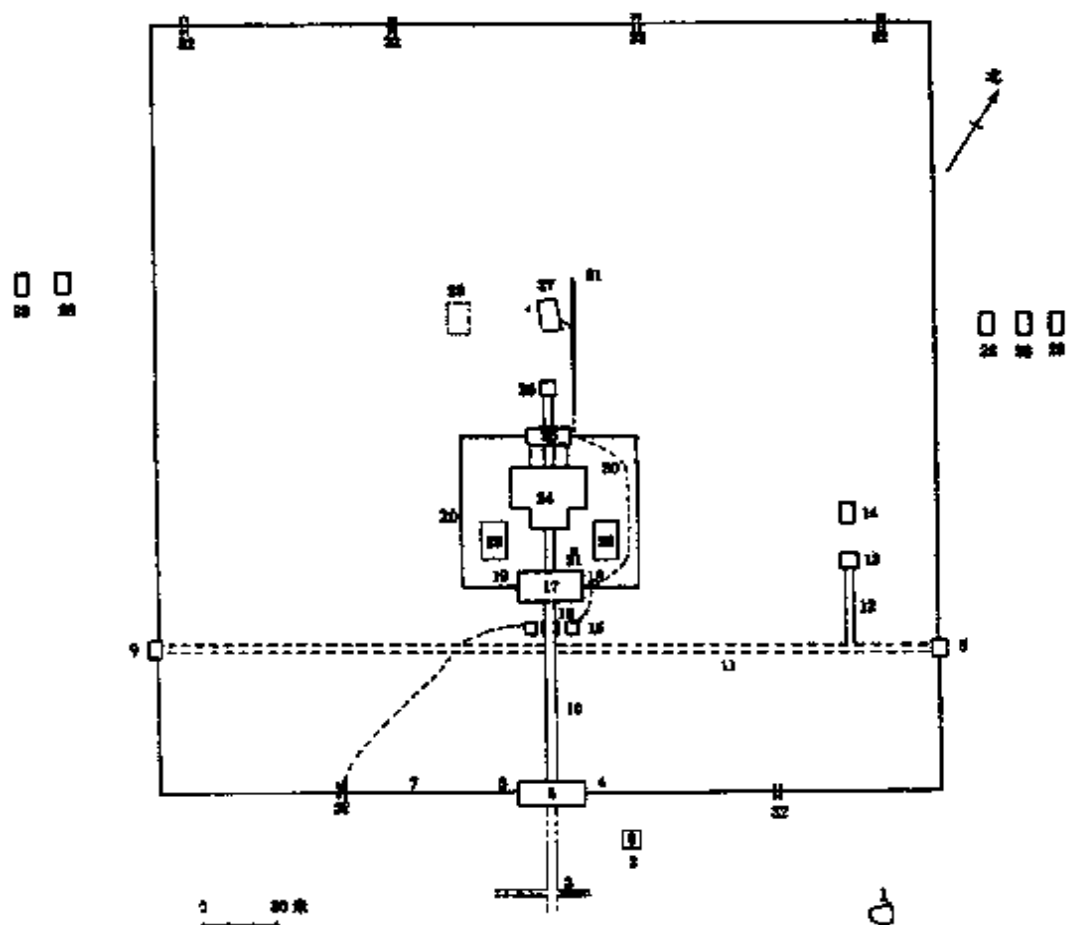


图3—5 明楚昭王陵陵园平面示意图(引自《文物》2003年第2期)

1. 荷花池 2. 碑亭 3. 外神道 4. 东角门 5. 园门 6. 西角门 7. 外垣
8. 东侧门 9. 西侧门 10. 内神道 11. 横道 12. 樊哙墓神道
13. 樊哙墓石几筵 14. 樊哙墓 15. 水池 16. 金水桥 17. 殿门
18. 东掖门 19. 西掖门 20. 内垣 21. 神帛炉 22. 东配殿 23. 西配殿
24. 享殿 25. 棂星门 26. 石几筵 27. 昭王墓 28. 夫人墓 29. 王妃墓
30. 排水暗道 31. 自然山沟 32. 泄水口

昭王生平功德及子孙分封等情况。

拱券式宫门以内正中为白条石铺砌的神道,神道北端有一字并列的三座单拱石桥。石桥以南有一条与主神道十字交叉的东西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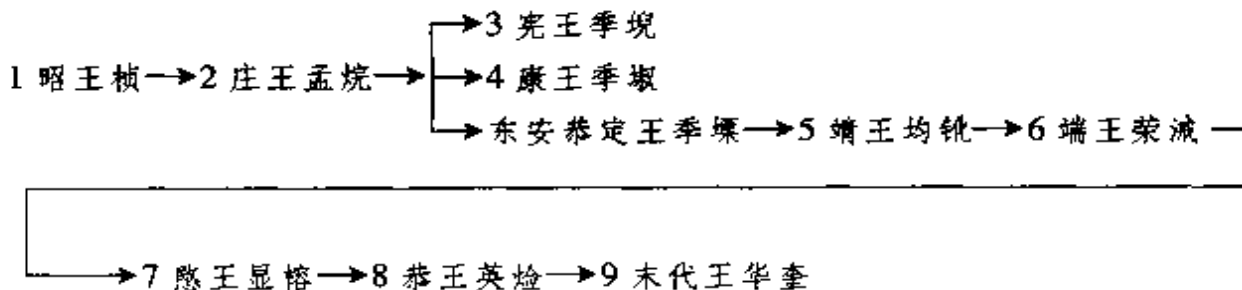
图 3—6 明楚昭王陵金水桥、享殿

路,直通向陵园的外宫墙,道路尽处各辟一门,是为陵宫外垣的东、西宫门。二门均为砖石拱券结构,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券门一洞。金水桥北为享殿门,是为内宫城的正门,基址尚存,从现存柱础可以看出原制为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台基前有月台,三出陛阶,中道有丹陛石,台基环以汉白玉石栏板。门址以北为享殿,1988年即原址修复,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总建筑面积451平方米,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殿前有月台,三出陛阶,左右各一出陛阶;周围环以汉白玉石栏板。殿前左右为东、西配殿,已复原,面阔三间,悬山顶;东配殿前有焚帛炉一座(图3—6)。享殿后为砖石拱券门一座,辟门三洞,单檐庑殿顶,覆绿琉璃瓦,前有月台与享殿台基相接。此券门为内宫城之北门,形制和功用均与南京孝陵、北京长陵之内红门相似。

券门以北,正中为一座低矮的石砌祭台,平面呈正方形。据当地流传的《朱氏宗谱》记载,台上原有石条案一,上置石香炉一、石花瓶和烛台各二,现有复制品,其制仿北京昌平诸皇陵之石几筵。由此向

北顺山坡而上到达玄宫,现已修成阶梯。玄宫前面有一座三开间的宫殿式建筑,称为“明楼”,经访谈核实为原制所无,系现代为保护玄宫入口及方便参观而建。在玄宫发掘以前原封土底径 24 米,现存封土高 4—8 米、底径 24 米(一说封土厚 2 米)。按,楚昭王陵与鲁荒王陵相似,皆为在山坡凿建墓室,其封土在某种程度上与山体很难分开,昭王陵冢测量高度差别或即因此而产生。

楚藩传八世,共九王,其世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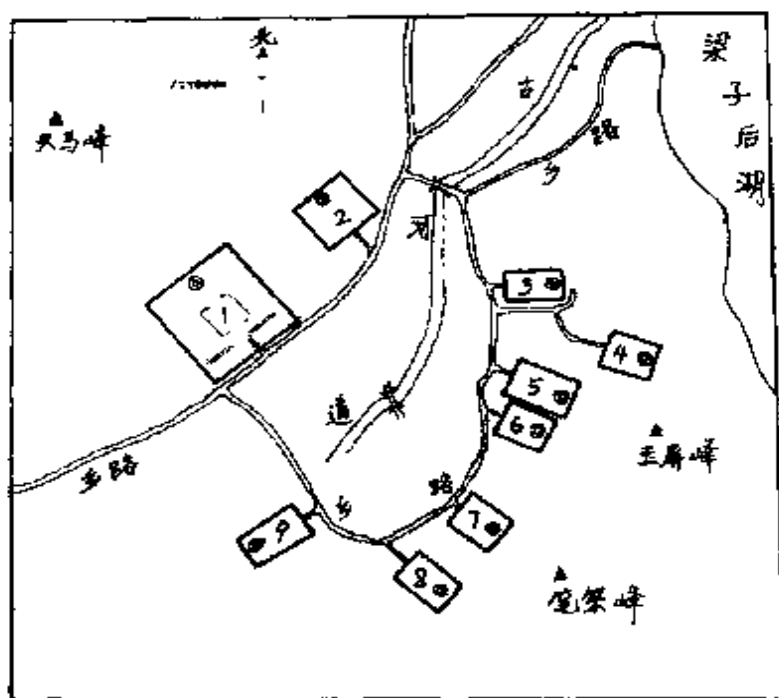
楚藩后世嗣王皆葬于龙泉山,与昭王同兆域。昭王园寝之左旁又次峰下为楚宪王园寝,坐西北朝东南。其余诸王园寝皆在天马峰对面,与昭王园寝隔古河道相望,自东北而西南依次为楚庄王园寝、楚愍王园寝、楚恭王园寝、楚靖王园寝、楚端王园寝、楚末代王华奎园寝^①、

^① 楚藩末代王华奎于万历八年(公元 1580 年)嗣王位,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被张献忠沉于长江,宗人觅尸葬之。陵园后部坟冢有三,呈“品”字形排列,华奎在上,二妃在下。1990 年代中期,“品”字右下之墓室被不法人员挖开,文物部门清理出土了《楚八代国君继妃张氏墓志》一方,现存于楚昭王陵享殿内。志文称张氏“偕予在宫五十一载”,“妃生于隆庆六年十月十六日,薨于崇祯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奉诏葬于崇祯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合圻于灵泉之长寿山”。从世次、年代和在王位五十年以上等几方面因素考察,都可证此墓志文应系楚藩末代王华奎亲撰,从而进一步确认了其葬所。该陵园范围内尚有柱础、石条等建筑遗存,推测可能是华奎生前预营之寿域,或为继妃墓园。据武汉市考古研究所所长魏航空先生告知,华奎墓曾经钻探,但仅探出三块大石,未发现墓室。又,当地人名华奎墓曰“贺王陵”;考“贺”非溢法用字,疑其陵之得名或与末王王妃(元妃?)姓氏有关。

楚康王园寝。这八座楚王园寝亦皆建于山脚至山坡处,朝向随山势走向,其中庄王园寝朝正西,康王园寝朝东北,其余诸陵园皆大致为坐东南朝西北。诸王陵的排列位次看不出明显的辈分、长幼规则(图3—7)。

图3—7 明楚藩诸王陵分布示意图(据《楚天名胜龙泉山》附图改绘)

1. 昭王陵 2. 宪王陵 3. 庄王陵
4. 愍王陵 5. 恭王陵 6. 靖王陵
7. 端王陵 8. 末王陵(当地称曰“贺王陵”) 9. 康王陵



八王园寝和昭王园寝相似,亦皆有陵宫门、享殿前门、享殿、配殿、墓冢等建筑,屋顶、墙檐皆覆绿琉璃瓦;各陵宫的规模远远小于楚昭王园寝,除宪王陵外,其余各陵陵宫平面亦由正方形变为长方形,有些后墙还变成弧圆形。各园寝的宫墙现多已不存,但建筑基座、柱础、土冢等却大多依稀可辨,因陵宫缩小,土冢到享殿的距离比较近。陵冢系封土面成,不包砖,亦无“明楼”一类建筑;其中宪王陵玄宫已被掘毁,券顶暴露于外。在庄王、端王陵宫前各有一碑亭,形制和昭王陵一样,皆置于宫门前左侧,内有趺趺巨碑,分别记述二王生平功德,均由翰林院撰文。据江夏区龙泉山风景管理区主任朱德春、涂明龙等人介绍,这三座碑亭的碑座处海拔高度皆为36.82米,即位于同一等高线上,并且三座碑亭之间的直线距离都是860米,呈正三角

形布列。现在已经很难证明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当年营造时出于某种风水考虑的刻意安排。

1998年9月,笔者到武昌楚王陵区调查时,适逢愍王(朱显榕,为子所弑,卒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园寝清理发掘,该陵在整个陵区的东北角上,建在玉屏峰下,宫门(图3—8)、享殿前门、享殿、配殿、后红门等设置与昭王园寝相似,大殿台基环以汉白玉石栏板,从柱础可见原建筑面阔五间,前有月台,正面三出陛阶。陵园周围绿色琉璃瓦件等俯拾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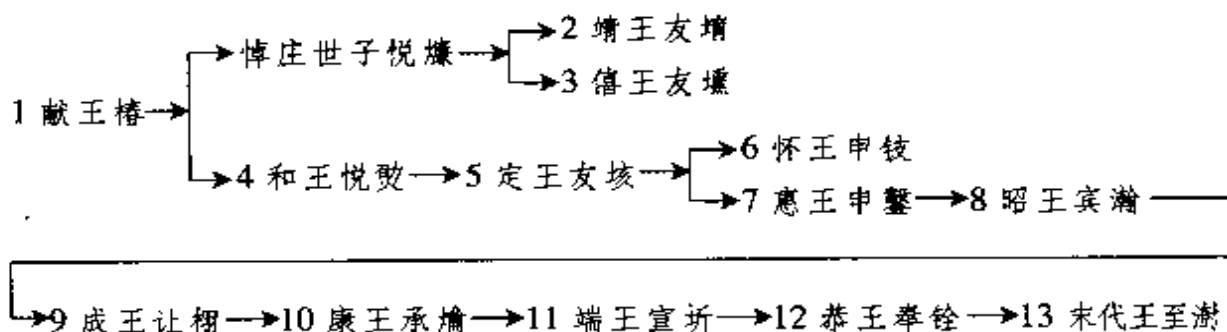
图3—8 明楚愍王陵宫门基址

3. 蜀藩诸王陵园

蜀藩始封王朱椿,为明太祖第十一子,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三月生,七岁封蜀王,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就藩四川成都府。在藩邸“潜心儒术,旁及佛老,读书为文,苦心不懈。喜延贤士大夫讲

论,或至夜分,不为声色游畋之事”^①。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朱椿同母弟谷王朱橞图谋不轨,收留获咎于父的蜀府崇宁王朱悦燊(朱椿第三子),并诡称其为建文帝,声言:“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②。朱椿闻变上告朝廷,成祖嘉其忠诚,赐书曰:“贤弟此心,周公存王室之心也”^③,赏赉颇厚。朱椿死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谥曰献王。

蜀王爵传十世,共十三王,其世系如下:



历代蜀王皆葬于成都附近,歿于嘉靖以前者,“蜀献王墓、蜀靖王墓,具成都县天回山;蜀僖王墓,华阳县正觉山;蜀怀王墓,华阳县东二十里东景山;蜀惠王墓,华阳县芳上(山);蜀昭王墓,成都县东山;蜀定王墓,仁寿县东溪山”^④。又据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记载:“蜀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七,永乐二十一年三月戊申,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2375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谷王橞》,标点本第12册,第3604页。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八,永乐十四年七月癸丑,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945页。

④ 明·刘大谟等:《(嘉靖)四川总志》卷三,《郡县志·陵墓》,影印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42册,第7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献王墓,县北三十里天回山;蜀靖王墓,县北三十里天回山;悼庄世子墓,县北十里威凤山”^①。天隰山在今成都市北郊天回镇,1970年曾在天回镇西南面的凤凰山麓清理发掘过蜀献王长子悼庄世子朱悦爌(永乐七年六月先于献王而薨)的墓^②,证明天回镇附近应该是时代比较早的蜀王陵墓区。另据清乾隆《四川通志》云:“蜀端王墓,在华阳县东十五里毓灵山;蜀昭王墓,在华阳县东二十里东山;黔江悼怀王墓、蜀僖王墓,俱在华阳县东北三十里正觉山;蜀怀王墓,在华阳县东二十里东景山;……蜀惠王墓,在华阳县东北三十里芳山”^③。嘉靖、乾隆两《志》著录的蜀王墓可以互为补充,其中蜀僖王陵于1979年发掘^④,1991年因修建成渝高速公路又发掘过蜀昭王陵^⑤。二陵皆属今成都市东郊龙泉驿区,这里也是一个蜀藩墓葬区,蜀王陵墓主要集中在十陵镇南部、洪河镇北部的黄土陇冈区域,墓主除蜀王、王妃以外,还有若干郡王、将军墓,调查共发现有大墓20余座。1995年7—8月,有关部门曾对十陵镇和洪河镇的蜀藩王陵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和小规模试掘。“调查发现,该区域内的陵墓分南北二区,北区包括3座蜀王陵、3座蜀王妃墓、2座郡王墓;南区包括3座蜀王

① 清·罗廷权等:《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舆地志第二·陵墓附义地》,影印清同治十二年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②,第71页,巴蜀书社,1992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③ 清·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卷二九上,“陵墓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0册,第57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④ 薛文:《明僖王陵及明蜀藩王墓群简介》,《成都文物》1986年第4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⑤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1991年成都市田野考古工作纪要》,《成都文物》1992年第1期;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陵,其中一座规模较大,保存相对较好的王陵属新发现”^①。现在,这一带现已经建成十陵镇“明蜀藩王陵墓群保护区”,1996年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据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熊相修《四川志》卷四记载:“(蜀)和王葬府城南八十里黄龙溪”^②。早年调查发现,在华阳县黄龙溪北岷江东岸确实有一座大墓,砖券结构,1940年代尚可见墓内砖券、石门,推测即蜀和王陵^③。

除这几处能够与明清方志相印证的陵墓外,在今成都市东南锦江区琉璃河乡的潘家沟村也发现过明代蜀王及王妃的墓葬,1997年底曾在潘家沟村一组发掘过一座无谥号的蜀王及王妃异穴合葬墓,推测其年代可能是明代晚期^④。1999年在潘家沟村十二组又发掘过蜀定王次妃王氏墓^⑤,此外,“在与潘家沟村东北面相邻的王圣乡还有一座大型明代墓葬,墓室内有龙凤雕刻,可能也是一座蜀藩王及王妃的合葬墓”^⑥,由此可以判定潘家沟村一带也是明代蜀藩王陵的分

① 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② 明·熊相修:《四川志》卷四,“园寝”,转引自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2页注释[7],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③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④ 谢涛:《成都发掘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村明蜀王及王妃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22日第1版;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谢涛:《成都市潘家沟村明蜀王、王妃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年》第224—22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主墓墓主身份不详,两侧分别为王妃史氏、次妃某氏,发掘者曾疑为定王(卒于天顺七年)或康王(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后又定为明代晚期;也有人认为是清康熙初年由四川地方官改葬的蜀末王朱至澍。

⑤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1999成都考古发现》,第295—314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⑥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1999成都考古发现》,第295—314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布区域之一。

已知历代蜀王陵的陵园建筑早已经荡然无存,有些尚存遗迹。

蜀僖王(朱友壘,卒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陵在龙泉驿区十陵镇的大梁村,建于大梁山下,朝向西南,墓向 130° 。陵园未经发掘,仅有简单的地面调查,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75米、东西宽约120米,围墙厚约1.5米,中轴线上早年仍有建筑遗迹,残留绿琉璃瓦构件等,多已因修路毁坏。陵冢凸出于陵园后墙约27米(图3—9)。



图3—9 明蜀僖王陵玄宫庠序

蜀昭王(朱宾瀚,卒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陵在龙泉驿区洪河镇白鹤村与十陵镇千弓村交界处^①,因成渝高速公路经过,1991年

^① 此墓于明末被张献忠捣毁,陵园不存,玄宫上部亦残毁。冢前旧有碑题曰“明蜀惠王陵”,因一直被指为蜀惠王陵。1991年4月发掘时出土的残圯志上有“惠王之长子也,母妃……”,“袭封蜀王,正德三……”等字,可知此墓墓主不是蜀惠王,而应该是蜀惠王嫡长子,即薨于正德三年的蜀昭王。蜀昭王陵玄宫残体已迁到正觉山蜀僖王陵旁,异地重建保护。

发掘后将玄宫残体迁至蜀僖王陵侧异地重建保护。陵园坐北朝南而微偏东,墓向 190° 。陵宫前面有神道遗迹,宽5米、长约50米左右。勘察出陵园墙基,南北长约240米、东西宽122米,分为大小相等的前后两进院落,中间建有隔墙。在陵园后部中轴线上曾发掘出一座建筑台基的遗迹,面阔约14米、进深约9米、高0.6米,周边砌以条石,中间实以夯土,地面铺小块石板,应为享殿基址。在享殿基址以北约10米处,北距玄宫门约14米处,还发掘出一道条石砌墙,附近发现有琉璃建筑构件的残体。石墙后为陵园最高一级台地,高于前面将近2米,与玄宫之上的地表连成一片。陵冢凸出陵园北墙约21米,有馒头形土冢,残高5米余、底径残长22米左右,墓穴开在土冢之前,墓口东西两侧各有9个柱洞,洞口直径0.49米,自南起第一柱洞的中心点至最北端第九柱洞的中心点间距为24.20米,东西列柱的横间距约为14米,完全罩住墓口。在两行柱洞的外侧,各有一列带状石灰浆的铺垫层,宽0.47—0.55米,靠近柱洞一边距柱洞0.8米左右,平而低于柱洞处地表约0.2米,此铺垫层应该是建筑外的散水基址遗迹。关于墓室上建筑的用途,有人认为是“明楼”,并结合蜀藩坟冢皆在墓室之后的特点,更进一步认为:“明楼后面垒土筑坟冢(宝顶),这是明蜀王陵的共通形制和统一格局”^①。按,蜀王陵的这种建筑格局不见于明代其他诸藩王陵,在历代帝王陵中亦属少见,故“明楼”之说尚待有更多资料来支持,就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看,尚不能排除此处建筑是建造玄宫时所搭盖的工棚之可能性。

蜀定王次妃王氏(惠王生母,卒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墓在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村十二组,1999年1—5月发掘,2000年初将玄宫部分迁至蜀僖王陵侧异地复原保护。该陵陵宫原建于大庆山南而

^① 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缓坡上,坐北朝南而微偏西,墓向 200° 。陵园平面呈长方形,长约250米、宽约60米,占地约22亩,自南而北分为三级台地,逐级升高。南部第一级台地未经发掘,调查中发现有大量明代建筑垃圾和红砂石铺成的地面;据说在台地的南缘,直到1950年代尚存石雕像,推测可能是门狮一类。第二级台地高出第一级台地约1米,发掘出供祭平台、牌楼门和房屋等建筑遗址。第三级台地高出第一级台地约2.5米,为玄宫和坟冢所在。

1995年成都市考古队和龙泉驿区明蜀王陵博物馆曾对龙泉驿区青龙村四组的蜀王陵陵园进行了试掘。该陵园东西长490米、南北宽140米,占地近75亩,“由神道、献殿、明楼、墓室组成,发现献殿的条石基础,柱础及陵园的渗井、散水、排水沟等遗迹”^①。另一说谓此陵园坐西朝东略偏北,墓向 290° 。分为三进院落,前、中院各长97米,后院长192米余,通宽近150米,占地面积87亩余;在陵园享殿和玄宫之间尚存一座宫门的遗址,面阔约17米、进深约7米,并列三个门道。陵园以外尚有较为明显的神道遗迹,宽约13米、长约90米,当地传说,神道前端原有一四柱三间的石牌楼,早已倒毁,北侧田土中还埋有残缺的石牌楼构件^②。关于该墓墓主,有人认为是蜀成王,也有人认为是蜀献王^③。

蜀藩诸王陵陵园地面建筑保存情况较差,只能了解大致梗概,诸陵的共同特征是:陵园呈长方形,分为二进或三进院落,陵宫门前有红砂石铺成的地面,有的王陵仍有神道遗迹,但各陵均未见有石像生或其子遗;玄宫建于较高处,其上可能还有地面建筑,其功用及名称

① 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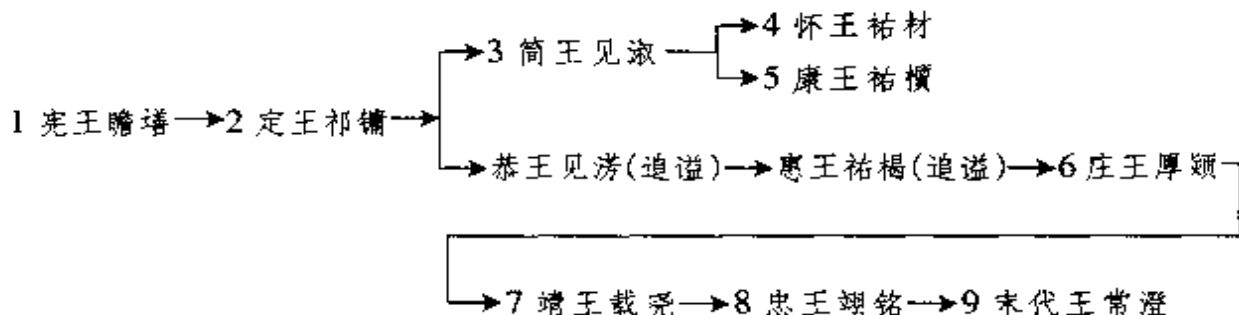
② 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③ 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陵冢在玄宫后面，而不是叠压在玄宫之上，并且凸出陵园后墙以外。有人认为诸蜀王陵封土不压在墓室之上是设置“疑冢”，其实这种形式也有可能是修筑玄宫开圻所取土的一种处理方式，或是出于某种风水意义考虑而故意为之。

4. 襄宪王及襄藩诸王陵园

襄宪王朱瞻埈，为明仁宗第五子，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封亲王，宣宗即位前后曾两度受太后命监国，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之藩长沙，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徙封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旧城区）。朱瞻埈死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谥曰宪王。襄藩王爵传8世9王，第八任王翊铭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被张献忠杀死于襄阳，其子常澄嗣为第九任王，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寄居九江，再徙汀州，《明史》云不知所终。襄藩世系如下：



襄宪王年少时即“庄敬有令誉”^①，兼以身为皇后所生嫡子，深孚众望，曾经两度有被推为天子之议。一次是宣宗崩，传闻张太后将以“国赖长君”而召立襄王，结果即位者是皇太子祁镇；另一次是“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瞻埈以年长且贤明，为人睹目，宣宗之妻孙太后也有以符节迎立襄王的打算，但最终以皇弟郕王监国。当众议未定时，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九，《诸王传·襄宪王瞻埈》，标点本第12册，第3629页。

瞻墻上书请雇募智勇双全之人伺机自瓦剌劫回英宗。奏章上至朝廷,郕王已即位数日。英宗被放回,以太上皇居南内,颇被冷落,瞻墻又上书景帝,劝他勤问兄长饮膳起居,定期率百官朝见。后来英宗复辟,赐书召瞻墻入朝,恩礼有加,赏赉颇多,敕令设襄阳护卫。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英宗再召入朝,令百官朝王于京邸,诏王诣昌平谒长、献、景三陵。瞻墻辞归,英宗又厚加赏赐,并特许他和诸子得岁时出城游猎。六年三次召见,瞻墻以年老推辞。襄宪王“于诸王中为最亲,故朝廷所以眷爱之者为最优。王小心清慎,笃于孝敬,尤为诚孝昭皇后(仁宗张皇后)所钟爱。然能守礼法,远嫌疑,故虽有异议,不为上下所疑,卒能安荣寿考,以终其天年”^①,以七十三岁高寿终于藩封。

襄宪王墓址不晚于景泰中叶已经预先选定。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四月,“先是,襄王瞻墻欲营寿藏于封内五朵山,奏乞听其预载松柏,令军余看守,待四方宁谧之时修造,户部请移文勘实。至是,湖广都、布、按三司官覆奏:此山与军民田土俱无相干,诏从王所请”^②。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瞻墻第一次入朝时,英宗“命有司为王营寿藏”^③,其陵墓在今湖北襄樊谷城县茨河镇承恩寺村殿沟^④。陵园建于山间,坐北朝南,正对五朵山,有神道通向山外,蜿蜒曲折绕山而行,地表散见青砖,可知原有青砖铺地。在山口和接近陵园处各

① 《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四,成化十四年正月己卯,校印本《明实录》第25册,第3142页。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八,《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四十六,景泰四年四月丙申,校印本《明实录》第19册,第4979—4980页。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九,《诸王传·襄宪王瞻墻》,标点本第12册,第3629页。

④ 襄樊市考古队等:《明襄阳王墓调查》,《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调查资料。



图 3—10 明襄宪王陵宫墙基址

有砖券拱桥遗迹,当地民间传说,神道上原有拱桥 99 座。陵园建筑已不存,但可看出陵冢前为三级台地(《明襄阳王墓调查》称为“拜台”),自下而上第一级台地上原有石碑 2 通,东西相距 20 米,一通螭首跌座,额篆“御制”,碑身刊明宪宗赐祭、赐谥文,由嗣王朱祁鏞刊石;另一通仅存龟跌座。碑后为第二级台地,有基座、角石、宫垣等砖石建筑遗迹,多掩没于竹林和荆莽,不易辨识(图 3—10)。据襄樊市考古队等单位调查,“第一、二级拜台平面近长方形,分别长约 50、40 米,宽约 20、30 米,高出前部地面约 1、2 米”,两层均有铺地砖残存。第三级台地上现存庵堂一座,庵堂后有墙一道,墙后为一片院落空间,再后有东西向青砖宫墙一道,西侧残存宫墙一道;有些砖上仍残留有红垩痕迹,可知当年宫墙砖外涂朱。地势由此再升高一级,即东西向青砖宫墙之后为坟冢所在,现存封土圆形,底径约 50 米、高约 15 米,周围环砌青砖石条,仿帝陵宝城式,但无明楼、城台等。西侧宫墙在冢前残断,看不出原来是否与环冢砖垣相接。这一片地域为竹林

荒草覆盖,遗迹观察难度较大。

冢前庵堂墙壁上嵌有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九月重修碑记,上有“千峰庵建自大明成化之口,经年甚久,栋宇摧颓,野蛙争聚于梵堂,圣像集尘而袈裟莫顾其肩背”等语;下记慈明法师历辛劳而重修庵堂事。据当地传说,尼姑庵原为守冢处,王坟处本无村落,“土改”后始有居民,庵堂现为几位“五保户”居住。考此庵堂位于襄宪王坟冢正前方同一纵轴线上,且在陵园墙之内,从其位置来看,应该是原王陵的享殿或享殿前门的基址,这组建筑早已不是原貌,但铺地条石等仍可见当年王室气派,绝非一般山间小庙所有,应是明代襄宪王陵宫的遗物(图3—11)。自墓冢至现庵堂一带,是当年襄宪王陵的核心区域;从种种遗迹观察,该王陵原来应有内外两重宫墙,宫门等建筑已无存,有些基址还在,御祭文碑在陵园门外东南,偏离中轴线。

襄藩后世嗣王多近宪王而葬,据清代《襄阳府志》记载:“明襄简

图3—11 明襄宪王陵享殿基址,曾改建为尼姑庵



王见淑墓在城西隆中山,《明志》谓襄藩十一墓俱在城西某山,山多易以美名,今考宪王、靖王、忠王、追封襄恭王墓俱在谷城,定王、康王墓俱在南漳,余尚无确考,旧《志》混称未足据也。怀王祐材墓在丰乐山,庄王厚颙墓在龙泉山”^①。据襄樊市考古队等单位调查,襄藩诸王墓均在今谷城、南漳两县交界处的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间,康王墓在宪王墓以西,定王墓在宪王墓以南,庄王墓在定王墓东南,靖王墓在庄王墓以南,地均属今南漳龙门镇。茆地选择,均为背靠山冈,面朝谷地,并有河水萦绕,左右矮丘对称。各王陵保存情况皆差,大多只存封土和残垣断壁、若干残碑等。襄定王陵前现存正德元年、隆庆元年御祭文碑2通;襄庄王陵、襄靖王陵前的西南方各有青石下马碑一通,圆首方座,其中庄王陵之碑高3.2米、宽0.8米、厚0.35米,上刻楷书“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八字。

襄简王墓在襄樊市襄城区隆中座山,不在襄藩诸王兆域。传说其墓即诸葛亮草庐旧址开穴,现存封土底径约30米、高约7米(图3—12),墓冢前原有石砌祭台、神道,已毁。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所建“三顾堂”一组孔明纪念建筑即应为原王陵享殿和享殿前门基址,条石神道等当系明代原物。墓东侧另有一冢,底径约20米、高约5米,传为王妃墓。

南漳县九集镇双泉寺村旧有东西并列二墓,1969年挖防空洞时被毁,出土有《阳山恭和王次妃严氏圹志铭》一合^②,据圹志得知,严氏为追谥襄惠王之生母,卒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与阳山

^① 清·恩联修、王万芳纂:《襄阳府志》卷五,《古迹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362),影印光绪十一年刊本,第2册,第407—40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② 叶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第631—632页,“双泉明墓”,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



图 3—12 明襄简王陵封土

恭和王(即追谥襄恭王)合葬。可知此地即追谥襄恭王墓之所在。

追谥襄惠王墓在谷城县茨河镇前庄村东北,封土底径约 50 米、高约 6 米;盗洞暴露于外,石券。墓冢前为二级台地,残存砖石宫墙。神道地表散见青砖,原有“皇明襄惠王神道”石榜额及牌楼(图 3—13)。



图 3—13 明襄惠王陵神道榜额

襄怀王、襄忠王葬地不详。在南漳县城北 22 公里处补林坪村有一座大墓,西北与襄庄王墓仅一岭之隔,封土底径约 50 米、高约 20

米,当地传为“襄幼王墓”^①。另外,在襄阳古城西约13公里处的一小土阜上有明代墓群,其中位于南坡的一座传为“王坟”,已被盗一空,墓砖亦被隆中大队取用;又,谷城县茨河镇石咀子村传有王妃墓及王妃侍女墓,大墓已不存,现存小墓封土底径约17米、高约3米;承恩寺村狮子山东麓有一座大墓,封土底径约20米、高约5米,当地盛传为“王坟”^②。上述这些特殊墓葬应该都是寻找二王陵墓的重要线索。

5. 德藩诸王陵园

德庄王朱见潏,为明英宗次子,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封荣王,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改封德王,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之藩济南,卒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是为德藩始封祖。据《明史》之《诸王传》和《诸王世表》记载,德王爵共传七世、六王,其中端王常瀾谥号缺载,据《长清县志》增;嗣王由枢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正月被清兵执赴盛京(今辽宁沈阳),“德藩蒙难,此本朝近三百年未有之变”^③,此后德府事缺载。据明末清初的有关记载,由枢之后尚有一德王由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七月,招抚山东河南侍郎王鳌永启报:“济南、东昌、青州、临清等州郡以次抚定,并赉送故明德王朱由棨降表”^④。可知崇祯十二年以后,明朝又曾另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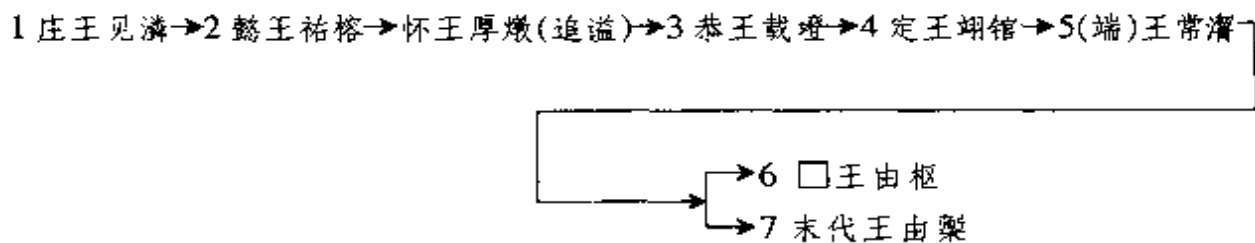
① 叶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第630页,“补林坪王墓”,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明襄阳王墓调查》(载《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一文认为补林坪王墓墓主为襄靖王。

② 叶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第536页,“十八步岭墓群”;第609页,“王坟冲墓”;第610页,“王坟洼墓”,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崇祯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礼部为保护藩封请赐敕书优奖事手本》,影印本第84册,第1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 《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丁酉,据皇史宬旧藏等清抄本影印《清实录》第3册,第67页,中华书局,1985年。

由槩为德王,其人《明史》漏载;故德府应为七世七王,其世系如下:



历代德王陵墓皆在山东长清,据清代《长清县志》“明德王墓”条下记载,“明德庄王墓(子济宁安僖王祔)、德懿王墓、德怀王墓、德恭王墓、德定王墓、德端王墓,俱在县东南四十里青崖山之阳”^①。据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长清县文物管理所调查^②,青崖山今名青崖寨山,在五峰乡东马村迤东,东西绵延二三公里,南面正对九顶莲花山,东西两侧为凤凰山、滚粟山夹峙,南大沙河自东南而西北从九顶莲花山下流过。7座王墓在青崖寨山南麓,各倚一支脉而建(图3—14),其中M4出土圻志两方,可确证为德庄王朱见潏及王妃刘氏墓。

庄王陵在诸王陵中规模最大,俗称“老王林”。陵园坐北朝南微偏西,内外两重宫垣,版筑土墙,尚存东北垣长约12.5米一段。外城南北长487.5米、东西宽286.5米,有宫门和金水桥,宫门形制不详,金水桥为单孔石拱桥,1958年拆毁。自宫门至金水桥神道东侧有2处建筑遗迹,南部的东西65米、南北22.5米,北部的东西60米、南北65米,神道西侧有1处建筑遗迹,东西85米、南北32.5米。内陵

^① 清·舒化民修、徐德城纂:《长清县志》卷十,《祠祀志下·邱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365),影印清道光十五年刊本,第73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② 鲁波:《济南市五峰山发现明德王墓》,《文物》1994年第5期;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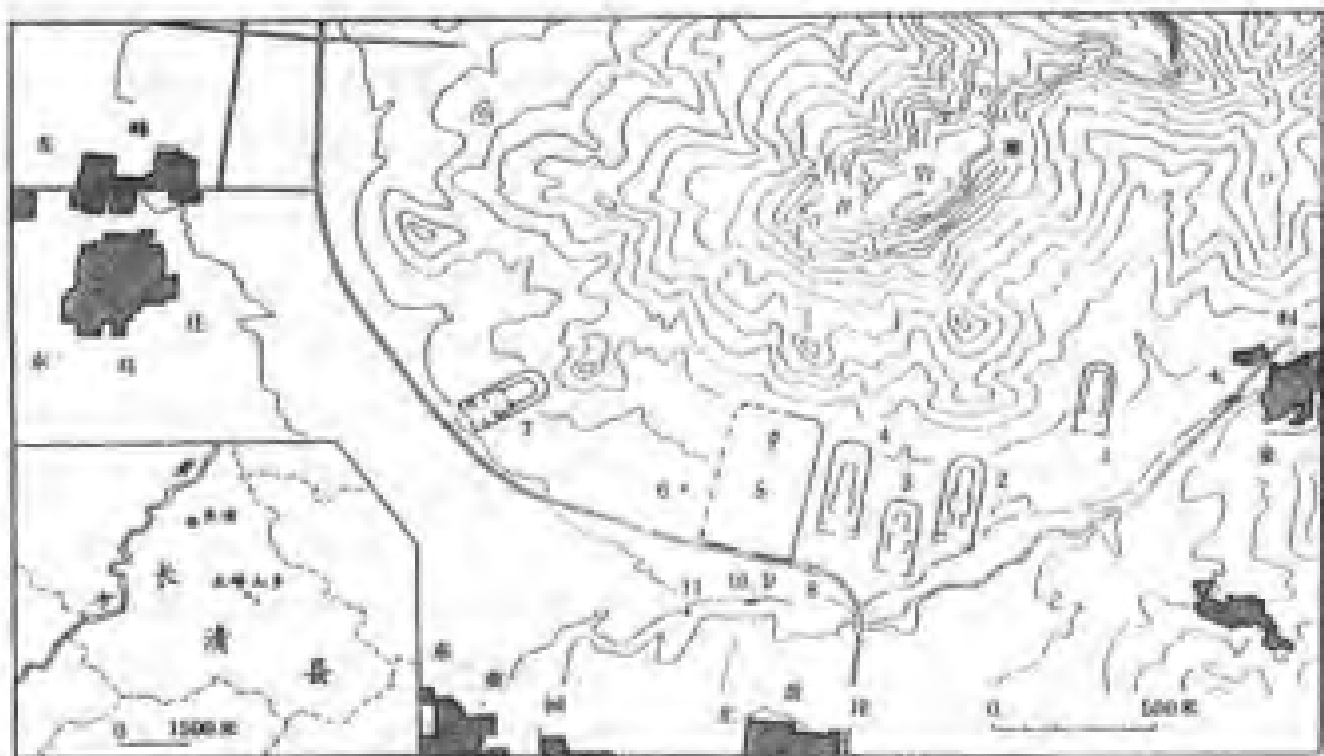


图3—14 明德藩诸王陵分布图(引自《考古学辑刊》第11辑,1997年)

1. 7号墓 2-7. 1-6号墓 8. 明代砖石拱桥 9-11 墓

垣存西侧长约85.7米一段,尚可见宫门、享殿、配殿的遗迹。封土在享殿之后,南北长13米、东西宽19米、高5.8米。

青崖寨山7座德王墓自东而西依次编号为M7、M1、M2、M3、M4、M5、M6,调查发现,除M5无地面建筑遗存以外,其余各王陵陵园结构大体相同,均为内外两重墙垣,平面前方后圆,其中M1、M3、M6地面遗迹相对保存较好,但规模都远远小于庄王陵。据说陵园神道两侧原有石像生、碑碣等,已全部毁坏。诸陵朝向,皆与M4相同,为坐北朝南微偏西,惟M6朝正西南。

M1位于整个墓群的东南部,石砌墙垣及建筑均毁,仅有遗迹可辨。外陵垣东西南三面平直,北垣呈弧形;南北长约303.5米、东西宽约118米。南部正中为陵宫门,门制不详。院落前部呈“凸”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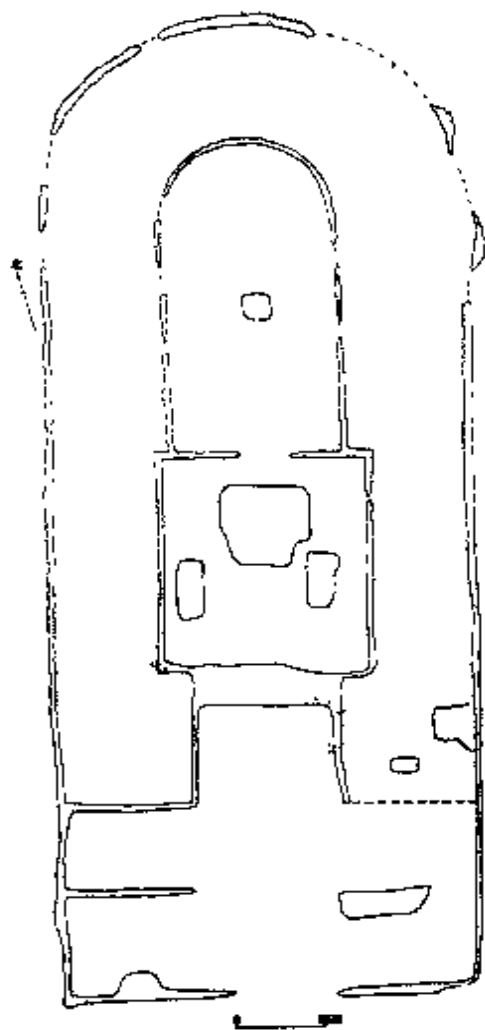


图3—15 明德藩王陵1号墓平面图(引自《考古学辑刊》第11辑,1997年)

东西两侧分别有墙垣、建筑遗迹；北部凸出之处与内陵垣相接。内陵垣内分为两进院落，通长约165米，北壁亦呈弧形。前进院落东西宽约59米、南北长约68米，南墙处有东西约42米、南北约12米的建筑遗迹，应为内陵宫门。院内北部正中有倒“凸”字形建筑基址，东西约25.5米、南北约24.5米，应为享殿所在；其前方东西配殿遗址长约18米、宽约7.5米。后进院落东西约50米、南北约95米，正中为封土，略高于地表，直径约8米(图3—15)。

俗称“东王林”的M3位于庄王陵东旁，陵园北部宫墙尚存，其结构为两面石砌，中间以石块、白灰、黄沙、粘土和糯米汁填筑(图3—16)，高5.11米、厚1.4米，顶部向两侧伸出宽约5厘米的檐。该陵外陵垣南北长约310.5米、

东西宽约117.5米，南部正中辟“八”字门，为陵宫大门；门北26米处有东西向横隔墙遗迹。内陵垣分为前后两进院落，前进院落东西宽57米、南北长66米，南部正中为内陵宫门，院内有享殿及东西配殿遗迹；后进院落东西宽50米、南北长100米，正中为封土；两进院落之间未见隔墙遗迹。



图 3—16 明德王陵区 3 号墓宫墙遗存

M6 位于整个陵区的最西部,距诸陵稍远,俗称“西王林”。其内外墙垣保存大体完好,南北长约 276.5 米,东西宽前部约 103 米、后部约 114 米。南部正中为“八”字形宫门(图 3—17),神道东侧有东西向墙基一道,西侧有东西向墙基二道。内陵垣南北通长约 151 米,分为前后两进院落。前进院落东西宽约 68.3 米、南北长约 57.8 米,内有享殿及东西配殿遗迹。后进院落东西宽约 63 米、南北长约 92 米,正中为封土,封土前之墓道与墓圻已经暴露。

德藩诸王陵自明末清初至 1960 年代前后曾数次遭到严重破坏,除 M4 以墓志断定为庄王陵外,其他诸王陵已无法从地面的遗存物来判定墓主。调查者认为:地面有建筑遗迹的是前六代德王墓,而无大规模地上建筑的 M5 之墓主则可能是世子由柷(端王长子,原封广宗王,赠谥不详)、或被俘王由枢,也可能是某位郡王。按,该墓紧靠始祖庄王陵,位置尊崇,但墓葬级别却较低,推测所葬可能是追谥之德怀王(懿王之子,卒于世子之位);如此,庄王陵东之 M3 墓主就应该是庄王之子、德藩第二代懿王。另据光绪《五峰山志》附载邵承照



图3—17 明德王陵区6号墓“八”字型宫门遗存

《游五峰山记》，有德藩诸墓“并列为九”之说，正与德藩前后七王、二世子（一人即追谥之德怀王，另一人为端王世子）之数相合。至于德府末二王由枢、由棗，可能都在入清后不久即被杀，《国榷》记载：“戊子（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四月己丑，晋王□□、周王绍□、德王□□同遇害，是日大风”^①。此德王具体为谁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德府由字辈二王都不可能兴建大规模的陵园。因而，俗称“幼王林”的M7之墓主，应该是卒于万历间的德端王庶长子□□世子由枢。另外，青崖寨山一带传说当地有“十二王林”、“二十四王林”，如果此说可信，可能还有若干郡王葬于这片兆域中。道光《长清县志》著录有“明宁海王墓、明临朐王墓、明东平王墓、明临清王墓、明泰安王墓”^②，但均未记

① 清·谈迁：《国榷》卷一〇四，弘光元年附载，张宗祥点校本，第6册，第6217页，中华书局，1958年。

② 清·舒化民修，徐德斌纂：《长清县志》卷十，《祠祀志下·邱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365），影印清道光十五年刊本，第731—732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载具体地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庄王玄宫中发现二男一女共三具人骨架,据山东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鉴定,后东室为约60—70岁老年男性,后西室为女性,前室为男性,年龄约40—45岁。据出土墓志记载,德庄王享年七十,则后室二人当分别为德庄王和王妃刘氏无疑。至于前室男子,发掘者认为是祔葬的庄王庶三子济宁安僖王朱祐梈。如果人骨鉴定无误,这种成年无后男子与父母合葬于同一墓室的现象,倒是比较罕见之例。

6. 益藩诸王陵园

益藩始封王朱祐棨,为明宪宗第六子,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之藩建昌(今江西南城),即荆王故邸而居,是为益藩第一代亲王。据《明史·益王传》记载,益国传六世、六王,末王名朱由本,“国亡窜闽中”^①。而据清乾隆官修《江西通志》记载:“按益府《世系》:常汪溢敬王,由本溢定王,长子慈炆袭封益王,乙酉(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城陷,流离播迁,薨于粤”^②。据此则益府末王应为由本之长子慈炆。益末王在弘光帝被俘后曾“捐货募士,以建昌起”而抗清^③,后至福建投奔隆武帝,再随其残部奔广东,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在广州被清兵杀害,《清世祖实录》记载在广州被杀明朝宗室成员中有“益王思炆”之名^④,应系“慈炆”之误写。1982年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九,《诸王传·益端王祐棨》,标点本第12册,第3641页。

^② 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四五,“封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4册,第46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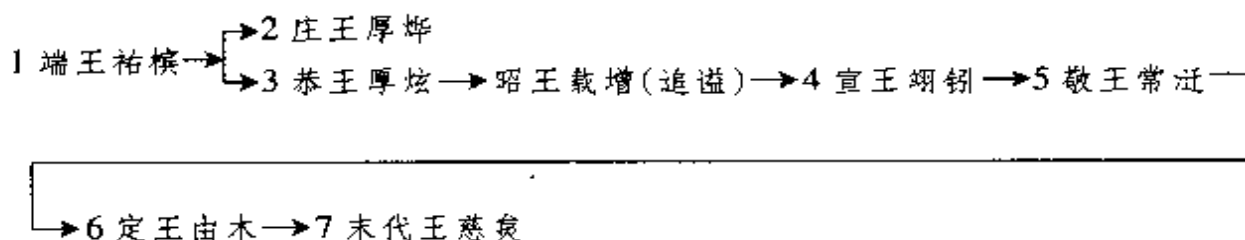
^③ 清·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四,第1268页,“益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三〇,顺治四年二月乙未,影印本《清实录》第3册,第252页,中华书局,1985年。

3月,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在南城清理了益定王朱由木及其元妃黄氏、待追封次妃王氏的合葬墓^①,出土的三方圹志,证实了《江西通志》的记载,即朱由本并非益府末王,并且揭示出“由本”之名也是以讹传讹,益定王之名应为“朱由木”。

益定王“由本”之名既属清人之误载,而“由木”也不是其本名。据1979年出土的《益宣王圹志》记载:益宣王朱翊钊共有18子、14孙,“世子之子曰由校,寔元孙也”^②。此时的益世子常汪后嗣为敬王,即定王之父。由此可知,“由校”乃是益定王的本名。益宣王死后两年的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十一月十四日,当朝皇帝(神宗)之长孙、皇太子(光宗)之长子诞生,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命皇太子第一子名”由校^③,诏告中外,从此,“朱由校”就成了皇长孙之名,此由校后来即位,改元天启,是为明熹宗。而益藩之由校最迟到熹宗登基即以卑避尊,不敢再用本名,遂去“交”存“木”,改名“由木”。

在订正《明史·益王传》中的有关舛差后,可知自端王始封迄于明末,益藩共传七世、前后七王,其世系如下:



①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②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③ 《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八,万历三十四年二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61册,第7922页。

益藩含追封共七世八王,歿后皆葬于南城,王妃合葬。乾隆《江西通志》记载:“益端王朱祐棨墓在南城金华山,益庄王朱厚焯在南城二仙山,益恭王朱厚炫在南城资圣山,益昭王朱载增在南城华盖山,益宣王朱翊钊在南城七宝山”^①。除前面已经涉及的宣王、定王二陵以外,端王陵^②、庄王陵^③也先后经过发掘,益恭王圹志亦于1987年被发现^④。益藩诸王陵墓资料较为系统完备,地面遗存较多,是研究明代亲王陵园制度及其变迁的重要资料。

益端王朱祐棨卒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八月二十四日,次年八月二十五日葬于南城县东南15公里的金华山,今其地属南城县洪门乡(曾名红湖乡)外源村。金华山南麓有一小丘陵,丘陵南端为一小山包,益端王墓室即建于此小山包之中。在小丘陵及小山包的東西两侧各有一支余脉向南延伸,陵园即建于这个范围之内。在两条支脉的内侧发现有墙基和残碎瓦片,应该是陵宫围墙的遗存。1972年发掘此墓时,在山下水田路边还见有许多琉璃瓦的残片,应为享殿遗址所在。由此再往南约100米处为红石雕成的神道石像生,自南而北依次为望柱、狮、马、武将、文官各一对。神道前左右各

① 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一一〇,“邱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6册,第64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棨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③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见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江西省博物馆内部刊印,1977年。

④ 彭桂容:《南城发现明代益恭王朱厚炫夫妇墓志》,《中国文物报》1988年4月1日第2版;墓志全文见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6—517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有石碑一通,左碑碑文已泐,右碑分别刊刻嘉靖十八年、十九年(公元1539、1540年)的御祭文。陵宫围墙范围内约有水田六七十亩。墓穴建于石质山体之中,造墓时先凿山开圻,砌成墓室后再回填土,墓顶上筑有封土,厚1.22—2米。

益庄王朱厚焯卒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五月二十二日,次年三月十七日“葬于南城县金华山水濺之原”^①,其地今属南城县洪门水库长圻村,墓所在地名殿后山。山南麓有小土丘,高出地表7.8米,土丘左右各有一条支脉向南延伸环拱,名“城山”,墓室建在小土丘之下,陵宫建于环拱的两条支脉之间。小丘前有方广各丈余的小池,池南左右各有土台,台上有琉璃瓦残片,土台之间有南北向的神道遗迹,石像生已残缺,自南而北依次为西侧石狮一只、武将、文官各一对,石像生以南东西各立一通石碑,东碑风化已甚,额篆“敕赐文”,刻致祭文四篇,西碑仅存龟趺座。

益宣王朱翊钊卒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二月二十五日,据出土圻志记载,宣王临终嘱“其葬地,当附我于昭考之侧,庶我得以追欢于地下,且不扰民也”,遂当年十二月初三日与李妃、孙妃“合葬于南城县十都七宝山,是即昭王之墓侧也”^②。今其地属岳口乡游家巷村,在南城县城北20公里。益宣王墓在游家巷村北女冠山南麓小山丘的南坡,1979—1980年发掘。当时调查得知,陵园原环以宫墙,旧有柱础、石像生等物,尚可见墙基和绿色琉璃瓦的碎片。

益定王朱由木卒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三月,当年十二月下葬。其墓也在七宝山,在益宣王陵以西约200米处,1982年发掘。墓

^① 明·翰林院撰文:《大明益庄王圻志》,见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上封土残高约3米,墓向为正南偏西8度。墓址所在的東西两侧有山丘向南延伸,中间为长150米、宽100米左右的开阔地,陵宫建于其间。发掘时尚有围墙、享殿遗址可寻,陵宫基址及其前面残留有绿色琉璃瓦的碎片,并有石像生和石碑龟趺座的残余。

游家巷村北面的女冠山全名为十都女冠山,旧名七宝山,山之南麓有许多小山丘,高出地面约7—8米;再向南,隔村舍有盱江水自东向西流过。在七宝山一带,益藩四王的陵墓原是连成一片的。据发掘者介绍,益宣王墓左侧约50米处为益昭王墓,该墓早年已被破坏。在益宣王墓西面100米处、200米处还各有一墓,后者即益定王墓。综合益宣王、益定王二陵墓地资料推断,七宝山四位益王陵墓的排列顺序应该是自东而西依次为昭王、宣王、敬王、定王,四陵在大约0.25公里的横向范围内东西毗连,分别以陵宫的宫墙和自然小山丘间隔开。

7. 潞简王陵园

潞简王朱翊鏐为明穆宗第四子,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之藩卫辉府(今河南汲县),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五月十五日薨,次年八月葬于卫辉府城西之五龙岗,其地今属河南省新乡市北郊。潞简王陵地面建筑遗存保留基本完好,可视为研究明代王陵制度、特别是王陵陵园制度的最重要实例资料。潞简王陵在民国时期曾经被盗掘一空,1978年,河南省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对陵园和玄宫做了调查和测量^①。潞简王陵园背靠海拔高度约200米的凤凰山(本名望虎山或万虎山),坐北朝南而微偏西,陵西有峙儿山,陵东原有金灯寺,今为村落。陵前旧有大潭,名“老龙潭”,现改建为蓄水池。陵园周围已经衍生为现代村落——潞王坟村,凤凰山等山体则因不断开

^①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第5期。

采石材,原生自然风貌已被彻底破坏。

潞简王陵修建于凤凰山前山脚下的缓坡地上,分为东、西两个墓区,东墓区为潞简王陵,西墓区为潞简王次妃赵氏之墓(图3—18)。

潞简王墓区陵园地面建筑分为神道和陵宫两部分。

神道南端为仿木结构三阙四柱青石牌坊一座,面阔9.4米,残高6米,石坊的梁柱上均有精细的龙纹浮雕,额坊上锈“潞藩佳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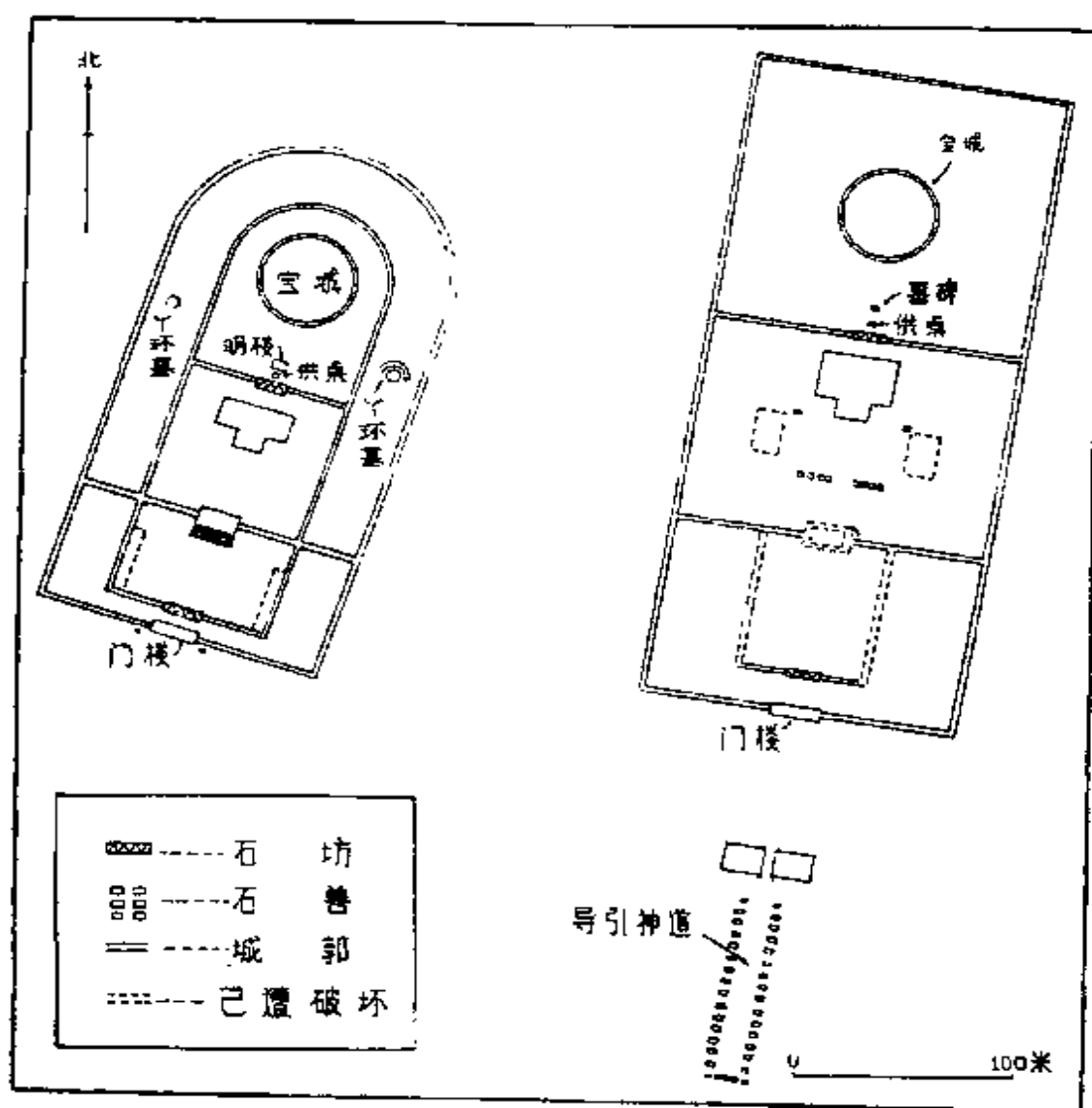


图3—18 明潞简王陵园平面示意图(引自《文物》1979年第5期)

字。牌坊的东西两侧各有方柱形青石雕龙望柱一根,残高 5.5 米。由此往北为神道石像生,其形象多为怪异之兽。据笔者 1999 年 1 月调查所见,自南而北依次为狮子、有鳞带翼鸟喙异兽、熊、无鳞羊头狮身异兽、鳄鱼状异兽、有鳞狮状异兽、羊、虎、獬豸、类麒麟形狮状异兽、麒麟、骆驼、象、马及控马官各一对,以及文官(东面)、武将(西面)各一件,共计 15 对。石兽的姿态,除羊和骆驼为卧姿、象和马为立姿外,其余皆为蹲姿^①。石像生全部为青石雕成,身高自 1.55 至 2.77 米不等,间距 4.8 米。石像生段神道总长约为 100 米,由此往北为一白条石砌成的长方形水塘,其上正中建三孔石桥,桥长 15 米,石桥北端有神道直达陵宫门前(图 3—19)。



图 3—19 明潞简王陵神道

^① 有人考证明潞简王陵神道石兽的名称,自南而北依次应为貔貅(貔)、爱居、饕(黑)、獬豸、豹(旗、程)、貔貅、羊、虎、狮、辟邪、麒麟、骆驼、象、马,所考虽未尽允当,但可备一说。见苏德荣:《潞简王陵石刻群石兽简释》,载《中原文物》2003 年第 2 期。

陵宫原有内外两重墙垣,内墙基本无存。外墙全部以青条石砌成,墙高6米,厚1.5米,南北长324米,东西宽147米,分为前、中、后三进院落。南墙正中辟宫门,条石砌拱券式,面阔22米,进深7.5米,高10.3米,辟门三洞,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门内进深18.2米处为仿木结构的四柱三阙石牌坊一座,面阔9.3米,高6.9米,枋、柱、坤石上均有精美的浮雕,额坊横书“维岳降灵”四字,正门两侧刻有楹联一副,曰“龙卧太行绵玉牒”、“凤栖瑟水濯银潢”。石牌坊两侧各有石墙向东西延伸,复折而向北衔接第二进院落宫墙,疑此牌坊为原内宫城的南墙正门。

石牌坊以北有享殿门遗址,由此进入陵宫的第二进院落,享殿前门遗址面阔20米,进深8米,现已复原为五间两进式宫门一座,中三间为门道,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第二进院落的核心建筑为享殿,遗址面阔36.5米,进深18米,前有月台,面阔16米,进深10.6米。从残存柱础推断,原享殿应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殿前左右为东西配殿。享殿月台下有石狮一对,左右分别竖立刊刻皇帝、皇太子遣官致祭的祭文石碑。复前至享殿前门之后为夹神道方形雕龙望柱一对,望柱左右各有石碑四块,亦刊刻皇帝等人祭文。

享殿后有条石砌墙一道,正中为单阙石牌坊门一座,由此进入第三进院落。石坊高5.35米,面阔5.8米。门内有石供器5件,为香鼎一、花瓶二、烛台二,五件供器之下各承以石座,其后为石条祭案一。其北为石砌碑台一座(据说原有“明楼”建筑,已经倒毁),上立方座石碑一块,自碑额至碑座通高7.4米,碑阳正楷书径尺大字“敕封潞简王之墓”,碑阴刻墓主生卒年月日时:“隆庆戊辰(二年,公元1568年)貳月初伍日寅时降生,万历甲寅(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伍月拾伍日辰时薨逝”。碑后为坟冢,仿帝陵宝顶形式,圆形,环砌以条石,高9.35米,直径40米,周长130米,内填以土,南部正中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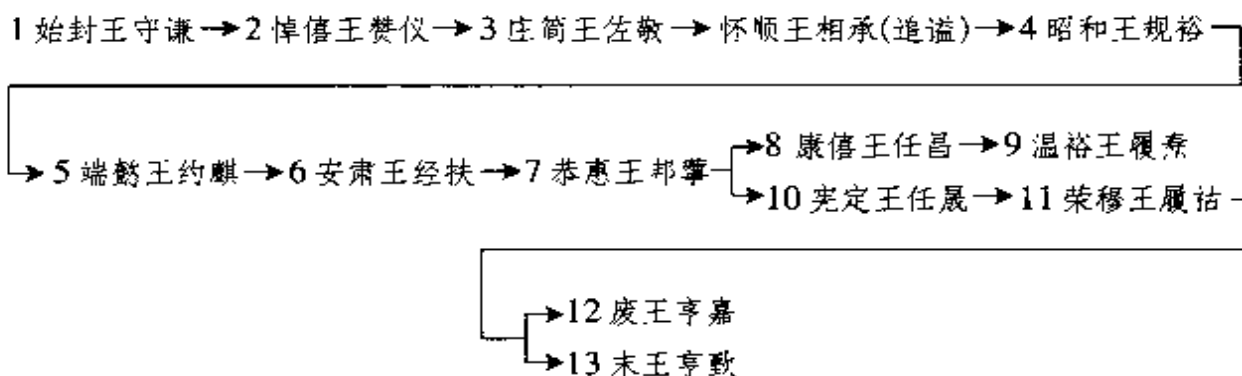
图 3—20 明潞简王陵石供器、墓碑、宝顶

券门，券门内西侧有石级可以上达冢顶，墓室在土冢之下（图 3—20）。

西墓区墓主为潞简王次妃赵氏，据《潞简王圹志》记载：“次妃赵氏，则孝定皇后钦赐随封侍陵，卒后奏请追封者”。赵氏先潞简王卒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二月，其墓园结构与潞简王陵相似，但不设神道石像生。陵宫坐北朝南，但比简王陵更略偏向西，有内外两重石砌宫墙，北垣为半圆形，外宫墙南北长 260 米，东西宽 137 米，高 6 米，厚 1.5 米。内宫墙长 210 米，宽 80 米，分成三进院落。陵宫内的建筑布局与潞简王陵相似，但大多体量比较小，建筑级别低。陵宫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拱券式三洞宫门一座（在外宫墙南部正中）、四柱三间石碑楼（由此进入内宫垣）一座、享前殿门（由此进入第二进院落）、享殿、四柱三间石碑楼（左右两间以雕花石板封堵，由此进入第三进院落）、五件石供器和条石祭案、“明楼”、坟冢。赵氏坟冢亦用条石包砌，周长 130 米，高 10 米。陵宫内墙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陪葬墓。

8. 靖江诸王陵园

靖江诸王是明太祖长兄(追封南昌王)之次子朱文正的后裔。明太祖称吴王时,曾命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诸军,数有战功。后得罪安置于桐城,未几卒。其子守谦尚幼,育于太祖宫中,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封为靖江王,“禄视郡王,官属亲王之半”^①。守谦后受命之藩广西桂林,即元顺帝潜邸改建成王宫,因过被废,居住凤阳七年;复位,徙封云南,以“暴横如故”,再招还居凤阳,后禁锢京师,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卒。其子赞仪年幼,封为世子。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袭封,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之藩桂林,子孙世袭至南明。靖江王爵共传十一代、十三王,其世系如下:



除始封王朱守谦葬南京,末二代王朱亨嘉、朱亨歆别葬于他处以外,其余历代靖江嗣王皆葬于广西桂林东北郊之尧山。陵区内“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这里有王、妃合墓十一代;厚葬次妃墓三座以及将军、中尉、宗室、王亲藩戚墓三百二十余座,整个墓群占地近一万亩”^②。各郡王陵园大多残存有宫墙、享殿等建筑遗址以及望柱、石兽、石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靖江王守谦》,标点本第12册,第3613页。

^② 罗标元等:《靖江王墓群简介》,《广西文物》1987年第1期;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明靖江王十一陵述略》,《广西文物》1987年第2期。

人等神道石刻。

尧山以隔江与舜祠相望而得名,它是桂林市周围最高的山,也是这一地区少有的土石山(无溶洞)。共有 10 位靖江王和 1 位追谥靖江王葬在封域之内,核心区域大约 5 平方公里,整个陵区范围大约南北 15 公里、东西 7 公里。

靖江悼僖王(朱赞仪,卒于永乐六年,公元 1408 年)陵位于尧山王陵区的中心,是王陵区中年代最早也是兆域最大的一座王陵,占地面积 315 亩。神道部分现存石羊、石虎各 1 对,石人 2 对,西侧之羊、虎偏置于中间,不知是否原制,神道石刻原初规制也已不可知。陵宫区地势较高,已没于草中。其南面有追封靖江怀顺王朱相承(卒于天顺二年,公元 1458 年)之墓,规模较小,占地面积仅约 30 亩。

靖江庄简王(朱佐敬,卒于成化五年,公元 1469 年)陵位于悼僖王陵东北,规模仅次于悼僖王陵,占地面积 87 亩,地面遗存较多,已经即原址复原开放。此陵朝向西南,由内外两重宫墙围起。陵园南墙正中为砖石拱券式宫门一座,绿琉璃瓦覆顶,辟门三洞,左右还各有一随墙门,门前左右有石狮一对。门内为神道,依次排列望柱、蹲狻猊、卧羊、蹲貔休、卧麒麟、马及控马官、卧象、执笏官员各 1 对,皆以青石琢成,刀法朴拙,体量小,线条比较简单,有些如卧羊、卧象等皆随石形。在石羊和石虎之间有三座一字并列的石桥,桥下小沟原为本山溪水,现已干涸。石人之后为内宫墙,南面正中为屋宇式宫门,亦即享殿前门,三间两进式,已复原,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图 3—21)。院内为享殿,石砌台基,前有月台,无栏板,陛阶三出,大殿五间三进,已即原址复原,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殿前左右(东西庑位置)有石雕宫人(或宦官)各 1 对,小半已没人土中。殿后为土冢,再后即是内宫城之北墙。



图 3—21 明清江庄简王陵神道及享殿前门

靖江恭惠王(朱邦華,卒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陵在庄简王陵的东北方,位于整个王陵区的东部,建于尧山余峰之下,地面遗址保存较为完好。陵宫门前左右两侧有石狮1对,宫门基座、陛阶基本完好,可以看出3个门道的痕迹。宫门内神道石刻依次为望柱、蹲狮、卧羊、蹲虎、蹲麒麟、马及控马官、卧象、执笏官员各1对,石人身后的神道外侧各有石碑一通,原有碑亭,墙裙尚存。石像生之后为享殿门址,三间两进式;其后为享殿遗址,五间三进式。享殿门和享殿之间左右两侧(东西庑位置)各有石雕宫人2对,这两座建筑的基座保存不甚好,但柱础大体完整。享殿之后为坟墓封土(图3—22)。恭惠王陵石刻刀法细腻,线条流畅,望柱上下两端皆饰以仰覆莲花,柱头上还有一只小蹲狮;享殿门和享殿室内的柱础也有莲花瓣装饰。

恭惠王陵右前方有次妃刘氏墓,建筑结构一应俱全,但规制较



图 3—22 明靖江恭僖王陵神道、建筑遗址及封土

低。宫门前左侧石狮已缺,神道石刻为望柱、象、獬豸、麒麟、官员各 1 对。墓室已经被挖开,单室砖券结构。

靖江康僖王(朱任昌,卒于万历十年,公元 1582 年)陵在庄简王陵的西面、悼僖王陵东北,占地面积约 9 亩,宫墙及陵宫门已经修复。宫门前左右为獬、马及控马官各 1 对,宫门三洞,左右还各有一随墙门。门内为望柱、蹲獬豸、卧羊、蹲麒麟、蹲虎、卧象、执笏官员各 1 对,左列石人背后有石碑一通。石像生以后的建筑遗址均淹没于草木之中。康僖王陵石刻刀法娴熟,表现细致入微,其中盘龙望柱尤其特色,但石刻的整体风貌柔顺有余,刚健不足,人和兽的比例也不甚协调。

靖江王陵园自明朝初年一直沿袭至明末,资料较为完备,演变脉络清晰,可以作为研究明代王陵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且靖江王虽然爵禄视郡王,但其礼制待遇却是介于亲王和郡王之间,“守谦虽封郡王,冠止七旒,禄止二千石,而设内外承奉、长史等官,宫城、

庄田、宗社之类,皆与亲王等”^①，“靖江王分国桂林府,礼数如亲王”^②。纵观尧山诸陵,其陵宫制度基本一致,皆为内外两重宫墙,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陵宫门、望柱及石像生、享殿前门、享殿、坟冢;坟冢在内宫垣内。从庄简王陵开始,石像生的内容也已经基本固定,为石兽6对、石人1对,导引以望柱1对,只是石兽的排列次序略有不同、内容小有变化。康僖王陵之石马及控马官置于陵宫门外,可能是因为陵宫内地势逼仄的一种变通。

除以上八藩之外,明朝时号称“天下第一藩”的秦王府在西安附近也留下了大量的亲王、郡王陵墓。据清代《咸宁县志》记载:“明秦愍王榑墓在洪固原上,妃邓氏、烈妃王氏祔;隐王尚炳、妃刘氏、夫人唐氏,僖王志垣,怀王志均,昭王秉榘墓俱在左右。《府志》、《旧志》又有安王、庄王墓。秦康王志瓌墓在府城南四十里少陵原,子惠王公锡墓祔(《府志》),惠王妃王氏合祔(《碑记》)。秦简王诚泳墓在韦曲原,定王惟焯墓祔(《通志》)。秦宣王怀塔墓在高望原,靖王敬谿、敬王宜[谊]湣、肃王宜[谊]湮、景王存机墓俱在焉(《通志》)。永兴懿简王尚烈墓、恭宪王志璞[圻]墓并在高望原,昭僖王公铭[钰]、荣惠王诚澜、庄定王秉榘墓并在乐游原(《旧志》)。保安怀僖王尚煜墓在凤栖原,庄简王公鍊、荣穆王诚演、昭和王、靖和(引者按,漏一“王”字)诚淶墓俱在高望原(《旧志》)。兴平恭敬王尚焯、庄惠王志塿墓俱在凤栖原(《旧志》)。永寿怀简王尚烜墓在洪固原,安惠王志埴、康定王公錠、庄僖王诚淋、恭和王秉榘、荣靖王怀塔、昭宪王敬鏞墓并祔,怀顺王墓在慈恩寺北(《旧

①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郡王同亲王”,魏连科点校本,第106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三,《朝端大政十三·宗藩上》,据明天启刊本影印本第2册,第901—9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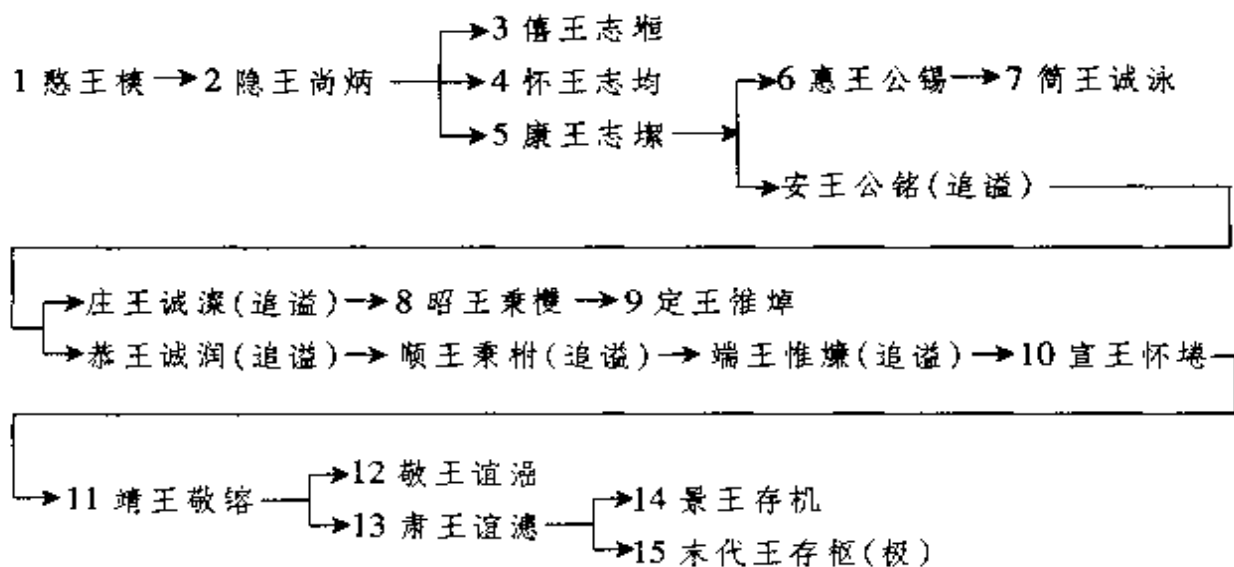
志》)。宜川庄靖王志塚墓在三兆里,荣顺王公琬、康僖王诚灌、思裕王秉栋俱祔(《旧志》)。临潼惠简王公铭墓在北里王村(《采访册》),后以孙昭王进袭,追封秦王,改谥曰安(《通志》)。郃阳恭惠王公堂(引者按,衍字)鎧墓在三爻村北(《采访册》)。汧阳端懿王公鑑墓在珍珠原,安裕王诚洌墓在洪固原(《旧志》)^①。又据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秦康王妃陈氏合祔墓在康王井东村,妃潘氏墓在西村(《墓碑》);秦藩辅国将军朱秉樾墓在三爻村南(《墓碑》)”。“已上前志不载,今补入”^②。

秦藩始封愍王朱棧,为明太祖第二子,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开府陕西西安。据《明史》之《诸王世表》和《诸王传》记载,秦府亲王爵传十一世,先后十四王,依次为:愍王棧、隐王尚炳、僖王志垣、怀王志均、康王志塚、惠王公锡、简王诚泳、昭王秉樾、定王惟焯、宣王怀塔、靖王敬镛、敬王谊湜、□(引者按,谥号缺载,据《咸宁县志》应为“肃”)王谊湜、末王存枢。据前引《咸宁县志》和《西安府志》记载,在肃王和末王之间尚有一位嗣王名存机,“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袭封,薨,谥景王,无子,王弟存极(《明史》‘极’作‘枢’)崇祯十四年袭封”^③。因此,秦藩总计应有15位亲王,其世系如下:

① 清·高廷法修、陆耀遒等纂:《咸宁县志》卷十四,《陵墓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228),影印清嘉庆二十四年修、民国二十五年重印本第1册,第695—697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

② 翁怪修、宋联奎纂:《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十,《陵墓考》,《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229),影印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第1册,第458、45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

③ 清·舒其绅等修、严长明等纂:《西安府志》卷三三,《人物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313),影印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第3册,第166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秦藩诸王陵曾经做过调查^①,但对于各陵墓主的身份世次等仍存在模糊认识,各陵地面建筑荡然无存,地下玄宫亦结构不详,惟其石像生制度颇有研究价值。

二、关于明代王陵陵园制度的讨论

鲁荒王、楚昭王及楚藩诸王、蜀藩诸王、襄宪王及襄藩诸王、德庄王及德藩诸王、益藩诸王、潞简王、靖江诸王八座(组)陵园建成年代自明初间断延续至明末,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明代亲王陵墓的陵园形态;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诸王陵园规制模拟帝陵但又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各亲王之间的陵园规制亦不尽相同,与朝廷的有关等级规定也并不完全吻合。下面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相关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分几个方面对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

1. 王陵兆域的分合

^① 王翰章:《明秦藩王墓群调查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

明代亲王墓地一般都卜选在藩府周围,其中太祖诸子之陵墓选址有些离王府较远,如周藩王府在开封,墓地在禹州、郑州等地,庆藩王府在银川,墓地在同心,其余诸藩陵墓大多卜兆域于王府之城郊。总计明朝太祖至神宗总共有 37 位皇子开府京外,其中 31 人皆曾传之子孙,这 30 余藩之王陵可以分为诸王同兆域和诸王异兆域两种分布形态。

(1) 诸王同兆域

诸王同兆域即某藩始封王及其子孙嗣王若干代毗邻而葬于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内,最典型的是湖北武昌龙泉镇楚藩诸王陵,八代九位亲王同一兆域,号称“楚藩九寝”^①;在附近的流芳岭镇还有若干楚藩郡王、王妃墓,该镇牌楼舒村即发现过楚王家族墓葬^②。和它相似的,还有德藩诸王陵,也是典型的诸王同兆域,“明德庄王墓,王名见潏,英宗第二子,成化三年就国济南,《通志》云子济宁安僖王□祔;明德懿王墓,王名祐榕,庄王子;明德怀王墓,《五峰山志》云,怀王《明史》不载,失考,盖《诸王列传》不载,而《诸王世表》则详,《历城县志》云名厚燉,懿王庶子,据《诸王世表》言之也;明德恭王墓,王名载澄,懿王孙;明德定王墓,王名翊馆,恭王子;明德端王墓,《明史·诸王列传》名常潯,《诸王世表》名常潯,定王子;以上俱在五峰东南青崖山之阳”^③。

分封在宁夏(今宁夏银川)的庆藩,也是历代亲王皆葬于同一兆

^① 清·王庭楨修、彭崧毓纂:《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古迹附》,《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341)影印清同治八年刊本、光绪七年重刊本第1册,第18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②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流芳岭明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

^③ 李起元等修、王连儒等纂:《长清县志》卷末,《五峰志略·陵墓第四》,《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9),影印民国廿四年山东省政府印刷局铅印本,第1609—161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域,诸王墓均在韦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韦州镇)。除亲王以外,庆藩诸郡王,也只有安塞宣靖王朱秩炅之墓在贺兰山干沟儿孤山之下。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庆藩之墓俱在韦州,(安塞宣靖)王生时立墓于此(指贺兰山干沟儿孤山之下)”^①。根据同书卷三中关于韦州庆藩诸陵的著录,结合《明史·诸王世表》“庆藩”条下有关记载,可知凡卒于《宁夏新志》修成的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之前的庆藩亲王、郡王,除无子封除以及因过废死者外,基本全葬于韦州兆域^②。查明末抄本《宁夏新志》可知,庆藩韦州兆域一直使用至明末。该书记载韦州庆藩诸王陵墓包括“庆靖王(始封王,太祖第十六子)墓、庆康王墓、庆怀王墓、庆庄王墓、庆恭王墓、庆定王墓、庆端和世子墓、庆惠王墓、庆端王墓、庆宪王墓;真宁庄惠王墓、康简王墓、温穆王墓、荣禧王墓、安惠王墓、恭简王墓,安化惠懿王墓、恭和王墓,弘农安僖王墓、荣惠王墓、恭定王墓、康禧王墓、恭顺王墓,丰林温僖王墓、安简王墓、端康王墓、恭懿王墓,寿阳和靖王墓、端懿王墓,延川端穆王墓,华阴端懿王墓;俱在韦州蠡山”^③。可见,庆藩不仅历代亲王葬于同一兆域,还有几乎所有的本支郡王也祔葬于其间。清代所修

① 明·胡汝砺纂修、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宁夏总镇·陵墓》,陈明猷点校本,第17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明·胡汝砺纂修、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三,《所属各地·韦州·墓》,陈明猷点校本,第2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〇二,《诸王世表·庆王》标点本,第9册,第2715—2727页。

③ 明·胡汝砺等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七,《陵墓》,《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8),影印明抄本,第340—34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按,胡汝砺主修者为《弘治宁夏新志》,在此基础上,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由宁夏巡抚杨守礼主持,管律重修成《嘉靖宁夏新志》。此影印之抄本所记述之庆藩诸王已至明代晚期,绝非弘治或嘉靖原本,当系明末以后增补抄本,或由后修之志书张冠李戴亦未可知;惟其中弘农之“弘”字不讳,故抄成必在清代乾隆纪元以前。

《宁夏府志》中“明庆王墓”条下更明确地记载说：“靖王、康王、怀王、庄王、恭王、定王、惠王、端王、宪王、端和世子，并庆藩分封之真宁、安化、宏[弘]农、丰林、寿阳、延川、华阴诸王墓，俱在灵州韦州堡蠡山”^①。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1980 年代的普查资料表明：明代庆藩墓区在今同心县城东北约 90 公里的大罗山麓，东距韦州古城 5 公里，墓区范围 260 平方公里，现存土冢 34 座，多于《宁夏新志》所开列的 31 座。这些陵园，“规模较大的墓葬多有长方形陵园，地面散布琉璃砖瓦；规模小的墓葬周围则散布灰陶砖瓦，而且有琉璃瓦件”^②，这些墓葬规模的大小应该是墓主本人亲王或郡王身份的一种显示。韦州蠡山之首陵——庆靖王陵已于 1967 年被拆毁，文物部门只征集回一件《大明庆靖王圹志》。1999 年 9 月笔者到韦州调查时发现，大罗山（即蠡山）大体呈南北走向，诸王陵在山的东麓，多呈东西走向，封域内已严重沙漠化（图 3—23）。



图 3—23 明庆藩诸王陵所在的大罗山

① 清·张金城修，杨澆雨辑：《宁夏府志》卷四，《古迹陵墓附》，《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3），影印清嘉庆三年刊本，第 85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

②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管会编印：《文物普查资料汇编》，第 114 页，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管会，内部资料，1986 年 12 月。

河南南阳的唐藩诸王陵也在同一兆域,唐藩始祖为明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桎,从始封至崇祯末,唐国共传九世,十王,依袭次先后为定王、靖王、宪王、庄王、成王、敬王、顺王、端王、追封裕王、嗣王聿键(崇祯九年被废,后为南明隆武帝)、嗣王聿夔(死于李自成军)。据清代《南阳县志》记载:“明唐定王、靖王、唐世子,并宪、庄、成、敬、顺、端、裕诸王墓均在紫山(《明一统志》、《府志》、旧《志》),今山阳荒冢累累,碑碣无存”^①。唐藩诸郡王也有不少葬在南阳城附近,据同《志》记载:“明三城康穆王墓在城西”;“明新野王墓在城西羊山前”;“明承休昭毅王墓在城西北五里四府并,有嘉靖四十五年祭王妃王氏碑”;“明赠唐恭王(唐敬王之父,原封文城王,谥恭靖)墓在城北七里栖真原”;“明卫辉王墓在城东北五府并,有华表;明新野恭简王子镇国将军墓在城西二里”^②。

广西桂林东郊尧山的靖江王墓群,是郡王、将军等同支宗亲葬于同一兆域,封域内“有王、妃合墓十一代;厚葬次妃墓三座,以及将军、中尉、宗室、王亲藩戚墓三百二十余座”^③。这是一处总体保存状况较好的明代藩王陵墓群。

在明代诸藩中,有些是大多数亲王葬于同一兆域,只有个别亲王别葬,这种情况也可视为诸王同兆域,甘肃榆中的肃王陵即属于这种类型。肃藩始封为明太祖第十四子、肃庄王朱楨,肃藩共传九世,九

^① 清·潘守廉修、张嘉谋纂:《南阳县志》卷二,《疆域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457),影印清光绪三十年刊本,第226—227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② 清·潘守廉修、张嘉谋纂:《南阳县志》卷二,《疆域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457),影印清光绪三十年刊本,第227、229、232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③ 罗标元等:《靖江王墓群简介》,《广西文物》1987年第1期。

王,另有追封三王。据清代所修《兰州府志》记载:“肃庄王、康王、简王、恭王、靖王、定王、昭王、怀王、懿王九代墓俱在皋兰县平顶峰,按,《县志》又有(宪王)薛夫人墓及肃王识懿(末代王,崇祯十六年冬死于李自成军)墓亦在焉。安王墓在县西五里圃子湾,宪王墓在县西南二十里周家山”^①。调查表明,在今甘肃榆中县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平顶峰下确有明肃藩王陵11座,诸陵背靠平顶峰,前瞰苑川河,陵园建筑呈阶梯状排列。20世纪六七十年代1号墓和2号墓相继被当地农民打开,其中1号墓玄宫五室,出土圜志残片上有“妃……薨于水乐”等字,推定为肃庄王陵(图3—24);1977年,甘肃省考古队试掘7号墓,



图3—24 明肃庄王陵封土

^① 清·陈士禧修,涂鸿仪编辑:《兰州府志》卷四,《祠祀志附冢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564),据清道光十三年刊本影印,第26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玄宫单室,从出土的两合圻志可知墓主为肃怀王及其王妃王氏^①。

与肃藩王陵情形相似的还有位于河南安阳的赵藩诸王陵,据《安阳县志》记载:“明赵简王、惠王、悼王、靖王、庄王墓,俱在县西北五十里;赵康王墓,在县西寿安山。按,康王孝行丕著,旧《志》载赵藩诸王坟墓,独遗康王,今依《府志》补入”^②。按,赵藩始封王朱高燧(赵简王),为明成祖第三子,封于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赵府亲王爵传十一世,共八王,除《县志》所载以外,康王以后尚有穆王(康王曾孙,嘉靖四十四年袭封,万历四十二年薨),以及追封穆王祖父恭王、父安王,穆王世子未及袭位而薨,穆王孙(世子之侄)袭为末王。康王以后诸王葬地缺载。

(2) 诸王异兆域

诸王异兆域是指某藩历代亲王分别葬若干处或若干个不同区域中,包括某些亲王自为兆域。鲁藩诸王陵是最典型的异兆域,鲁荒王葬于山东邹城九龙山,而诸嗣王的陵园则分布在邹城、泗水、滕州、费县四县之境。据明人于慎行《兖州府志》记载:在邹县境内,有“皇明鲁荒王园,在县东北二十五里九龙山,鲁靖王园,在县东北云山”;另有钜野、安丘、乐陵、阳信、高密、新蔡、馆陶、滋阳诸郡王墓亦在县内各处。在泗水县境内,有“皇明鲁惠王园,在县南三十五里九奇山,鲁恭王园,在九奇山”;另有钜野、东瓯、东阿诸郡王墓分别在县东南五十里凤凰山、县东北五十里龟山。在滕县境内,有“皇明鲁庄王园,在县东南二十里狐台山麓,俗谓壶山是也”。在费县境内,有“皇明鲁怀

^① 甘肃省博物馆资料;施连山:《明肃王墓考略》,《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调查资料。

^② 清·贵泰等纂:《安阳县志》卷十五,《古迹志·陵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108),影印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民国二十二年北平文岚齋古宋印书局铅印本,第386—387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王园,在西南八十里毓秀山,即南成山也,亦曰曾子山,鲁悼王园,在毓秀山,鲁端王园,在县西南洙湾山”。此外,在峰县境内,还有乐陵、安丘等鲁藩郡王墓^①。可见,鲁藩诸王之葬地基本上没有统一规划,各自为中心。周藩诸王墓大体与鲁藩相似,分布于禹州(原名钧州),郑州、荥阳等地。

历代蜀王也是分别葬于不同兆域,但与周府、鲁府不同的是,蜀藩诸王皆葬于成都附近,只有个别略远;而且每一兆域中一般都不止一座亲王陵,有些还有郡王葬于其间。蜀献王、蜀靖王陵在成都市北郊的天隰山一带,其地今属天回镇。蜀僖王、蜀惠王、蜀昭王等王葬于成都市东郊龙泉驿区,这一带包括十陵镇南部、洪河镇北部的黄土陇冈区域,是一个比较集中的蜀藩墓葬区。在成都市东南锦江区琉璃河乡的潘家沟村也有明代蜀王及王妃的墓葬群。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成都府成都县,“明蜀献王、蜀靖王墓俱在县北三十里天回山,悼庄世子墓、崇庆王墓俱在县北十里威凤山”;成都府华阳县,“明蜀端王墓在县东十五里毓灵山,蜀昭王墓在县东二十里东山,黔江悼怀王墓、蜀僖王墓俱在县东北三十里正觉山,蜀怀王墓在县东二十里东景山,南川安靖王墓在县东二十五里东峰山,汶川懿简王墓在县东南二十五里灵溪山,内江王世子墓在县东二十二里东晖山”;成都府新都县,“明德阳僖安王墓在县南清泉山”;成都府崇宁县,“明崇宁王墓在县治朝天山”;成都府彭县,“明永川庄简王墓在县西七十里大隋山,蒲江郡主墓在县西七十里涌华寺侧”;成都府新津县,“明庆符恭僖王墓在县东二十五里牧马山”^②。在成都府以外,资州直隶

^① 明·于慎行:《兖州府志》卷二三,《陵墓志》,第3—15页,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第3册,齐鲁书社,1985年。

^② 清·常明等修:《四川通志》卷四四,《舆地四十三·陵墓一》,影印清嘉庆刊本第2册,第1695—1696、1698、1705、1709、1710、1711页,巴蜀书社,1984年。

州仁寿县,“明蜀定王墓在县东八十里东溪山”;茂州直隶州汶川县,“明懿简王墓,……在县灵溪山”^①。可以看出,明代蜀府王陵具有明显的“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有些王府的坟墓在自然地理上属于范围比较大的同一区域,但诸王陵相距较远,在现代、甚至在明代的行政地理上跨越州县,这种情况是一种特殊的诸王异兆域。

秦藩诸亲王墓都在王府城南黄土塬上,但分成若干个区域。据《西安府志》记载:“秦愍王朱棣墓,《冯志》:在鸿固原,妃邓氏、王氏祔;又隐王尚炳、僖王志垣、怀王志均、昭王秉榘墓俱在左右。已下咸宁。秦康王志壤[壤]墓,《冯志》:在少陵原,子惠三[王]公锡墓祔。秦简王诚泳墓,《通志》:在韦曲原,定王惟焯墓祔。秦宣王怀堦墓,《通志》:在高望原,靖王敬谿、敬王宜[谊]澍、肃王宜[谊]澍、景王存机墓俱在焉”^②。由此可知秦藩早期四王葬鸿固原,晚期五王葬高望原;中期康王、惠王葬少陵原,简王、定王葬韦曲原,昭王则葬鸿固原。十四王分葬于四处,末王葬地不详。秦藩另有追封王五人,为昭王祖父安王、父庄王,宣王曾祖恭王、祖父顺王、父端王,他们均以郡王或将军等原封爵入葬,其中秦安王朱公铭为简王庶七子,原封临潼王,“临潼惠简王公铭墓,《通志》:在韦曲原,《贾志》:后以孙昭王进袭,追封秦王,改谥曰安”^③。其余诸追封王葬地不详。

① 清·常明等修:《四川通志》卷四七,《舆地四十六·陵墓四》,影印清嘉庆刊本第2册,第1828、1837页,巴蜀书社,1984年。

② 清·舒其绅等修、严长明等纂:《西安府志》卷六五,《古迹志下·陵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313),影印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第5册,第330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③ 清·舒其绅等修、严长明等纂:《西安府志》卷六五,《古迹志下·陵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313)影印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第5册,第3306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图 3—25 明宁献王陵遗址(房屋处为玄宫入口)

宁藩亲王之葬皆在江西新建西山一带,西山实际上是南昌府赣江以西的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小山脉,是若干座小山包的泛称。“宁献王朱权墓在新建西山缙岭,敕建(《名胜志》);宁惠王朱盘斌墓在新建西山退龄峰下(《明一统志》);……宁靖王朱奠培在新建烟溪双岭;……宁康王朱觀鈞在新建润溪”^①。其中宁献王墓经过考古发掘^②(图 3—25)、宁康王墓 1951 年冬被农民挖开^③;在这一区域中还先后发掘过宁康王次妃冯氏(宁废王宸濠生母)墓^④、宁靖王夫人吴

① 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一一〇,“邱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516 册,第 624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年。

②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 年第 4 期。

③ 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 年第 4 期;孙家骅等主编:《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第 534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④ 郭运清:《南昌明宁康王次妃冯氏墓》,《考古》1964 年第 4 期。

氏墓^①。宁府五世四王,惠王为追封,末代王宸濠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兴师谋反,兵败被擒,次年十二月在北京通州赐自尽,“仍焚弃其尸”^②,其妃娄氏曾劝诫宸濠,兵败时“赴水死”^③。“娄妃墓在新建德胜门外,新建、上饶两县漕仓盈字廩下。乾隆辛未(十六年,公元1751年)布政使彭家屏立碑志之”^④。除亲王外,宁藩诸郡王墓也有不少建在西山之原,其中乐安昭定王朱奠垒墓经过清理发掘^⑤。

襄藩诸王墓的情况与宁藩相似,除襄简王以外,襄诸王墓多在今谷城、南漳两县交界处的山脉间,虽然所凭依的山脉连成一体,但有些陵墓之间相距甚远。

河南洛阳的伊藩诸王陵也是互不联属,但皆分布于广义的邙山地区。据《洛阳县志》记载:“明伊厉王墓(王名樛,见《地理·分封》),在县西五十里邙山,妃刘氏合葬。考得在正北路东老井村,墓周九十三弓,高八丈五尺。葬三亩,地十亩九分七厘五毫”。“伊简王墓(王名颢焮^⑥,嗣厉王),在县西南三十里三山之阳,妃谢氏合葬。考得在西南路老井村,墓周四十二弓,高五丈。墓六分一厘二毫,地九亩三分四毫”。“伊安王墓(王名勉堡[望],封洛阳王,薨,以子悼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② 《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校印本《明实录》第37册,第3633页。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一七六,正德十四年七月丁巳,校印本《明实录》第37册,第3436页。

④ 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一一〇,“邱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6册,第62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⑤ 徐兴万等:《明乐安昭定王墓清理记实》,《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⑥ 伊简王名,《明史·诸王传》记为“颢焮”;《诸王世表》“焮”作“焮”;龚修《洛阳县志》同《诸王传》。

王袭封,追赠亲王,谥曰安),在县东北十里邙山之阳,妃张氏合葬。伊悼王墓(王名谔钺,安嫡[嫡]一子),在县西六十里魏山,妃马氏合葬。伊定王墓(王名谔铎,安嫡[嫡]四子),在县西北十里上店保乾山阳,妃沈氏合葬。伊庄王墓(王名訏渊,定嫡一子),在上店保乾山阳。伊敬王墓(王名訏淳,定庶二子),在县正北路西老井村,考得墓周七十九弓,高五丈五尺。墓二亩一分六厘六毫,地十亩六分四毫”^①。

诸王同兆域是一种特殊的族葬,具有节省耕地、减少卜择时日等优点,特别是有利于子孙瞻拜,分葬者“每至寒食、十月朔,子姓奔走十数日犹未得止;族葬则数世之墓一朝而毕祭,不读不烦”^②。但这种葬法却因相对狭小的地域限制,不利于每座王墓都能卜兆于上佳风水之地。从明代各府亲王坟茔分布来看,诸王异兆域比诸王同兆域更为多见。这些王陵虽不在一处,但一般都卜选在府城周围,兆域之中或兆域附近还多有本府郡王祔葬。如“明沈简王(朱模,太祖第二十一子,封潞州,即山西长治)墓在城南凤凰山,自康王以下墓胥隶长治境”;“沈王妃宋氏墓在城南三十里凤凰山东坟村东南,见圻志;稷山悼靖王墓在城南三十里凤凰山;沁源恭定王墓在城西十里暴马村;黎城昭僖王墓在城北二十里;沁水悼怀王墓在城西南三十里至善都;平遥靖僖王墓在城北十五里柏谷村”^③。又如“衡恭王(朱祐樞,宪宗第七子,封青州,即山东益都)墓在(益都)县西南三阳山,衡庄

^① 清·龚松林纂修、汪坚总修:《洛阳县志》卷三,“山川”《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476),据清乾隆十年刊本影印,第1册,第228—22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② 清·陈确:《陈确集》,别集卷七,《葬书下·族葬五善》,点校本下册,第490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③ 清·陈泽霖鉴定、杨笃纂修:《长治县志》卷二,《地理志·冢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400),影印光绪二十年刊本第1册,第468—46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王(二代)墓在尧山西南、衡康王(三代)墓在县西马鞍山南、衡定王(四代五任)墓在尧山南、(新乐)康宪王墓在炉山之原”^①。

大约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明初周王开府开封,陵墓却卜选于钧州(今禹州)。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英宗第九子徽庄王朱见沛出藩钧州,此后徽藩诸王亦葬钧州,于是钧州周围就兼有了周、徽两藩陵墓。据民国《禹县志》记载,“周定王墓,乾隆《邵志》曰:州北五十里明山下,紫金里十甲后茔;周恭王墓,乾隆《邵志》曰:州北三十里,紫金里九甲前茔;周端王墓,乾隆《邵志》曰:州东北三十里,紫金里九甲大道观中茔;徽庄王墓,乾隆《邵志》曰:州西九十里,镇峰里八甲下官司;徽简王墓,乾隆《邵志》曰:州西九十里,镇峰里八甲下官司;……徽恭王墓,县西十五里,文风里二甲董村”^②。钧州周围还有不少二藩郡王墓,以徽藩居多,见诸《禹县志》著录的有荥阳王、阳夏王、太和王等。而周藩诸郡王则有不少就近葬于郑州、荥阳,据民国《郑县志》记载:“明南陵王墓在州西七口(里),冢前立有周王崇易碑文”;“明遂平荣靖王墓在州西北姜村保,有纪善梁玗碑文”^③。

这种两藩亲王兆域毗邻者,还见于前藩被废或绝嗣、后藩继之,二藩同府这种情况,如湖北安陆(今湖北钟祥)曾先后为明太祖第二十四子郢靖王、仁宗第九子梁庄王的封地,二王无嗣,又皆葬于封地,

① 清·张曜等修、孙葆田等纂:《山东通志》卷三七,《疆域志·古迹·青州府益都县》,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1915年初刊本校订重刊,第1册,第14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 王琴林等纂修:《禹县志》卷十三,《陵墓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459),影印民国二十年刊本,第1033—103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③ 周秉彝等修、刘瑞璘等撰:《郑县志》卷二,《舆地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104),据民国二十年重印本影印,第1册,第136、137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三度开府安陆的宪宗第四子兴献王(世宗之父)又卜葬于此。另据民国《重修汝南县志》记载:“崇简王墓,确山九十里,靖、恭、□(昭?按,应为庄或端)诸王同。秀怀王墓,城东北五里。顺阳怀庄王墓,上蔡西南五里□。怀安府庄惠王墓,城东南八里屯;温穆王墓,城东南八里屯。瑞安府恭简王墓,城东南方良屯;庄惠王墓,城东南方良屯。庆元府荣康王墓,城东南董家屯;端穆王墓,城东南董家屯;庄懿王墓,城东南董家屯。归德府庄(《明史·诸王世表五》“庄”作“端”)惠王墓,城西□济屯”^①。秀怀王为明英宗第五子,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薨于汝宁(今河南汝南),无嗣封除。崇简王为明英宗第六子,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就藩汝宁,即秀王故邸为王府,王爵凡六传至明末。瑞安、庆元、怀安、归德诸邸皆为崇府郡王。明太祖封第二十五子朱橚为伊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之藩洛阳。伊王爵传五世六王皆葬洛阳,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嗣王典模因过被废,伊藩绝^②。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第三子福王常洵继而开府洛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被李自成杀死,亦葬于洛阳邙山。“福忠王墓(王名由桀^③,见《地

① 陈伯嘉修、李成钧等纂:《重修汝南县志》卷三,《古迹志·古墓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453),影印民国廿七年石印本,第19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② 伊庶人朱典模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十二月卒于高墙,其妻、子亦卒,宗人乞赐归葬,神宗许之。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丙申条。

③ 福王名常洵,见于《明神宗实录》及《明史》中的有关条目,龚修《洛阳县志》言其名由桀,实误。按明太祖手订“燕府世系”,“由”为“常”下一辈。考《明史·诸王世表五》,常洵生二庶子,长名由崧,封德昌王;次名由桀,封颖上王。由桀与福王同死;由崧后嗣福王位,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被拥戴即位于南京,改元弘元。又,《明史》记常洵谥曰恭,实为误记,龚《志》无误,其谥应为“忠”,有墓志为证。有关考证可参阅拙文《〈明史·诸王传〉补正》,载《南开学报》1997年第2期。

理·分封》),在县西北十五里金水河上崖”^①;其圻志已经出土^②。

各藩王陵相距数里至数十里不等,有些甚至跨越府县,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力、物力,有时还会因不法之徒假王陵名义侵夺民间田产而发生纠纷。正统初年,秦府即接连发生类似事件。当时秦王府内使、校尉等占种西安府咸宁县民田五十亩,田主上告地方官,秦康王庇护校尉,且“诬奏民妄认先王坟地为己业”,英宗令陕西布政司等三司衙门提审,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五月,“三司奏民言有实,行在户部请以地还民,逮治占种人罪,从之”^③。正统四年闰二月,陕西咸宁县民徐四奏:“居近秦愍王坟园,内使占据其地四十余亩”^④,经三司查实,亦令给还之。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明孝宗更定王陵之制,规定:“亲王、郡王、镇国将军,各于始封父祖茔序昭穆葬;郡县等主,于仪宾父祖茔安葬”^⑤。这是一项指令性的节俭措施,用以限制王陵新墓区的出现。但从各府实际来考察,这一命令似并未严格执行。但其中有些王府另辟茔区,实出于不得已。如益藩诸王陵兆域分为建昌(今江西南城)城东南金华山和城北七宝山两处,端王、庄王、恭王葬金华山、资圣山一带,末代王、铜陵恭简王、淳河怀僖王等祔;昭王、宣

① 清·龚松林纂修、汪坚总修:《洛阳县志》卷三,“山川”《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476),据清乾隆十年刊本影印,第1册,第23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② 李宪奇等:《明福王朱常洵圻志》,《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③ 《明英宗实录》卷四二,正统三年五月丁酉,校印本《明实录》第14册,第819页。

④ 《明英宗实录》卷五二,正统四年闰二月己卯朔,校印本《明实录》第14册,第991页。

⑤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1页。

王、敬王、定王葬七宝山一带,浦阳肃安王等祔。益府冒禁另卜兆域,主要原因是金华山一带地脉不好,水位较高。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五月,益恭王妃吴氏薨,次年四月“营葬于南城县资盛山之原”;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闰八月,恭王厚炫薨,益世孙(宣王)遵成宪奉旨开圻与王妃合葬,岂料短短的三四年时间,玄宫内即“水蚁交侵”,于是“具书上请,亟图改卜”,恭王夫妻浅厝10余年,经“恳疏再请”,始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迁葬于旧墓址两丈外的新墓穴^①。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十二月,益庄王继妃万氏合葬,也是因为“开圻睹朽”,遂将益庄王及王妃王氏“更斂易棺”^②,次年正月重新安葬。益庄王墓发掘时见到,玄宫棺床上并列三棺的四周加砌高1.2米的围墙,以石灰将各棺之间及棺与墙之间的空隙填实^③。这种特殊做法,实际上是在不便迁葬的前提下而采取的一种防水防虫措施。因为城南兆域的不堪用,益藩才有了城北七宝山新陵址之选。

2. 王陵的规模和建制

(1) 王陵的规模:

明初地广人稀,王陵的规模也比较大。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明太祖第三子晋恭王朱櫜薨,“晋世子济燿将葬恭王,欲得民地千一百余亩为寝园,遣使入奏,上命以八百亩为限,而以附近宫地偿民,仍量地

① 明·翰林院撰文:《大明益恭王圻志》,见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明·翰林院撰文:《大明益庄王圻志》,见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③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见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1977年,内部刊印。

多寡给钞加赐之”^①。估计八百亩应该是明初藩王寝园的最高额限。据《太原县志》记载：“明晋恭王墓在(太原)县东北三十五里许东驼山之阳,洪武三十一年七月造”^②。1972年,太原市郊黄陵村农民在明晋王陵园内取土时,曾在距地表1米余处发现铸于洪武年间的金锭^③,进一步证实这一区域曾属于晋恭王陵园。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朝廷始正式规定亲王陵园之制:“亲王坟茔,享堂七间,广十丈九尺五寸,高二丈九尺,深四丈三尺五寸。中门三间,广四丈五尺八寸,高二丈一尺,深二丈五尺五寸。外门三间,广四丈一尺九寸,高深与中门同。神厨五间,广六丈七尺五寸,高一丈六尺二寸五分,深二丈一尺五寸,神库同。东西厢及宰牲房各三间,广四丈一尺二寸,高深与神厨同。焚帛亭一,方七尺,高一丈一尺,祭器亭一,方八尺,高与焚帛亭同。碑亭一,方二丈一尺,高三丈四尺五寸。周围墙二百九十丈,墙外为奉祠等房十二间”^④。这是有明一代对于亲王墓园建制最详尽的规定。按此规定,亲王坟园应该有享堂即享殿七间、中门即享殿前门三间、外门即陵宫门三间、东西厢房即配殿各三间,以及神厨、神库、宰牲房、焚帛亭、祭器亭和碑亭等,宫墙之外还有奉祠房等附属建筑十二间。此后,关于亲王、郡王等宗室成员的坟园规制在不断完善更定。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规定:“亲王坟茔,地五十亩,房十五间;郡王,地三十亩,房九间;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己未,校印本《明实录》第5册,第3705页。

② 清·员佩兰总裁、杨国泰纂修:《太原县志》卷四,《古迹》,《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431),影印清道光六年刊本,第26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③ 胡振祺:《明晋王陵园出土金锭》,《文物》1991年第1期。

④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0页。

郡王之子,地二十亩,房三间;郡主、县主,地十亩,房三间”^①。正统年间定制:“亲王母妃、郡王母妃、将军母夫人坟地房屋,悉如其夫与子之制”^②。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奏准:“王或妃有先故者,并造其圻,后葬者止令所在官司起倩夫匠开圻安葬;继妃则附葬其旁,同一享堂,不许另造”。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令:“王府擅奏重修坟茔者,先将辅导官参奏”^③。同年又定王府造坟工价:“亲王坟价三千八百两,郡王并妃三百五十两,镇国将军并夫人二百四十五两,辅国将军并夫人二百二十五两”;“十九年定将军以下造坟银价:奉国将军一百四十七两一钱二厘二毫,中尉一百二十三两七钱二分五厘八毫”;“二十一年定:郡王并妃开圻价银一百两,镇国将军并夫人八十两,辅国将军并夫人七十两,自开安葬”^④。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题准:“亲王并妃造坟开圻,行该省都布二司派办夫匠、木石砖灰等料,合用冥[明]器、丧仪,一并造完送用。其铭旌、纁丝、金箔、龙凤钩,工部行文思院等衙门成造,候便领送”;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定:“郡王、将军、中尉、郡县主君,坟价一概免给。惟郡王及妃并郡主铭旌、纁丝、金箔、龙凤钩,工部行文思院等衙门成造候领,合用冥[明]器、丧仪等项,行该省照依递减事例,给银自造”;万历十年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1页。

② 明·朱勤美:《王国典礼》卷六,《丧礼附谕祭、坟茔》,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三年周府刻、天启增修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24册,第4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1页。

④ 明·朱勤美:《王国典礼》卷六,《丧礼附谕祭、坟茔》,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三年周府刻、天启增修本影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24册,第446—4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公元1582年)议准:“郡王初封系帝孙者,身后坟价照例全给,其余郡王量给一半,开圻合葬者免给。世子坟价与郡王同,将军以下一概停免”^①。万历之制较嘉靖“全免给”之制又有所反弹,此制一直沿用至明末,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五月,郑王载玺[璽]转奏称,郑府繁昌王载澄于崇祯三年十月二十日病故,乞赐“所有谕祭、铭旌、冥[明]器、造圻等项”^②,礼部即依例请旨定夺。

从上述这些不同年代的规定可以看出,时间越往后,王陵的等制越被压低,世子、郡王以下尤其明显。明太祖手定宗藩条规,待遇优厚,“王爵封及二代,子孙六世尚得为校尉,余有禄,亲亲之恩可谓隆矣,不知数世之后尾大难掉,故韩王一派,一府之钱谷不足支也”^③。到了明朝中晚期,亲藩生齿日繁,晋府庆成郡王竟然生子一百,“俱长成,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座,至不能相识”^④;宗室糜废日多,国家财力见拙,于是“宗伯苟为革削,司寇严其条禁”^⑤;这些是亲王等宗室成员坟园规制一再降低的主要原因。

(2) 王陵的建制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2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崇祯四年五月十一日《礼部为繁昌王载澄病故其丧礼等项照例事题稿》,影印本第10册,第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一二,《国事类·本朝封王》,横排点校本,第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④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庆成王百子”,魏连科点校本,第9页,中华书局,1985年。按,此事《明史·诸王传》记为庆成端顺王奇演,“生子七十人,嘉靖初,尚书王琼闻于朝”。见标点本《明史》第12册,第3564页。

^⑤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宗室之盛”,魏连科点校本,第6页,中华书局,1985年。

就目前已知有关资料而言,明代亲王陵园制度与永乐八年定制及以后历次更定之制并不完全吻合,有时甚至还有较大出入。从同藩前后诸王的陵园规制来看,大体上都有由崇到卑的变化;但在同时代的各藩诸王之间却很难找出完全一致的规律,各藩王陵虽然基本都由神道、陵宫、享堂、坟冢等主要建筑组成,但其制度并不划一。下面从碑亭、石像生、享堂、明楼、封土形式等几个方面对明代王陵陵园建制进行讨论。

a. 碑亭

依据永乐八年定制,亲王墓前应有方广二丈一尺、高三丈四尺五寸的碑亭,即边长为6.72米,高11.04米的一座建筑^①。从诸王陵陵园遗存来看,明代亲王墓前所立石碑均以御祭文碑为主,它们大多不覆建碑亭,有些只有碑屋(即碑侧及碑阴两面或三面包砌青砖,上建屋脊,只留碑阳部分),至于碑屋是否为原制,尚需进一步考察才能确认。有关明代王陵陵园的调查资料,亦鲜见记述碑亭遗迹。从实际情况来看,每座亲王陵亲都应该有御祭文碑多通,如河南新乡潞简王陵园中现存皇帝、皇太子遣官致祭的祭文碑四通,其他陵园原有祭文碑当亦不在少数,不可能每碑皆建一亭。永乐碑亭之制,显然不会是为祭文碑而建。

现存明代亲王陵碑亭实例有湖北武昌的楚昭王碑、楚庄王碑、楚端王碑等。楚昭王碑亭边长11.3米,石碑承以赧炭。碑刊1200余字,述昭王功德及妃、子女分封等情况,碑文由楚宪王朱季垵(昭王长孙,庄王长子)奉敕亲撰,楚康王(庄王次子)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三月奉敕立碑,其碑文首云:“孙楚王季垵奉敕撰:伏唯王

^① 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牙尺当今32厘米,见矩斋:《古尺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又,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二”中亦略有考证,见该书第5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本书明度核算均照明一尺准今0.32米,以下不另注明。



图 3—26 明楚庄王陵碑亭

祖、王考至德令行，昭园、庄园未有树碑，听夕靡宁。敬述梗概，上闻于朝，冀于文儒为著，刻辞以贻来世，仰荷玉旨，谓国家先代陵碑皆后圣亲述，用克详也，爰命季况自述其词。臣季况俯伏膺命，不敢以不文不勉，谨叙昭王之碑曰……”^①，这段话把楚昭王碑的性质和碑文源起说得很明白，即追述楚昭王一生功德和生平纪事，其性质与太祖孝陵、成祖长陵的神功圣德碑相似。楚庄王碑碑文内容与昭王碑文相似，只是碑文由翰林院侍讲学士廖道南撰写，文末所附四言颂诗为楚宪王亲作（图 3—26）。与昭、庄二王相比，楚端王碑则有些怪异，它立于墓主生前预营寿域之时。楚端王朱荣浹正德七年（公元 1512 年）袭封，卒于嘉靖十三年（公元 1534 年），其陵碑先立于嘉靖十年，内容主体与昭、庄二碑相仿，碑文由湖广学政、前翰林院侍读经筵讲

^① 明·朱季况：《楚昭王碑》，见袁家新主编：《楚天名胜龙泉山》，第 66 页，武汉出版社，1995 年。本书引用时标点有所更定。

官,同修国史崔桐撰写。碑文首云:“楚王在位逾二十年,德与寿增,达昼夜之理,爰命营苑裘于灵泉山。其地去武昌郡城五十里,群峰森峙,楚先园皆在焉。今之所营,位卯面酉,厥既得卜,工师奏功,規制宏丽,宛然昆仑玄圃也。王以语诸前史官桐,俾为之记”。因系立碑于寿藏之前,故文中又有“寿以千秋为期,福祿弥隆”等语^①。楚三王陵碑亭的券门皆三开,系原来制度,应当属于敬避帝陵碑亭门四开的一种降等之制;碑亭置于陵宫门左,应该也有等级标识意义;至于屋顶覆绿琉璃瓦,则更是亲王身份的明确标志。

楚藩兆域中所营造之三王碑亭等距离鼎立,或许有追求风水方面的考虑。就碑文内容而言,楚藩三碑应属于称颂墓主生平的神道碑一类,其功用等同于皇帝陵前的神功圣德碑;从帝陵制度推断,王陵前也只有这种碑才会配建以碑亭。湖北江陵湘献王朱柏墓前有神道碑一通,解缙奉敕拟,碑文记墓主生平及“遇害于苦块之间”的凄惨结局。原碑立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已毁,2004年8月重刊;龟趺座仍为明朝旧物,但已经向北位移,位神道正中,使靠近墓冢,以利保护(图3—27)。



图3—27 明湘献王陵神道碑(重刻)

^① 明·崔桐:《楚端王碑》,见袁家新主编:《楚天名胜龙泉山》,第70—72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引用时标点有所更定。



图 3—28 明郢靖王陵封土

湖北钟祥郢靖王朱栋墓前据说“有龟座碑 1 通，碑文记墓主生平”^①；但此碑今已不在原地（图 3—28）。湘献王衣冠冢建于永乐元年，郢靖王卒于永乐十二年（公元 1414 年），两墓之年代和区域都与楚昭王陵接近，神道碑及碑亭之制或亦相近。类似内容的石碑还见于秦藩陵前，陕西长安庞留井村秦惠王墓冢前有龙首龟趺碑一通，额篆“大明宗室秦惠王神道碑”；秦宣王世子墓前有螭首龟趺碑一通，额篆“赐嫡子敬修墓”^②，但地表均未见碑亭遗迹。河南沁阳郑端清世子朱载堉墓前原亦有记载墓主生平的石碑^③。另外，笔者在调查秦愍王陵时亦见有一龟趺座，在陵宫门东侧石狮之北，原陵宫墙以内，但原碑

①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第 399 页，《郢靖王朱栋〔栋〕墓》，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 年。

② 王翰章：《明秦藩王墓群调查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2 辑，三秦出版社，1995 年。

③ 李秀萍等：《沁阳市出土的朱载堉残碑》，《华夏考古》1991 年第 4 期。

已佚,究竟是神道碑还是祭文碑,已不得而知。

可能是因为朝廷自仁宗献陵以后诸帝陵皆无神功圣德碑(昌平献、景、裕、茂、泰、康诸陵前现存诸碑及碑亭均为嘉靖十六年下诏添补)、各藩嗣王坐食俸禄无可称述等原因,亲王陵碑并不多见,因而碑亭应该是非常设之制。

b. 石像生

关于明代石像生制度,《大明会典》卷二〇三记载了皇陵中成祖长陵有石像生十八对,同卷又分别记载了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和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所规定的公侯、职官坟墓前石人石兽制度,但惟独不见关于亲王、郡王及宗室其他封爵人等墓前石仪制度的记叙文字。在明代其他官私文献,如《国朝典汇》、《皇明典礼志》、《王国典礼》中,也不见有相应的记载。就目前已知考古调查、发掘资料而言,也找不出诸王陵石像生制度的统一规律。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许多明代亲王陵墓前没有石人石兽或其子遗,如楚昭王及楚藩诸王、鲁荒王、蜀藩诸王陵、辽简王陵等都不见有石像生遗存;秦愍王及秦藩诸王、周恭王、宁献王、赵康王、徽庄王、荣怀王、益藩诸王、潞简王等亲王墓以及广西靖江王陵前有石像生或望柱。其中秦藩诸王神道石刻保存最为完好,也进行过较为系统的调查^①,是研究明王陵神道石仪制度的重要资料。秦愍王神道石刻为望柱、虎、羊(缺1件)、麒麟、马、武官、文官各1对(图3—29);秦隐王神道石刻为麒麟1对、马3对、文官1对、武官1对;秦康王陵现存神道石刻为马2对、武官1对、文官1对;秦惠王陵王神道石刻为望柱1对、虎1对、羊1对、麒麟1对、马2对、武官1对、文官1对;秦

^① 王翰章:《明秦藩王墓群调查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



图 3—29 明秦懿王陵神道石刻及封土

简王陵尚存麒麟 1 对、马 2 对、武官 1 对、文官 1 对；秦宣王陵神道石刻尚存望柱、虎、羊、马（带控马官）、文官各 1 对；秦□□世子朱敬铨陵前尚存麒麟、马各 1 件。此外，明代各藩王陵现存神道石刻或存留比较明显石刻遗迹的还有：河南郑州市西南刘胡垌乡周悼王陵前残存石刻 10 件，有羊、马、武将、文官各 2 件^①；江西新建宁献王陵前有石望柱 1 对，上刻道教符箓（图 3—30）^②；河南安阳赵康王陵前现存羊 1、象 2，一说有石像生 7 对^③；江西南城益端王陵前有望柱、狮、马、

①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世纪郑州考古》，第 247 页，香港国际出版社，2004 年。周悼王，名安横，周惠王之子，未妻封而薨，初谥曰荣悼世子，其子恭王嗣封，追谥曰悼王。

②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敬墓发掘》，《考古》1962 年第 4 期；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 年第 4 期。

③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 277 页，《康王墓》，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年；杨焕成等主编：《河南文物名胜史迹》，第 267 页，《康王墓》，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 年。



图 3—30 明宁献王陵神道望柱

武将、文官各 1 对^①，益庄王陵前有狮 1 件、武将、文官各 1 对^②，益宣王、益定王陵前亦皆有石像生遗存^③；河南新乡潞简王陵前石像生包括狮、虎、熊、羊、獬豸、麒麟、骆驼、象、马、翁仲以及若干种无名异兽，共 15 对^④。广西靖江王诸陵从三代庄简王陵开始，石像生内容基本

①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棨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 年第 3 期。

②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 年第 1 期；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见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1977 年，内部刊印。

③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昭偁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 年第 8 期；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2 期。

④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 年第 5 期。

固定为石兽6对、石人1对,即獬豸、羊、虎、麒麟、马及控马官、象、翁仲各1对,导引以望柱1对,但石兽的排列次序略有不同、内容小有变化^①。位于河南郑州、荥阳的周藩若干郡王墓前也有石像生或其遗存^②。另外,湖北江陵湘献王陵前传说原来也有神道石像生,但已遭破坏,有些移往他处,无法辨识。今其冢前有新刻石仪5对,仿钟祥显陵制度,基本没有研究价值。

从诸王陵石像生内容来分析,石兽多以狮、马、羊为主,獬豸、麒麟等神兽仅见于秦藩诸王陵、潞简王陵和靖江诸王陵等,潞简王陵还有各陵都不见的骆驼。石人,一般都是文武兼具,但不见帝陵中的勋臣形象;各陵石人数目最多为2对,即文、武各1对,靖江诸郡王为文臣1对、潞简王为文武共1对;从石像生数目来看,秦惠王陵为8对,秦愍王陵为7对,赵康王、靖江诸王(三代以后)陵均为7对,益端王陵为4对,潞简王陵多达15对,数目逼近太祖孝陵的16对,超过了钟祥显陵的12对,其石兽囊括了所有见于天子神道的种类。

参照明代其他器用仪仗通行则例,亲王、郡王墓前的石像生等级应该低于天子、高于公侯。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定公侯墓葬碑碣石兽之制:“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阔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石人二、石马二、石羊二、石虎二、石望柱二”^③。1967年,南京市中央门外小市镇安怀村曾发掘清理了追赠蕲国公康茂才

^① 罗标元等:《靖江王墓群简介》,《广西文物》1987年第1期;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明靖江王十一陵述略》,《广西文物》1987年第2期;调查资料。

^②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世纪郑州考古》,第247页,香港国际出版社,2004年。

^③ 明·佚名:《皇明制书》“稽古定制卷之九”,“碑碣石兽”,影印明镇江府丹徒县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6册,第298—23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职官坟墓》,影印本第5册,第2733页。

之墓,康茂才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八月卒于军中,迎丧归葬南京,其墓前有马、羊、虎、翁仲各1对^①,石像生内容与洪武二十九年定制完全符合,表明它的制定是有实际基础的。此外,南京等地其他明初功臣墓的石像生制度也可资参较。魏国公徐达,号称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卒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追赠中山王,“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②;其墓在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神道有马、羊、虎、武将、文臣各1对,神道碑1通。鄂国公常遇春,卒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追赠开平王,其墓在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神道有羊、马、虎、翁仲各1对,残存石龟趺座1、望柱1。曹国公李文忠,卒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追赠岐阳王,其墓在南京市太平门外蒋王庙,神道有望柱、马及马夫、羊、虎各1对,翁仲2对,石碑2,残存石龟趺座1。卫国公邓愈,追赠宁河王,葬南京市中华门外邓府山,墓前有马、望柱、羊、虎、石文臣、石武将各1对,有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所立神道碑^③。信国公汤和,卒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追赠东瓯王,葬安徽蚌埠东郊,墓前有神道碑,高6.35米,神道有马及马夫、羊、狮、文臣、武将各1对^④。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和汤和等人都是生封国公,歿后追赠郡王,其墓葬的地面建筑应该是郡王等级。这几座墓葬的石像生内容基本一致,为石马(李文忠、汤和墓附带马夫)、石羊、石虎各

^①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蕲国公康茂才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标点本第12册,第3730页。

^③ 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四人墓前石刻资料,分别引自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编著:《江苏文物》,第21—22、25—2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④ 蚌埠市博物展览馆:《明汤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2期。

1对,石翁仲2对(只有年代较早的常遇春墓为石人1对),比公侯多石人1对。显然,徐达等人这种5对石像生组合应该是洪武时期异姓郡王的石像生制度。南京市安德门外石子岗向花村的渤泥王墓,神道石像生也是石虎、石羊、石马、文臣、武将各1对^①,渤泥王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到南京朝贡时病故,明成祖赐谥曰“恭顺”,敕令葬以王礼。因此,渤泥王墓所反映的也应该是异姓郡王石像生制度。

明代亲王和郡王的神道石像生等制应该介于天子和异姓追封郡王之间,《大明会典》等明代礼制规范类文献中没有记录当朝亲、郡王陵石像生制度,不会是疏漏,惟一可信的解释应该是明朝对于宗室王爵的石像生制度可能根本就没有作过明确的规定,所以才有今日所见诸王陵前石像生多少不一、有无不一的现象。亲王陵墓前不设石像生可能与墓主主张薄葬有关;也有些王陵前的石像生毁于明亡以后,或为耕作方便而埋于土中,为今日研究带来了不便。至于明朝亲、郡王石像生无定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迄于洪武末年皇帝陵前的石像生制度尚未完全确立,而仁宗献陵以下诸陵又皆无独立的神道石像生,所以对于王陵也无法做出相应的规定,诸王墓前的石仪仗制度只能视各藩视始祖陵情形斟酌而行。以洪武末秦愍王陵为标准,参考钟祥显陵制度,估计明代亲王陵石像生正常情况下应该不超过10对,惟潞简王例外。

c. 享堂

依《大明会典》,亲王坟墓前的祭享建筑应名曰“享堂”,但王宫建筑亦以殿名,故本书对于亲王陵“享殿”、“享堂”通用。从鲁荒王、

^① 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编著:《江苏文物》,第30—3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楚藩诸王、蜀僖王、襄宪王、益藩诸王、潞简王等王陵前的建筑遗存来看,明代诸王墓前的主体建筑应用绿琉璃瓦覆顶。按永乐八年定制,亲王享堂应为面阔 35.04 米,进深 13.92 米,高 9.2 米,七开间,享堂前的中门(即享殿前门)应为面阔约 14.66 米,进深 8.16 米,高 6.72 米,三开间。以此标准来衡量,鲁荒王陵享殿遗址面阔 33 米,进深 24 米(含月台),面阔七间,基本符合这一规制而略有降杀,可见,永乐八年定制与洪武间的亲王陵园之制应该是相差无多的。属于此定制颁布以后的楚昭王陵享堂面积为 451 平方米,面阔五间,略逊于定制(约为 493 平方米),配殿三间符合定制,但其中门为五开间、建筑面积 350 平方米却明显超逾定制之三开间、约 120 平方米建筑面积。可以看出,这一制度具体执行起来并不十分严格。正统十三年(公元 1448 年)重新规定“亲王坟茔地五十亩,房十五间”^①,如果这十五间房包括享堂、配殿、中门等主体建筑在其中,那么这些建筑的等制也应该相应降低,享堂的面阔最多不能超过五间,否则即无法分配。结合昌平仁宗献陵以后诸陵陵宫绝大多数为享殿前门(亦兼作陵宫门)三间、献殿五间来看,洪熙(公元 1425 年)以后诸王享殿一般不应该超过五间之制。宁献王朱权卒于正统十三年(公元 1448 年)九月十五日,据墓中出土圹志记载,他是“豫营坟园于其国西山之原,比薨,以正统拾肆年貳月貳拾壹日葬焉”。其墓之建正当正统重新厘定王陵规制前后,墓址在今江西新建县石埠乡璜源村西之猴岭东麓,土冢前有建筑遗迹,“地面有柱础六列,分布整齐”^②,这里应是享殿所在,亦为五开间(图 3—31)。可以推测,正统王陵房十五间的分配应该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 5 册,第 2731 页。

^②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 年第 4 期;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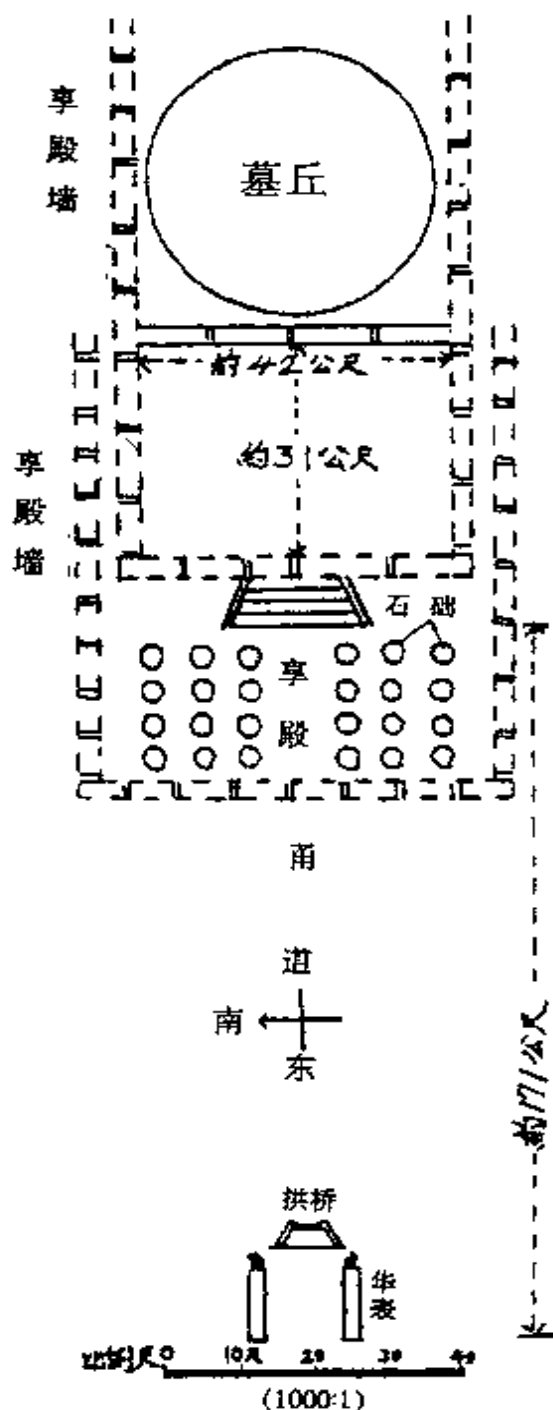


图3—31 明宁献王陵园平面示意图(引自《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是：享殿五间、中门三间、左右配殿各三间、神厨或神库一间。至于新乡潞简王陵，享殿前中门宽20米，进深8米，面阔五间，享堂面阔36.5米，进深18米，面阔七间，在开间制度上超过了正统定制，也明显超逾了昌平长、永定以外诸皇陵之制；在建筑尺寸上，享殿的进深和面阔、享殿前中门的面阔都超过了永乐之制，其中中门面阔竟超逾永乐定制一丈六尺以上，而其年代处于反复压杀亲王陵墓等级的明代晚期，属于明显的僭越。

d. 明楼

“明楼”之名见于陵墓建筑，应该是始于凤阳皇陵，皇陵砖城四面正门各名曰“明楼”，前冠以方位。从南京太祖孝陵开始，城堡形明楼成为明代皇陵封土前的标识性建筑。楚昭王陵、鲁荒王陵坟冢前各有“明楼”建筑，均为现代为适应旅游需要而添建，并非原制。明蜀藩诸王陵玄宫上多有建筑遗迹，有人认为应该是“明楼”，“明楼后面垒土筑坟

冢(宝顶),这是明蜀王陵的共通形制和统一格局”^①。但此说尚待有更多资料来支持。从文献记载来看,明代的亲王陵似不应有“明楼”建制。明世宗之父原以亲王礼下葬,被追尊为皇帝后加修陵寝,添建项目中就包括明楼一项。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八月,显陵司香太监杨保上言:“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工部尚书赵璜因上奏:“陵至当与山水相称,恐难概同。今殿墙已易黄瓦,但宜添设明楼、石碑,及改司香衙门为神宫监、设置护卫曰显陵卫,其余未备房屋应创新者另为添造,应仍旧者止加修饬,不必大为改作”^②。次年三月,“工部奏请盖造恭穆献皇帝陵寝明楼,树碑镌题如制”^③。又,明景帝初亦葬以王礼,后来虽然追尊帝号,但其陵制却不同于诸帝,清初梁份说:“景皇帝陵在帝与王之间也”;“景皇帝陵冢无宝城、无明楼、无穹碑”^④。这些记载都可以佐证“明楼”之制原非亲王陵所当有。

明代王陵的“明楼”实例,目前只见有潞简王次妃墓一处(据说潞简王陵“敕封潞简王之墓”石碑处原亦有“明楼”,已经倒毁),其“明楼”在坟冢前,与坟冢并不相联属,通高12米,上下两层,用石砌成,上层高7.95米,下层高5.05米,长宽各6.65米,悬山顶覆绿琉璃瓦,上下层四面各辟拱门,上层立墓碑,碑高6米,碑阳刻楷书“敕封潞藩次妃赵氏墓”,碑阴刻墓主生卒年月日时:“隆庆庚午年

① 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② 《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嘉靖三年八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39册,第1095—1096页。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九,嘉靖四年三月甲戌,校印本《明实录》第39册,第1239页。

④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三,清汪鱼亭传抄本,第83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四年,公元1570年)拾壹月初捌日丑时生,万历辛丑年(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貳月拾陆日寅时薨”^①。显而易见,此“明楼”虽然在外形上与帝陵明楼有相似之处,但功用却有很大的不同,明楼与宝顶不相联属,实际上只相当于一种特殊的碑亭。明制诸王陵封土前不建明楼应为通例,潞简王次妃墓之“明楼”既属逾制,又不伦不类。

e. 封土

明代王陵陵冢分为有明显封土和无明显封土两种形态,这里的封土是特指高出地表、由人工堆筑的坟冢,而不是指墓穴的回填土部分。按理说,明代王陵既不实行“潜埋”、“阴葬”,就应该起有坟冢。但实际上诸王陵大多定穴于山坡,封土与山坡浑然一体,很难与周围山体分开,如鲁荒王陵就属此类,益端王的玄堂也是建在了山前的一小山包中,这类墓葬很难用一般标准去衡量其封土的尺寸、形状,楚昭王坟冢高度有不同的测绘数据,大概就是因为测绘标准不一致。有些陵墓定穴于山顶、山前稍平处或平岗地,这种墓葬封土比较明显,比如辽简王墓冢呈圆形,高约4.5米,直径约60米;赵简王墓封土高约3米,周长约40米;庆康王墓封土高20.5米,底径52米;益庄王墓封土高约7.8米;潞简王墓坟冢高9.35米,直径40米,周长130米;成都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蜀某王之墓封土高约5米,直径约60米等^②。各王陵冢高和直径有较大差别,除兴建时即规模不同外,主要是明以后自然或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完毁程度不一所致,如河南禹州徽庄王墓现存墓冢高1米多,周长

^①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第5期。

^② 各王陵封土数据资料出处,俱见本章第一节《明代亲王陵墓资料表》,此处不一一注明。

10米,显然不会是原来面貌。但庆康王墓冢高20.5米(约相当于明6.4丈),经实地调查确认,颇疑有测绘或梓行中的失误。从洪武二十九年规定公侯“坟高二丈”^①来看,明代亲王土冢高度虽然未必有统一限定,但基本都应该在6.4米以上。从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及笔者所掌握的其他资料来看,明代藩王陵墓封土外一般没有包砖之制,仅襄宪王坟冢以砖石包砌,而潞简王墓封土硕大且全包砌以石条,似属特例。

一般来说,封土应该叠压在墓室之上,起保护和标识墓穴的作用,但明代亲王墓封土却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即土冢不在墓室之上,而是在墓室之后。蜀藩诸王陵即多为此种形式,如僖王陵、昭王陵等都是墓冢在墓室之后。据介绍,蜀昭王陵墓室处原地表呈坡状,墓穴两侧有排列规则的柱洞,发掘者认为墓室后的土冢是“疑冢”。除王陵外,北京海淀金山口熹宗妃墓(董四墓村一号墓)也是封土与墓室错位。据介绍:此墓封土“高约4米,上径4.8米,下径6米”,“位于主室之后,并不直接压在地下墓室建筑之上”^②。笔者推测,这种墓冢不叠压玄宫的设计用于合葬墓可能有风水和工程方面的考虑,不一定是设置疑冢。

3. 关于王陵陵园规制的变化和“逾制”问题

《大明会典》记载的永乐八年、正统十三年、天顺二年、成化十八年、弘治五年、嘉靖二十八年、嘉靖四十四、万历十年等若干条不同时期的条规,勾勒出了明朝王陵陵园规制变化的主线,即从早到晚有一个规模变小、营葬越来越简单的过程。按永乐八年的规定,明代亲王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职官坟墓》,影印本第5册,第2732页。

^② 刘精义等:《明代妃嫔陵园及圻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坟园的占地面积应该不超过 90 营造亩^①,远远小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 1398 年)晋恭王陵园之 800 亩。据调查,卒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 1424 年)正月的辽简王之陵园占地面积约 80 亩^②,约合 87.76 明营造亩^③,正在规定范围之内。正统定制亲王陵园占地降为 50 亩,而且这 50 亩不仅仅是陵宫部分,应该还要包括神道、碑亭等附属建筑。同藩而不同时代的王陵规模变化是最能够证明王陵陵园面积缩小的例证,如宁夏同心庆藩诸陵,卒于正统三年(公元 1438 年)的庆靖王陵园为长方形,长 200 米,宽 100 米,面积为 2 万平方米,约合 32.9 明营造亩,陵宫墙周长约合明 187.5 丈。卒于成化五年(公元 1469 年)的庆康王陵园长 140 米,宽 84 米,面积为 11760 平方米,约合 19.35 明营造亩,陵宫墙周长约合明 140 丈。如果只考虑陵宫面积,这两套数据分别都低于当时的定制,此二陵清晰地反映出正統十三年限令颁布前后王墓等制降低的趋势。另外,嗣王陵墓的规模一般也都小于始封王。如卒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 1424 年)的楚昭王陵园围墙周长达 1380 米,合明 431.25 丈,占地面积 118925 平方米,约合 195.68 明营造亩,建筑规模庞大,大大超过了永乐八年定制。而卒于正統四年(公元 1439 年)的楚庄王、卒于正統八年(公元 1443 年)的楚宪王二人的陵园规模都远逊昭王,享堂之后地势逼仄,直接

① 按明代一市尺准今 0.32 米推算,则永乐定制亲王陵围墙周长 290 丈约合今 928 米。明代王陵陵园平面有正方形、长方形两种形式,周长相同,以正方形面积为最大,约为 53824 平方米。据陈梦家先生研究推算,明代一营造亩约合今 607.7440 平方米(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 年第 1 期;本书明亩折算皆用此标准,以下不另注明),则永乐定制亲王陵最大面积约为 88.56 明营造亩。

②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第 8 期。

③ 按 1 市亩折合 666.67 平方米计算,辽简王陵占地约 53333.6 平方米。大体上说,今亩约相当于明营造亩的 1.1 倍。

坟冢。再如德藩诸王陵的占地面积,作为始封祖的德庄王陵园(M4)占地约139600平方米,约折230明营造亩,远远超逾正统之制;而其余诸嗣王墓,M1约35800平方米、M2约27100平方米、M3约36400平方米、M6约28400平方米、M7约24800平方米^①,分别约合明营造亩59亩、45亩、60亩、47亩、41亩,大体与正统令相吻合。

除了降低陵园规制外,实行王与王妃同穴合葬更是节省营造王陵工程开支的一个重要举措。关于王与王妃的合葬,从《明代亲王陵墓资料表》中所列来看,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合葬令颁布以前诸王陵大多为单人葬,如鲁荒王、蜀悼庄世子、辽简王、楚昭王、赵简王、蜀僖王等,此时王妃应当是另建墓室于王陵玄宫附近如鲁荒王妃戈氏即于王玄宫西旁另造墓室而葬;而周定王与王妃及宫嫔等人合葬,梁庄王与继妃魏氏(卒于景泰二年)合葬,王妃纪氏别葬;伊厉王、庆靖王等墓则情况不明。可见,在天顺二年以前王与王妃分葬应是主流。在合葬令颁布以后,该《表》中所列的庆康王、蜀昭王、德庄王、郑懿王、益端王、益庄王、益宣王、益定王等皆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同穴合葬;晋裕王为单人葬。由此可以判定:天顺二年以后王与王妃合葬基本成为定制,晋裕王例外,但他薨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王妃是否卒于明亡以前很难确定。合葬令颁布以后,也有个别破例者,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二月,“蜀王申凿以继妃梁氏薨,乞别择寿圻地并继妃圻同造,诏可。先年王妃陆氏薨,已预造王寿圻,盖王例与妃合葬,而继妃则祔葬其傍[旁],兹特因王请,从之”^②。蜀惠王舍元

^①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五,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己亥,校印本《明实录》第27册,第4633页。

妃而与继妃合葬,应该与梁氏诞育王子宾瀚(后嗣为蜀昭王)有关^①。这方面有一个明显超逾规制的例子,即潞简王次妃赵氏之别葬。她不仅别起坟园,而且公然违反了天顺二年“同一享堂,不许另造”的敕令^②,独建与王等制相埒的享堂,坟园占地面积达35620平方米,约合58.6明营造亩,其坟墙周长约合明248.1丈。而潞简王陵园外宫墙周长约合明294.38丈,占地78.39明营造亩(神道部分占地面积尚未计入),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正统之制。此外,潞简王还有一妃蔡氏,别葬于河南卫辉,墓室的规模也很宏大^③。

1997年发掘的成都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村之蜀某王陵,可能是蜀藩一个过渡期的王陵。该墓属于三人异穴合葬,具体年代不详,据介绍,一、二号墓墓室前八字墙相连,墓室结构尺寸完全一致,可以判断为同时建造,其平面结构与蜀僖王陵近似,但玄宫面积却仅约相当于僖王陵玄宫的七分之一。此墓为异穴毗连合葬,从玄宫平面结构来看,是介于僖王与昭王二种不同形式之间,因此笔者认为其所属时代应当晚于天顺二年合葬令,在僖王之后、昭王之前,而不会晚到明晚期,更不会清初改葬的蜀末王。蜀僖王至昭王之间薨逝的蜀王有和王(天顺五年薨)、定王(天顺七年薨)、怀王(成化八年薨)、惠王(弘治六年薨)四位,其中怀王、惠王葬成都东郊十陵镇南,而和王有葬成都府城南之说,则此墓墓主最大可能是定王,1999年在锦江区

^① 《明武宗实录》卷三八,正德三年五月庚戌:蜀王宾瀚,“惠王第二子也,母妃梁氏。成化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生,弘治四年十二月封世子,弘治七年十二月袭封蜀王,至是薨”。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1页。

^③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56页,《明潞王蔡妃墓》,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琉璃乡潘家沟村曾发现蜀定王次妃王氏(惠王生母,卒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墓,也可以作为一佐证。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同藩列王同兆域序昭穆而葬之令颁布以后,仍有后世嗣王另择葬地之事。而且在同兆域内,也没有明显的昭穆制度,从楚藩陵园来看,靖王(正德五年卒)陵园之左为端王(卒于嘉靖十三年)、右为愍王(嘉靖二十四年卒)似符合祖孙三代昭穆制度,但靖王并不是楚藩始封祖(靖王以东安王之子人继宪王、康王),而且后来在靖王与愍王之间又葬了卒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楚恭王。益藩昭、宣、敬、定四代王同葬于一处,属于自东而西的祖孙鱼贯葬,既没有父子左昭右穆之分,也与上古以西为尊、“尚右”的礼俗相悖,从已发掘的明代帝王陵墓来看,以东为尊、“尚左”应当是通行惯例。可见弘治令中“序昭穆葬”只是一种祖孙、父子排序的说法,并不一定是要在亲王墓葬分布上恢复上古的昭穆制度。

综上所述,明代亲王陵宫制度并不划一,如果鲁荒王陵体现的是洪武时期典型的王陵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认定永乐八年的定制比洪武早期略有扩张,正统十三年则明令缩减王陵规制,其后天顺二年的王妃合葬令、弘治五年的子孙从葬令都体现了降低王陵规制以减省开支的原则。不同时期的王陵与朝廷明令规制并不完全一致,有不及者亦有超越者,这表明亲王陵园制度执行起来并不十分严格,其主要原因应该与不同藩府、不同时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有关。有些王陵营造经费直接出自皇帝特旨,如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七月,“赐靖江王任昌造坟全料,以靖江分封不宜与他郡王例,特给之”^①。万历十四年六月,“秦王宜湜薨逝,给封内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九,万历十一年七月庚寅,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2591页。

郡县无碍钱粮三千八百两,与伊妃坟一并造葬”^①;这是沿用成化之制。至于潞简王陵园严重逾制,甚至超越了永乐以来的所有定制,应该是出自皇帝的格外特许或默许,《御祭潞王碑》引述的追封赵次妃之诰即可以说明问题,该诰文中有云:“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国家定制:惟王正配得册为妃,至于侍媵,例靳不封,而效有勤劳、情有可恤者亦得推恩而追录焉。尔赵氏系圣母钦赐,随封之国,难拘常例,特允王请追封尔为次妃,以彰朝廷笃念亲王之意”^②。潞简王与神宗同出于慈圣李太后,太后对少子甚至还有些偏爱,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十一月,“一日,神庙偶醉,佩剑夜游,将一内官头发斫下,又杖二内官几毙。慈圣老娘娘知之,翌晨易青布袍,屏簪珥,声言欲特召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将废神庙立潞王。且先令喧传于官中,神庙恐惧滋甚,跪泣久之始解”^③。潞简王死后,世子常滂年幼,暂由王妃李氏代理藩事,章奏直达神宗御前,而不必经由通政司等衙门,“时福王奏请,辄取中旨,帝于王妃奏亦从中下,示无异同”^④,身为皇帝同母弟的潞简王在世时,这种“难拘常例”、“直取中旨”的行为只会更加突出,超逾常规的潞简王及其次妃陵墓就是在这些背景下建成的。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五,万历十四年六月癸酉,校印本《明实录》第55册,第3219页。

^②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第5期。

^③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五,“三朝典礼之臣纪略”,点校本第2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传·潞简王翊鏐》,标点本第12册,第3648页。

第三节 明代王陵玄宫形态研究

明代王陵的玄宫结构犹如其地面陵园一样,也是不尽划一,而且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更为少见,朝廷似乎根本就没有关于王陵玄宫规制的明文规定。本节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已经公开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其中内容比较翔实、准确,并配有带比例尺玄宫平面图的明代亲王陵墓室调查发掘报告或简报有:宁献王陵^①、鲁荒王陵^②、蜀悼庄世子陵^③、益端王陵^④、潞简王陵^⑤、辽简王陵^⑥、德庄王陵^⑦、襄藩诸王陵^⑧、蜀僖王陵^⑨、楚昭王陵^⑩、梁庄王陵^⑪以及无玄宫结构

①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②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③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④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⑤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第5期。

⑥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⑦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⑧ 襄樊市考古队等:《明襄阳王墓调查》,《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⑨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⑩ 梁柱等:《武昌县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第24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⑪ 梁柱:《钟祥明代梁庄王墓的发掘》,《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的益宣王陵^①、益定王陵^②等;还有一些资料附有示意图,或可以根据有关描述勾勒出示意图,从而可以大体了解其玄宫结构,如晋裕王陵^③、益庄王陵^④、伊厉王陵^⑤、庆康王陵^⑥、周定王陵^⑦、赵简王陵^⑧、郑懿王陵^⑨、肃庄王陵^⑩、蜀昭王陵^⑪以及1997年发掘的蜀某王陵^⑫等;另外还有10余座亲王妃和郡王墓室资料可资研究参照,主要

①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翎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②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③ 郭勇等:《明晋裕王墓的清理工作》,《文物考古资料》1956年第6期。

④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见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1977年,内部刊印。

⑤ 徐金星等主编:《洛阳市文物志》,第133—134页,《明代伊王朱樛墓》,洛阳市文化局刊印,内部资料,1985年。

⑥ 许成等:《同心县任庄村明代王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第175—17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⑦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321页,《明周定王墓》,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杨焕成等主编:《河南文物名胜史迹》,第614—616页,《明周定王墓》,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调查资料。

⑧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77页,《赵简王墓》,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杨焕成等主编:《河南文物名胜史迹》,第267页,《赵简王墓》,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

⑨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05页,《郑懿王墓》,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⑩ 施连山:《明肃王墓考略》,《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林健:《兰州明肃王府遗迹、遗物调查研究》,《陇右文博》2005年第1期;调查资料。

⑪ 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⑫ 谢涛:《成都发掘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村明蜀王及王妃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22日第1版。

有：荆端王次妃墓^①、宁康王次妃墓^②、鲁荒王妃墓^③、潞简王次妃墓^④、辽废王朱贵烺之妃墓^⑤、汝安王次妃墓^⑥、蜀定王次妃墓^⑦、宁靖王夫人吴氏墓^⑧，以及秦藩兴平安僖王墓^⑨、肃藩某郡王墓^⑩、晋藩广昌悼平王墓^⑪、益藩罗川瑞懿王墓^⑫、周藩原武温穆王墓^⑬、靖江安肃王等王墓^⑭、宁藩乐安昭定王墓^⑮等。本节即以上述资料为基本依

① 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② 郭远渭：《南昌明宁康王次妃冯氏墓》，《考古》1964年第4期。

③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④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第5期。

⑤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王妃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

⑥ 李波涛：《卫辉清理一明亲王次妃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5月5日第1版。

⑦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295—314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⑧ 樊昌生等：《明代王妃饰物：工艺精湛、金碧辉煌——南昌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大批金银玉器及保存完好的丝织品》，《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9日第1版；樊昌生等：《南昌发掘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8日第1版；《宁靖王妃盛装出土》，《文物天地》2002年第3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⑨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四府井明安僖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⑩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⑪ 戴尊德：《山西太原七府坟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⑫ 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

⑬ 郑州市博物馆：《荥阳二十里铺明代原武温穆王壁画墓》，《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⑭ 罗标元等：《靖江王墓群简介》，《广西文物》1987年第1期；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明靖江王十一陵述略》，《广西文物》1987年第2期。

⑮ 徐兴万等：《明乐安昭定王墓清理纪实》，《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据,对明代王陵玄宫进行研究。

一、明代王陵的玄宫形态

根据已调查发掘的各藩王陵的墓室结构,本书将明代王陵玄宫分为八种形态进行分析研究,其先后顺序的排列以主室多者优先,配室为二级指标,耳室仅作参考。

1. 七室玄宫

七室玄宫由三主室和四配室构成,其形式为前、中、后三个主室依次排列,前、后室两室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配室,平面呈“工”字形。这是目前已知明代亲王陵玄宫的最高等级,比北京昌平明神宗定陵还多两个配室,应该是“九宫格”式九室玄宫的另外一种简化形式,湖北江陵湘献王朱柏(卒于建文元年)的衣冠冢即为此种形式(图3—32)。朱柏为明太祖第十二子,因被告谋反而忧惧自焚,明成祖即位之初建墓于荆州城西之太晖观。该墓于1997年12月被盗掘,清理



图3—32 明湘献王陵玄宫

出土文物 600 余件,有“湘献王宝”木玺等,墓室总面积 109 平方米^①。江西鄱阳淮靖王朱瞻燠(卒于正统十一年)之墓连同东西耳室等也共有七室,墓穴长 29、宽 12 米^②,具体形式不详。

2. 五室玄宫

按其平面布局的不同,五室玄宫可以分为三主室二配室三壁龕之标准型和三主室二配室二耳室之蜀藩型两型。

(1) 标准型五室玄宫

三主室二配室三壁龕型五室玄宫也可以称为“典型五室玄宫”,其平面布局和明神宗定陵玄宫一致,即前、中、后三室依次排列,平面呈“十”字形,中室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配室,后室的后壁和左右两壁各有一个壁龕。属于这种玄宫结构的明代亲王陵有伊厉王陵(卒于永乐十二年,葬河南洛阳)、肃庄王陵(卒于永乐十七年,葬甘肃榆中)、辽简王陵(卒于永乐二十二年,葬湖北江陵)、宁献王陵(卒于正统十三年,葬江西新建)、庆康王陵(卒于成化五年,葬宁夏同心)五座,其中伊、肃、辽、宁四王均为太祖之子、各藩始封王,庆康王为太祖之孙,庆藩二代王。

这五座亲王陵玄宫的平面结构虽然相似,但其规模却大小不一:

伊厉王玄宫以大砖砌成,全长 34.1 米(不计墓道,含隧道券),隧道券以条石封堵。前室石门,无纹饰;中室及两配室无门,后室木门,已朽。

肃庄王玄宫以青砖砌成,三主室通长 24 米,两配之室间最宽处 13.1 米;前室、后室为石门,中室为木门,门上均涂朱漆,两配室无门(图 3—33)。

^① 丁家元:《荆州堪明湘王府城遗址》,《中国文物报》1998 年 6 月 17 日第 1 版;荆州市博物馆资料,转引自王纪潮:《明代亲王葬制的几个问题》,《文物》2003 年第 2 期;调查资料。

^② 孙家骅等主编:《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第 522—523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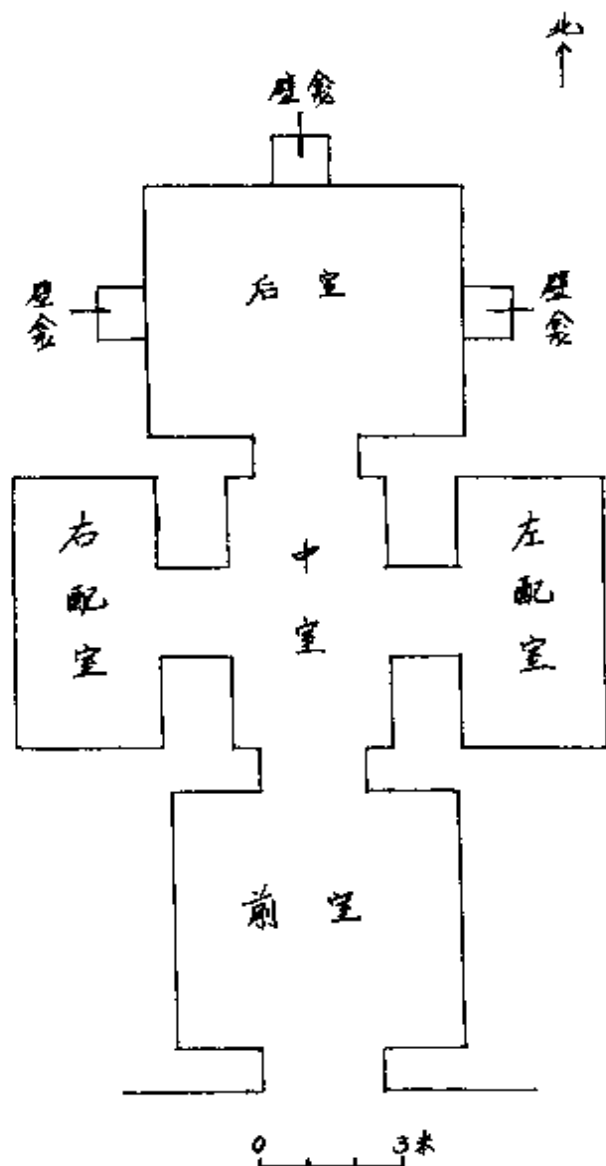


图3—33 明肃庄王陵玄宫平面图
(据有关资料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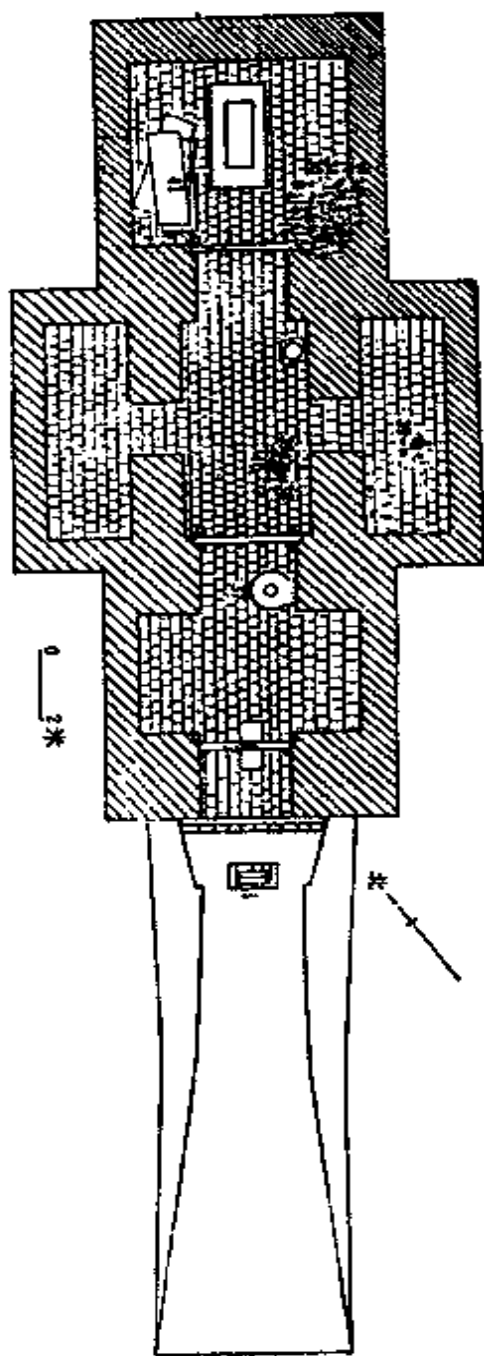


图3—34 明辽简王陵玄宫平面图
(引自《考古》1995年第8期)

辽简王玄宫砖砌,纵长 21.8 米,两配之室间最宽处 10.6 米;封门墙两层,外砖内石。前室石门,石门上部已毁,现存五行石钉,每行九颗;中室、后室均为木门,皆已残腐;两配室无门(图 3—34)。

宁献王玄宫砖砌,少数部位使用石料,自礮礮前端至后室壁龕后墙止,全长 31.7 米,若不计礮礮部分,则全长为 27.7 米,两配室后墙之间即墓室最宽处为 21.45 米。礮礮末端有封门墙两层,其后为门槽,插石板三块,插板式石门以内为隧道券。前室、中室各为石门,门上有铺首;后室及两配室无门。后室及两配室均有棺床(图 3—35)。宁献王玄宫在前室之前还另有一室,安设插板式石门,该墓“发掘报告”将之称为“前室”,而把前室称为“次前室”^①。实际上,这个“前室”仅相当于明清皇陵以及部分王陵玄宫前的隧道券或罩门券,所以不把它单独列为一室;而插板式石门的作用也正相当于又一道封门墙。

庆康王玄宫砖砌,三主室连前甬道通长 18.1 米,两配之室间最宽处为 13.5 米。室门已无,室内积土,门限遗迹不清,曾出土门上铜泡(图 3—36)。

以上五墓皆为每室各发一筒拱券,即五室五筒拱券,以宁献王玄宫最为考究(图 3—37),纵深长度最大者为伊厉王陵,庆康王玄宫规模最小。辽简王、宁献王皆为单人葬,1975 年伊厉王墓室左侧曾挖出王妃刘氏圻志,可知伊厉王亦系单人葬。庆康王玄宫中发现有四对肱骨,当为夫妻合葬,是遵守了天顺二年(公元 1458 年)的亲王与王妃合葬令。

此外,别葬于河南卫辉的潞简王妃蔡氏,墓主室面阔五间,左右耳室各一间,面积 317 平方米,青石砌筑,拱券顶^②,可能也是五室玄宫,但其具体内涵不详。

^①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 年第 4 期。

^②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 256 页,《明潞王妃墓》,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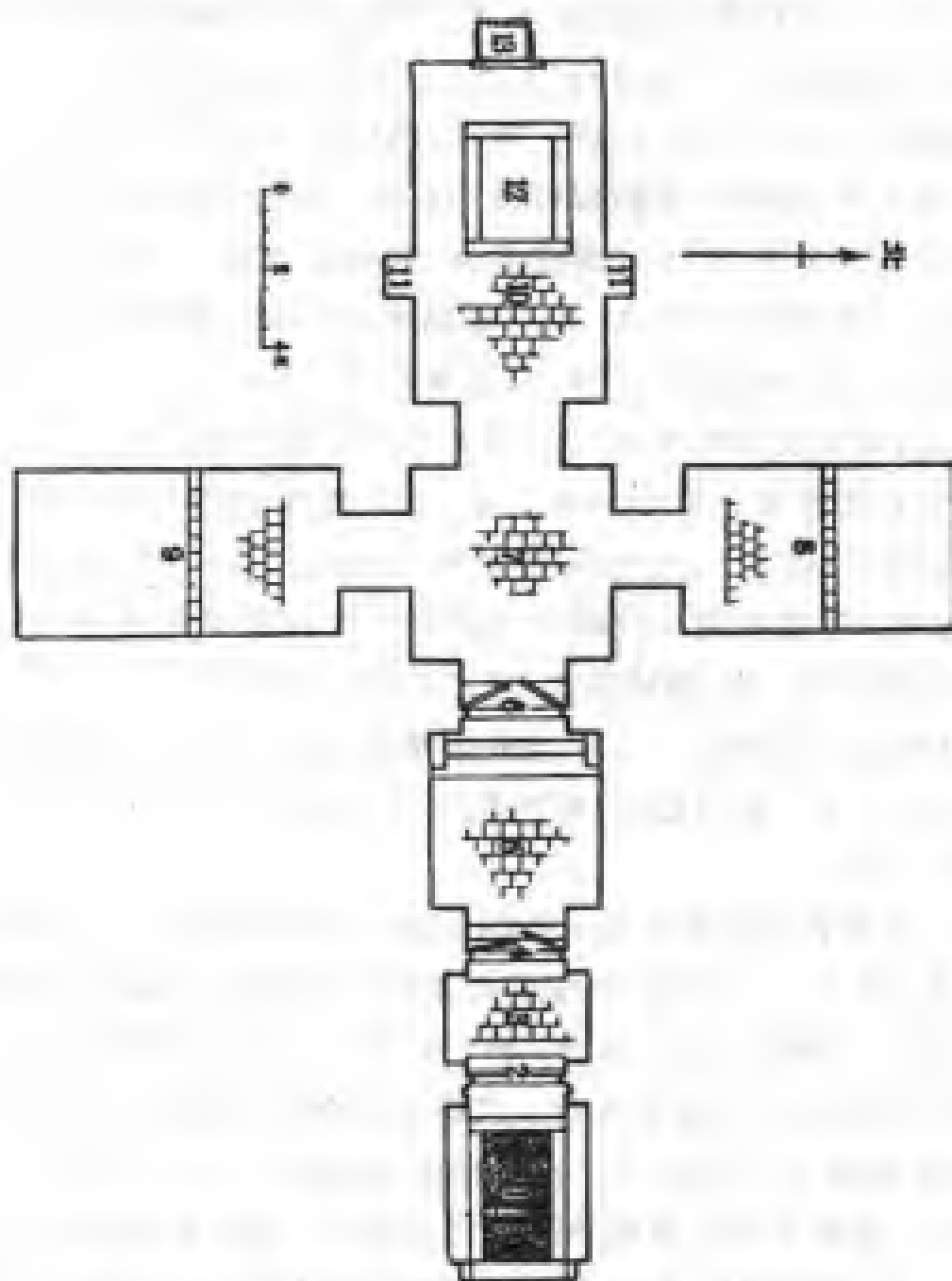


图3—35 明宁缺王陵玄宫平面图(引自《考古》1962年第4期)

1. 埋罐 2. 一门 3. 前室 4. 二门 5. 次前室 6. 三门 7. 中室
8,9. 左右耳室 10. 后室 11. 左右壁龛 12. 棺台 13. 后壁龛



图3—36 明庆康王陵玄宫



图3—37 明宁献王陵玄宫

(2) 蜀藩型五室玄宫

成都北郊凤凰山蜀悼庄世子墓提供了王陵五室玄宫的另外一种形式,即三筒拱券五墓室(图3—38)。悼庄世子卒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次年四月下葬,该玄宫由三个砖筑纵列筒式拱券并连而成,全长33米,墓室内最宽处为10.5米。三券把墓室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前面的拱券比较矮小,长4.7米,中高5.06米,相当于一般帝王陵墓玄宫的隧道券或罩门券,前有石门,发掘简报称之为“前庭”。石门外两侧为“八字墙”。

中券规模最大,长21米,中高6.2米,拱跨7.66米,这道拱券下的空间以并排的三座宫门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相当于其他玄宫的前室,后面相当于其他玄宫的中室。悼庄世子玄宫内部装饰比较特殊,在前、中两室的两侧壁前均搭出硬山顶厢房各五间,中室的正中偏前还有石构正方形圈室一座,形如小亭,内陈设石桌三件;另在中室厢房之后左右壁各有一 1.27×1.30 米的小耳室,亦安设石门。这种布置使得前、中两室不似殿堂,倒颇似庭院,因此,该墓“发掘简报”称前室为“正庭”、称中室为“中庭”,认为这种布局是“模拟王府的规制”^①,此说应该有一定的道理。但将连接“前庭”与“正庭”的宫门名为“前室”、将连接“正庭”与“中庭”的三座宫门(前后檐柱间进深为1.58米)名为“正室”,则显然有失允当。

后券在中券之后,长7.6米,中高6.08米,这部分墓室相当于一般王墓玄宫的后室。但此墓却在同一拱券下将空间分隔为左、中、右三室,每室前各有格子门通向中室(“中庭”),其中中间一室较大,长7.6米,宽3.26米,顶以石板砌成盝顶,地表比“中庭”高出22厘米,中设棺床,两旁有直棂窗与左右两室相望。棺床后壁正中有壁龛痕

^①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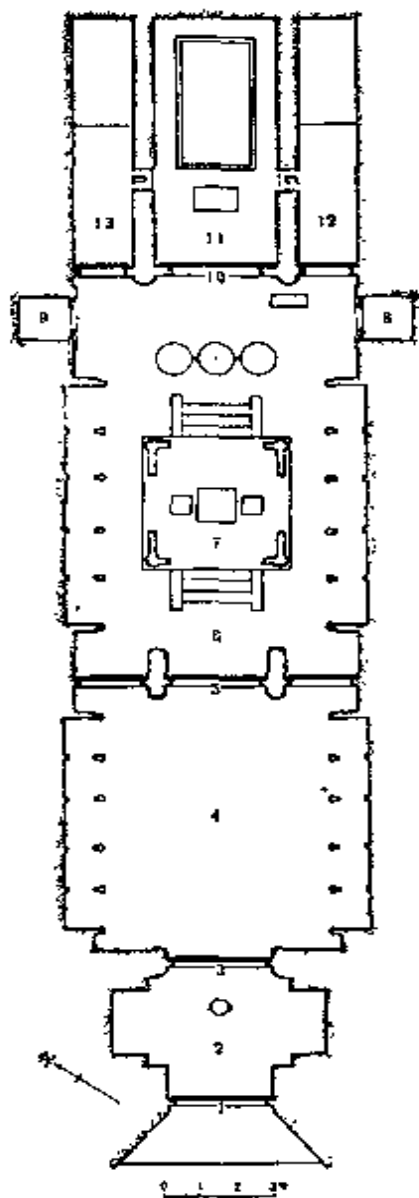


图 3—38 明蜀悼庄世子陵玄宫平面图(引自《考古》1978年第5期)

1. 大门 2. 前庭 3. 二门 4. 正庭
5. 正殿 6. 中庭 7. 圆殿
8. 左耳室 9. 右耳室 10. 后殿
11. 后殿中室 12. 后殿右室
13. 后殿左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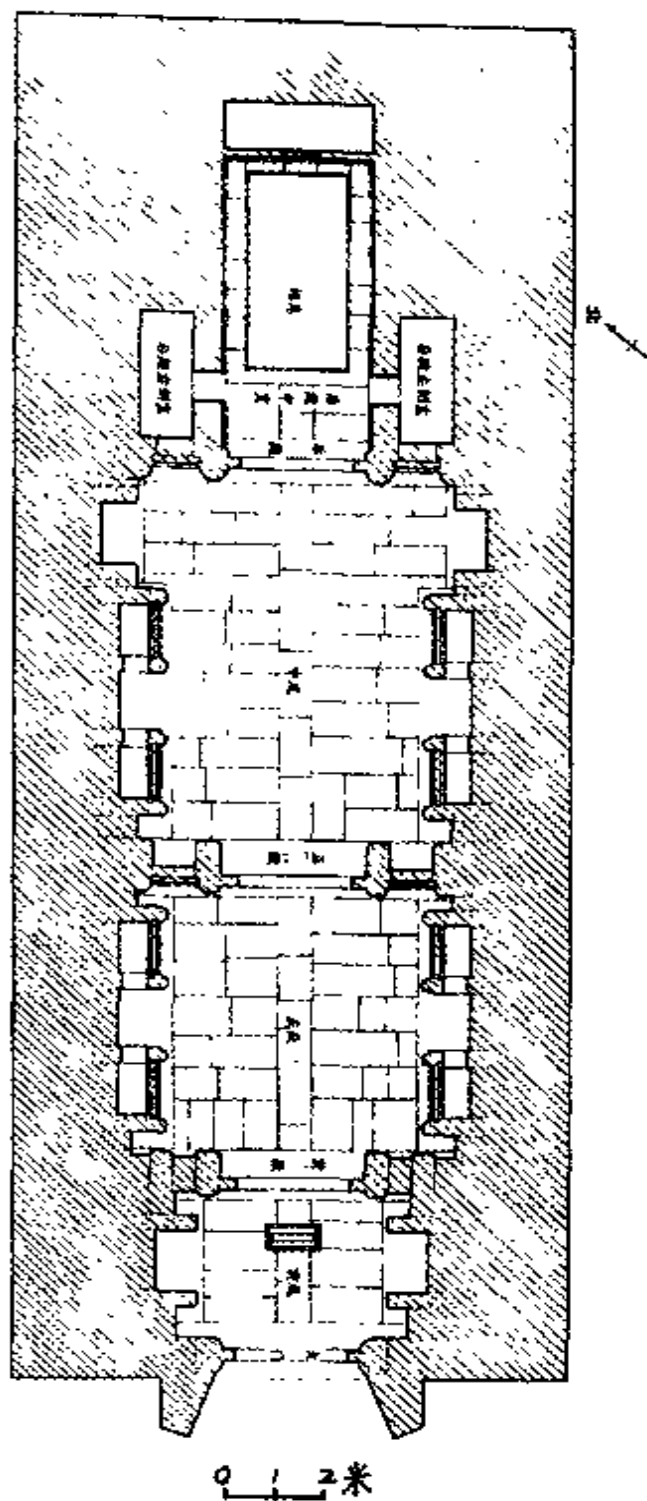


图 3—39 明蜀僖王陵玄宫平面图(引自《文物》2002年第4期)

迹,原貌已被盗墓者破坏。

蜀悼庄世子玄宫与前述五王陵玄宫不同,它的前殿、中殿均明显象征庭院,只有后殿象征殿堂,并且将两配殿设在了后室两侧,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可以称之为“蜀藩型五室玄宫”。如果再将只具象征意义的中殿中的两个小耳室(配室的减略形式)算入,则此墓似又可视为“七室玄宫”。

蜀僖王陵是蜀藩型五室玄宫的简化形式。僖王为悼庄世子之第三子,卒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六月,次年三月葬,其墓在今成都东郊十陵镇南。僖王陵砖券结构,玄宫砖石混筑,通长27.8米,最宽处6.14米。该陵“发掘简报”亦将玄宫各部分分别称之为“前庭”、“前室”、“正庭”、“正室”、“中庭”、“后室”^①。整个玄宫由两筒拱券组成,“前庭”即自用一券,其余后面三室共用一券。中室内无“圜室”之设,而代以雕龙纹红砂石宝座一副;中室后部的两个小耳室平面呈长方形,面阔2.08米,进深0.66米,无石门。后室亦分三室,中室长6.71米、宽2.9米、高3.17米,长方形盝顶,上有曼荼罗及莲花、八吉祥等图案,室中央设石棺床,单人葬;两个配室面积狭小,各有小门与后室主室相通(图3—39)。

和悼庄世子陵相比,僖王陵玄宫不仅规模比较小,建筑结构和装饰也趋于简化。从平面布局来看,有两点变化值得注意:其一是“八字墙”以内的“前庭”部分占玄宫总面积的比重加大,悼庄世子陵“前庭”长4米,中部最宽处5.67米,僖王陵“前庭”长3.74米、中部最宽处5.56米,二者相差无几,但从总面积来看,僖王陵却仅相当于悼庄世子陵的一半左右。其二是后室部分变小,后室之中室仅足容棺,两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个配室更是仅具象征意义。这两个变化为后来之蜀王陵“前庭”演变为“前室”、后室萎缩为仅足容棺的棺室开了先河。

3. 三室玄宫

三室玄宫分为“标准型三室玄宫”和“蜀藩型三室玄宫”两型。

(1) 标准型三室玄宫

标准三室玄宫是三主二配三壁龛型五室玄宫的减略形式，亦即标准五室玄宫省略掉左、右配室，保留并连于一条纵轴线之上的前、中、后三室，平面呈“目”字形。这种玄宫结构应该是五室玄宫最直接的减略形式，明光宗庆陵可能就是这种结构。山西榆次晋裕王陵是典型的三室玄宫，晋裕王朱求桂卒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十一月，五年八月葬，其墓在榆次北苏村，玄宫分前、中、后三室，安设石门，门洞高2米。三室墙上全部用白粉涂底，其上彩绘云雾，后、中两室用红、黄、淡墨三色，前室增加了绿色，墓门及外墙涂红色。

(2) 蜀藩型三室玄宫

成都东郊的蜀昭王陵属于略有变型的三室玄宫。蜀昭王卒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其陵墓在今龙泉驿区洪河镇白鹤村与十陵镇千弓村交界处。昭王玄宫砖砌拱券结构，券内以砖石砌筑出墓室，自墓道起连同“八字墙”部分总长41米余，券内落空进深16.5米、宽4.7—5米。该墓夫妻合葬，八字墙后隧道券以内分为前、中、后三室，前室、中室两侧各以枋柱表示两厢；后室为棺室，以墙体分隔为左右两室，每室各置一棺，前、中两室虽未以墙隔开，但也和后室一样，辟左右两门，中间隔以雕团龙石门柱，三室双门各自前中后相对。在后室的“两个棺室之间，纵隔厢房的壁面下部，镌刻一座庑室式房屋图形，面阔约0.65米、高0.54米。檐下壁面，刻作两扇门扉，呈现略推开之状。因而在棺室之间，形成一条相通的竖缝，表示夫妻二人魂

灵便于随时过往相从”^①。这种图案实际上是宋元以来“妇人启门”墓饰的一种延续和变体(图3—40)。



图3—40
明蜀昭王陵
玄宫后殿隔
墙假门

1997年成都锦江区琉璃乡发掘的明蜀某王陵为三室玄宫的另外一种形式。此墓为在一直径约60米的大封土堆下并列三座墓室,东、中两墓结构和大小完全一致,根据出土墓志得知分别为某王妃和蜀某王的玄宫。在八字墙以内,玄宫以石门分隔为前、中、后三部分,各宽1.95米,前段长3.4米、高2.3米,中段长2.55米、高2.2米,后段长2.5米、高2.05米;因为前段最为高大,所以发掘者径称之为“前室”,尽管这部分仅相当于其他陵墓玄宫的隧道券或罩门券,其后依次为“中室”、“后室”^②。在“后室”之后另有一室,相当于蜀僖王

① 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② 谢涛:《成都发掘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村明蜀王及王妃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22日第1版;谢涛:《成都市潘家沟村明蜀王、王妃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年》,第224—22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陵的后室,地表高出前面 0.5 米,进深 3.6 米、宽 1.2 米,后壁另有一宽 1.2 米、进深 0.8 米、高 0.9 米的壁龛;因其窄小,发掘者称之为“棺室”。这种玄宫结构可以视为前、中、后三室的一种扩张和变通之例。

这座王陵玄宫西旁另有一套墓室,规模比较小,宽 1.8 米、全长 8.9 米,八字墙以后分为前、后两室,后另有棺室,墓主身份应比王妃略低。

1999 年发掘的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玄宫结构与上述蜀某王陵相同,该墓在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村十二组,按照发掘报告的描述,从八字墙开始,由四道石门把玄宫分为四部分,即前室、中室、后室和棺室(图 3—41)。前室长 2.58 米、宽 2.6 米、高 3.44 米,中室长 3.86 米、宽 2.6 米、高 3.44 米,后室长 2.32 米、宽 2.12 米,叠顶,彩绘金凤和红日祥云;棺室长 4.68 米、宽 2.12 米,棺床石砌,内实以黄土,长 3.5 米、宽 1.52 米、高 0.56 米,“床面由 5 块石板铺成,中轴线上等距离地透雕 5 个方孔圆钱式穿孔”^①。蜀定王次妃玄宫共发两券,前室、中室共一券,后室、棺室共一券。该墓做工考究,营造级别也等同于亲王,四道石门门钉纵横各九路,门身涂朱,门钉涂金。

4. 十室玄宫

明代王陵十室玄宫目前只见一例,即周定王陵玄宫,为二主室各附四配室结构。

周定王朱橚为明太祖第五子、明成祖同母弟,卒于洪熙元年(公元 1425 年)闰七月,其墓在禹州城北后营老官山,墓室距地表约 10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1999 成都考古发现》,第 295—314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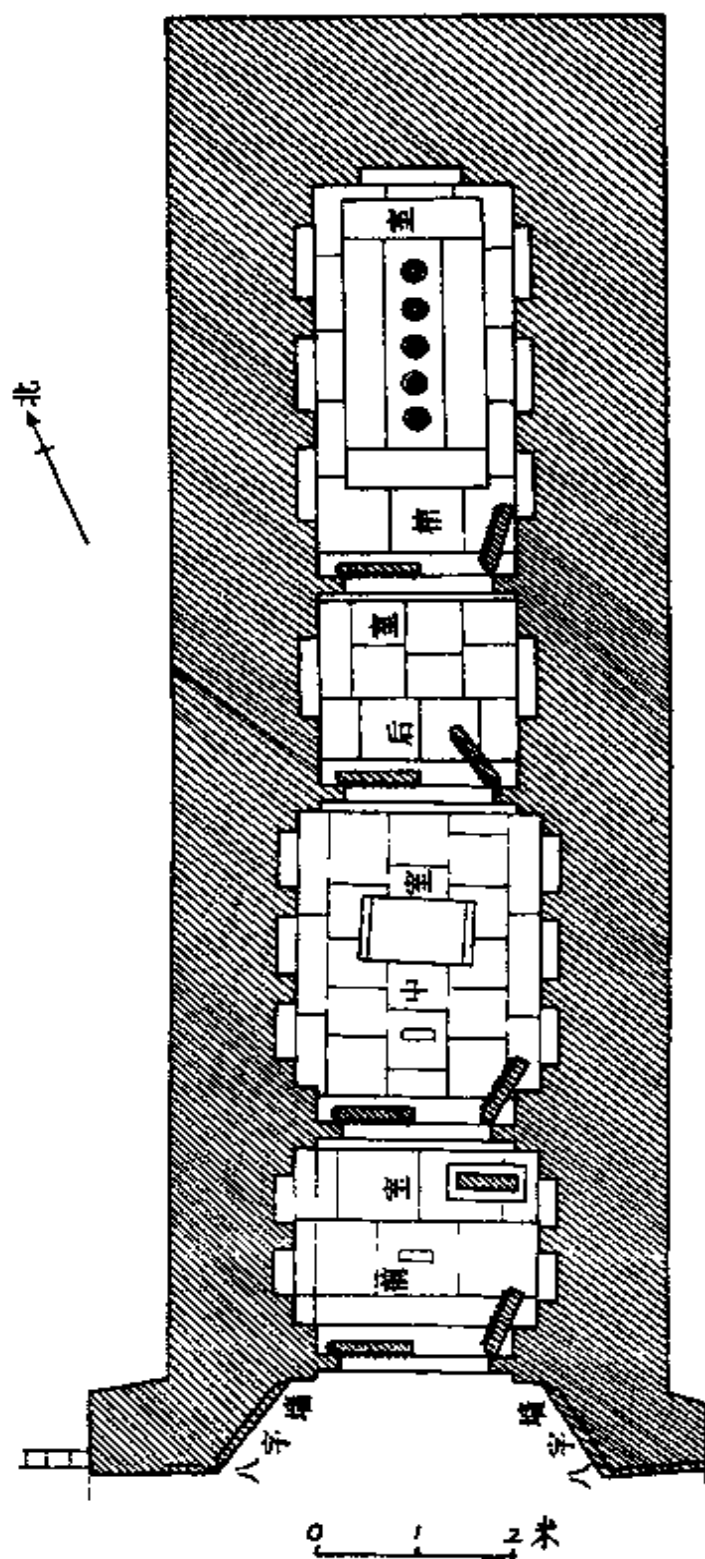


图3—41 明蜀定王次妃墓玄宫平面图(引自《1999 成都考古发现》)

米,由墓道、墓门、甬道及前、后、中、左、右五组殿堂组成;在其右前方500米处另有王妃及宫人陪葬墓^①。另据《河南文物名胜史迹》一书介绍^②,周定王玄宫为劈山凿洞,砖石砌券,结构为墓道、墓门、甬道及前、后、中、左、右五室组成,墓室纵长约40米,宽34米,总面积1970平方米。如果这个数据无误,则周定王玄宫之大当居明代帝王陵墓玄宫之冠,要远远大于定陵(1195平方米)。从实际调查来看,周定王玄宫并非五室玄宫,而应该是两主室各附带四个配室。墓道长20米,宽5米,墓门为石仿木结构,顶覆黄绿色琉璃瓦。甬道长6.55米,宽6.44米,甬道尽头为石门,门墙厚2.55米,石门两扇,各高3.17米,宽1.6米,厚0.2米。玄宫前室长12.33米,宽9.58米,左右各有两个相同的配室,间以石门;配室深10.23—10.25米,宽3.7—3.71米。前室之后升8级台阶通过石门入后室(也被称为寝殿或主室),该室宽25.7米,进深9.57米,高15米,室内有棺床,棺床后有壁龛。后壁并排4个配室,各有石门,其中中间两个门额上镶嵌仿木结构装饰,曾出土“故次妃穆氏”、“故次妃杨氏”墓志,可知四个配室为隔室附葬。此墓的“寝殿”有棺床,应为周定王的葬处,四个后配室为王妃等人葬处,称之为“后殿”显然不恰当。因当时在帝王中流行宫妃殉葬制度,故此玄宫中的诸棺可能是同时随周定王入葬的。

5. 四室玄宫

四室玄宫是三主二配型五室玄宫的另外一种简略形式。它是将标准型五室玄宫纵轴线上的三主室省为二室,但保留两配室而成。

^① 河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河南省文物普查大观》,《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② 河南省文物局编:《河南文物名胜史迹》,第614—616页,“明周定王墓”,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

河南安阳赵简王(卒于宣德六年)墓、河南新乡潞简王(卒于万历四十二年)墓墓室均为这种四室玄宫结构。

潞简王陵玄宫由甬道、前室、左右配室、后室五部分组成,石砌拱券结构。甬道长 7.62 米、宽 2.62 米;前室长、宽各 4.8 米,高 4.95 米;左、右配室各长 4.8 米,宽 3.82 米,高 4.95 米;后室长 6.1 米,宽 15.63 米,高 6 米。各室之间有拱券门相通,中室内陈设石几筵,后室置棺床。玄宫距地表 3.8 米,总面积 185 平方米(图 3—42)。卒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的潞简王赵次妃墓玄宫布局与潞简王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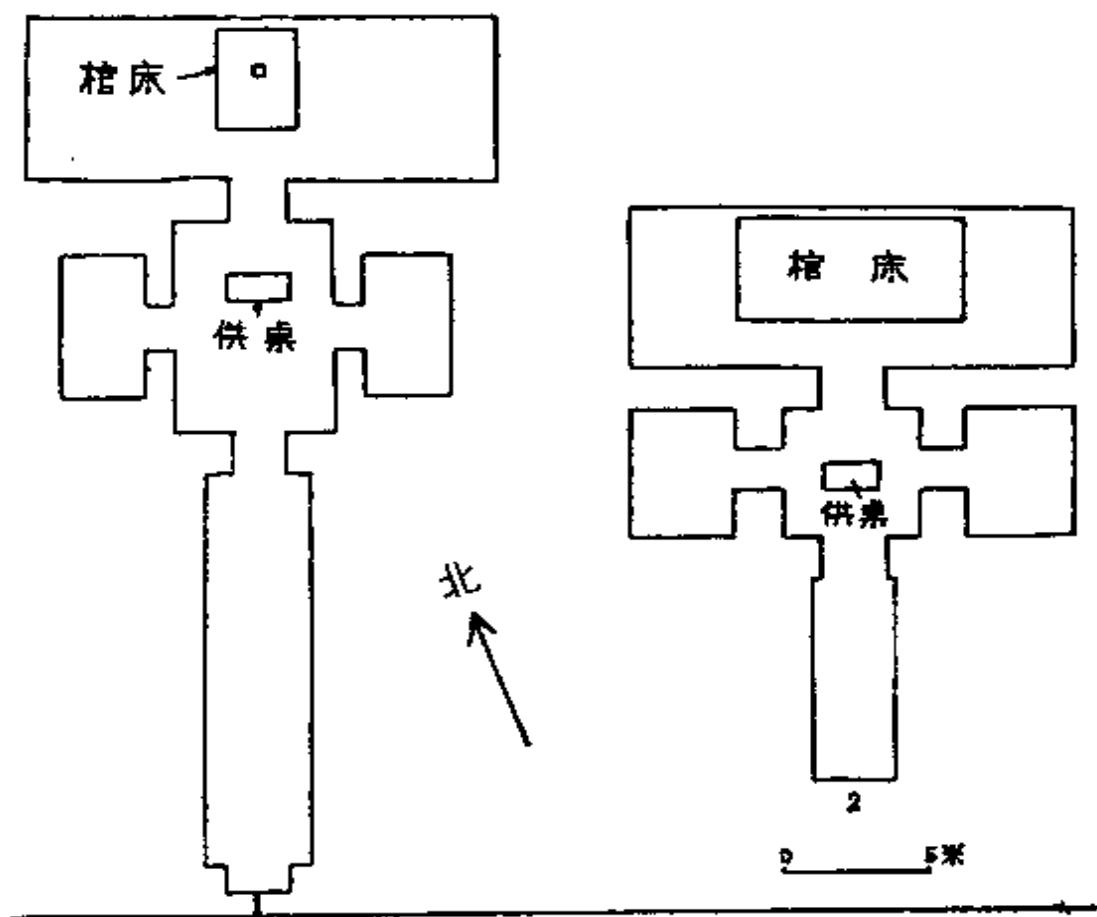


图 3—42 明潞简王陵玄宫(右)、潞简王次妃赵氏墓玄宫(左)平面图(引自《文物》1979 年第 5 期)

宫相似,它的高度虽然稍逊王玄宫,但其前后两室面积均大于王陵,总面积达230平方米,特别是甬道长约16米,宽3.6米,规模宽敞,前起隧道券,平面结构已经逼拟五室玄宫。

6. 二室玄宫

二室玄宫分为“标准型二室玄宫”和“德藩型二室玄宫”两型。

(1) 标准型二室玄宫

标准二室玄宫即前后并连两室,平面呈“日”字或“干”字型,这种玄宫形式在明代亲王陵中比较多见,鲁荒王陵、梁庄王陵、郑懿王陵、襄康王陵、襄庄王陵等墓室均为此种形式,除亲王外,郡王陵玄宫亦多见此制。

鲁荒王朱檀,卒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十二月,其地宫距地表20余米,凿山开圹,以砖砌室,墓室前为封门墙、金刚墙各一道,金刚墙内为隧道券,其后为墓室,通长20.6米,共有石门两道。前室南北长8.05米,东西宽5.25米,高4米,纵向筒券;后室南北长5.45米,东西宽8.2米,高5.05米,横向筒券。后室中央设棺床,地表铺砖(图3—43)。

鲁荒王次妃戈氏,卒于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十月,祔葬于鲁荒王玄宫西旁^①,玄宫前后两室,通长15.2米。

梁庄王朱瞻埈为明仁宗第九子,封国安陆(今湖北钟祥),卒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正月,同年八月“葬封内瑜坪山之原”^②。墓室凿山开圹,青砖拱券结构,前为10.6米长的斜坡墓道,墓道尽头为凿岩面成的隧洞,其内以青砖砌墓室,以石灰浆料黏合;内长15.4米、

^①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② 明·佚名:《梁庄王圹志》,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第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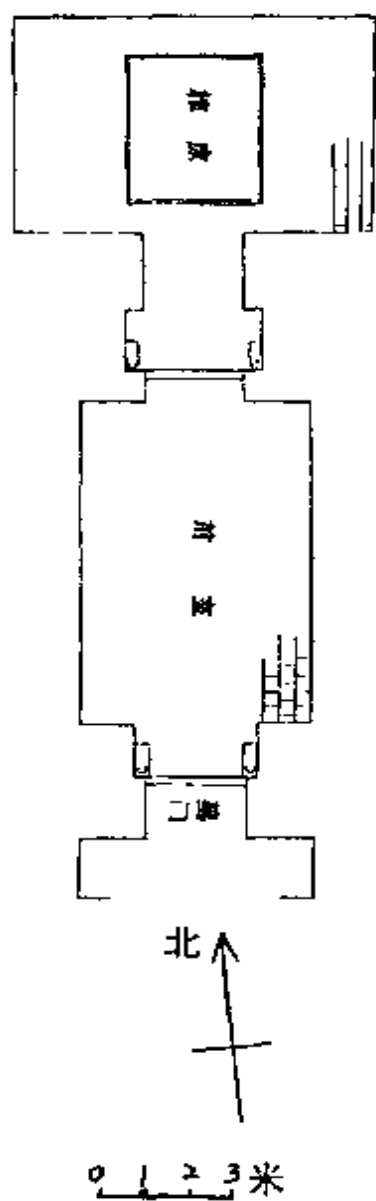


图3—43 明鲁荒王陵玄宫平面图(引自《文物》1972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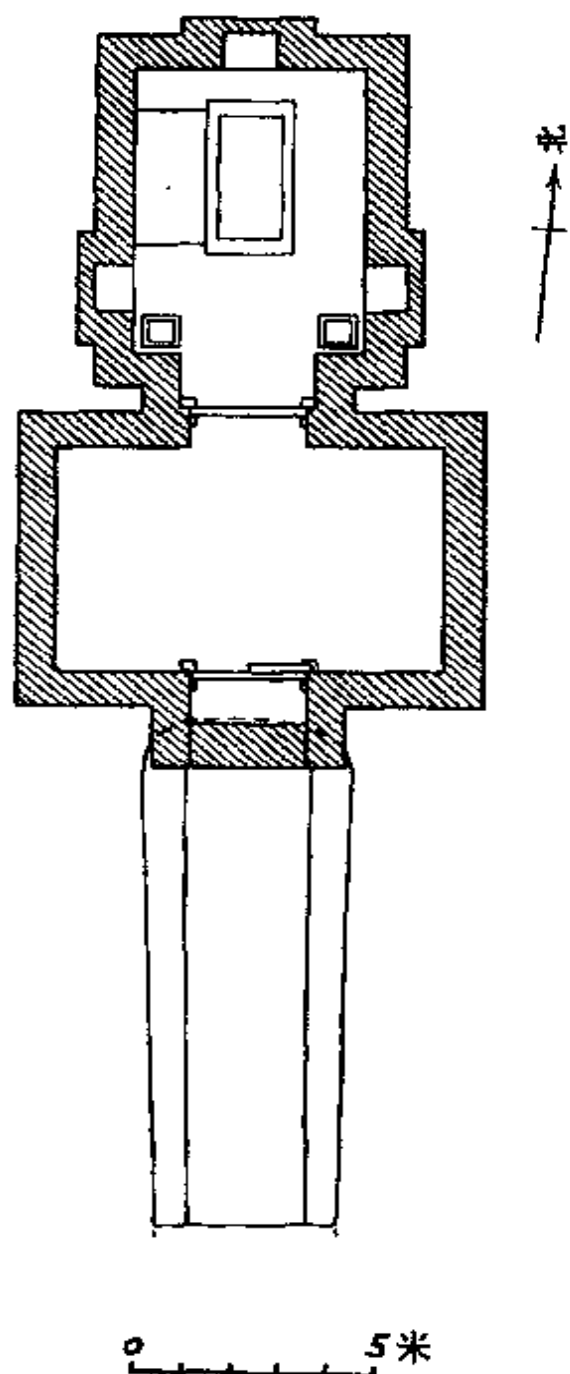


图3—44 明梁庄王陵玄宫平面图(引自《文物》2003年第5期)

最宽处 7.88 米、高 5.3 米,分为前后两室,各有一条甬道和双扇石门。后室三壁各有一小壁龛(图 3—44)。在后室正中偏后石砌棺床,石包边,内芯为原生红赭岩,王棺置其上;其西侧(右位)另有一稍小棺床,砖砌,内实黄土,葬王继妃魏氏,卒于景泰二年(公元 1451 年)三月,同年九月与王合葬。梁庄王无子,因二女幼,魏氏因免殉葬,据圻志记载:“正统六年正月十二日,王以疾薨,欲随王逝,承奉司奏,蒙圣恩怜悯,遂降敕旨存留,抚养王二幼女,仍主王宫之事。”^①

郑懿王朱祐檠为明仁宗玄孙、郑藩四代四任王,卒于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其墓在今河南沁阳西方乡校尉营村,玄宫砖砌,穹窿顶,宽 5.8 米、进深 8.3 米,前室出土多尊彩绘泥俑,后室并置郑懿王及王妃阎氏、赵氏三棺。

襄康王朱祐楨,卒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墓室条石砌拱券结构,前后两室(图 3—45)。前甬道长 1.6 米、宽 2.15 米、高 2.88 米;石门已失,门槛犹存;砖砌封门墙。前室长 2.55 米、宽 3.45 米、高 3.8 米。后甬道长 0.93 米、宽 2.3 米、高 2.88 米,残存石门一。后室长 5.65 米、宽 4.75 米、高 4.1 米。

襄庄王朱厚颙,卒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砖石砌拱券结构,前后两室,平面呈土字形,石门(图 3—46)。前甬道砖砌,长 2 米、宽 1.4 米、高 2.2 米。前室砖砌,长 2.5 米、宽 4 米、高 3.2 米。后甬道砖砌,长 4.5 米、宽 1.4 米、高 2.2 米。后室石砌,长 4.5 米、宽 5.7 米、高 4.5 米;后部有石棺床,长 5 米、宽 2 米、高 0.18 米。

宁康王次妃冯氏,卒于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 年)十一月,墓室

^① 明·佚名:《梁庄王妃魏氏圻志》,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5 期,第 2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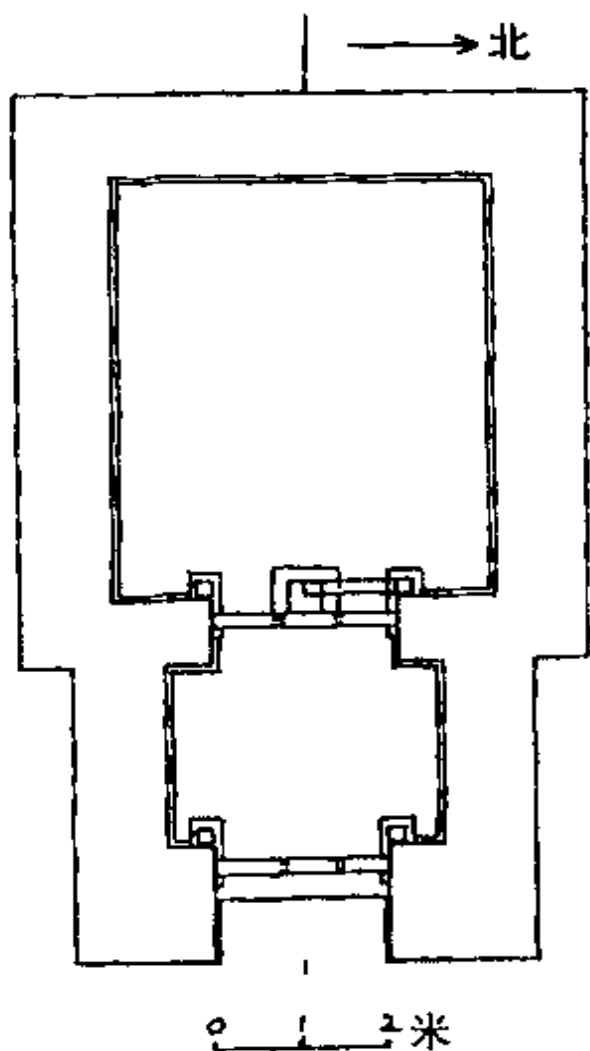


图3—45 明襄康王陵玄宫平面图
(引自《江汉考古》
1999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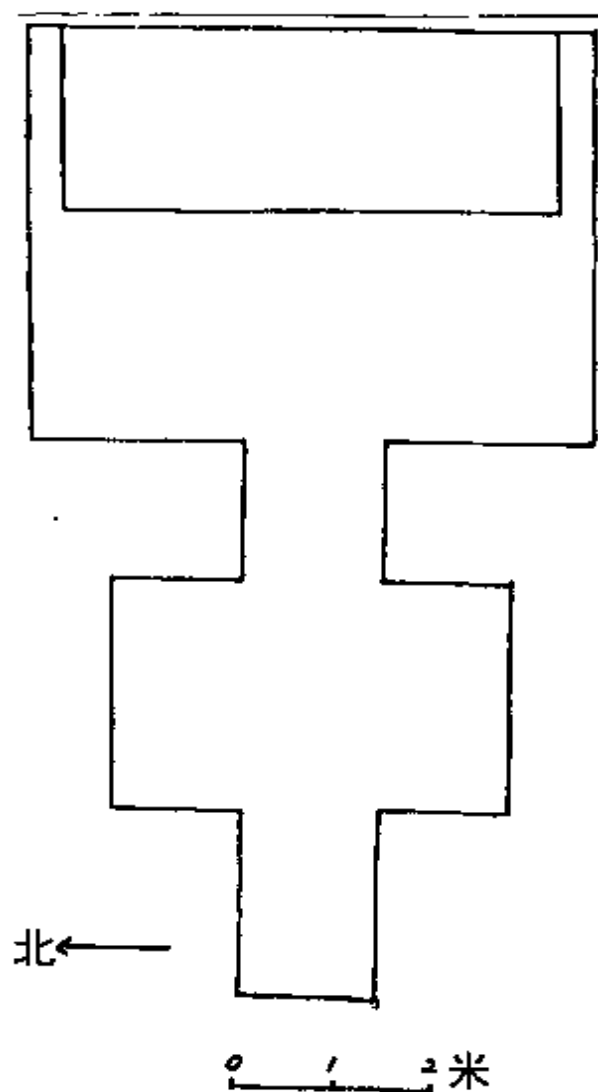


图3—46 明襄庄王陵玄宫平面图
(引自《江汉考古》
1999年第4期)

拱券结构,前后两室,前室长6.75米、宽3.05米、高3.35米;后室长8.52米、宽3.09米、高4.2米,左、右两壁各有壁龛二,后壁有壁龛一。

除亲王和王妃外,标准二室玄宫亦见于明代郡王墓。

晋藩广昌悼平王朱济熈为明太祖之孙、晋恭王之子,卒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月,次年六月葬,其墓在今山西太原北郊七府坟村。玄宫砖筑,拱券结构,坐东朝西,前后两室通长13.1米。墓道长18米,前室南北长3.7米、东西宽2.7米、高3.95米,后室东西长9.74米、南北宽3.6—6.1米、高3.95—4.95米,南北和西壁各有一壁龕。石砌棺床,单人葬(图3—47)。王妃杨氏卒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五月,同年九月葬,墓为单室。嗣王(广昌安僖王)生母刘氏卒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墓为两室,前后通长近10米。

秦藩兴平安僖王朱公铄为明太祖玄孙、秦愍王曾孙^①,卒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十一月,次年六月葬,其墓在今陕西长安县韦曲以东四府井村,坐南朝北略偏西,前后两室通长近14米。前室长3.85米、宽4.25米、高4米,左、右两壁各有一壁龕,后室长9.15米、宽4.1米、高4.35米,左、右、后壁各有一壁龕。前后室均安石门,棺床在后室,单人葬(图3—48)。

宁藩乐安昭定王朱奠垒为明太祖曾孙、宁献王孙、追封宁惠王之子,卒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十一月,次年八月葬,其墓在江西新建望城乡幸福花坑山。玄宫以红石和青砖砌成,拱券结构坐北朝南,前后两室,自金刚墙至后室通长19.83米。前室长5.37米、宽3.49米、高3.27米,后室长7.95米、宽5.35米、高4.13米,左、右、后壁各有一壁龕。棺床在后室,以红石砌成,内实三合土。王妃宋氏卒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原葬别处,迁与王合葬。

^① 秦愍王庶四子尚焯为始封兴平王,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薨,谥恭靖。子庄惠王嗣,《明史》卷一〇〇,《诸王世表一》谓其“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薨,无子,除”。从兴平安僖王圻志得知,安僖王以庄惠王之次子袭封,成化十二年薨,《明史》此条记载有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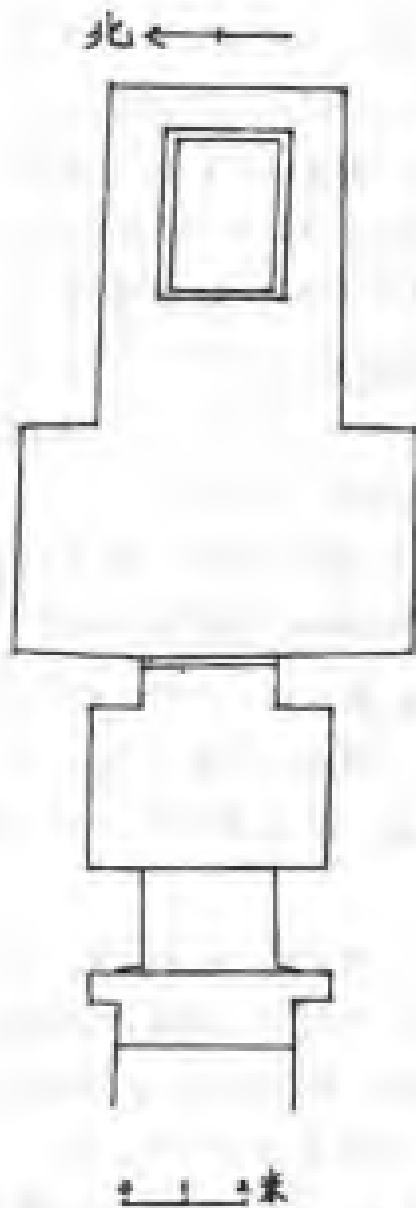


图3—47 明晋藩广昌悼平王陵玄宫平面图(据《考古》1961年第2期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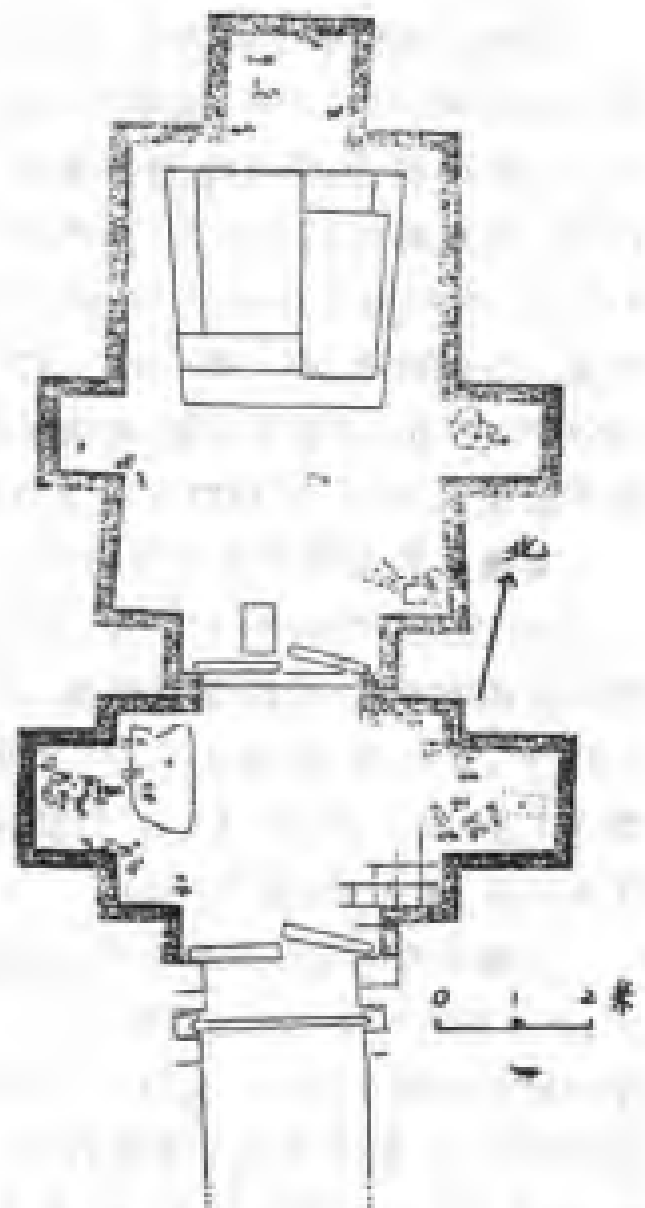


图3—48 明襄藩兴平安僖王陵玄宫平面图(引自《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2) 德藩型二室玄宫

德藩型二室玄宫是标准二室玄宫的一种变通方式,即后室分为并列的左右二室或三室,其中德庄王朱见潏之墓经过清理发掘。德庄王玄宫地表距地面约 13 米,砖石拱券结构,由墓道、甬道、前室、东西后甬道、后东室、后西室等几部分组成,平面近乎倒置的“凹”字形(图 3—49),朝向与陵园方向一致,均为 197.5° 。斜坡式墓道,南宽北窄,全长 46.1 米。墓道尽头为金刚墙一道,顶檐之正脊、正吻、额枋等为青砖瓦,垂脊为绿釉琉璃瓦;金刚墙下部正中为墓门,石须弥座,砖砌拱券式,高 4.76 米、宽 2.9 米(图 3—50)。券洞内 1.46 米处双扇石门一道,门高 2.54 米、宽 1.02 米、厚 0.21 米,雕出 81 颗门钉和铺首衔环。门外为乱石、砖块封堵,其上有德庄王及其妃刘氏的圹志各一合。玄宫通长 17.02 米、通宽 11.9 米,墙基及甬道两端的拱圈、殿门为石质,其余墙壁和券顶均为青砖。前室东西 11.9 米、南北 5.36 米、高 6.58 米,殿内正中有两个小石台,西壁下偏南有一石砌须弥座式棺床,长 2.83 米、宽 1.42 米、高 0.54 米,正中为长方形金井。

前室北壁东西各有一甬道,间以双扇石门,分别通向后东室和后西室,两组建筑规模、结构完全相同。其中甬道长 3.03 米,石门高 2.3 米、宽 1.03 米、厚 0.17 米;室内南北 5.51 米、东西 4.14 米、高 4.8 米,墓室中央为石砌须弥座式棺床,长 2.77 米、宽 1.45 米、高 0.48 米,正中为长方形金井。两室之间开设一窗形隧道相通,面宽 0.5 米、高 0.66 米、长 3.22 米(两后室壁间距),隧道距玄宫地面 1.9 米。

德庄王卒于正德十二年(公元 1517 年)八月,正德十三年四月葬。王妃刘氏卒于弘治六年(公元 1493 年)十二月,葬于弘治九年九月。前室所葬被推测为庄王庶三子济宁安僖王朱祐棔,薨于正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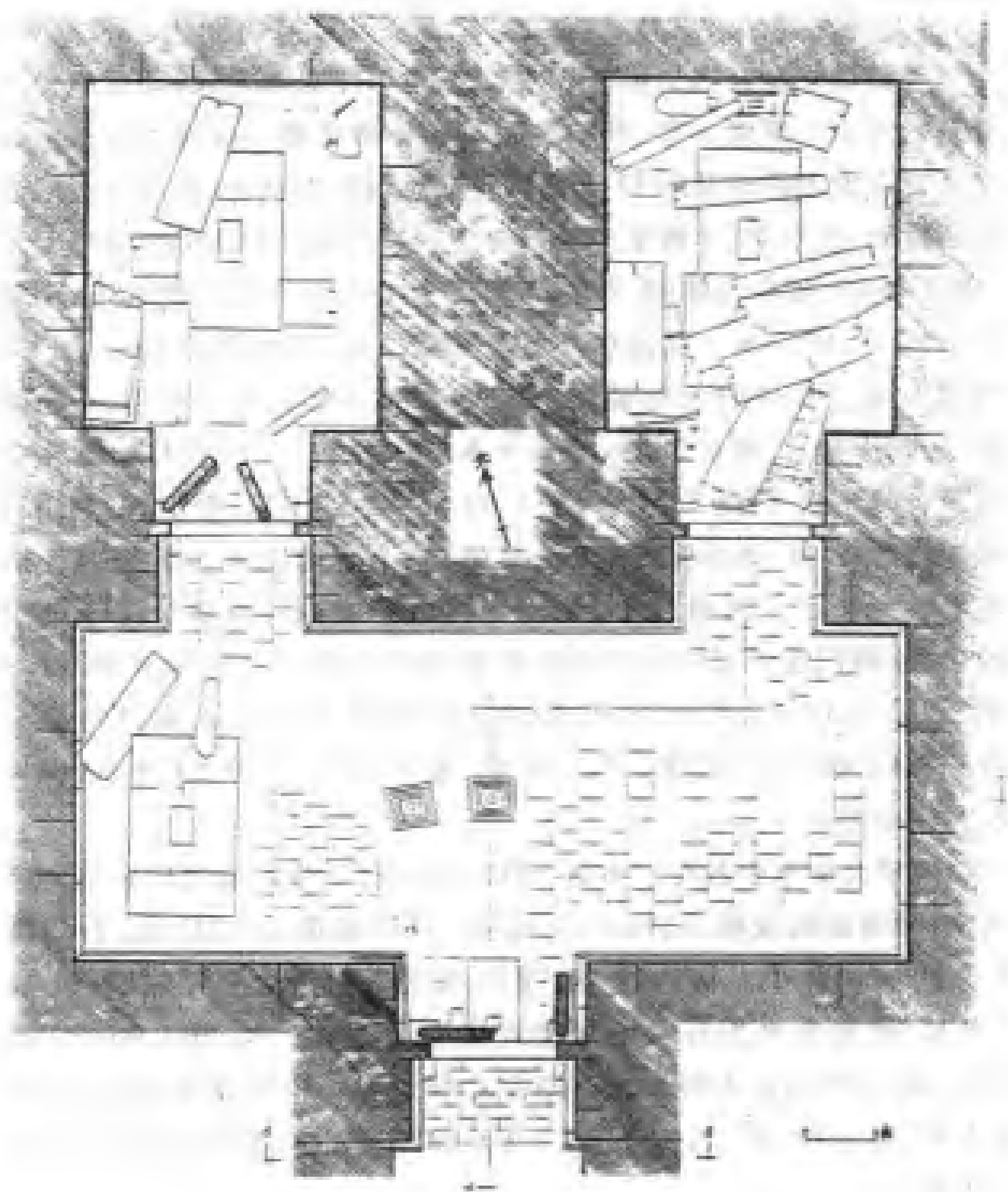


图3—49 明德庄王陵玄宫平面图
(引自《考古学辑刊》第11辑,1997年)

年(公元1512年)。发掘墓道时发现,该墓有多次葬的迹象,与“开圻合葬”的事实相符。

山东长清德藩王陵有些墓的玄宫早年被挖开,亦可见其大致结构。如2号墓前室为砖石结构,券顶,已被破坏;后室分为左、中、右三室。6号墓前室东西约7米、南北约4米,后室亦分为三个小室。

湖南常德的荣定王陵玄宫结构和德府王陵玄宫结构相似。荣定王朱翊修为

明宪宗玄孙、荣藩四代三任王,卒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其墓在常德市德山。墓室长17米,宽13米,分为前、后两室,后室又分为三个小棺室,荣定王与王妃李氏、杨氏合葬,尚存石棺床等^①。

德藩型二室玄宫是为方便夫妻开圻合葬,而又不使先葬者棺柩



图3—50 明德庄王陵墓道及玄宫门

^①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中国名胜词典》,第799页,《明荣定王墓》,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第183页,《荣定王墓》,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

再次暴露而出现的一种变通形式,和葬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的蜀昭王陵玄宫异曲同工。这种墓葬结构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颁定之“王或妃有先故者,并造其圻,后葬者止令所在官司起倩夫匠开圻安葬”^①的合葬令相适应,但其形式在南京明初功臣墓中已见(详后)。

7. 单室玄宫

单室玄宫平面呈“凸”字或“甲”字形,楚藩诸王玄宫皆用此制。

楚昭王卒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二月,其玄宫结构为砖砌单券单室,南北进深13.84米、东西面阔5.78米、高4.78米,左、右、后壁各有一落地壁龛,壁龛较大,形同耳室(图3—51)。玄宫正中为石砌棺床,上置昭王棺槨,棺床前为石供案一,上陈供器及谥册匣、谥宝匣等,复前为碑碣形圻志(图3—52)。玄宫南壁并列三座双扇小石门,每门均由门楣、立颊、门槛组成,每扇石门上有81颗门钉,但门甚小,最大的中门仅高1.15米、宽0.8米,左右门高1.09米、宽0.76米,仅可蹲姿出入,颇明器化。

据武汉市考古研究所所长魏航空先生介绍,调查武昌龙泉山陵区的楚王陵之玄宫结构发现,诸陵皆与楚昭王玄宫形式相同,为单室单人葬,但有个别的左侧壁龛较大,内葬一具女性尸骨。

1977年发掘的肃怀王朱绅堵(葬于嘉靖四十三年)及其妃王氏墓玄宫为单室,一说肃康王朱瞻焰(葬于天顺八年)墓玄宫亦为单室^②。

襄宪王朱瞻塔,葬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其墓室为条石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1页。

^② 甘肃省博物馆资料;施连山:《明肃王墓考略》,《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调查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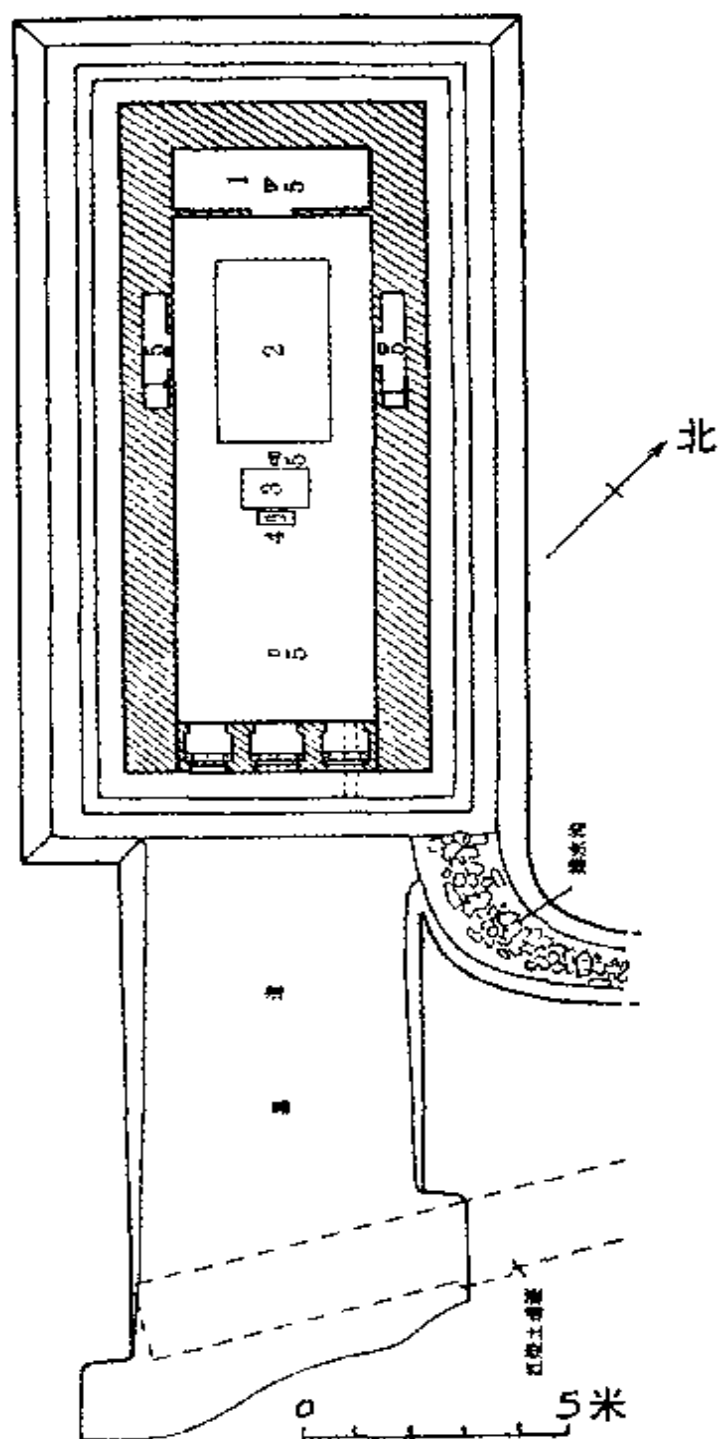


图3—51 明楚昭王陵玄宫平面图(引自《文物》2003年第2期)

1. 窆龕 2. 棺床 3. 供桌 4. 墓志 5. 灵牌



图 3—52 明楚昭王陵玄宫

砌筑单室结构,墓顶以方块石横行起券,1层,厚0.25米。前有甬道,平面呈“凸”字形。墓室内长6.4米、宽4.8米、高3.8米,墓室后部有石棺床。墓门石质,高1.8米、宽1.3米,厚0.185米。甬道内前后部分别以青砖乱石块封砌,尺寸不详。

襄简王朱见淑,卒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经勘探得知其墓室结构为单室砖砌,券顶,平面呈“凸”字形。墓室内长6.2米、宽2.4米。

按照原“发掘简报”介绍,江西南城明益端王、益庄王二陵为二室玄宫,但从该二陵的平面结构来看,其“前室”甚小,仅相当于甬道,因此这两座墓也应该是单室。

益端王卒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八月,次年八月葬于江西南城县东南的金华山。其墓室凿山而建,以红条石为墙基,青砖砌墙及拱券,通长8.2米,前设石门两道,平面呈“甲”字形(图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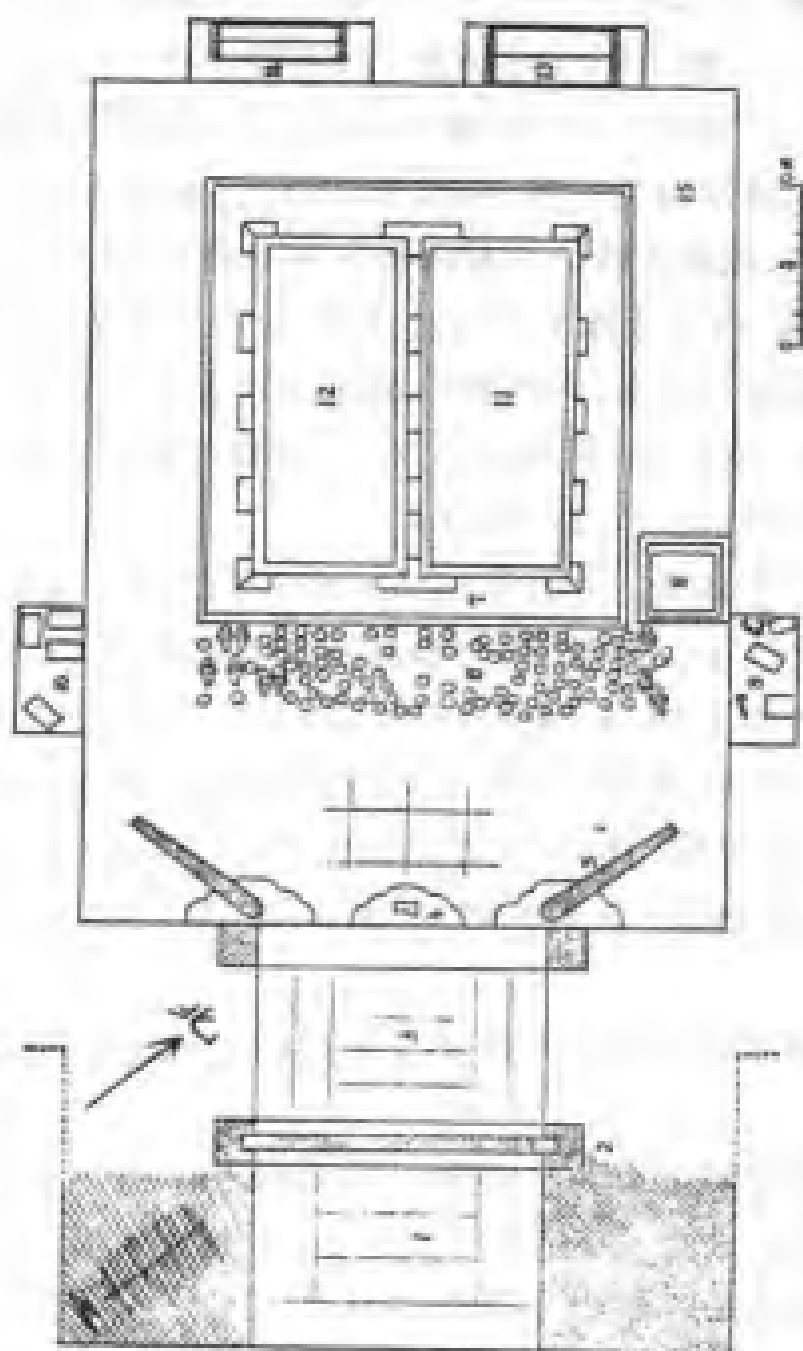


图 3—53 明益端王陵玄宫平面图(引自《文物》1973 年第 3 期)

1. 门券 2. 一门 3. 前室 4. 门栓插槽 5. 二门 6. 陶甬 7. 棺台
8. 楹枋 9. 东壁龛 10. 西壁龛 11,12. 棺 13,14. 护志 15. 后室

玄宫前斜坡墓道,长4.92,宽3.1米;其后为甬道,宽1.62米,进深2.33米,高2.12米,中为插板式石门,地铺条石。石门以内即原《发掘报告》所名之“前室”,与“甬道”部分共发一纵券,插板石门即自此券正中插下。墓室自为一券,前设开式石门,室宽3.62米,进深5.2米,高2.97米,地铺方砖。左右两壁各有一高0.62米、宽0.8米、深0.38米的壁龛,内各放四个小木盒;后壁并列二壁龛,分别高1.1米,宽1.02米,进深0.3米,内各置一副圹志。墓室内正中以红石砌棺床,长2.66米,宽2.33米,高0.6米,上并置二棺,益端王居左,王妃彭氏居右,头向朝里(与墓门相反)。

益庄王卒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五月,次年三月葬于南城县东南的金华山,玄宫结构与益端王玄宫结构相似,但规模略大。其甬道部分进深1.53米,宽2.13米,高2.45米,地铺方砖。墓室宽4.66米,进深5.48米,高3.35米,左右壁各有一壁龛,后壁原并列三壁龛,但后来又封堵。棺床上并列益庄王及王妃王氏、继妃万氏三棺,三棺四周加砌高1.2米的墙,以石灰将三棺之间及棺与墙之间的空隙填实。

王妃使用单室玄宫的有辽废王朱贵烺之妃曹氏墓、汝安王次妃晋氏墓等。

辽废王曹妃约卒或葬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十一月,其墓在湖北江陵,单室,砖砌,长5.2米、宽3.3米、高2.4米。墓门在东壁,南、北、西三壁各有一壁龛,进深0.3米。

汝安王次妃晋氏卒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以前,其墓在河南卫辉,墓室为砖砌单室,券顶,长4.15、宽2.7米,后墙有壁龛。

明代郡王墓使用单室玄宫有若干实例。

在广西桂林东郊尧山历代靖江王墓群中,1961年发掘过恭惠王朱邦華次妃刘氏墓(王隆庆六年卒,妃万历五年卒)(图3—54);1972

年发掘过安肃王朱经扶及妃徐氏合葬墓(王嘉靖四年葬);1982年发掘康僖王朱任昌(万历十年葬)夫人莫氏墓。据介绍,靖江王陵玄宫分为前后两室^①,但实地考察发现,所谓“前室”面积窄小,实为甬道,所以笔者认为靖江王陵玄宫亦属于单室。墓室青砖砌券,下壁用石料,左右壁各有二或三个壁龛,后壁有壁龛一个。王、妃均为单人葬,但玄宫隔墙毗邻,有的还以壁龛相通,次妃别葬。



图 3—54 明靖江恭惠王次妃刘氏墓玄宫

甘肃兰州上西园肃藩某郡王墓,年代为嘉靖十六年(公元 1537 年)或再稍后,由石门、甬道、主室、耳室组成。甬道长 2.25 米、宽 1.18 米、高 2.48 米。主室东西 7.45 米,南北 5.46 米,自底至顶高 3.46 米,墓门朝正北。东西两壁各有一耳室,与主室联以券门,耳室

^① 罗榕元等:《靖江王墓群简介》,《广西文物》1987 年第 1 期。

南北长 11.5 米、东西宽 1.3 米、高 2.1 米。四壁各砌高 37 厘米、宽 55 厘米、深 55 厘米的小壁龛两个(图 3—55)。夫妻合葬,男棺在东,女棺在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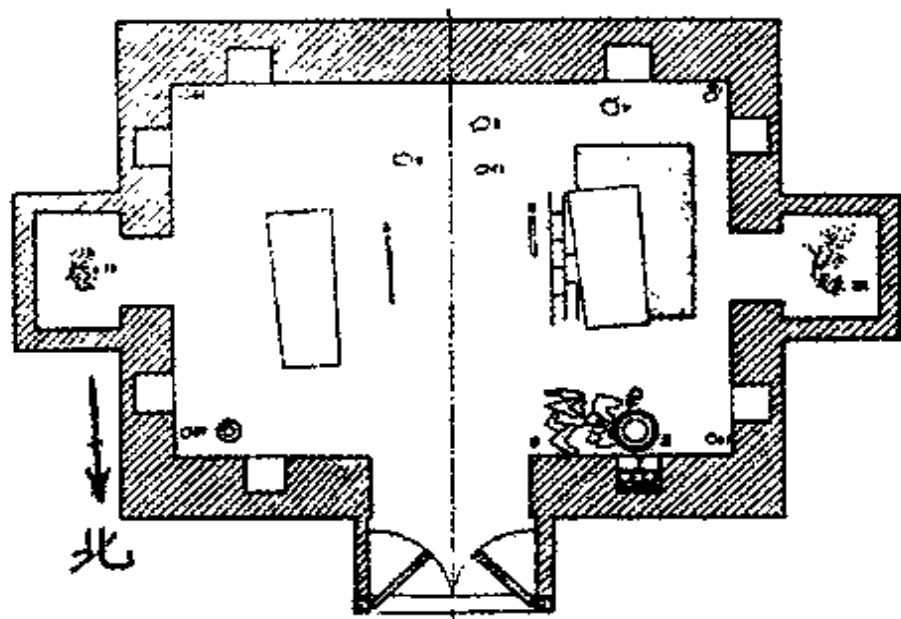


图 3—55 明肃藩某王墓(甘肃兰州上西园)玄宫平面图
(引自《考古》1960 年第 3 期)

周藩原武温穆王朱朝垞,为周简王裔孙、六世原武王,万历三十五年(公元 1607 年)薨,其墓在河南荥阳二十里铺乡瓦屋孙村,墓室距地面 7 米,小砖砌成,石门南向,室内长 5 米,宽 4.1 米,高约 3 米,东西北三面各有一壁龛。室内除前壁外,画满反映佛教彩绘壁画,棺床石砌,正方形,边长 2.9 米,温穆王与王妃张氏合葬。

此外,河南洛阳邙山的伊藩洛阳安惠王朱勉堡(薨于天顺八年。名从墓志,《明史·诸王世表》记其名曰勉堡,追谥为伊安王)墓、伊藩万安康懿王朱典楨(薨于隆庆四年)墓也系砖砌拱券结构,单室,其

中万安康懿王墓深约4米,墓室之南为墓道^①。

8. 石灰椁墓

明代亲王中还有仅筑椁室、而不建墓室玄宫的墓葬形式,已发掘实例有江西南城的益宣王墓和益定王墓。

益宣王朱翊钊,薨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二月,其墓在今江西南城县岳口乡游家巷村。该墓是在墓穴中以青砖砌成长方形大椁室,室内以砖墙隔成三室,每室长2.4米、宽1.04米、高1.2米,在椁室前墙外复砌出一长3.4米、宽0.5米、高1.1米的空间,用以放置圹志。每座椁室内葬楠木棺一具,中为益宣王,左为王妃李氏,右为继妃孙氏,三棺椁室之上各盖一块长3米、宽1.5米、厚0.27米的绿色大石板,石板凿成边槽搭合缝。棺椁之间空隙处以石灰填实。大石板之上再以石灰糯米汁浇筑,形成一个长5.7米、宽3.6米、厚0.8米的整体覆斗状的盖顶。

益定王朱由木,薨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二月,其墓在益宣王墓西侧,棺室建筑结构与宣王墓相似。此墓亦为三人合葬,中定王,左王妃黄氏,右次妃王氏,圹志在椁室前,但不另砌砖志圹。墓圹口石盖板上石灰糯米汁厚0.2米,整个盖顶长4.7米、宽3.2米。

经过考古发掘的这种砖椁填石灰墓葬结构之实例还有江西南城的益藩罗川某郡王墓^②,据说江西波阳淮藩“墓葬大多为石灰椁墓结构”^③,但其具体内涵不详。另外,笔者在湖北蕲春蕲州镇调查荆藩

① 黄明兰:《洛阳考古纪实录——记明藩洛阳王墓地调查发掘和墓志研究》,载洛阳古代艺术馆主编:《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第488—492页,朝华出版社,2002年。

② 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

③ 孙家骅等:《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第52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王陵时,在镇北缺齿山王墓区亦见有石灰椁墓残迹,1970年前后破坏,墓主身份年代不详;1986年在蕲春县西驿镇曾发掘过荆藩樊山郡王位下镇国将军朱怡仙(卒于嘉靖五年)墓、辅国将军朱东溟(卒于嘉靖十五年)墓^①,墓坑壁亦用石灰糯米浇浆,可知此种葬法亦用于荆府。

长江流域气候潮湿,地下水位较高,故常有“水蚊交侵”之患,而石灰则有防虫防水之功效,这是明代皇族石灰椁墓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墓葬结构在明末清初的一些著述中被称为“灰葬”,而券室墓则对举为“砖葬”。时人陈确认为:“祸莫速于浅葬,莫酷于中空。空则蓄水穴虫,兼忧覆坠,浅露必不能久存。二者之祸,其理易见。砖葬者皆将不免,灰葬则实而能深,千秋之计,无以易此,非徒惜费之谓也”^②。益庄王陵棺床上四周加砌砖墙,复以石灰填实空隙,正是因万妃合葬时“开圻睹朽”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江西新建宁康王朱觐钧(薨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墓,墓室砖砌拱券结构,由7层竖砖间7层平砖砌成,长5.6米、宽3.92米、高3.67米。朱漆棺置于圻室中央,套以外棺,其外复包以青石板的盖、墙、底;石板与圻空间以石灰、砂土拌糯米浆填实^③。此墓虽有墓室,但室内满填石灰,可以看作是石灰椁墓制的滥觞。宁康王墓较益宣王墓早100余年,但此种结构并不是当时宁藩的通制,卒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十一月的宁康王次妃冯氏墓即为前后两室结构^④。可见,由砖石

① 李从喜:《湖北蕲春县西驿明代墓葬》,《考古》1995年第9期。

② 清·陈确:《陈确集》,别集卷七,《葬书下·砖灰椁解惑说》,点校本下册,第498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③ 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孙家骅等:《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第53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④ 郭远渭:《南昌明宁康王次妃冯氏墓》,《考古》1964年第4期。

券室墓到石灰椁墓,应该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2001年在新建发掘的宁靖王夫人吴氏(卒于弘治十五年)墓,为砖砌拱券墓室,两端无墙,室内满填松香^①;1956年在湖北蕲春清理的荆端王次妃刘氏(薨于嘉靖三十九年)墓,亦仅有简单的椁室,四壁和底部以三合土筑成,无墓门和墓道,东西长5.1米、南北宽2.8米、通高2.35米。“墓顶两檐用青砖斜铺,中间用瓦堆成屋脊”^②;这两座墓都可以看作是由券室墓向无墓室之石灰椁墓过渡的例证。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灰隔”式墓葬的形式可以追溯到宋代^③;但从已知实例来看,明代宗藩中使用这种葬制基本都在嘉靖纪元以后,目前尚无资料可以确证它们和南宋皇陵攒宫“石藏子”之间有直接的关联。

除以砖或三合土砌墓圻外,在湖北武汉市洪山区洪山乡黄家湾还发现过以粗质青瓷碗砌筑棺室的明代宗室墓^④,根据墓志得知,墓主为楚藩镇国中尉朱显栻和其妻恭人赵氏。朱显栻卒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二月,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一月葬;赵氏卒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四月,十一年四月葬,二墓异圻毗邻。

二、关于明代王陵玄宫制度的讨论

从上述八种不同的玄宫形式来看,明代亲王陵墓玄宫制度显然不是同一种模式,其规章不十分严格,发展变化也不尽系统规范。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明代王陵玄宫制度的基本特征: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② 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③ 霍巍:《论江西明代后期藩王墓葬形制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④ 武汉市博物馆:《黄家湾明代楚王朱氏墓》,《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1. 明代王陵玄宫形态的纵横比较分析

从前举各例来看,明代各藩王陵玄宫自身的纵向关系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横向关系;或者说,各藩王陵玄宫自成体系的倾向颇为明显,这在楚、蜀、德、益四藩王陵中表现尤为突出。楚藩前后诸王陵之玄宫皆为单室附耳室、壁龛;德藩玄宫两进,后室为两或三室并列的隔室葬;益藩端、庄二王为单室玄宫,而昭王以后四王则无玄宫仅有停室。与其他诸藩相比,蜀王玄宫特色十分突出,悼庄世子陵、僖王陵、琉璃乡某王陵以及昭王陵四陵具有明显的纵向继承特征,玄宫前部庭院式的装饰、后室(棺室)狭小等尤为突出特色。悼庄世子虽用五室玄宫之制,但其玄宫配室却设在后室两侧,而且是在同一拱券之下分出三室,与伊厉王、



图 3—56 明蜀僖王陵玄宫门八字墙

肃庄王、辽简王、宁献王等其他亲王标准五室拱券式玄宫迥然有别。蜀藩诸王玄宫庭院式的布局、墓室门呈“八”字形等(图 3—56),都是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宗室,王府太监墓等也大都是这种形式。1950 年代以来,这种类型的墓室在成都地区多有发现,如成都白马寺第六号明墓等^①。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白马寺第六号明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0 期。

与各王府间玄宫制度自成体系相反,时代相同但不同藩府之间的王陵玄宫制度时代共性却不是十分明显,也就是说各府王陵之间的横向联系并不多。比如在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和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两年之间薨逝的三位亲王玄宫制度就截然不同:辽简王为标准五室玄宫,楚昭王为单室玄宫,周定王则为两主八配十室玄宫,三人同是太祖之子、本藩始封王,但玄宫等级却相差甚大。玄宫面积相差更为悬殊,周定王玄宫1970平方米,而楚昭王玄宫却只有85平方米,如果这两个数字均测绘不误,则周定王玄宫是楚昭王玄宫面积的23倍之多。其他如卒于永乐七年(公元1434年)的蜀悼庄世子之陵和卒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伊厉王之陵、卒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的赵简王之陵和卒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的蜀僖王之陵等都是营造年代相近,但墓室规制明显不同的例证。至于卒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的潞简王次妃赵氏使用石砌四室玄宫,而卒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的益宣王却只用砖砌填石灰椁室,更是属于天壤之别的例证。以玄宫的建筑材质而言,大部分王陵是用砖或砖石并用(以条石为基),完全石构玄宫仅见于襄藩和潞藩。从这些并非孤证的实例来看,很难说明代亲王玄宫制度有全国划一的统一模式,藩府地域性特色应该是超越于时代特征之上的一级分类指标。可以推断,明朝中央政府应该不会有关于王陵玄宫修建规程的“工部图示”一类文件颁发至各王府或有藩王之省的三司衙门。

明代亲王陵墓之玄宫在建筑形式上具有较强烈的以藩府为限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差异性表现得比陵园地面建筑更为明显。从各藩王陵纵向关系来分析,始封王玄宫规格一般都高于后世嗣王,已知诸例惟襄藩略有例外。另从晋裕王朱求桂在明末(卒于崇祯三年)依然使用三主室玄宫来看,太祖所封诸王以始封王地位较高等因,尽管嗣王有所降等,但其玄宫规格可能始终高于其他藩王。这种现象可以

在太祖所封异姓王公及其后裔之墓葬演变中得到间接证明。明太祖义子西平侯沐英,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薨,追封黔宁王,谥昭靖,葬南京江宁观音山,在今江宁县东善乡,1959年发掘,墓室坐北朝南,分为甬道、前室、中室、三个并列后室等几部分^①。前室南北长8.24米、东西宽3.14米、高3.1米,中室南北宽3.58米、东西长11.8米、高3.95米。后室分为三室,中室最大,葬沐英,南北长5.5米、东西宽3.5米、高3.9米,左右两室略小,分别葬沐英元配冯氏、继配耿氏,隔墙各有小洞与中室相通。沐英之子沐晟,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薨,追封定远王,谥忠敬,葬南京江宁沐英墓西旁,二墓相距约200米。沐晟墓墓室结构与沐英墓相似,分为甬道、前室、中室、二个并列后室等几部分,建筑规模略小^②。前室南北长2.8米、东西宽2.35米、高2.35米,中室南北宽2.68米、东西长7.15米、高3.27米。后室东室长4.56米、宽2.71米、高2.74米,葬沐晟;西室长4.66米、宽2.4米、高2.56米,葬沐晟妻程氏。沐晟子孙以黔国公世袭,八世黔国公沐昌祚,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薨,葬江宁祖塋,其墓1979年发掘^③,墓室结构仿沐晟墓,但省略前室,而以中室为前室,甬道偏在东侧。前室南北宽2.5米、东西长4.75米、高3.13米。后室东室长4.2米、宽2.42米、高2.46米,葬沐昌祚;西室与东室等大,葬沐昌祚妻。沐昌祚墓室虽然小于沐英、沐晟墓,但其规模仍很可观,甚至超过了某些时代相近的王陵,这是沐氏家族墓制世代相承的结果。

①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附载沐英墓),《考古》1960年第9期。

②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③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2. 明代王陵玄宫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

认定明代亲王陵玄宫之各藩自身纵向关系远远大于同时代却异藩封的横向关系,并不意味着同时认为明代王陵玄宫制度的发展变化完全无规律可循。从目前已知材料来看,大体上可以看出明代王陵玄宫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复由繁归于简的发展历程。鲁荒王陵玄宫是目前已知惟一一座洪武时期的亲王玄宫,其规模、结构均逊于异姓郡王沐英墓;明太祖虽然对于这个曾“饵金食药,毒发伤目”^①并最终致死的儿子十分厌恶,给赐恶谥。但从其墓室之深、工程之巨以及随葬品之丰厚来看,他的丧礼并没有减等,也就是说,鲁荒王陵的二室玄宫是正常的,而不是一种“降等”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洪武到永乐初期,二室玄宫亦多用于异姓公侯。如南京市中央门外小市镇追赠蕲国公康茂才(卒于洪武三年)墓,前后两室通长 8.64 米、宽 2.95 米、高 2.12 米^②;南京市中央门外小市镇东胜侯汪兴祖(卒于洪武四年)墓,前后两室通长 8.39 米、宽 2.9 米、券内高 4.51 米^③;安徽蚌埠市东郊信国公、追封东瓯王汤和(卒于洪武二十八年,其两女先后聘为鲁荒王妃)墓,前室宽 3.87 米、进深 2.59 米、高 3.6 米,后室宽 3.96 米、进深 6.2 米、高 3.6 米,西侧有一侧室,东西北三面各有一壁龛^④;南京市中华门外西宁侯宋晟(卒于永乐五年)墓,前后两室通长 9.87 米、宽 3.48 米、券内高 3.92 米等^⑤。这种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鲁荒王檀》,标点本第 12 册,第 3575 页。

②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蕲国公康茂才墓》,《考古》1999 年第 10 期。

③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汪兴祖墓清理简报》,《考古》1972 年第 4 期。

④ 蚌埠市博物展览馆:《明汤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 年第 2 期。

⑤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中华门外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2 年第 9 期。

“等威不明”，应该是明初亲王陵尚未定制的结果，但上述公侯墓墓室的规模无例外都小于鲁荒王玄宫。

永乐、宣德、正统时期，虽然间有单室、二室、三室玄宫，但亲王陵以五室玄宫比较多见，这种玄宫形式还见于成化时期，一说肃藩诸王陵形式全与肃庄王同，即五室玄宫^①。弘治、正德时期有两室玄宫和三室玄宫等不同制度。嘉靖以后除个别例外，亲王陵玄宫基本都是二个主室（潞简王及其次妃另附二配室）或单室。从王陵玄宫规模来看，嘉靖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嘉靖以前王陵玄宫的通长一般在二、三十米左右，楚昭王单室玄宫的长度也达到 13.84 米；卒于弘治十三年（公元 1500 年）、历侍成祖至孝宗七朝的司礼监太监牛玉之墓不但用二室玄宫，通长还达到了 16.8 米^②。而卒于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的郑懿王二室玄宫总进深才只有 8.3 米，卒于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的益端王陵甬道及玄宫的通长也只有 8.2 米，分别卒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和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的襄康王、襄庄王两陵之二室玄宫通长分别为 10.73 米、13.5 米。从次于亲王一等的王次妃和郡王墓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卒于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 年）的宁康王次妃冯氏玄宫前后两室，通长 15.27 米，宽 3.05—3.09 米^③；而卒于嘉靖二十年（公元 1541 年）以前的汝安王次妃晋氏玄宫却为单室，而且墓室较小，长 4.15 米，宽 2.7 米^④。以郡王而言，卒于宣德二年（公元 1427 年）的广昌悼平王玄宫前后两室通

① 施连山：《明肃王墓考略》，《西北史地》1997 年第 4 期。

② 保定地区博物馆：《明两京司礼监太监牛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2 期。

③ 郭远谓：《南昌明宁康王次妃冯氏墓》，《考古》1964 年第 4 期。

④ 不著撰人：《卫辉市清理一座明代亲王次妃墓》，《中国历史学年鉴·1992 年》，第 387 页，三联书店，1993 年。

长 13.1 米,卒于成化十二年(公元 1476 年)的兴平安僖王之玄宫前后两室通长约 14 米,卒于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的乐安昭定王之玄宫两室通长亦在 13 米以上;而卒于嘉靖中叶的肃藩某郡王、卒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 1607 年)的周藩原武温墓王玄宫皆为单室,而且面积都不很大。前者东西 7.45 米,南北 5.46 米;后者长 5 米,宽 4.1 米。可见,嘉靖改元前后应该是明代王陵玄宫制度由繁到简的一个转换点。

3. 明代王陵(玄宫)的分期

关于明代王陵玄宫的分期,是一个不很容易能说清楚、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明代王陵(主要是玄宫)的分期,在大约 20 年前有研究者曾依据 1980 年以前 30 年间的考古资料,认为“明初洪武时期的亲王墓制,较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改制后的规模要小”;悼庄世子陵、宁献王陵等“代表了明朝前期(永乐至弘治)亲王的陵墓制度”;“弘治以后的亲王陵墓制度,较明朝前期有所改变”^①。这是一种在资料甚少的背景下做出的二分或三分法的论断。在本书最后定稿过程中,见到两种否定和修正前说的观点,一种认为:“明代亲王墓室的大小、多寡和墓道的长短、方向等,各个时期都不相同,所以,仅以墓葬数据的变化来说明明代亲王墓葬制度的变化,还缺乏材料支持”;“各地亲王墓葬的形制大小往往有其偶然性,决定明代亲王葬制的仍是地上陵园规模、享堂、碑碣等”^②。另一种则“将明代诸侯王墓分为三期:早期,从洪武元年到洪熙元年;中期,从宣德元年到嘉靖四十五年;晚期,从隆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③。从第二章及本章罗列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631—632 页,《明代陵墓的发掘》,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② 王纪潮:《明代亲王葬制的几个问题》,《文物》2003 年第 2 期。

^③ 董新林:《明代诸侯王陵墓初步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第 4 期。

的资料来看,明代帝王陵墓玄宫制度的变化应该比陵园地面建筑制度的变化更为明显,如果再考虑到明代王陵地面建筑的保存状况普遍不佳,可以认为,玄宫的分期,目前仍不失为研究明代藩王陵墓分期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从明代王陵玄宫制度发展变化的整体来考察,它仍然有规律可循,尽管这条线索并不十分清晰。

本书根据2005年5月以前公布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和作者调查参观所见所闻资料,参照有关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将明代亲王陵墓玄宫制度的演变分为四期,兹分述如下:

第一期:洪武时期(公元1368—1398年):二室玄宫,夫妻分葬,以山东邹城鲁荒王陵为代表。这是明代王陵制度的初始期,因为薨于末年的秦愍王、晋恭王二人玄宫结构不详,故本期涵盖了整个洪武朝。

第二期:永乐至正统时期(公元1403—1449年):五室玄宫为主流,多见夫妻分葬,以四川成都蜀悼庄世子陵、湖北江陵辽简王陵、江西新建宁献王陵等为代表;亦可见其他少于五室的玄宫形式,如湖北武昌楚昭王陵;另外还有湖北江陵湘献王和江西波阳淮靖王的七室玄宫、河南禹州周定王陵十室玄宫,为目前所知特例。此期是明代王陵制度的确立期。

第三期:天顺至正德时期(公元1457—1521年):亲王陵玄宫有五室、三室、二室、单室等不同形式,多见夫妻合葬,以宁夏同心庆康王陵、湖北谷城襄宪王陵、四川成都蜀昭王陵、山东长清德庄王陵、河南沁阳郑懿王陵等为代表。这是明代王陵制度的过渡期,或曰平稳期。

第四期:嘉靖至明末(公元1522—1644年):多见二室玄宫及二主室加二配室玄宫、单室玄宫,亦有三室玄宫和无玄宫石灰椁墓等形式,一般都是夫妻合葬,以江西南城益藩诸王陵、襄藩康王和庄王陵、

德藩诸嗣王陵、山西榆次晋裕王陵等为代表,河南新乡潞简王陵是其中特例。这是明代王陵制度的简略期。

关于这个分期,需要做补充说明的是,建文(公元1399—1402年)、景泰(公元1450—1456年)两朝目前尚无亲王陵玄宫实例发现,但永乐、天顺分别是王陵制度颁布和王与王妃合葬令的下达时期,这两项指令是明代王陵制度分期的重要界标,所以建文、景泰两朝应该分别放入前一期,亦即初始期加入建文朝,此期年代下限降至1402年;确立期加入景泰朝,此期下限降至1456年。

如此,明代亲王陵墓制度的分期(主要是玄宫分期)可以概述为:

初始期:洪武、建文(公元1368—1402年);

确立期: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公元1403—1456年);

过渡期: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公元1457—1521年);

简略期: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公元1522—1644年)。

至于郡王陵墓,其玄宫制度的变化规律应该与亲王大体吻合,但由于研究资料比较缺乏,而且不是本书研究重点,故仅粗分为两期,即明前期:明初——正德(公元1368—1521年);明后期:嘉靖——明末(公元1522—1644年)。

第四章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若干问题的专题研究

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对于明代皇帝和亲王陵墓的形态及其基本制度特征进行了分析、归纳和研究,讨论的核心是陵墓(包括陵园制度和玄宫制度两部分)的本体。本章将着重研究那些在前两章中不便展开论述的问题,还将探讨其他一些属于陵寝制度研究范畴的、或者某些与陵寝制度研究密切相关的内容。

第一节 关于明代皇陵对于前代皇陵制度的继承问题

对比本书第一章所归纳的历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基本特征,看不出明孝陵及其以后诸陵之制度,特别是陵园制度方面对于秦、汉、唐、宋等前代皇陵有明显的直接继承关系。从总体上说,以洪武时期预营孝陵为标志,中国古代皇陵制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认为明代对于前代皇陵制度没有任何继承发展关系。

一、关于南宋皇陵(攒宫)对明代皇陵的影响

迄今为止,有关前代皇陵制度对明代皇陵影响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1936年,陈仲箴先生在研究南宋诸帝攒宫制度时,曾经提出过南宋攒宫影响明代皇陵的观点,他认为:“赵宋自南渡以后,偏安江

左,物力蹇困,凡所设施,未能悉遵旧规,故诸帝攒宫虽大体尊奉唐以来上下宫制度,但亦参酌时宜,废象生神墙及方上陵台,而藏梓宫于上宫献殿之后,为龟头屋覆之。自是以后,遂有明清方城明楼之制,故南宋攒宫,实为我国近代陵制变迁之枢纽”。又说:“南宋攒宫,则皆权厝于上宫正殿之后,为龟头屋覆之,虽云一时权宜,然实创我国陵寝未有之局也。意者,明清两代宝顶之前建方城明楼,即自此式演绎改进者欤”^①。此后,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推衍陈仲篪先生旧说,认为:“(南宋攒宫)这种权宜方式,把北宋时分离的上下宫串联在同一轴线上。后来明、清陵墓的祔恩殿(相当下宫)和明楼宝顶(相当上宫)纳诸同一组群内,即由此演变而成”^②。这两项相距40余年的研究结果,都十分肯定地强调了南宋皇陵与明清皇陵之间的直接演绎递变关系,但同样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详细说明。

从宋明两朝皇陵制度对比来看,可以基本认定明代皇陵对于南宋皇陵(攒宫)制度并没直接的继承关系。

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昭慈皇后崩^③,高宗以太后遗诰在会稽上亭乡择地权殡,“梓取周身,勿拘旧制,以为他日迁奉之便”^④,这

① 陈仲篪:《宋永思陵平面及石藏子之初步研究》,《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3期,1936年9月。

②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22页,中国建筑出版社,1980年。

③ 孟氏为宋哲宗元配皇后,被诬而废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元符(公元1098—1100年)末又迎还宫中,以哲宗初纪元之号而称曰“元祐皇后”,当时的皇后刘氏则称“元符皇后”。徽宗时,孟后再度废居瑶华宫。靖康(公元1126—1127年)初,以瑶华宫火而徙居延宁宫,延宁宫又火,遂出居相国寺前之私第,因而“靖康之变”时未被金人掳而北去。徽钦二帝被俘,孟皇后曾垂帘听政。高宗即位遵为元祐太后,以“元”字犯孟皇后祖父名讳,遂因所居官称“隆祐太后”。

④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三,《礼志·园陵》,点校本第9册,第2875页,中华书局,1977年。

是南宋皇陵兆域卜选之始。孟太后安厝处名曰“攒宫”，其地在今浙江绍兴东南皋埠镇宝山（又名“攒宫山”）。南宋皇陵卜建于绍兴，最初只是权宜之计，皇室仍以归葬河南永安旧陵区为念，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九月，当徽宗凶问初至时，高宗君臣还有过在巩洛为其建陵、陵制一仿安陵和永昌陵简朴之制的议论；而绍兴陵区用地也是渐次征买于民间的^①。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金和议达成，徽宗梓宫南还，攒于昭慈皇后攒宫西北，用地二百五十亩。关于墓园的名称，议者或谓应称陵；或谓不宜称陵，须待归葬巩洛方可上陵号，目前只宜暂称“攒宫”；礼部员外郎程敦厚迎合奸相秦桧之意，独上奏称：“仍攒宫之旧称，则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则若亡存本之后图。臣以为宜勿徇虚名，当示大信”^②。此后南宋诸帝后崩逝皆即绍兴宝山而权攒，浅葬于此，即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诸陵虽荐上陵号，但又都缀以“攒宫”之名，如徽宗陵称“永祐陵攒宫”，意实为暂厝之地。

关于南宋诸陵的位次，有人认为：“南宋六陵呈‘十’字形排列，永思陵、永阜陵、永茂陵三陵东西并列，南为永崇陵，北有永绍陵和永穆陵”^③。也有人绘陵区图显示，南宋皇陵分两组，南侧一组，永思陵之东为永阜陵，永阜陵之东北为永茂陵，东南为永崇陵；北侧一组，永祐陵西南为永穆陵，永穆陵西南为永绍陵^④。以《宋会要辑稿》中有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三十一册，卷八一八九，礼三七，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2册，第1330—1333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二，《礼志·山陵》，点校本第9册，第2859页，中华书局，1977年。

^③ 孙中家等：《中国帝王陵寝》，第23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 黄濂：《中国历代帝陵》，第191页，大连出版社，1997年。

关记载考之,上述二说均有欠妥处。该书卷八一八九记徽宗至宁宗葬地有云:徽宗永祐陵在昭慈圣宪孟皇后陵西北五十步;高宗永思陵“在徽宗皇帝攒殿篱围之外正西北,显仁皇后攒殿近上,正西向南”;孝宗永阜陵“神穴在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光宗永崇陵“神穴系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闲地段”;宁宗永茂陵在“昭慈陵侧仅一里许”。仔细阅读这段记载,并结合宋朝皇陵重视国姓音利等因素考虑,笔者认为《宋会要辑稿》对于南宋诸陵位次的记载是正确的,即以昭慈孟后园陵为基准点,其西北为徽宗永祐陵,又西北为高宗永思陵,永祐、永思二陵之间偏南为孝宗永阜陵,永阜陵西、永思陵南为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在昭慈园陵之侧一里许,方位不明,但从因永崇陵附近无地可择而卜此址的记载来推测,永茂陵未完全按角音尊卑序次,而是另辟一区,其地当在昭慈陵园东或北方^①。理宗、度宗二陵《宋会要辑稿》缺载,无法确考。

南宋皇陵既定位于暂厝之“攒宫”,因而规制比较简陋,比巩洛诸陵减乳台^②、石像生、陵台(封土)、神门等,但仍因袭北宋之制,分设上宫和下宫。

^① 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② 按,“乳台”、“鹤台”之名见于《宋会要辑稿》和《宋史》等文献。以实考之,二台实相当于唐陵前之两道阙,似宜称为“阙台”。又,《宋会要辑稿》第二十三册,卷八一九七,礼三九记载,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诏应臣僚诣陵朝拜者,并于阙庭前下马,候门开,入宫朝拜”(中华书局重印本第2册,第1362页),按,皇陵前理应不准骑马直走神道径抵神宫门,鹤台是入陵瞻拜起始点,故文中“阙庭”似应即鹤台。又,《宋史·礼志》记巩义诸陵有“司马门”之名;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三,“英宗葬永厚陵”条下有云:“陵前阙角谓之鹤台,门侧台曰乳台”(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8册,第158页),知乳台间亦有门,或即司马门,皇帝至阙庭下马经此门步入上宫。本书于宋陵制度从《宋会要辑稿》、《宋史》等文献,用“鹤台”、“乳台”之名。

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十月,宋高宗(时为太上皇)驾崩。次年,右丞相周必大以权太傅持节护梓宫下葬,事毕,周因著《思陵录》一卷,记录永思陵制度,文末附收修奉陵寝官员移交工程照会,对于高宗陵寝建筑规制等记载甚详。《思陵录》记永思陵制度云:“上宫者为献殿三间,六椽,中间阔十(引者按,通读前后文“十”应为“一”之误)丈六尺,两间各一丈二尺,其深三丈。后为龟头三间,中间亦阔一丈六尺,两间各五尺,其深二丈四尺,皇堂在焉”。“下宫之制,殿门三间,四椽,每间阔一丈四尺,深二丈。前后殿各三间,六椽,其深三丈,每间阔一丈四尺,东西两廊一十八间,四椽,其深一丈六尺,每间阔一丈一尺,殿门东西皆有挟屋一间,六椽,各阔一丈六尺,其深三丈,又有棂星门、神游亭、换衣厅”^①。

以这段文字,结合《思陵录》之《附录》的记载,可以把永思陵攒宫的主要建筑布局勾画如下:上宫南北各有棂星门一座(相当于北宋皇陵神门),外环以红灰墙,内为三开间殿门一座,献殿三间,龟头三间^②。龟头比献殿开间窄,两座建筑可能并联在一起,攒殿凸出形似乌龟头,故名,陈仲篪先生所绘永思陵献殿龟头复原图即为此种方式(图4—1)。下宫主要建筑有棂星门,殿门、前后殿各三间以及廊屋、神厨、神游亭、换衣厅等。上、下宫各有外篱门,上宫之外还有鹊台一座。从建筑设置和平面布局来看,南宋诸攒宫上宫、下宫的功用与巩洛筑陵完全相同。

^①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三,《思陵录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第928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按,“龟头”之名见于南宋周必大之《思陵录》,所指即覆于石藏之上的三间殿宇,在《宋会要辑稿》等文献中于献殿之外另有“攒殿”之名,应即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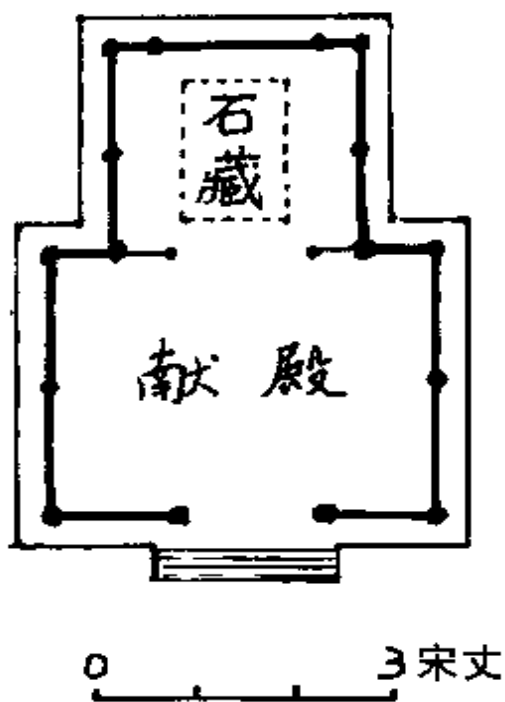


图4—1 宋永思陵上官献殿、龟头平面想像图(据陈仲篪《宋永思陵平面及石藏子之初步研究》摹绘)

因为只是攒厝而并非正式埋葬,所以南宋诸陵虽有“皇堂”之名^①,但无玄宫之实,只是将棺椁厝于比较浅的墓穴中。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高宗永思陵攒宫修奉使司上言:“攒宫石藏利害至重,二浙土薄地卑,易为见水,若不措置,深恐未便,谨别彩画石藏图子一本,兼照得厢壁离石藏外五尺别置石壁一重,中间用胶土打筑,与石藏一平,虽工力倍增,恐可御湿”^②,这便是永思陵攒宫皇堂的基本结构,即石藏外五尺复筑石壁一道,石藏与外石壁中间以胶土填筑夯实,用以防潮,与北

宋诸陵相比只取其石藏之制,而无玄宫,即土坑竖穴而下置石罩棺(石藏)。南宋官私文件中的“开掘皇堂”实际是指包括石藏外石壁在内的一个大墓穴的土方工程,但这种墓穴结构显然不等同于玄宫。

① 按,“皇堂”即玄宫,宋皇室以所奉始祖名中有“玄”字,为避讳示敬,故有“皇堂”之称。据《宋会要辑稿》第二十五册,卷七三四七,礼二九记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七月七日“礼仪院言玄宫上字理合回避,请只以皇堂为名,从之”(中华书局重印本第2册,第1076页)。此后遂成定制。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三十一册,卷八一八九,礼三七,“高宗永思陵”,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2册,第1331页,中华书局,1957年。

以各建筑尺寸推算,龟头所覆正在石藏之上,但并非将胶土带区及外石壁等全部覆盖。如《思陵录》云,永思陵龟头中间阔一丈六尺,两次间各阔五尺,进深二丈四尺,而“初开穴南北长三丈七尺六寸,东西阔三丈二尺”;由此记载也可以证明,南宋并非以所开包括填筑胶土在内的大穴为皇堂。高宗、孝宗石藏里明长一丈六尺二寸,阔一丈六寸,深九尺,因为面积窄狭,且无墓道,所以下葬时须“先下椁底板,俟进梓宫于椁底板上,定正讫,然后安下椁身,次将天盘囊网于椁上安设”^①,然后以石条封砌。高宗梓宫下葬后,“覆以天盘囊网,巧用青石为压栏,次铺承重柏讫,上用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后以方砖砌地,其实土不及尺耳”^②。以后诸帝葬法皆同。

南宋诸皇后攒宫与皇帝攒宫相似,只是早期规模略小些,高宗生母显仁皇后(徽宗韦妃)之石藏里明长一丈四尺八寸八分,阔一丈三寸,深九尺。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崩,攒宫修奉使司奏上显仁韦皇后石藏制度,并云:“若依此铺砌,恐至期安下神杀,外椁空分窄狭,事属利害。照得高宗皇帝石藏里明长一丈六尺二寸,阔一丈六寸,深九尺,欲乞依上件丈尺修奉施行”^③,宋宁宗准依其所奏行。此后,南宋诸皇后、皇太后攒宫石藏亦准此制度。

虽然南宋皇陵下宫之制和北宋诸陵一样,有正殿、影殿、南厨等,但其上宫之制却比较特殊。为有待异日奉迁之便,上宫规制简陋,既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三十一册,卷八一八九,礼三七,“高宗永思陵”,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2册,第1331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②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三,《思陵录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第928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三十册,卷七三八〇,礼三四,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2册,第1294页;第三十一册,卷八一九二,礼三七,重印本第2册,第1356页;中华书局,1957年。

没有石像生等设施,也不建玄宫,而是将梓宫暂厝于石藏之中,其上仅覆以浅土,不建陵台(封土),为了保护石藏不受风雨侵袭,其上再加盖一屋。这样一来,诸帝后之墓既不保安全,又无法受日月之光,因此在当时即颇遭物议。在宋高宗葬礼进行过程中,枢密使赵汝愚即接连上疏指出:“(徽宗)山陵之土未复,规制浅薄,可为深忧”^①;“绍兴攒宫规制浅薄,国家不可以虚名而受实害。今太上皇帝梓宫虽已奉攒,要非久计。况两京在远,道路阻修,正使克复有期,岂宜更议迁改。孰若考据古谊,及时而葬,以图万世之安也”^②。宋光宗时,赵汝愚再度上疏说:当年昭慈孟太后之权厝绍兴,是“将以愤激三军之心,不绝中原之望也。其后秦桧主和好,而南北之势既分,永祐、永思因仍不改,闻见习熟,视以为常。遂使诸陵尚存浅土,其制卑薄,可为深忧。复于献殿之中蔽以厦屋,不达天地之气,不睹日月之光。年岁滋深,大葬无日。考之典礼,固已非宜;验之葬书,亦所甚忌”^③。可见,南宋皇陵之制于常礼相去甚远。

从有关记载结合现存的实际例证来看,南宋皇陵攒殿、石藏之法与明代皇陵宝城、明楼之制相去甚远。宝城的实用功能是封土的围墙或保护墙,而明陵之封土实际上就相当于北宋皇陵上宫中的陵台,二者均未有建屋覆盖之做法,而是以封土直接承受雨露及日月星辰

① 宋·赵汝愚:《论山陵三事》,见明·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五,《礼乐·丧礼·山陵及祭礼》,影印明刊本第2册,第16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 宋·赵汝愚:《论山陵乞遵用七月之制疏》,见明·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五,《礼乐·丧礼·山陵及祭礼》,影印明刊本第2册,第16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③ 宋·赵汝愚:《论山陵乞下礼官详议疏》,见明·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五,《礼乐·丧礼·山陵及祭礼》,影印明刊本第2册,第16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之光。明楼是宝城的人口,其建筑为城堡式,但它并不是叠压在墓穴之上,显然并不等同于南宋皇陵上宫中的攒殿;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找不出龟头石藏到方城明楼的演变轨迹(图4—2)。所以,笔者认为:南宋攒殿与明代宝城明楼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南宋诸攒宫与明清皇陵的关系,杨宽先生在所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曾做过辩证;但对于“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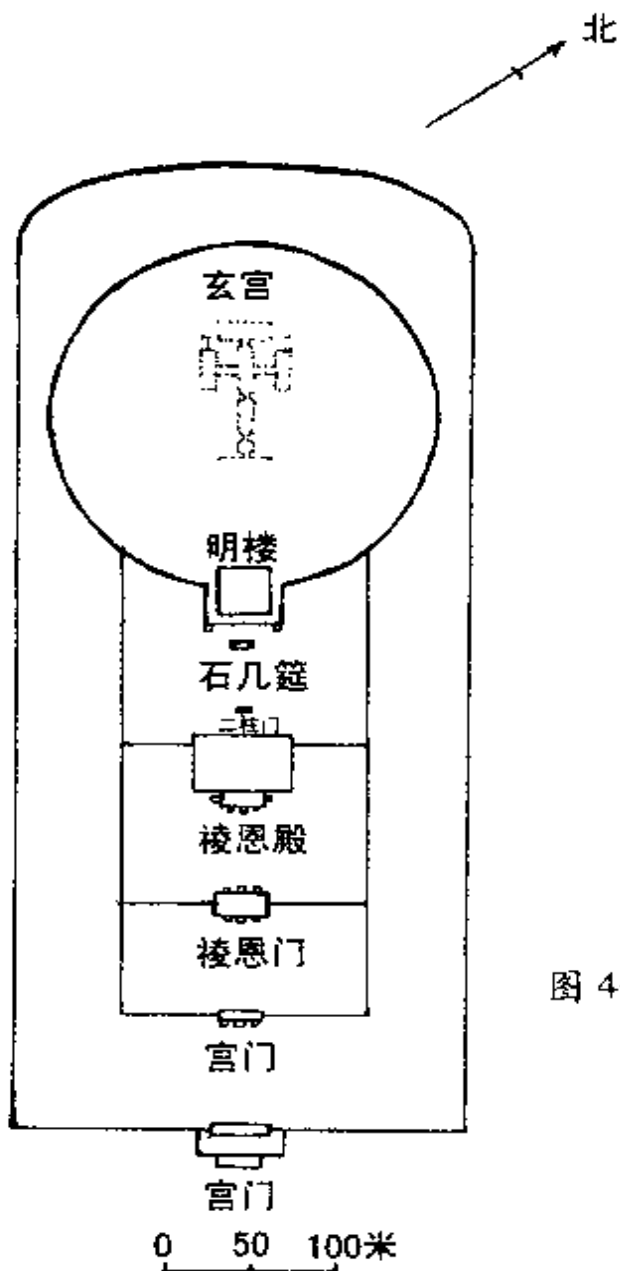


图4—2 明定陵陵园祔恩殿(献殿)、石几筵、明楼、玄宫位置示意图(据《定陵》等有关资料改绘)

宫串联在同一轴线上”之说,杨宽先生亦有相近的观点,他认为“南宋把唐以来分离的上下宫串联造在同一轴线上,成为当时陵园的一个特点”^①。对此,笔者亦难认同,兹分述如下:

首先,宋代皇陵卜选首重“五音姓利”之说,“五音姓利”说的基本理论是把诸姓按“五音”分为五类,再与“五行”相对应,从而得出某姓所利的阴阳宅方位、地势走向。赵姓属角音,角音所利为壬、丙两向,所利的地势走向首为东高西低、次为南高北低。从宏观来看,宋代皇陵的选址定穴充分关注“国音”问题。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太祖“诏改卜安陵,命枢密承旨内客省使王仁赡为按行使,仁赡与司天监赵修已言得河南府巩县西南四十里訾乡邓村地吉,从之”^②,宋太祖曾经有过建都洛阳的筹划,所以把陵区选在了都城的正东偏南,后来迁都虽未成事实,但洛阳却一直是北宋的“西京”。至于南宋,行都为临安,高宗曾驻蹕于绍兴,攒宫在绍兴以东,也正在都城的东南方,所选与北宋一样,都是于“国音”有利的方位。陵域之内的地势更是严格按照“国音之利”选定,南宋赵彦卫论两宋皇陵堪輿有云:“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岗阜,不甚高,互为胜势。自永安县西坡上观,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织,万安山来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计一百一十三顷,方二十里云。今绍兴攒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有上皇山新妇尖,隆祐攒宫正在其下”^③。如果按照“音利”

①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三十二册,卷七三四六,礼三九,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2册,第1368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③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傅根清点校本,第150页,中华书局,1996年。

的标准来衡量,北宋陵区东南有山,西北有水,东南高,西北低,确为上吉之穴。就每座皇陵而言,在构建时也都不是正南北(子午)朝向,而是丙壬朝向,“诸陵南北轴线,率正北偏西约六度”;地势也是南高北低,即由鹊台至陵台地平面是下坡,“尤其是永定、永昭陵,陵台顶面竟不高于鹊台处地面”^①。巩义诸陵朝向皆为南偏东,下宫建于上宫以北偏西,两宫不在同一轴线上,这些特点也已经为巩义北宋皇陵的全面考古调查资料所证实^②。南宋攒宫卜址仍然首重音利,选陵官甚至为此而互相攻讦。为宋孝宗择陵时,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曾应诏上言指出:“自永安迁奉以来已遵用此法:东南地穹,西北地垂。而九世之间,国统再绝(仁宗、哲宗两帝无嗣);靖康之变,宗社为墟。高宗中兴,匹马南渡,寿皇(孝宗)复自旁支人继大统,至于思陵亦用其法,而寿皇倦勤之后旋即升遐,太上违豫日久,以至逊位,赤山亦用其法,而庄文魏邸相继薨谢。若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则国音之说自为无用之谈,从之未必为福,不从未必为祸矣。何为信之若是,其笃而守之若是,其严哉!若曰其法果验,不可改易,则洛越诸陵无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国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③南宋皇陵早已彻底毁坏,无实物可证,但在《思陵录》及其附录永思陵工程交割照会中并没有能找到关于上下宫相关位置的文字,并且在《宋会要辑稿》等有关宋陵的宋代官私文献中也未发现南宋诸陵下宫在上宫正北的记载。关于绍兴攒宫上下两宫的相应方位,《宋会要辑稿》中有一条记载说:庆元六年(公元1199年)八

①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③ 宋·朱熹:《山陵议状》,见明·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五,《礼乐·丧礼·山陵及祭礼》,影印本第2册,第1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月,宋光宗崩,十一月六日“攒宫修奉司言:今来修奉攒宫所有下宫俟标定上宫地段毕,依永阜陵礼例于上宫之后随地修盖”^①。这里明确讲到下宫是建在上宫之后,即位于上宫之北,但并没有说二者同一轴线。从巩义北宋诸陵实例考察,结合《云麓漫钞》等宋人记载及宋皇室极端迷信“五音姓利”的事实来看,倒是认为南宋下宫仍在上宫和攒殿的西北更为妥贴。

其次,唐宋皇陵建制有上、下宫之分,上宫是指包括献殿、墓穴之上的陵墓封土或山丘在内的陵宫而言,其狭义有时专指献殿;下宫则指供奉墓主衣冠神像的寝宫一组建筑。在唐代,陵宫建于山上,而寝宫建于山下,上宫、下宫之名最初可能是因为山上山下方位差异而得出的俗称^②。上宫献殿之祭与下宫寝殿之祭在唐宋时期有显著的差异,“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备膳羞,内臣执事,百官陪位”^③。也就是说,上宫(献殿)之祭由品官行事,供奉太牢三牲,读祝奉册,为国家之公祭;下宫(寝宫)之祭由太监操持,供奉饮食,百官陪祭,如宫内之私祭。明孝陵及以后诸陵明楼宝顶之制为前代所无,宝顶实际上就是封土,与宋代陵台相同,明楼为封土宝顶前的标识物、也是附属物,它们应该同属于前代上宫的范畴,这点毫无疑义;但明代的祔恩殿实即唐宋封土坟丘前的献殿,它决不相当于宋代之下宫,并且“献殿”之名在明代也仍然在使用,如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三十一册,卷八一八九,礼三七,“光宗永崇陵”,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2册,第1332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② 关于“上宫”与“下宫”名称的由来,目前尚未见有专文论及,一般都是理解为“山下之宫”和“山上之宫”。考《礼记》中《文王世子》篇有云:“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郑玄注云:“下宫,亲庙也”。则“下宫”名称之由来是否与《礼记》中的这段话有关,尚不能确定,附记于此,姑俟异日再考。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三,《礼志·上陵之礼》,点校本第9册,第2883页,中华书局,1977年。

年)十二月明宪宗安葬,“辛巳,梓宫至山陵献殿”;“壬午,奉宪宗纯皇帝梓宫葬茂陵,驸马都尉周景奉神主诣献殿行安神礼”;“孝穆慈慧皇太后祔葬毕,奉迁宫奉安神主于茂陵献殿”^①。可见,明代的祔恩殿与方城明楼都属于唐宋皇陵“上宫”的范畴,明代孝陵以后诸陵宫中原本无寝殿之设,即顾亭林所谓“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②。既无下宫,则“继承了南宋上下宫串联在同一轴线上”之说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杨宽先生认为:宋代之陵台在明清时期发展为宝顶和方城明楼,上宫发展为享殿和配殿,下宫的前后殿发展为五供台,下宫的神厨、库室发展为神厨、神库^③,这一论断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关于宝顶、方城明楼、献殿等已经辩证于前,至于另外几项,五供台亦即“石几筵”,始见于明成祖长陵,为白石台上陈设香鼎一、花瓶二、烛台二,置于陵寝门和二柱门之后、明楼之前,它们的装饰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功用,显然不具备前代皇陵寝宫之起居、进奉的功用;而神厨、神库,还有杨先生未提及的宰牲亭,都是各陵陵宫的附属建筑,神厨用于制作祭品,神库用于储存祭器等物,其功用或许略同于前代寝宫中的神厨和库室,但以祭祀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显然也不能和唐宋陵下宫日常供奉饮食的诸建筑相提并论。

除了上宫下宫之祭以外,两宋皇陵还建有专门的寺院以追荐祖

^① 《明孝宗实录》卷八,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壬午,《明实录》校印本第28册,第167—168页。

^②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墓祭”,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先。在巩义陵区中,有为安、永昌、永熙三陵所建的永安禅院,有奉供永定、永昭、永厚三陵的永定昭孝禅院(一说在定陵东南有罗汉寺,昭、厚二陵西北有昭孝寺供奉),还有为永裕、永泰二陵所建的宁神寺。这些寺院皆靠近各帝陵封域。英宗落葬永厚陵后,朝廷曾勒石记于昭孝禅院,其文有云:“永厚陵南至永定陵七里一百三十一步,东至永昭陵九十步。其令永定昭孝禅院为二陵追福,仍赐良田十顷,房钱日一千,岁度童行二名,僧一人,紫衣于院”^①。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昭慈孟皇后攒于会稽宝山,即以原证慈禅院地近攒宫而令“每遇生辰节序等,就差本院僧二十一人作道场”;同年七月,礼部奏请:“越州宝山证慈禅院已充昭慈献烈皇太后攒宫修奉香火,未经赐额度僧。诏以奉宁寺为额,每岁度僧一名”^②。此后南宋诸攒宫也依例建禅院奉祭。这些寺院有赐田,房资,每年还有一至数名不等的剃度名额,其主要任务就是于帝后忌、诞等日及节日作道场追荐功德祈福。皇陵上建佛教禅寺,据说始于东汉,“明帝崩,起祇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屠焉”^③。北魏诸帝陵前也有建佛寺的习俗,山西大同方山南有文明太皇太后(孝文帝祖母)陵及孝文帝预作之寿陵,陵前“有思远灵图”^④。明代帝王丧葬礼仪中虽有一些带有佛教意义、或受佛教影响的仪式(如鸣钟万杵等),但陵园旁边绝无寺院香火供奉,这一点也与宋代乃至前代有很大的不同。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三十一册,卷八一八九,礼三七,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2册,第1325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三十一册,卷八一八九,礼三七,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2册,第1339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③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白马寺”,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本,第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④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三,“漯水”,标点本,第194页,岳麓书社,1995年。

作者坚持认为明代皇陵制度没有受到南宋皇陵制度的直接影响,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南宋皇陵在元兵初下江南、宋朝廷尚未完全被消灭时即已经遭遇毁灭性的破坏,明代根本无可参照。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宋少帝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总江南浮屠事西番僧杨琏真珈与演福寺僧允泽等人公然开掘绍兴诸攒宫。据《南村辍耕录》转引诸家记载云,在尽窃诸陵所藏珍宝后,盗贼们又将诸帝后的骸骨散弃荒野,未朽者焚之,理宗尸体被倒挂于树上沥取水银,头颅被割下带到大都,番僧以其骨制成用以厌胜的饮器。吴兴王国器(筠庵)所藏《唐义士传》云,绍兴义士唐珏愤恨番僧所为,暗约集邑中诸恶少,飨以酒食,乘夜避过看守现场者,盗得诸帝遗骨,分置于六石函中,上书年号为纪,葬于兰亭山后(一云天章寺前),又移南宋皇宫冬青树植于其上,而以野外无主尸骨混入原陵区,以掩人耳目。陶宗仪于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所见郑明德之《林义士事迹》则云,当宋攒宫被发掘时,故宋太学生林德阳方为丐者,以小银牌百十分贿看守番僧,得检出高宗、孝宗二帝遗骨分两函贮之,归葬于东嘉。又周密在《癸辛杂识》中云,宦官陵使罗铣曾试图阻止杨琏真珈等发陵,被武力逐开,事后,罗氏买棺制衣收殓遗骨。以上这些记载互有出入,到陶宗仪转述时已难辨正是非^①。盗掘攒宫七日后,番僧将诸陵骨(或伪骨)杂以牛、马骨运至杭州南宋故宫处瘞埋,并建“镇南塔”于其上,用以厌胜。元末张士诚据有苏浙,其弟士信守杭州,拆毁镇南塔,以其砖筑城。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派工部主事谷秉彝到北平(元大都)索取理宗头骨,瘞于应天府凤台门外高座寺之西北;次年六月,浙江省献上宋攒宫图,又下令将诸帝遗骸归葬

^①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点校本,第47—49页,中华书局,1959年。

于原穴。诸陵封土树碑,修葺享殿围墙。《国初事迹》记其事云:“元至元间,杨琏真珈发宋朝诸陵,以理宗首骨截为饮器,太祖既得燕都,命守臣吴勉寻访到京,太祖命埋之于城角寺。及览浙江所进地图有宋诸陵,命瘞于旧穴”^①。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设守陵户二户,令地方官每三年以香帛祀陵,并规定陵区五百步内禁樵采。

明太祖好大喜功,好夸己矜人,从心理分析角度来考察,也可以肯定他不会效法苟且偷安的南宋制度、当然也就不会取法其鄙陋的陵寝制度,更何况他对南宋诸陵被盗惨状了如指掌,避之犹恐不及,遑论照其演绎。

二、明代皇陵对于前代陵寝制度的继承

否认南宋皇陵制度对明代皇陵制度的直接影响,并不意味着全面否定明代皇陵制度对于前代皇陵制度相关事项的继承;只不过明代皇陵制度对于前代的继承是发展变化式的,而不是完全的模拟。

明朝诸帝同兆域的陵区制应该是受到过巩义北宋诸陵的影响;至于明代第一座帝王规格的陵墓——中都凤阳皇陵,其主体平面布局更是直接脱胎自唐代封土为陵诸陵和巩义北宋皇陵,关于它们之间的异同,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做过讨论,这里不再重复。南京孝陵玄宫因原山本体而开凿,显然是受到汉唐“因山为藏”之制的影响,但孝陵并没有完全照搬唐制,“独龙阜体表至少60%的地方是经过人工修补、堆填的”^②,并且在陵冢周围环砌以砖石墙垣,这些都与唐代

^① 明·刘辰:《国初事迹》,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许大龄等点校本,第80—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所等:《明孝陵地下宫殿勘测记》,载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20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的“因山为藏”有明显的区别。鲁荒王陵^①、梁庄王陵^②、益端王陵^③等一些明代亲王陵也是凿山开圹,其工程做法也与汉唐之制并不完全相同,并且大都有人工堆筑的封土。就北京陵区而言,金代皇陵近在京郊大房山之九龙山、云峰山一带,是明初卜陵时北京近畿惟一的先朝皇陵,长陵及昌平诸陵制度应该受到过金陵的影响。女真人最初丧葬制度颇为简单,“死者埋之而无棺槨,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④。金代皇陵制度之确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发展历程,“国初,祖宗止葬于护国林之东,逮海陵徙燕,始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岁余,始得良乡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龙城寺,峰峦秀出,林木隐映,真筑陵之处,遂迁祖宗于此。惟熙宗葬于山阴,盖以刑余,遂不人陵”^⑤。海陵王以后,金世宗、章宗等亦皆葬于此兆域中。金陵地面建筑已经在明末被捣毁,清代虽略有修葺,但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其制度不传。从最新公布的调查发掘资料来看^⑥,明代昌平诸陵在卜址、陵区布局、坟前竖碑等方面与金陵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明陵有可能受过金陵的启迪(图4—3)。限于资料尚不足征,金明皇陵之对比,此处暂付阙如,俟异日条件成熟再做探讨。

①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③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棨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④ 宋·佚名:《金志》,“初兴风土”;见崔文印:《〈大金国志〉校正》之“附录三”,第613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⑤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三,“凌庙制度”;见崔文印:《〈大金国志〉校正》,第474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2期。

另外,从神道设置石像生、石像生按前兽后人之序排列、坟墓前设献殿以备祭祀、坟墓高大突出等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唐、宋乃至汉等前代皇陵制度对于明陵的影响。下面从石像生制度、陵区制和陵名



图 4—3 金世宗兴陵遗址

等几个表现比较明显的方面讨论前代皇陵制度对于明陵的影响。

1. 石像生制度

石像生是汉以来帝王陵墓前的重要标识物,大体上包括石望柱、石兽、石人三类。石像生用以标识神道,而神道之名,汉已有之。《汉书》中有李蔡(李广从弟)“盗取神道外墼地一亩葬其中”的记载^①;《后汉书》记光武帝之子中山简王刘焉墓,“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家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钜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唐章怀太子李贤为此段记载作注时认为:“墓前于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②。现存年代最早的古代陵墓石刻是位于陕西兴平西汉霍去病墓前石兽,霍去病墓是汉武帝茂陵陪葬墓之一,封土像祁连山形,现存马、虎、象、羊以及马踏匈奴等 14 件,刀法古拙,形象生动;据调查,它们原置于

^① 汉·班固:《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第 8 册,第 2449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② 南朝·范曄:《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三王列传·中山简王焉》,宋云彬等点校本第 5 册,第 1450 页,中华书局,1965 年。

墓冢之上^①。霍墓前石兽的功用是表彰墓主生前战绩,装点封土所拟之“祁连山”,显然不能等同于后代的神道石像生。据《三辅黄图》记载:“青梧观,在五柞宫(西汉离宫,在今陕西周至县)之西。观亦有二梧桐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②。有人根据这类有关文献记载认为秦始皇陵上旧有石刻,至汉已毁^③。秦始皇陵石刻的性质是与霍去病墓上石刻性质相同,还是后世神道石像生之滥觞,目前尚未见可以充分说明问题的足够资料。山东邹县城东匡庄西汉末匡衡墓前约半华里处有石人一个^④,应该是汉代作品,但是否属于神道石刻,也还尚有待于其他资料佐证。“《风俗通》曰: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人墟,殴魍像。魍像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像畏虎与柏”^⑤。据此可知,东汉以前冢墓上石兽的主要功用,应该是为墓主震慑驱除魍魉鬼怪,尚不是仪仗象征。另据某些杂史记载说,先秦有些墓中还有石人,“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獾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⑥,它们显然更与神道石像生

① 傅天仇:《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西汉石雕艺术》、马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记》,均载《文物》1964年第1期。

② 汉·佚名《三辅黄图》卷五,“观”,何清谷校注本,第316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按,《三辅黄图》作者失考,其成书年代亦有数说,本书从清代孙星衍《〈三辅黄图〉序》之说。

③ 张文立:《秦陵墓上石刻探微》,《文博》1992年第5期。

④ 王思礼:《山东邹县城东匡庄的古代石人》,《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

⑤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五四,“木部三·柏”,据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宋版重印本第4册,第4235页,中华书局,1960年。按,查今本《风俗通义》中未找到此段文字;又,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下亦引,惟文字与《太平御览》微异。

⑥ 汉·刘歆:《西京杂记》卷六,“广川王发古冢”,向新阳等《〈西京杂记〉校注》本,第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无关。

唐人封演在所著《封氏闻见记》中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以表饰坟墓，如生前之象仪卫耳”^①。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来看，东汉帝王、官员的陵墓前有象征仪仗的石像生已经确定无疑。《风俗通义》记载，“汝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②。又据《水经注》记载，谯郡（今安徽亳州）“城南有曹嵩（曹操之父）冢，冢北有碑，……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③。另同书记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城北有东汉太尉乔玄墓，“冢东有庙，……庙南列二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皆高大，亦不甚雕毁”^④。东汉墓葬前石兽的实例已经发现不少，其中有纪年可考的主要有山东嘉祥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武氏墓前石狮^⑤、山东曲阜县孔林建宁四年

①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2册，第445—44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九，“怪神·石贤士神”，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元大德本，第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二三，“阴沟水”标点本，第345页，岳麓书社，1995年。

④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二四，“睢水”标点本，第358页，岳麓书社，1995年。

⑤ 山东嘉祥武氏石祠及石刻，早年即为金石学家所著录，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四，第八页，“汉武氏石阙铭”条下有“孙宗作师（狮）子，直四万”的记载（上海涵芬楼影印海盐张氏涉园藏吕无党手抄本，收录于《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48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上海书店重印，1984年）。清朝乾隆年间，武氏石祠倾圮残石出土，更被许多当时及以后的金石学家所著录和考释。现代研究成果主要有蒋英炬等：《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等，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公元 171 年)博陵太守孔彪墓前石兽一对^①、四川芦山建安十年(公元 205 年)巴郡太守樊敏墓前石辟邪一对和王暉墓附近的石羊、石瑞兽各一件^②、四川雅安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益州太守高颐墓前石辟邪一对等^③。无确切纪年的东汉石人、石兽发现得更多,但这些石刻大都经历过位移,更多的是保存在各地博物馆中,很难与史籍中的记载一一对应。郾道元关于曹嵩墓的记载明确提到了汉光武帝陵前有石象、石马,说明直到北魏时它们仍然完好。东汉皇陵神道建置目前尚缺乏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甚至关于光武帝原陵的位置都还有不同的认识,所以尚难证实。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洛阳有东汉石象:“象庄在(河南)府东,相传汉时西僧以象驮经来洛阳,后化为石,今有石象”^④。该石象在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县平乐乡象庄村南,据故老相传原为一对,其一已没人土中。现存石象在村外大道东侧水池中,下座已淹没,长 3.40 米、宽 1.50 米、高 3.20 米,象呈立姿,头朝东,由整块石灰岩雕凿而成。据考察,“石象所处位置正与邙山上的东汉陵南北相对,很可能是东汉帝陵前的神道石刻”^⑤。明孝陵神道石立象长 4.21 米、宽 2.16 米、高 3.47 米^⑥,比此象略大,但身体比例和雕饰手法都颇为相似。

南北朝陵墓神道石像生之设置已经趋于制度化,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主要分布于江苏南京市郊、丹阳市陵口以及南京附近的江宁、句

① 孔次青:《山东曲阜孔林发现汉代石兽》,《考古》1964 年第 4 期。

② 陶鸣宽等:《芦山县的东汉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0 期。

③ 耿继斌:《高颐阙》,《文物》1981 年第 10 期。

④ 明·李贤等奉敕纂:《大明一统志》卷二九,《河南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472 册,第 736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 年。

⑤ 徐金星等主编:《洛阳市文物志》,第 265 页,洛阳市文化局内部刊行,1985 年。

⑥ 南京博物院:《明孝陵》,第 7 页,文物出版社,1981 年。

容等县,共发现30余处,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还有一些则被移至博物馆等单位保存。这些石刻除皇陵外,还有将近20处是属于王侯的,石刻的内容包括神道石柱、瑞兽(天禄、辟邪)和石墓碑。南朝石柱形式有别于后代望柱,也称为“华表”,成对夹立于神道两侧,上部为柱头,一般都做成圆盘状莲花座式,顶端另有一个小辟邪;中部为柱身,圆柱形,刻瓜棱状直线条纹,柱额处嵌一长方形小石碑,其上阴刻“某官某人(墓主官爵姓名)之神道”字样,一般一为正文,一为反文(文字如图章反刻);下部为基座,分上下两层,上层呈圆形,刻瑞兽或螭龙等,下层为方形石座。石瑞兽皆作行走狮子形,背生两翼,形象生动,神采飘逸,刻工非常精细,时代特征鲜明。皇帝和王侯陵墓前的石兽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皇帝所用瑞兽头顶上均有单角或双角,一般双角在东侧(左侧),称曰“天禄”;单角的在西侧(右侧),名曰“麒麟”。王侯所用瑞兽头上无角,称为“辟邪”。

1976年,在河南洛阳北魏孝庄帝之静陵前12米处发现握剑侍立石人1件和石人头1件^①;2004年,在孝文帝长陵陵冢前也发现了石像生的基座^②,证实北魏皇陵前原有石像生。此外,在河北磁县、陕西咸阳的北齐和西魏、北周帝王陵墓前也都有石像生或曾经有过石像生的遗存,有些早年被埋入土中,有些则移入博物馆保护^③。

唐代帝陵前的石像生逐渐形成定制,《封氏闻见记》说:“国朝因

^① 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

^② 朱亮等:《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调查钻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7日第1版。

^③ 在河北磁县南有成片土冢,为北齐帝王陵墓兆域所在,其中兰陵王高肃墓前原有石羊、石马等,1950年代因平整土地被埋入土中;陕西咸阳有西魏、北周皇陵,其陵墓石刻有些已移入西安碑林博物馆。

山为陵,太宗葬九峻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臣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①。唐初二陵石像生制度变化较大,高祖献陵前原有石虎、石犀等,现已移入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太宗昭陵玄武门东西两庑原有著名的“六骏”浮雕,其中四石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另外两石现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高宗乾陵以后石像生制度基本定型,乾陵神道石刻自南而北依次为望柱一对、翼马一对、鸵鸟浮雕一对、马及控马官五对、石人十对,总计 18 对^②;在朱雀门外还有蕃部客使像 61 件(图 4—4)。此后唐诸帝陵基本沿用乾陵之制,神道石仪排列以望柱、石兽、石人为序;



图 4—4 唐高宗乾陵神道及其石刻

①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平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62 册,第 446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年。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 年第 4 期。

但在石刻内容方面小有调整,如唐睿宗桥陵将翼马换成独角兽^①,还有些陵墓没有蕃部客使像,如唐肃宗建陵等^②。

除追封宣祖的安陵神道石刻件数少、体态小以外,巩义北宋诸皇陵石像生制度基本一致,以宋太宗永熙陵为例,自南而北依次为望柱一对,象及驯象奴一对,朱雀浮雕一对,角端(独角兽)一对,马及控马官二对,石虎二对,石羊二对,蕃部客使三对,武将二对,文臣二对,总计17对^③(图4—5)。比诸唐代,宋陵石兽内容更为丰富,石人则以装束分出文武,蕃使也加入神道石人中。



图4—5 宋太宗永熙陵神道东侧石刻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

③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第58—7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明代皇陵石像生制度应该是对唐宋石像生制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前代石像生制度的影响在明早期的祖陵、皇陵二陵中表现尤其明显。与唐、宋诸陵相比,泗州祖陵、凤阳皇陵的石像生中马仍配以控马官,但二陵的控马官中却新添了长须文官的形象;皇陵神道还保留了虎和羊,在此后的明清时期这两种石兽只见于人臣墓前。从石刻内容方面来看,两陵神道取消了翼马、象及驯象奴、朱雀(或鸵鸟)浮雕、角端、蕃部客使等设置,并且取消了北宋皇陵南神门前的镇陵将军和神城内的内侍石像,在石像生队列中新增加了麒麟、狮子(唐宋诸陵只有门狮)和内侍;在石仪仗排列次序上,两陵一改唐、宋诸陵以辂柱为导引的常规,将望柱夹列于石人和石兽之间,并且增为二对。从数量上看,泗州祖陵神道石刻为 18 对(含望柱),与唐宋皇陵神道石仪数大致相埒;凤阳皇陵为 28 对(含望柱),为历代皇陵所罕见(图 4—6)。

南京孝陵石像生制度与唐宋诸陵以及凤阳皇陵有较大的不同,孝陵和凤阳皇陵一样不再设置翼马、朱雀(或鸵鸟)浮雕、角端、蕃部



图 4—6 明凤阳皇陵神道石刻

客使,并且取消了羊、虎;恢复了象、保留了马,但取消了驯象奴和控马官;新增加了骆驼、獬豸;保留了凤阳皇陵望柱夹列于石人和石兽之间的排列方式。从孝陵开始,诸种石兽、石人的基本形式已经固定;确立了石兽每种两对,一对蹲坐或跪卧、另一对伫立的形式,这些为以后明清使用石像生诸陵所承袭。北京长陵石像生中石兽的内容和排列方式源自孝陵,在石人中增列了两对勋爵形象;并且恢复了唐、宋诸陵以望柱列于石像生之前为导引的做法,而不同于明初祖、皇、孝三陵望柱夹列于石人石兽之间。

综上所述,经过汉和南朝时期的发端和不断修正,唐陵神道石像生已经趋向于定型,而从石像生的内容和排列方式上,则可以明显看出唐、宋、明三朝帝陵一脉相传的演化轨迹。

2. 陵区制

杨宽先生在所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专辟有“陵区的形成及其发展”一目,认为:“从战国中期国君开始兴筑陵墓起,同时就有陵区的设置,往往用二个以上的陵墓排列成一个陵区,这也是用来显示君王‘威势’,作为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①。这大概是对“陵区制”最早的阐述。

如果以二个以上帝王相近而葬即为“陵区制”,则殷墟王陵即已兆见其端倪。今河南安阳殷墟附近的侯家庄、武官村、西北岗等地都有商王及王族高级成员的墓葬区,1928年以来曾有若干“亚字型”、“中字型”大墓发现。洛阳附近的东周王陵也有相聚而葬的倾向,《水经注》“洛水”条下记载:“枝渎又东径周山,上有周灵王冢。《皇览》曰:周灵王葬于河南城西南周山上,盖以王生而神,故谥曰灵。其

^①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冢人祠之不绝。又东北径柏亭南,《皇览》曰:周山在柏亭西北,谓斯亭也。又东北径三王陵东北出。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注《西征赋》云:定当为敬。子朝作难,西周政弱人荒,悼、敬二王与景王俱葬于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纪》曰:景王葬于翟泉,今洛阳太仓中大冢是也。而复传言在此,所未详矣。又悼、敬二王,稽诸史传复无葬处。今陵东有石碑,录赧王以上世王名号,考之碑记,周墓明矣”^①。据洛阳市考古工作者的调查研究,“东周王陵大致可分作周山、王城和金村三个陵区”^②。其中周山陵区位于东周王城西南约5公里处,有三王冢和周灵王陵;王城陵区位于周王城东北,1957年曾钻探出4座规格很高的东周墓,出土的石圭有些还有“天子”字样;金村陵区洛阳老城东北汉魏洛阳故城北端,即汉太仓一带,有周景王冢。

笔者认为,商周王及诸侯的相聚而葬与后世的“陵区制”不尽相同,陵区制的正式形成应该比较晚。陕西西汉和唐代诸皇陵规模宏大,每陵皆自为兆域,陵园封域自数里、数十里至百余里不等。每座皇陵不但自成体系,而且还有一套完备的附属设施,汉元帝渭陵以前西汉诸帝陵的陵园附近还曾大量移民,建成“陵邑”,为县级建制,咸阳塬上“五陵”之名一直使用至唐代。把这些地理相距遥远、并且相互间也没有明显整体关系的陵墓列为一个“陵区”,似乎范围过大。“陵区”应该是指那些单座皇陵规模比较小,若干座、甚至整个王朝一代皇陵共同所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这个区域的地理范围一般为方圆数里至数十里,并且各陵之间应该有明确的或基本

^①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标点本,第228—229页,岳麓书社,1995年。

^② 徐金星等主编:《洛阳市文物志》,第80页,洛阳市文化局内部刊行,1985年。

明显的尊卑主从关系。按照这个标准来考察,中国古代陵区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南朝齐、梁两代皇室姓萧氏,皆为汉初相国萧何之后裔,为南兰陵(今江苏丹阳东)望族。两朝高级皇室贵族聚族而葬,陵墓在今江苏丹阳陵口,“《輿地志》云:泰安陵、兴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墟,西为齐梁二代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有亭、有营户守典之。四时公卿行陵,乘舫艫自方山由此入兰陵,升安车,招传驿置,以至陵所”^①。据清乾隆元年《江南通志》记载:“陵口,在丹阳县东三十一里,齐、梁诸陵多在金牛山旁”^②。陵口金牛山陵区内有齐武帝景安陵、齐文惠太子(追尊为帝)崇安陵、齐明帝兴安陵、齐和帝恭安陵、追封梁文帝建陵、梁武帝修陵、梁简文帝庄陵等,皇室贵族聚族而葬。据《南齐书》记载:“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竟陵王萧)子良临终,望祖劓山,悲感叹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既薨,遂葬焉”^③。从这段文字推测,齐皇室之葬应该有一定的排列规则。

两宋皇陵已经是比较典型的陵区制。宋代帝陵不像汉唐帝陵那样可望而不可即地分散,而是相对集中,在整体上属于同一个区域。北宋陵区旧属巩县,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真宗诏置永安军以专奉陵寝,景德四年复析巩、偃师、缙氏、登封四县之地设永安县,隶河南府,诸陵所占不足一县之地。北宋列帝皇陵在今巩义市城南,洛河东南,嵩山以北,规模比较小,同属一个地理区域。各陵

^① 宋·佚名:《嘉定镇江志》卷十一,“陵墓·丹徒县”,影印清嘉庆《宛委别藏》本,第44册,第261—26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② 清·黄之隽等编纂:《江南通志》卷三二,《輿地志·古迹三·镇江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8册,第8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③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〇,《武十七王传·竟陵文宣王》,王仲荦点校本第3册,第701页,中华书局,197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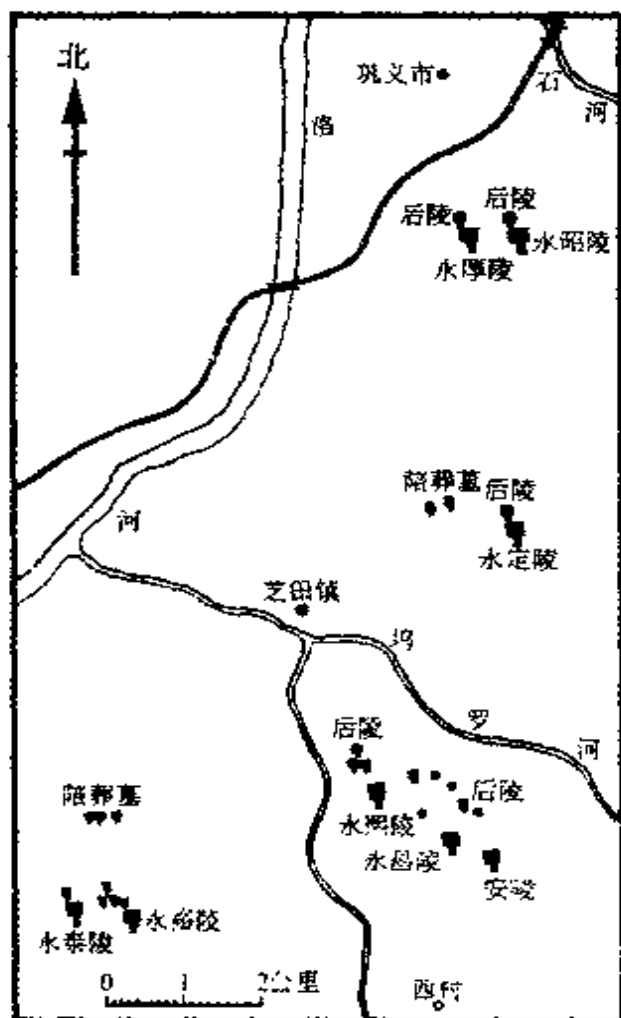


图 4—7 北宋皇陵分布图(据《考古》1964 年第 11 期改绘)

虽然仍有相对独立性,但在整体布局等方面却可看出彼此之间关系之密不可分。北宋皇陵兆域内可分为四个墓区(图 4—7),按照“五音姓利”的原则,墓主辈分尊卑自东南向西北递降。东南部西村区有三陵,自东南而西北依次为追封宣祖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中部芝田区一陵,为真宗永定陵;东北部孝义区二陵,东为仁宗永昭陵、西为英宗永厚陵;西南部八陵区有二陵,东为神宗永裕陵、西为哲宗永泰陵。南宋诸陵仅为有待奉迁的“攒宫”,只是稍存陵制,形局促狭,規制简陋,各陵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更加明显。

陵区葬法既成制度,后世嗣皇帝若另择墓地便被疑为“非法”,这种行为往往被谏阻。宋仁宗驾崩后,英宗和皇太后都因考虑风水因素,曾拟在永安陵区之外别择佳穴卜建山陵。司马光对此明确反对,他上疏说:“夫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至于丧葬,为害犹甚”;“国家自宣祖以来葬于永安百有余年,官私储侍,素皆有备,今改卜宅所,不惟县邑官司更须创置,亦恐大行皇帝神灵眷恋祖宗,未敢即安于新

陵也”^①。可见,到北宋中期陵区制的观念已经颇有市场。此后,房山迁葬金陵也是毗邻而葬,各陵间距不过旬丈之间,宋金皇陵的陵区制对于明代陵区制的形成应该有一定的影响。

明代皇陵肇建伊始即已见陵区制的端倪,明太祖自卜皇陵于钟山独龙阜,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九月葬入孝慈马皇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八月又将年未不惑即卒的懿文皇太子朱标葬于孝陵之东;随即立太子之子允炆为皇太孙,子孙昭穆,南京陵区制似乎已经势在必行。但靖难之变改变了皇家统系,也进而改变了南京的地位,明太祖最初的设想化为泡影。明成祖迁都北京,最终使明朝列帝共一陵区在昌平成为事实。不过北京陵区的形成也并非一帆风顺,成祖自定寿域于北京昌平黄土山,又在其东西两翼卜建东、西二井以葬妃,其中东井在德陵东南馒头山之南,西向,西井在定陵西南,东向。关于二井内所葬,清初顾炎武、梁份等人认为是殉葬诸妃,如《帝陵图说》云:“东井、西井当天寿山正东正西之地,永乐间所置,取金井之义,下窆穿圻不隧,为成祖十六妃殉葬之所,以次而祔也”^②。现代一些研究者通过对天寿山陵区诸妃陪葬墓的调查排比,认为:“东西二井规制与其他各坟园基本相同,推测其墓主,亦当为永乐诸贵妃,妃嫔埋葬之所,不当为殉葬妃嫔宫女之葬地”^③。长陵外加东西二井,已经布满了天寿山前圈部分,如此,则成祖是否有嗣皇

① 宋·司马光:《山陵择地札子》,见明·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五,《礼乐·丧礼·山陵及祭礼》,影印本第2册,第16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代汪鱼亭传抄本,第19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③ 王岩等:《明十三陵的陪葬墓——兼论东西二井陪葬墓的墓主人》,《考古》1986年第6期。

子孙鱼贯而葬的初衷,尚难确定。另外,仁宗初即位即宣布还都南京,只是未及正式实施即驾崩;宣宗将他葬于长陵之西。推仁宗之本意未必愿意随父葬于北京,直到他驾崩前的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四月间仍拳拳以祖父山陵为念:“太祖皇帝陵寝奉违已久,朕夙夜在念”^①;因南京屡次地震而命皇太子南下监国,并传谕南京太监王景弘:“朕以来春还京(南京)”,令其督修宫殿^②。可以说仁宗葬于昌平完全是因为死后身不由己。宣宗对于奠都一事依违于祖、父之间,既不宣布还都南京,也不去北京名前所冠“行在”之号,但既葬父于行在,已经向天下后世表明了他的内心倾向,北京成为无名而有实的首都。宣宗死后葬于长陵之东,昌平陵区才正式确立。

3. 皇陵的命名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出现各自的特称,应不晚于战国末年,《史记》:秦“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茝阳,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国一年,葬寿陵,生庄襄王;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③。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则谓昭襄王“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庄襄王“三十二而立,立三年卒,葬阳陵”^④。以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出土的铭刻“丽山”陶文,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则可证始皇陵本名“丽山”^⑤。西汉以后,历朝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一,实录卷首,校印本《明实录》第10册,第7页。

② 《明仁宗实录》卷九上,洪熙元年四月甲辰,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280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顾颉刚等点校本第1册,第288—289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④ 分别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索隐》、卷五《秦本纪·索隐》,顾颉刚等点校本第1册,第289、219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⑤ 赵康民:《秦始皇陵原名丽山》,《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王学理:《“秦始皇陵原名丽山”的再议》,《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各代皇帝皆有陵名,与庙号、谥号等并行,形成定制。汉、唐等许多王朝皆以单字名陵,如汉高祖陵名长陵、唐太宗陵名昭陵等;双字名陵见于魏晋及南朝的宋、齐、陈诸帝陵和两宋皇陵,如晋武帝陵名峻阳陵等,其间也有共用一字的现象,如东晋诸陵皆名“某平陵”、刘宋诸陵皆名“某宁陵”、萧齐诸陵皆名“某安陵”、两宋皇陵皆名“永某陵”等。在宋人文集中也常可见省略“永”字,而仅以后一字称某皇陵者,如程颐《代富弼上神宗皇帝疏》中说:“往者营奉昭陵,时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听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于迫卒,不复深虑博访,凡百规画一出匠者之拙谋,中人之私意”^①,文中“昭陵”就是对宋仁宗永昭陵的略称。但这种简称一般不用于正式的祭文、诏诰。

明代皇陵命名皆以一字,洪武二年(公元1367年)二月,明太祖为父母之墓荐上陵号曰“英陵”;同年五月初一日,“更英陵曰皇陵”^②。按,洪武时“皇陵”、“祖陵”之名皆非特称,这可能是由于明太祖文化不高、又妄自尊大,不肯俯从儒臣的缘故。此后,太祖孝陵、太宗长陵皆预建于皇帝生前,一说在葬人先于皇帝而死的皇后时即尊上陵名,如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九月马皇后落葬,即“命所葬山陵曰‘孝陵’”^③;又,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二月,“丙寅,葬仁孝皇后于长陵”^④。但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六年冬至节,

^① 宋·程颐:《代富弼上神宗皇帝疏》,载《二程文集》卷六,《伊川文集一·奏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45册,第64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827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庚午,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342页。

^④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七,永乐十一年二月丙寅,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668页。

“皇太子、亲王诣孝慈皇后陵致祭如常仪”^①；又，洪武十七年十二月“腊日，祭孝慈皇后陵”^②；同月岁末之日又“祭孝慈皇后陵”^③。按，《明太祖实录》既有多处称“孝慈皇后陵”，则很可能其时尚无“孝陵”之名。考《明太祖实录》凡前后三修，其间枝节本末已不能尽知，故其制难以详考。后来景帝皇后杭氏先葬入预营的寿宫，只称“寿陵”而并未荐上陵名，据《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录》记载，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中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寿陵”^④。可见至迟到景泰时，皇后入葬即荐上陵名尚未成为定制。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二月，明世宗以孝烈皇后将先葬寿宫，谕辅臣曰：“朕思太祖、成祖俱是二后先安玄宫，其陵名荐在何时，可令礼臣案查故事以闻”。于是礼部尚书费霖“具奏：‘洪武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孝慈皇后葬孝陵、永乐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仁孝皇后葬长陵，皆命名在先，卜葬在后，载两朝《实录》中’。于是，上定孝烈皇后陵名曰‘永陵’”^⑤。预营寿陵在皇后葬入即荐上陵名，至嘉靖朝形成定制。明朝昌平诸陵大多建于皇帝死后，其陵名由嗣皇帝在皇帝大葬前荐上。如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五月己丑，“荐宣宗章皇帝陵号曰景陵”^⑥；六月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八，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丙辰，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580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洪武十七年十二月戊戌，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574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洪武十七年十二月辛酉，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580页。

④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八十六，景泰七年七月壬午，校印本《明实录》第20册，第5684页。

⑤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三，嘉靖二十七年二月癸丑，校印本《明实录》第45册，第6107页。

⑥ 《明英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己丑，校印本《明实录》第13册，第108页。

辛酉，“奉宣宗章皇帝梓宫葬于景陵”^①。有时在山陵营造伊始即荐上陵名，如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六月戊午，“营建大行皇帝陵于天寿山，荐名泰陵”^②。明神宗虽亦预建寿陵，并且皇后先崩数月，但以帝后同日而葬，陵名亦在大葬前由光宗选定：“钦定新陵名曰定陵。阁拟四名以进，上所择也”^③。

明朝太祖孝陵及以后诸皇陵之陵名都与前代重复，据《钦定日下旧闻考》引《裘杼楼丛说》云：“明诸陵犯前代陵名者匪一，太祖曰孝陵，与后周武帝同也。成祖曰长陵，与汉高祖、魏孝文帝同也。仁宗曰献陵，与唐高祖、金穆宗同也。宣宗曰景陵，与魏宣武帝、唐宪宗、金睿宗同也。英宗曰裕陵，与金显宗同也。宪宗曰茂陵，与汉武帝同也。孝宗曰泰陵，与唐玄宗、金肃宗同也。武宗曰康陵，与汉平帝、东汉殇帝、后晋睿祖、宋顺祖、南汉刘龚同也。世宗曰永陵，与南唐徐知诰^④、蜀王建、金世祖同也。穆宗曰昭陵，与后周明帝、唐太宗、南汉刘晟同也。神宗曰定陵，与孙吴景帝、魏孝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宋翼祖、金景祖同也。光宗曰庆陵，与唐元昭后、后唐德祖、后周世宗、辽圣宗、兴宗、道宗同也。熹宗曰德陵，与南汉刘隐、金宣宗同也。庄烈愍皇帝曰思陵，与金熙宗同也。又兴献帝曰显陵，与前凉张重

① 《明英宗实录》卷六，宣德十年六月辛酉，校印本《明实录》第13册，第124页。

② 《明武宗实录》卷二，弘治十八年六月戊午，校印本《明实录》第33册，第51页。

③ 《明光宗实录》卷四，泰昌元年八月壬子，校印本《明实录》第65册，第101页。

④ 按，此条有误。徐知诰即南唐烈祖李昇，其陵墓在江苏南京西南祖堂山，号“钦陵”，经南京博物院发掘，有《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出版。

华、后晋高祖、辽世宗、义宗同也”^①。可见，除明初的祖陵、皇陵以外，明代诸帝陵名并无创新，显然并不以与前代陵名重复为忌。

明皇陵陵名用字不同于西汉皇陵以山陵所在地名，而是多用吉祥字或谥法中字，所以陵号也成为指代皇帝的一种称谓，如蒋一葵《长安客话》：“宣德中，李时勉为侍讲学士，一日景陵怀金钱至史馆，撒之于地，令诸讲官拾取。时勉独正立，乃呼至前，赐以袖中金钱”^②。文中“景陵”即指代明宣宗。有人甚至对于以陵称帝情有独钟，如郑晓《今言》：“孝陵、长陵皆中宫先崩，不立继后。献陵至康陵，后皆后帝崩。裕陵二后，茂陵三后，盖孝肃、孝穆、孝惠，皆母以于贵，尊称之号也”^③。文中孝陵指代太祖、长陵指代成祖、献陵指代仁宗、康陵指代武宗、裕陵指代英宗、茂陵指代宪宗，类似例证在《今言》中俯拾皆是。以陵名用作为帝王的代称，至迟在唐宋间已有之，据裴庭裕《东观奏记》记载，唐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④。文中“光陵”为唐穆宗（宣宗异母兄）之陵名，用以指代唐穆宗。这种例证在宋人笔记中尤为多见，如《铁围山丛谈》云：“昭陵晚岁开内宴，盖数与大臣侍从从容谈笑”^⑤，昭陵即永昭陵之略称，指代宋仁宗；又如《齐东野语》云：“阜陵天纵睿圣，英武果断，古

① 清·于敏中等奉敕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七，点校本，第2216—221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②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记·讲筵金钱》点校本，第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③ 明·郑晓：《今言》卷二，一百四十六条，李致忠点校本，第85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④ 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田廷柱点校本，第85页，中华书局，1994年。

⑤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五，点校本，第94页，中华书局，1983年。

今之所鲜俪”^①，阜陵即永阜陵之省称，指代宋孝宗。

以陵号代替庙号或谥号称本朝帝王，应该是陵墓在国家祀典中日益重要在语言习惯中的一种反映。明朝文献中这种例证很多，除见于各种行文中以外，陵名指代帝王还见于书名。焦竑《国史·经籍志》中载有《孝陵纪略》，原书已佚，内容不详，“此书或记太祖事，未必定指陵寝”^②。此外，还有明末清初许重熙之《五陵注略》、文秉之《定陵注略》、孙承泽之《思陵勤政记》、戴笠之《怀陵流寇始终录》等。这些书都不是记述陵墓制度的专书，其中《五陵注略》为编年体史书，记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五朝史事；《定陵注略》十卷，分条记录万历朝史事，其卷一有“寿宫始末”条，具体内容亦为记神宗定陵营造事件本末，而不是讲述陵寝制度，其书的著作目的是揭示“门户之能亡国败家如此”，希望能“昭止水鉴”，使“后之谋国者取鉴乎此，痛抑爱憎之私，力消左右之袒，乐民誉以公任，使课实绩”^③。考以帝王陵墓名用作书名，可能也是始于唐代，唐人令狐澄有《贞陵遗事》二卷、柳玘有《续贞陵遗事》一卷，惜二书均佚，内容不详。贞陵为唐宣宗陵名，从书名推断，此二书内容亦应为记述宣宗朝史事，当无关乎贞陵陵寝制度。目前所知，除南宋周必大的《思陵录》以外，以帝王陵名名书而其内容又主要是讲述陵寝制度的古代著作比较罕见。

^①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孝宗圣政”，点校本，第1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② 王焕德：《明孝陵志》“規制第二”，见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第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 明·文秉：《定陵注略》叙，影印中央图书馆藏手抄本，第2—3页，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第二节 制约明代皇陵、王陵选址的因素

古人以送死为大事,认为死者与生者之间有着某种超自然的神秘联系,葬地的选择关乎后嗣命运,皇陵的卜选更是事体重大,被认为可以直接攸关国运。历代帝王陵墓的选址大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就明代而言,陵墓择址主要受地理因素、政治因素、风水因素、礼制因素等几个方面的制约。

一、地理因素对陵址选择的影响

地理因素对陵址选择的影响主要是指皇陵要卜选在国都附近,王陵要建在王府所在府、县附近。皇陵、王陵在国都、王都附近选址,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习惯,汉以来尤其坚守这一原则,陵墓与都城一体化,不仅更有利于兴建、奉祀、防护,而且还方便了嗣君人等的瞻拜活动。明代皇陵选址遵循历代惯例,除追封的几位皇帝外,列帝陵墓都卜选在两京附近,太祖孝陵在应天府城朝阳门(今名中山门)外,外城之内;成祖以下诸帝之陵在昌平,在北京城北约50公里,亦属近畿。明代各藩亲王所葬一般都在藩封所在府州的辖境内,如鲁藩封国在兖州,鲁藩诸王陵虽分布在邹县、泗水、滕县、费县四县之地,但此四县在明代俱属兖州府,而且诸王世次越靠前,葬地靠兖州越近(这是分别以始葬某地的诸王为考察对象,后世嗣王再有祔葬者另当别论)。诸藩王陵区距藩府较远者一般都有特殊原因,如周藩王府在开封,定王等王墓在禹州,相距100余公里,这是因为开封周围地势低洼,不利于营造陵墓。而且要特别指出的是,禹州在明代也属于开封府管辖,周藩选墓并未出境。

又如庆藩开府宁夏(今宁夏银川),而王墓则在银川以南 200 公里左右的韦州(今属宁夏同心县),这是因为韦州也是朝廷许可的庆藩驻地之一。明初宁夏地近边塞,庆靖王始封宁夏,以藩府未建,曾暂驻古韦州城,永乐时虽然早已经在银川建成王府,但仍“令岁一至韦州度夏”。宣德初年庆靖王奏请“宁夏卑湿,水泉恶,乞仍居韦”,宣宗不准,“令岁一往来,如成祖时”^①。韦州深为始封庆王所喜爱,银川周围多荒漠,北部的贺兰山虽然气度宏伟,但却早就建有西夏王陵,其他地方难得觅见如韦州王陵区的好山势,于是庆藩诸王依次卜陵于此。另外,和周藩相似,从行政归属来看,明代的宁夏与韦州也都隶属于宁夏镇之宁夏卫。

毫无疑问,道里远近是明代帝王选择陵址的最优先条件,只要能在近处卜得佳穴或基本如意之墓址,其他地方风水再好,也不会考虑选用。例如江西南昌市郊梅岭有一处“龙口穴”,为前朝明令禁葬之风水宝地,其地气虽好,但皇帝和其他藩府却决不会舍近求远地选卜此地为山陵。第四任宁王朱宸濠蓄谋造反夺取皇位,乃于正德十二年(公元 1517 年)十月葬本生母妃于梅岭,以当其“盛气”,《明武宗实录》记其事云:“西山青岚龙口穴,先朝所禁者,濠复以葬其母”^②,后来宸濠起兵谋反事败,此事也被列为他的一条罪状。

二、政治因素对陵址选择的影响

明太祖定都金陵,并预营寿宫于都城东郊钟山之阳,洪武十五年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传·庆靖王榘》,点校本,第 12 册,第 3588 页。

^② 《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五,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校印本《明实录》第 37 册,第 3382 页。

(公元1382年)九月,将新故嫡妻孝慈马皇后“安厝皇堂,……命所葬山陵曰孝陵”^①,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太祖死后合葬于此。明成祖“靖难”夺位后,虽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太祖和马皇后的嫡子,下令将建文朝的所有变更尽数恢复洪武旧制,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今主宰天下,谨遵父皇太祖高皇帝成法,纤毫不敢改违”^②;“谨遵皇考成宪,不敢一毫自用”^③,但在陵址选择这样的大事上,他却要远离孝陵。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④。明成祖没有依历朝惯例在京师祖陵附近为皇后建陵,而是命人在北京附近选择吉地,最终选中了昌平的天寿山。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的北京并不是国都,长陵的初建也绝不是近国都而葬。成祖即位以后,北京城由燕藩王城到陪都、再到正式都城,经历了漫长的十八年。其间因革变迁,《明太宗实录》都有清晰的记载,兹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永乐元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奏请:“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皇帝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⑤。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庚午,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342页。

^② 明·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二,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〇,许大龄等点校本,第9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校印本《明实录》第6册,第150页。

^④ 《明太宗实录》卷六九,永乐五年七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966页。

^⑤ 《明太宗实录》卷十六,永乐元年正月辛卯,校印本《明实录》第6册,第294页。

永乐四年闰七月壬戌，“文武群臣淇国公丘福等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①。

永乐七年正月癸丑，“礼部言：皇上将巡狩北京，旧藩府宫殿及门宜正名号。从之”^②。

永乐七年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县。时仁孝皇后来葬，上命礼部尚书赵玘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③。

永乐十一年正月，“天寿山陵成，命名长陵”^④；二月丙寅，“葬仁孝皇后于长陵”^⑤。

永乐十四年八月丁亥，“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作西宫为视朝之所”^⑥。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六部等官因上疏曰：“比年圣驾巡狩，万国来同，民物阜成，祯祥协应。天意人心，昭然可见。然陛下重于劳民，延缓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计，正陛下当为之时。况今漕运已通，储蓄充溢，材用具备，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五七，永乐四年闰七月壬戌，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835页。

② 《明太宗实录》卷八七，永乐七年正月癸丑，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1154页。

③ 《明太宗实录》卷九二，永乐七年五月己卯，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1202页。

④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六，永乐十一年正月卷末，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660页。

⑤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七，永乐十一年二月丙寅，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668页。

⑥ 《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九，永乐十四年八月丁亥，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953页。

军民一心，营建之辰，天实启之”^①。

永乐十五年四月癸未，“西宫成”^②。

永乐十八年九月己巳，“北京宫殿将成，行在钦天监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受朝’。遂遣行在户部尚书夏元吉赍敕召皇太子，令道途从容而行，期十二月终至北京”^③。

永乐十八年九月丁亥，皇帝传谕行在礼部：“自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正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各衙门印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绶监。令预遣人取南京衙门印给京师各衙门用。南京衙门皆加‘南京’二字别铸印遣人赍给”^④。

从这张时间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早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北平升格为北京，永乐四年下诏营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但事实上，直到徐皇后病故，明成祖本人一直未曾回过北京，这时的北京最多不过是相当于“陪都”；他即位后第一次离开南京北上，是在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壬午，车驾发京师”^⑤。大规模营造北京宫殿始于永乐十四年，这时徐皇后已葬于北京三年有半；而迁都北京之诏是在徐皇后死后十三年多的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底才颁下。“仁孝皇后崩，文皇圣意，已不欲立封域于南方，故迟迟未葬。至七年

①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964、1966页。

②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七，永乐十五年四月癸未，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2000页。

③ 《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九，永乐十八年九月己巳，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2225页。

④ 《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九，永乐十八年九月丁亥，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2227—2228页。

⑤ 《明太宗实录》卷八七，永乐七年二月壬午，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1170页。

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县”^①。北京陵址的选择,表明了成祖即位之初就要远离太祖而葬的决心,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他最终决定迁都北京的一个重要信号。所以说,成祖不愿在南京近太祖而葬,不是因为定国都于北京,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是政治上的,简单地说,一方面是心理上“篡位”的道德污痕总难抹去,另一方面则是上厌于懿文皇太子。

明成祖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名起兵,宣称要“扶国家于既坏,安宗社于垂亡;恭朝阙庭,谒拜陵寝,然后退守旧藩,庶几以明忠孝之心”^②。但最终的事实却是他假“靖难”之名从太祖的合法继承人、自己的侄儿于中夺得了皇位,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有悖于君臣之义和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所特别强调的首重嫡长的原则。明成祖虽然能够如愿以偿地称帝建元,并且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杀反对者,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道德舆论的谴责,特别是那些“诛心”的言论,简直使他如芒在背。对于这些他一直惴惴于心,即使在接受即位朝贺时也不例外,据明人记载:“太宗文皇帝师入南京,继统皇极。工部尚书茹瑺入殿首贺即位,文帝呼谓之曰:‘瑺,吾今日得罪于天地祖宗,奈何?’瑺叩首曰:‘殿下应天顺人,何谓之得罪呼?’文帝大悦,进封忠诚伯”^③。然而,在众多的建文朝臣和勋戚中,能像茹瑺一般谄媚者毕竟不多,方孝孺、铁铉、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母后先祔庙”,点校本,第93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建文)元年七月丁丑,校印本《明实录》第6册,第20—22页。

^③ 明·佚名:《建文皇帝遗迹》,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一九,许大龄等点校本,第3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练安、徐辉祖等人都宁死不肯承认成祖即位的合法性，拒不称臣。诚意伯刘基的次子刘璟更是直诛其心，他公然斥骂殿上的僭伪者：“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①！在传统政治和伦理道德的氛围中，无论如何粉饰，明成祖都无法从心理上抹去“篡弑”、“得罪天地祖宗”的罪恶感。清除自身的心理障碍，要远远难于诛灭敌手；更何况那些忠于建文帝的忠臣孝子们的肉体可以消灭，其言论却并不一定会因“诛十族”而就都能从世界上永远消失。在这个背景下，远离太祖建陵会有有一种重开天地、再造邦家的自我感觉效果，并进而可与太祖南北并尊，使“篡弑”之垢骂稍得舒缓。有研究者指出：成祖预营皇陵于北京，“窥其本意，乃是欲迫使其子孙必须将其葬于北京，造成不得不以北京为都城之情势，其后明代世世帝王亦皆葬于此，如此南京自然沦为辅助的都城，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犹如一座冷宫，太祖之地位不贬而自贬。成祖为建都北京者，又是第一位营葬于北京的帝王，其后明代帝王皆都于北京葬于北京，于是明代之国都是北京而非南京，成祖自然具有百世不迁之主的地位，甚至可以取代太祖成为奠定明代万年鸿基的创业皇帝的地位”^②。此观点虽略有偏激之嫌，但用于明成祖的心理分析，却颇有合理成分。

为了淡化自己篡位者的形象，明成祖制造了大量的舆论，甚至不惜编造谎言，诬称“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并“常于宫中行呪诅”；甚至虚构出太祖欲传位于自己神话：“诸子无如燕王最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附子璟》，点校本，第12册，第3784页

^② 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7）》），第249页，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编印，1988年。

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吾所属意”^①。永乐朝最后修成的《明太祖实录》记载,懿文太子死后两日,太祖御东角门对诸臣云:“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②。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成祖“敕谕天下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云:“朕以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高皇帝以燕地与胡虏连境,屡属以边事。后懿文太子薨,高皇帝以朕堪属大事,欲正位东宫,永固基本。不幸高皇帝宾天,允炆矫遗诏嗣位,戕害诸王骨肉,怀衅之意已具,疑朕之心实深……朕实不得已,起兵相救,初岂有心于天下哉!竟以一隅之众,敌天下之兵,三四年间,大战数十,小战无算,制胜克捷,卒平祸难,此岂人力所能为也!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佑,天意所集,人心所归,是以至此”^③。在另外的诏旨中他又说:“太祖高皇帝以某年蚤早逝青宫,建储之议出于皇考之心,初欲立朕,朕躬自揆度,小宗不得干预正统,力辞其命,乃让太孙”^④。但无论怎样矫言饰非,太祖曾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二十余年、继而又立皇太孙为皇嗣的事实总是抹杀不掉的。

懿文皇太子死后,以太祖命安葬在孝陵之东,称“东陵”,从陵墓

^① 明·佚名:《奉天靖难记》卷一,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一一,许大龄等点校本,第2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校印本《明实录》第5册,第3195页。

^③ 明·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二,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〇,许大龄等点校本,第9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 明·佚名:《建文皇帝遗迹》,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一九,许大龄等点校本,第3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位次上继续肯定了朱标的皇嗣地位^①，太祖传子若孙的安排昭然若揭。这一点更让以太祖“合法继承者”身份自居的成祖无法接受。成祖与懿文皇太子同为太祖之子，懿文太子既据有太祖之昭位，则成祖最多只能卜陵于孝陵之西，这种在懿文太子之下的安排委实令他无法接受，既然“无地自容”于父皇陵旁，择陵于北京便势在必行。

对于明成祖迁都北京，明人多有褒扬之辞；燕京形胜，亦久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万历朝大学士许国《谒长陵诗》中有云：“自起寝园临大漠，长留弓箭镇全燕”^②。谢肇淛说：“燕山建都，自古未尝有此议也，岂以其地逼近边塞也？自今观之，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带，诚天造地设以待我国家者”。“使当时不封燕，纵得守臣节，不兴靖难之师，而北虏乘间窃发，燕云终非国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与文皇之定都于燕，其远见皆相符契矣”^③。甚至有人认为“都燕、陵燕”，足以“捶勒九边，囊括四海”，是“前万世未破斯荒，后万世无穷斯利”的壮举^④。但是设皇陵于边关，从长远来看，只能说是利弊参半。一方面，以祖陵为抵压，迫

① 明代钟山陵墓布局，惟孝陵及懿文东陵在钟山之阳，其余开国功臣陪葬墓，如徐达墓、常遇春墓、李文忠墓等皆在山阴；夭折者而外，皇子亲王皆葬封国，惟韩王松以尚未出藩而薨，葬南京外城安德门外，事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其地亦远离钟山。帝陵在山阳，陪葬墓在山阴，以别等制，将懿文皇太子葬于山阳孝陵东旁（左侧，昭位），表明太祖在陵园分布上继续认可懿文皇太子嗣皇帝的地位。

② 引自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郊垌杂记·天寿山》点校本，第8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③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点校本，第4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④ 明·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叙”，标点本，第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使后世嗣皇帝不得不加倍重视边防,绝不敢轻言放弃。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土木之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群臣集议战守,有主张南迁者,礼部尚书胡濙一言即以沮之:“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太监李永昌亦奉劝皇太后曰:“陵庙宫阙在兹,仓廩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由是中外始有固志”^①。但另一方面,皇陵地接边塞,难免时有被侵扰之虞,特别是国力衰弱时,边陲皇陵就成了情感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包袱。土木之变,“虏寇入境,侵犯三陵,官军惊散”^②,昌平长、献、景三陵供器等遭到破坏,直到一年多以后才修复补齐,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十二月庚寅,“遣宁阳侯陈懋告于长陵、献陵、景陵曰:曩因虏贼干犯山陵,兹以修复灵座一新,卜以今日铺设,谨用祭告”^③。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蒙古兵突袭,“距天寿山仅七十余里,巡按御史玉应钟闻警,夜驰赴昌平,时守臣俱不设备”^④。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八月“庚戌之变”,“虏遁至清河迤北,分掠天寿山、东山口、康陵果园等处。上命大将军鸾严护陵寝”;“虏长驱天寿山,见总兵赵国忠列阵红门前,不敢入而去”^⑤。此后,昌平陵区在朝廷与清兵的对峙中多次首当其冲,整饬边防以护陵寝之议屡见于章奏,明思宗敕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校印本《明实录》第17册,第3509页。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〇一,《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十九,景泰二年二月丙戌,校印本《明实录》第18册,第4299页。

③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九,《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十七,景泰元年十二月庚寅,校印本《明实录》第18册,第4231页。

④ 《明世宗实录》卷三四一,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丙辰,校印本《明实录》第45册,第6205页。

⑤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乙酉、丁亥,校印本《明实录》第45册,第6503、6506页。

令：“各路道将著[着]严行悉飭，其陵后一带冲隘上紧倍加侦备，不得隙踈”^①。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军也是先破十二陵，继而才攻陷北京城的。而崇祯末年在是否迁都南京以暂避内忧外患这一问题上，昌平皇陵始终是一个极重的砝码。

昌平陵区开辟后，明朝后嗣诸帝相继葬于此兆域之中，惟景帝别葬于西郊金山妃嫔及夭折皇子女墓区之中，这也是出于政治原因。景帝在位时已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在祖父仁宗献陵之西旁建成寿陵，并已葬入当年二月病故的皇后杭氏，时人所见“明楼高耸，僭拟与长陵、献陵相等”^②。英宗复辟，景帝死后被追废为“郕戾王”，只能以亲王礼别葬于金山，“与许悼王及怀献世子坟园共处”^③。后来明宪宗虽然下诏恢复景帝的皇帝身份，但以其昌平之陵地比英宗的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兵部为着宣大各路道将倍加侦备陵后一带冲隘奉旨事行稿》（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初五日），影印本第42册，第35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另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收录的这类章奏还有：《直隶巡按监察御史胡良机为夷情及审拟侯应科等事题本》（崇祯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影印本第7册，第402页；《宣府巡抚陈新甲为恭迷东巡怀来等地情形并陈陵区急需加强防范事题本》（崇祯八年四月三十日），影印本第18册，第326页；《宣府巡抚陈新甲为边墙修葺不牢特约庸弁并陈陵边久远之图事题本》（崇祯八年十月初五日），影印本第20册，第292页；《兵部尚书张凤翼等为请令迟国柱急任皇陵路冲边宣府东路周四沟守备事题行稿》（崇祯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影印本第20册，第355页；《兵部为陵京用将两难事奏行稿》（崇祯十年十月十五日），影印本第27册，第142页；《整飭怀隆山东按察司佥事宋应鳌为添兵护陵管见事题本》（崇祯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影印本第32册，第95页；《天寿山太监申之秀为请裁免总监以修陵后边备事题本》（崇祯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影印本第32册，第363页等。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天顺元年五月癸酉，校印本《明实录》第20册，第5944页。

③ 《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五，天顺元年二月庚申，校印本《明实录》第20册，第5860页。

裕陵更靠近献陵,位次在英宗之上,当然不便迁葬,只好在原来亲王陵的基础上依制添建,“宫门一以夺,羨门竟迷方。碧瓦易黄屋,蓬颗西山旁”^①。于是,在西山妃嫔和夭折之王、公主墓群中便突兀出了一座等制介乎于皇帝与亲王之间的皇帝陵。

政治因素对皇陵卜址的影响是偶然的,但对于某些特殊人物和特殊事件来说,却是至关重要。

三、风水理论对陵址选择的影响

“风水”二字源出于伪托东晋郭璞所纂之《葬书》:“《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②。历代皇陵所尊用的风水法术规则并不完全一致,汉代皇陵尚看不出风水理论的影响,南朝皇陵明显依随山势,似有风水因素影响。但大体上说,唐代以前堪舆术对于皇陵的影响并不明显。从宋代开始,堪舆之说大行于世,堪舆术与皇陵卜选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宋朝皇帝极端迷信“五音姓利”之说,该说把世间诸姓按“五音”分为五类,再分别与“五行”相对应,从而得出某姓所利的阴阳宅方位、地势走向。皇室赵姓属角音,所利之地势为首选东高西低、次选南高北低,所以巩义北宋诸陵地势都是南高北低,陵区的地貌是东南为高山,西北为开阔的平原;角音所利方向为壬、丙方向,因之诸陵皆

^① 清·于敏中于奉敕撰:《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七,《京畿·昌平州四》引虞淳熙《景泰注诗》,点校本第7册,第220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② 晋·郭璞:《葬书》内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8册,第1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按,《葬书》旧题晋郭璞撰,《四库全书》之“子部·术数类”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书自宋始出,其后方技之家竞相粉饰”。现代研究者中也有人认为此书成于南北朝或唐代,见何晓昕《风水探源》第34页,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笔者认为此书成书年代当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为是。

朝南而略偏东^①。经过元代的扫荡,“五音姓利”之说在明初已经失势,对于明代墓葬选址影响最大的堪輿术是以《葬书》为代表的一套理论。据《松窗梦语》说,明人迷信《葬书》所谓“骸骨得气而子孙受荫之说,指某山为发源,指某山为过峡,至某山而凝结为穴;某山为龙,某山为虎,龙昂而虎伏;某山为尊,某山为案,尊欲有力,案欲有情;必如是乃延福泽,不然则否。于是贪求吉地,不独愚昧细民,即缙绅士大夫亦惑于此。未葬,谋求不遗余力,甚至构讼成仇;各谋利己,暴露迟久,迁徙再三”^②。有人甚至认为:“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③,也就是说,追求风水和饮食安居等同样重要。但风水理论绝非明朝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的主流,运用堪輿术卜选阳宅墓地,其利在用:“盖不过远水患、处原避湿、得土之宜,而无浸淫之虞也,然皆为建都谋。至卜其宅兆,则埋葬以安亲体魄。孝子慈孙之心,惟欲得善地,永无崩蚀侵损患害是已”^④。对于风水理论,明人有的认为荒诞不足凭,“人之一身,岁不能无休戚,阖门百口,岁不能无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谓生者之命脉其权尽制于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耶”^⑤;推崇

①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冯继仁等:《论阴阳堪輿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文物》1994年第8期。

②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五,“堪輿纪”,点校本,第92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③ 明·李贽:《焚书》卷一,《答耿司寇》,点校本,第30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④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五,“堪輿纪”,点校本,第92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⑤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六,“人部二”,点校本,第115—11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住场好不如肚肠好,坟地好不如心地好”之说^①;也有人趋之若鹜,为求子孙富贵而不惜迁葬已死多年的先祖于所谓“吉地”。传闻正德丁丑状元舒芬即以迁祖坟而得鼎甲:“舒芬之父得一葬地,形家曰:‘此地当发鼎元,然必四世之后’。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时芬童年,曰:‘父无患,若地果胜,请移三世祖骸葬于此,儿即应矣’。父从之,芬果大魁”^②。从有关言行来考察,明朝皇帝对于风水之说有迷信者,亦有不甚信者,大多是介于信与不信之间,但“山陵事重”,所以仍要“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③;陵址卜选“必须精择”,“务求吉兆,以为万万世之寿藏”^④。

风水术对于明代陵址的选择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帝王陵墓兴建之前都要有一个按《葬书》风水理论去卜选陵址的过程。明孝陵所在的钟山,古称王气所钟,陵址所在有“宝势旁连大江起,尊形独受众山朝”^⑤之誉。传闻孝陵陵址即由明太祖与刘基、徐达、汤和三人共同卜定,“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人言王气,龙蛻藏焉。高皇帝与刘诚意、徐中山、汤东甌定寝穴,各志其处,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⑥。成

①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六,“论堪舆”,魏连科点校本,第244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② 明·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点校本,第249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③ 《明武宗实录》卷一,弘治十八年五月丁未,校印本《明实录》第33册,第27—28页。

④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五,嘉靖十五年三月庚午,校印本《明实录》第42册,第3915页。

⑤ 宋·王安石:《北山三咏·宝公塔》,见朱自清《宋五家诗钞》,第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⑥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一,“钟山”,点校本,第21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

祖长陵之吉穴更经过慎重的选择,《明太宗实录》记其事云:“上命礼部尚书赵玘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①。廖均卿是当时江西派风水理论的嫡传人,山陵卜选是国家大事,当时参与其事者可能并不止廖均卿一人。据郑晓《今言》记载:“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成祖择寿陵,久不得吉壤,永乐七年,仁孝皇后尚未葬。礼部尚书赵玘以均卿至昌平县,遍阅诸山,得县东黄土山最吉,成祖即日临视定议,封为天寿山。命武义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长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许人”^②。另据《长安客话》记载:“国初有宁阳人王贤,少遇异人相之,当官三品,乃授以青囊书,遂精其术。永乐七年,成祖卜寿陵,遍访名术,有司以贤应。贤奉命于昌平州东北十八里得兹吉壤,旧名东柞子山,陵成封曰天寿。贤后累官至顺天府尹”^③。按,《长安客话》中的王贤或即《今言》中“不知何许人”的“王府尹”。长陵的卜选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当时预选之地亦不止一处,《宙载》云:“文皇帝初卜陵,众议欲用檀柘寺基,上独锐意用黄土山,即天寿山也”^④。天寿山陵域即定,后世嗣皇帝选陵址时不必再遍觅京畿,但在既定陵区之内也须具体卜穴。明朝列帝选陵及各王府卜选葬地,除聘请名高一时的阴阳先生外,主要依靠由钦天监选派的阴阳生,当人员不敷用时,另以天文生充之。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五年(公元1461

^① 《明太宗实录》卷九二,永乐七年五月己卯,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1202页。

^② 明·郑晓:《今言》卷三,一百九十一条,李致忠点校本,第109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郊坰杂记·天寿山》,点校本,第8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清·于敏中于奉敕撰:《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七,《京畿·昌平州四》引《宙载》,点校本第7册,第219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年)四月,“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事汤序差天文生充阴阳人往各王府择坟地。校尉觉之,序陈阴阳人精地理者少,故自正统以来,间使天文生代往”^①。《大明会典》载钦天监职掌之一云:“凡营造、出师等事,奉旨选择年月日时、方位进呈;若陵寝及各王府安葬选择吉地奏用,其差委官生,各有次第,不许紊乱”^②。

以《葬书》为代表的堪輿理论对于明代帝王陵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葬书》主张:“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这是指墓穴周围的山势而言,具体要求是:“玄武垂头,垂头言自主峰渐渐而下如欲受人之葬也”;“朱雀翔舞,前山耸拔[攀]端特,活动秀丽,朝揖而有情也”;“青龙蜿蜒,左山活跃宽净展掌,而情意婉顺也”;“白虎驯颊,驯善也,如人家蓄犬驯扰而不致有噬主之患也”^③。除山势形局要全以外,还要得水,《葬书》所云:“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明代诸皇陵的选址大多符合上述要求,陵后为玄武山,山体高大;左、右山体略小,分别为青龙山、白虎山;陵园正前方有一孤耸秀丽的小山相对,是为朱雀山,亦称“案山”。皇陵靠近玄武山而建,玄武山前蜿蜒出一小山包,是为玄武垂头处亦即《葬书》之所谓“百尺为形”处,此小山之前即是所卜寿宫之吉穴;穴之左、右须各有小砂山一道,有时亦可权作“青龙”、“白虎”。两砂山之内须有小股水流过,此小水沟既有“得水”和“界水而止”的风水视觉效果,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七,天顺五年四月辛巳,校印本《明实录》第21册,第6739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二三,“钦天监”,影印本,第5册,第2958—2959页。

^③ 晋·郭璞:《葬书》外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8册,第2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又具有将山水排走不使之侵染墓穴的实用功效。

明人论长陵风水云：“皇陵形胜，自其近而观之，前有凤凰山如朱雀，后有黄花镇如玄武，左蟒山即青龙，右虎峪即白虎。且东、西山口两大水汇流于朝宗河，环抱如玉带三十余里，实为天设地造之区。自其远而观之，山虽起自昆仑，然而太行、华岳连亘数千里于西，山海以达医无闾，逶迤千里于东，唯此天寿山本同一脉，奠居至北正中之处。此故第一大形胜，为天下之主也。我列圣遗弓并妥于此，斯不独天限华夷，有自然之屏障，而王气所钟，真永保国祚于亿万年，镇压沙漠于千百世矣。”^①。与之相近的说法还有不少，如沈榜云：“太行自天之西柱奔腾以北，云从星拥，几千万派，而至宛平三岔口析而为二，此堪舆家所谓大聚讲也。一自口东翔，为香山，结局平原，一望数百里，奠我皇都。一自口北走，百折而东，逆势南而，去作皇陵，而浑河玉泉等水纵横其间，为之界分而夹送之，令岳渎诸山川，得拱揖襟带，比之共辰。相传冀州风水极佳，宛平盖独收其胜矣”等^②。长陵以后的昌平诸帝陵以及各地的诸藩王陵并不能都卜选得有如长陵一般完美的佳穴吉壤，但也大都遵循了墓穴周围四神布列的原则，尽量求得形局完美。不仅如此，为不伤及“龙脉”，吉穴周边的山砂皆不可改动，仁宗献陵、光宗庆陵皆因保全龙砂而把祔恩殿和明楼宝城所在区域分为前后不相连属的两个院落。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闰二月癸未，大学士刘一燝奉命覆视庆陵吉地回京上奏称：“新陵营造规制原题比照昭陵，今相度形势，似又宜参酌献陵。盖以龙砂蜿蜒环抱在前，形家以为至尊至贵之砂，不可剥削尺寸，献陵亦以龙砂前遶[绕]，建享殿、

^①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郊坰杂记·天寿山》，点校本，第82—8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四，“古迹”，点校本，第3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袞恩门于龙砂之前,正与此合”^①。明代亲王陵的风水理念大多与皇陵相同,如山东曲阜鲁荒王陵背靠九龙山,东有卧虎山,西有玉皇山,前有白马河为冠带水,再南有朱山为朝案,形局完美^②。又如山东长清德藩诸王陵背靠东西绵延二、三公里的青崖山,南面正对九顶莲花山,东西两侧为凤凰山、滚粟山夹峙,南大沙河自东南而西北从九顶莲花山下流过,7座王墓各倚一支脉而建^③。江西南城益端王陵建于金华山,山南麓有一小丘陵,丘陵南端为一小山包,益端王墓室即建于此小山包之中,在小丘陵及小山包的東西两侧各有一支余脉向南延伸,陵园即建于这个范围之内^④。

第二,《葬书》认为:“葬者,乘生气也”,“生气附形而有,依土而行”,“夫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⑤;因而主张以石山土穴为上吉。至于山葬,虽不无吉者,但却有诸多忌讳。从现存遗址来考察,明代帝王陵墓,特别是皇陵,都非常注重“乘生气”,点穴处尽依《葬书》所云:“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千尺言其远,指一枝山之来势也,百尺言其近,指穴地之成形也。势来形止,是谓全气”。所以诸陵建于山前,以高山为背景而开穴于山坡前的土地中,与唐代主要皇陵选择“孤耸回绝”之山峰开凿玄宫、宋代皇陵皆建于平川而迥然有别。为了使墓主能够依土而“乘生气”,明代皇陵玄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天启元年闰二月癸未,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333页。

②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太祖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③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调查资料。

④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⑤ 晋·郭璞(传):《葬书》内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8册,第12、1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宫虽然以石条砌造,但在玄宫后殿的石棺床正中都要留一个方孔,称为“金井”,井中即是原山黄土。在已发掘的定陵后殿棺床正中即明神宗棺位之下就有一金井,南北长0.4米,东西宽0.2米;定陵左、右配殿棺床正中亦各有金井一方,分别长0.39米,宽0.19米,内为黄土^①。在定陵陵址最终确定时,参与卜选的官员曾就玄宫所在是否为土穴有过争议,太仆寺少卿李植指责大峪山(即今定陵址)选址不当,谓“玄宫后凿石横阔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即棺床)安砌石上”^②,指责卜选此址误用石穴,将使皇帝不能“乘生气”。

明代亲王陵墓中也多有“金井”之制。四川成都蜀悼庄世子石砌须弥座式棺床,中央开一长294厘米、宽30厘米的长方形金井,“木棺正置于金井之上”^③。蜀僖王陵“棺床正中有一长方形金井,井内充填黄土,与床面平齐”^④。湖北江陵辽简王石砌须弥座式棺床,金井长206厘米、宽72厘米、深40厘米,“中间空,内填黄土”^⑤。江西南新建宁献王墓之棺床,以石砌边框,内满填黄土(图4—8)。河南新乡潞简王次妃赵氏石棺床上的金井长40厘米、宽30厘米^⑥。江西南城益定王及王妃合葬墓,王棺底中部有一个圆形腰坑,直径20厘米、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0—2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六,万历十三年闰九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3012页。

③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④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⑤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⑥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第5期。



图4—8 明宁献王陵棺床

深15厘米，“内置铜镜一面”^①，其功用等同于金井。另外，四川成都蜀定王次妃王氏墓^②、蜀昭王陵中棺床上虽无金井，但铺面石板皆镂刻出若干金钱纹，与下面黄土通，可视为金井的一种变体（图4—9）。

第三，《葬书》认为：“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并进一步解释说：“父母骸骨为子孙之本，子孙形体乃父母之枝，一气相荫，由本而达枝也”；“生死殊途，情气相感，自然默与之通。今寻暴骨，以生人刺血滴之而渗人则为亲骨肉，不渗则非气类相感，有如此者，则知枯骨得荫，生人受福，其理显然，不待智者而后知也”^③。明太祖就曾经用滴血法检验过母陈氏遗骨的真伪^④。这种先人所葬与后嗣休戚相关的

^①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1999 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③ 晋·郭璞（传）：《葬书》内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8册，第1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④ 《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乙亥，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820—821页。



图4—9 明蜀定王次妃墓棺床

观念由来已久,唐朝术士严善思曾经说过:“山川精气,上列为星。葬得其所,则神安而后嗣昌;失其宜,则神危而后嗣损”^①。按照这一理论,死者葬得其地,则子孙受福祉,反之则将被祸患。明代有些人对于风水的迷信几达如痴如狂的地步,由于“《葬经》及《阴阳杂撰》以生人之利钝由地理之美恶,若执券探怀,遂使末世滋蔓,虽士大夫间,以此构弃,或地未获,暴露经年”^②;甚至“昧者至争地盗葬,诉讼连年”^③。明朝有些帝王十分注重先人陵墓的选址,认为皇陵卜址得当与否攸关国脉,风水好者则不轻言动迁。明太祖即位后念及父母之墓葬,曾议改葬,因问博士许存仁改葬服制,并付诸制作,而“时有言改葬恐泄山川灵气者,

①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〇四,《方伎·严善思传》,标点本第18册,第5808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②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六,“论堪舆”,点校本,第244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③ 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葬地盘蛇兔”,点校本,第13页,中华书局,1980年。

乃不复改”^①。为了既不“泄元气”，又能让明太祖尽孝心，于是群臣集议：“为今之计，莫若增土如山，栽植成林。如是，则元气厚藏，阴灵亦妥，诚万万世无穷之美矣”^②。明成祖也很迷信以风水宝地葬先人可福泽及于生人之说，明初北平城内有一位“疯秀才”，“秀才不知何许人，太宗在藩邸时，秀寄赤籍中，佯狂奇谲，众因呼之云。然无他异。惟上知其人，数召与语，语多不伦。尝启上：‘某地贵不可言，上宁有可葬者乎？’上怪其不祥，曰：‘无之’。秀才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谁与？’上曰：‘死矣，藁葬于某。’秀请更葬，上从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间，即圣夫人墓，人呼‘奶母墓’是已”^③。明成祖夺得皇位不久即“遣太监郑和祭乳母冯氏”^④，或即依“疯秀才”议而改葬者。明人另有一种传说，谓：“太祖生十王，燕王即第四子也。母元妃所生。少而悍勇，及长有落落大志，好游侠，善骑射。王尝不得于君亲，然不知何以为计。太祖恒欲废弃，赖廷臣力谏得免。洪武中大分封诸王居国，而王实得燕冀也，与母太妃居北平”^⑤。此说若有所据，则成祖改葬之乳母为其生母硕妃之讳言亦未可知。正德时嗣宁王宸濠有异志，乃葬母于先朝所禁之“西山青岚龙口穴”^⑥，也是希望

①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点校本，第9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仁祖皇陵”条引《在田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3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③ 明·祝允明：《野记》卷二，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二，许大龄等点校本，第531—5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癸卯，校印本《明实录》第6册，第262页。

⑤ 明·佚名：《建文皇帝遗迹》，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一九，许大龄等点校本，第3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⑥ 《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五，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校印本《明实录》第37册，第3382页。

以葬地得王气而助成其非分之想。明世宗以兴王世子入继皇统,其父兴献王原葬于湖北安陆(世宗即位后改名承天府,即今湖北钟祥)松林山,他即位后曾为母亲蒋太后在天寿山陵区的大峪山下择定寿穴。蒋太后死后,世宗对于迁父柩北来或祔母棺南下以及父母合葬与否而几番改变主意,于是有人望风希旨,提出种种建议,“方大峪之初兴工也,御史陈让上疏,引舜葬九疑[嶷]二女不从之事,谓宜奉睿宗衣冠与章圣太后合葬大峪山,以章圣衣冠合葬显陵。若必欲迁显陵于大峪山,则承天旧陵为二圣衣冠几杖别藏,以当荆襄旺气”^①。明世宗虽明斥其言荒谬,但最终还是以“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完美”^②为由而不远千里将母亲之棺柩南葬于承天显陵,以当其“旺气”。

大约是有感于明太祖出身寒微而成帝业,明朝人对于皇帝祖陵风水肇基王业之说信之弥笃,传说泗州祖陵所在就是一块宝地,“相传宋季元初民间妄言帝星明于泗州,外郡有覬非分者,自远营葬于山后水外之东北,凡数处,今其冢固累累也,土人谓之‘抢墩’”^③。即以盱眙祖陵而言,这里本是德祖、懿祖、熙祖三代追封帝后的衣冠冢,地脉原非上佳之地,《松窗梦语》说,从泗州城北门“遥望祖陵,隐隐如弹丸之地,四面皆水”^④,从晚明开始就不得不靠筑堤束水以护陵园。但是这里依然被附会成是神仙所择的“上吉之壤”。一些明代中晚期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大峪山用舍”,点校本,第79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明·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章圣南祔”,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第6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③ 明·曹惟诚:《帝乡纪略》卷一,《帝迹志·陵墓》,《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700),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第1册,第7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④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二,“东游记”,点校本,第37页,中华书局,1985年。

的著述中记录有这样一个传说：“泗州有杨家墩，墩有窝。熙祖尝卧其中，有二道士过，指其处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询其故，曰：‘此地气暖，试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叶’。时熙祖在卧，呼熙祖起，曰：‘汝闻吾言乎？’熙祖佯睡，乃以枯枝插之去。熙祖候之十日，果生叶，熙祖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复来，其徒曰：‘叶何不生？’是时熙祖在旁睨之，道士曰：‘必此人拔去矣’。熙祖不能隐，道士谓曰：‘汝有福，死后当葬此，出天子’。熙祖以语仁祖，后果得葬。葬后其土自壅为坟，半岁陈太后孕太祖，时人皆言此墩有天子气”^①。关于这个传说，在蒋德璟《凤泗皇陵论》、查继佐《罪惟录》等明末清初人著述中亦有谈及。《罪惟录》中所记载的道士最后告诉熙祖之语是：“汝他日卜兆此，后福非常。此地也，汝偶闻之，亦天也。惜泄气，长枝率不振耳”^②。所谓“长枝率不振耳”，可能是从仁祖、太祖皆非长支，特别是懿文皇太子早夭、建文帝不克令终等史实附会而来。

太祖父母感时疫贫厄而死，棺槨不具，只是藁葬而已。但凤阳皇陵后来也被神化，其说谓：仁祖帝后死，“太祖与仲兄谋辇葬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纆绝，仲返计，太祖视尸。忽风雷震电，太祖避树下，闻空中神云：‘孰袭取我土？’仿佛有应者，具淳皇帝讳，神曰：‘为若人则已’。已而，暴风扬沙折木，天转晦。比明，往视之，土裂尸已陷人，田伯刘大秀遂归其地而辞其价，即今凤阳陵寝是其地也”^③。这则神话

^① 明·曾惟诚：《帝乡纪略》卷一，《帝迹志·陵墓》引王文禄《龙兴寺记》，《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700），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第1册，第73—7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② 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一六，“陵志总论”，点校本，第80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 明·徐祯卿：《翦胜野闻》，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许大龄等点校本，第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显然与明太祖御制《皇陵碑》所述原委大相径庭。

世宗以外藩入继,亦有得先人坟墓福荫之附会。“承天府献皇陵寝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今俗呼其地为天子冈。夫荆郢自春秋楚庄称霸以来,代有窃据者,然而未尝埋玉。我朝曾封郢王,及府而薨,今则终于献皇而生今上,岂非其数耶?杭南山邵皇亲坟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后山壁有湘公篆《易》家人卦于上,遘劲可观;寺前通衢地名太子湾也。其寺乃五代钱文穆王所建,历世殆五百余年,岂知毁于嘉靖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贞’,五爻聘纳后妃之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冢,又非其数耶”^①。邵皇亲坟即世宗本生祖母邵氏之祖坟,郎瑛的这段记载把风水佐成帝业之说扩大到了外亲坟墓。

万历年间成书的《帝乡纪略》述泗州祖陵形胜云:“山脉迤邐而来,形势尊严,绵亘起伏,所谓势如万马自天而下者。术家但见龙之方隅自亥坐向子午,又似在双沟过峡而已,真禁穴也。旧有台官《形胜赋》乃云龙脉自大梁来,又堪舆家云天下有三大干龙,惟中干最尊,以[次]北干,又次面[南]干,而祖陵则为中干龙,此亦臆说也。盖自开辟以来,鬼神呵护,天地秘藏以待真人,岂术家所能窃窥哉?!”^②崇祯朝礼部右侍郎蒋德璟索性直接向皇帝奏称本朝诸陵占尽中国的“三大干龙”之风水:“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结为凤、泗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诸陵,这三大干本朝独会其全,真是帝王万世灵

^①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七,《事物类·坟陵有数》,标点本,第49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② 明·曾惟诚:《帝乡纪略》卷一,《帝迹志·陵墓》,《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700),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第1册,第6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长之福”^①，这种说法虽可使皇帝龙心大悦，但未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时，祖陵的风水尤受重视，明思宗“以孝陵地脉侵毁，使成国公朱纯臣、礼尚书林欲楫行视山陵”^②。在孝陵下马坊东至今尚有立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五月的《禁约碑》，强调“抔土为重，岂容损伤”^③。

四、礼制因素对陵址选择的影响

礼制因素对于明代帝王陵墓卜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陵区制的限制，具体来说，一方面，在一片兆域之内，风水上佳之地毕竟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先祖诸陵的排列位次也限制了后世皇帝选陵的范围。

明朝诸帝既葬于同一兆域，若干代后自然再难找到无可挑剔的上吉佳穴，长陵居昌平诸陵之首，据风水绝胜之地，其东旁山形不佳，在明朝早中期只建有宣宗之景陵，仁宗、英宗、宪宗依次葬长陵西旁，仁宗、英宗两陵之间还有景帝废陵。到武宗初即位为孝宗卜选陵址时天寿山下已难觅得理想的风水之地，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丁未，礼部左侍郎李傑、钦天监副倪谦同司礼监太监戴义奏报：“于茂陵西施家台得吉地，堪以奉安大行皇帝陵寝。然山陵事重，乞别命官覆视”；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亦上言，请“于廷臣中推取谙晓地理者视前地。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

^① 明·蒋德璟：《查勘皇陵纪》，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〇，“陵园”，点校本，第13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清·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二，“虞渊沉上”，李学颖点校本，第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③ 南京博物院编：《明孝陵》附录二，《禁约碑》，文物出版社，1981年。

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①。他们的建议先后得到礼部部议通过和明武宗的首肯。六月,施家台陵园开工,“戊午,营建大行皇帝陵于天寿山,荐名泰陵”^②。但陵工初兴,“都下盛传其地有水”^③、“金井内水孔如巨杯,水仰歆不止”^④。吏部主事杨子器上书直言其事,请求改卜,竟被投入锦衣卫监狱,后又被司礼监押往陵址与督工太监李兴当面对质,杨被太监们折辱,经太皇太后干预才作罢,而最终泰陵陵址也未作更改。清初谈迁作《国榷》记录此事本末,并评论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谈迁曰:泰陵有水石,其地非吉壤,杨子器早言之,辅臣不加意,遗痛桥山,泽斩子子。噫!德如孝宗,宁无罪地脉哉!”^⑤从诸陵址所在山势来看,献陵在皇山一岭、景帝废陵在皇山二岭、裕陵在石门山、茂陵在宝山,均为天寿山支系,而泰陵所在的施家台笔架山与天寿山已不相联属,中有河流相隔。泰陵以后,长陵西旁亦无合适佳穴,只能在天寿山东西两翼卜穴。从康陵开始,诸陵为迁就山势形局,多已不能取大致朝南之向,武宗康陵朝东偏南、世宗永陵朝正西南、穆宗昭陵朝正东南、神宗定陵朝东偏南、熹宗德陵朝西。

随着帝后妃嫔陵墓的不断增多,天寿山陵域的范围也在逐渐扩

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弘治十八年五月丁未,校印本《明实录》第33册,第27—28页。

② 《明武宗实录》卷二,弘治十八年六月戊午,校印本《明实录》第33册,第51页。

③ 明·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之四,点校本,第35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④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孝宗泰陵”条引《无用闲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5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⑤ 清·谈迁:《国榷》卷四五,弘治十八年十月庚午,张宗祥点校本第3册,第2846页,中华书局,1958年。

大,其地皆征自民间。嘉靖初年,为悼灵皇后营陵,用乡民尹甫元地六顷,“已而,守陵内臣郭鉴又度其十五顷余,将为果园。给事中张润身言:此地为民恒产,且上有坟墓百余所,宜仍还民便。上命给民种住,其陵域占用者,仍于近地如数拨补”^①。即便是向天寿山两翼发展,嘉靖以后陵区兆域中所能选中的佳穴也已经有限,有些候选地在历朝都要拿出来供反复比较选用。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十一月,宪宗之妃、世宗本生祖母寿安皇太后邵氏病故,“文武大臣争言豫[橡]子岭地形高敞,可以卜葬,……卜宅橡子岭便”^②,世宗弃而不用,坚持将邵太后合葬于茂陵。“橡子岭”亦写作“祥子岭”,后来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世宗卜陵、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神宗卜陵时,这里也分别是候选吉地之一。又如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明穆宗死后,大学士张居正和司礼监太监曹宪等人奉命“诣天寿山潭峪岭复营视山陵”^③。为了节省建陵开支,在张居正等人回京后,明神宗“诏建大行皇帝陵寝于大峪山”^④。这大峪山曾经被明世宗称为“峪地空凄”之处,而安葬穆宗所用的,也正是三十多年前即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已经建成的、原为世宗之母章圣太后准备的玄宫。在实地考察这座旧玄宫之后,工部尚书朱衡奏称:“先帝陵寝系肃皇帝为睿祖造建玄宫之地,内紫光焕发,和气郁蒸,门堂干洁,宛若暖室,玄宫安妥,则大襄有期”^⑤,本来的“空凄”之地,至此却用“紫

① 《明世宗实录》卷九九,嘉靖八年三月己酉,校印本《明实录》第40册,第2343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一,嘉靖元年十二月癸未,校印本《明实录》第38册,第606—607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庚申,校印本《明实录》第51册,第12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庚申,校印本《明实录》第51册,第34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三,隆庆六年七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51册,第107页。

光”、“和气”等吉祥词来称颂,颇令人感觉滑稽。至于此次未用的潭峪岭(亦写作“澹峪岭”,又名檀子峪)吉地,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神宗卜陵时再成候选,最后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确定为熹宗的陵地,是年九月庚午,“定先帝山陵于澹峪岭”^①。此吉地一说“即永陵之虎沙也”^②。

在天寿山兆域内佳穴日少的情况下,有些吉地还因位次不宜而不能选用,当时长陵西旁自仁宗献陵以下,依次为景帝废陵址、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自东而西,一字雁翅排开,诸帝辈分越小其陵墓距离长陵越远,皇山一岭、宝山、橡子岭等吉穴介于诸陵之间,用之难免有僭越祖宗之嫌,因此明朝中晚期陵址的选择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世宗元配陈皇后死,“上密谕大学士张孚敬,令致仕官骆用卿择地于十八道岭及橡子岭,两具图说以进”^③。到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三月,明世宗亲到十八道岭和橡子岭两地卜择寿陵,事毕,传谕诸臣曰:“适观吉地,咸可为陵。朕惟祖宗所遗此,本诸天赐,既越列圣之地,恐朕未可当,今日既定,宜无他适”^④,确定十八道岭为寿陵吉穴,岭因改名阳翠岭。

明神宗预建寿藏,自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二月开始,至次

^① 《明□宗□皇帝实录》不分卷,天启七年九月庚午,校印本《明实录》(附录)第88册,第4页。

^②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熹宗德陵”条引《燕都游览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6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按,德陵在永陵东北(左位),似应为龙砂。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五,嘉靖十五年三月己卯,校印本《明实录》第42册,第3924—3925页。

^④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五,嘉靖十五年三月己卯,校印本《明实录》第42册,第3924—3925页。

年九月,先后卜得潭峪岭、祥子岭、皇山一岭、团山、形龙山、大峪山(在昭陵大峪山北,本名小峪山)、宝山、平冈地、石门沟山等若干处吉地,大学士申时行、礼部尚书徐学谟指斥通政参议梁子琦所择之吉地曰:“黄山一岭在献、裕二陵之间,位次非宜”^①。明神宗曾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闰九月亲自相度黄山一岭、宝山、大峪山、东井平冈地等几处预选吉地,他说:“朕遍阅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英宗、宪宗)陵之间,朕不敢僭分,还用大峪”^②。当时大峪山陵工已兴两月,李植等人奏称玄宫穴位发现有石,请求改卜,神宗坚决否定其说:“今外廷诸臣为寿宫事争言风水,夫在德不在险,昔秦皇营骊山,何尝不求选风水!未几见发,选求何益。我祖宗山陵及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安得许多吉壤,朕志定矣”^③。此言貌似不信风水,但囿于陵区制的种种限制之不得已之情已溢于言表,天寿山陵区“安得许多吉壤”倒是一句实在话。后来明光宗卜陵于黄山一岭,超越先辈位次,被认为是缘于事出非常,“庆陵在裕陵西南(引者按,应为东南),俗传为‘景泰洼’是也。先是景泰中建为寿宫,英宗复辟,景皇帝遂葬西山之麓,陵基遂墟。光宗上宾既速,仓卒不能择地,乃用此为陵”^④。清初查继佐评论说:“古盛朝陵所,子孙不必一山,或云天寿钟灵,至光、熹而薄,则何不另求天作?!意者两京高山不少,时岂无视地如廖均卿者哉!嗟地之运,附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〇,万历十一年八月甲戌,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2618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六,万历十三年闰九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3011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六,万历十三年闰九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3012—3013页。

^④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光宗庆陵”条引《芹城小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册,第26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天而行；窝之得气，会有衰时；地之不能不受成于天，固然也”^①。查氏归结为命运使然，事实上，正是陵区制把明朝中晚期皇帝卜陵的可选择范围限制到很小。倒是再稍晚一些的梁份的评论更切合实际，他说：“天寿虽灵域，而王气所钟独长陵耳，次则献、景二陵耳，二十里间，安得有子孙世世帝王之穴乎”^②。据说明思宗即位后，也曾拟在天寿山陵区预卜寿陵，但久不得吉地，不得不考虑另辟新陵区。后来在遵化县凤台山相得吉地，但又卜不得开工的吉时，“崇祯初年，遍求天寿，无吉壤。至十三年（公元1640年），始召刘诚意孔昭及张真人甲协视地，得蓟州凤台山，云地善而难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以后，不及事”。记载此事的查继佐因而对于陵区制颇有微词，他于明亡后慨叹到：“术家云：陵以寿世，无吉壤，地限之矣；无吉日，天又限之。嗟！有莫之为而为者欤！”^③。可以认为，陵区制是制约后世嗣皇、嗣王陵墓选址的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明代帝王陵墓择址主要受到地理因素、政治因素、风水因素、礼制因素等几方面的影响，具体到每一次卜陵活动，影响它的主要因素可能是一种，也可能是兼有几种。一般说来，在明代不同的时期、相对于不同的皇帝，影响陵墓择址的因素会有不同的侧重，

^① 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一六，“陵志总论”，点校本，第804—80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 清·梁份：《帝陵图说》附录，“十三陵记上”，清汪鱼亭传抄本，第85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③ 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一六，“陵志总论”，点校本，第809—8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按，明思宗以刘孔昭、张真人卜陵于凤台山之说似仅见于《罪惟录》，尚少见其他旁证材料。凤台山在河北遵化县西马兰峪，这里后来成为清世祖的孝陵所在，康熙时凤台山改名为昌瑞山，孝陵吉穴向两翼拓展进而发展成为清东陵。

开国的太祖皇帝卜陵首重地理位置和风水因素,靖难即位的成祖皇帝卜陵则兼重政治因素、地理位置和风水因素,仁宗以后诸嗣君系在陵区制限制的前提下在天寿山兆域中依风水术卜陵,景帝别葬于西山则纯系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时候,看似简单的水风问题,实际也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万历朝陵址之争是为最典型之一例。大峪山陵址由礼部尚书徐学谟所力主,大学士申时行赞成之,通政参议梁子琦则极言其地不可用。申、徐为姻亲,而徐学谟又与刚刚被清算的已故大学士张居正私交甚厚,故而梁子琦上章所言于山陵风水之外,更“劾其始结居正、继附时行”^①,再揭党争。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八月,申时行、徐学谟各具疏奏辩称:“子琦所择吉地石门沟山坐南向北,逼窄难用,黄山一岭在献、裕二陵之间,位次非宜,而反不满于形龙、大峪,执拗纷争,何时得决”^②。私下里,徐学谟更是一语破的:“是何过于虑耶!祸咎即至,谁犹视息人间世耶!朝廷家事,有长陵一吉壤足矣,他则何地不可葬耶”^③,明白表示了对于不希望朝廷中再兴争端的企盼。皇帝裁定双方争端,将梁子琦罚俸处分。诏下,当年曾因坚决反对张居正夺情视事而被谪戍的吏科给事中邹元标再度上章弹劾徐学谟,徐不得不致仕求去。因为陵址之争,免了一个礼部尚书;然而事情还没有就此完结,直到建陵开工,另外几位倒张居正的急先锋李植、江东之辈仍以大峪山寿穴有石为言,意在扳倒时任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其疏谓:“地果吉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奏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四三,《邹元标传》,标点本第21册,第6303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〇,万历十一年八月甲戌,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2618页。

③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定陵图说”,清汪鱼亭传抄本,第58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请改图。乃学谟以私意主其议,时行以亲故赞其成。今言凿石以安寿宫者,与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胧易徙,若奕棋然,非大臣谋国之忠也”。疏入,申时行力辩“其借事倾臣明甚”^①,请辞职。明神宗乃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九月传谕内阁:“大峪山吉壤,朕已定期年”^②,并表示自己不迷信风水,建陵于大峪山事,“朕志定矣”^③,李植等被贬斥,一场以陵址之争为导火线、已经揭开序幕的党争终于免于大规模爆发。然而,“李植、江东之以大峪山寿宫事撼时行不胜,贬去,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④,为日后朝臣更大规模的党争和互相倾轧埋下了伏笔。

第三节 明代帝王埋葬制度和随葬品研究

埋葬制度也是古代陵寝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受资料匮乏的限制,历年来关于明代帝王埋葬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其研究难度比明代帝王陵墓制度中其他内容还要大;并且,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接近事实而已。基于上述原因,本节仅就装殓和随葬品两个方面中若干可以对比讨论、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六,《李植传》,标点本第20册,第6144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五,万历十三年九月甲午,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3007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六,万历十三年闰九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3013页。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标点本第19册,第5748页。

一、明代帝王的葬式和装殓

在《明实录》、《大明会典》等明代官方文献中,对于历朝帝后的丧葬之礼多有详尽的记述,对于各地亲王、郡王及王妃人等的丧葬之礼也有相应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大都偏重于丧服等制、祭葬礼仪等方面,基本找不到有关装殓制度的文字。下面仅就相关信息保存比较好的若干考古发掘资料,研究明代帝王的葬式、殓服和棺槨制度。

1. 葬式

明神宗定陵是惟一经过考古发掘的明代皇陵,并且该陵玄宫未经盗扰或其他破坏,所葬一帝二后骨架完整,葬式现象基本保留了当初的原貌。

明神宗骨架头西脚东仰卧,“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伸直,两脚向外撇开”^①。

孝端皇后“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直伸,被身体半压,下肢交叠,左肢在上,右肢在下”^②。

孝靖皇后骨架头西脚东,“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于头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下肢曲”^③,左腿叠压右腿。

神宗帝后葬式各不相同,皇帝仰卧微侧、两位皇后均右侧卧,姿势如睡眠状,似比较随意。定陵玄宫坐西朝东,三位墓主均为头西脚东,头向与墓向相反。三人合葬位次:皇帝居中;元配孝端皇后在北,居皇帝左位;嗣皇帝本生母孝靖皇后在南,居皇帝右位。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在已经清理发掘的明代亲王陵中,玄宫部分未经破坏的有鲁荒王陵、楚昭王陵、宁献王陵、梁庄王陵、益端王陵、益庄王陵、益宣王陵等,但葬式现象并不都能保存完好。

鲁荒王陵玄宫曾经积水,内棺已自外棺中脱出,被水浮至玄宫后室西南角,“骨架仰身直肢”^①,但原葬时头向不明。

楚昭王陵玄宫内亦曾经积水,所幸棺槨并未发生位移,“墓主位于棺床东侧,骨架已朽。仰身直肢,头朝北”^②。楚昭王墓为单人葬,玄宫坐北朝南而略偏西,墓主头向与墓向相反。

宁献王陵玄宫坐西朝东,墓主头向未见说明。单人葬,“尸体腐而未溃,手足伸直,仰身而卧。口内含一小金钱”;“右手扶一手杖”^③。口含金钱,是古人装殓时的“饭含”之礼,据班固解释:“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贝也”^④。宁献王尸体保留了清晰的“饭含”现象,虽未尽合古礼,但可以证明明代宗室中仍相沿此俗。

梁庄王陵玄宫曾经积水,人骨架及棺槨全部腐朽,位置凌乱。玄宫坐北朝南,发掘《简报》对墓主头向未作说明。墓室内为二人合葬,正中石砌棺床应为梁庄王,其西侧砖砌棺床应为梁庄王妃魏氏^⑤。

益端王陵玄宫合葬益端王及王妃彭氏,王棺居左,王妃棺居右,

①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③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④ 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十,“崩薨”,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元刊本,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俱为直肢仰身葬,头向均与墓门方向相反”^①。

益庄王陵玄宫合葬益庄王及王元妃王氏、继妃万氏,“俱为直肢仰身葬,以万氏的骸骨保存较好,头向均与墓向相反”^②。三人合葬的位次,据发掘《简报》介绍,棺床前分别放置圹志三副,“中为益庄王朱厚焯之志,右为王妃王氏、左为继妃万氏之志”,由此可推知是以益庄王居中,元妃王氏居于王左,继妃万氏居于王右。

益宣王陵为青砖砌成的一圹三椁室,“中室为益宣王朱翊钊,左室为元妃李氏英姑,右室为继妃孙氏”^③。此墓向南略偏西,益宣王尸体完好,但墓主头向未见说明,通读全文判断,应该是头北脚南。

益定王陵与益宣王陵结构相同,曾遭到局部破坏,但一圹三椁室的结构仍保存完好,“中棺死者为益定王朱由木,左棺为元妃黄氏,右棺为次妃王氏”^④。墓向南略偏西,墓主头向未见说明,结合圹志位次等相关资料判断,也应该是头北脚南。

已发掘明代郡王墓中尸骨大多保存不好,葬式不明。其中陕西长安秦府兴平安僖王墓保留一些有价值的迹象,该墓玄宫大致坐北朝南,墓主“部分下肢骨发现在棺床的南段,未遭严重的扰乱。头骨是发现在棺床北的墙壁下,而死者头上的部分饰物也散落在棺床北部”^⑤,由

①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棨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②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江西省博物馆内部刊印,1977年。

③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④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⑤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四府井村明安僖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此可以大体确认此墓墓主之葬为头北脚南,即头向与墓门方向相反。兰州上西园肃藩某郡王墓室坐南朝北,墓主头向未见说明,但从清理《简报》所附墓室平面图来看,棺头一侧显然是朝向后壁,即与墓门方向相反。据介绍,此墓“东为男棺,西为女棺”^①,从墓主位置来说,是女居于男之左位。此墓男女棺位次与其他墓有所不同,并且在女棺的下面还留有一块长 2.55 米、宽 1.55 米的地面没有铺砖,内填细沙,亦即女棺坐于沙池上,清理《简报》推测细沙“可能是做渗水用的”,个中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明代帝王之葬式是以仰身直肢为主,也有些略为随意。墓主的头向均与墓向相反,即取面朝墓门之向。夫妻二人合葬者,以墓主本身定向,基本都是男左女右,惟兰州上西园肃府某王墓例外;夫妻三人合葬者,以墓主本身定向,男居中,次左位,再次右位。墓室中这种尊卑位次与明代宗庙、奉先殿、陵园享殿中神主的排序方式是一致的。

2. 殓服

(1) 帝后

明制:皇帝冠服有衮冕服、通天冠服、皮弁服、常服、燕弁服、武弁服等若干种,分别用于不同场合。其中衮冕服等级最高,皮弁服次之,常服最常用。

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二月,翰林学士陶安等奏请仿古礼制天子五冕,以备祭祀。明太祖认为:“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②,由此奠定了明朝帝王

^①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 年第 3 期。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三〇,洪武元年二月戊辰,校印本《明实录》第 1 册,第 532—533 页。

礼服制度的基本规章。衮冕服用于天地、宗庙祭祀以及正旦、冬至、万寿节等重大朝会和册封典礼。当年十一月,初定衮冕之制:冕版长二尺四寸,宽一尺二寸,冠玄表朱里,前后各垂十二旒,每旒串五彩玉珠十二颗,冕板前弧圆后方。红丝组为纓,黹纁充耳,玉簪穿导。衮服之制,分上衣下裳,衣玄色,裳纁(黄红)色,取象天地,饰十二章纹,画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于衣,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于裳。素纱中单;红罗蔽膝,绣龙、火、山三章。革带佩玉,长三尺三寸。大带素表朱里,大纓六彩,用黄白赤玄缥绿六色。小纓三,色同大纓,间施三玉环,朱袜赤舄。玉圭,长一尺二寸^①。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改衮服为玄衣黄裳,并改画为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于衣^②。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对冕冠制度做了更定:冕冠以皂纱为之,上覆纁板,桐木质,罩之以绮,玄表朱里,前圆后方,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用周尺)。纁板前后各十有二旒,每旒各五彩纁十有二就,贯五彩玉珠十二颗,赤白青黄黑相次,以玉衡维冠,玉簪贯纽,纽与冠武并系纓处皆饰金,纁之左右垂黹纁充耳(用黄玉),系以玄统,承以白玉填珠纁。衮服之制改为:玄衣饰八章,日、月、龙三章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纁裳饰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裳裙式,前三幅,后四幅,前后不相联,共腰,有襞积。蔽膝纁色,织藻、粉米、黼、黻四章。赤色袜舄。通身饰玉珩、瑀、琚、璜、冲牙等。手搢玉圭,长一尺二寸,尖头方尾,上刻四山以象四镇,用黄绮束圭下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678—679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标点本第6册,第1615页。

部装于饰金龙之韬囊中^①。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改定:冕冠圆匡罩以乌纱,垂旒改为七彩玉珠十二枚,青纁充耳缀玉珠两枚。依古礼改袞服为玄衣黄裳,各饰六章纹样。衣织章纹,裳前后两片相连如帷,绣章纹。蔽膝由黄罗制成,上绣一龙,下绣三山,系于革带。革带前饰玉,后无玉而以佩绶系而掩之。朱袜赤舄,黄绦边玄纓结^②。

袞冕服虽然至尊无尚,但泥古的冕冠和上衣下裳之制穿戴不便,华而不实,因此除祭祀天地等极个别场合之外,皇帝一般并不穿用。定陵随葬品中有皇帝冕冠和袞服实物,其中裳、蔽膝、中单、大带、绶、套手玉圭套等大体与嘉靖改制以后的袞服制度相同,但并未用做皇帝的殓装。

常服:常服是皇帝正规的便装,用于一般场合及燕见大臣。

洪武初年定皇帝常服巾袍之制:“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玉、琥珀、透犀”^③。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增定皇帝常服之制,冠罩以乌纱,折角向上;“袍黄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一;带用玉,靴以皮为之”^④。明朝皇帝常服之冠名“翼善冠”,是唐宋幞头的变体。幞头原是一种头巾,也叫“折上巾”,北朝时为军旅冠服,唐宋时已成帝王常服冠,以漆沙制作、桐木为架。明代帝王翼善冠即参照唐宋之制为之,所不同的是折角在后而向上。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〇,《礼部十八·冠服一》,影印本第2册,第1018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〇,《礼部十八·冠服一》,影印本第2册,第1018—1019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679页。

④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〇,《礼部十八·冠服一》,影印本第2册,第1026页。

关于皇帝的殓装,明代史无明文。英宗遗诏中讲到:“敛时须沐浴洁净,棺内装用袍服系腰缘环。皇后同东宫自选带皮鞋者易以缘鞋,衣服不须多,纵多亦无用”^①;是要求以常服入殓。定陵玄宫中明神宗尸骸身着黄缎短内衣,因腐朽严重,已不辨形式;外著刺绣衮服,腰系玉带,头戴乌纱翼善冠。下身穿黄素绫裤,足穿红素缎高统单靴,底、面质料相同,裤脚装于靴统内^②。从这套殓服来看,翼善冠无疑属于常服,袍服亦属常服之制,但上下三团龙刺绣又不完全同于《大明会典》中所记永乐所定皇帝常服之制。

关于定陵中两位皇后的殓服,据《定陵》介绍,孝端皇后尸骸头戴黑纱尖棕帽,帽上插金簪、钗。头发用带扎后盘于顶部稍后,横插金簪。上身穿绣龙方补黄绸夹衣,内着本色云纹绸夹衣。下身穿绣龙长裙,内穿黄缠枝莲花缎夹裤。裤脚筒装在袜里,袜筒用带绑住。鞋面、鞋底均为黄缎制成,底不加缝纳^③。

孝靖皇后尸骸头戴黑纱尖棕帽,帽上插金簪、钗。帽后侧有丝网,网有珠串。黑发理顺后盘绕一周,余发掩于髻下,髻上又插金玉簪钗。上身穿黄缎短衣三层,腰束红织锦缎裙,其上又覆绸缎裙各一件。下身穿折枝花卉缎夹裤,黄素缎袜,袜筒很高,装住裤脚,用带绑住。鞋面、鞋底均为红缎制成,底不加缝纳^④。

明制,后妃冠服分为礼服和常服两类。其中礼服用于受册封、谒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三六一,天顺八年正月己巳,校印本《明实录》第21册,第7172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4—2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宗庙、朝会、助祭等，常服用于一般场合穿戴。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一月，定皇后礼服之制：冠，圆框架，敷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小花枝各十二树，两博鬓，十二钗。服为袼衣，深青色绘翟纹，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黼纹饰领，朱色罗缘边。蔽膝、大带等同衣色，青色袜舄，饰金彩^①。又定皇妃礼服之制：九翟四凤冠，饰大小花钗各九枝，两博鬓，九钗。礼服为青色绣翟衣，青纱中单，黼领，青袜舄，佩绶^②。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重定凤冠規制，仍为九龙四凤，龙以翠制，凤以金制。凤冠顶部正中之龙口衔一颗大珍珠，上有翠盖，下垂珠结。其余八龙，各口衔珠滴，饰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各十二枝。三博鬓，饰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钗花、翠钗花各十二枝。托里为金口圈。另配一条皂罗额子，描画金龙，饰珍珠二十一颗。更定皇后礼服为翟衣，其制，衣深青色，织翟纹十二等，间以小轮花，领口、袖端、缘边及开裾处皆为红色，织金云龙纹。玉色纱中单，领、袖、缘边等处为红色，织黼纹十三个。蔽膝同衣色，织翟纹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个。另配大带、革带、绶等。饰玉有珩、瑀、琚、璜、冲牙。青袜舄，描画金云龙，舄头饰珠五颗。手搢玉圭，圭长七寸，尖上方下，饰谷纹，配金龙纹套^③。同时更定皇妃礼服之制：冠为九翟冠，以皂鞞制成，附翠博山，饰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珠翟四，皆口衔珠滴，另有翠牡丹花、翠云等装饰。鞠衣青色，胸背饰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682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687页。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〇，《礼部十八·冠服一》，影印本第2册，第1032—1033页。

鸾凤,袄裙绿缘边,青色袜舄,饰金彩,舄头加珠三颗^①。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一月定皇后燕居之服制:冠为双凤翊龙冠,首饰、钏镯以金、玉、珠宝、翡翠为之。服为诸色团衫,饰金绣龙凤纹,带饰以金玉^②。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更定皇后常服之制:冠饰龙凤珠翠,红衣红裙,霞帔,红褙子。冠制如特髻,上加龙凤饰,衣饰织金龙凤纹,加绣饰^③。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增补旧制,皇后常服冠用皂毳,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翠凤二,口衔珠滴,前后饰牡丹花两朵,每花八蕊,翠叶三十六片,珠翠穰花鬓二支,珠翠云二十一朵,翠口圈一副。另有装饰珍珠金宝钿花九枝,金凤两条,凤口衔珠结。三博鬓,饰以鸾凤。金宝钿二十四个,边垂珠滴。配金簪两根,珊瑚凤冠嘴一副。常服为大衫霞帔,衫黄色,霞帔深青色,织金云霞龙纹,或绣或铺翠圈金,饰珠玉坠子。深青色褙子,金绣团龙纹。红色鞠衣,黄色缘襖袄子,红色缘襖裙,皆织金云龙纹。玉带,绶,饰佩玉,青袜舄^④。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一月定皇妃燕居服制:鸾凤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翠。服为除黄以外诸色团衫,饰金绣鸾凤,带饰以金玉^⑤。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定:冠服同前制,带饰以金、玉、犀;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〇,《礼部十八·冠服一》,影印本第2册,第1036—1037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682页。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标点本第6册,第1622—1623页。

^④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〇,《礼部十八·冠服一》,影印本第2册,第1035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687页。

又定：山松特髻，假髻钿花或花钗凤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裙，褙子，织金绣凤纹；永乐时更定妃常服之制，服制多同皇后，但纹样只用云霞凤纹，不得用云龙纹^①。

对比上述记载可知，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殓服应该属于常服，而不是礼服。其中孝靖皇后服用黄色但无龙纹，等级略低于孝端皇后，当与其以皇贵妃身份殓斂有关。定陵玄宫中出土了不少皇后衣冠，也多属于常服；所出凤冠也与“九龙四凤”之制有所差别，其中孝端皇后两顶，分别为九龙九凤和六龙三凤；孝靖皇后两顶，分别为三龙二凤和十二龙九凤。它们的装饰和工艺大体相同，即以竹丝编胎，外髹漆，下口部镶金圈，龙为金质，凤为翠制，凤背以孔雀羽毛贴饰，满布珍珠，龙凤口衔珠宝。在珠花中心、博鬓等处还饰有大量红、蓝等各色宝石。

(2) 亲王及王妃

明制：亲王助祭、谒庙、朝贺、受册封、纳妃服衮冕；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服皮弁；燕居有常服，嘉靖时又增保和冠服。亲王妃冠服分为礼服、常服两种，其制略同皇妃。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一月，定亲王冠服之制：冕冠九旒，每旒玉珠九颗，用金簪。玉圭九寸二分五厘。冕服九章，青衣五章，画龙、山、华虫、火、宗彝；纁裳四章，绣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黼纹饰领。蔽膝纁色，织火、山二章；其余带、绶等与皇帝冕服之制略同^②。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改定青衣纁裳章纹具用织。永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标点本第6册，第1624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686页。

乐三年(公元1405年)更定:亲王冕冠为玄表朱里,缜板前弧圆后方,九旒贯五采玉珠九颗,以赤、白、青、黄、黑相次,用玉衡金簪。衮服九章,玄衣织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纁裳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但共腰,织藻、粉米、黼、黻四章。纁色蔽膝亦织藻、粉米、黼、黻四章。另配中单及各式玉佩,余与皇帝冕服略同。玉圭九寸二分五厘,下有锦韬囊^①。

亲王常服,洪武时定以乌纱折上巾为冠。永乐三年(1405年),定亲王常服与皇太子同,冠为乌纱折上巾,即“翼善冠”。服为赤色袍,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团,带饰玉^②。

从装殓现象保存比较好的几座王陵来看,大多数明代亲王、王妃和帝后一样,也是身着常服下葬。如鲁荒王“身着龙袍,系玉带,戴圆顶小帽;发髻完好,贯金簪;两腋下各有一小金粒”^③。益宣王“尸体完好,身着龙袍,腰系玉带,项挂念珠,足穿黄锦高筒靴”;二妃皆身着袍服,系玉带^④。宁献王殓服比较特殊,他发插金簪,头戴漆制道冠,腰系玉带,胸部还有两顶道冠,“身穿金线云纹道袍”^⑤。朱权晚年崇信道教,或许因此而身着道士衣冠入敛。

以礼服入殓,目前仅知有亲王夫人一例,即宁靖王夫人吴氏。据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〇,《礼部十八·冠服一》,影印本第2册,第1042页;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标点本第6册,第1627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〇,《礼部十八·冠服一》,影印本第2册,第1043页。

^③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④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⑤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末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吴氏墓发掘《简报》介绍,“墓主头戴凤冠”,“身穿5套共12件衣物”^①。在两套裙、袄、裤的外面,墓主的外三层殓服依次为:妆金团凤纹鞠衣一件、花卉云凤纹裙一件;织金云凤纹冠服一件、披戴霞帔一件,胸口置谷纹玉圭一件;最外为素缎大衫一件,大衫背后两侧各挂一组玉佩。戴金耳坠,口内下颌含金、银珠各一枚。左手戴镶宝石金戒指3枚,右手戴镶宝石金戒指2枚。比照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所定郡王妃礼服用七翟冠,霞帔以深青为质、金绣云霞翟纹,“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具同亲王妃,第绣云霞翟纹,不用盘凤纹”等制度^②,吴氏殓装等级有所超逾,其制逼拟亲王妃。按明朝制度,亲王夫人为媵妾之属,地位卑下。吴氏服用级别较高的原因,从残破墓志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一是因为宁靖王“甚贤之”、由皇帝诰封夫人,再是因为她曾生育宁靖王庶四子,即建安简定王朱覲鍊。

亲王及王妃的衮冕服、礼服虽一般不作殓装,但和定陵一样,大多也随葬于陵墓中。鲁荒王墓中出土了保存较为完好的九旒冕、皮弁冠和翼善冠,与洪武之制吻合;益宣王棺内头部亦随葬有九旒冕;在益藩罗川瑞懿王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清单中开列有“旒冠一顶、皮弁冠一顶、金簪二根、翼善冠一顶……冕服一袋”^③。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亲王、郡王一般是以常服为殓服,以衮冕服等礼服殉葬;但在鲁荒王、益宣王墓中只有冕,而均未见有衮服,或是朽坏,或是所出土者相

^①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六〇,《礼部十八·冠服一》,影印本第2册,第1050—1051页;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标点本第6册,第1629—1630页。

^③ 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

对于文献记载的制度有所变异^①。

据《大明会典》记载：明代官员大殓时，有“实生时所落发、齿及所剪爪于棺角”的礼俗^②。皇室成员是否有此礼仪，史传无载，这方面的实际例证也不多见。在定陵明神宗棺内有三个棉纸本，分别放在墓主头部和左右两侧，其间夹存小辮头发和剪下的指甲，推测是皇帝生前所遗^③。宁靖王夫人吴氏棺中，在墓主头左侧有一个褐色丝袋，“内装 11 颗墓主生前脱落的牙齿”^④。从《大明会典》等记载来看，明代民间有保留落发、落齿及剪下指甲的习俗，宫中可能也沿袭此俗，但却不一定都随葬入棺。思宗初即位，令熹宗乳母客氏出居私邸，“客氏五更衰服赴（熹宗）梓宫前，出一小函，用黄龙袱包裹，皆熹庙胎发、痘痂及累年剃发、落齿、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⑤。由这条记载可见，熹宗的落发等并没有封入棺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

① 明定陵中曾出土过两件缂丝十二章纹十二团龙纹服，其墨书绢标签自题名曰“袞服”。其制为袍形，黄色，盘领大袖，右衽，地纹织卍字、寿字、蝙蝠和如意云纹，饰十二团龙和十二章。十二团龙均为侧面行龙，左右肩下各一团，前后片上中下竖排各三团，左右两侧边各两团。十二章纹的排列是左肩日，右肩月，背部为星辰、山，两袖饰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别列于前后片三团龙的两侧，两两对称。这种自名为“袞服”的十二章服，与《大明会典》等文献记载的上衣下裳之制的袞服明显有别，不见于文献记载，应该是介于袞服与常服之间的一种变通之制，而不是正规的袞冕之服，推测亲王之“袞服”之制可能也有类似的变通。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九，《礼部·丧礼四》，影印本第 3 册，第 1538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 233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④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 年第 8 期。

⑤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客氏出宫”，魏得良等点校本，第 79 页，中华书局，1984 年。

这类东西必须随葬,客氏也万不敢擅自将其焚化。

3. 棺椁制度

棺椁制度是中国上古时期墓葬等级的最主要标识物,《荀子》说周代“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①。《庄子》则谓:“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②。《礼记》说:“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柩棺一,梓棺二”^③。在商周木椁墓中,椁的功用实际上相当于后代的墓室,“椁之为言廓,所以开廓辟土,无令迫棺也”^④。从东汉开始,砖石结构的墓室逐渐大行于世,上古椁制遂不复存在。后世之所谓之“椁”,核以周礼,仍然应该是棺,亦即古之重棺,也就是《礼记》“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槨四寸”中的“大棺”^⑤。至于“棺”,则略当于上古的“槨”,《礼记·檀弓上》:“君即位而为槨,岁壹漆之”。注曰:“槨谓柩棺亲尸者。槨,坚著之言也”^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以上古制度为标准,除益府、荆府等几位亲王、郡王用砖砌椁室内葬一棺外,明代其他诸帝王陵皆无椁制。

① 《荀子》卷十三,《礼论》,影印浙江书局光绪刊《二十二子》本,第3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 《庄子》卷十,《天下》,影印浙江书局光绪刊《二十二子》本,第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 《礼记·檀弓上第三》,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八,第1293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④ 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十,“崩薨”,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元刊本,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⑤ 《礼记·丧大记第二十二》,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四十五,第1583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⑥ 《礼记·檀弓上第三》,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八,第1292页,中华书局,1980年。

明代帝王之葬有重棺和单棺两种形式,其中重棺在相关发掘报告或简报中一般写作“一棺一槨”。

(1) 重棺

明神宗帝后皆用重棺^①。明神宗内棺楠木质,为整板榫卯插合,复以铁钉钉住。内外髹朱漆,无纹饰。重棺松木质,为多块板拼接,榫卯插合,复以铁钉钉住。内外施朱漆,无纹饰,板面粗糙,似未经加工而直接上漆,漆面亦薄而无光泽。重棺内侧原有织锦为衬里。

孝端皇后内棺楠木质,内外朱漆无纹饰,棺盖为两板拼接而成,余同神宗棺制。孝靖皇后内棺松木质,内外朱漆无纹饰。二后重棺之制同神宗,惟内棺、重棺尺寸皆略小。

帝后棺盖上原有织锦铭旌,神宗铭旌锦已腐朽,仅见残迹金书“大行皇帝梓宫”字样。铭旌两端原有木雕龙牌,已落于棺两端。铭旌上有铁制扁平葫芦,葫芦上有九曲须,须上又有一小葫芦,下部有弯曲铁插。孝端皇后铭旌残存金书“□(大)行皇后王氏梓□(宫)”,上亦有铁制扁平葫芦^②。

据历年发掘报告或简报介绍,明代亲王使用重棺的有鲁荒王、蜀悼庄世子、蜀僖王、楚昭王、蜀昭王及王妃、梁庄王及王妃、辽简王等。鲁荒王,内外棺皆“系楠木作成”^③;蜀悼庄世子,内棺楠木制成,髹朱漆,重棺亦髹朱漆^④;蜀僖王,棺“楠木朱漆”^⑤;楚昭王,“棺槨漆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2—2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2—2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④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⑤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质,已朽”^①;蜀昭王及王妃,“棺床之上,各置一具长方形木椁套棺”^②;梁庄王及王妃,“漆木棺椁、门屏、箱盒等也都或垮或朽”^③。辽简王的棺制比较有特色,其内棺以整板制成,档板与墙板子母口套接,盖、底板与四周墙板用铁钉拴接,并用糯米浆灌缝。重棺盖板为整木,墙板由三块板拼接,无底板,“内棺直接置于棺床上”^④,内外棺的材质未见介绍。辽简王的重棺实际相当于一个木质棺罩,从现存实物观察,其外棺亦髹朱漆(图4—10)。

亲王使用单棺的有宁献王、益端王及王妃、益庄王及王妃、益宣王及王妃、益定王及王妃等。宁献王,棺一具,“已腐朽溃裂,仅可看出两头用大红朱漆,颜色鲜艳。棺盖、底和两侧的末端刻有折曲,即俗称荷叶头的图案”^⑤;益端王及王妃,并列“两具红漆棺木”^⑥;益庄王及王妃、继妃,“三具棺柩均腐朽”,在墓的前室中还曾发现有改殓易棺所遗的碎棺木屑漆片盛于陶瓮中^⑦;益宣王及王妃、继妃,“三副棺均为大红髹漆棺,楠木质,榫合,保存完好,棺之周围与椁墙空隙处用石灰填塞”^⑧;益定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② 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④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⑤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⑥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⑦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焜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⑧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王及王妃、继妃，“棺木为柏木质，髹朱红漆”^①。

明代单葬之亲王妃棺槨大多保存不好，仅知荆端王次妃为一棺^②。地位次于妃的宁靖王夫人亦为单棺，“楠木棺系用整木加工而成，棺内外壁先贴上棉纱布，再髹红漆。棺两侧各有一对铁质铺首衔环。棺盖与棺以榫卯相套，并用4个木钉将其钉牢。棺外墓室内浇满松香”^③。

兰州上西园肃藩某郡王墓墓主夫妇具用单棺，两棺皆髹朱漆，“两侧绘二龙戏珠花



图4—10 明辽简王外棺及棺床

纹，龙身施金，棺前后两端亦绘赤金盘龙宝珠”^④。其余已发掘清理的明代郡王墓棺槨大多被盗毁，其制不详。

明代亲王、郡王棺上铭旌大都保存不好，仅存少量遗迹。楚昭王棺床东侧下有掉落的铭旌头一件，作成覆置荷叶状，木质，涂绿色，叶

①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② 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③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④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脉黄色^①。宁献王墓中亦出土铭旌头一件^②。益端王棺盖上写有“大明益端王”五个白字^③；益宣王及王妃、继妃，三副棺“棺盖上书写正楷金字，由于石灰浆沾蚀，已模糊不清”^④；这些字迹是否为铭旌遗存已不可知。此外，在鲁荒王和宁献王墓中都还出土有葬仪用“窆”6件，上缘三尖状，下有柄，绘云纹、斧纹和黻纹^⑤。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明代帝后、亲王按礼制应用重棺，嘉靖以前亲王陵墓惟宁献王例外。益藩诸王皆为单棺，其时代亦皆在嘉靖纪元以后，由于缺乏其他王府的对比材料，无法判定是否有制度上的变化。棺用榫合，间有再用铁木钉加固者；封棺多用铁钉或木钉加于棺盖。无论内棺、重棺皆髹朱漆；朱漆棺加金彩，目前所知实例不多。除兰州上西园肃府某王墓外，2004年在陕西西安南郊发现的明代秦藩家族墓葬，墓主为秦康王曾孙朱秉橘等，其棺亦髹朱漆描金彩，其中M26之棺绘舞龙、莲花，M24之棺绘花卉、飞凤，前档板上还绘有端坐于莲花上的佛祖和执旌侍立童子^⑥，彩绘保留之好为历年来明代帝王陵墓考古发掘所罕见。明代帝王棺的材质，内棺一般都是楠木，卒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的宁靖王夫人吴氏亦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②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③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④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钅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⑤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⑥ 肖建一等：《西安发现明代秦王家族墓葬》，《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22日第1版。

用楠木棺。至于鲁荒王内外棺皆用楠木、益定王棺用松木,可能分别与不同时期、不同王府的财力有关。而孝靖皇后内棺用松木,应该是因为她受明神宗虐待,被有意压低殓葬等级。另从北京西郊明熹宗三妃合葬墓、明神宗七嫔合葬墓来看^①,明末妃嫔亦用重棺,但其材质未见说明。

关于明代帝后、亲王、郡王等人内棺、重棺的尺寸,以及它们之间有无明显的等级差异,因缺乏时代相同或相近、并且可资对比的准确数据,又无文献记载可资佐证,故此处暂付阙如。

二、明代帝王随葬品研究

随葬品的分析研究,特别是随葬品种类、器物组合的分析研究,主要依赖于发掘时保存完整的墓葬,定陵是唯一一座经过科学发掘的明代皇帝陵,并且发掘前保存完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资料;然而由于明亡以后历年的盗扰和其他人为、自然因素的破坏,明代亲王陵墓的保存情况却甚差,发掘时保存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墓葬寥寥无几,有价值的研究信息因而相对有限。

定陵中埋葬帝后三人,出土各类随葬品总数为 2648 件(套)^②,其中有衣冠及匹料 644 件(匹)、佩饰 67 件、首饰 248 件、梳妆用具 23 件、金器 289 件、银器 271 件、铜器 65 件(内 60 件为明器)、锡明器 370 件、瓷器 16 件、琉璃釉陶器 15 件、玉器 51 件、漆器 84 件、木俑 305 件、武器仪仗 77 件、溢册 7 份(木 4,锡 3)、溢宝 4 方、墓志 1 方,

^①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均载《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2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五章“出土器物”,第 43—235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另有木质明器家具若干,已朽坏。

亲王陵墓中的随葬品一般比定陵少(梁庄王陵号称出土器物5100余件,但组佩类均未经复原,在整理过程中数字已渐趋真实),现将发掘时尚保存完好的鲁荒王陵^①、楚昭王陵^②、梁庄王陵^③、宁献王陵^④、益端王陵^⑤、益庄王陵^⑥、益宣王陵^⑦出土器物归纳为一个简表,以利于进一步分析。

表4—1 明代亲王陵墓随葬品统计表

内容 墓主	卒年	埋葬人数	冠带佩饰	玉器	金器	银器	陶器	瓷器	铜器	铁器	漆木器	册宝志	铅锡器	俑	总数
鲁荒王	洪武二年	1	31	1	2	3		6			11	宝1		木 432	
楚昭王	永乐二年	1	7					2	64	129	6	各件 1	明器 72		318

①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④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⑤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檣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⑥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⑦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内容 墓主	卒年	埋葬人数	冠带佩饰	玉器	金器	银器	陶器	瓷器	铜器	铁器	漆木器	册宝志	铅锡器	俑	总数
梁庄王	正统六年	2	340余	3200余	120余	360余		8	100余			册志 12	明器 50余		5100余
宁献王	正统十三年	1	5		14	1		6	明器 22	16		志 1	明器 43	木俑已腐	
益端王	嘉靖十八年	2	70	22	2				1			册志 12		彩绘陶 110	
益庄王	嘉靖三十五年	3	150	116	2	16	26	18	3	4		志 3	明器 39	彩绘陶 204	656
益宣王	万历十一年	3	94	7	3	8		2	4		2	志 3			460

关于这个表,需要做几点说明:

第一,各藩王陵墓发掘《简报》或《报告》对于出土器物的统计方式不一致,特别是关于簪、钗、带、圭一类,有些放入衣冠类,有些则分别入金、玉类,本表则均入衣冠佩饰类,其中玉带片如出土于墓主腰部并且在20片以内,仅计为1件;而金耳勺、银筷等则分别与容器一起列入金器、银器类。

第二,因为整理工作尚未完成等原因,有些发掘《简报》并没有提供全部的出土器物信息,如梁庄王陵中出土的漆木器和铁器尚未统计公布,本表数据全部以各墓《简报》已经公布者为准。

第三,个别品类特殊的随葬品未入表,如鲁荒王陵中出了文玩35件、书画11种,这类东西不见于其他墓,故未列入表中。

从上述八座陵墓所揭示的资料可以看出,明代帝王的随葬品种类十分丰富,其中有冠服、佩饰,还有各类生活日用品,甚至像耳勺、牙签、手杖这些细微物件也都应有尽有,益宣王陵三棺中还各出土有折扇;鲁荒王

陵中更有文玩和宋元书画；可以说，王陵随葬品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还多有铅锡铜木等不同质地的明器，特别是各类俑。

就出土器物的质量和数量而言，不仅皇帝、亲王之间有明显等差，各藩王之间也有所不同，楚昭王似过于俭约，而年代比较接近的宁献王、梁庄王二墓更是对比悬殊；益府四代三亲王前后相差60余年，随葬器物也不尽相同，益端王陵出土物明显逊色。

涉及到明代帝王随葬品统计分析，还有一份重要资料不容忽视。1964年3月，在江西南城发掘了一座益藩某郡王墓，墓中出土有保存完好的随葬品清单一份，纸质、墨书，长68厘米、宽27厘米。其上文字为：“正」典服所今将成造敛衣数目开具于后」旒冠一顶 皮弁冠一顶 金簪二根」翼善冠一顶 金冠一顶 天青绉丝寿巾一顶 香枕一个」红六云绉丝鸡鸣枕一个 红六云绉丝引带一个」大红五彩织金绉丝四团龙圆领一件 冕服一袋」绿六云改机袖衬摆一件 素玉带一条 玉佩一件」大红六云织金绉丝过肩一件 白云布道袍一件」蓝丝袖长棉袄一件 蓝斗袖长夹袄一件」白六云绉丝过河中一件 白西洋布衫一件」白西洋布单中衣一件 蓝六云绉丝棉中衣一件」白湖袖夹中衣一件 白洋布单裙一条」蓝六云绉丝棉夹裙两条 西洋布暑袜一双」白湖袖肩褥一个 脚褥三个 五彩锦棉被二床 棉褥一床」蓝六云绉丝棉褥一床」青绉丝寿靴一双」白梭布大夹衾一件 小夹衾一件」木梳一付 寿簟一床 金扇一把 宝钱七文」宝钞七 手巾 脚巾 大明皇历」冥途路引一张」万历二十一年六月 日」”^①。

^① 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从该墓旁3米处出土益府罗川瑞麟王副官夫人张氏圹志，结合《明史·诸王世表五》中的有关记载，推断此墓墓主应该是益宣王第九子罗川瑞麟王朱常潸。但随葬品清单上的“万历二十一年六月”与《明史》中万历“二十九年薨”之记载不符。墓主身份暂且存疑。

这件清单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文件,它提供了明代郡王随葬品的详尽资料。

以上述1座帝陵、7座亲王陵的实际出土资料和1份郡王墓随葬品清单为基准,再结合其他被盗亲、郡王墓中出土残留随葬品的情况来分析,大体上可以看出有一个明初随葬品数量少、价值低,从正统开始有所增加,到嘉靖前后最多也最好,万历末年衰退的发展变化轨迹。在所有墓葬中,凡有后妃合葬者,衣冠和金玉类佩饰也比较多,这应该是一个通例。

明代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种类虽然很多,有些陵墓中出土物的数量也比较可观,但无论哪一类器物都看不出明确的组合关系,除反映身份等级的衣冠服饰和明器仪仗外,其他随葬品的选择有一定的随机性。这一特点和汉代以来的情况近似,而与上古的贵族墓葬有较大的区别。

基于上述情况,本节只研究几种和丧葬礼仪有关的器类。

1. 明器

明器在《明实录》、《大明会典》等文献中也被写作“冥器”,是专门制作、仅用于为死者殉葬的器物。明器与一般的生活用器不同,基本都没有实用价值,制作粗率,仅具其形而已。孔子对明器的特性有比较准确的阐释:“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筭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簠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①。“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②。所以《盐铁论》说“古

^① 《礼记·檀弓上第三》,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八,第1289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② 《礼记·檀弓下第四》,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九,第1303页,中华书局,1980年。

者明器有形无实,示民不用也”^①。也就是说,明器不是实用器;同时,明器也不同于祭器,因为祭器是实用器。《礼记》中的一段对话,把它们区分得很清楚:“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②。历代明器的种类很多,有人俑、兽俑、镇墓俑,也有日常衣冠、餐饮器、炊器、兵器、工具,还有家具、车船、房舍楼台亭阁等模型,明器的体量一般都比所模拟的真物要小得多。

明代帝王陵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兼有“人器”和“鬼器”,但从它们各自所占的比重来看,显然是以实用器为主。并且在随葬品的陈设、安放次序上,二者也对比悬殊。尽管如此,明代还是沿用了随葬明器这一古礼,并且载在皇帝葬礼中。如《大明会典》记载明成祖葬礼:“奉迁梓宫入皇堂安奉讫,内侍捧谥册、宝置于前,陈列冥器等毕,行赠礼”^③;又如明世宗葬礼:“奉迁梓宫进皇堂安奉讫,内侍官捧谥册、宝置于前,陈列冥器等毕,仍于献殿上设灵座,以候奉安神主,遂行赠礼”^④。帝后之“冥器行移工部及内府司设监等衙门成造”^⑤。外藩亲王、郡王,在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以前“每有丧礼,所用谥宝册、

^① 汉·桓宽:《盐铁论》卷七,“散不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 《礼记·檀弓上第三》,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八,第1290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六,《礼部五十四·丧礼一》,影印本第3册,第1499页。

^④ 《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丁未,校印本《明实录》第49册,第135页。

^⑤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六,《礼部五十四·丧礼一》,影印本第3册,第1489页。

铭旌、明器俱下工部委所司制造”；是年六月礼部奏请“凡其明器宜令工部具例品式，下所在有司就彼制造给用”^①，以节省道路供亿之费、减少对民间的烦扰。此后，各藩明器皆由所在省之布政司、都指挥司等衙门安排成造。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定：“郡王、将军、中尉，郡县主君，坟价一概免给”，但郡王及郡王妃、郡主之“合用冥器、丧仪等项，行该省照依递减事例，给银自造”^②。

从定陵和各地藩王陵墓中出土的实物来分析，明代帝王所用明器的质地一般都是锡、铜、陶、木，器型主要可以分为器用模型和俑两大类。

（1）器用模型

器用模型类明器的范围非常广，有日用器皿、家具，还有房屋等建筑模型。

定陵玄宫中出土铜明器60件、锡明器370件，其中铜明器共21种，每件器物上贴有墨书名称标签，计有：水罐二、水桶三、水勺三、水盆二、唾盂二、唾壶二、盘六、勺三、漏勺三、笊篱三、箸三双、香盒二、香炉二、香靠三、香匙三、烛台六、油灯三、剪刀二、火炉三、交椅二、脚踏二，它们制作工艺粗糙，均为素面鎏金，但金层甚薄，器型也比较小，如交椅的通高只有15.5厘米^③。锡明器型共有35类，每件器物上也都贴有墨书名称标签，计有酒注、爵、瓶、壶、酒缸、酒瓮、罐、盂、水桶、水盆、茶盅、碗、汤鼓、盘、碟、盏、托子、香盒、粉子、鉴妆、印池、

^① 《明宪宗实录》卷六八，成化五年六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23册，第1351—1352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二十三·王府坟墓》，影印本第5册，第2732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175—178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宝匣、香炉、烛台、灯台、宝顶、宝盖、红节葫芦形宝珠、海棠花、荷叶、莲蓬、慈菇叶、菖兰叶、交椅等，每种器物中又有不同的小类，如瓶中包含有花瓶、看瓶、柱瓶、酒瓶、梁水瓶、凉浆瓶、汁瓶、茶瓶、杏叶茶瓶、油瓶、水瓶、香匙箸瓶等十二种。这批锡器的制作更加粗糙，“所有器物的器盖均与器身焊接在一起。一些器物的附件如耳、把、提梁、盖纽以及酒缸、酒瓮上的酒勺等则用锡片剪成象征性的部件，不加任何修饰，焊接上去，使器物仅具其形而已”^①。从定陵中出土的这400余件铜、锡明器来看，完全符合“不成用”、“有形无实”等特征，是典型的“送死之器”，以铜鎏金象拟金器，而以锡象拟银器。

在定陵玄宫后殿的北壁下还发现有很多小型木质明器，但均已残朽。从朽痕观察，计有小方凳二个、长凳一个、长条桌一个、屏风一面、脸盆架一个、长方形托盘一个，器表均涂红色。另在后殿东北角下还有长81厘米、宽53厘米的长方形木盘六个，内亦装家具模型，除一件小木桌外，其余均已朽不辨型^②。北壁下还有一组木质小明器，“像是房屋院落，因腐朽严重，难辨形体”^③。在帝后三具外棺的盖板上，也都有木制小型仪仗明器，均已腐朽^④。

除日常器用模型外，在器用模型类明器中有一些应该是皇帝卤簿的象征物。《大明会典》中载有公、侯、伯、都督等人的明器仪仗细目，但却没有关于皇帝、亲王等人这方面的规定。查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丧仪中有“冥器行移工部及内府司设监等衙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178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19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4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成造,照依生存所用卤簿器物名件”一条^①,可知皇帝明器卤簿仪仗应当是完全照依生时所用制造。

明朝皇帝卤簿由车辂、旗帜、盖、幢、幡、伞、扇、刀、枪、乐器、仪象、仗马及诸执事等组成。吴元年(公元1367年)岁末,中书左相国李善长率礼官奏上天子登极仪仗:午门外东西排列甲士,奉天门外东西陈设旗仗。所设为龙旗十二面,分左右排列,用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后,俱用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列左右。排设各种旗帜六十四面,即门旗、日旗、月旗,青龙、白虎、风、云、雷、雨、江、河、淮、济旗,天马、天禄、白泽、朱雀、玄武等旗,木、火、土、金、水五星旗,五岳旗,熊旗,鸾旗及二十八宿旗,各六行;每旗配甲士五人,一人执旗,四人执弓弩。在奉天门外设五辂:玉辂居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并排陈列。丹墀左右布列黄麾仗、黄盖、华盖、曲盖、紫方伞、红方伞、雉扇、朱团扇、羽葆幢、豹尾、龙头竿、信幡、传教幡、告止幡,绛引幡、戟斨、戈斨、仪鍠斨等,各三行。丹陛左右设幢节、响节、金节、烛笼、青龙白虎幢、班剑、吾仗、立瓜、卧瓜、仪刀、鐙仗、戟、骨朵、朱雀玄武幢等,各三行。殿门左右设圆盖一、金交椅、金脚椅、水盆、水罐、团黄扇、红扇,皆由校尉擎执^②。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月命礼官定元旦朝贺仪卫:列甲士于午门外之东西,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列左右,列旗仗于奉天门外之东西;设五辂于奉天门外,玉辂居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奉天门内文楼、武楼以南设仪仗马各三,殿前丹墀下设各种麾、伞、盖、扇、幢、斨等,设幢节、响节、金节、烛笼、青龙白虎幢、班剑、吾仗、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六,《礼部五十四·丧礼一》,影印本第3册,第1489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上,吴元年十二月辛酉,校印本《明实录》第1册,第435—436页。

立瓜、卧瓜、仪刀、鐙杖、戟、骨朵、朱雀玄武幢等；奉天殿门左设：圆盖一，金脚踏一，金水盆一，团黄扇三，红扇三；右设：圆盖一，金交椅一，金水罐一，团黄扇三，红扇三。皆由校尉擎执。殿上左右内使监陈设：左，拂尘二，金唾壶一，金香合一；右，拂尘二，金唾盂一，金香炉一。皆由内使擎执。同时定皇后卤簿之制，丹墀仪仗用五十八人：班剑、金吾杖、立瓜、卧瓜、仪刀、鐙杖、骨朵、斧各四，响节十二，锦花盖二，金交椅、金脚踏、金水盆、金水罐各一，方扇八。宫中常用仪卫二十人：内使八人，色绣幡、金斧、金骨朵各二，金交椅、金脚踏各一；宫女十二人，金水盆、金水罐、金香炉、金香合、金唾壶、金唾盂各一，拂尘二，方扇四^①。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新造卤簿仪仗，有具服幄殿一座，金交椅、金脚踏、金盆、金罐、金马杌、鞍笼、金香炉、金香合、金唾盂、金唾壶各一，御杖二，摆锡明甲一百副，盔一百，弓一百，箭三千，刀一百^②。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定天子车辂制度，为玉辂一、大辂一，九龙车一，步辇一，后罢九龙车。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重定车制，天子备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步辇、大凉步辇、板轿各一乘，具服、幄殿各一具。辂、辇之上俱设亭，内有红髹漆桌、椅。皇后车制有辂、安车，皇妃之车曰凤轿。自皇后以下皆有行障二、坐障一^③。

定陵出土的鍍金铜水罐、水盆、唾盂、唾壶、香盒、香炉、交椅、脚踏，锡罐、水盆、香盒、印池、宝匣、香炉、交椅等明器，都应该是属于帝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五，洪武元年十月丁酉，校印本《明实录》第1册，第640—649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四，《仪卫志》，标点本第6册，第1592页。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五，《舆服志一》，标点本第6册，第1606—1608页。

后卤簿的象征物。在帝后三具外棺的上面还有插着仪仗的仪仗架多个,全为朱漆木质明器,均已腐朽倒塌。从形状看,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上插仪仗十至二十件,仪仗有矛、戟、钺、立瓜、卧瓜、剑、朝天镫等。在孝端皇后棺北侧的宝床上还有木质车、轿明器各一件^①,这些也都是帝后卤簿的象征物。

在历年发掘的明代亲王墓葬中也有不少铜、锡、铁或陶质的明器,就其器型而论,和定陵一样,既有生活器皿、家具模型,也有仪仗用器。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定亲王仪仗之制:宫门外设方色旗二,青色白泽旗二,执旗人穿戎服,服色随旗色。殿下设绛引幡、戟擎、戈擎、仪镗擎各二,由校尉擎执。殿前设班剑、吾杖、立瓜、卧瓜、仪刀、镫杖、骨朵、斧各二,响节八,由校尉擎执。殿门设交椅、脚踏、水罐、水盆各一,团扇四,盖二,由校尉擎执。殿上设拂尘二,香炉、香合、唾壶、唾盂各一。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诏令:亲王仪仗内交椅、盆、罐用银者,俱改为金。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又增设红油绢销金雨伞一,红纱灯笼、红油纸灯笼各四,鱿灯二,大小铜角四^②。亲王乘象辂,王妃所乘车则有凤轿、小轿,亦有行障、坐障等^③。

鲁荒王陵玄宫前殿排列380个木雕彩绘人俑和24件马俑、2件车的模型,其中“有戴盔佩甲执戟的武士;有捧剑,执戟、矛、金瓜、钺斧、朝天镫、响节、伞、扇、灯笼,捧笏,肩杖的仪仗队;有吹笛、箫、笙,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4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四,《仪卫志》,标点本第6册,第1593—1594页。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五,《舆服志一》,标点本第6册,第1610—1611页。

佩长鼓,持鼓槌,击拍板的乐队;有拱手而立的文职官吏和身材魁梧的侍卫”^①;还有一组牵马扛凳俑。在仪仗中有散乱的木交椅、脚踏、盾牌、弓箭、铁盔、甲片、带鞘铁佩刀、木鼓、铜锣等。这些显然是一组比较完整的亲王卤簿。在此墓玄宫的后殿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模型类明器,有木质的床、箱、桌、凳、衣架、盆架、巾架、盆、桶、盘、碗、坛等;有竹制的箱、篋、筐等;铜盆、暖锅、锡质酒器皆腐。

楚昭王陵的东、西、北三面壁龕中的随葬品全部为明器,其中东、西龕中主要是已朽的木质箱、匣等,仅剩金属附件;另有铜炉、铁炉等。北龕内放置铜、铁、锡明器,其中铜器有炭炉、熨斗、香炉、双耳瓶、烛台等,锡器有执壶、瓶、匕箸瓶、罐、坛、爵、杯、匜、盘、碟、温锅、盏托、匕、箸、勺、鼎、香炉、圆盒、烛台、灯台等,多为素面,个别的有花纹、有的器表涂饰金粉^②。

梁庄王陵中出土了铅锡明器 50 余件(套),可辨的器型有壶、瓶、匕箸瓶、鼎、炉、杯、盒、盘、碟、灯台、烛台等,大多在玄宫后室,也有些是出自于前室^③。

宁献王陵中出土铜明器 22 件,形体甚小,外观有如玩具,器表多鎏金,有马蹬、盘、剪刀、锣、斗形器等;出土锡明器 43 件,高度和直径多在 5 厘米以内,最大不超过 10 厘米,外表均鎏金,器型有鼎、壶、带托茶杯、高足杯、爵、碗、盘、筷子、勺、茶杯、瓶、盆、烛台、灯台等^④。

益庄王陵中出土有 20 件陶明器,有香几、桌、轿、椅、床、宝座、脸

①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 年第 5 期。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2 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5 期。

④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 年第 4 期。

盆架、脚盆、箱、灯等。在后室东壁龕内有铜钱数串、瓷坛三个；西壁龕内有锡明器一套，共 10 种 39 件，多已朽坏^①。

除了这些保存完整的王墓，明器在其他王陵中也多有发现。湖北荆州辽简王陵出土有铜提梁炉和锡钵、瓶、盘、罐、壶、鼎等明器^②。蜀悼庄世子墓后殿左室中出土有陶椅、陶屏、陶案、陶暖砚，右室中出土有陶凳、陶案、陶盆等明器模型；中殿左耳室中有陶仓一件，右耳室中有陶库一件，陶库的两边有 20 余件绿釉或黄褐釉的陶瓶、罐、注子、唾壶、灯盏、盘、匜、碗、碟、高足杯等；在中殿的左右两厢，还出土有陶象辂各一件^③。蜀僖王墓中有陶床、箱、桌、凳、仓、笔、笔架以及象辂、轿等明器，计 30 余件，陶胎表面涂朱；还有黄或绿色釉陶碗、罐、灯、盒、瓶、桶、盆、灶等^④。蜀昭王陵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釉陶明器碎片，经拼对复原，可见有房屋、箱笼桌案、罐等^⑤。蜀定王次妃王氏墓中出土有彩绘陶桌、椅、床、轿等^⑥。江西南城益定王陵一圹三穴，位于左位的元妃黄氏墓中出土锡明器 10 余件，可辨识器型有高足杯、碗、盅等^⑦。湖北江陵辽废王曹妃墓南、北两壁龕内各有

①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 年。

②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第 8 期。

③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 年第 5 期。

④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 年第 4 期。

⑤ 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 年第 5 期；调查资料。

⑥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1999 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⑦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2 期。

陶房 1 件^①。

从明神宗定陵和各地藩王陵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来分析,随葬实用器与明器的大致分工情况是:冠服佩饰一般都为实际穿戴之物,个别见有纸质明器;日用器皿(包括容器和用具)中有一大部分是实用器,其质地有玉、金、银、铜、漆等,也有一些是明器;卤簿仪仗和车轿基本上都是明器;除盛放陪葬品的箱笼外,其余家具、房屋等也几乎全为明器。

(2) 俑

俑和器用明器的基本性质一样,都是专门用于随葬的器具,也有人认为俑就是明器之一种。其实在上古人看来,俑和明器还是不能完全等同的,《礼记》所谓“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②。俑是人或动物殉葬的代替物,一般都做成人或动物的形象。一般认为,最早的俑是用茅草扎束而略具人形,谓之“刍灵”。从历代出土物来看,俑在春秋战国以后始多见,秦汉至隋唐极为盛行,质地以陶、木最为多见,此外还有石俑、金属俑和瓷俑等。俑的形式有文官俑、武将俑、仪仗俑、侍俑、伎乐俑、马或骆驼等兽俑、镇墓俑等很多种类。北宋以后,纸明器日益流行,墓中出土的俑已比前代少见,所见多是一些与风水法术有关的厌胜物,如“墓龙”、“蒿里老公”、“伏听”、“仰观”、“仪鱼”等。元明以后,俑在一般人的墓葬中已经不多见,但在明代帝王陵墓中仍有比较普遍的发现。其种类以人物仪仗俑、侍俑居多;动物俑很少,而且基本都是马俑,与车配套;未见镇墓兽和厌胜用的墓仪俑。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王妃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

^② 《礼记·檀弓下第四》,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九,第1303页,中华书局,1980年。

北京定陵随葬了大量的木俑,在玄宫后殿总共 29 只随葬品箱中就有 7 只用于盛放人俑,分别是棺床北端 2 箱、棺床南端 2 箱、南部东壁下 3 箱。这 7 箱木质人俑绝大部分已经朽败不堪,有些仅可略辨形体。只有位于棺床北端的 X26 中保存较好,“内置俑约在千件以上,比较完整的只有二百四十八件”^①。这些人俑的做法是将小圆木劈作两半,再圆雕而成。俑呈扁平体、直立状,大小不等,一般身长在 18.5—29 厘米之间。头戴冠,分为黑色平巾、高冠、圆帽等几种;身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袍为红色或黑色,也有少量未施色彩。拱手,多数两手插于袖中,也有的穿短衣,足穿皂靴。面部敷粉,墨绘眉目,唇涂朱。从衣冠服饰来分析,定陵这批俑的身份主要是宫内的太监和皂隶。另有 3 件俑头戴黑色红顶圆帽,身着红色圆领对襟长袍,长髯垂于胸前,双手执笏,所对应的身份应该比较高。除人俑外,在孝端皇后棺东端的棺床下以及玄宫后殿南部东壁下的第 21 箱内还发现有马俑 57 件。定陵俑的保存状况很差,以每箱千件保守计算,则保存较好的大约只能占到全部的约三十分之一左右,所以其全部内涵很难明晰。明神宗死后不久的一份题本说:“祖宗朝设旗尉以供法驾,盖十万人,渐减至今,止存一万”^②,如果严格按生时仪制作明器,则定陵中的随葬俑总数至少应该在一万件左右,在已经朽坏的人俑中应该有数量较多的仪仗俑。北京西郊神宗七嫔合葬墓中出土木俑百余件,“以前室仪仗附近最多,由他们的装束上看,有文臣、武将、宦官、皂隶、平民等类别”^③,定陵随葬俑的身份应该与之相似。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 213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② 《明光宗实录》卷四,泰昌元年八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 65 册,第 122 页。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2 期。

俑在明代亲王墓中出土比较普遍,因藩属不同,质料也有所不同。

鲁荒王陵中出土木雕彩绘人俑 406 个,其中有 2 个头戴盔身佩甲、手执金瓜的人俑放置在玄宫第一道门的前两侧,应该是“镇墓将军”一类;在玄宫前殿共有 380 个仪仗俑和 2 件车、24 个马俑,组成一组比较完整的亲王卤簿;另有 24 个头戴无脚(翅)幞头、身着长袍拱手而立的内侍俑,放置于后殿^①。

蜀悼庄世子墓中出土有 500 余件釉陶俑,种类有人俑、马俑,还有象辂。人俑陶胎,施琉璃釉,最大的一件武士俑高达 84 厘米,一般武士俑高 51 厘米,其他乐俑、侍俑、仪仗俑高 31—32 厘米。陶马一般高 24 厘米、长 30 厘米,下附底盘,马身施黑釉或褐釉,也有不施釉者(引者按,疑为釉层剥落)。象辂在中庭的左右厢各有一件,高 70 厘米、长 78 厘米、宽 34 厘米,陶质,无釉,涂深褐色漆,辂之头尾饰以金色龙头、龙尾,辂亭之前左右三面装格扇,开门,内置座椅和脚踏。这些俑,“除少数被移动破坏外,绝大部分俑的位置均未移动,保存完整”^②,是一批研究明代亲王仪仗内容、排列方式以及随葬俑制度的珍贵资料。

据原发掘《报告》介绍,蜀悼庄世子墓中俑的排列次序为:

大门内前庭(前殿前)左右两厢中,各置 2 个武士俑和 3 匹陶马(右厢缺一马)。武士俑头戴兜鍪,系项巾,身披铠甲,铠甲及披膊皆为黄褐色,腿裙下露出草绿色战袍,足穿黑靴。带弓箭,执矛。

正庭(前殿)的左右两厢各有三排仪仗俑,左厢 61 件、右厢 71 件。其中第一排为牵马俑;第二排俑分别击锣鼓、捧画角和手执各种仪仗;第三排俑分别执刀盾、弓箭;这部分仪仗俑全部头戴六瓣小帽。

①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 年第 5 期。

②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 年第 5 期。

正庭的正殿(中殿门)门前列两行武士俑,每行5个(其中有一行缺1件)。

中庭(中殿)左右两厢排列以象辂为中心的仪仗俑,左厢157件、右厢154件。象辂前有六匹马和九个牵马俑,牵马俑头戴六瓣小帽。象辂两边各置三排俑,第一排除牵马俑外,皆手执乐器,有笛、鼓、箫、笙、琴、瑟、拍板等。这批乐俑头戴黑色金鹅帽,额前束黄褐色绦带,结垂于脑后;身穿盘领窄袖黄褐色长衫,腰系绦带。第二、三排为仪仗俑,分别执戈斨、戟斨、仪镗斨、仪刀、班剑、立瓜、卧瓜、骨朵、金钺、金铎、稍等仪仗。这批仪仗俑头戴黑色无梁冠,身穿黑色或草绿色的盘领窄袖长衫,腰系带。长衫前襟折三叠系于腰带内,以便行走。

中庭正殿(中殿门)后,有4个俑抬着一架大鼓,1俑击鼓。这几件俑的装束与乐俑相同。

在后殿前的台阶上,有4个拱手侍立的俑。后殿中室的左、右、后壁,面向棺床排列叉手或拱手的侍立俑48个。侍立俑头戴黑色乌纱帽或裹方披巾,身穿盘领窄袖长衫,腰系带。

另外,在中庭(中殿)中的圜殿附近,还发现有头部残缺的文官俑,身穿褐色右衽宽袖长袍,项挂牙牌,腰系革带,系玉佩,穿云头履,叉手侍立。这几件俑的原位置不详。

蜀僖王陵中出土陶明器约500件,其中陶人俑425件,另有马俑、象辂等。人俑为模制,陶胎,施琉璃釉,种类有将军俑、文官俑、仪仗俑、侍俑等,高度自19.6厘米至22.6厘米不等^①,排列方式与悼庄世子墓俑的排列方式大体相似,俑的形象更为生动(图4—11)。

将军俑6件,头戴盔,身着绿色窄袖长袍,肩系披肩,腰束革带并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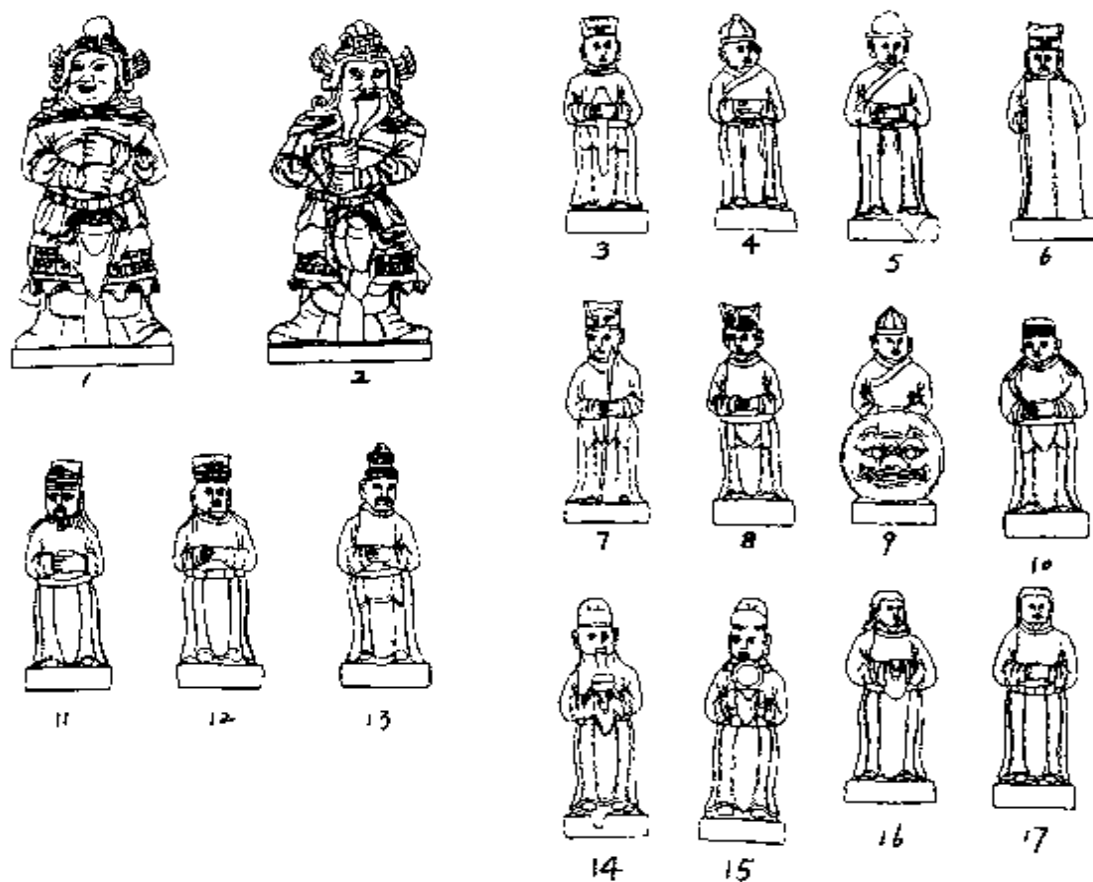


图4—11 明蜀僖王陵出土陶俑(引自《文物》2002年第4期)

1-2. 将军俑 3-10. 仪仗俑 11-13. 文官俑 14-15. 侍俑
16-17. 女侍俑 1-2. 1/10 3-17. 约1/6

扎缠腰,袍下露出甲衣,足穿长靴。手握板斧或方天画戟。

仪仗俑 407 件, A 型: 头戴瓜皮小帽, 身穿右衽交领窄袖长袍, 腰系带, 足穿靴; 有的腰挎刀、手执盾, 有的拱手执矛。 B 型: 头戴黑色高冠, 身穿圆领或交领窄袖长袍, 袍有黄、绿、黑色, 腰系带, 足穿靴; 手执盾、矛或刀, 也有的拱手站立。 C 型: 头戴圆顶笠帽, 腰束带, 足穿靴; 一种身穿姜黄色右衽交领窄袖长袍, 拱手执矛; 另一种身穿姜黄色圆领窄袖长袍, 拱手而立。 D 型: 头戴平巾幘, 脑后有飘带, 身穿

圆领窄袖长袍,衣色有绿、黄和绛青色等,腰系带,足穿靴,拱手站立。E型:头戴黑色平顶冠,身着黄色圆领窄袖长衫,前襟折于腰带内,足穿靴,拱手站立。F型:头戴黑色矮檐帽,腰后有飘带,身穿绿色圆领窄袖长衣,束带,着靴,拱手站立。

文官俑 8 件,A型:头戴黑色高冠,上饰一朵两叶花,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足穿靴,拱手站立,有的有须,有的无须。B型:束发,头戴莲花状束发冠,身穿绿色或银白色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蓄短须,拱手站立。C型:头戴幞头,帽后有短筒状插翅管,身穿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足穿靴,拱手而立,有的留长须。

侍俑 14 件,A型:头戴幞头,帽后有短筒状插翅管,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足穿靴,双手搭红巾捧物,站立;一种留长须,袍黄色,手捧圆盒;另一种黑幞头、黑袍,手捧花瓣形镜。B型:均为女性,头梳螺髻,身穿黄色或绿色圆领窄袖长袍,有的腰束革带、着靴,有的无带、尖足;多数双手搭巾,捧物站立。C型:均为女性,头梳中分短发辫,身穿绿色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足穿靴,有的拱手站立,有的捧巾站立。

陶马俑 38 件,长 17 厘米、高 18 厘米,陶胎,釉色有黄、白、绿、黑之分。多数马带马鞍、脚蹬,为仪仗马;少数马无鞍,马背上驮包袱、布匹、箱子等,为载重马。

蜀昭王陵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釉陶俑碎片,经拼对复原,可见有仪仗俑、乐俑、侍俑、太监俑、宫女俑以及马俑、轿和轿夫等^①。

益端王陵棺床前排列 6 行陶俑,共 110 件。俑为灰色陶胎,肩部以下模制成型,再刻划出衣纹束带,头部多为手制,与身体粘合。经窑烧成后再加彩绘,脸部涂白粉,绘出须眉眼,口唇涂朱,衣服多为红

^① 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 年第 5 期;调查资料。

色,但出土时彩色大多已经剥落。俑的高度自 20 厘米至 25.2 厘米不等^①。内有骑马乐俑 10 件,头戴尖顶圆帽,穿长衣,束带,着靴,手作各种姿势,手中器物已朽没。仪仗俑 27 件,身穿长袍,腰束带,头上分别戴无梁黑冠、五梁冠、风帽、老人巾,手皆作执物状,手中器物已朽没不存。官吏俑 14 件,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束带,胸前背后绘有凤、虎等图案,袖手拱于胸前。男女乐队俑 30 件,其中女俑 12 件,头梳云髻,身穿短衣,下着长裙,手中乐器多腐蚀,仅能辨认出琵琶、三弦、洞箫、拍板、小鼓数种;男乐俑 18 件,其中 6 件鼓手,头戴红色尖顶圆帽,身穿长衫,束带;12 件头戴平顶帽,帽前簪花一朵,身穿长袍,腰束带,手执琵琶、三弦、洞箫、拍板等乐器。轿夫俑 16 件,头戴风帽,身穿长衣,腰束带,八人合抬一木质轿(已腐),另八人一手扶杠、另一手扶带。侍俑 13 件,男俑 7 件,2 件头戴乌纱帽,身穿长袍,束带,手捧水罐,5 件头戴尖顶圆帽,长衣,束带,手中物已失;女俑 6 件,头梳云髻,长衣,束带,双手拱于胸前,手中物件已失。

益庄王陵中出土陶俑 204 件,其中 41 件出现在墓室门外墙顶上,其余全在二门后亦即玄宫主室前端的两角。陶俑的大小和制作风格不一致,应该是益庄王和两位王妃下葬时分别制造的,而且由于二次改葬而扰乱了次序,“出土时混乱地堆在一起,毫无规律可寻”^②。从俑的性别、服制、造型等方面,发掘者把它们分为 10 大类、19 组。计有大型骑马乐俑一组 13 件、小型骑马乐俑一组 21 件、步行乐俑一组 24 件、仪仗俑一组 11 件、轿夫俑三组 28 件、男管弦乐俑二组 25 件、女管弦乐俑二组 22 件、官吏俑四组 32 件、女侍俑三组 18

^①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棨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 年第 3 期。

^②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 年。

件,职务不明女俑一组 10 件。

除了这些成组出土、并且保存情况也比较好的以外,还有一些王陵中也出土过比较有特色的俑。湖北荆州辽简王陵中出土残木雕车、马各 1 件,木雕人俑 80 余件。人俑大多已经残腐,较为完整的 6 件原有彩绘也已全部脱落。它们身高不足 20 厘米,立于木座之上,头戴高冠或圆帽,身穿圆领或右袷窄袖长袍,拱手或插手于胸前^①。江西新建宁献王陵玄宫发掘时,在中室地面上发现有小木俑残迹,均已朽烂如泥,不知数目。木俑残迹旁有铁匕首、小马镫、小铁环和小宫灯等,原应为木俑手中所执^②。宁夏同心庆康王陵中残存有文官形象木俑 1 件^③。山西榆次晋裕王陵玄宫中室甬道的两侧发现男像小泥人头 6 个^④,也应该是俑的残体。另外,在该陵玄宫门前填土向上 1 米处还发现有绿琉璃釉陶公鸡一只,上骑一束发人。因未见实物或照片,仅从描述语言中推断,它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葬仪意义的俑,如“观风鸟”一类;也可能是玄宫封门墙檐上脊兽中的“行什”。

卒于弘治十一年(公元 1498 年)的秦简王朱诚泳之墓于 1989 年 11 月被盗,出土了 300 余件陶俑,人俑高 23—24.5 厘米不等,陶马高 20 厘米。人俑座下有标识文字 70 余种,其中有“清道旗”、“金鼓旗”、“戟”、“笛”等,应该是指俑所执物而言。因身份不同,它们的服饰也各异^⑤。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第 8 期。

②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 年第 4 期。

③ 许成等:《同心县任庄村明代王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 年》,第 176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④ 郭勇等:《明晋裕王墓的清理工作》,《文物考古资料》1956 年第 6 期。

⑤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第 110 页,《明秦简王墓》,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 年。这批俑现陈列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明代亲王妃墓和郡王墓中也有葬俑的实例。四川成都蜀定王次妃王氏墓中出土有模制釉陶俑约 300 件,分为武士俑、骑马俑、乐俑和侍俑几类,还有彩绘陶轿等^①。山西太原晋藩广昌悼平王墓中出土木俑 15 件,俑身施彩绘,有的还手执仪仗,分布于墓后室的南北两侧(此墓玄宫门朝西)^②。陕西长安秦藩兴平安僖王墓中出土木俑 40 件,其中 35 个在前室,5 个分别在后室的三个壁龛内和棺床前,有女乐俑、侍俑、骑马俑等几类^③。这三座墓都曾经被盗,所出釉陶俑或木俑均系盗扰后的孑遗。

值得注意的是,楚昭王陵随葬品以明器为主,但却没有发现俑;梁庄王、益宣王这两座保存完整的王陵中也未见有俑随葬,在益宣王陵中甚至就没有发现明器。如果能排除这三座王陵发掘《简报》遗漏介绍的可能,那么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可以有两种推测:其一是随葬的俑为木、纸等易朽坏质地,出土时已看不出痕迹,如明神宗定陵中的绝大部分木俑已经朽烂如泥,辽简王、宁献王墓中也都有类似情况;再如甘肃兰州肃藩某王墓的壁龛中亦有朽木器痕迹,是俑还是其他明器模型已经无法辨认^④。第二种推测是,这几座王陵中根本就没有用俑类随葬,俑或其他明器皆为纸质,在墓主下葬时焚化于墓所。纸明器中最常见的纸钱,在唐代已经很多见,“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币,今纸钱则皆烧之,所以示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1999 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② 戴尊德:《山西太原七府坟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

③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四府井明安僖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 年第 5 期。

④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 年第 3 期。

不知神之所为也”^①。北宋中叶纸钱已经普遍使用,据宋人记载:宋仁宗死,遗诏到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又有周长孺都官赴剑州普安知县,行乱山中,见汲水妇人,亦载白纸行哭”^②。纸明器在明代应该更为多见,只是几乎全部都用于焚化,遗留资料十分有限。定陵中孝靖王皇后棺内就有纸钱随葬^③;鲁荒王陵随葬的一个小木箱中装有纸制的冕、袍、玉带、靴等^④,是一批难得的明代纸质明器实物。使用纸俑的推测可能更适合于益宣王陵,该陵无玄宫结构,仅用砖砌椁室,而且棺椁之间填以石灰,没有容纳明器的空间,包括俑在内的各种明器只能焚于墓所。益定王陵也是一圻三穴,形制与益宣王同,位于左位的元妃黄氏(卒于天启五年五月)墓中出土锡明器 10 余件,此墓严重被盗;而在部分被盗的中穴益定王(卒于崇祯七年三月^⑤)墓和保存完好的右穴次妃王氏(卒于崇祯七年十月)墓中均未发现明器^⑥。一圻三墓而明器制度不

①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纸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62 册,第 446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年。

②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李剑雄等点校本,第 16 页,中华书局,1983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 233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④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 年第 5 期。

⑤ 据《益□王圻志》记载:益定王生于万历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崇祯某年(志文残缺),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另据出土时保存完好的王妃墓志记载,她在益定王死后“过乎哀”,“遂于今崇祯七年甲戌十月初八日寅时,后先王二百六日而薨”。据此志文推算,益定王当卒于崇祯七年三月,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核准,当为三月初十日。

⑥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2 期。

同,这个现象值得研究,或许明朝帝王根本没有严格的明器制度。

2. 几种特殊的葬仪用品

在明代帝王陵墓中,除了随葬大量的实用器和明器外,还有不少葬仪用品。以功能材质而论,它们有些是明器,如谥册、谥宝等;也有些本身为实用器,只是在陵墓中才被赋予了特殊功能,如梅瓶等。

(1) 谥册、谥宝和圻志

谥册是记载墓主尊谥号的册文,谥宝是刻有墓主谥号的宝玺,它们都是墓主身份的证明物。据《明实录》、《大明会典》等文献记载,明朝历代帝后大葬,奉迁梓宫入玄堂安奉毕,都要陈设谥册、谥宝,如《明仁宗实录》记载太宗(成祖)葬礼:“奉迁梓宫入皇堂安奉讫,内侍捧谥册宝置于前,陈列明器等毕,行赠礼……”^①,可知明代帝后陵中应当有谥册、谥宝随葬。

明神宗定陵中出土谥册7副,其中木质4副、锡质3副。木谥册分别为神宗1副,以光宗名义奉上;孝端皇后2副,分别为神宗赠谥“孝端皇后”1副和以熹宗名义奉上带尊号并加系神宗谥号者1副;孝靖皇后1副,以熹宗名义奉上。谥册以檀香木板制成,每副10版,版长28厘米、宽12厘米、厚1厘米,原木本色,不加髹饰,上刻谥文。谥册用织金包袱包裹,放入盝顶金漆匣内,匣外又以罗面夹袱包裹,放置在随葬器物箱内。锡谥册中有孝端皇后1副,文字内容同木谥册;孝靖皇后2副,1副文字内容同木谥册,另1副已氧化成碎块,“从所置放箱的形状及同出器物来看,当属孝靖后死时随葬”^②,笔者认为,这副谥册应该是她以皇贵妃礼初葬东井时所用。

^①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壬子,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171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2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定陵中出土谥宝4方,以梨木制成,不髹漆,呈褐色。宝面方形,上为龙钮,包装方式与谥册相似,装于盝顶金漆匣内,再置于随葬品箱中。一般是一宝一箱,惟孝靖皇后册、宝同置于一个箱中。谥宝有3方保存较好,阳文篆书玺文分别为:“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之宝”、“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宝”、“孝靖温懿敦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宝”,可知它们参别属于三位墓主。三方谥宝大小略同,其中孝端皇后一方最大,通高15.5厘米、长宽各13.5厘米。另有一方谥宝保存不好,出土于X10中,仅存残钮,发掘报告认为:“这一残宝,从出土位置来看,虽然靠近孝靖后棺椁一侧,但它很可能是属于孝端皇后的。原来它也是单独放在一个随葬器物箱内,可能是在下葬时抬箱入玄宫,误放于孝靖后椁侧的,或者另有原因”^①。这个推测值得商榷。

考明初制度:“皇后金宝金册,贵妃以下,有册无宝”^②。宣宗宠贵妃孙氏,请于皇太后,特制皇贵妃宝赐之,“自是贵妃授宝,遂为故事”^③。孝靖皇后最初以皇贵妃之礼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七月葬于东井,其身份既为皇贵妃、又是皇太子生母,殉葬品中理亦应兼有册、宝。因此,定陵中出土的这件仅剩残钮的谥宝并没有放错位置,它应该属于孝靖皇后,是初葬时的皇贵妃谥宝,所镌文字应为其初谥之号“温肃端静纯懿皇贵妃宝”,和前面讲到的残锡谥册配套。

定陵中出土圹志一副,位于玄宫后殿南端西壁棺床下、孝靖皇后椁头的西南部约1米处,石质,长64厘米、宽63.5厘米、盖身各厚13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3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宣宗孝恭皇后孙氏》,标点本第12册,第3514页。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八,《舆服志四》,标点本第6册,第1659页。

厘米。志盖篆书“大明温肃端静纯懿皇贵妃王氏圹志”，志身楷书志文，为孝靖皇后初葬东井时所用。孝靖皇后迁葬定陵时，该志石自东井一并迁来，但从其摆放位置来看，已经不是葬仪之必须。定陵玄宫和已发掘墓道范围内未见神宗和孝端皇后圹志。

明制：“宗室本支蕃衍，每有丧礼，所用谥宝册、铭旌、明器俱下工部委所司制造”；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六月礼部奏上省简新例，但“凡亲王、郡王谥宝册仍下工部所司促办”^①。因此，明代亲王陵墓中应该皆有谥册、谥宝随葬；但从几个发掘时保存完整的王陵来看，各王陵之册、宝制度并不尽相同，但墓志比较普遍。

鲁荒王陵中出土有木质贴金的“鲁王之宝”，龟钮，通高4厘米、长宽各10.2厘米，置于玄宫前室后部的红漆案上^②。该墓中未见谥册及圹志（墓道未经发掘）。

楚昭王陵中出土有鎏金铜册二副，一副是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谥册，共两页，对折；另一副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分封墓主为楚王的实用封册。二册形制、大小相同，册页长24.7厘米、宽10.15厘米、厚0.5厘米，共置于一个木盒中，封册在下，谥册在上。册盒置于刻龙纹的石函中，放在棺床前的石几案上。同墓中还出土木质贴金“楚昭王宝”一方，置于石函前的盝顶木匣中。谥宝龟钮，通高7.5厘米、长宽各10.5厘米。石几案前竖立圹志石一方，上圆下方，碑碣形，连座通高100厘米、宽51.5厘米、厚10.3厘米，碑身刻志文填朱，额篆“大明楚王圹志”，周边线刻龙纹^③（图4—12）。

① 《明宪宗实录》卷六八，成化五年六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23册，第1351—1352页。

②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梁庄王陵中出土有鎏金铜册一副,册页长 23 厘米、宽 9.1 厘米、厚 0.4 厘米,共两页,对折。从册文内容来看,是宣德八年(公元 1433 年)册封王妃魏氏的实用封册。该墓中未发现二位墓主的谥册和谥宝^①。石质圹志两方,在墓道终端、玄宫门的上方,东西并列竖立嵌入砖墙中。梁庄王志盖长 73 厘米、宽 72.7 厘米、厚 10.6 厘米,楷书“梁庄王墓”四字,阴刻填朱;志身长 72.5 厘米、宽 72.5 厘米、厚 10.2 厘米,阴刻志文填朱。王妃



图 4—12 明楚昭王谥册匣、谥宝匣、瓷罐、圹志

志盖长 58 厘米、宽 57.5 厘米、厚 10.5 厘米,楷书“大明梁庄王妃圹志文”九字,阴刻填朱;志身长 58 厘米、宽 58 厘米、厚 10.5 厘米,阴刻志文填朱。

宁献王陵中未见有谥册和谥宝,在墓室门前的砖台上有一方圹志,长宽均为 91 厘米,志盖篆书“故宁献王圹志”,志身楷书志文,周边线刻龙纹^②。

益端王陵中出土木质谥册一副,阴刻谥文,烫以金粉,已残朽,上有“谥曰端”等字,知为益端王所有。该残册出土时置于玄宫后室棺床东侧(益端王棺所在一侧)的小石座上,谥册储于涂金小木匣中,外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5 期。

^②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 年第 4 期。

复盛以红漆小木箱。圹志两副,分别放置于墓室后壁的两个壁龛中,分别与墓主棺位相对应。益端王圹志盖及身長 76.5 厘米、寬 76.2 厘米、厚 17.5 厘米,礮石质,志盖篆书“大明益端王圹志”,志身阴刻楷书志文。王妃彭氏圹志盖及身長 76.1 厘米、寬 76.3 厘米、厚 10.7 厘米,形式同王志^①。

益庄王陵中未见有谥册和谥宝,棺床前放置圹志三副,礮石质,中为益庄王、东为王妃王氏、西为继妃万氏。三志形式相同,篆盖、楷书志文,边框有线刻龙纹(王妃为凤纹),益庄王圹志边长 67 厘米、王氏圹志边长 70 厘米、万氏圹志边长 72 厘米,厚皆为 10.5 厘米^②。

益宣王陵中未见有谥册和谥宝,在椁室前墙外有砖砌的圹志室,内放置圹志三副,白矾石质,中为益宣王、东为元妃李氏、西为继妃孙氏。三志形式相同,篆盖、楷书志文,边框有线刻云龙纹,益宣王圹志长 100 厘米、寬 93 厘米、厚 17 厘米,二妃圹志大小一样,边长 90 厘米,厚 17 厘米^③。

在发掘前已被盗扰的诸王墓中也间或有谥册、谥宝出土,并多有圹志发现。

湖北荆州湘献王衣冠冢中出土有谥宝一方,木质,文曰“湘献王宝”^④。

辽简王陵玄宫门前正中的长方形石座内竖立石圹志一方,志盖

①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棖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 年第 3 期。

②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焜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 年。

③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翎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 年第 8 期。

④ 丁家元:《荆州勘明湘王府城遗址》,《中国文物报》1998 年 6 月 17 日第 1 版。

阴刻楷书“故辽简王之墓”，描黄；志身楷书志文；周边有线刻龙纹。志盖及身大小相等，均为长80厘米、宽78厘米、厚2.8厘米^①。

蜀悼庄世子陵中出土木质谥册宝各一件，谥册两片，各长24.2厘米、宽10厘米、厚1厘米；谥宝龟钮，边长10.8厘米、通高7.9厘米，印面阳文篆刻“蜀悼庄世子宝”。在玄宫后室前左檐柱下竖立圹志一方，石质，碑碣形，额篆“故蜀悼庄世子圹志”，旁饰龙纹，志文楷书，志石高104厘米，下有底座，高46厘米^②。

蜀僖王陵玄宫第一道门内竖立圹志一方，石质，碑碣形，额篆“大明蜀僖王圹志”，旁饰龙纹，志文楷书，志石高148厘米、宽80厘米、厚13厘米，下有底座，高44厘米^③。1991年发掘的蜀昭王陵中也有王及王妃残碎圹志出土^④，从而纠正了此墓旧传为蜀惠王陵之误，确认了墓主身份。

德庄王及王妃刘氏墓志均为石灰岩质，正方形，出土时各以两道铁箍套束，位于墓门内封堵墙上。王墓志边长70厘米，志盖厚12厘米，边框阴线刻二龙戏珠纹，中阴刻篆书“德庄王圹志铭”；志石厚13厘米，边框阴线刻二龙戏珠纹，中阴刻楷书志文。刘妃墓志志盖边长47.7厘米、厚9厘米，边框阴刻云凤纹，中朱书篆体“大明宗室德王妃刘氏之墓”；志石边长48.5厘米、厚9.5厘米，边框阴刻云凤纹，中朱书“宗室德王妃刘氏圹志文”并阴刻志文，皆楷书^⑤。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②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③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④ 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⑤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襄藩诸王墓基本全被盗空,有些曾征集到墓志,其中襄康王志盖边长62厘米、厚15厘米,线刻龙纹边饰,中阴铭篆书“皇帝御制襄康王圻志文”十字;襄庄王圻志边长61厘米、厚24厘米,四周线刻二龙戏珠纹,志盖铭刻篆书“皇帝御制襄庄王圻志文”十字^①。

潞简王陵已被盗一空,清理发掘时在玄宫后殿的石门外残存潞简王圻志一盒,志盖已失,志身边长87厘米、厚17厘米^②。

晋裕王陵中也有圻志出土,但未见详细介绍^③。

益定王陵三座椁室的前墙外各竖青石圻志一方,盖、身对合,各长96厘米、宽76厘米、厚2厘米,志盖分别篆书“大明益国王圻志”、“大明册封益王元妃黄氏圻志”、“大明益王次妃王氏圻志铭”,志身楷书志文,边框饰以线刻龙纹^④。

明制:亲王之册金质,二片;“其宝用金,龟钮,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宝”^⑤。从上述几座王陵出土的谥册和谥宝来看,基本都符合这一定制,惟册文内容不同、宝文用谥号。

谥册、谥宝是古代帝王带到“阴间”证明身份的物件,汉唐以来,使用制度日益完臻。据冯汉骥先生考证,谥册之制始于汉,至唐初始以玉册入于陵中^⑥。东汉皇帝大葬礼中有“太尉读谥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庙,太史奉哀策苇篋诣陵”;太史令“读哀策”;“司徒、太

① 襄樊市考古队等:《明襄阳王墓调查》,《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②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第5期。

③ 郭勇等:《明晋裕王墓的清理工作》,《文物考古资料》1956年第6期。

④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⑤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八,《舆服志四·亲王册宝》,标点本第6册,第1660页。

⑥ 冯汉骥:《论南唐二陵中的玉册》,《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史令奉谥哀策、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等仪式^①，可知当时已有谥册、哀册制度。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②。可知东汉是以竹册入山陵。据《旧五代史》记载：后周礼仪使奏：“魏、晋郊庙祝文书于册；唐初悉用祝版，惟陵庙用玉册”^③。根据这段文字，可以推定唐代帝陵中随葬有玉册；1995年陕西乾县唐僖宗靖陵中出土的汉白玉质哀册残片^④，直接证实了唐代帝陵中确实有玉册随葬。唐代以后，江苏南京南唐二陵中出土有南唐烈祖、中宗的玉册^⑤，河南巩义宋太宗永熙陵祔葬墓元德李后陵中也出土有残破的珉玉质哀册和谥册^⑥。此外，在内蒙古辽陵遗址中还发现过契丹小字的辽兴宗、仁懿皇后、辽道宗、宣懿皇后的哀册^⑦。

四川成都十国前蜀高祖王建永陵中不仅出土了白色大理石质的哀册和谥册，册匣遗痕尚可辨识，还出土了一枚白玉质蹲龙钮的谥宝，提供了册、宝俱全的实证。该谥宝长11.7厘米、宽10.7厘米、含钮通高11.1厘米，印文曰：“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篆书

① 宋·郑樵：《通志》卷四五，《礼略第四·凶礼·大丧及山陵制》，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第1册，第59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②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一，《束皙传》，吴则虞等点校本第5册，第1433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③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四三，《礼志下》，朱东润等点校本第6册，第1910页，中华书局，1976年。

④ 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第326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⑤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文物出版社，1957年。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⑦ 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奉天图书馆，1934年。

阴刻,贴金^①。据《晋书·礼志》记载:曹丕称帝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②。这段记载表明:不晚于汉末魏初,已经有了为大行皇帝奉上谥宝之制。另据《通典》引《大唐元陵仪注》记载,“梓宫降自羨道,……龙輓既出,礼仪官分赞太尉、礼仪使奉册、宝、玉币,并降自羨道至玄宫。太尉奉宝绶,入跪奠于宝帐内神座之西,俯伏,兴。礼仪使以谥册跪奠于宝绶之西,又以哀册跪奠于谥册之西,又奉玉币跪奠于神座之东,并退出复位。礼生引将作少监人陈明器、白幟弩、素信幡、罍等,分树倚于墙,大幡置于户内。布陈訖,自内官以下并出羨道就位”^③。据此可知唐代皇帝之葬皆兼有谥宝和谥册。

明代帝王陵墓中随葬谥册、谥宝,应该是继承发展了汉、唐以来的制度。帝后有谥册、谥宝应无疑义,除定陵中出土的实物外,还有《明实录》、《大明会典》等明代官方文献中关于历代帝后丧葬礼仪的记载可资佐证。至于亲王,揆诸常理,也应该都有谥册和谥宝随葬,但宁献王、梁庄王、益庄王、益宣王这几座发掘前未经盗扰的陵墓中却并未发现谥册、谥宝;鲁荒王陵中未见谥册,所随葬之宝文曰“鲁王之宝”,严格讲也不能算是“谥宝”,只能说是亲王宝玺的明器;楚昭王陵中兼以实用受封册随葬,亦属不多见之例。上述王陵中的木质随葬品大多保存不好,有木质谥册、谥宝已经朽坏无存这种可能。另外,如果墓主下葬时朝廷赠谥未行,那么以铭载谥号为核心的谥册、谥宝就无法制作,江西南城益定王陵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从益定

①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7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②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礼志中》,吴则虞等点校本第3册,第632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③ 唐·杜佑:《通典》卷八六,《礼四六·丧制之四·葬仪》,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第46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王圻志来看,虽题由“翰林院奉敕撰文”,但首行谥号处却空缺一字,作“大明益口王圻志”,志盖亦仅写作“大明益国王圻志”,无谥号;定王次妃圻志也作“益口王待追封次妃王氏圻志铭”^①;可知定王及王氏妃下葬时,朝廷尚未赐定王谥,王妃也尚未追封。再有,谥册谥宝制作耗时废工,有时“累月不成,比成,遣官赉送或已不及葬期”^②。在这两种情况下,陵墓中显然也不可能有谥册、谥宝。

关于谥册、谥宝的陈设位置,鲁荒王是在玄宫前殿案上,楚昭王是在棺床前石几案上,益端王是在棺床侧小石台上,而定陵则全部放置在棺床上。神宗册宝分别放在其外棺北侧、与孝端皇后外棺夹道之间第18、19箱中(这个区域共有3个随葬品箱,另外一箱即第20号箱装甲冑、刀剑等);孝端皇后谥宝和两份木谥册分别放在其外棺北侧的第3、4、5箱中,锡谥册放在棺床南端第7箱中;孝靖皇后木质谥册谥宝分别放在其外棺南侧的第10、12箱中,锡谥册放在其外棺南侧第11箱和棺床南端第7箱中。按《大明会典》记载,“梓宫入皇堂安奉讫,内侍捧谥册宝置于前”^③,结合鲁荒王、益端王等几位亲王的册宝摆放位置分析,笔者认为定陵册宝并未安放如仪。谥册宝关乎国家祭葬大典,正常情况下不应该置于器物箱内混杂于一般随葬品中。益端王谥册放在特制的小石台上,应该是最正规的摆设方式;而鲁荒王、楚昭王置于几案,则是象拟生前。从《定陵》中的玄宫中殿“遗迹遗物分布图”、“随葬品统计表”、发掘时拍摄的照片以及有关

^①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② 《明宪宗实录》卷六八,成化五年六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23册,第1351页。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六,《礼部五十四·丧礼一》,影印本第3册,第1499页。

文字来分析,玄宫中殿帝后石御座两旁的石台上无摆放物,它们应该是为安放谥册、谥宝而设。也就是说,定陵中的谥册、谥宝连同盛载它们的盝匣应该分别放置在玄宫中殿神座两旁的六个石台上。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舛差,固然与神宗三十年不上朝,文恬武嬉、纲纪荡然有直接关系,但也有影响更直接的近因。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自七月廿一日至九月初一日,短短40天内,神宗、光宗二朝皇帝相继驾崩,“红丸”、“移宫”两案迭起,朝廷一片混乱。就在这个背景下,神宗和孝端皇后于当年九月廿八日发引、十月初三日落葬定陵。据大学士方从哲等题奏:还在发引途中,就已经纰漏不断,“梓宫甚重,举动极难,出大明门已近午矣。且营中军夫虽拨八千人,而素不惯习,兼以杠索间有损伤,时时更换,以至沿途稽迟,入夜方抵德胜门。……二十九日之夜,梓宫至巩华城,拖灵龙木铿然有声,右手一角堕地。内官行尚食礼,连呼献爵,竟无人应”^①。从当时现场遗迹来看,神宗帝后三人人葬玄宫似乎也是在匆忙慌乱中进行的。定陵发掘时发现,玄宫后殿棺床前、中殿前段和整个前殿的地面上都铺有木板,其上有车辙印迹。这些木板是为了龙辂通过而不损伤地面而铺设,大葬后按理应该撤出,但却只撤掉一部分,即不妨碍关闭石门、摆设石神座即止。在前殿的木板上有零星的纸钱痕迹。前殿前的甬道中虽无木板,但“地面又有散乱的珠料、麻绳痕迹”,还有甬道券门的临时木栏亦未拿出^②。大葬礼中差错频仍,混乱之际护丧太监没有如礼摆设谥册、谥宝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不仅册宝,从《定陵》所附“遗迹遗物分布图”来看,木俑、仪仗等也并未全部摆放如仪。当时就有人针对神宗、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泰昌元年九月癸卯,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71—72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18—1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光宗丧葬礼仪中的某些重大疏漏,上奏指斥礼部官员“固属茫昧”,而首辅方从哲等人本应该“熟于典故”却也是草草将事^①。

圹志,亦即墓志、墓志铭,起源于东汉,晋代已比较多见,原本是为了“素族无名策,故以纪行述耳”;“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②。南北朝时期圹志基本定型,一般为方形,上盖下身,盖书志名,多用篆体;志文记墓主姓氏爵里、世系履历、嘉行懿德、功业政绩、生卒年月、葬地方位等,有些还有四言押韵颂辞,字体一般用楷书。到唐代,墓志已经是“贵贱通为之”^③。

陕西咸阳北周武帝孝陵中出土的周武帝宇文邕的墓志^④,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皇帝墓志实例,此外历代皇帝墓志并不多见。昌平明定陵的墓道、玄宫均经发掘,但未见有神宗、孝端皇后的墓志,孝靖皇后墓志为自东井旧墓迁来,也未见有孝靖皇后迁葬定陵皇太后身份的墓志。这个现象说明明代帝后之葬继承前代传统不用圹志,而皇贵妃以下则例有圹志,除孝靖皇后外,北京西郊金山口熹宗三妃合葬墓和神宗七嫔合葬墓等妃嫔墓中都出土过圹志^⑤。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泰昌元年九月辛丑,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奏,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70页。

②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石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2册,第444—44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③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石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2册,第44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⑤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均载《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刘精义等:《明代妃嫔陵园及圹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从已发掘或清理的明代亲王墓来看,圹志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还有不少陵墓已毁或久失基址所在而志石尚存者,如庆靖王^①,鲁靖王^②,宁康王^③,淮靖王、淮康王、淮恭王^④,益恭王^⑤,福忠王^⑥等。

明代亲王圹志的制式并不统一,既有两石相合形,如辽简王、宁献王、梁庄王和益藩诸王、潞简王等;也有碑碣形,如楚昭王和蜀藩诸王等。山西太原晋藩广昌悼平王及王妃合葬墓中同时出土这两种形式的圹志,悼平王为二石相合形,王妃刘氏、杨氏二人圹志皆为碑碣形^⑦。如果以此墓三志为标准,广昌王圹志等级应高于二妃;但若就各藩亲王而言,这两种志石应该没有等级上的差异,或许碑碣形圹志略简朴些。和王陵制度一样,各藩府圹志也自有传统,如楚藩自永乐至崇祯圹志皆为碑碣式等。另外,卒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的益定王圹志仅厚2厘米,远逊于益藩先辈端、庄、恭、宣诸王,与随葬品衰退的大趋势正相吻合,也是国势浸弱的一种反映。

圹志放置的位置,晋唐以来一般都是在墓室或墓穴的前面,置于

① 许成等:《同心县任庄村明代王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第17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该圹志志文未见披露。

② 鲁靖王圹志现藏山东邹县文物保管所,志文著录于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附录),《文物》1972年第5期。

③ 宁康王圹志现藏江西省博物馆,志文著录于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454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淮藩靖王、康王、恭王三方墓志现藏江西省博物馆,志文著录于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03—50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⑤ 益恭王圹志现藏江西省南城县博物馆,志文著录于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6—517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⑥ 福忠王圹志由河南孟津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志文著录于李宪奇等:《明福王朱常洵圹志》,《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⑦ 戴尊德:《山西太原七府坟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墓道的靠近终端处。明代妃嫔、亲王圹志放置的位置不一,宁献王、辽简王、梁庄王、德庄王圹志放置于墓室门外墓道内或墓门上方,与古制相合。金山熹宗三妃、神宗七嫔的圹志皆置于棺床后靠近墓室后壁处^①。蜀悼庄世子、潞简王圹志是在玄宫后殿(棺室)门前;后来蜀藩诸陵皆改为放置在玄宫第一道门内。益端王及王妃圹志在玄宫后壁壁龛中,楚昭王、益庄王及王妃圹志在棺床前,益宣王、益定王及其王妃圹志是在砖砌椁室的前面(棺尾侧)。就圹志放置位置而言,明代各藩王陵并没有统一规则。

(2) 谷物、酒醴与梅瓶

用谷物随葬,在中国由来已久。秦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鬼犹求食”,“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②。因而明器也就相应地多见食器、酒器以及谷仓等物。唐宋时期人们认为谷物能引魂,敦煌卷子中有一份晚唐写本《杂抄》中讲到:伯夷叔齐兄弟义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载尸还乡时,恐魂灵饥,即设熟食瓶、五谷袋引魂,今葬用之礼”^③。这个传说虽不足以说明商周之际,但却道出了唐人的一般信仰。为了招引亡魂,所以汉晋间的五联罐、谷仓罐(魂瓶),唐宋金元时期的粮罌瓶、多角瓶、多管瓶、皈依瓶等也就特别多。有不少这类东西在出土时里面还保留有稻、粟等谷物。据成书于金元时期的

^①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均载《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② 汉·王充:《论衡》卷二三,“薄葬”,影印明通津草堂刊本,第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 伯2721号,转引自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盟器神煞篇》讲^①，公侯卿相以至庶人的墓室中都应安放“五谷仓”，其高度在一尺二寸至二尺二寸间不等。

墓中葬谷的习俗在明代仍有，当时人亦认为此礼沿袭自商周之际，“今包笥谓之粮罌瓶者，因夷齐饿死后，人恐其魂饥而设五谷之囊，故《礼记》曰‘重生道’也，起于商”^②。《大明会典》记载公、侯、伯人等的随葬明器中有“五谷仓一、凉浆瓶二”^③，但在明墓的实际考古发掘中，这类东西并不是很多见。与之相反的是，尽管在《大明会典》等文献中不见记载，但明代帝王陵墓中却时有葬谷的现象发现。明神宗定陵中虽未见有谷仓罐一类器物，但三位墓主仍然都有谷子和稻子随葬。从《定陵》中所附玄宫后殿“随葬器物分布图”来看，神宗的谷子和稻子在外棺的中部偏下南侧，大约相当于墓主腿部的位置，其中稻在外棺板上，谷在外棺之侧；孝端皇后的稻、谷均在外棺板上头部位偏南侧；孝靖皇后的谷子在外棺头外的棺床下，稻子分别在棺头上和外棺头外的棺床下发现^④。这些稻谷原本都是装在小袋中，均已腐朽。它们当时应该都是放置于外棺之上，后来可能是因外棺板及其上的仪仗明器等朽塌散落而掉落。

① 堪輿术著作《大汉原陵秘葬经》，原书已佚，在《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十九庚条“陵”字部下收录。据徐莘芳先生考证，此书成书年代当在金元间，作者为“地理阴阳人张景文”，中所记明器、葬仪制度在宋金元墓葬中多能找到实例印证。见徐莘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②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五，“辩证类·面帛粮罌看果纸钱始”，点校本，第26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二十三·坟墓》，影印本第5册，第2735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8—3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就已发掘清理的明代诸王陵的保存程度而言,如果都是和定陵一样的放置方式,随葬谷物或其遗痕无疑很难保留下来,因而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比较少。

宁康王朱覲钧墓室前 3.3 米处有一道厚 8.4 厘米的照面墙,墙上有并列的长方形砖龕二个,内置皈依瓶一对^①,这是罕见的明代王墓用皈依瓶随葬之实例,但瓶中是否有谷物未见说明,挖墓取砖的农民称之为“衣饭瓶”。益定王及王妃合葬墓中发现了保存比较好的随葬谷物现象。该墓由青砖砌成三个椁室,椁室前墙外各竖青石圹志一方。中间益定王棺椁与圹志间的上方两角各有一件豆青釉瓷瓶,其内装满黍粒;左侧元妃黄氏圹志内侧靠椁底处深埋两件青花瓷瓶,其内盛黍;右侧次妃王氏圹志与椁尾相间处上方两角各有一件青花瓷瓶,内盛黍^②。谷物盛瓶随葬,在明代帝王陵墓中确知者目前仅此一例,其造型与同期一般瓶相同,并不是特制的明器(图 4—13)。

另外,四川成都蜀悼庄世子墓中殿左耳室中出土陶仓一件,右耳室中有陶庖一件^③;蜀僖王墓中出土有陶仓,陶胎表面涂朱^④;宁献王陵中出土铜斗形器^⑤,这些可能也都与葬谷有关;兰州上西园肃藩某郡王墓玄宫的东边耳室内有汉唐宋铜制钱 900 余枚,西边耳室“内有

① 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 年第 4 期;孙家骅等:《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第 534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②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2 期。

③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 年第 5 期。

④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 年第 4 期。

⑤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 年第 4 期。



图4—13 明益定王妃墓出土
盛黍之瓶

小米、小麦的痕迹甚多”^①，这是明代郡王陵墓葬谷之例。鲁荒王墓中出土有一件荷叶形盖暗花云龙纹青白釉罐，“内盛梨、枣、肉、米饭、鸡蛋、菜叶等”^②。楚昭王陵棺床前石供案下圹志旁边的白釉瓷坛中发现果品17个，计有核桃七、板栗四、枣一、枣核二、白果一、荔枝核一、不明品属一^③。这两座王陵发掘时未见有随葬谷物的现象，这些果品、饭菜等是否与葬谷有相同意义，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无疑它们都属于同一类葬俗，或是“熟食瓶”之类。

除谷物外，汉代以来的墓葬中还常见以酒醴随葬。到宋金时期，酒醴之葬也已经成为固定的葬俗。各种盛贮酒醴的罐或瓶虽然形式各异、装饰不同，显示了不同的时代风貌，并且具体安放、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功用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招引、安顿墓主灵魂^④。《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盟器神煞篇》说，公侯卿相以至士庶人的墓室中都应安放“五谷仓”和“仪瓶”、“浆水瓶”等，“……棺南

①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②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5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④ 刘毅：《瓷明器述略》，《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第1号。

安仪瓶,高一尺九寸;正南偏西安立谷仓,高二尺二寸”;“三浆水”则安置在棺后^①。明代帝王陵墓中随葬酒醴的例证发现不多,鲁荒王墓中出土一件带盖暗花云龙纹青白釉梅瓶,“内盛酒”^②。宁献王玄宫“后室左壁龛中放有5个白瓷罐,内有黄棕色液体,似为油类”^③。湖北江陵辽废王曹妃墓西壁壁龛内有白瓷罐1件(墓门朝东)^④,其中是否有物未见说明。笔者推测,鲁荒王墓中的梅瓶应该是《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仪瓶”,而宁献王墓中的五个白瓷罐则很可能就是该书所谓的“浆水瓶”或《大明会典》中的“凉浆瓶”之类(图4—14)。

瓶、坛、罐一类器物在明代帝王陵墓中并不罕见,但多不见有关其中盛物的资料。神宗定陵中出土8件青花带盖梅瓶,其中6件形体较大,通高71.2—74.9厘米,绘龙穿缠枝西蕃莲纹,肩部有“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款;另2件形体较小,通高45.7或46厘米,



图4—14 明宁献王陵出土的白瓷罐

① 转引自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②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鲁荒王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③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④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王妃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

绘缠枝花卉和纓络纹,肩部有“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款^①。从《定陵》所附“随葬器物分布图”来看,这8件梅瓶中有4件应该属于明神宗,分别放置在其外棺尾部的南北两侧,每边2件;孝端皇后、孝靖皇后二人各随葬2个梅瓶,也分别放置于她们各自外棺尾部的南北两侧。这8件梅瓶出土时已有2件破损,发掘报告并未说明其中是否残留有物品,从一般写作逻辑推测它们应该是空的。据徐莘芳先生考证,《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盛放三浆水的器物就是当时南北窑场中比较常见的经瓶即梅瓶^②。事实上,仪瓶可能也是梅瓶,明定陵中的梅瓶安放在外棺尾部,该陵坐西朝东,若转换成南北向正相当于“棺南”。由此可知,定陵中梅瓶随葬应该具有葬仪的意义,它们是宋元时期“仪瓶”一类的赓续。另外,梁庄王陵中出土有4件青花梅瓶,其中3件并列于后龕内,另1件出自前室西壁下。后龕中西侧一件“出土时侧置,瓶盖在瓶身侧”;西壁下一件,“出土时侧置,盖与瓶分离”^③。这种现象的解释及其是否具有象征意义,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上述资料来看,明早期鲁荒王陵中出土有“内盛酒”的梅瓶、宁献王陵中出土有疑为油类的白瓷罐,但这两座王陵中均未见有完整的“墓仪”和“明器神煞”,表明这种宋元时期曾经流行一时的葬俗已经衰替。明末益定王陵中随葬谷放于普通瓷瓶中,神宗定陵中的稻谷盛以袋直接放于外棺之上,而不是贮于仓或瓶中,陵中随葬梅瓶空而无物也更进一步表明这种繁琐的葬俗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183—18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徐莘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明代帝王陵墓中随葬梅瓶的现象曾经引起过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孔繁峙先生对于明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梅瓶做了统计和对比,指出:“梅瓶多置于棺槨的四周或前面。如北京定陵万历帝随葬的四个梅瓶,均置于棺槨四周,而孝后、端后(引者注:应为孝端皇后、孝靖皇后)随葬的各两个梅瓶,则置于棺槨头前的两侧。至于郡王所使用的一个梅瓶,则多置于棺槨的前面。可以看出,这不同的陈设方法本身就含有不同的使用意义。我国古代,往往用某种器物的谐音来表达一种吉祥的含义,把梅瓶放在棺槨四周,可能是作为一种‘四方(槨为方)清(青)平(瓶)’的象征;而内盛以酒置于棺槨之前应是‘清(青)平(瓶)长久(酒)’的寓意。总之,明墓的梅瓶,是上层统治者等级地位的标志与‘风水’寓意的象征”^①。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明墓中随葬梅瓶的特殊功用,但在具体论证中,却没有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并且这段话中还有两处明显的引证错误:

其一,关于定陵中梅瓶的位置,前面已经谈到,均在外棺尾部,而不是如孔先生文中所云是在棺槨四周或棺槨的前面。

其二,孔文中所列举随葬一件梅瓶的四座“郡王墓”,其墓主身份并非都是“郡王”,鲁荒王朱檀为明太祖第十子、雍靖王朱祐枬为明宪宗第八子,“明制,皇子封亲王”^②,所以这二人应该都是亲王而非郡王;靖江王朱经扶为明太祖从孙守谦之后,为袭封郡王;沐晟是明太祖义子、追封黔宁王沐英之子,本身嗣侯爵、进封黔国公,歿后追赠定远王,生前虽不是郡王,但可以按郡王之礼丧葬。也就是说,孔文列

^① 孔繁峙:《试谈明墓随葬梅瓶的使用制度》,《文物》1985年第12期。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点校本,第12册,第3557页。

举这4人中亲王、郡王各占2人。郡王为亲王众子,其地位低于亲王,衣冠邸第等一应用度等级也相应低于亲王,墓中随葬仪物的等级也不会与亲王等同。另外,同属于亲王级别、发掘时又相对完好的楚昭王陵、宁献王陵、益端王陵、益庄王陵、益宣王陵等陵墓中都没有梅瓶出土;相反,在明代帝王贵戚高官以外,亦有其他人的墓中随葬梅瓶,例如四川平武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龙州宣抚司佥事王玺之妻蔡氏墓中就出土有两件白釉黄绿彩带盖梅瓶^①。因此,很难确定地说明代帝王随葬梅瓶具有“严格的使用制度”;另外,随葬梅瓶应该有一定的风水意义,但它们是否具有“四方清平”或“清平长久”的寓意,也颇值得商榷^②。

(3) 宗教信仰、民俗信仰在随葬品中的反映

明末谢肇淛说:“古礼之尚行于今者,丧得十七,昏得十五,至于祭则苟然而已,冠则绝不复举矣”^③。从前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明代帝王的丧葬之俗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一些上古之礼,但在内容上却有不少的新补充。“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已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汉礼明器甚多,自是(魏)皆省矣”^④。所以,如果以《周礼》、《仪礼》、《礼记》为参照系,明代帝王的丧葬礼俗应该是大有变异,决到不了保留十之七的比例;明代帝王丧葬礼仪的制定,大多是对汉代以来的有关制度的因革损益。不仅如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文物》1989年第7期。

^② 刘毅:《“梅瓶”小考》,《中国古陶瓷研究》第6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③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点校本,第29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④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礼志中》,吴则虞等点校本,第3册,第632页,中华书局,1974年。

此,汉以来佛教的兴起、道教的正式形成,都不断地对以“儒术”为核心的正统文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丧葬礼俗也在不断地发生着相应的演变。毫无疑问,明代儒家思想在全国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程朱理学是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使得宗教,特别是不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相违背、又不妨碍统治秩序的佛、道二教依然能够正常发展。从巩固统治基础出发,明朝皇帝还提倡“三教合一”。明人评论说:太祖“于吾儒及释、道二氏精究秘奥,虽专门名家有不及。然崇佛而无封帝师、西天佛之异典;讲道而羽流辈无孤卿、伯爵之横恩。即表章圣学,而不屑议笾豆、舞佾升降及改革公侯等事。至三教一论,和合同异,具在御制集中,尤为抉微扼要、万古至言”^①。就明代帝王自身而言,佛、道等宗教信仰都有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功利色彩。有记载说,皇帝受朝时大殿上随设佛像和真武大帝像,“朝廷每受朝时,置一金物于宝座香案上,当其前。婺源汪玄锡为给事中,见而不知,问于太监,答曰,‘是金佛也,殿上头又置一小真武像,皆欲以此收福’”^②。从已经发掘清理的明代陵墓来看,随葬品和墓主们在人世间的的生活一样,都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其含义值得进行分析研究。但也有不少本来是宗教寓意的东西,后来被世俗化,已经不完全是本初意义。比如莲花被奉为“佛门圣花”,但明代许多器物上包括汉白玉石棺床等皆以变体莲瓣纹为装饰,很难说这类装饰一定就是佛教寓意,更不能据此证明墓主一定崇信佛教。这里仅讨论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

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其基本精神曾经和中国传统文化发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圣祖兼三教”,谢兴尧标点本,第78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二,“殿上金佛”,魏连科点校本,第47页,中华书局,1982年。

生过激烈的冲突,但随着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成为汉族聚居区的主要教派以后,这种冲突便不复存在,佛教禅宗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太祖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他因生活所迫曾于十七岁时在凤阳皇觉寺出家,以寺中粮尽又做过游方僧,直到二十五岁始还俗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即位后还曾亲注《金刚经》、序《心经》。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正月,明太祖在蒋山大作法会,御撰章疏,加盖皇帝玉玺,“上服皮弁服,搢玉圭,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法服以从,举行佛事”^①;颇有举国佞佛之嫌。他自卜的寿藏即明孝陵之址,原先是南朝高僧保志法师的墓地。为建孝陵,将保志塔向东迁移,明太祖亲为文祭之曰:“昔者,师能出世异人,性备六通,景张佛教,使凶顽从化、善者愈良。及其终也,择地于钟山之阳,阴其宅而居之,经今八百六十七年。今朕建宫在迩,其为师焚修者俯而视之,因敕中书下工部,造浮图于山之左,今将完成,徙师于是。于戏!漏尽毋生人我,劫终勿堕尘埃。惟师神通,尚飨”^②。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九月,安葬马皇后大典礼毕,明太祖为诸子选高僧随侍之国,庚午,“葬孝慈皇后于孝陵。时诸王奔丧,送葬毕,将还。上命各选僧一人侍从之国,为孝慈皇后修佛事。吴僧道衍先以宗泐荐,名在燕府籍中”^③。这位道衍和尚后来成为辅佐明成祖“靖难”的重要功臣,配享太庙,其俗名曰姚广孝。明成祖即位后,曾“徵尚师哈立麻于西番,寻命同灌

①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佛会道场”,谭棣华等点校本,第37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② 明·朱元璋:《御制文集》卷二〇,《祭保志法师文》,见张德信等编:《洪武御制全书》,第245页,黄山书社,1995年。保志,《南史》卷七六有传。

③ 清·夏燮:《明通鉴》卷七,《纪七·太祖》,影印清光绪二十三年湖北官书处重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按,诸王之国是在洪武十五年十月,《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洪武十五年十月癸巳:“秦王、晋王、今上、周王、楚王还国。赐其从官侍卫钞锭有差”。见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350页。

顶大国师哈思巴罗等于灵谷寺建大斋,为高皇帝后资福,又命于山西五台寺资度仁孝皇后”^①;并在南京建大报恩寺为父母祈冥福。此后明朝诸帝后崩,多有斋僧颂经之会,如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十月,仁宗“命礼部集僧道于庆寿等寺及灵济宫建荐扬大斋七昼夜,以太宗皇帝晏驾至此百日也”^②;同年十一月,“以冬至节近,命礼部集僧道于庆寿、海印、能仁三寺及灵济宫各建荐扬大斋七昼夜,资皇考妣之德”^③。类似活动在同年十二月、次年正月又曾举行多次。

明朝后嗣诸帝虽未曾出家及卜葬于僧墓,但他们和诸皇子仍多有替身僧,“本朝主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俱递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缘起,意者沿故元遗俗也”^④;“主上新登极,辄度一人为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养居处几同王公”^⑤,由宫廷布施,大建兰若。如果替身僧先于皇帝而圆寂,还须再另补一人。如明神宗在替身僧志善谢世后,另觅替补者“年未二十,美如倩妇”,令其主持万寿寺,并将永乐大钟赐予该寺以助祈福^⑥。定陵发掘时发现,明神宗骨架“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⑦。定陵中共出土念珠

①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佛会道场”,谭棣华等点校本,第37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② 《明仁宗实录》卷三下,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辛酉,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119页。

③ 《明仁宗实录》卷四下,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亥,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149页。

④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京师敕建寺”,谢兴尧标点本,第686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⑤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主上崇异教”,谢兴尧标点本,第683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⑥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京师敕建寺”,谢兴尧标点本,第68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6串,其中三串放置在神宗尸骸左手处,三串放在孝端皇后棺内头部北侧的漆盒内;念珠质地为菩提子4串、琥珀2串。“棺内随葬念珠,正是他们生前崇奉佛教的实物证据”^①。万历宫廷崇奉佛教,应该是受到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的影响。李太后笃信佛教,生前曾捐建长椿寺、万寿寺、千佛寺等寺院多处,“神庙侍太后最恭笃,梓宫殡殿产莲花九枝”^②;李太后因而被尊称为“九莲菩萨”,晚明宫廷和一些寺院中供奉李太后神像亦承以九莲座。如“慈寿寺在阜成门外八里,万历丙子(四年,公元1576年)慈圣皇太后建。寺有塔十三级,高入云表,后‘宁安阁’榜太后手书,又后有九莲菩萨像”^③。

孝端皇后多年被神宗冷落,在宫中优养天年,佛教成了她的精神寄托。除念珠外,孝端皇后殓装的棕帽上还有三枚镶玉莲花托“佛”字金簪^④,也可以看作是她曾笃信佛教的象征。这种带有佛教意味的发饰,在益宣王继妃孙氏棺中也有发现,为一枚观音乘风金钗^⑤。而琥珀念珠在益宣王棺中也有发现,并且保存完好,串首一颗作宝塔形。益宣王“尸体完好,身着龙袍,腰系玉带,项挂念珠,足穿黄锦高筒靴”^⑥。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3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清·谈迁:《北游录》,《纪闻上·神庙遗事》,汪北平点校本,第340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③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八,“寺庙”,排印本,第58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⑤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⑥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湖北蕲春荆端王次妃刘氏墓中出土有两枚鍍金压胜钱,其上有“阿弥陀佛”四字^①;兰州上西园之肃藩某郡王墓中出土有金钱一枚,其上有“法轮转回”四字^②,都明显具有佛教意义。益定王及其次妃王氏棺内出土的“金光接引”、“径上西天”文金钱^③,其寓意也应该相同。2004年陕西西安南郊发掘的明代秦藩家族墓葬 M24 之棺前档板上绘有端坐莲花的佛祖和执旌侍立童子^④,表明墓主崇信佛教笃深(图 4—15)。



图 4—15 明秦王家族墓朱漆棺上的金彩佛像(引自 2004 年 9 月 22 日《中国文物报》)

① 小屯:《刘妃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5 期。

②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 年第 3 期。

③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2 期。

④ 肖建一等:《西安发现明代秦王家族墓葬》,《中国文物报》2004 年 9 月 22 日第 1 版。

明神宗七嫔合葬墓中西边第一棺内有两件铜质钟形佛教法器，其上刻有梵文、藏文的符号咒语。其中一件上有“一切蒙蔽”、“大明永乐年施”等字；另一件上有“救护！唵，文殊师利……”、“大明宣德年施”等字^①。这两件东西应该是喇嘛教的法物。

喇嘛教，亦即“藏传佛教”或“密宗佛教”，是佛教与藏地固有原始宗教苯教相结合的产物，与内地佛教有着明显的区别。喇嘛教与明朝宫廷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明太祖初即位曾遣人招谕西藏僧官，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改封入朝南京的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喇嘛教噶举派（白教）黑帽活佛噶玛巴五世入朝，明成祖在奉天殿接见，赐宴华盖殿，令其为太祖帝后在南京灵谷寺和五台山建大斋追荐亡灵，封之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②。明宣宗是明代比较崇信喇嘛教的皇帝，西番僧人在宣德年间大量来到北京，“至正统初，遣回本处者至六百九十一人。既而礼部尚书胡濙再请汰其四百五十人以闻，上命法王、佛子不动，余者去住听其自裁”^③。四川地当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冲，各种往来更为密切，宣德时期喇嘛教对于蜀王府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卒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的蜀僖王很可能就信仰喇嘛教，至少是对藏传佛教感兴趣。蜀僖王陵玄宫后殿中室的盥顶上浮雕一个直径2.1米的曼荼罗图案，中心小圆内为梵文“昙”字，外围的变体莲瓣纹中为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三一，《列传·西域三》，标点本第28册，第8572—8573页。在《明史》中，噶玛巴写作“哈立麻”。

^③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僧道异恩”，谢兴尧标点本，第684—685页，中华书局，1959年。

“八吉祥”纹^①。这幅图案正位于棺床正上方,雕刻精美,上施彩绘,对于墓主来讲,显然至关重要(图4—16)。另外,在卒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的梁庄王陵中出土有三尊发掘者推测为“帽饰”的金质佛像,从其背后的梵文铭文来看,分别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大黑天和大鹏鸟^②。可见,梁庄王也应该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的兴趣。



图4—16 明蜀僖王陵玄宫顶部的曼荼罗图案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以后逐步形成,奉老子李耳为教主。明朝建国后,龙虎山第四十二代嗣天师张正常被封为“正一嗣教真人”,受命统领天下道教。明太祖在给第四十三代嗣天师张宇初(正常之子)的敕教中称:“昔之能名,名于海内。始汉至今,所以不泯者,盖为御灾捍患之妙,功达于君,利及于民,故有不泯者为此也。迩闻服制且终,当正教中之首,率徒以修,符至一来,朕当谕尔,尔其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任新建:《明蜀僖王陵藏式石刻考释》,《四川文物》1995年第3期。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不二其心,则上下格矣”^①。明太祖曾亲注老子《道德经》、作《祭真人张正常文》、并为龙虎山第一至二十代真人各写过一篇四字八句《赞》,大力扶植正一派,使之成为道教的正宗。明太祖诸子中不乏信奉道教者,鲁荒王朱檀“饵金石药,毒发伤目”^②。湘献王朱柏“善道家言,自号‘紫虚子’”^③,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之藩荆州,创建太晖观。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正月,朱柏在道教胜地湖北武当山建罗天大醮五昼夜,以太晖观经篆法师周思礼主持,设斋一千二百份于紫霄宫福地殿。1982年,文物部门曾在紫霄宫前赐剑台下发现此次斋醮后投放的青石山简、玉璧、金龙等物^④。湘献王因被建文帝猜忌,自焚而死,永乐初建衣冠冢于太晖观内,成为明代帝王陵墓中的一个特例。

宁献王朱权佐燕王靖难成功后被疑忌,“日韬晦”;晚年受压抑,甚至“有司多齟齬以示威重”,于是超然世外,“自号臞仙”^⑤。他以道上衣冠入殓,戴漆道冠,腰系玉带,身穿金线云纹道袍,成为明代帝王殓服中的一个特例。并且,宁献王陵冢前还建有道观“南极长生宫”,宫前望柱上刻符篆,并有铭文曰:“此宫之作,因极降灵,今建是宫为生民祈寿,于是奉闻大廷,敕封南极长生宫,上祝圣寿万年,宗支悠

① 明·朱元璋:《御制文集补》,《谕故真人张正常嗣子宇初敕》,见张德信等编《洪武御制全书》,第273页,黄山书社,1995年。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鲁荒王檀》,标点本第12册,第3575页。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传·湘献王柏》,标点本第12册,第3581页。

④ 赵本新:《武当山之宝与湘献王》,《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日第4版。

⑤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传·宁献王权》,标点本第12册,第3592页。

久”；“皇明天历正统柒年岁在壬戌拾贰月拾陆日，南极冲虚妙道真君立，永镇是宫，与天长存”^①（图4—17）。按，宁献王曾著有《翻仙肘后经》二卷，讲星命吉凶，方位日时等，说明他对于墓地卜选、安排等应该有一定的研究^②。另据《宁献王圻志》记载，宁献王“豫营坟园于国西山之原”，而南极长生宫也营建于他在世之时，这种特殊的寿藏布局应该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明朝诸帝对道教大多都有一定程度的崇信。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二月，明孝宗命于大德显灵宫作春祈醮事三日，礼科给事中于谓

“乞罢其事，且请上躬行节俭，减免赏赉，崇正道、黜邪说，裁革近年僧道官之传升、乞升者”。明孝宗说：“春祈秋谢斋醮，乃本朝旧典。给事中不谙事体，辄来奏扰，本当究问，姑宥之”^③。号称节俭的孝宗尚



图4—17 明宁献王陵前望柱上的符篆

①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② 明·朱权《翻仙肘后经》，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68册，第47—101页，齐鲁书社，1995年。

③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九，弘治十三年二月乙未，校印本《明实录》第31册，第2854页。

且循例如此,其他皇帝可想而知。明朝列帝中最崇信道教者是明世宗,“世宗忿髡辈之积蠹,焚慈恩、焚佛骨,而事玄之盛又十倍焉”^①。他崇信道教并不仅仅是出于宗教的虔诚,其根本出发点是祈祷长生,试图寻求不老之术,所有道教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展开。世宗以后,神宗亦曾召龙虎山真人张国祥入朝,虽不列朝班,但却以“祝延圣寿建醮”为词,久留不去^②。在这个背景下,嘉靖、万历之际道教相当盛行,这些在明代帝王的随葬品中亦有所反映。

明神宗身着皇帝常服下葬,并且手握念珠,但其棺内却仍然有8件道袍随葬,其制为交领绫面绢里丝绵袍,有签自称“大袖衬道袍”^③。此外,在定陵随葬的衣物、匹料上云鹤、杂宝等明显具有道教特征的图案也比比皆是。

先后落葬于嘉靖年间的益端王和益庄王玄宫中皆有八卦图案。益端王陵玄宫后室左右墙壁的第28、29两层砖上各刻划三个卦象,后壁及后室门的门框上,与左右六卦同一水平处也各有一个卦象,卦文图案处均填以朱砂;卦象的安排,乾在西北、巽在东南,与墓向一致^④。益庄王玄宫后室左右墙壁上各有三个卦象,前后两壁上各有三个卦象,其中坤象在南。另外,益庄王和元妃王氏棺内各有金钱7枚,其上亦有八卦图像^⑤;同样形制的金钱在益宣王棺内亦有发现,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主上崇异教”,谢兴尧标点本,第684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羽流不列清班”,谢兴尧标点本,第696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8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棨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⑤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都是为了随葬而特制。在益宣王继妃孙氏棺内还有一件镶玉金发箍,所镶玉人为寿星和八仙^①,亦为典型的道教题材。

道教是典型的中国宗教,其教义不甚严密,诸神谱系比较庞杂,一些民俗信仰神祇也杂侧其间;其宗教信仰还时常与一般迷信思想混杂在一起,法术、符咒、炼丹、房中术等等都是道家者流。在明代帝王陵墓中仍有不少现象介乎于道教或其他宗教与民间信仰之间,如几乎各陵墓中都见的长明灯、苓板上刻镂北斗七星排列等。还有一些现象只见于个别墓葬,其含义也各不尽同。

明代帝王陵墓中多见有铜镜随葬,除实用外,也有葬仪意义,一般都放置在棺内或棺盖上。除楚昭王陵中为半镜外^②,其他诸陵一般都是一枚,有些为两枚。蜀悼庄世子陵后殿中室中,在棺床的四角和前面正中部位的地面上各有一面铜镜,斜立于石镜台上,正照着棺床^③,其寓意不明。

在楚昭王陵玄宫门与圻志碑之间、棺床与供案之间,东、西、北三个壁龛的门坎正中,各有一“灵牌”,均为石质座砖质碑,形如神主。正面上刻符、下为篆字,涂朱;背面阴刻云龙纹。5件灵牌形质近似,但符、篆字及龙头方向不同;摆设方式均为正面朝外^④。估计它们是镇墓符一类的东西(图4—18)。

益宣王陵中元妃李氏棺内出土“冥途路引”一件,该路引为绵纸

①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③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图4—18 明楚昭王陵出土的
符篆牌

质,木板印刷,其上印有太上老君画像和“太乙救苦天尊”、“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证盟”等字,留空由墨书填写死者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填发路引日期等内容,并加盖带有道教符号和篆文的印章。出土时路引放在一个毛边纸的封套中,其上墨书“封”字,并加盖朱印(图4—19);封套和烧纸灰一起放在一个葛布袋中,葛布袋放于墓主盖被之上^①。据随葬品清单记载,江西南城益府罗川王墓中也有“冥途路引”一张随葬^②。

益庄王陵继妃万氏棺内有金钱、银钱各7枚,金钱上分别为魁、魁、魁等字,银钱上分别为

篆体文,武,以,廉,破,贪,禄等字^③;前者可能与星宿有关,后者寓意不明。江西南城益府罗川王墓中出土银钱7枚,其上各有一篆文星宿名^④,有牛、女、危、室等,可能是二十八宿中的玄武七宿。

①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榘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② 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

③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焜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④ 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

晋裕王陵玄宫后室外棺南头,约10厘米深的土中埋有6块小河光石,其上墨书离、丙、箕、景、财、田宅等字^①。其寓意不明。

甘肃兰州市上西园肃藩某郡王墓墓室的中央和四角各有一块镇墓石,其上分别朱书“镇星居中”、“岁星居左”等字^②。

对于上述这些现象,很难一一作出完全合乎实际的解释,但推究它们的核心思想和目的,无疑都应该是要保护墓主灵魂和遗魄的安宁,不受精怪侵扰,在冥间道途光明,早登彼岸。

为了保证墓主不受侵扰,中国古代墓葬中还常常以买地券的形式宣布墓主对于基地的所有权。买地券又称“墓别”或“地券”,系由人世间真实买地契约演变而来,最早见于东汉时期。历代买地券的内容和格式都在不断的变化,南北朝以后,迷信的内容占据了券文的绝大部分。券文大都注明,当墓主购买茔地后,便不会受鬼神的侵犯,不少券文中有明显的道教的烙印,有的还画有符篆。这类东西在宋金时期很流行,“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



图4—19 明益宣王陵元妃棺中出土之《冥途路引》(引自《文物》1982年第8期)

① 郭恩等:《明晋裕王墓的清理工作》,《文物考古资料》1956年第6期。

②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风俗如此”^①。明代已经是在墓中使用买地券的末叶,这类东西已经不多见,但在皇族墓葬中也偶有发现。荆端王次妃刘氏墓中有一块方形石质买地券,置于棺的东头(此墓坐东朝西),文字已经全部脱落,仅余朱色残迹^②。兰州上西园肃藩某郡王墓有一块方砖式买地券,黑底朱书,字已大部分脱落,可辨识者有“□府……东至……西至……”等字^③。这类东西在山东青州、临朐衡王及王妃墓中亦有出土,多为青石质^④。

“冥途路引”和买地券都属于民间迷信范畴,其制当不入国家典章。

第四节 明代皇陵祭祀制度研究

古不墓祭,自天子及于庶人皆然。自汉明帝推行“上陵礼”,把某些宗庙中的祭祀礼仪加诸陵园以后,唐宋等王朝踵而行之,祭陵之礼越来越隆重。明代的上陵人之礼虽不皆由皇帝亲行,但其仪式却更加制度化和正规化;与前代相比,不仅祭祀形式有所变化,祭祀的内涵和祭祀制度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陵上的献殿已经具有了宗庙的某些功能,山陵的实际地位甚至凌驾于宗庙、社稷之上。

一、明代皇陵祭祀制度概况

据万历重修《大明会典》记载,明朝诸陵祭祀制度并不完全划一,结合其他有关文献记载,将各陵祭祀情况分述如下:

① 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买地券”,吴企明点校本,第277页,中华书局,1988年。

② 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③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④ 青州博物馆:《青州博物馆》第261—268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1. 祖陵

祖陵置泗州祠祭署,设奉祀一员。有陵户 293 户,一说“泗州祠祭署,奉祠一人,以朱氏世官,朱本宗人婿也,陵户三百十四家”^①。每年冬至、正旦日各祭以三牲太牢;清明、中元、孟冬三节及每月朔望各祭以三牲少牢。

2. 皇陵

凤阳皇陵设皇陵卫及祠祭署,设奉祀一员、祀丞三员,有陵户 3343 户,从陵户子弟中选取礼生 24 名,专供祭祀执事。每年冬至、正旦祭以太牢,清明、中元、孟冬三节祭以少牢,由署官行礼;每月朔望各祭以少牢,由中都留守司官员行礼。“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敕内官一人监护”^②。百官以公事经过凤阳者,一律要赴陵拜谒。

3. 孝陵

孝陵为明朝开国皇帝之陵,祭祀礼仪比祖、皇二陵要隆重。孝陵设神宫监、孝陵卫和祠祭署,每年圣旦(在位皇帝生辰)、正旦、孟冬、忌辰(太祖帝后驾崩之日),祭以酒果,上香;清明、中元、冬至祭以太牢,遣勋旧大臣一人(后多为徐达之裔嗣封魏国公)行礼^③,南京各衙

^① 明·劳堪:《宪章类编》卷三,“泗州皇祖陵”,影印万历六年自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 46 册,第 480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② 明·劳堪:《宪章类编》卷三,“中都皇陵”,影印万历六年自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 46 册,第 480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③ 明·郑晓:《今言》卷二,“一百三十三”：“孝陵奉祀礼,专敕皇亲,如西宁侯骠马都尉宋琥是也。成化十五年,专敕魏国公徐備。弘治九年,備改守备南京,专敕骠马都尉杨伟。正德八年,伟卒,协同守备西宁侯宋恺兼行祭礼。正德十六年,恺还京,礼部请命南京协同守备丰城侯李旻奉祀。上曰:‘孝陵奉祀,先年有专官奉敕行礼,恁部里还议拟来说’。改敕魏国公徐鹏举,令掌南京中府事。盖琥、備、伟、恺、鹏举皆皇亲也。然自恺以协同守备兼掌祀事,而官无专设矣。亦或暂令守备代行,不为常典。嘉靖十三年,鹏举解守备,仍奉祀行礼”。李致忠点校本,第 79 页,中华书局,1984 年。

门文武官员陪祭。朝廷有大事(如新帝嗣位、皇帝大婚、立皇太子等)另专遣亲王或勋戚大臣祭告。另外,孝陵还有一种非常制的特殊祭祀,即“亲王之国过南京者、官员以公事入城者俱谒陵、出城者诣辞”^①。

4. 长陵及天寿山诸陵

天寿山诸陵各设神宫监、祠祭署和陵卫^②。诸陵之祭在嘉靖以前制同孝陵,每年三大祭、四小祭。清明、中元、冬至三节各祭以太牢,遣官(明中期以后多为世袭侯、伯或驸马都尉)行礼,文武各衙门堂上官、属官各一员随行,分至各陵陪祭。忌辰及圣旦、正旦、孟冬为四小祭,亦遣官行礼,但只用香烛酒果设祭,不备牲牢和神帛,各衙门官亦不陪祭。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七月,定制春秋两大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遣官行礼,各衙门陪祭;其余中元、冬至等节序依例遣官行礼,但不陪祭。陵祭至此演变为每年清明、中元、霜降、冬至四大祭,圣旦、元旦、忌辰三小祭。除了每年七祭以外,有时皇帝还亲自祭陵(有些是亲主春、秋之祭),朝廷有大事,另专门传制遣官祭告。

5. 景帝陵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影印本第3册,第1421页。

^② 天寿山十二陵各有陵卫,负责陵寝守卫,各卫由原普通军卫改建,即以本陵命名,事见明历朝《实录》。如长陵卫为原南京羽林右卫,献陵卫为原武成左卫,景陵卫为原武成右卫,裕陵卫为原武成前卫,茂陵卫为原武成后卫,泰陵卫为原忠义左卫,康陵卫为原义勇中卫,永陵卫为原义勇左卫,昭陵卫为原神武后卫,后又增设定陵卫、庆陵卫、德陵卫。据《明史·兵志·卫所》记载,诸陵卫皆属于亲军,不隶属于五军都督府。陵卫名称另见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衞衞集》,标点本第2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据《明英宗实录》卷二六七,《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八十五,景泰七年六月己亥,曾“改武成中卫为寿陵马[卫]”。见校印本《明实录》第20册,第5663页。

西山景皇帝陵祭祀礼仪同天寿山诸陵，初遣仪宾行礼，后亦改由驸马都尉主祭。

6. 显陵

湖北钟祥显陵是世宗父母的合葬墓，世宗尊崇本生父母，显陵之祭仪亦皆拟昌平诸陵甚至有过之。显陵设神宫监、显陵卫、祠祭署等衙门一如诸皇陵。置奉祀一员，由世宗母蒋太后之弟侄充任，主祭典；设礼生二十四名，供祭祀执事；设陵户六十户，供洒扫；设校卫二十名，供巡视。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升奉祀为都督僉事，仿孝陵之制由蒋氏世袭，“给钦差纯德山掌祀关防”，专司陵寝守护；又仿昌平诸陵之制，定例自太常寺中选补奉祀，并增祀丞一员。每年清明、霜降和睿宗帝后忌辰大祀；圣旦、正旦、中元、孟冬、冬至五节小祭，例遣守护奉祀官行礼。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照长陵之制，设左司乐一员、右司乐三员、俳长四名、色长十四名、教师十六名供祀”^①。陵园设教坊颇不合礼义，所以明人讥评说：“世宗人绍，报恩所生，如尊兴邸旧园为显陵，此情也，亦礼也。至推恩蒋氏，命为世都督僉事，令专典祀事，以比魏国公徐氏世奉孝陵故事，已为滥典。至嘉靖二十七年，增设伶官左、右司乐以及俳长、色长，铸给‘显陵供祀教坊司印’，独异天寿山诸陵，不特祀丰于祢庙傅岩犹以为渎，且教坊何职，可与陵祀接称！不几皇帝梨园子弟遗讥后世乎”^②。

明制，每年清明春祭毕，要给诸陵宝顶添上新土。皇陵封土加培，不晚于永乐时已有成例，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成祖北巡过凤阳，“谒祭皇陵，祭毕，上亲负土益陵。于是尚书夏元吉等皆负土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影印本第3册，第1423页。

^②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园陵设教坊”，点校本，第361页，中华书局，1959年。

以从”^①。据清初计六奇记载：“(昌平)十二陵,每陵遣三品官主祭,陪祭则六品以下二人,又勋戚一人为担土加坟事,旧例也”;“所加之土预贮于门右,一担一土簣,垒皆抹红在焉。祭毕,勋臣亲自肩乘,凡三上,余则总戎继之,则六上”^②。加土培坟至此已成为一种礼仪性的活动。

概而言之,明朝的诸皇陵祭祀之制,在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以前,为每年清明、中元、冬至三大祭,圣旦、正旦、孟冬、忌辰四小祭。大祭用牲牢、神帛、祝版,遣官行礼并由各衙门陪祭;小祭只上香、供酒果,虽亦遣官行礼,但不陪祭。世宗改制以后,为每年四大祭(清明、中元、霜降、冬至)、三小祭(圣旦、正旦、忌辰),但中元、冬至二节例只遣官行礼,各衙门官不陪祭,已颇类同于小祭。祔葬皇陵中的历代皇后忌辰亦遣官致祭,所以各陵的忌辰之祭非但日期不一,而且因各陵中埋葬帝后数目不等,小祭的次数亦因而不等^③。万历四

^① 《明太宗实录》卷八八,永乐七年二月戊子,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1172页。

^②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九,“祭十二陵”,魏得良等点校本,第340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明朝历代帝后忌辰,据历朝《实录》、《大明会典》以及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记载:太祖五月十日,孝慈皇后八月十日;成祖七月十八日,仁孝皇后七月四日;仁宗五月十二日,诚孝皇后十月十八日;宣宗正月三日,孝恭皇后九月四日,恭让皇后十一月五日;英宗正月十七日,孝庄皇后六月二十六日,孝肃皇后三月一日;景帝二月十九日;宪宗八月二日,孝贞皇后二月十日,孝穆皇后六月二十八日,孝惠皇后十一月十八日;孝宗五月七日,孝康皇后八月八日;武宗三月十四日,孝静皇后正月二十五日;世宗十二月十四日,孝洁皇后十月二日,孝烈皇后十月十八日,孝恪皇后正月十一日;穆宗五月二十六日,孝懿皇后四月十三日,孝安皇后七月十三日,孝定皇后二月九日;神宗七月二十一日,孝端皇后四月六日,孝靖皇后九月十三日;光宗九月一日,孝元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孝和皇后三月一日,孝纯皇后七月十九日;熹宗八月二十二日。另见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十七,《礼十二·忌辰》,标点本,第284—286页,中华书局,1956年。

十四年(公元1616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桂有根言:‘孝陵元旦、清明、长至三大祭,文物俱备;中元、孟冬、两忌辰及万寿节五祭,向止陈设酒果,应加用牲、帛、祝文’。从之”^①。如此,孝陵一年八祭,皆用大祭之礼。明代有记载说,嘉靖更定皇陵祀典原未改及孝陵,“上陵之礼,南京文武官凡八次,其在京师止清明与霜降耳。京师之礼,是嘉靖时所定,旧亦与南京同。当时改制,不知何以不并行南京”^②。明代各陵除每年固定的大、小祭以外,还有特祭,如国有大事遣官祭告、辞谒等,皆为非常举之典。

另据清初谈迁记载,他于甲午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在思陵听守陵太监许某介绍,当时天寿山诸陵“清明、霜降二节,具羊豕合祭于红门外;正旦、元夕、七月望、冬节各素祭,荐酒一卮;朔、望二十钱,燃寸烛,献茶三瓯”。又曰:“本陵(崇祯帝思陵)如庶人礼,朔望燃寸蜡、薰片香,正旦、七月望、冬至各蔬茹私荐,非出田租也”^③。而康熙时梁份等人所见,昌平诸陵“清明、霜降二祭,朔、望薰香,皆守陵内使司之,而供洒扫、司启闭则陵卒矣”^④。从这两条记载可知,在清初时明昌平诸陵尚有每月朔、望之祭,这不会是新增之礼,而应当是沿自明朝之旧。《大明会典》记洪武初年制度:祖陵“清明、中元、孟冬及每月朔、望,以三少牢,本署(祠祭署)官行礼”;皇陵

^① 清·夏燮:《明通鉴》卷七五,《纪七五·神宗》,影印清光绪二十三年湖北官书处重校本,第5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上陵”,谭棣华等点校本,第165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③ 清·谈迁:《北游录》,《纪卮上》,甲午年八月己未,汪北平点校本,第69页;《纪文》,《思陵记》点校本,第248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④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天寿山”,清汪鱼亭传抄本,第10页,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

“朔、望,以少牢,中都留守司官行礼”^①。《会典》中孝陵以下诸陵无朔、望之祭的记载,明人王圻记其本末为: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十月,“诏定陵寝朔、望、节序祀礼。时礼部学士乐韶凤等奏:‘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腊、社,每岁朔、望日则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则用节礼’。从之。后清明、中元、冬至日祭列圣陵寝,分遣勋戚大臣行礼,翰林官二员陪祭”^②。昌平十二陵的朔、望之祭应该是沿袭自明初的一种“俗礼”,其仪节既不见载于《大明会典》,则应该是由祠祭署官或神宫监太监行礼。

在诸帝陵之外,宣宗恭让胡废后、宪宗吴废后、世宗张废后皆别葬于西山,或祭以牲醴,或祭以素飧,俱遣太监行礼。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改定,别葬之后妃皆分别从祀于所属各陵。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二月以将行春祭礼,议制各陵从祀诸妃木位,“礼部因言:‘诸陵享殿帝后皆不设位,则妃附享宜以纸牌标设,祭毕焚之,永为定制’。报可”^③。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十月,礼部题请:“金山列圣诸妃,世宗皇帝特命并人各陵从祭。岁时享祀得以附于列圣左右,但各陵惟设诸妃几案,时享惟以纸牌列名号,前奉世宗皇帝圣旨置设木位,今尚未备,合应补造,恭置各陵前。前项祀典原出世宗皇帝圣裁,凡世庙诸妃并请迁附永陵一体从祀,其金山坟祭俱宜照例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影印本第3册,第1421页。

^②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三,《王礼考续·山陵》,影印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64册,第4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二七一,嘉靖二十二年二月辛卯,校印本《明实录》第44册,第5338页。

罢免”。皇帝准其所奏，“惟世庙诸妃仍旧祭于坟所”^①。各陵从祀诸妃多寡不等，“长陵十六案、献陵七案、景陵八案、裕陵十八案、茂陵十四案、泰陵无从案、康陵二案、永陵三十案、昭陵无从案、定陵无从案、庆陵无从案、德陵无从案”^②。

二、关于明代陵祭几个问题的讨论

明代皇陵之祭是朝廷中的大事，其祭祀制度对前代有所继承，但更多的则是创新。下面将着重讨论明代陵祭的场所及祭祀实质、陵祭与寝祭之关系、陵祭与庙祭之关系等问题。

1. 明代的陵祭场所和陵祭实质

从明代各处皇陵的布局来看，陵园中用于祭祀墓主的场所只有一处，即祫恩殿。祫恩殿亦即享殿，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二月，明世宗至天寿山亲行春祭礼，命改此名，“各陵殿旧名享殿，嘉靖十七年上躬祀天寿山，始名殿曰祫恩殿，门曰祫恩门。祫者，祭而受福之名也；恩者，罔极之思也”^③。祫恩殿是明陵享殿的正式名称，嘉靖改名以后各陵殿、门俱依制照新名书榜悬额，官方文献亦用此名，如《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六，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九月甲寅条下有“命修显陵裕[祫]恩殿及旧邸龙飞殿”^④的记载。但同样是在《明实录》、《大明会典》等明代官方文献中（包括嘉靖改名以后成书的），却

^① 《明神宗实录》卷六，隆庆六年十月丁卯，校印本《明实录》第51册，第224页。

^② 明·不著撰人：《太常续考》卷四，“长陵等陵事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9册，第17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③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〇，“陵园”，点校本，第135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六，嘉靖二十一年九月甲寅，校印本《明实录》第44册，第5267页。

保留了对于明代皇陵享殿的多种不同称谓,分别是:

(1) 皇堂:这是凤阳皇陵祭殿的正式命名。《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五,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闰五月丁巳:“皇陵祭殿成,命称曰皇堂”^①。以此名称陵上祭殿,似不见于以后诸帝陵。《明实录》中亦间或可见“皇堂”之名,但所指都应该是地下玄宫。如《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九月庚午,孝慈马皇后梓宫发引,“是日安厝皇堂”^②;又如《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三月甲申,以太皇太后将祔葬裕陵,敕太监李兴等:“其早夜勤慎,戒谕用工军夫匠作,各加敬谨,不许谗诬褻渎,皇堂内不许闲杂人等擅入”^③;再如《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甲辰:以世宗将安葬,“命内官往启永陵皇堂,预设明器”^④。按,宋陵玄宫即有“皇堂”之名,以避始祖之讳。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真宗崩,七月七日“礼仪院言玄宫上字理合回避,请只以皇堂为名,从之”^⑤。

(2) 享殿:这是历代皇陵祭祀之殿的通用名称,也是嘉靖改名以前明朝陵上祭殿使用最多的旧名,享在这里作“献祭”解。《明世宗实录》卷二〇五,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十月己酉:“以预作寿宫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五,洪武十二年闰五月丁巳,校印本《明实录》第3册,第1997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庚午,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342页。

③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弘治十七年三月甲申,校印本《明实录》第32册,第3897页。

④ 《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甲辰,校印本《明实录》第49册,第126页。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二十五册,卷七三四七,礼二九,“真宗”,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2册,第1076页,中华书局,1957年。

享殿,遣督工官等甘为霖等行礼”^①;《明熹宗实录》卷二四,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七月庚申:“庆陵享殿上梁,遣工部尚书姚思仁祭告后土”^②。又,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条下记载万历三年世宗孝烈、孝恪二后神主迁祔永陵仪式条下有云:“至永陵,由中门入,至享殿门外,内侍官各捧人”^③。

(3) 献殿:这是唐宋皇陵上宫中祭殿的通用名称,其本义即“献祭之殿”。明代有时亦沿用献殿之名。《明孝宗实录》卷八,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辛巳:“(宪宗)梓宫至山陵献殿”;同月壬午:“奉宪宗纯皇帝梓宫葬茂陵。……孝穆慈慧皇太后祔葬毕,奉迁官奉安神主于茂陵献殿”^④;《明熹宗实录》卷二,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月乙巳:“神宗显皇帝、孝端显皇后梓宫同至定陵,孝靖皇太后迁祔,俱于献殿奉安”^⑤;同书卷一四,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己亥:光宗“梓宫至庆陵,孝和皇太后梓宫同至,孝元贞皇后梓宫迁祔,俱于献殿奉安”^⑥。

(4) 陵殿:陵殿之名在元修《宋史》中有使用,神宗崩,陈美人(徽

① 《明世宗实录》卷二〇五,嘉靖十六年十月己酉,校印本《明实录》第43册,第4287页。

② 《明熹宗实录》卷二四,天启二年七月庚申,校印本《明实录》第67册,第1229页。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影印本第3册,第1429页。

④ 《明孝宗实录》卷八,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校印本《明实录》第28册,第167页。

⑤ 《明熹宗实录》卷二,泰昌元年十月乙巳,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73页。

⑥ 《明熹宗实录》卷一四,天启元年九月己亥,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693页。

宗生母,追封钦慈皇后),“守陵殿,思顾旧恩,毁瘠骨立”^①。从宋代皇陵平面布局和各部分建筑的实际功用来看,这里的“陵殿”,应该是守陵官人奉守的下宫中的寝殿。明代文献中的“陵殿”与宋代有异,其所指为“陵上之殿”,亦即陵中祭祀之殿的简称与俗称。《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三月癸未:“乃于陵殿神座奉移英庙居中,孝庄居左,而孝肃居其右云”^②。《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三,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十一月甲子:“诸妃岁时并祭于陵殿内,罢坟所祭”^③;《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七月乙卯:“元旦之祭在陵殿止用果酒者,非俭也,礼也”^④。又,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条下记载,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二月,“上躬行春祭礼,改陵殿曰祫恩殿,门曰祫恩门”^⑤。另外,《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四,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三月癸巳:“长陵殿成,奉安仁孝皇后神位,命赵王告祭”^⑥,这种“某陵殿”之称可能是明朝“陵殿”的最直接名源。

(5) 香殿:香殿一名似不见于前代皇陵,在明代也比较少见使用,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三,《列传·后妃·钦慈陈皇后》,点校本第25册,第8631页,中华书局,1977年。

②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弘治十七年三月癸未,校印本《明实录》第32册,第3896—3897页。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三,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甲子,校印本《明实录》第43册,第4080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七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55册,第3262页。

⑤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影印本第3册,第1423页。

⑥ 《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四,永乐十四年三月癸巳,校印本《明实录》第8册,第1915页。

推其本意或许是“上香之殿”，也可能是“享殿”的音转。《明宪宗实录》卷六，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六月壬寅条下记载：“裕陵成。其制：……香殿一座，五间……”^①；《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四月戊辰，工部尚书周嘉谟奏：“万寿宫香殿一柱腐朽，拟照南京孝陵享殿制用大木四面环抱，柱即坚稳”^②。又，万历《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山陵》条下，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显陵“香殿暖阁渗漏，重修”^③。

综上所述，对于皇陵祭殿的称谓，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以前多用“享殿”，亦用“献殿”，并有“香殿”等名；嘉靖十七年以后则多用“祫恩殿”，亦间用其他名称。有时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同名称并用。如《明穆宗实录》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记载世宗葬礼时即并用“享殿”和“献殿”，二月丁亥朔：“以永陵享殿兴工，暂移孝烈皇后神位奉安于席殿”^④。同月丁未，礼部进发引仪注：“将至陵，设席享殿于永陵献殿之右，执事官陈龙辂于享殿门外，梓宫升龙辂，由中门入，奉迁官由左门入，诣献殿安奉”。由此观之，即使是明朝官方文件，对于皇陵中祭祀大殿的称谓也并不严格。但毫无疑问，明代皇陵中的祭祀场所却只有祫恩殿一处，明代诸陵大祭、小祭皆于祫恩殿行礼，而别无唐宋等朝代“寝殿”、“便殿”之设。至于祫恩殿的祭祀性质，则可以通过祭品和祭祀仪式来具体分析。

① 《明宪宗实录》卷六，天顺八年六月壬寅，校印本《明实录》第22册，第157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辰，校印本《明实录》第65册，第11381页。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山陵》，影印本第5册，第2730页。

④ 《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丁亥，校印本《明实录》第49册，第97页。

祿恩殿上设帝后神位,诸陵大祭时于帝后神位前设正案,陈设之供祭品为:“每案木爵三,羊肉一,豕肉一,炙肝一,炙肉二,面食四,枣、栗、胡桃、(荔)枝、圆(眼)各一,汤一,茶饭各一,菜四,(帝后)二案共黝牛一,羊豕各一、奉先帛二段”;“八陵陈设同,惟裕陵三后加筵豆一案、奉先帛一段,不加牲”^①,茂陵、永陵等多位皇后合葬诸陵皆准此制。案前还供设香炉一、烛台二,右侧陈放祝版。皇妃祔祀,设从案,供品及陈设略同正案,但各位设素帛一段,不设牲牢、祝版。诸陵小祭,“长陵等十二陵,恭让、恭仁二陵,共一百三十七案,陈设俱同,各爵三、果五,无牲、帛、祝文”^②,五果为枣、荔枝、胡桃、圆眼、栗,案前设香炉一、烛台二。

遣官致祭的一般程序,按照《大明会典》所记:祭前先将牲醴祭品一一陈设,钦差承祭官由殿右门入,跪叩,三上香,四拜,奠帛、行初献礼,读祝,行亚献礼,行终献礼,四拜。读祝官捧祝版、进帛官捧帛至瘞位,礼毕。若皇帝亲祭,则由皇帝主祭行礼,程序同。其祝文依各节序而有所不同,但皆有定式,主题词依节序有变化,如清明云:“时维仲春,雨露既濡;追念深恩,不胜怵惕。谨用祭告,伏惟尚享”。霜降则云:“时维季秋,霜露既降;追念深恩,不胜怀怆。谨用祭告,伏惟尚享”等^③。各陵内容一致,惟祭文前所冠受祭享帝后尊谥有别。

从明陵享殿的祭享仪式和供品来看,供品中虽有饭、菜、蔬果等食物,但重点在于牲醴、祝文、香帛,祭祀时行三献礼、读祝焚帛亦合

^① 明·不著撰人:《太常续考》卷四,“长陵等陵事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9册,第17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 明·不著撰人:《太常续考》卷四,“长陵等陵事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9册,第18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陵坟等祀》,影印本第3册,第1427页。

于一般的祭神程序,而不是供奉墓主日常膳食。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中元节,张岱亲见孝陵祭典:“祭品极简陋,朱红木簋、木壶、木酒樽甚粗朴。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铗,黍数粒,东瓜汤一瓯而已。暖阁上一几,陈铜炉一、小筋瓶二、杯椿二;下一大几,陈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见如是”^①。张岱所感叹的正是祭品中食物之粗陋。由此也可以旁证明代的陵祭应该是略同于唐宋时期的上官献殿之祭,而不同于唐宋下宫之寝殿日享。

2. 明代的陵祭与寝祭

东汉蔡邕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②。通览全文,这里的“寝”或“寝殿”,所指应该是陵园中的“寝”,而不是宗庙中的“寝”。陵上寝殿是秦汉以来皇帝陵园中的重要建筑,唐宋时期一般称为“寝宫”或“下宫”。杨宽先生在所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中列表认为:战国秦汉陵墓中的寝由上古宗庙中的寝演变而来,继而递变为唐宋陵园中的下宫,而宋陵下宫中的前、后殿则演变为明清陵园中的五供台^③。笔者认为这一图表中关于宋明之间递变的推断并不合乎实际。宋陵下宫以英宗之永厚陵为例,“有正殿,置龙辂,后置御座。影殿置御容。东幄卧神帛,后置御衣数事。斋殿旁皆守陵宫人所居。其东有浣濯院,有南厨”^④。可见宋陵下宫为供奉衣

^①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一,“钟山”,标点本,第22页,作家出版社,1994年。

^② 汉·蔡邕:《独断》卷下,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④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三,“英宗葬永厚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8册,第15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冠、饮食之处,是继承秦汉以来之制的典型寝宫。而明清陵园中的石几筵台置放于明楼之前,其制为须弥座式长方形石台一,上陈香炉一、烛台和花瓶各二。石几筵台的实际功用,与其说是用来供奉香烛,倒不如说是在宝城入口处作一屏壁,起装饰作用,用以填补空间并衬托出明楼的高大,它显然并不具备“寝”的功能。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石几筵真如唐宋下宫一般不可替代,那么开创明清陵寝新制的孝陵却无之,岂不乖张。

明代帝王陵园中别无寝宫之设,这是它与前代陵寝制度的显著区别之一。明代两京及三处追封皇陵平时由太监洒扫,而别无宫女应差。司礼监外差中有“孝陵神宫监掌印太监一员,别衙门可升,不系司礼监也。辖本陵僉书、掌司,及谪种菜净军人等。天寿山守备太监一员,关防一颗。辖十二陵掌印、僉书、工部厂掌司等官。凡每年清明,亲率各掌印来京,奏添土木。每岁进松花、黄连、茶、核桃、榛、栗等果。各陵皆有晾果厂在京。凤阳守备太监一员,关防一颗,护卫皇陵。辖僉书数十员,兼管高墙犯罪宗室。湖广承天府守备太监一员,关防一颗。辖僉书数十员,辖承、德、荆、襄地方,护卫显陵,征收籽粒。每年进茶、扇、葛布、香茶、手巾”^①。西山景帝陵等亦由太监看护:“景皇陵、皇太子坟、王坟、妃坟、公主坟,各有掌府官一员,僉书十余员不等。以供修理、洒扫、看守香火。凡有祭祀,即本处掌府官行礼”^②。

^①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点校本,第9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明·刘若愚:《明官史》木集,“西山陵坟”,点校本,第5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刘著《酌中志》“西山陵坟”条下记为:“西山陵坟:景皇陵、皇太子坟、王坟、公主坟,各有掌府官一员,僉书十余员。以供洒扫、看守香火,凡有祭祀,即本处掌府官行礼”。见《酌中志》卷十六,“西山陵坟”,点校本,第12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明人记载说：“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诸陵；又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宫观，天下诸司亦于国忌行香，至宋犹有宫观行香之礼，外州不同也。汉唐以来，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沾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闻有此。本朝国忌，上陵及内殿有祭。诸陵惟中官洒扫，不遣宫女，皆前代所不及也”^①。但有迹象表明，明代陵寝制度建立之初可能一并保留了“寝宫”，在凤阳皇陵中就有“寝殿”之设置。据《中都志》记载，在皇陵享殿所在的内皇城以外、砖城以内，有“寝殿五间，膳厨五间，左、右庑各十间；红门三间，中门五间，西厢房一间”^②。不难看出，这组“寝殿”明显是一处自成系统小宫院，还特别备有膳厨，但其功能是否等同于秦汉以来事死如生的下宫，却无明文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万嗣达所增补的《皇陵总图》中，已经找不到这组建筑。因此，笔者推测，或许在凤阳皇陵营造之初仍沿唐宋之制设置有寝宫，后来不再有寝宫之享，原寝宫亦逐渐荒废。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可以进一步认为：明代皇陵中最初有寝宫之设，其废除应该是在洪武初年。至于《陶庵梦忆》谓孝陵“平常日二膳，亦魏国（世袭魏国公）陪祀，日必至云”^③，其说不见于他书，魏国公事亦不尽合情理，或得之讹传。

明太祖出身寒微，对于繁琐而刻板的古礼不感兴趣，他认为：“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能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筮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

^① 明·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一，张德信点校本，第4—5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② 明·柳瑛：《中都志》卷四，“陵寝”，《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618），影印明隆庆三年重刻本第2册，第41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③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一，“钟山”，标点本，第22页，作家出版社，1994年。

之,似亦无谓”。因而在制作太庙祭器时敕令“制宗庙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仪”;“于是造银器以金涂之,酒壶孟觶,每事皆八,朱漆盘盞二百四十,及桦梳、枕簟、篋笥、帙幔、浴室皆具^①。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六月,又按照这一原则制成太庙金祭器,为“每庙壶一、孟一、台盞二、爵二、碗四、肉碟十、菜碟十、囊四、匙二、箸二,茶壶二、茶盅二、香炉一、香盒一、花瓶二、烛台二”^②,所造者皆当世所用器型,而不用传统祭宗庙所惯用的筮、豆、簋、簠等上古器型。《明太祖实录》特记此事本末云:“先是,上欲造宗庙金器,因谕礼官曰:‘礼缘人情、因时宜,不必泥于古。近世祭祀,皆用古筮豆之属,宋太祖曰:‘吾先人亦不识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言可法。今制宗庙祭器,只依时常所用者’。于是造酒壶孟盞之属皆拟平时之所用,又制桦梳、枕簟、篋笥、帙幔之属,皆象其平生焉”^③。在祭品方面,也不尽泥古,“洪武十一年秋享太庙,太常奏:‘栗未熟,请以桃代’。上曰:‘诸祭果实不必常品,有即用之,著为令’”^④。明太祖的这种实际主义的礼制思想直接影响到明初各种祭礼趋于简化,而更加靠近现实生活。为了表达对生前极度穷困潦倒的祖先的追慕之情,明太祖下令在太庙以外另于宫中建奉先殿供奉祖先,以便随时展谒。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丙子,校印本《明实录》第1册,第484—485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三,洪武二年六月丁亥,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848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四三,洪武二年六月丁亥,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849页。宋太祖事见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宋)太祖初即位,朝太庙,见其所陈筮豆簋簠,则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礼器对。帝曰:‘我之祖宗宁曾识此!’命撤去,亟令进常膳”。李剑雄等点校本,第5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④ 明·郑晓:《今言》卷三,“二百三十五”,李致忠点校本,第134页,中华书局,1984年。

南京奉先殿建成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二月,位于宫门内之东,南向,正殿五间,深二丈五尺,前为轩五间,深一丈二尺五寸。殿成,命礼部制四代追封帝后神牌至殿内奉安,并命制四代帝后衣冠、诸祭仪用物及常用祝文。礼部奏定奉先殿祭仪:“每日朝晡,上及皇太子、诸王二朝,皇后率妃嫔日进膳羞,每月朔荐新”^①。其中月朔荐新之礼原于太庙中行之,此时移到奉先殿。《大明会典》把奉先殿的功能归纳为:“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时节献新,生忌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礼”^②,可见奉先殿比诸太庙,无论在祭仪上,祭品上,还是地理方位上,都更贴近于皇帝的现实生活,符合“如事生”之需要。

每月初一日荐新是奉先殿中的重要礼仪活动,其物品及数量为:“正月,韭菜四斤,生菜四斤,荠菜四斤,鸡子二百六十个,鸭子二百四十个;二月,芹菜三斤,苔菜五斤,冰若干,菱蒿五斤,子鹅二十二只;三月,茶若干,笋一十五斤,鲤鱼二十五斤;四月,樱桃十斤,杏二十斤,青梅二十斤,王瓜五十个,雉鸡十五只,猪二口;五月,桃子十五斤,李子二十斤;夏至,李子二十斤,红豆一斗,沙糖一斤八两,来禽十五斤,茄子一百五十个,大麦仁三斗,小麦面三十斤,嫩鸡三十五只;六月,莲蓬二百五十个,甜瓜三十个,西瓜三十个,冬瓜三十个;七月,枣子二十斤,葡萄二十斤,梨二十斤,鲜菱十五斤,芡实十斤,雪梨二十斤;八月,藕四十枝,芋苗二十斤,茭白二十斤,嫩姜二十五斤,粳米三斗,粟米三斗,稷米三斗,鳊鱼十五斤;九月,橙子二十斤,栗子二十斤,小红豆三斗,砂糖一斤八两,鳊鱼十五斤;十月,柑子二十五斤,橘子二十五斤,山药二十斤,兔十五只,蜜一斤八两;十一月,甘蔗一百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己巳,校印本《明实录》第2册,第1187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八九,《礼部·奉先殿》,影印本第3册,第1411页。

三十根,鹿一只,雁十五只,荞麦面三十斤,红豆一斗,砂糖一斤八两;十二月,菠菜十斤,芥菜五斤,鲫鱼十五斤,白鱼十五斤”^①。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宫中建奉先殿一如南京旧制,每月荐新供祭物品亦与南京相同,其中鲜笋、梅子、茭白、橘、柑、橙等南方蔬果,系由南京太常寺预先备办,送北京太常寺收受,再转光禄寺备用。

奉先殿中神主奉安位次与宫外太庙一致,而且同步升祧,即祧懿祖而升祧宪宗,祧熙祖而升祧孝宗等,已祧神主之衣冠、床幔、仪物等敬贮于神库。明制:太庙中一帝皆配一后,奉先殿中也是一帝配一后,明孝宗即位后,为了解决本生母妃纪氏的供祭问题,特于奉先殿西旁建奉慈殿以奉孝穆纪太后,此后,庶出皇帝本生母皆供祭于此殿中,一岁五享,月朔荐新,生辰忌辰祭祀礼仪一如奉先殿。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明世宗为严别嫡庶,下令皇帝本生母、本生祖母尊谥之末不再用“皇太后”,“太皇太后”字样,而概称“皇后”,但不系帝谥;奉慈殿中宪宗生母孝肃周太后、孝宗生母孝穆纪太后、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后神主俱迁于皇陵享殿供祭,罢奉慈殿之祀。同年十月癸卯,“上谕礼部,三后主奉迁陵殿礼成,朕宜往慰”;辛亥,“上诣裕陵、茂陵行奉慰礼”^②。奉慈殿罢祀以后,陵上之祭完全承担了庶出皇帝本生母庙祭之职任。这种庶出皇帝本生母别祭于陵寝之例,不晚于东汉时已有之,“永元(公元89—105年)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陵曰西陵。以窦后配食章帝,恭怀后别就陵寝祭之”;“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追尊其祖母宋贵人曰敬隐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寝祭,太常领如西陵”;“顺帝即位,追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八九,《礼部·奉先殿》,影印本第3册,第1412—1414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二,嘉靖十五年十月癸卯、辛亥,校印本《明实录》第43册,第4060、4066页。

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寝祭,如敬北陵”^①。明世宗罢奉慈殿之祀,下令迁神主于陵,应该是于史有徵。但可能是由于陵上享殿中原已有三后神主等原因,奉慈殿中诸神后牌实际并未出宫,而是暂存于奉先殿中,继后、庶出皇帝本生母宫内之祭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此后,穆宗生母孝恪杜太后、世宗孝烈方皇后之神主分别被供奉于神霄殿、弘孝殿中,亦未迁于陵园。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二后神主亦迁入奉先殿,遂罢二殿之祭。再后来,“神宗继母陈、生母李二太后俱附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设祭、服青”^②。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恢复孝宗时继后、庶出皇帝本生母合祭别殿制度,于奉先殿外建殿合祀诸后。

明世宗为了尊崇本生父兴献王,特于太庙之东建世庙以奉之,又仿奉先殿之制先后在奉慈殿后建观德殿、奉先殿之东建崇先殿,供祭兴献王。后来兴献王得到了皇帝--应庙享尊谥,神主亦入奉先殿,遂罢崇先殿之祭。嘉靖十五年迁建世庙,改名献皇帝庙(后改名睿宗庙,十七年以睿宗升祔太庙而罢专祭),旧世庙前殿改名景神殿,后殿改名永孝殿,奉藏列朝帝后御容。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令凡遇太祖帝后忌辰祭于景神殿,成祖以下帝后忌辰祭于永孝殿。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又恢复列帝后忌辰祭于奉先殿之旧礼。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明代的奉先殿之祭与汉、唐、宋等朝陵上之寝祭颇多相似之处,但其祀仪已大为简化,取消了宫人侍奉起居等项。可以认为:明代皇陵中虽然没有下宫,但寝祭并未完全消失,宫中的奉先殿承担了原先陵上寝殿的一部分功能。不过,奉先殿并不是陵

^① 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宗庙》,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197页,中华书局,1965年。

^② 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点校本,第198页,中华书局,1982年。

上寝宫的替代者,它还分担了一部分宗庙祭祀的功能,明孝宗曾说:奉先殿“与太庙寝規制一般,时常祭荐皆在此”^①。可以说,明代奉先殿之祭属于“礼顺人情”的宫内私祭,而不同于太庙的“国祭”。它既与三代庙中之“寝”不同,也和同时期的陵祭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3. 明代的陵祭与庙祭

明初在宫城外东南建“四亲庙”,明太祖四代祖先考妣即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夫妻各为一庙,德祖庙居中,懿祖、仁祖庙在东,熙祖庙在西,庙皆南向,各以其中室奉神主。这是明朝最初的宗庙。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开始改建太庙,次年十月新太庙建成,其制,前为正殿,后为寝殿,按照唐宋以来同堂异室之制,将祖宗合祭于一殿,两柱之间为一室,设神龕以奉神主。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旧制建太庙于宫城东南、端门之东(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即其旧址)。北京太庙前后两殿,仿古代“天子九庙”之遗意,各为九开间,建于三重台基之上,前为太庙大殿,时享、裕、禘等祭用之,后为寝殿,平时奉安列帝后神主及衣冠。东西两侧为两庑,供奉亲王、功臣等人神主,殿前为庙门(戟门),列二十四戟,门前为金水桥五座,再南为宫门。宫门、庙门旁各有向东西延伸的红墙,复折向北,共合围成内外两重宫墙。弘治初,为了奉安已祧神主,特在太庙寝殿之后建祧庙一座,其制亦为大殿九间,仿古“夹室”之义,殿外别建围墙及宫门,以与太庙前两殿分隔开。

洪武时太庙中供奉四祖,中德祖,东一懿祖,西一熙祖,东二仁祖,建文帝即位,升祔太祖神主于西二室,追尊懿文皇太子为兴宗孝康皇帝,升祔东三室。成祖即位,废兴宗庙享。迁都北京后,南京旧太庙改为四祖庙,供奉德祖以下四代追尊帝后,以追封太祖伯兄诸王

^① 明·李东阳:《燕对录》,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九,许大龄等点校本,第11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和功臣配享^①。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南京太庙被火焚毁,世宗令妥善保护遗址,不再重建,其址在今南京航空学院院内。北京新建太庙寝殿中神主位次一如南京旧制,诸帝后死后相继升祔,德祖居中,东一懿祖,西一熙祖,东二仁祖,西二太祖,东三太宗,西三仁宗,东四宣宗,西四英宗,至此九庙已满。孝宗即位,在讨论宪宗升祔时,有人提出太庙中当首尊太祖,追尊四祖宜依次奉祔,也有人认为当尊始祖德祖,后来议定,仍奉德祖居中,祔懿祖而祔宪宗,以后孝宗升祔而祔熙祖,武宗升祔而祔仁祖。每当有皇帝升祔,原有神主依次奉迁而递上。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明世宗认为太祖功德最高,不得上压于德祖,因命祔德祖而以太祖居于太庙寝殿中位,为不迁之祖,十七年又改上太宗庙号曰成祖,亦百世不迁。同年,世宗为本生父加上庙号曰“睿宗”,升祔太庙。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为解决本生父的供祭问题,明世宗曾仿古制分建宗庙,以旧太庙奉太祖,建世室奉太宗,二庙位于群庙之上。以下群庙三昭三穆,仁宗、英宗、孝宗三庙为昭,宣宗、宪宗、武宗三庙为穆,本生父献皇帝为世庙,位诸庙之东,各庙皆前殿五间,后寝三间,后以天火焚诸庙,于嘉靖二十四年恢复太庙同堂异室旧制,直至明末(图4—20)。诸神主在太庙寝殿及祔庙中各有龕位,帝后夫妻共用一大龕,为一室,皆南向,祭时捧至前殿,按不同次序排放供设。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八六,《礼部·庙祀一》,影印本第3册,第1367页。一说嘉靖火毁以前,南京太庙一直供奉追谥四祖、太祖帝后及成祖仁孝皇后。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南京太庙祀典”条记载南京奉先殿制度,“所祀者六室,一为德祖,二为懿祖,三为熙祖,四为仁祖,三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六为仁孝皇后。颛祀仁孝,盖以成祖在御日,未定都北京,故祀于南太庙。后长陵肇建,太庙立于京师,南京大内崇奉如故,而升祔之礼不行,故所祀惟后一位也”。谭棣华等点校本,第165页,中华书局,1987年。



图4—20 明北京太庙前殿(清乾隆朝重建)

明朝太庙之祭主要有时享、禘祭、禘祭等,洪武初还有月朔荐新,后改行于奉先殿,太庙中遂不存此礼。太庙时享,洪武初定为春正月上旬择吉日、夏四月初一、秋七月初一、冬十月初一及岁暮凡五祭,后改岁暮之祭为禘祭,时享遂为一年四次。嘉靖时曾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日为四季时享之日,后来又恢复旧礼。时享祭仪,祭前斋戒三日,祭日,自太庙寝殿中请出到列帝后衣冠(嘉靖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改为请神版,后复旧制),陈设于前殿预设神位之上,其位次,太祖居中南向,成祖等昭位帝后居东边西向,穆位帝后居西边东向,夹太祖而列,每代帝后神位前各陈设榘一、羊一、豕一、登二、鬯二、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白色“奉先制帛”二条,设爵六,陈香炉、烛台。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大祭,庙中共通设酒尊九,金爵十七,瓷爵三十四,篚九。诸祭器中所盛祭品,据《大明会典》所载:笾豆十二,笾分别装形盐、鼈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白面制)、黑饼(养

麦面制)、糗饵(米粉制)、粉糝(糯米糝糕);豆分别装韭菹(韭切去头尾,只留中段四寸),醢醢(猪肉鲊以盐酒料物调和)、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鱼醢、脾析(牛百叶细切以汤煮熟,调盐酒制成)、豚胎(猪肩肉)、饨食(糯米和羊脂、蜜熬成)、糝食(牛羊猪肉细切与粳米熬成)。簠、簋各二,分别盛黍、稷、稻、粱。登盛太羹(煮肉汁不加盐酱),铏盛和羹(肉汁加盐酱)。尊用以盛酒^①。

宗庙之祭不仅要供奉祭品,还要有乐舞以娱神,读祝文以敬神,其内容都是表达对祖先的仰慕和崇敬。

太庙祫祭,是将太庙寝殿和祧庙中的神主牌位悉数请至前殿合祭。明初太庙中无祧主,因而亦无祫祭之礼,只是四孟以外加岁暮之祭一年五享。弘治初,因祧懿祖,遂有祫祭之仪,于每年岁暮行之,嘉靖时曾一度改为腊月中旬择日行,后复旧制。祫祭之仪与时享略同,但更隆重一些。祫祭祭品同时享祭品,惟另加酒尊五,金爵十,瓷爵二十,篚五。神位排列,中德祖,东一懿祖,西一熙祖,东二仁祖,西二太祖,皆南向;太宗以下昭位居东,西向;仁宗以下穆位居西,东向。

嘉靖十年(1531年),明世宗欲仿虞夏禘黄帝、商周禘帝喾之礼而下令议设禘祭,定议三年一禘,虚设“皇初祖”之神位,奉太祖配享。后以其不经而罢。

明制,宗庙之祭在圜丘(天坛)、方泽(地坛)之下,社稷之上,陵祭则要等而次之,在官私文件中常可见到“天地宗庙社稷山陵”这样的固定行文排列顺序。但在实际操作中,陵祭似乎却更重于庙祭,这里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其一是明成祖“靖难”渡江,谷王开金川门迎降后,“文皇兵初入城,杨文敏公(荣)迎见马首,上问:‘何人?’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八六,《礼部·庙祀一》,影印本第3册,第1369页。

对曰：‘翰林编修臣杨荣’。曰：‘何如？’曰：‘臣请问殿下：今始入城，当先谒陵（孝陵）乎？先入朝乎？’上哑然，曰：‘固当先谒陵’。遽从之。既而，召文敏谓：‘非若言，几误乃事矣’。由是宠遇遂隆”^①。成祖以“奉天靖难”、“清君侧”为号起兵，军事成功后一时得意竟忘记了伪装，便欲直入宫城，杨荣则讽以当先祭祖，但祭祖之地不言近在咫尺的宗庙，却提出城外的孝陵，可见在时人心中除了固定程式的大祭外，陵寝比宗庙更重要。其二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驸马都尉巩永固上疏，请恢复建文帝皇帝身份，载入祀典，“崇祯帝曰：‘建文无陵，从何处祭？’盖建文之死，史谓葬以天子之礼，所葬之地，南中杳然也”^②。如为建文追补祀典，不仅有陵祭，更有庙祭，崇祯帝首先考虑到的是陵祭，而不是礼仪所重的宗庙祭典，这又是陵祭实际重于庙祭之一例。晚明蒋一葵在讨论昌平形胜时更直截了当地说：“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莫重于陵寝，戎莫重于畿辅”^③。

明代之所以会有这种陵祭与庙祭名实地位颠倒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古礼”与“今俗”的差异，或者说是“古理”与“人情”的差异。庙祭是载在三《礼》、传自上古的大典，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历代相因为首重；而陵祭即墓祭，为不见经传之典，但却因其发乎后嗣子孙之至情而长盛不衰。自汉明帝推行“上陵礼”以来，陵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后汉书·志》等书中就曾数见“陵庙”之辞^④，但山陵在礼法

① 明·祝允明：《野记》卷二，见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二，许大龄等点校本，第5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〇，“陵园”，点校本，第135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③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六，《畿辅杂记·昌平州》，点校本，第12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见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194页，中华书局，1965年。

上究竟不能超逾宗庙,于是这种悖反现象也就日益严重。时代越往后,人们对于人、神、鬼之际的认识也就越趋近于现实,就更认为人工制造的木主牌位远不如埋葬有先人遗骸的坟墓更真实、亲切。陆容的一段议论反映了明人对于庙祭、墓祭关系的基本看法,颇有代表性。他说:“古人谓墓祭非礼,故礼无墓祭之仪。朱子亦尝谓其无害于义。盖以孝子感时物之变,有不忍遽死其亲之心,不能不然,此说是也。抑又有可言者,葬后题主,谓亲之神魂已附于主,故凡有事荐祭,惟主是尊是亲。然为主之木,与吾亲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礼制所在,人心属焉。亲之体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载,安知委魄之后,神魂不犹依于此乎?盖魄有定在,而魂无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诸阳,或求诸阴,或求诸阴阳之间,不敢必也。故以墓祭非礼而不行者,泥古忘亲者也;行之无害也”^①。陆容之说虽是泛泛而论,但其中所反映的观念却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也反映了明人(包括皇室成员)对于宗庙和山陵关系的认识。再进一步说,明人对于宗庙为栖神之所之说多少有些疑惑,陆容已经有“为主之木,与吾亲平昔神魂素不相干”之妙论;比他稍晚的郑晓在谈到南京宗庙倾颓时,虽认为“宗庙火亦当复建,神所栖也”,但因为明太祖及追尊四代帝后的宗庙神版皆为两套,分别供奉于南京旧太庙和北京太庙中,所以他紧接着便提出了颇有些“大不敬”的疑问:“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②。吏部侍郎张元祜在为陈彦成撰《思礼堂记》时更进一步推衍说:“墓而藏,庙而祭者,周礼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备也。汉之时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见于三代而以为非礼,不能无

^①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二,点校本,第151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明·郑晓:《今言》卷三,第二百二十二条,李致忠点校本,第127页,中华书局,1984年。

惑焉。且墓而藏者，体魄也；庙而祭者，魂气也。魂气无所不之，墓焉，庙焉，孰有而孰无也？且人子之子亲，食焉则若见于羹，入其门则若见其坐于寝。视其杯棬而不能举，视其琴瑟书册而不相越，矧于体魄之所在，而可愒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庙以貌之、尸以象之、裸将以求之阴，薰香以求之阳，其体严以周，冢具而入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之所当益，而后世之所不可损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废不行也明矣”^①。这段文字把墓祭比庙祭更真切、实际的意思表述得很清楚，时代越晚，这种意识也越明晰^②。

①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一七，《义理类·思礼堂记》，点校本，第254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清代纪昀假借某书生遇亲族先辈之鬼魂于基地的对白，也阐释了墓祭重于庙祭的道理：“博山有书生，夜行林莽间，见贵官坐松下，呼与语。谛视，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谒，问家事甚悉。生因问：‘古称魄藏于野，而神依于庙主。丈人有家祠，何为在此’！某公曰：‘此泥于古不墓祭之文也。夫庙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来格，以是地是位为依归焉耳。如神常居于庙、常附于主，是世世祖妣与子孙人鬼杂处也。且有庙有主，为有爵禄者言之耳。今一邑一乡之中，能建庙者万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设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于亿万贫贱之家，其祖妣皆无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神之情状者，莫若圣人。明器之礼，自夏后氏以来矣。使神在主而不在墓，则明器当设于庙，乃皆瘞之于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于神所不至也，圣人顾若是颠耶？卫人之祔离之，殷礼也；鲁人之祔合之，周礼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则墓之分合了无所异，有何善不善耶？《礼》曰：父歿而不忍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母亡而不忍用其杯棬，口泽存焉耳。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顾以先人体魄，视如无物，而别植数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毋乃不知类耶？寺钟将动，且与子别。子今见吾，此后可毋为竖儒所惑矣’。生匆遽起立，东方已白。视之正其墓道前也”。（见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第70则，排印本第144—145页，华龄出版社，2002年）。这段文字虽然不能用来说明明代的史实，但可与前几段引述文献之主旨相表里，并且假先人之口说出，阐述更为明晰透彻，附载于此，以资参照。

根据以上引证我们可以认为:庙祭因为是“礼制所在”,不得不在名义上凌驾于墓祭之上,而且陵祭的规格也略低一些,其祭器也不尽同于太庙的笱豆之属。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十二月,太常寺奏进工部送到的长、献、景三陵祭器,计有:“硃红漆钺金一千九十事,素红漆三百八十三事,二硃红漆一百二十三事,金漆九事,硃红油二百五事,矾红油四十四事,明油一百九十二事,铜三百六十事,生铜九十事,熟铁五十四事,锡二十七事,象牙一百八事,杂物四百七十七事”^①。但在明人的实际生活中,陵墓的地位要远远重于宗庙,陵祭的地位也相当高,与古礼之规范不尽相同。明代皇陵制度对于清代皇陵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清代皇陵制度模拟明代皇陵制度而来,其皇陵祭祀之制亦承袭自明代并有所发展。清朝诸陵每年有五次大祭,即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和忌辰,每月朔、望皆有小祭。康熙时定制,世祖孝陵“安神位隆恩殿,制龕座、宝床、帷幔、衾褥、桦槐如太庙式”^②。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定皇帝亲谒皇陵之仪同太庙亲祭之仪,至此,皇陵在礼制上已经完全与宗庙并尊。

第五节 明代“陵山之祭”研究

明朝陵寝制度中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对于“五陵山”的崇祀;陵山,即皇陵所凭依之山。据《明世宗实录》、万历《大明会典》以及《明史·礼志》等文献记载,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明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九,《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十七,景泰元年十二月甲申,校印本《明实录》第18册,第4228页。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六,《礼志·谒陵》,标点本第10册,第2589页,中华书局,1976年。

世宗为四处陵山加上尊封,祖陵山曰基运、皇陵山曰翔圣^①,孝陵山曰神烈,显陵山曰纯德,并永乐时所封长陵天寿山号称“五陵山”,从祀方泽坛。这是中国古代陵山列入国家重大祀典之始,以后终明不改,清朝因之。

一、明朝“陵山之祭”的发展过程

明朝“陵山”崇祀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明初已有对于皇陵所凭依之山的单独祭祀,但此时“陵山”的概念尚不明确,所举之祭祀是直接源自自然神崇拜,即因工程需要而祭祀山神或“后土之神”。明制,皇陵兴建开工、维修、帝后入葬启土覆土等活动,都要告祭山神。如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九月“以孝慈皇后梓宫将发引,具醴饌告太庙,遣官致祭金水桥、午门等神。仍遣官祭钟山之神曰:兹以今月庚午安葬孝慈皇后于钟山之阳,成穆贵妃、永贵妃、汪贵妃祔,尚祈神祐,永保安宁”。次日马皇后发引,“是晚仍遣醴饌告谢于钟山

^① 关于凤阳皇陵陵山之名,明朝嘉靖、万历以来即并存“翔圣”、“翊圣”二说。“翔圣”之名见于万历五年修成的《明世宗实录》、万历十五年重修成的《大明会典》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刊刻《凤阳府志》等。“翊圣”之名见于成书于嘉靖四十五年、刊行于万历四十二年的郑晓所著《今言》,序于万历二十九年的徐学聚所著《国朝典汇》以及清乾隆时所修《明史》、《续文献通考》和清光绪三十四年本《凤阳府志》等。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世宗诏谕的最原始记录,笔者推测“翔圣”、“翊圣”两说并存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原名“翊圣”,后以“翔”代“翊”,以避明神宗御讳;其二是在书写刊布过程中出现的鲁鱼亥豕之误,后以北传说。避讳之推测有较大的疑问,即同样刊印、写成于万历时期的《明世宗实录》、《大明会典》、《今言》、《国朝典汇》等书何以讳与不讳并存?况且明朝有官门名不避御讳之例,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记载,皇宫厚载门及翊坤宫犯明朝世宗、穆宗、神宗三朝御讳却相因无改。陵山于礼重于宫阙,必无避帝讳之例。从“翊”、“翔”二字字义推断,“翔圣”似比“翊圣”更妥,所以本书于凤阳皇陵之山用“翔圣”之名。

之神,以复土故也”^①。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七月,“以营建仁宗昭皇帝陵寝于长陵之右,遣官祭告天寿山及后土之神”^②。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七月,“上将命工以是月庚申修献陵、八月壬午修景陵,预遣卫王瞻埏诣陵祭告,遣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祭后土及天寿山之神”^③。不仅皇陵,明代废后、妃嫔、皇子亲王人等修墓及安葬亦皆祭祀墓所山神。如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十二月,“以营建静慈仙师坟园毕,遣官告谢金山之神”^④;又,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十二月,“以葬卫恭王,遣官祭石景山之神”^⑤。这种祭祀活动都是因工而兴,它的祭祀对象虽然就是帝王陵所凭依之山神,但仅限于因工程动土而告祭山神后土,并非国家每岁必举的祀典。关于这一点,《明英宗实录》附载《废帝郕戾王附录》中的一条记载更为明确,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八月戊戌朔:“遣保定侯梁瑶祭天寿山后土及司工之神,以营建山陵香殿故也”^⑥。这种“后土之祭”古已有之,所以它还不能算是明朝“陵山”之祭的真正开端。

除因工而祭之外,明初对皇陵凭依之山的祭祀还见于山川坛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己巳、庚午,校印本《明实录》第4册,第2342页。

② 《明宣宗实录》卷三,洪熙元年七月戊寅,校印本《明实录》第10册,第85页。

③ 《明英宗实录》卷六,正统元年七月丁巳,校印本《明实录》第13册,第397页。

④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一,正统八年十二月乙未,校印本《明实录》第15册,第2236页。

⑤ 《明英宗实录》卷四九,正统三年十二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14册,第940页。

⑥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九,《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八十七,景泰七年八月戊戌,校印本《明实录》第20册,第5695页。

这应该是后来正式陵山之祭的最直接源头。

明初沿古制在京城南郊建山川太岁坛,用以祭祀天下名山大川、天上风云雷雨及星宿之神。据清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记载: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五月,礼部尚书牛谅等奏进“太岁诸神春祈秋报礼”,诸神分列,共十五坛,中为太岁等五坛,东为四渎(东渎淮河、西渎黄河、南渎长江、北渎济水)、京畿山川,西为钟山、甘肃山川^①。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建太岁坛,诸神共十三坛,“二月,祀太岁风云雷雨诸神于新坛,正殿祀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钟山凡七坛”^②。其中“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等“五岳”,“镇”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中镇霍山等“五镇”,“海”指东、西、南、北四海,“渎”指四渎,钟山即南京城东之紫金山。

成祖迁都北京,仿建山川坛于正阳门外西南,《明会要》说,新坛一如旧制,“惟正殿钟山之右增祀天寿山神”^③。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南京山川坛所祭之钟山,与北京山川坛所祭之钟山、天寿山在神祇身份上有本质的不同。这个问题可以从建陵与祭山的时间先后关系上来考虑,关于孝陵的始建年代,明人有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十四年(公元1381年)两说,而钟山之祀于山川坛是始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显而易见,它是作为京畿之名山,而不是作为“皇陵

^① 文下原注曰:“时新附,故山川祔祭京师”。见清·嵇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七二,“郊社八”,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第1册,第344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② 清·嵇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七二,“郊社八”,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第1册,第344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③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八,“礼三”,排印本第121页,中华书局,1956年。

所凭依之山”受祭的,也就是说,洪武时期山川坛中的钟山并不是“陵山”。但在北京永乐新建山川坛中,钟山既非岳、镇,又远离北京,它之所以受祭,虽然不能排除是因为留都南京,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因为是孝陵所凭依。如果认为这样推测尚根据不足,可以再参照天寿山之祭的背景来说明之。天寿山原名黄土山,本不见经传,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己卯,“仁孝皇后来葬,上命礼部尚书赵玘以明地地理者寥均卿等择地,得吉于昌平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①。对于此事,叶盛《水东日记》等书亦有相似的记载。明世宗后来推衍为“昔皇祖在此饮酒,是日万寿之日,百司臣庶上寿,因进名天寿山”^②。在建成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北京山川坛中,天寿山无疑是以皇陵凭依之山而受祭的。那么,位于太岁、岳、镇之下,天寿山之上的钟山似只能理解为孝陵所凭依之山而别无选择。因此,我们可以说,北京山川坛中的钟山、天寿山都是因皇陵所凭依而受祭的,明代“陵山”之祭应该是滥觞于永乐朝;只是此时的“陵山之神”的概念尚不十分明晰。

永乐以后,天寿山神的地位日渐重要,除了祔祀于山川坛以及动土告祭以外,皇帝到陵区祭陵,也要派人专祭陵山,并且这种告祭活动一般都在正式祭陵以前。如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三月,“上告奉先殿,遣官祭皇城门之神,车驾发京师,驻蹕沙河,遣礼部尚书胡濙[潑]祭天寿山之神”^③。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二月,明英宗

^① 《明太宗实录》卷九二,永乐七年五月己卯,校印本《明实录》第7册,第1202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六,嘉靖十五年四月戊申,校印本《明实录》第42册,第3946页。

^③ 《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九,正统十一年三月甲戌,校印本《明实录》第16册,第2756页。

到昌平祭三陵，“癸未，驻蹕天寿山；甲申，驻蹕陵下，遣礼部尚书胡濙祭告天寿山之神；乙酉，上祭长陵、献陵、景陵”^①。根据这张时间表，遣官祭告陵山一般是在皇帝亲祭祖陵之前一日。不晚于景泰末天寿山之祭规格进一步提高，在国家祀典中开始祔祀郊坛。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七月，太常寺奏：“今五岳、四渎皆在祀典，钟山以孝陵所在，附神主于中岳，每岁孟春祭南郊既合祀之，仲秋祭山川又专祀之；惟天寿山祖宗三陵所在，今又益以寿陵，犹未列诸祀典，请于每岁春祈秋报附祭天寿山神主于比〔北〕岳之坛，虽牲牢不加而事体寔宜”^②。此时钟山、天寿山神已经作为陵山之神而受祭于郊坛，只是分别祔神主于中岳、北岳，尚未完全独立。弘治时期，甚至还有向天寿山神祈雨之举，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五月，“礼部尚书张升以畿内及山东等处久旱，请各遣大臣祈祷。上命礼部左侍郎郭享杰祭告天寿山之神，分命各巡抚官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之神”^③，在这里，天寿山神已经成为主要的祷告对象。

对天寿山祷祭日隆，最终导致了嘉靖时期“陵山”正式从祀郊坛。《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二月戊寅，“上谕内阁：昨因议追祖陵、皇陵二山名，朕思孝陵在钟山亦宜同体，文皇帝既封黄土山为（天）寿山，今又拟显陵为纯德山，而独钟山如故，于理未妥〔妥〕，朕惟祖陵宜曰基运山、皇陵宜曰翔圣山、孝陵宜曰神烈山，并方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三，正统十三年二月癸未、甲申、乙酉，校印本《明实录》第17册，第3172页。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八十六，景泰七年七月庚辰，校印本《明实录》第20册，第5683页。

^③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五月丁酉，校印本《明实录》第32册，第3965页。《明史·礼志·祈报》记为：“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畿内山东久旱，命官祭告天寿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九，点校本第5册，第1278页。

泽从祀。以基运、翔圣、天寿山之神设于五岳之前，神烈、纯德山之神位次于五镇之序。仍预闻之祖考及命所在有司官祭告各陵山祇”^①。嘉靖十年是明代皇陵所凭依之山有正式命名之始，基运、翔圣、神烈、天寿、纯德，是为明朝之五陵山。

先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二月，明世宗主持议定分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于南北郊，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改订郊祀之礼并因而分建南北郊坛。封陵山之旨既下，安定门外北郊方泽坛的工程也即将告竣。于是，明世宗遣官告祭祖先诸陵、陵山之神，命礼部赶制陵山神牌，以应地坛大祀。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方泽坛举行祭皇地祇神大典，坛上层正中供奉皇地祇神位，北向，奉太祖高皇帝配享，西向。坛下层两侧分别供奉从祀诸神，东位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基运山、翔圣山、天寿山八神共一坛，神牌东设西向；其下为四海一坛。西位沂山、吴山、会稽山、医无间山、霍山、神烈山、纯德山七神共一坛，神牌西设东向，其下为四渎一坛。至此，“五陵山”正式成为庄严神圣之国家大祭中的从祀之神。它们所享受的祭品，据《大明会典》记载，五岳、基运山、翔圣山、天寿山一坛前设犊、羊、豕三牲各一，帛八(黄、青、红黑各一，白四)，登一(盛太羹)，镗二(盛和羹)，簠簋各二(盛黍、稷、稻、粱)，笾十(盛形盐、鳧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豆十(盛韭菹、醯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鱼醢、脾析、豚胎)，黄瓷爵三，酒盏三十，尊三，篚一。五镇、神烈山、纯德山神位前陈设同，惟减一白帛^②。

除北郊地坛外，五陵山还曾经被祭祀于天神地祇坛。嘉靖十一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二，嘉靖十年二月戊寅，校印本《明实录》第41册，第2928—2929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八三，《礼部·郊祀三》，影印本第3册，第1309—1310页。

年(公元1532年)改南郊山川坛为天神地祇坛,五陵山皆列祀于地祇坛中,逢辰、戌、丑、未之年的仲秋,由皇帝亲祭,其余年份遣大臣摄祭。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以天神地祇之祭与天地坛祭祀重复,乃罢其祭。

二、“陵山之祭”出现的原因

陵山之祭属于自然神崇拜之一种,其最久远的原因应该是起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于山川之灵的崇拜。山川之祭历代有之,自天子至庶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敬礼山川的行为,这在明朝也是得到普遍接受的。除此之外,陵山之祭之所以出现于明代,应当还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1. 明朝祭陵山,可能曾经受到金朝敕封“保陵公”的影响。据《金史》记载:“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册、香、币,使副使持节行礼,并如册长白山之仪。……是后,遣使山陵行礼毕,山陵官以一献礼致奠”^①。女真人有崇拜山神的旧俗,因而对其发祥地长白山和皇陵区大房山皆设神而祭(图4—21)。明成祖初选陵址颇费周折,“久



图4—21 北京大房山金诸帝陵远眺

^① 元·脱脱等:《金史》卷三五,《礼志·诸神杂祠·大房山》,点校本,第820页,中华书局,1975年。

未得吉壤”，派人遍踏京畿诸山，据《钦定日下旧闻考》引《宙载》等书说，当时曾有用京西潭柘寺旧基或大房山之议。金陵就在大房山，并且是当时近畿惟一的一处先朝皇陵区，明朝最初对于天寿山的祭享完全有可能受到过金朝封大房山为“保陵公”的启示。只不过金代“保陵公”之祭尚属于“诸神杂祠”，所赐冠服属于诸侯级别，而天寿山神却从一开始就有直追岳镇海渚的崇高地位。

2. 陵山之祭是明朝注重皇陵风水的一个突出表现。明太祖对祖先墓地的风水很重视，为了不泄“山川灵气”，他宁肯不改父母之微葬，仅对凤阳皇陵做地表的修饰。至于泗州祖陵，也有人认为当时知道太祖祖父熙祖的确切葬所，即杨家墩凤凰嘴（俗名“旧陵嘴”），“熙祖真体实于此安厝，野史之指述、诸书之记载，不啻指掌然。且往来堪舆有谒陵寝而谈风气者，靡不谓千里来龙至是结穴，时懿文太子与刘青田秘之，有深意存焉”，“洪武十九年始制帝后冕袞开此三圻葬之，其不动旧灵嘴者，恐泄王气，且德懿二祖原当招附故也”^①。为了子孙万世昌盛，明朝于陵址之选十分慎重，“南京钟山，太祖陵寝在焉，云气山色，一日之间，青、黄、紫、翠之不一，人以为气旺所致。……晋时已如此也”^②，于是卜孝陵于此；成祖欲归北而葬，久不得吉地，皇后便停丧六年之久。好的墓址，应该是背山临水，龙脉环护，藏风聚气，祖陵地势低洼，“山一片漫土”，便要堆土象山。其风水凭依更要东拉西扯，谓“前二百余里为大江，而陵后则明堂九曲，水绕玄武；又后为影塔湖；又后为汴湖；又后二百里为黄河；又数百里为泰山。大约五百里之内，北戒带河、南戒杂江，而十余里明堂前后复有

^① 明·曾惟诚：《帝乡纪略》卷一，《帝迹志·陵墓》，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第7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②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六，《天地类·钟山气色》，点校本，第108页，中华书局，1959年。

淮、泗、汴、河诸水环绕南、东、北,惟龙自西来稍高耳”^①。《帝乡纪略》虽极力推崇祖陵形胜,但也不得不承认:“基运山旧日只有墩阜,后复加上封之,自来惟呼万岁山”^②。至于皇陵,原先是朝南的,其北远处虽有山冈如屏,但却隔以中都城,于是改建皇陵时也改了陵的朝向,遥傍迤南诸山,后指大约 10 公里外之小岗峦善山(即翔圣山)为龙脉所来,尽管在皇陵处肉眼根本无法望到此山。祖先陵墓既然要凭山而建,陵址又多经过慎重选择,自然与众不同,理当崇以封典,使与五岳、五镇同尊。

3. 陵山之祭的出现与明朝皇陵地位日渐重要密切相关。明代皇陵在国家政治构架中的地位十分崇高,在官私文件中,山陵的地位次于天地宗庙,在社稷之上,因为是祖宗体魄所寄居,在实际操作中更在宗庙之上。明陵在每年四大祭、三小祭之外还有不时之祭,遇有雨旱灾侵还有祷祀于陵的做法。《大明会典》云:“国家凡遇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③。嘉靖十六年(公元 1537 年)八月,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顾鼎臣即奏请:“今岁夏秋多雨,京城内外房舍倾圮,军民多压死者。又闻南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江浙各被水灾,而湖广尤甚。……请敕顺天府及五城御史量行优恤,湖广灾沴重大,神人震惊,仍宜遣大臣一人前去祭告陵庙,遍祀山川,循行郡县,赈救安戢”^④。据《凤

^① 明·蒋德璟:《凤泗皇陵记》,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〇,“陵园”,点校本,第 1364—1365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年。

^② 明·曾惟诚:《帝乡纪略》卷一,《帝迹志·形胜》,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第 68—69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年。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八四,《礼部·郊祀四》,影印本第 3 册,第 1328 页。

^④ 《明世宗实录》卷二〇三,嘉靖十六年八月壬戌,校印本《明实录》第 43 册,第 4253—4254 页。

泗皇陵记》记载：泗州祖陵，“列圣承统，皆遣重臣祭告。景泰时以不雨，弘治时以大风伤陵树，嘉靖时以陵前山石坠、以基运山从祀方泽、以皇嗣未生、以修陵完工，皆遣重臣祭告”^①。皇陵地位日趋重要，皇陵凭依之山自然也就随之地位骤增。从明初山川坛中朦胧的陵山之祭，到正式封列陵山从祀地坛，便是皇陵地位提高在郊庙祀典上的一个直接反映。

除上述诸项原因外，明世宗要在“议礼”中不断提高本生父兴献王在宗庙、山陵祭仪中的地位，并且要通过一系列制礼作乐活动来显示外藩入继的新天子圣明，希冀垂法万世，也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促成明朝陵山封祀之典的最直接原因。

第六节 影响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变化的原因

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研究讨论了明代皇陵、王陵的陵园制度和玄宫制度，从中可以看出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前后有所发展变化，而各地藩王陵墓的差异性更大，它们既有时代先后之变化，也有时代相同或相近而地域不同的差别。从现有材料出发，很难归纳出明代帝陵、王陵简单的二级制度模式。关于制度变化问题，吕思勉先生曾指出：“一朝创制之时，未始不欲整齐之，使归于画一，然思想之变更既不能与事实之变更相副，则所定之制度，往往与实际不合，制甫定而潜行变迁之势已起于其中”^②。这段话虽然是仅就历代官制而发，

^① 明·蒋德璟：《凤泗皇陵记》，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〇，“陵园”，点校本，第136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65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但对于包括陵寝制度在内的多项古代制度分析研究皆具有借鉴意义。本节对影响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帝王个人旨趣的影响

明代帝王个人旨趣对于陵墓规制有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等其他条件的限制,起决定性的作用。明太祖对自己的陵墓非常重视,亲卜寿域,当孝陵陵宫建成,还将监督营造有功的李新“封崇山侯”^①,有明一代,仅此一例^②。从北京昌平陵区来看,由墓主生前自己督修的长、永、定三陵规模大大超逾其余十陵,其中长陵建筑最称雄伟,明宣宗说:“所建寝殿,皆皇祖当时规画”^③。据世宗、神宗两朝《实录》记载,永陵、定陵的许多规制也都是由世宗、神宗自己确定的,在卜选陵址,筹建兴工期间他们分别曾经数次以“谒陵”的名义亲至陵区勘察,明世宗曾指示李时、夏言等,寿宫“未尽事宜,俟朕仍亲往决之”^④;明神宗也曾“钦定寿宫式样、丈尺”^⑤。这些内容在

① 明·劳堪:《宪章类编》卷二八,“洪武作孝陵功臣”,影印万历六年自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46册,第92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 永乐七年营造长陵,十三年加封武义伯王通为成山侯,是拟李新例;但王通父王真及王通本人皆有“靖难”佐命之功,并非仅以营造山陵而得侯封。见郑晓:《今言》卷一,“二十七”,李致忠点校本,第15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明宣宗实录》卷六三,宣德五年二月丙申,校印本《明实录》第11册,第1495页。

④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辛未,校印本《明实录》第42册,第3958—3959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四,万历十二年十月己酉,校印本《明实录》第54册,第2847页。

前面已经提及,此处不再重复。此外,《北游记方》还记载了一则生动的传闻:“永陵成,世宗登阳翠岭,谓工部臣曰:‘朕陵如是止乎?’部臣仓皇对曰:‘外尚有周垣未筑。’乃筑垣,诸陵所无也,后定陵效之”^①。于是永陵、定陵就比诸陵(包括长陵)多了一道外罗城,将陵宫及宝城全部包容在内。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四月,工部尚书周嘉谟奏:“万寿宫香殿一柱腐朽,拟照南京孝陵享殿制用大木四面环抱,柱即坚稳。其对柱亦照样帮修,费工无多,匝月可完”。此时正在筹划孝端皇后的葬礼,所以工部希望节省经费,从简从速完工。但神宗却不准所请,坚持换柱,“命该部还同内监作速换安、修理,毋得延缓,至误典礼,责有所归”^②。陵制一旦由墓主确定,虽有奢僭之嫌,后世子孙亦不便轻易裁减。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闰二月,工部题奏定陵隧道已经填土完毕,请重议宝顶規制以速完工,并以钱粮匱乏上告,请求减少培土量。熹宗降旨:“定陵宝顶規制乃皇祖亲定,朕念在天之灵,何忍言减?!著照永陵丈尺培筑。该部每称缺乏,其费银俟朕凑给,仍作速并工,毋得借口稽延”^③,结果定陵宝顶仍依原拟,照永陵之制培筑。

相比较而言,皇帝死后由子孙主持营建的陵墓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仁宗临终前曾有遗诏说:“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浹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④。宣宗即位后,“及营仁宗皇帝山陵,

① 引自清·朱孔阳:《历代寝寝备考》卷四八,“明”,影印清道光本,第333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辰,校印本《明实录》第65册,第11381—11382页。

③ 《明熹宗实录》卷七,天启元年闰二月甲申,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334页。

④ 《明仁宗实录》卷一〇,洪熙元年五月辛巳,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306页。

上谕尚书蹇义、夏原吉等曰：‘国家以四海之富葬其亲，岂惜劳费？！然古之帝王皆从俭制，孝子思保其亲之体魄于久远者，亦不欲厚葬。秦汉之事足为明鉴。况皇考遗诏，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为宜遵先志，卿等之意如何？’义等对曰：‘圣见高远，发于孝思，诚万世之利’。于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书黄福总其事，其制度皆上所规划也”^①。献陵陵工三月即告竣，规模自然远逊于长陵，后来宣宗景陵因之，规制更为简陋。“天寿山七陵，惟景陵规制独小”^②。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四月，明世宗谒景陵，对随行的武定侯郭勋等人说：“景陵规模独小，文[又?]多损坏，其于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为勿称，当重建宫殿，增崇基构，以降追报”^③。景陵增建工程很快开始，至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告竣。但由于原来结构基址的限制，这次添建工程也只是“稍大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景陵的格局，所以清初顾亭林在昌平诸陵中所看到的情形依然是“献陵最朴，景陵次之”^④。

个人旨趣对于各地藩王陵墓规制也有较大的影响。如同卒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前后、身份相同的各藩始封王（包括深为明成祖所厌恶的辽简王）陵一般为用五室玄宫，而楚昭王朱楨在王位五十四年，守藩四十余年，其玄宫却只是简单的单室，这显然是个人因素使然。楚昭王墓发掘时保存基本完好，但仅出土300余件器物，

①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6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② 明·劳堪：《宪章类编》卷三，“昌平山陵”，影印万历六年自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46册，第48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六，嘉靖十五年四月辛亥，校印本《明实录》第42册，第3947页。

④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6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而且大都是明器^①,这也反映了他崇尚简朴,与诸王有异,或许真如其陵墓前碑文所云:“留心典籍,靡他嗜好。书十事座侧,旦夕自警,恭慎俭约,恒存省己”^②。明朝中期以后,亲、郡王陵墓规模大大缩小,而卒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的潞简王,却修建了地上地下都有“逾制”之嫌的奢华陵墓,其规模和材质令同时代其他藩王望尘莫及,这其中原因非一,但与潞简王本人的奢华个性肯定大有关系。

二、国家财力的制约

历代皇帝大都声称“天子以四海之富葬其亲”,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都不能不受到国家财力的限制。成祖长陵规模宏大,初建时只完成玄宫,次建成享殿,其神道石像生等皆建于英宗已继位后的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此距长陵之初建已经有二十余年。规模较小的献陵修建虽然只用了三个月,但其明楼却是在仁宗诚孝张皇后人葬后的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才开始建造的。英宗裕陵之建虽然只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但地上地下各项建筑完备,在诸陵中是属于进度较快的。到了明代中晚期以后,国家财用匮乏,皇陵营建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明世宗制礼作乐,大建坛庙山陵,造成了财政亏空,据南京吏部司务朱希皋奏称:“陛下践祚以来,增光前烈,郊丘有建、宗庙有建、皇陵有建、内殿慈宁宫有建,用之于公者广,而征之于民者数,司农告乏,屡行纳银之例,大行开矿之法”^③。隆庆六年(公元1572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② 转引自袁家新主编:《楚天名胜龙泉山》,第67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

^③ 明·范钦等:《嘉靖事例》“钱法”,影印明抄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51册,第15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年)五月,明穆宗死,为了节省建陵开支,经大学士张居正等人奉命相蹶,明神宗“诏建大行皇帝陵寝于大峪山”^①,利用世宗原为生母章圣太后准备的玄宫,当年九月即葬。山陵礼毕,张居正奏称:“恭叩玄宫,见其精固完美有同神造;宝城三面俱完,工甚坚厚,及周视山川形势,结聚环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时更觉佳胜,诚天地之奥区、帝王之真宅也”^②。但此后不到两年,即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六七月间,昭陵“祔恩门里外砖石沉陷”、“祔恩门、殿等处砖石沉陷甚多,至于宝城砖石翻坍损伤更为可虑”、“祔恩殿丹陛方墙等处沉陷闪动”^③,则当初营造时的工程质量可想而知。张居正本人并不迷信堪舆,他曾在归里葬父之际作《葬地论》认为:“若谓凭借地灵乃能垂荫后世,凡欲为子孙计者,速死而已,恶用生为乎”;“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叔季希覬之私、谬妄无稽之论也”^④。但他决不会因为力主节俭而公然拿皇陵质量当儿戏,昭陵地面建筑工程质量粗劣,应该是国库空虚和主持营造者蠹蚀的结果。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晚明陵工也常常拖延时日。光宗在位一月死去,利用景帝寿陵旧址改建山陵,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开工,七月玄宫基本完成,直到次年七月,享殿方才上梁,比起明朝前期来,工程进度明显迟缓。熹宗德陵之“神路创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庚申,校印本《明实录》第51册,第34页。

②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七,《山陵礼成奉慰疏》,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4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万历二年七月乙未,校印本《明实录》第512册,第675页。按,清·夏燮:《明通鉴》卷六六,《纪六六·神宗》和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十七,《礼十二·陵灾》皆引乾隆官修《通鉴纲目三编》记此事为:万历二年七月,“霖雨,昭陵地陷”。

④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一五,《葬地论》,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建五空桥一座,屡奉明旨,刻期报竣”^①,但直到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七月二十五日始安合龙门券石。到了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保卫昌平陵区的“陵后墙濠”工程,更只得靠“各官输助修浚”^②,明朝中央财政已经是匮乏不堪。

明代各地藩王陵的规模受国家财力影响更大。明制,皇帝子孙及其后嗣均是生由国家奉养,死亦由国家经营祭葬,不断呈级数增长的宗室人口给明朝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根据明人的统计,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五月时,“宗室载属籍者八千二百三人”,其中有“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三位,世子五位,长子四十一位,镇国将军四百三十八位,辅国将军一千七十位,奉国将军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镇国中尉三百二十七位,辅国中尉一百八位,奉国中尉二百八十位,未名封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位”;其人口繁衍之迹如周藩,“洪武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开封,一郡惟一王府。今则郡王三十九府,辅国将军二百一十二位,奉国将军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计矣”;而各府“宗室王二等、将军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罪庶人,凡五万余”^③。嘉靖末年宗藩供养已成朝廷严重负担,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五月,礼部仪制司郎中戚元佐上疏指出:当时“宗支人《玉牒》见存者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视国初不啻千倍,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礼部为德陵神路五空桥于七月二十五日安合龙门券石请遣官祭告事题稿》(崇祯四年七月初十日),影印本第10册,第2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兵部为宣大总督列报捐输助陵工各官员名钱数并请敕议叙事行稿》(崇祯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影印本第43册,第3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 明·郑晓:《今言》卷四,“二百七十六”,李致忠点校本,第159页;卷二,“一百四十”,点校本,第83页;卷二,“一百六十五”,点校本,第94页,中华书局,1984年。

即尽今岁供之输,犹不能给其半”;“昔高皇帝众建诸臣,皆拥重兵据要地,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堂无懿亲之迹,府僚无内补之阶,此又一时也;嗣是而后,骄侈渐盈,间作不典,法多圜上之收,辟有勒尽之惨,此又一时也。合则人多禄寡,支用不敷,乃有共室而居,分饼而膳,四十而未婚,廿载而不空(引者按,疑为“空”字之误),强者劫夺于郊衢,弱者窜入于舆皂,此又一时也”^①。而另一项止于隆庆、万历之际的统计则说,当时共有亲王25位,“郡王二百五十一位,将军七千一百位,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共七千七十三位。庶人六百二十,未封未名者与齐府高墙之庶皆不与焉”^②。到了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玉牒》收录的宗室人口已经达到十五万七千多人。从宗室方面来说,在屡减俸禄之后,加之克扣、拖欠,亲王、郡王尚可以维持自身的优裕生活,而将军、中尉以下诸人则往往人不敷出,支派疏远者更是无法自存于世。明成祖“靖难”成功以后,在实际操作中继续执行了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剥夺了诸王领兵出征等权利。以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宣宗亲征乐安,平定汉王高煦之乱为标志,宗藩已经完全置于朝廷的监控之下,成为坐食俸禄的寄生阶层。明人评论到:“嗣是天子揽权结网,收阿藏器,诸王分封后不得再入朝,出其王城必请护卫,不置亡繇臣,一切吏民为左官者,不得复任天子吏,诸王衣食租税,比君有卑”,而且因为“生齿日繁,邸禄岁窘,尚尔浮系一城,仰口待哺,于是裨王莫知南面之愉,支子

^① 《明穆宗实录》卷三二,隆庆三年五月辛酉,校印本《明实录》第50册,第843—844页。

^②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三,《朝端大政·宗藩》,影印明天启刊本第2册,第12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更起齐民之慕”^①。面对如此众多的宗室人口,无论如何,明朝政府再也无力把他们的生养死葬全部承担下来了。

各地藩王宗室建府、造坟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明朝中期的一份奏章云:“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與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蚊蠹,益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蓋之費約三萬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坟,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②。面对越来越大的经济支出的压力,正统、天顺以后,朝廷不断颁布新条令,试图从压缩亲王、郡王等人的坟茔规模人手,以期减少营造开支。“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奏准:亲王以下依文武大臣例,或王或妃有先故者,并造其圻,后葬者止令所在官司起倩夫匠开圻安葬。继妃则附葬其旁,同一享堂,不许另造。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令:亲王并妃照旧差官开圻,郡王以下止令所在官司量备工料开圻。十八年令:王府擅奏重修坟茔者,先将辅导官参奏。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令:亲王、郡王镇国将军各于始封父祖茔序昭穆葬,郡县等主于仪宾父祖茔安葬”^③。关于各王府造坟工价,“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定:郡王并妃三百五十两,镇国将军并夫人二百四十五两,辅国将军并夫人、郡主各二百二十五两;……十九年定,……郡王并妃冥器八十两,郡王六十两。二十一年定,郡王并妃开圻价银一百两,镇国将军并夫人八十两,辅国将军并

^①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六,“分藩记一”,影印明崇禎刊本第3册,第1968—19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明·林俊:《林贞肃公集》,《论宁府用琉璃疏》,见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七,影印明末刊本第1册,第776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③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1页。

夫人七十两,自开安葬。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令:郡王以下造坟并开圻悉照修府事例,价银减半送用。十四年奏准,郡王开圻价银五十两,止送四十两,余皆递减。……亲王及世子、郡王、镇国将军至郡王长子,斋粮麻布俱革免”^①。嘉靖以后,进一步压缩各王府和宗室的造坟开支,“(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题准:亲王并妃造坟开圻,行该省都、布二司派办夫匠,木石砖灰等料、合用冥器丧仪,一并造完送用。其铭旌纁丝、金箔龙凤钩,工部行文思院等衙门成造,候便领送。四十四年定:郡王、将军、中尉、郡县主君坟价一概免给。惟郡王及妃并郡主铭旌纁丝、金箔龙凤钩,工部行文思院成造候领。合用冥器丧仪等项,行该省照依递减事例给银自造。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议准:郡王初封系帝孙者,身后坟价照例全给,其余郡王量给一半;开圻合葬者免给,世子坟价与郡王同,将军以下一概停免”^②。为了减少王府造坟开支,对于庶出亲王请封母妃也有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十二月,尚书欧阳德议:“亲王之妾有子者许请封夫人;其子已袭封亲王、而嫡妃不存者,许请封为次妃。仍照例请敕知会,不给诰命冠服,及裁减身后祭葬”。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蜀王宣圻为生母已封次妃林氏请封继妃,部议准行,但“仪仗相传应用,冠服令其自备,身后祭葬,照例裁减”。礼部因奏定条例,著为令甲:“亲王生母封为继妃,郡王生母封为次妃,止于请敕知会,俱不给诰命冠服,裁革祭葬,情制两尽,无容议矣。今后请封生母者俱照此例,养母、庶母不得一概奏乞。如违,

^①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1—2732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王府坟茔》,影印本第5册,第2732页。

俱听本部参奏治罪”^①。到了明末,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皇亲国戚们的祭葬费更是无限期拖欠。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三月,“驸马万炜奏请瑞安大长公主(神宗同母妹)造坟工价。帝以费烦时诎,命于发引前先给一半,余续给竣事”^②。两年后的崇祯五年九月,“驸马万炜以瑞安大长公主于崇祯二年薨逝,坟价至今不给,具疏恳请。帝切责所司玩视,仍令于岁内全完,以称軫念懿亲至意”^③。

从上面这些材料中不难看出,国家经济实力对于明代王陵的营造规模有较大的影响,各藩造坟经费由政府全包,到亲王陵园规模缩小、郡王免给或减半、将军以下一概免给,这种政策的变化是造成明代王陵制度由繁到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于是,明代中晚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似乎是悖反的现象:一方面是正德、嘉靖以来整个社会的生活习俗日益奢华;另一方面,则是各地王陵的渐趋简朴。在各地藩王中,太祖诸子及其后裔、各府始封亲王的政治地位较高,经济实力也比较强,他们的坟墓规模相对来说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略小一些,其中万历年间的潞简王陵是一个极端突出的例证。

三、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

明代帝王陵墓的建制,有时也会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的影响。明太祖卜陵钟山,本欲子孙昭穆,鱼贯而葬,但明成祖却迁都北京,把自己的陵墓定在了昌平。明仁宗即位后曾于洪熙元年(公

① 明·李春芳等:《宗藩条例》卷上,“请封生母”,影印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59册,第376—37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 《崇祯长编》卷三二,崇祯三年三月庚寅,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三)第93册,第1846页。

③ 《崇祯长编》卷六三,崇祯五年九月辛丑,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三)第95册,第3632页。

元 1425 年)下令将国都回迁南京,但因其很快即驾崩而未成为事实,倘若还都南京成真,仁宗必不会再返葬北京,所以昌平十三陵陵区的形成本身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景帝在位期间为自己在献陵西旁黄山一岭卜建寿宫,并于景泰七年(公元 1456 年)先葬入了皇太子生母孝肃皇后杭氏,又据《明英宗实录》附载《废帝郕戾王附录》记载,景泰七年八月戊戌朔:“营建山陵香殿”^①;次年襄王入觐朝谒三陵时见到:“景陵明楼未建,而杭氏所葬明楼高耸,与长、献二陵相等”^②;这些记载表明景帝寿陵的地上地下建筑都已经基本建成。但几个月后英宗复辟,景帝被废,复为郕王,所营寿陵被毁,最终只得别葬西郊金山口,陵寝规制大大降低。后来利用景帝旧陵址为光宗建造庆陵,也是事出偶然:“庆陵俗名景泰洼。景泰时代宗建寿宫,英宗复辟,代宗葬西山,陵基遂虚。光宗宾天,仓卒不能择地,乃用此为陵”^③。

在明代亲王陵玄宫的诸种形态中,最令人费解的是益藩后几代亲王的特殊墓制,各陵均不建玄宫,而仅以青砖砌出椁室,上覆石板,棺与椁室之间填以石灰。已发现的实例有益宣王墓和益定王墓^④,这实际是一种很普通的墓穴之制,没有等级标记,一般官员甚至庶民都可以使用。益藩贵为亲王,为什么只用这种简陋的墓制呢?这当然可以推测为益藩诸王的个人品性节俭,如《明史》所说,端王祐檉

①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九,《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八十七,景泰七年八月戊戌,校印本《明实录》第 20 册,第 5695 页。

②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母后先祔庙”,点校本,第 93 页,中华书局,1959 年。

③ 清·王弘撰:《山志》二集卷一,“大明世系”,何本方点校本,第 173 页,中华书局,1999 年。

④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 年第 8 期;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2 期。

“性俭约,巾服浣至再,日一素食”;庄王厚焯“性朴素,外物无所嗜”;恭王厚炫“自奉益俭,辞禄二千石”等^①,加之江西供奉宁、淮、益三藩,地方经济贫困,不得不陵制从俭。但《明史》中也同样记载着益宣王翊钊“嗜结客,厚炫所积府藏,悉斥以招宾从,通聘问于诸藩,不数年而顿尽”^②。宣王如此不吝惜钱财,即使江西官府财力见绌,他也会自出府帑预为自己后事做准备,不致丧葬失之于简。因此,“简朴”这个判断显然站不住脚。

关于益藩不建玄宫的原委,在益藩诸王圹志中透露了重要线索。据《益恭王圹志》云:“先是,吴妃薨,营葬于南城县资盛山之原,比世孙(按,即益宣王)奉命开圹合葬,而水蚁交侵,哀恸几绝,权同吴妃厝于浅土。具书上请,亟图改卜,情词恳切。上嘉其孝,爰命壶[壶?]史金儒驻[往?]彼相视”^③。另据《益恭王妃吴氏圹志》记载,吴妃卒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五月八日,次年四月十七日,“葬于金华山左资胜山之原”^④。益恭王厚炫卒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闰八月二十八日,可知吴妃葬后仅三年多墓地即遭“水蚁交侵”,所以益宣王冒禁上疏要求改卜茔地。大约是金华山一带地下水位较高等原因,此处的益藩诸王陵皆保存得不好,益庄王朱厚焯卒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五月二十二日,次年三月十七日葬金华山,其元妃王氏先卒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合葬。据《益庄王继妃万氏圹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九,《诸王传·益端王祐楨》,标点本第12册,第3641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九,《诸王传·益端王祐楨》,标点本第12册,第3641页。

③ 明·佚名:《益恭王圹志》,引自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明·佚名:《益恭王妃吴氏圹志》,引自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9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志》记载,万妃卒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八月十三日,嗣益王翊钊“奏奉谕旨,扶柩附葬,开圹睹朽,更敛易棺,次年辛卯正月五日,重修勒石”^①。益庄王墓发掘时发现,益庄王及二王妃三棺并置于棺床上,棺四周砌有高1.2米的砖墙,墙内以石灰将三棺之间及棺与墙之间的缝隙填实^②。这种做法不符合明代一般的将棺椁露陈于棺床上的通例,棺隙间填充石灰,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防潮和防虫蚁设施。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是万历年间的两次“开圹睹朽”、“水蚁交侵”促成了益藩诸王玄宫制度的变化。砖砌石灰椁是取其防潮防蚁之用,非取其节俭,这是益藩玄宫结构简陋的最根本原因。这一变故同时也促使益藩诸王由卜陵于城南金华山周围改为建陵于城北七宝山一带。

除以上诸原因外,风水观念的限制、陵区制的限制等,也都是影响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奢俭的重要因素,这些已见于本章第二节,不再赘述。

^① 明·佚名:《益庄王继妃万氏圹志》,引自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51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见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第五章 余 论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讨论明代帝王陵墓的历史地位、明代陵墓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明陵的保护、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等问题。

第一节 明代帝王陵墓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前面四章的研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明代皇陵制度与前代相比是创新多而继承少,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经过辽、宋、西夏、金四朝之徘徊与元代之中衰,从明初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与前代相比,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第一,明代帝王陵墓的选址规则与汉、唐、宋等前代主要王朝不同,不是在高旷的平地或因山为藏,而是卜穴于山前的慢坡处,对于穴点和周围环境的选择标准主要依据传为东晋郭璞所著《葬书》中的有关理论。

第二,明代皇陵陵宫采用了全新的平而布局,其结构是仿自宗庙或皇宫的“前朝后寝”之制,分为三进或两进院落,陵宫门、祔恩门(享殿前门)、祔恩殿、内红门(或三座琉璃花门)、石几筵、明楼、宝顶都在一条纵向中轴线上。祔恩殿和明楼、宝顶分别取像“朝”和“寝”。亲王陵陵宫布局与皇陵大体相似,只是等制大为递杀,特别是

明朝中期以后,从总体上看,二者之间的差距更大。

第三,明神宗定陵玄宫为三主两配五殿结构,全部以石材砌成,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建筑法式合乎规范,在历代皇陵中洵属上乘之作。从理论上推导,明陵玄宫制度对于前代可能有所继承,但其独创性也不容忽视。从明初到万历年间以至以后,明代皇陵玄宫制度应该有所变化。天子玄宫用石、亲王玄宫用砖石混筑或纯用砖(潞简王陵等例外),也是一种等级差异;建材质地和颜色的差异是区分明代帝王陵墓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四,与前代相比,明代帝王陵墓的祭祀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取消了寝祭,陵墓上的祭祀场所惟有祔恩殿或称享殿一处。就皇陵而言,陵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时其实际地位甚至超逾了宗庙。这个现象,反映出明代皇家的祭祀观念虽未能摆脱三《礼》之规范,但和民间一样,已经更趋于现实。

第五,明代继承了两宋以来的陵区制,不仅皇陵如此,后来要求各藩王陵也遵用此制。明代皇陵的陵区制比之宋代更加彻底,各陵之间的距离更近;昌平陵区献陵以下诸陵的独立性较小,相对于长陵来说,都近似于从属之祔葬,首陵(祖陵)与子孙陵墓之间的等级差别十分明显。各地藩王陵墓也有类似现象,湖北武昌楚藩诸王陵、山东长清德藩诸王陵尤为典型。

第六,明代帝王后妃的葬式为仰身,肢体摆放比较随意;天子后妃重棺,亲王多用重棺,亦有用单棺者;随葬品中兼有实用器和明器,除器用模型外,明器中最多见的是俑,唐宋金元时期曾经流行的葬仪用品仍有孑遗。

明代帝王陵墓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本模式,它们既有用以埋藏帝王遗魄的实用功能,兼具娱悦亡者灵魂的祭祀功效;同时,还通过程式化、美术化的象征意义,实现了神化和强化

皇权的政治功用。明代帝王陵墓以其鲜明的创新特色,标志着中国古代陵寝制度走到了一个新的、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后的一个发展阶段。

第二节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对于清代 和民国陵墓建置的影响

明代创立了全新的帝王陵墓制度,相对于汉、唐、宋而言,它少有继承,但对于清代和民国的陵墓制度却有重大的影响。清代皇陵与明代皇陵相比是大同而小异,它们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

一、清朝皇陵概况

清朝自太祖、太宗建国,传十一世,十二帝,除末帝溥仪未建陵墓外,其余十一帝并四位追封先祖分葬于五处,分别在今辽宁新宾、沈阳,河北遵化、易县。清代皇陵制度在早期还保存有较浓重的关外习俗,康熙初年以后陵寝制度全面汉化,在明朝皇帝陵墓制度的基础上,又兼采了一些宋代等前代的制度,形成了自己的定制。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太宗称帝,分别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父为福王,父为太祖武皇帝。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世祖追尊泽王为肇祖原皇帝,庆王为兴祖直皇帝,昌王为景祖翼皇帝,福王为显祖宣皇帝。清圣祖即位后又改太祖谥曰“高”。清朝追尊四祖最初均分别葬于赫图阿拉(兴京),天命九年(公元1624年)四月,因得辽沈之地及迁都辽阳(东京),太祖命族弟铎弼等人到赫图阿拉奉迁景祖、显祖、伯父礼敦、继妃富察氏、孝慈高皇后以及皇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和长子褚英等人的遗骨到东京城

东北之阳鲁山安葬,举行了隆重的迁葬奉安仪式:“迎至接官亭,命束草为汉人形,放炮呐喊,斩草人以夺其地”。太祖亲读祝文曰:“吾征大明以复祖父之仇,遂得广宁辽阳,今迎先灵葬于所获之地,乞祖父上达天地神祇,冥中默祐可也”^①。阳鲁山之陵称“东京陵”。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六月,议政大臣鳌拜以钦天监地理官之议上奏:“兴京皇陵风水实系第一福地,请仍迁景祖、显祖陵于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陵旁,庶与风水有合”^②。经过一番讨论,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乃将二祖还葬兴京陵;次年,定兴京陵名为“永陵”。东京陵陵园中只剩舒尔哈齐、穆尔哈齐、雅尔哈齐、巴雅喇、褚英等人的墓,坟园由诸王自行管理,罢陵山祀典。清太祖葬盛京沈阳东北,名福陵;清太宗葬盛京城北,名昭陵。永陵、福陵、昭陵号称“盛京三陵”。入关后,九帝皆葬于京畿,世祖亲定兆域于京东遵化凤台岭,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在此建孝陵,封凤台岭为昌瑞山,此后圣祖葬景陵、高宗葬裕陵、文宗葬定陵、穆宗葬惠陵,又有昭西陵、孝东陵、定东陵等皇后陵以及五陵之妃园寝,这片陵区习惯上称为“东陵”。清世宗另择京西易县太平峪为万年吉地,建成泰陵。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封泰陵所凭依之泰宁山为永宁山。此后仁宗葬昌陵、宣宗葬慕陵、德宗葬崇陵,又有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诸皇后陵和四陵妃园寝,这片陵区习惯上称为“西陵”。

永陵在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启运山下,位于清兴京城(赫图阿拉)西北5公里左右(图5—1)。《清实录》中关于兴京皇陵最早的记载,是在太宗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二月,“清明节,遣官祭太庙、福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80—3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二,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3册,第788页,中华书局,1985年。

陵、兴京东京列祖陵”^①。此外，在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九月初一日的一条上谕中还提到：“祭太祖、列祖陵寝，照旧仍用大小牛只”^②，但这里并没有明确“列祖陵寝”的具体内涵，是否兼有兴京、东京二处，不得而知。从广义上说，水陵的最初建造时间应为先祖落葬之时，但这只是一般意义的墓葬，它作为皇室祖先陵墓而被合乎规范地祭祀，大规模兴建陵园应该是始于崇德朝（公元1636—1643年）。水陵葬四祖及太祖伯父武功郡王礼敦、叔父多罗恪恭贝勒塔察篇古，诸墓为捡骨迁葬或衣冠冢，没有正规的地下玄宫结构。陵园四周环以红墙，墙外设红桩74根，20丈外设白桩64根，约10里外再设青桩36根，是为陵区标志。水陵建筑在历代帝陵中比较特殊，红墙正南为前宫门，三开间硬山顶覆黄瓦。其北并列四祖碑亭，黄瓦歇山顶；再北为启运门，五架三间，单檐歇山顶；其后



图 5—1 清代所绘《永陵图》

下玄宫结构。陵园四周环以红墙，墙外设红桩74根，20丈外设白桩64根，约10里外再设青桩36根，是为陵区标志。水陵建筑在历代帝陵中比较特殊，红墙正南为前宫门，三开间硬山顶覆黄瓦。其北并列四祖碑亭，黄瓦歇山顶；再北为启运门，五架三间，单檐歇山顶；其后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二月癸未，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2册，第883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九月甲子，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2册，第53页，中华书局，1985年。

为启运殿三间,殿内设暖阁、宝座和神主牌位,东西有配殿,西配殿前有焚帛亭。启运殿后为墓冢区,有上下两层台基,上层台基之上有三堆大土冢,中为兴祖墓,东为景祖墓,西为显祖墓,兴祖墓东北为肇祖衣冠冢,不起坟;兴祖冢前植神榆一株。下层台基上有二堆小土冢,附列左右,为太祖伯叔礼敦、塔察篇古之墓。

福陵在今沈阳东郊浑河北岸的石嘴头山,俗称东陵。清太宗于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二月,“谨卜地于浑河北石嘴头山,川紫山拱,佳气郁葱。敬建宝城,用谶吉日,奉迁皇考梓宫,奠兹佳域”^①,孝慈高皇后、大妃富察氏同时自东京陵迁来合葬;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陵园基本建成,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又曾改建地宫,始成后来所见之规模。福陵建置比永陵规格高,占地面积19万平方米,居盛京三陵之首。陵园南向,建于三色木桩之内,四周环以红墙,中为正红门,歇山顶,拱券门三洞,左右列石牌楼、华表、石狮。门前下马碑上刻有满蒙汉回藏五体“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文字。入正红门为神道,两旁夹列石兽四对,为骆驼、马、虎、狮各一对,石兽的南、北两端各有华表一对。其后依山势为108级砖阶,上达山顶。前为重檐歇山顶碑楼,内立清圣祖御制“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碑楼之后为方型城堡,四角设重檐角楼,南面正中辟券门一洞,名“隆恩门”,上为三重城楼,每层各三开间(图5—2)。城堡内中心为隆恩殿,建于石台基上,陛三出,殿三间。丹陛栏板皆雕石为之,左右设配殿。隆恩殿之后为二柱门,紧接石几筵,再后即为宝城明楼和宝顶,地势逼仄。进入明楼券门内为月牙城,其后宝顶下即为玄宫。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二月己亥,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2册,第69页,中华书局,1986年。

清太宗病死于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同年昭陵兴工,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四月,太宗孝端文皇后病故,次年与太宗合葬;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陵工基本告竣,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又曾改建地宫。昭陵在沈阳城北,俗称北陵,陵园规制与福陵相仿,但建于平地。陵宫围以红墙,外设三色木桩,正红门为陵园正门,其南

有三阙石碑楼(图5—3)。入正红门为神道,旁列狮、獬豸、麒麟、马、骆驼、象六对石兽,其后为碑亭一座,神道石兽前及碑亭后各有华表



图5—2 清福陵隆恩门

图5—3
清昭陵石碑楼、正红门



一对。碑亭内立有清圣祖御制“大清昭陵神功圣德碑”，其后为方型城堡；隆恩门、殿之規制一如福陵，惟宝城之后土山为人工堆筑，顺治八年荐号曰“隆业山”。

遵化昌瑞山东陵，陵区东起马兰峪，西至黄花山，北接雾灵山，南有天台、烟墩两山对峙，中阙为龙门口。陵区以昌瑞山为界，分前圈、后龙两部分，周围开割宽 20 丈，长 380 余里的防火道，沿防火道设红桩，外 20 丈设白桩，外 10 里设青桩，再外 20 里以内为官山。昌瑞山下共有五座帝陵，四座后陵和五座妃园寝，葬 5 帝、15 后及妃嫔、皇子等共 157 人。孝陵居中，神路起自仿木结构六柱五间十一楼石牌坊，石牌坊北为大红门，三洞拱券式，旁设左右掖门。大红门内为大碑楼，内立圣祖御制“大清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楼重檐九脊歇山顶，四角各有擎天柱（华表）一根。往北向西绕过影壁山为石像生群，望柱一对导引，后为狮子、狻猊、骆驼、象、麒麟、马，立卧各一对，朝服文臣，甲冑武将各三对，总计人兽共 18 对（图 5—4）。其北为龙凤门三阙，过七孔桥、五孔桥，神道蜿蜒到神道碑亭，内立清世祖尊谥号碑。再往北即是孝陵的主体建筑——陵宫，分为前后二进院落，环以红



图 5—4 清孝陵神道（东陵主神道）

墙。正南为隆恩门,五开间,单檐歇山顶,左右为朝房,前有神厨、神库、宰牲亭等。前院主体建筑为隆恩殿(享殿)五间,重檐歇山顶,前为左、右配殿各五间,另有焚帛亭。往后经三座并列琉璃花门进入第二进院落,门内为二柱门,后为石祭台(石几筵台),再后过石平桥为宝城明楼、宝顶,宝顶下为地宫^①。孝陵东旁为孝东陵,葬世祖继后孝惠章皇后及世祖妃嫔。孝陵之东为景陵,葬圣祖帝后,神道自孝陵主神道分出。大碑楼内立世宗御制“大清景陵神功圣德碑”满汉文并列双碑,碑楼四隅各有华表一件。望柱导引石像生5对,为狮、象、马、武将、文臣各一对,皆立,后设五阙牌楼门。再后为神道碑亭、陵宫,制同孝陵。景陵之东为景妃园寝、景双妃园寝,葬圣祖妃嫔。复东为宝华峪宣宗废陵旧址。孝陵之西为裕陵,葬高宗帝后,其制如景陵,惟设石像生8对,为狮、狻猊、骆驼、象、麒麟、马、文臣、武将各一对,皆立。裕陵西旁为裕妃园寝。裕陵以西为定陵,葬文宗帝后,規制比较简约,无大碑楼,石像生为5对,其余同景陵。定陵迤东为定妃园寝和两座規制相同的定东陵,分别葬文宗妃嫔和慈安、慈禧两太后。景陵东南3公里双峪山为惠陵,葬穆宗帝后,規制更为简单,不设大碑楼和石像生,仅有望柱一对,且不与孝陵通神道,陵宫制度同诸陵。其西旁为惠妃园寝,葬穆宗妃嫔。东陵大红门外东旁为太宗孝庄文皇后之昭西陵,陵宫内部布局大体同孝陵,前有以下马坊和神道碑亭。昭西陵是搬迁皇太后生前所居宫殿改建而成,有内外两重宫墙,建筑規制与诸帝后陵不尽相同;它也是清朝帝后由火葬到改为保

^① 清孝陵各主要建筑名称均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为准,其余诸清陵皆沿用之。见清·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四三,《工部·陵寝規制一·孝陵》,据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石印本影印本第10册,第806—807页,中华书局,1991年。

留棺木葬, 丧葬礼俗汉化的标志^①。

易县西陵, 陵区北起奇峰岭, 南到大雁桥, 东起梁各庄, 西至紫荆关, 周围辟防火道, 设三色木桩标志及官山, 一如东陵。陵区内有帝陵四座、后陵三座、妃园寝三座, 葬 4 帝、9 后以及妃嫔和皇子、公主等总计 76 人。西陵首陵为泰陵, 始建于雍正八年(公元 1730 年), 竣工于乾隆二年(公元 1737 年)。泰陵规制仿自孝陵, 但又略有不同, 大红门前南、东、西三面各有石碑坊一座, 形制相同, 皆为仿木结构六柱五间十一楼。大红门内为大碑楼, 内立高宗御制“大清泰陵神功圣德碑”, 四角各有华表一根(图 5—5)。碑亭北为石像生五对, 为狮、象、马、武将、文臣各一对, 皆立, 前导以望柱。石像生后向东绕过蜘蛛山为三间六柱龙凤门一座, 再北为神道碑亭、陵宫。陵宫内隆恩门、隆



图 5—5 清泰陵神功圣德碑亭

^① 刘毅:《昭西陵与清朝帝后丧葬礼俗更易》,《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 年第 4 期。

恩殿、宝城等制度一如景陵。泰陵东傍为泰东陵,葬高宗生母孝圣宪皇后,又有泰妃园寝,葬世宗诸妃。泰陵西南 0.5 公里为昌陵,陵宫制同泰陵,葬仁宗帝后,神道通泰陵,其西傍为昌西陵,葬孝和睿皇后,西南为昌妃园寝,葬仁宗诸妃。泰陵西南 6 公里为慕陵,葬宣宗帝后。宣宗陵凡两建,原在东陵宝华峪,因地宫渗水而迁于西陵龙泉峪。慕陵建筑规制特别,既无大碑楼、华表、石像生,亦无方城、明楼诸建制;宝顶圆型,建于石台上,前无三座琉璃花门和二柱门,而代以三间石牌坊;隆恩殿三间,单檐歇山顶,月台无栏板,大殿全以楠木建成,虽不施彩绘,但雕饰精美,别具一格。慕陵东傍为慕东陵,葬孝静皇后及宣宗诸妃嫔。泰陵东 5 公里为崇陵,葬德宗帝后。崇陵规制完全同于惠陵,其东旁为崇妃园寝,葬德宗二妃。崇陵始建于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竣工于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在崇陵以东的旺隆村村北还有为宣统帝卜选的“万年吉地”,但尚未及勘定开工,清朝已告灭亡。

二、明清陵寝制度的异同

清代 5 处 12 座皇陵分别建于不同时期,其制度亦不尽相同。盛京三陵建于清初,它们随着后金——清政权的日益扩大和巩固而不断改建、添建,其制度也是逐渐完善的。三陵保存了不少满洲旧制,介于明清皇陵制度转型期之间,特异性比较突出。永陵硬山顶的前正门与普通坟冢,福陵和昭陵的城堡式陵宫墙垣、城门式隆恩门等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方特色^①。清初诸帝王歿后火化,再葬以骨灰罐,因此墓室比较简陋,有些墓甚至没有墓室,这是清初帝王陵墓制度中

^① 刘毅:《清初三陵制度述论》,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最具特色的部分。1981年6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对祔葬永陵的武功郡王礼敦、恪恭贝勒塔察篇古二人之墓进行了清理,二墓结构基本一致。其中礼敦之墓以青砖筑成,墓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98厘米、东西宽84厘米,墓壁上起半弧形券顶,上为四面叠涩递收攒尖式小顶,穴内最高处为96厘米。底部中央放置一块长宽皆34厘米、高7厘米的花岗岩石板,其上安设盛有墓主骨殖的瓷罐一个。穴内填充大量木炭,以单壁砖封门,其外再砌约1.5米厚的挡券砖垛,向上递收达于墓顶^①。1998年春笔者在东京陵调查时得知,东京陵中现存舒尔哈齐、穆尔哈齐、褚英三座寝园坟墓皆曾被盗,文物部门在清理过程中发现,各墓冢下亦无墓室,只有一骨灰坛。帝后火葬的习俗一直沿袭到康熙初年,孝陵中的清世祖、孝康章皇后(圣祖生母)、孝献皇后(端敬皇后)都是葬骨灰罐,直到圣祖亲政以后皇室贵族的葬俗才发生变化。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六月,“礼部请照例加四祖、太祖、太宗陵山封号,从祀地坛。命作速举行”^②。同年十月,清朝仿明制封祀“陵山”,“封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陵山曰启运山,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陵山曰积庆山,福陵山曰天柱山,昭陵山曰隆业山。遣多罗贝勒吞齐、固山贝子吴达海等祭告”^③。以此为标志,清朝的陵寝制度开始走向全面汉化。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世祖亲自看定风水的遵化凤台岭孝陵工程开工;同年九月至十二月,分别改建福

^① 方殿春等:《清武功郡王、恪恭贝勒二墓》,《辽宁文物》总第5期,1983年。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五七,顺治八年六月乙亥,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3册,第457—458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③ 《清世祖实录》卷六一,顺治八年十月乙丑,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3册,第480页,中华书局,1985年。

陵、昭陵地宫,估计二陵早先的墓室之制应当与礼敦墓相类,正是因其简陋过甚,才不惜惊动祖灵而改建。改造二陵地宫工程表明清朝规范化的陵寝制度已经确立,这次改建工程使福、昭二陵明楼以后部分的建筑格局与清代关内诸皇陵制度大体一致,新玄宫应该与正在兴建的孝陵玄宫制度相去无多,但从工程进展之迅速来推断,二陵玄宫的规模当不会太大。孝陵以后,清朝诸帝陵制度与明代皇陵制度非常相似,可以按照明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思路进行对比如下:

第一,清陵选址的风水标准与明代一致,甚至还有传闻说清朝关内第一陵——孝陵的风水还是明末勘定的。据清初查继佐记载:“崇祯初年,遍求天寿无吉壤,至十三年(公元1640年),始召刘诚意孔昭及张真人甲协视地,得蓟州凤台山,云地善而难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公元1644年)以后,不及事。后为董贵妃葬处”^①。蓟州凤台山就是遵化昌瑞山(在今天津蓟县与河北遵化交界出处,清代以来属遵化),考明思宗并无董氏妃,并且,按明朝制度,即使有某宠妃先卒也不可能预葬于皇帝新卜吉地,卒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七月的田贵妃就葬在了天寿山西南的鹿马山(又名锦屏山,后建为思陵)下。所以这里的“后为董贵妃葬处”之“董贵妃”,只能是清朝人,或许就是合葬孝陵的董鄂妃(端敬皇后)之讹传。

第二,清代皇陵陵宫平面布局与明代昌平多数皇陵相似,亦为前后两进院落,主体建筑的布局方式、建筑形式均与明陵一致,琉璃花门、明楼、宝顶等名称亦沿自明朝之旧,前院的隆恩门、隆恩殿,与明陵中相应的祔恩门、祔恩殿也仅仅是一字之差(图5—6)。

^① 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一六,“陵志”,标点本,第80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图 5—6 清孝陵神道碑亭、陵宫

第三,清代帝陵玄宫为前、中、后三室,与明神宗定陵“三主两配”之形式不同,而与文献记载中的明光宗庆陵结构相同,这是定陵式玄宫的简化形式,即省略了两个配殿。若按“明堂九宫”之制来说,清陵玄宫不但减省了四个个室,还减省了清阳太庙和总章太庙,而只保留了明堂太庙、太庙太室和玄堂太庙三个主要部分。根据“样式雷”工程做法档案资料的记载,清朝皇陵玄宫的前、中、后三殿分别名明堂券、穿堂券和金券(图 5—7)。

第四,清朝诸皇陵每年有五次大祭,为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和忌辰,每月朔、望皆有小祭。和明朝一样,皇陵之祭皆于享殿举行,而别无寝宫之设。除了固定大、小祭祀以外,清代凡逢遇国家重大庆典、武功告成等皆有祭陵之仪。官员因公谒陵,三品以上在罗城门外行礼。如遇祭日,二品以上许入城随守陵官陪祭;归京复命前要谒辞。皇帝亲祭陵,行前要躬告太庙,至陵于隆恩殿行大享礼。礼成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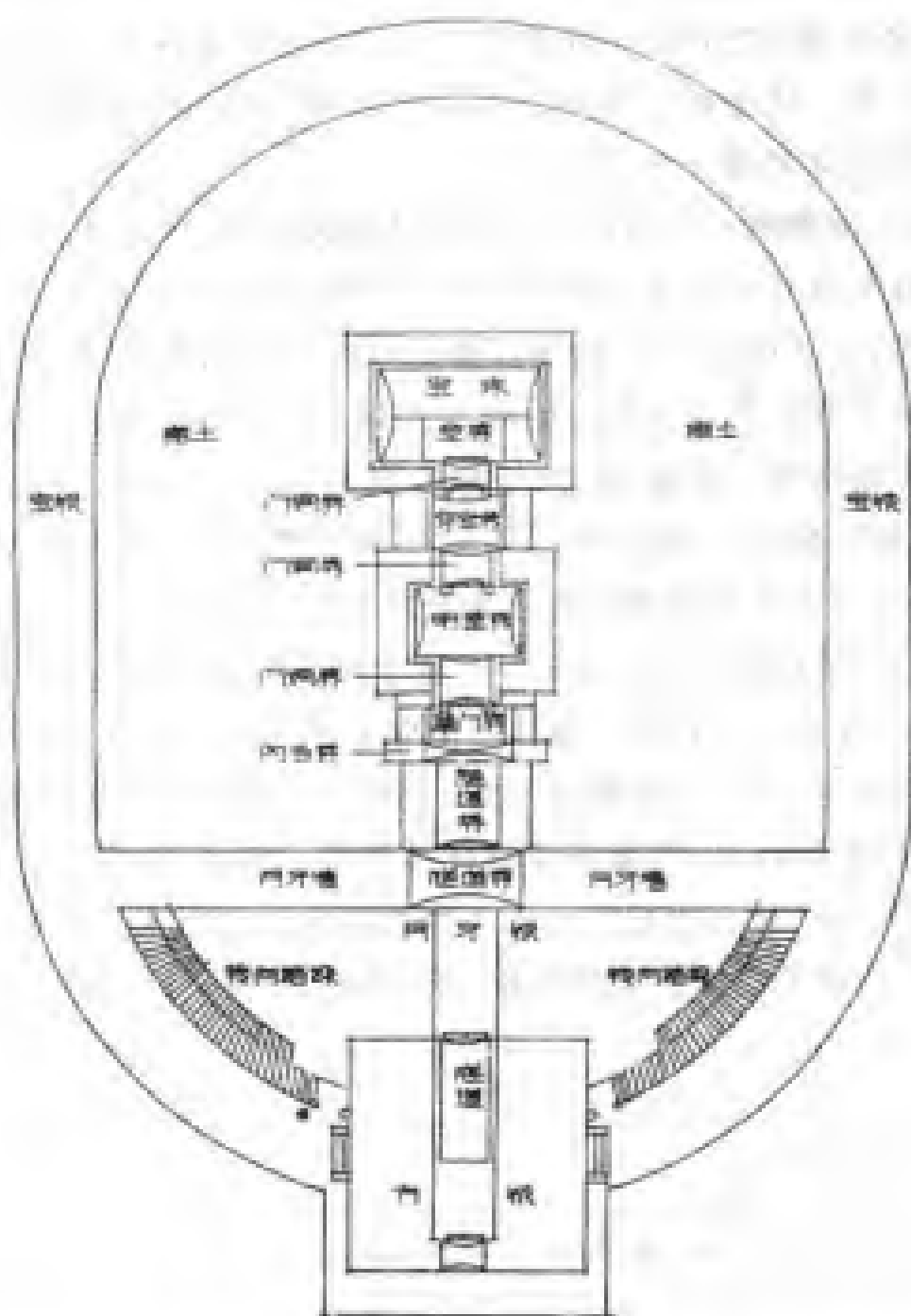


图 5—7 清“样式雷”昌陵地宫平面图(引自《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5 卷第 3 期,1935 年)

京仍告太庙,并出御太和殿,受百官表贺^①。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定皇帝谒陵之仪同太庙亲祭之仪,至此,皇陵在礼制上已经完全与宗庙并尊。从法理上肯定了山陵与宗庙齐肩并尊的地位,这是明朝重陵祭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清朝继承了明代昌平皇陵式的陵区制,父祖子孙不葬于同一兆域有不合礼义之嫌。清世宗以“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为由^②,对于为他在遵化陵区卜选的九凤朝阳山万年吉地的风水不满意^③。后来由怡亲王允祥、总督高其倬等人在易州泰宁山太平峪选择了寿陵址,世宗虽心喜其地,但却因与祖、父之“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不敢贸然开工,让大臣们讨论另处建陵“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于是大学士九卿会议上奏:“谨按《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自非一方独擅其灵秀,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于是皇帝表示“朕心始安”,正式下令另辟易州陵区^④。后来,清高宗考虑到若后世子孙皆依父祖而葬,则“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六,《礼志·谒陵》,标点本第10册,第2589页,中华书局,1976年。

^② 《清世宗实录》卷八九,雍正七年十二月壬寅,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8册,第190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③ 关于清世宗在昌平山陵区以外另择“万年吉地”的动因,清朝官方文献的解释是风水因素使然,史家则众说纷纭,有因“篡位”心虚而远离父皇、自高自大等种种推测。本师冯尔康教授认为“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迷信风水上”。见冯尔康著:《雍正传》,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清世宗实录》卷八九,雍正七年十二月壬寅,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8册,第190—191页,中华书局,1985年。

孝思而申爱慕”，于是将自己的寿陵卜定于昌瑞山圣水峪。嘉庆初年，他又念及“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意”，于是命仁宗万年吉地卜于西陵界内。并预嘱：“至朕孙纘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运庞鸿，庆衍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①。从而确定了清朝皇帝父子异陵区的祧葬之制，为了预防子孙依世宗成宪再另择陵区，他反复强调：不要听信形家术士的蛊惑，“遵化、易州两处山川灵秀宽广，其中吉地甚多，我子孙务须恪守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妨民业”^②。所以此后清朝诸帝实行京东、京西两个陵区的祧葬之制。

清代皇陵制度虽然基本仿自明陵，但在具体建制和平面布局上、在礼制方面，与明代相比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兹对比如下：

第一，明十三陵以成祖长陵为中心，子孙祔葬于同一兆域，有些设神道以达长陵，有些则自宗陵分之。除长陵外，其余诸陵均无望柱、石像生、龙凤门，更没有大碑楼，各陵属于自身的部分实际只有陵宫及神库、神厨等附属建筑，相对独立性要差一些；清代东、西二陵虽诸帝同兆城，相距也不远，但昌陵以上诸陵各有大碑楼、望柱和石像生、龙凤门或七间牌楼门等，而且大多都是自祖陵（或首陵）主神道分出本陵支神道，相对独立性更强一些（图5—8）。另外，明十三陵以长陵为中心，以长陵为基点考察，其余各陵惟自重风水卜址，长陵东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五，嘉庆元年十二月癸巳，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27册，第1023—1024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六，嘉庆二年三月乙卯，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27册，第1034页，中华书局，1986年。



图 5—8 清裕陵神道

西两旁皇陵数目对比悬殊(东 3 座,西 9 座)。清东陵则以祖陵居中,子孙序于祖祢之下(外旁),即孝陵居中,景陵居左,裕陵居右,宣宗初陵居于次左,文宗定陵居于次右,穆宗惠陵居于再次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昭穆制度。西陵的布局似考虑风水因素更多一些,但相对于首陵泰陵而言,慕陵仍然是居于昌陵之下。

第二,明代皇陵玄宫除皇帝外,还合葬皇后和嗣皇帝本生母,甚至孙辈皇帝的本生祖母。皇后先崩者或先葬入地宫,或权攒他处以待异日帝后同葬;皇帝已落葬,皇后或嗣皇帝本生母等人后死亦开启玄宫合葬,并不以年久为忌。这种现象很普遍,如仁宗皇后(宣宗生母)晚于仁宗 17 年,宣宗继后(英宗养母)晚于宣宗 27 年,英宗钱皇后晚于英宗 4 年,宪宗生母晚于英宗 40 年,景帝汪皇后晚于景帝 49 年,世宗本生祖母晚于宪宗 35 年,孝宗皇后(武宗生母)晚于孝宗 36 年,蒋太后(世宗生母)晚于睿宗 19 年,穆宗继后晚于穆宗 24 年,神宗生母晚于穆宗 42 年,皆合葬。这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帝后合葬。

清代皇陵合葬制度与明代迥异,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皆帝后合葬,但其中只有太宗孝端皇后之葬是再启玄宫,其余皆是帝后同时入葬。自孝庄文皇后另建昭西陵为始,凡皇帝已先死并入葬皇陵,玄宫石门既经封闭便永不再启,皇太后死后均单独建陵,于是在诸帝陵之外又有孝东陵、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定东陵等皇后陵。皇后陵无大碑楼、神道石仪、牌楼门等设置;除昭西陵、定东陵外,也不设神道碑亭;陵宫部分比帝陵降煞等制,惟定东陵略高些。昌西陵、慕东陵虽为皇后陵,但皆仿慕陵制度,只设大宝顶,而不建方城明楼。需要说明的是,清朝有一位先于皇帝而崩却未得葬入帝陵的皇后,即清高宗继后乌喇纳喇氏。她因为得罪高宗,既不得合葬裕陵,又不能单独起后陵,只是祔棺于裕妃园寝中纯慧皇贵妃券室内,并且在陵园、宗庙中均无祭享。清代帝陵玄宫除皇后、嗣皇帝本生母合葬外,还有一些皇贵妃从葬,此例创自景陵,景陵除一帝四后外,还葬有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此后诸陵效尤,泰陵地宫葬敦肃皇贵妃年氏,裕陵地宫葬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

第三,除南京孝陵外,明朝妃嫔之葬多不近帝陵,或在天寿山之东井、西井、银线山、袄儿峪、锦屏山等处,或远至于西郊金山口。清代列帝妃嫔则集中建园寝,各祔于所奉皇帝陵宫之左右。关内九陵,七陵有妃园寝(或名“妃衙门”),孝、慕二陵虽无之,但孝东、慕东二后陵中亦兼葬诸妃嫔。各陵之妃园寝亦为两进院落,前院为享殿,后院墓葬区,按位号尊卑排列先后左右,每人一小宝顶,一般不建明楼;主要建筑皆覆绿琉璃瓦。圣祖两位贵妃恣惠皇贵妃佟佳氏、惇怡皇贵妃瓜尔佳氏以保育高宗有功,特单独建园寝,宝顶前增设明楼,即景双妃园寝;高宗纯慧皇贵妃葬裕妃园寝前排正中,亦建有明楼,此三人为特例。

第四,明清陵园在建筑建置方面也有所差异。明陵中孝陵、长

陵、永陵、定陵诸陵之陵宫皆为三进院落,在祔恩门前还有一道拱券式宫门,清代诸陵皆无之。明朝诸陵在嘉靖时皆于陵宫前立石碑,但皇帝未遑撰文,遂成无字之碑;清代陵宫前石碑上刊皇帝庙号及尊谥,名曰“神道碑”。明陵祔恩殿之制:孝陵、长陵九间,永陵七间,其余诸陵皆五间,长陵殿重檐庑殿顶,其余诸陵多为单檐;清陵隆恩殿,除永、福、昭、慕四陵为三间单檐歇山顶以外,其余诸陵皆为五间重檐歇山顶。明朝诸陵除昭、德二陵外,明楼内皆无月牙城,宝顶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清陵宝顶一般是前方后圆,皇帝陵在明楼以内皆有月牙城(一名“哑巴院”)。皇后陵宝顶、宝城制度与大多数明朝帝陵相似,不设月牙城。明朝皇陵宝顶较大,宝城前端与陵宫墙相接,除永、定二陵各有一道外周垣以外,其余诸陵宝城之后部皆暴露于外;清陵宝城较小,成为陵宫三座琉璃门后第二进院落的中心建筑,方城明楼两侧延伸出卡子墙与陵宫两侧墙相接(图5—9)。从陵园朝向来看,明代诸陵除朝南或朝南略偏外,还有朝东、朝西者;清朝诸陵则皆朝南或朝南略偏。

第五,明清皇陵玄宫皆为石砌拱券式,明陵玄宫制度前后应该有所变化,其中定陵是前、中、后、左配、右配五殿,玄宫连同甬道前后长87.34米,左右横跨47.28米,总面积1195平方米^①。清陵地宫制度前后基本一致,以裕陵为例,玄宫分为明堂券、穿堂券、金券三殿,而别无左、右配殿,设石门四道,门上精雕佛像,地宫石壁皆满雕佛像、法器及经咒文。明堂券陈设谥册、谥宝,金券内设棺床,正中有金井一口,其上安奉皇帝之棺。裕陵地宫全长约54米,总面积372平方米^②。崇陵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于善浦:《清东陵大观》,第9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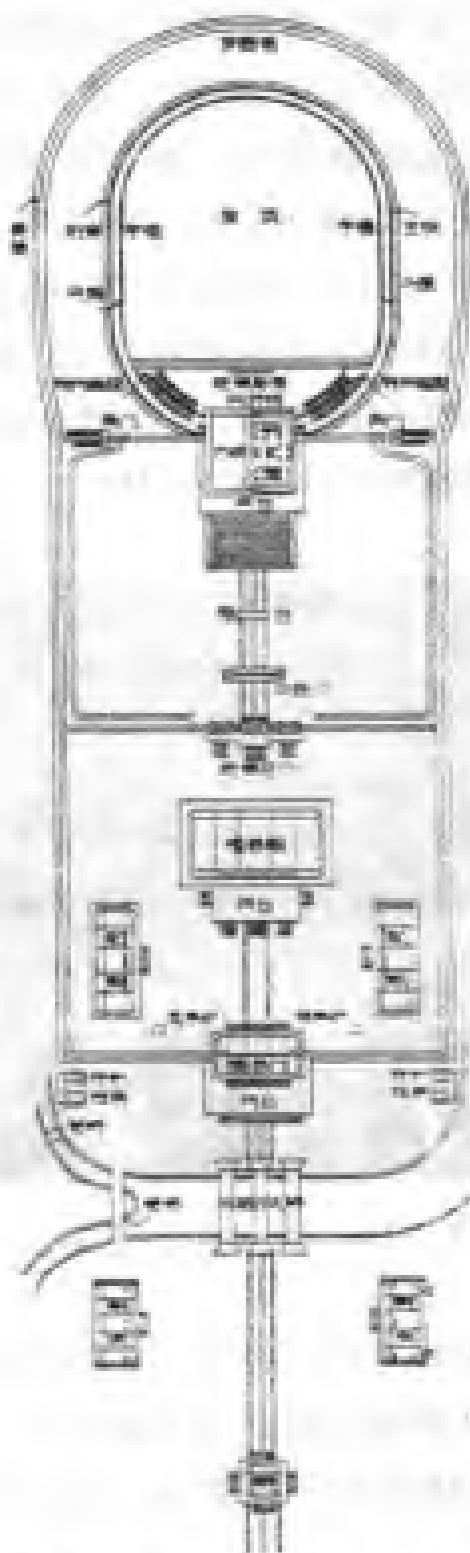


图 5—9 清景陵陵宫平面图(引自《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5 卷第 3 期,1935 年)

宫面积近 350 平方米,墓道终端后依次为金刚墙(封门墙)、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明堂券、穿堂券、金券。共有石门四道,石门及门框上皆有浮雕佛教造像或法器图案。斜坡墓道长 10.25 米,宽 3.80 米,自墓道至金券后墙全长 64.05 米。明堂券、穿堂券、金券为玄宫三室,其中明堂券进深 9.71 米,面阔 7.79 米;穿堂券进深 7.80 米,面阔 5.09 米,中高 6.30 米;金券进深 7.22 米,面阔 12.32 米,高 8.95 米^①,金券内有石砌宝床(棺床)。清陵地宫虽然比明陵狭小,但其雕饰之精美,却为明陵所不及(图 5—10)。



图 5—10 清裕陵玄宫石刻

第六,明朝太祖、成祖、景帝、世宗、神宗生前亲卜吉地,预建寿陵,其余诸帝都是死后才择地建陵。昌平陵区中,凡建于皇帝生前诸陵,规模都比较大,建筑材质也比较讲究;而死后所建诸陵则规模较

^①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清西陵崇陵地宫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0年第2期。

小、制度划一。清代从康熙朝开始,皇帝预建寿陵成为定制,“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①。皇太后凡卒于皇帝大葬以后者,既不能开启玄宫与先朝皇帝合葬,即在皇陵近处预建后陵。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其间只有穆宗早夭而未预择万年吉地,惠陵卜建于他死后;德宗和末帝都曾卜得吉地而未兴工。清朝关内诸陵,除慕陵外,各陵陵宫部分制度基本统一,所差惟在神道部分,后陵亦然。

三、明代陵寝制度对民国陵墓的影响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不仅影响了有清一代,而且直到民国时期仍可见其余韵,民国早期两位特殊人物的墓葬也分别留下了深浅不一的明陵印记,它们分别是河南安阳的袁世凯墓和江苏南京的中山陵。

袁世凯背叛民国、恢复帝制引来举国上下一致声讨,于1916年6月6日在忧惧中死去,遗嘱“扶柩归籍、葬我涇上”,其墓地在今河南安阳市涇水北岸之太平庄。袁墓始建于1916年,当时称为“袁公林”。其主体建筑依次为照壁、石拱桥、五阙石牌楼、望柱一对及石像生五对(马、虎、狮、武将、文官各一对)、碑楼、单檐歇山顶陵宫门五间、单檐歇山顶景仁堂(享堂)七间、三座铁花门、石几筵台、坟冢。袁墓建于平地,主要建筑皆覆绿琉璃瓦;除铁花门及墓冢略有西洋风格外,其余主体建筑皆脱胎于明、清皇陵中同类建筑,陵园平面布局亦与之相同。

中山陵在南京东郊紫金山之阳中茅峰下,传说墓址由孙中山先生生前自己选定。1926年开始兴建,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吕彦直先生设计,平面呈铎(或曰“自由钟”)型,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紫铜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五,嘉庆元年十二月癸巳,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27册,第1023—1024页,中华书局,1986年。

鼎台、三阙牌楼(博爱坊)、单檐歇山顶拱券式三洞陵门(“天下为公”额)、重檐歇山顶大碑楼、392级石阶、重檐歇山顶祭堂(“天地正气”额)、墓室。中山陵的建筑形式较明清皇陵相去甚远,已经完全不见帝王色彩的建置和装饰,但从其石牌楼、陵门、碑亭等主体建筑中仍然可以看出明陵制度的影响。

第三节 明陵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研究

现存的明代帝王陵墓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它们提供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帝王墓葬制度的实物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因而它们的保护、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也相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明代帝王陵墓的保护

明代的皇帝陵墓分布在江苏南京、盱眙,北京昌平、海淀,安徽凤阳和湖北钟祥等六地,共有18座皇陵(陵园)。其地面建筑虽有不少早已倒毁,但陵园结构却大体保存完好,遗址清晰可辨。明代的太子陵、亲王陵总数应该超过300座,其中正规的亲王级陵墓不会少于220座,还有一些保存比较好的郡王墓或墓群,如靖江王陵等,它们分布于今北京、南京以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宁夏、甘肃、山东、广西等省市自治区。各地明代王陵完整或基本完整保存至今的甚少,有遗迹或明显遗址可寻的不足百座。这些皇陵、王陵是研究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皇族史、宫廷生活史、文化史、建筑史以及其他一些专门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对于明代帝王陵墓进行有效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

至少有以下几项工作切实可行：

1. 清理遗址

将淹没于断壁残垣和蓬蒿之中的明代帝王陵墓遗址界划出来，将遗址上的杂物清理干净，使其原有建筑格局、规制一目了然，这实际上是一种既简便又行之有效的保护行为。南京紫金山下的懿文皇太子之“东陵”，经过清理发掘后，已经建成遗址保护区，和明孝陵一起对外开放^①。各地明陵遗址的保存程度并不一致，有些仅仅是为荒秽所笼罩，清理工作相对容易；有些则经过后代改建甚至改做他用，工作起来就比较复杂，比如昌平陵区一些陵宫毁于明末清初，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三月，清高宗行幸汤泉途经昌平，到长陵致祭，“见诸陵寝明楼、享殿多有损坏，神牌龕案亦遗失无存，为之慨然弗忍视”。于是命令“重加葺治，增设龕位，俾臻完备”，各陵皆恢复祭享；并表示：“此次修复诸明陵殿宇等工，即费至百万帑金亦所不靳”^②。但乾隆朝这次大规模的修复工作并没有完全依照明制，不少殿宇都被利用旧料拆大改小，因而至一二十年前陵区百姓中仍流传着“乾隆爷，心不公，拆大改小十三陵”的说法。因此，昌平陵区长陵、思陵以外的十一陵要恢复明朝建筑遗址的原貌（如享殿柱础、明楼形式等），尚须有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

2. 有限的复原和发掘

为了便于陈列展出上文物以及其他与陵寝相关的文物之需要，可以对陵园中的享殿等建筑进行修复使用。如神宗定陵的出土文物原先曾陈列于定陵明楼前面左右两所临时建筑中，既不安全也

^① 徐机玲：《南京兴建首座帝王陵遗址公园》，《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1日第2版。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六，乾隆五十年三月甲寅，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24册，第433—434页，中华书局，1986年。

破坏了陵园原有建制、有碍观瞻。后来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将这批文物移至长陵祿恩殿陈列,这样虽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却往往会给非专业观众带来疑惑,即这些文物到底是哪个陵出土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重建定陵享殿,以备作定陵博物馆展厅使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修复工作不宜过多,而且一定要坚决做到“整旧如旧(明制)”,如果仅仅为了旅游等方面的需要,凭空添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建筑,不仅会对观众造成误导,而且更与文物保护工作理念相抵触。对于散处各地被盗严重、玄宫建筑濒危的明代亲、郡王陵可以申请清理发掘,其玄宫建筑经过修复加固后可以开放以供研究和游览之用。对于那些基本保存完好,又非工程征用者,鉴于目前的保护条件,不宜主动发掘墓室部分,只宜尽可能按原状进行外观加固整修。

3. 对陵园周围环境的综合治理

明代帝王陵墓的周围环境保护,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宁夏同心庆藩诸王陵几乎被黄沙淹没,这似乎还可以完全归咎于“自然原因”,姑且不论;许多人造的、近乎疯狂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明代各个帝王陵墓区原本各有大范围的风水环护系统,显然现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它们完全复原。但是由于经济利益驱动等原因,帝王陵墓周边地区的开发利用已经威胁到了陵墓的本身。比如河南新乡的潞简王陵,陵园周围变成了采石场,爆破声震撼着陵园内的石雕构件,有些被震裂、震掉,还有些发生了移位;而作为潞简王陵陵宫背衬的凤凰山也被炸得面目全非^①。1999年初,笔者在这里调查时虽未闻炮声隆隆,却亲见烟尘飞扬,颇惊诧于当地的空气质量

^① 路波:《潞简王墓还能支撑多久》,《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8日第2版。



图 5—11 明潞简王陵后满目疮痍的凤凰山

竟然还不如新乡市区的；所见凤凰山也是满目疮痍（图 5—11）。这座差不多是规模最大的明代亲王陵，就这样完全失去了它的雄姿。我们不敢奢望明代帝王陵墓的周边环境都能恢复到清代甚至是明代的水平，但是每座陵园及其周围小范围内综合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的治理却可以操作，也势在必行。文物保护范围必须明确，文物保护范围之内的职责必须明确，占用单位应该尽早撤出，有害操作应该立即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有关条款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事实上，有一些工作，既保护了文物，又利在当今，推行起来应该没有太大难度。比如明代帝王陵墓大都建于山区或丘陵地带，补栽仪树和种植其他树木，不仅可以恢复陵园旧观，还可以优化环境。在陵园周围环境的综合治理方面，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工作相配合，祖陵、皇陵、孝陵、长陵等十三陵、显陵诸陵都做过不少工作，有些已颇见成效^①。明祖陵的整治工作还与古泗州城等其他文物单位的保

^① 李德仲：《明长陵整治环境再现神采》，《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0 月 24 日第 2 版。

护工作相结合,互为依托,相辅相成^①。

二、明代帝王陵墓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明代帝王陵墓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而且还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因此,在确保文物遗迹和遗址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明陵资源,不但丰富了旅游业的内涵,如果措置得当,还能以旅游业收入的一部分来贴补文物保护经费,是一件双赢的事。除金山景帝陵外,明朝五处皇陵现在都对一般观众开放,其中南京孝陵和昌平十三陵还是旅游热点。昌平陵区开放的二陵——长陵、定陵,每年夏秋旅游旺季时都是人山人海,定陵玄宫中有时甚至会拥挤不堪,不得不进行疏导。与定陵毗邻的昭陵修复陵宫主要建筑并开放后^②,分散了一部分二陵人流,但效果似乎并不如意。相比之下,分布在各地的明代亲王、郡王陵旅游资源明显开发不够,一些王陵虽已辟为旅游区,但门庭冷落,甚至有些是游人罕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资源的闲置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浪费。笔者多年实地调查、参观,颇有一些感触,建议各陵园的文保部门可以考虑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宣传

有不少王陵虽然有深刻的内涵,但却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其症结主要在于宣传不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些专业工作者外,自然不会有其他人光顾。可以通过不同的宣传手段,以喜闻乐见和形象化的形式把王陵的概况介绍给大众——潜在的旅游者。明代的王

^① 祝阅武:《淮安明祖陵和泗州古城重现历史风采》,《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22日第1版。

^② 庄建:《明昭陵修复竣工》,《光明日报》1990年9月1日第2版。

陵虽大多近山而建,但有很多都距离大都会不远,如楚藩诸王陵之于武汉、鲁荒王陵之于曲阜(重点旅游城市)、蜀藩诸王陵之于成都、德藩诸王陵之于济南、潞简王陵之于郑州、靖江诸王陵之于桂林等,可以在这些城市开辟旅游汽车专线,定时往返,只要能坚守信誉、价格适中、方便周到,在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发展的今日,明代王陵之旅定会日渐红火。

第二,提供赏心悦目的旅游场景

一般观众不同于专业工作者,他们也需要全面、有时甚至会是很细致地了解游览对象,但教科书式的正经形式往往会令游人生厌。因此陵园中的介绍说明设施要丰富多样,更要形象生动,如在某些建筑遗址旁竖立建筑复原图,放置廉价材质的按比例缩小的原建筑模型、放映其他相关的音像资料等都是比较可取的方式。另外,昌平明昭陵、遵化清定陵等皇陵的享殿中都有人物蜡像祭祀场景的复原,这种做法既无损于文物、又形象地介绍了明清皇陵的祭祀制度,是颇为可行的一种特殊陈列手段,值得各地开放王陵借鉴模拟。

第三,旅游环境的综合开发

明代帝王陵墓基址的卜选多在风水绝佳的风景名胜之地,可以把王陵及其周围的自然旅游资源和其他人文景观旅游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综合开发利用。如楚王陵群在武昌江夏区龙泉山,当地便把昭王园寝、愍王园寝以及附近的传说汉樊哙墓、唐李道宗墓、明初栽植的菩提树(又名“婆婆树”、“九龙赴会”)以及留云亭、听松阁等一体开发,构成“龙泉山风景区”。再如成都东郊正觉山,为明蜀僖王陵所在,又有因建设工程发掘而迁建来的蜀昭王陵、蜀定王次妃墓和若干太监墓,构成了一个“明陵旅游区”。同时,在基本不破坏王陵小环境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正觉山庄”,提供餐饮、住宿和休闲娱乐,也未尝不是一种思路。这些做法既可以使旅游者得到多方位的旅游享

受,还可以吸引兴趣不同的旅游者和旅游团体。类似办法行之有效,值得借鉴。

三、明代帝王陵墓的研究

关于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笔者以为尚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亟待开展:

第一,是在对各处明陵遗址的调查的基础上整理出若干篇(部)明代皇陵、王陵调查报告,以著录地面遗存、遗址为主,尽可能记录完整的测绘数据,那些进行过发掘或清理的王陵尤其应该尽快整理、发表完整的资料。像蜀、宁、益藩诸王陵经过较为系统发掘的以及楚王、德王、靖江王等整个王陵区域保存相对较好的,应该考虑编纂集中的大型调查或发掘报告。

第二,是在资料相对丰富的基础上,对明代帝王陵墓制度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一些专题性的研究。

第三,是走出陵寝制度本身,利用皇陵、王陵的调查发掘资料对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嫡庶制度、宗藩制度、祭葬观念、灵魂观念等进行研究,还可以利用陵墓中的墓志及其他出土文物进行皇族生活史的专项和综合研究。

愿以本书为引玉之砖,衷心地期待着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能及早更上一层楼。

参 考 书 目

参考书目排列顺序说明:首先为明代以前古籍,大致按成书时代早晚排列;次为明代古籍,排列顺序以官书和记述一代之制者优先,以私著及专门记载居后;次为明、清、民国地方志,基本按刊印时间排列;次为清代古籍,先为关于明史及明陵的专著,再为其他;次为明代陵墓考古发掘调查资料(书籍部分);次为明代陵墓考古发掘调查资料(文章部分);次为明代陵墓研究论文;次为其他朝代陵墓考古发掘调查资料(书籍部分);次为其他朝代陵墓考古发掘调查资料(文章部分);次为相关研究书目;最末为相关研究论文。

《周礼》,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仪礼》,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之《仪礼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礼记》,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之《礼记正义》本,中华书局,1980年。

《春秋左氏传》,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本,中华书局,1980年。

《荀子》,影印浙江书局清光绪《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庄子》,影印浙江书局清光绪《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汉·司马迁:《史记》,顾颉刚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

汉·佚名:《三辅黄图》,何清谷校注本,三秦出版社,1995年。

汉·刘歆:《西京杂记》,向新阳等《〈西京杂记〉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汉·班固:《汉书》,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中华书局,1962年。

汉·荀悦:《汉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汉·刘珍等:《东观汉记》,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元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汉·桓宽:《盐铁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汉·应劭:《风俗通义》,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元大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汉·王充:《论衡》,影印明通津草堂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汉·蔡邕:《独断》,影印《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晋·袁宏:《后汉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晋·司马彪:《后汉书志》,宋云彬等点校《后汉书》本,中华书局,1965年。

晋·张华:《博物志》,影印《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晋·郭璞(题):《葬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宋(南朝)·范晔:《后汉书》,宋云彬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65年。

- 宋(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点校本,岳麓书社,1989年。
- 梁(南朝)·萧子显:《南齐书》,王仲莘点校本,中华书局,1972年。
-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标点本,岳麓书社,1995年。
-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唐·房玄龄等:《晋书》,吴则虞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74年。
- 唐·李隆基等:《大唐六典》,影印《古逸丛书》三编之《宋本大唐六典》,中华书局,1991年。
- 唐·杜佑:《通典》,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 唐·裴庭裕:《东观奏记》,田廷柱点校本,中华书局,1994年。
-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朱东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76年。
-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据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宋版重印本,中华书局,1960年。
-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标点本,中华书局,1975年。
- 宋·欧阳修等:《太常因革礼》,影印清嘉庆《宛委别藏》本,第52、5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李剑雄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
- 宋·李攸:《宋朝事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 宋·程颐:《伊川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 宋·赵明诚:《金石录》,上海涵芬楼影印海盐张氏涉园藏吕无党手抄本,《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48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上海

- 书店重印,1984年。
-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
- 宋·周必大:《文忠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 宋·郑樵:《通志》,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傅根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6年。
- 宋·佚名:《嘉定镇江志》,影印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崔文印《〈大金国志〉校证》本,中华书局,1986年。
- 宋·周密:《齐东野语》,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
- 元·脱脱等:《宋史》,点校本,中华书局,1977年。
- 元·脱脱等:《金史》,张政烺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
-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点校本,中华书局,1959年。
- 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张辅等:《明太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张辅等:《明仁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张辅等:《明宣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孙继宗等:《明英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

- 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李东阳等:《明孝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费宏等:《明武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徐阶等:《明世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张居正等:《明穆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顾秉谦等:《明神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张维贤等:《明光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温体仁等:《明熹宗实录》,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清·不著撰人:《明□宗□皇帝实录》(《明实录》附录一),据梁鸿志影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本《明实录》影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清·不著撰人:《崇祯实录》(《明实录》附录二),据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嘉业堂旧抄本影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清·不著撰人:《崇祯长编》(《明实录》附录三),据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旧抄本影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明·官修:《万历起居注》,《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据天津市图书馆藏明抄本影印,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2001年。
- 明·李东阳等奉敕修、申时行等奉敕重修:《大明会典》,影印明万历十五年刊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
- 明·佚名:《皇明制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镇江府丹徒县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 明·李春芳等:《宗藩条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 明·劳堪:《宪章类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影印万历六年自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 明·朱勤美:《王国典礼》,《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三年周府刊刻、天启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影印明天启刊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朱国桢:《皇明史概》,影印明崇祯原刊本(浔溪朱府藏版),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
- 明·孔贞运:《皇明诏制》,《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南京市图书馆藏明崇祯七年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明·何乔远:《名山藏》,影印明崇祯刊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不著撰人:《太常续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
- 明·范钦等:《嘉靖事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影印明抄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 明·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明·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影印明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明·王在晋:《历代山陵考》,罗振玉辑《殷礼在斯堂丛书》本,东方学会石印,1928年。
- 明·朱元璋:《御制文集》,张德信等编《洪武御制全书》本,黄山书社,1995年。
- 明·朱元璋:《御制文集补》,张德信等编《洪武御制全书》本,黄山书社,1995年。
- 明·朱元璋:《明太祖宝训》,张德信等编《洪武御制全书》本,黄山书社,1995年。
- 明·朱元璋:《皇明祖训》,张德信等主编《洪武御制全书》本,黄山书社,1995年。
- 明·谢缙(题):《天潢玉牒》,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刘辰:《国初事迹》,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朱权:《臞仙肘后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齐鲁书社,1995年。
- 明·佚名:《奉天靖难记》,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佚名:《建文皇帝遗迹》,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叶盛:《水东日记》,魏中平点校本,中华书局,1980年。
- 明·杨瑄:《复辟录》,《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明刻“广百

- 川学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宋端仪：《立斋闲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李东阳：《燕对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陆容：《菽园杂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
-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姚夔：《姚文敏公集》，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本，影印明末刊本，中华书局，1962年。
- 明·徐祯卿：《翦胜野闻》，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陈洪谟：《治世余闻》，盛冬铃点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
- 明·张瀚：《松窗梦语》，盛冬铃点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
- 明·祝允明：《野记》，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许大龄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魏连科点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
- 明·林俊：《林贞肃公集》，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本，影印明末刊本，中华书局，1962年。
- 明·郎瑛：《七修类稿》，点校本，中华书局，1959年；横排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魏连科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

- 明·郑晓:《今言》,李致忠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
-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
- 明·焦竑:《玉堂丛语》,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
- 明·于慎行:《穀山笔麈》,张德信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
- 明·朱赓:《茶史》,罗振玉辑《殷礼在斯堂丛书》本,东方学会石印,1928年。
- 明·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1947年。
-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谭棣华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7年。
-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谢兴尧标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
- 明·文秉:《定陵注略》,影印中央图书馆藏手抄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明·谢肇淛:《五杂俎》,点校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 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衢衢集》,标点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明·李贽:《焚书》,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
-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明·沈榜:《宛署杂记》,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 明·刘若愚:《明宫史》,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明·刘若愚:《酌中志》,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明·刘侗等:《帝京景物略》,标点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明·蒋德璟:《凤泗皇陵论》,附载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十,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明·蒋德璟:《查勘皇陵纪》,附载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十,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明·李国木辑:《地理大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山西大学图

- 图书馆藏明崇祯三多斋刻本,齐鲁书社,1995年。
- 明·李清:《三垣笔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
- 明·张岱:《陶庵梦忆》,点校本,作家出版社,1996年。
- [朝鲜]官修:《朝鲜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李朝实录》本,东京,1956年。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明·李贤等奉敕纂:《大明一统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 明·胡汝砺等修:《嘉靖宁夏新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明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 明·刘大谟等:《(嘉靖)四川总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 明·胡汝砺纂修、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陈明猷点校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 明·柳瑛:《中都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明隆庆三年重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 明·于慎行:《兖州府志》,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齐鲁书社,1985年。
- 明·曾惟诚:《帝乡纪略》,《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 清·陈食花修、锺锸等纂:《益都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康熙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龚松林纂修、汪坚总修:《洛阳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乾隆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舒其绅等修、严长明等纂:《西安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

- 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 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 清·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 清·黄之隽等编纂:《江南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 清·张金城修、杨浣雨辑:《宁夏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嘉庆三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 清·常明等修:《四川通志》,影印清嘉庆刊本,巴蜀书社,1984年。
- 清·贵泰等纂:《安阳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民国二十二年北平文岚簃古宋印书局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 清·高廷法修、陆耀遯等纂:《咸宁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嘉庆二十四年修、民国二十五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
- 清·穆章阿等续修:《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据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清国史馆道光二十二年进呈写本重印,中华书局,1986年。
- 清·杨国泰纂修:《太原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道光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陈士楨修、涂鸿仪编辑:《兰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道光十三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舒化民修、徐德城纂:《长清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罗廷权等:《同治重修成都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清同

- 治十二年刊本,巴蜀书社,1992年。
- 清·王庭楨修、彭崧毓纂:《江夏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同治八年刊本、光绪七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英启修、邓琛纂:《黄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恩联修、王万芳纂:《襄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于万培等修、谢永泰续修:《凤阳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
- 清·周家楣等纂修:《光绪顺天府志》,左笑鸿等据清光绪十五年刊本标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清·杨笃纂修:《长治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二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潘守廉修、张嘉谋纂:《南阳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三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魏家骅等:《凤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三十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
- 清·张曜等修、孙葆田等纂:《山东通志》,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1915年初刊本校订重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周秉彝等修、刘瑞璘等撰:《郑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二十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王琴林等纂修:《禹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二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李起元等修、王连儒等纂:《长清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廿四年山东省政府印刷局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 翁怪修、宋联奎纂:《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

- 二十五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
- 陈伯嘉修、李成钧等纂:《重修汝南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廿七年石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清·吴履福等修、缪荃荪等纂:《光绪昌平州志》,《中国方志丛书》据民国二十八年铅字本重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 清·张廷玉等:《明史》,郑天挺等标点本,中华书局,1974年。
- 清·谈迁:《国榷》,张宗祥点校本,中华书局,1958年。
- 清·查继佐:《罪惟录》,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清·王弘撰:《山志》,何本方点校本,中华书局,1999年。
- 清·吴伟业:《绥寇纪略》,李学颖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清·温睿临:《南疆逸史》,影印清道光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魏得良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
-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任道斌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
- 清·夏燮:《明通鉴》,影印清光绪二十三年湖北官书处重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清·龙文彬:《明会要》,标点本,中华书局,1956年。
- 清·梁份:《帝陵图说》,清汪鱼亭传抄本,北京十三陵特区影印本。
- 清·佚名:《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 清·图海等:《清太宗实录》,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中华书局,1985年。
- 清·巴泰等:《清世祖实录》,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中华书局,1985年。
- 清·马齐等:《清圣祖实录》,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中华书局,1985年。

- 清·鄂尔泰等:《清世宗实录》,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中华书局,1985年。
- 清·庆桂等:《清高宗实录》,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中华书局,1986年。
- 清·曹振鏞等:《清仁宗实录》,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中华书局,1986年。
- 清·文庆等:《清宣宗实录》,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中华书局,1986年。
- 清·崑冈等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清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石印本,中华书局,1991年。
- 清·蒋良骥:《东华录》,林树惠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0年。
-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点校本,北京出版社,1962年。
- 清·顾炎武:《日知录》,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清·谈迁:《北游录》,点校本,中华书局,1960年。
-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 清·查慎行:《人海记》,石继昌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清·陈确:《陈确集》,点校本,中华书局,1979年。
- 清·嵇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中华书局,1957年。
- 清·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影印清道光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 1990年。
- 清·于敏中等奉敕纂：《钦定日下旧闻考》，点校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排印本，华龄出版社，2002年。
- 清·昭槤：《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本，中华书局，1980年。
- 清·戴璐：《藤荫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清·俞樾：《〈日知录〉小笺》，《〈日知录〉集释》影印《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赵尔巽等：《清史稿》，标点本，中华书局，1976年。
- 刘仁甫：《前明十三陵始末记》，铅印本，1915年。
- 王焕镛：《明孝陵志》，南京中山书局，1934年。
- 黄鹏霄等：《明陵、长城调查报告》，载《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1935年。
- 汤用彬等：《旧都文物略》，北平市政府编印，193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 北平特别市政府工务局：《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怀英制版局铅印本，1936年。
- 商传：《明十三陵》，北京出版社，1978年。
- 定陵博物馆编：《定陵——地下宫殿》，北京出版社，1978年。
- 南京博物院：《明孝陵》，文物出版社，1981年。
- 金世绪：《漫话十三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 魏玉清：《明十三陵》，中国旅游出版社，1983年。
- 李登勤：《特殊的明帝陵——显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李世源：《明祖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 路秀闽：《明鲁荒王陵——地下宫殿》，山东友谊书社，1988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

- 杜彤华:《潞王与潞王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 蒋中健:《明代第一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 中山陵园管理处文物管理办公室:《朱元璋与明孝陵》,南京出版社,1996年。
- 袁家新主编:《楚天名胜龙泉山》,武汉出版社,1995年。
- 胡汉生:《明十三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 胡汉生:《明朝帝王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 中山陵园管理局等编:《〈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 庞中威:《定陵发掘亲历记》,学苑出版社,2002年。
- 刘敦桢:《明长陵》,《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1933年。
- 朱僎:《谒昌平明十三陵记》,《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期,1935年。
-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四府井明安僖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 郭勇等:《明晋裕王墓的清理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白马寺第六号明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
- 沈彭年:《东善桥娘娘坟发现宣德瓷瓶》,《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 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 长陵发掘委员会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
- 长陵发掘委员会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续)》,《考古》1959年第7期。
- 刘占炎:《明监国鲁王墓发现经过》,《中华日报》(南部版)1959年11月14日第2版。
-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附沐英墓),《考古》1960年第9期。
- 戴尊德:《山西太原七府坟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中华门外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2年第9期。
- 张正祥:《明祖陵》,《考古》1963年第8期。
- 郭远渭:《南昌明宁康王次妃冯氏墓》,《考古》1964年第4期。
- 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
-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汪兴祖墓清理简报》,《考古》1972年第4期。
-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棻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 蚌埠市博物展览馆:《明汤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2期。
-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焯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 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 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

第5期。

刘精义等:《明代妃嫔陵园及圻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刘聿才等:《祖陵石刻修复》,《文博通讯》1982年第5期。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保定地区博物馆:《明两京司礼监太监牛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刘聿才等:《明祖陵述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花坛三座明代墓葬》,《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郑州市博物馆:《荥阳二十里铺明代原武温穆王壁画墓》,《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李登勤:《钟祥明显陵调查记》,《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许成等:《同心县任庄村明代王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文物出版社,1985年。

河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河南省文物普查大观》,《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薛文:《明僖王陵及明蜀藩王墓群简介》,《成都文物》1986年第4期。

罗标元等:《靖江王墓群简介》,《广西文物》1987年第1期。

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明靖江王十一陵述略》,《广西文物》1987年第2期。

李献奇等:《明福王朱常洵圻志》,《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蒋中健:《明祖陵浅探》,《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

-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王妃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
- 吴兴汉:《嘉山县明代李贞夫妇墓及有关问题的推论》,《文物研究》总第4辑,黄山书社,1988年。
- 李登勤:《特殊的明显陵》,《紫禁城》1988年第6期。
-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文物》1989年第7期。
- 赵福生:《十三陵主神道发掘简记》,《北京考古信息》1990年第2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印,内部发行,1990年6月。
- 胡振祺:《明晋王陵园出土金锭》,《文物》1991年第1期。
- 王剑英:《明中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2期。
- 李波涛:《卫辉清理一明亲王次妃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5月5日第1版。
-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1991年成都市田野考古工作纪要》,《成都文物》1992年第1期。
- 梁柱等:《武昌县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
- 傅守平:《明代楚昭王朱楨墓发掘简讯》,《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
- 不著撰人:《卫辉市清理一座明代亲王次妃墓》,《中国历史年鉴·1992年》,三联书店,1993年。
- 蔡华初:《明楚昭王朱楨墓》,《文物天地》1993年第3期。
- 徐兴万等:《明乐安昭定王墓清理纪实》,《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 鲁波:《济南市五峰山发现明德王墓》,《文物》1994年第5期。
- 范胜雄:《明监国鲁王三冢略记》,《台南文化》新卅七号;台南,1994年7月。
- 谢碧连:《金门文物保存——风狮爷、鲁王墓》,《台南文化》新37号;

台南,1994年7月。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王翰章:《明秦藩王墓群调查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

周致元:《明代凤阳的皇陵》,《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施连山:《明肃王墓考略》,《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谢涛:《成都发掘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村明蜀王及王妃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22日第1版。

彭桂容:《南城发现明代益恭王朱厚炫夫妇墓志》,《中国文物报》1988年4月1日第2版。

丁家元:《荆州勘明湘王府城遗址》,《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第1版。

秦士芝:《明祖陵的营建及其神道石刻》,《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

南京文研所:《明孝陵陵宫门基址清理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2日第1版。

祝建华等:《奇特的明代帝陵——显陵的建筑艺术》,《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

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蕲国公康茂才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周致元:《明祖陵的地位和影响》,《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 襄樊市考古队等:《明襄阳王墓调查》,《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 李德仲:《明长陵整治环境再现神采》,《中国文物报》1999年10月24日第2版。
- 贺云翱等:《南京明孝陵及东陵考古获多项发现》,《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7日第1版。
-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明祖陵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0年第4期。
-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流芳岭明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
- 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 谢涛:《成都市潘家沟村明蜀王、王妃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年》,文物出版社,2000年。
- 徐机玲:《南京兴建首座帝王陵遗址公园》,《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1日第2版。
- 梁柱:《钟祥明代梁庄王墓的发掘》,《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
-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载《1999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年。
- 樊昌生等:《南昌发掘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8日第1版。
-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 樊昌生等:《宁靖王妃盛装出土》,《文物天地》2002年第3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 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 肖建一等:《西安发现明代秦王家族墓葬》,《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22日第1版。
- 林健:《兰州明肃王府遗迹、遗物调查研究》,《陇右文博》2005年第1期。
- 孔繁峙:《试谈明墓随葬梅瓶的使用制度》,《文物》1985年第12期。
- 阮荣春:《论明代祖陵、孝陵石刻之时代》,《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 王岩等:《明十三陵的陪葬墓——兼论东西二井陪葬墓的墓主人》,《考古》1986年第6期。
- 李世源:《明祖陵建造时间考》,《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
- 黄展岳:《明清皇室的宫妃殉葬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1期。
- 胡汉生:《明定陵玄宫制度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 霍巍:《论江西明代后期藩王墓葬形制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 孙祥宽:《凤阳明皇陵及其石刻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 李秀萍等:《沁阳市出土的朱载堉残碑》,《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 任新建:《明蜀僖王陵藏式石刻考释》,《四川文物》1995年第3期。
- 刘毅:《明朝“陵山之祭”述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
- 刘毅:《明清皇陵制度比异》,《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
- 刘毅:《明朝皇陵祭祀制度研究》,《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6月。
- 刘毅:《明代帝王陵墓选址规则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

- 中华书局,2001年6月。
- 刘毅:《明代皇陵陵园结构研究》,《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
- 王纪潮:《明代亲王葬制的几个问题》,《文物》2003年第2期。
- 董新林:《明代诸侯王陵墓初步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
- 许智范:《江西明代藩王墓考古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
- 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奉天图书馆,1934年。
- [日]田村实造等:《庆陵》,京都大学座右室刊行会,1953年。
-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文物出版社,1957年。
-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62年。
- [日]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株式会社同朋舍,日本京都,1977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于善浦:《清东陵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 洛阳市文化局:《洛阳市文物志》,洛阳市文化局内部刊行,1985年。
-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 孙中家等:《中国帝王陵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髡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

1993年。

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

叶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洛阳古代艺术馆:《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年。

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

宋大川等:《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世纪郑州考古》,香港国际出版社,2004年。

刘敦桢:《易县清西陵》,《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中国

- 营造学社,1935年3月。
-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期,1951年。
- 王思礼:《山东邹县城东匡庄的古代石人》,《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
- 陶鸣宽等:《芦山县的东汉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年第4期。
-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 马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记》,《文物》1964年第1期。
- 孔次青:《山东曲阜孔林发现汉代石兽》,《考古》1964年第4期。
-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
-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
-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第3期。
- 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 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考古》1966年第5期。
- 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 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汉墓》,《文物》1973年第4期。
-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
-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第8期。

- 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 宁夏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 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 傅永魁:《巩县宋陵》,《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
- 王世和等:《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 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学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 耿继斌:《高颐阙》,《文物》1981年第10期。
-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第3期。
-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 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学集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
- 许子荣:《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
- 方殿春等:《清武功郡王、恪恭贝勒二墓》,《辽宁文物》总第5期,1983年。
- 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 南京博物院等:《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 王仲谋等:《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 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 泾阳县文教局:《唐贞陵调查记》,《文博》1986年第6期。
- 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1987年。
- 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
- 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清西陵崇陵地宫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0年第2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等:《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
- 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市1990年田野考古工作纪要》,《成都文物》1991年第1期。
- 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闽王王审之夫妇墓清理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三号陵园东碑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 傅永魁等:《河南巩县宋永昭陵的考察》,《考古学集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 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第4期。
- 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 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
-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 宋大川等:《金陵遗址第一阶段调查报告》,《北京文博》2001年第3期。
-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银川市西夏3号陵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8期。
- 宋大川等:《金陵遗址主陵区第二阶段调查报告》,《北京文博》2002年第3期。
- 周原考古队:《周原李家楼铸铜作坊遗址发掘和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1日第1版。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

- 发掘》,《考古》2004年第2期。
- 董新林等:《辽代祖陵陵寝建筑初现端倪》,《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26日第1版。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园考古队:《秦始皇陵》,《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文物出版社,2004年。
- 昭陵考古队:《昭陵北门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文物出版社,2004年。
- 朱亮等:《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调查钻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7日第1版。
- 韩国河:《东汉陵墓踏察记》,《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出版社,1980年。
-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中国名胜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
- 刘敦桢:《刘敦桢文集》第2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 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 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
- 夏鼐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986年。
-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影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版,中华书局,1986年。
-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
-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管会:《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管会刊印,1986年12月。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编印,1988年。
-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 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 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
- 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
- 王国维:《古史新证》,影印北京来薰阁1935年之影印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 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杨焕成等主编:《河南文物名胜史迹》,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
-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
-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
-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
- 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刘毅:《明清宫廷生活》,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 洛阳古代艺术馆主编:《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年。
-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
- 青州博物馆:《青州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3年。
-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孙家骅等:《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 陈仲篪:《宋永思陵平面及石藏子之初步研究》,《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3期,1936年9月。
- 矩斋:《古尺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 冯汉骥:《论南唐二陵中的玉册》,《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 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
-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 傅天仇:《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1964年第1期。
-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
- 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
- 赵康民:《秦始皇陵原名丽山》,《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 蒋英炬等:《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 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
- 王学理:《“秦始皇陵原名丽山”的再议》,《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 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
- 刘庆柱:《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 张文立:《秦陵墓上石刻探微》,《文博》1992年第5期。
- 刘毅:《昭西陵与清朝帝后丧葬礼俗更易》,《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
- 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
- 罗西章:《西周王陵何处觅》,《文博》1997年第2期。
- 刘毅:《清初三陵制度述论》,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 刘毅:《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论纲》,《南开学报》2001年增刊,2001年12月。
- 姜捷:《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后 记

本书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开始构思到现在,光阴荏苒,已经过去十年。1995年10月,最初以课堂讨论形式把“明代藩王陵墓制度研究”作为论文选题之一;1996年春以后逐步完善提纲,补充、搜集资料,反复对比甄别,并陆续写成若干片段;一些成熟的部分在期刊上陆续先行发表。1998年10月起,开始正式缀合成文。也正是在这时,没有基本的精神准备,我开始成为所在文物博物馆学专业的实际负责人,种种纷繁,令我焦头烂额。本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就难免要超负荷工作,而此时正处在写作冲刺阶段的博士论文,首当其冲地受到较大的干扰和影响,在资料齐备的情况下,每天能写两三百字就已经算是“高速度”。1999年4月终于完成论文初稿,5月中旬送审并申请论文答辩;同年6月8日通过答辩。

尽管答辩委员会的“决议”给了这篇论文以比较高的学术评价,但我对它并不很满意,希望能够极早修订,以便对于这项研究有一个阶段性的交代,然而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因循下来。1999年6月以后的一年多,白天多忙于专业的公务,晚上要抽时间从事我的主攻专业——中国古陶瓷研究,这当中还经历了申请博士后研究失败等挫折,其间甘苦与委屈非局外人所能完全理解。2000年8月底至次年8月底,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我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等单位作访问学者,从事“中韩古代陶瓷器比较研究”。回国后,又因试图调换工作环境、职称评定等琐事而心神不定三、四个月。2002年年初,始立足现实,调整心态,全力从事中国陶瓷考古研究。如此,自答辩

以后,大约有三年半的时间,我基本没有再继续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只是间或补充一些新公布或新发现的资料,校订舛误,个别相对独立的章节抽出来作为论文发表。要说明的是,导致这部书稿长期搁置的主要原因,除我个人拖沓外,还更有因为选题偏、读者面窄而没有经济效益,基本不可能出版的因素。其间先后联系了几家出版社,都不了了之。

2003年寒假,我开始重新修订本书。促成此举的重要契机,就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决定以“211 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重点建设项目”的经费资助本书出版。此后不久,我又复任历史学院文物博物馆系主任,这虽然是一个虚体系,但由于学科特殊性等原因,其实际工作量要远远多于本院其他两系,再加上我每年都须承担本科生、硕士生的8门课程,平时少有闲暇时间,因此,本书的集中修改基本全是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的寒假和暑假这6个时间段内完成的。其间曾在2004年8月、2005年3月两度结稿,终因意有所嫌而再度重新修订。

以上是本书的写作和修订经过。

相对于1999年6月论文答辩时的打印稿,2004年8月稿增加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以后的两次修订又略有增补,2005年8月的修订并将以前因故删节的内容也都作了复原。总括通过论文答辩以后增补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1999年4月以后公布的有关明代帝王陵墓的考古发掘和调查资料,如明祖陵、梁庄王陵、襄藩诸王陵等;有些在原稿中用报道、资讯或调查记录等其他形式资料者,也因有发掘简报面世,进行了相应的材料替换,如楚昭王陵、蜀僖王陵等。

二、笔者在1999年春以后调查或再次调查的明代帝王陵墓资

料,在相应章节作了若干订正或增补,如盱眙祖陵、凤阳皇陵、孝陵及东陵、景帝陵、鍾祥显陵、秦藩王陵、周定王陵、楚藩王陵、蜀僖王陵及昭王陵、肃藩王陵、襄藩王陵、德藩王陵、靖江诸王陵以及可资对比的清代若干皇陵等。另外,有些资料,如某些调查资料,原来认为价值不大略而未用,现一并收入,尽可能做到资料赅备。

三、增补、抽换了若干文献史料,明代存世史料相对比较多,有些内容在不同史籍中互见。在修订过程中尽可能都选用时代最早或者是最权威的史料,至于内容主旨、甚至文字完全一致者,则尽量避免同一书目的征引频率过高,以增强可信度,避免孤证之嫌;诸书记载有异同者,则尽量并存,以资同好考校。

四、全书文字叙述普遍细化,有些在旧稿中未曾展开讨论的问题,增补了论证过程和论据,如第二章中的懿文东陵、第四章中明陵对于前代陵寝制度的继承问题等。

五、增补了原学位论文中所没有的内容,其一是明清以来相关地方志中关于明代帝王陵墓的有关记载,其二是关于明代帝王的装殓、葬式和随葬品的分析。这两部分内容的基本资料在1998年10月以前已经作过初步的分析和处理,有些还写过初稿片段,因为当时感觉与文章主旨关系不十分密切,在内容上也不便归类,特别是方志资料,如专成一节,则有掉书袋之嫌;加之彼时因故而缺乏“熟虑之”的时间条件,均舍而未用。这两部分占全书增补内容的一半以上。此外,在第二、第三章中还相应增补了明代后妃制度和皇子制度,作为相关讨论的背景资料。至于各章的附图,因为受印刷条件限制,答辩稿只用了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修订时增补的。

六、结构作了一些调整,从内在逻辑出发,使之更趋合理,其间大端,如将原在第四章中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变迁”移入第二章等。

由于以上增删修订,节、目也因而作了相应的调整,但章结构保

持原样,全书的基本观点亦无变化。

这是关于增补修订内容的说明。

这部书的最终完成,得益于尊长殷切的教诲和众师友的热忱帮助。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冯尔康教授,我于1995年9月开始正式师从冯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其实,在这之前10年读大学本科时我即表达了师从他继续深造的愿望,只是一直未能如愿。冯先生端方的品性、严谨的学风一直是我心向往之的楷模。在学四年期间,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严格要求,悉心栽培,更让我受益匪浅,这部书稿凝聚着老师的心血。最近几年,他又以古稀高龄多次鼓励、敦促我将本书及早整理出版,关爱之情,拳拳殷切。尽管就学科领域而言,我可能是冯先生最不成器的学生,但仍希望今后能继续蒙先生不弃,常随左右,聆听教诲。

在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刘庆柱教授、王天有教授、张国刚教授、罗澍伟教授的指教让作者受益良多,而拙文的其他论文评阅人郑克晟教授、马文宽教授、王思治教授也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同样给了作者以有益的教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先生,在1999年6月以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和我的这项研究,本书增补的内容很多都是在刘先生的具体指导之下完成的。刘先生多年坚守在汉唐都城和皇陵考古发掘和研究第一线,是这方面的权威,因而他给我的指导不仅有具体内容的指教,在方法论上也有启示意义。特别要说明的是,本书的2004年8月稿还经过刘先生逐字审读,指摘谬误,至于句逗;为本书能早日梨枣,他还直接出面联系有关出版社,终因经费问题无法谈妥而作罢。

此外,在本书写作和修订过程中,李伯谦教授、朱凤瀚教授、刘泽华教授都曾经从不同方面给予过作者中肯的教诲和帮助。

此项研究虽然正式开始于1995年,但我对于这个题目的关注却要早得多,此前我曾不止一次遍谒昌平十三陵,徜徉其间,流连忘返。直到1985年年末,读了杨宽先生所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我才知道这一领域不但饶有趣味,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部书是引导我走向古代陵墓制度研究的启蒙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由衷地感激杨先生,尽管我从未与这位前辈学者有过交往。

四年博士在学期间,导师经常组织我们以课堂讨论的形式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互相取长补短。常建华、杜家骥、孙立群、阎爱民、余新忠、杨杭军、赵全鹏、吴存存、周正庆、金承修诸同窗对于我的论文都曾经有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中有的人本来就是我读本科时的老师。

笔者历年对明代及相关朝代帝王陵墓进行考古调查和资料搜集时,江苏、安徽、北京、湖北、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甘肃、宁夏、江西、广东、广西、辽宁、河北等省市的师友同仁提供了诸多便利和帮助,他们分别是:刘尊志、周保平、贺云翱、路侃、季倩,李广宁、邓峰,黄秀纯、李刚、耿捷,万全文、魏航空、贾纪华、涂明龙、朱德春、陈千万、王先福、潘杰夫、幸运华、李易、张万高,王原茵、田静、范淑英,孙新民、任伟、康国义、杨文胜、教之忠,郭思克、孔祥峰、刘伯勤,翁善良、赵川荣、李加峰、戴夔、李明斌,林建、贾建威,杜玉冰、哈艳,许智范、陈柏泉,黄洪流、陈少辉,邹中清,李声能、陆海英、邢启坤,于善浦等。没有这些师友们的无私帮助,这样一部以实物资料为主要依托的著述根本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本书插图,照片为作者自己拍摄,大部分线图则引自原发掘报告或简报等,其出处在相应部分都作了说明,在此也向各位原作者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南开大学“211 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重点建设项目”的经费资助,感谢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为本书提供了割剜的机会,感谢李治安院长最终指定本书送人民出版社梓行。南开大学文物博物馆学系教师袁胜文博士为本书描绘了部分线图,研究生李敏行、耿超、王国颖帮助笔者复核了部分地方志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本书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编审为本书的出版精心编辑、认真审校,使本书增色,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最高学位的研究成果即将面世之际,我更应该感谢父母四十余年来的养育和教诲之恩;感谢我的妻子、儿子为我提供的多方面帮助和种种便利。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者驽钝,学识有限,而本项研究可资借鉴的前期研究成果又甚少,复经前后十年之拖沓,因而本书中肯定会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祈诸师友不吝赐教。盼望本书能作为引玉之砖,有更多的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成果以此为阶石脱颖而出。

刘毅

2005年8月15日